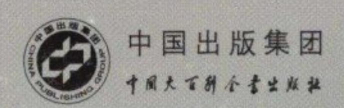
加拿大史

罗伯特 · 博斯韦尔 著

裴乃循 符延军 邢彦娜 耿小岩 译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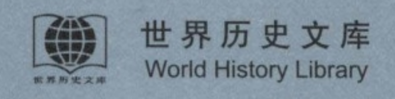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ISBN 978-7-5000-8748-9

9 787500 08748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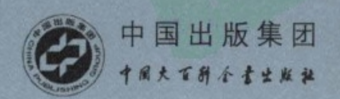
定价：58.00元



加拿大史

罗伯特·博斯韦尔 著　裴乃循 符延军
邢彦娜 耿小岩 译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图字:01 - 2010 - 18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拿大史/(加)博斯韦尔著;符延军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000 - 8748 - 9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加... II. ①博...②符... III. ①加拿大—历史 IV. ①K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009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施 楠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57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故乡　/　1

最早的居民　/　5
首次"邂逅"　/　9

第二章　无主之地　/　19

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的战争　/　25
新法兰西的幸存者　/　29
王室政府　/　31

第三章　扩张和巩固　/　34

塑造美洲的欧洲　/　35
印第安式的民主　/　38
定居新法兰西　/　40
阿卡迪亚　/　44
殖民地的扩张和毛皮贸易　/　45
帝国的气息　/　49

第四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1)　/　50

安妮女王之战　/　52
战争中的和平　/　56
来自英国的挑战　/　60
不战不和　/　64
七年战争　/　67
缔结和约　/　74

第五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2)　/　76

帝国的理由(1763—1774)　/　78

叛乱的过程 / 83
和平、美国人与效忠派 / 91
战争的后果 / 93

第六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3) / 95

帝国政治 / 98
政府、土地与印第安问题 / 100
土地与忠诚 / 103
英属北美的立法 / 106
战争与殖民地的安宁 / 109
上加拿大 / 112
下加拿大 / 114
1812 年战争 / 118

第七章 转变与联合(1815—1840) / 126

划定与保卫边界 / 132
停滞的政治经济 / 137
上、下加拿大 / 140
下加拿大 / 142
上加拿大 / 151
德拉姆伯爵与加拿大联邦 / 157

第八章 从殖民地到省 / 161

再造帝国 / 162
不尽责帝国的责任政府 / 167
政府的作用 / 171
政治与发展 / 177
南北战争 / 179
联邦 / 182

第九章 扩张与失望(1867—1896) / 185

里埃尔与铁路 / 188

平定西部 / 195
铁路与国家政策 / 200
又是美国人——交易与互利 / 206
宗教与爱国主义 / 209

第十章 繁荣与萧条(1896—1914) / 212

发展中的政治 / 215
铁路与过度发展 / 219
经济繁荣 / 222
组织改革 / 224
帝国政治 / 228
一笔勾销 / 238
白雪佳人 / 240
萧条与战争 / 245

第十一章 摆脱束缚(1914—1930) / 248

战争与分歧 / 252
政治、资金和军需品 / 258
战略与伤亡 / 260
意外与先例:加拿大和大英帝国 / 264
战争的后果 / 270
20 年代的政治与经济 / 274
外交,对内和对外 / 276

第十二章 敌意的世界(1930—1945) / 282

老计策,新挫折 / 285
金与乱象 / 291
复杂的姑息政治 / 296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 302
征兵的诅咒 / 308
第三大军队 / 312

第十三章　馈赠礼物时期(1945—1963)　/　316

婴儿潮　/　321
重建与恢复　/　322
制造破坏的怪物　/　324
加拿大与帝国的结束　/　332
能源政策　/　337
民族主义与反美主义　/　340
迪芬贝克现象　/　341
20世纪50年代末的文化与社会　/　344
矛盾的魁北克　/　345
迪芬贝克的衰落　/　346

第十四章　富足及不满(1960－1980)　/　350

安全政治　/　357
贸易条件　/　361
越南的阴影　/　363
脱节的时代　/　365
变化中的加拿大　/　369
联邦－省的灾难　/　371
暗夜冰封　/　372

第十五章　两种民族主义　/　377

1967年世博会及其后　/　386
十月危机和此后的日子　/　389
布拉萨和魁北克人党　/　395
首脑之争:特鲁多和勒韦克　/　399
特鲁多宪法　/　404
特鲁多的政绩　/　408

第十六章　80年代的繁荣与萧条　/　411

马尔罗尼、政治与贸易(1984—1993)　/　415

联邦政治的毒害 / 426
马尔罗尼时代的结束 / 433

第十七章 新千年、新世界 / 437

多元文化论 / 440
魁北克的动荡不安 / 442
极端政治 / 448
自由党的外交 / 453
相同的领导、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世纪 / 458
外部边境 / 462
政治分歧 / 468
结论 / 471

致　　谢 / 474

索　引 / 476

第一章　故乡



1612 年，塞缪尔·德·尚普兰的画作中所描绘的 17 世纪早期的蒙塔格奈人家庭。

3 有人一直认为，过于辽阔的国土是加拿大的一个弊端。作为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它从温哥华岛的雨林延伸到北极圈满是细石的沙漠，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加利福尼亚北端的纬度（几近如此）到北冰洋。加拿大的范围，从东部海洋到西部海洋，再到北部海洋，是演说家的梦想，亦是管理者的噩梦。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它的繁荣使很多政客省去在公开场合中讲出独到见解的麻烦。但是如人口一样，繁荣的分布很不均衡，高度集中在某些揣在口袋里的宝地。幸运的是，不多的人口和充分的繁荣已经绰绰有余。也许，只有这样稀少的人口才能使加拿大完成其政治使命。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限制了加拿大的人口。其中，地质环境的变迁也发挥了作用。南、北美洲在数百万年前便具有了现在的模样，数千公里的海洋将它们与欧亚大陆及非洲大陆分隔开来，只靠阿拉斯加州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小片浅海，即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连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白令海峡并非总是被水覆盖，因为随着气候变冷，欧亚大陆及北美大陆最北的地区变得严寒难耐。在更新世冰期，北美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被绵延的冰川覆盖，使这片大陆余下的可居住地区——现今华盛顿特区所在纬度以南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分隔开来。由于海水被吸入巨型冰川，海平面降低，横跨白令海峡的大陆桥变得广阔。

4 冰河时代前的美洲拥有与欧亚大陆种群相似的、丰富的动物资源，包括马、乳齿象和虎。这些动物很多在冰河时期生存了下来，原因是当时没有足以将它们捕杀至绝迹的猎食者。但是就分布于大洲之上的植物和动物种群而言，它与欧亚大陆的区别产生了。人类祖先的缺失便是其中之一。

人类祖先的最早足迹见于非洲，可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更新世时期。第一个现代人种，即智人似乎进化于约150 000年前，同样出现于非洲。约两万年前，智人取代了其他的人种，从非洲扩展到欧亚大陆，来到广袤的大陆块的东北角——西伯利亚东部。那里气候寒冷，千里冰封，被3 000多米厚、从北极漂来的巨型冰川覆盖。然而，当时的

海岸比现在的向外延伸得远得多。

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冰覆盖。特别是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Alaska）间的地区［学者将其称为“白令陆桥（Beringia）”］是干燥的，虽然寒冷且使人难耐。而且即使穿过白令陆桥，早期人类也发现并非处处皆冰。距今15 000年至13 000年间，冰盖开始退缩，敞开了一条大致沿落基山脉，且南北走向的无冰走廊。学者们为这条走廊以多快的速度开通、并且开通了多少而争论着，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约11 000年前，人们可以通过北美西北的内陆从阿拉斯加南下至大平原的草地及其以外的地区，并再向南到达墨西哥北部的温带地区。①

人们确实进行了迁徙，但他们的迁徙（可能包括水路和陆路）很难追踪，而且要考古学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就更难了。最谨慎且保守的解释是，人类于12 000年前到达阿拉斯加，并于11 000年前到达今天美国的西南部。那时，一片巨大的冰盾仍然覆盖着如今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横贯东西，尽管它已开始沿南部边缘融化。随着冰面的退去，暴露出的土地首先变成了苔原，然后是整齐的矮树，最终成为林地。动物随着进化的林区生息繁衍，而人类捕食动物，代代相传。

5

北美的最早居民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似乎捕食了一些北美终将灭绝的动物：例如，消失了的猛犸象、骆驼、乳齿象、巨型树懒和马。两米长的巨型海狸也不复存在。但很多其他的猎物，如鹿、驼鹿、熊和海狸，足以养活有限的人口。

11 000年前的北美居民，像其他洲的其他族裔一样，使用石器和木制的工具。但与居住于亚洲及欧洲的人类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将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或15世纪与欧洲探索者接触的时候。但这并非是美洲居民与其他海外居民的唯一不同之处。

在亚洲西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的居民栽种植物，驯养动物。

---

① 一段时间以来，位于育空地区老乌鸦的一处地点被认为是人类很久以前迁移到达（27 000年前）北美洲的隐匿证据，但是运用更为先进的科学手段再次进行年代测定后，这个时间缩至仅为3 000年以前。Alan D. McMillan，*Nativ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Canada*：*An Anthropological Overview*，2nd ed.（Vancouver：Douglas & McIntyre，1995），28.

通过实践农耕，他们可以避开狩猎和采集，不再依附这两种手段作为生存的基础。农业需要组织筹备，但它也供养了更多的人口。于是便出现了村落，接着是城镇和城市，最后形成了有组织的国家，即出现于约公元前3700年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紧随其后。金属工具也应运而生，首先是铜制或青铜工具。此后，约公元前1000年，出现铁制用具。车轮的发明使运输变得便利——运输依靠对马的驾驭实施。所有这些文化的传播，使越来越大的城邦的出现成为可能，并在亚历山大帝国和此后的罗马帝国发展到巅峰，二者在面积最为广阔之时，均横跨5 000千米的土地。[①]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于公元前2000年前产生了国家结构，且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持续到20世纪。）

为什么美洲没有走同样的道路？首先是地理条件不利，多山脉、沙漠，使得交通变得困难。另一原因在于可耕种的植物及可驯养的动物。那里适合耕作的植物少之又少，农业传播缓慢。没有马匹和车轮，缺少一定规格的船只，无论是人还是物资的大规模运输都严重受限。家畜仅限于狗和美洲驼，而且只有居住于美洲南部山脉的人使用美洲驼。当然也有独木舟，但无论是被挖空的树干型还是木制独木舟，都无法与欧亚大陆的巨型船只相提并论。

6

在如今的加拿大，定居随着冰盾的逐渐消失而缓慢地进行着。直至9 000年前，加拿大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被以昂加瓦为中心的冰冠覆盖；冰冠完全融化还需要千年的岁月。冰冠的边缘周围尽是如阿加西兹般的冰湖，位于（或覆盖）马尼托巴和易洛魁地区，几乎为现今五大湖区的所在地。而所形成的冰冠边缘为正在进化的针叶林，由南部的松树、西部的云杉、西北和东部的桦树组成。树林外是大草原，在西部扩展，并向东部和北部逐渐转移。在森林之外或之中，生活着人类，还有供其猎捕的动物。

---

① 关于这些要点见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Norton，1999），362－363。

地理环境发生了改变。冰冠融化，海平面升高。而通往西伯利亚的大陆桥白令陆桥也消失了。东部海岸的岛屿——纽芬兰岛和圣劳伦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上的岛屿——呈现出如今的模样。随着冰冠重量的减轻，陆地出现了。最终，随着冰冠融化成水源，北美内陆的大湖——大奴湖、大熊湖、阿萨巴斯卡湖、马尼托巴湖、温尼伯湖及加拿大东部的五“大”湖——也显现出如今的轮廓。

最早的居民

考古学家认为，北美最早的居民为古印第安人（Paleo – Indians）。古印第安人同时向北和向南迁移，最终到达南美的火地岛和北方苔原带边缘的林木线。这些人聚集成 15 至 50 人不等的群体，共同狩猎，将磨尖的琢石固定在长矛的顶端作为工具——一种叫做克洛维斯枪头的工具，因其后来在新墨西哥的克洛维斯被发现而得名。

7

随着气候的改善，克洛维斯文化（Clovis Culture）逐步变得精致且人口更加稠密起来，考古学家称其为古时期（Archaic）。这段时期被认为是适应时期，其间，北美的民族根据地区所呈现出的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区分开来。现在的人口数以百计，通过更加可持续且有计划的狩猎来糊口。虽然饮食仍仅限于肉或鱼，但东部林地的本土植物，如加拿大洋葱已被种植和食用，向日葵子和油也得以食用。再向西的大草原处，气候在极度干旱与如今天般的大量降雨间波动；这样对大型猎物（如北美野牛）产生影响，因此食物的供给也受到了影响。结果，草原上的人口数量也因此而大起大落。在这一时期，似乎已出现了人口迁徙，将加拿大西北的提纳人（Dene）与美洲西南的纳瓦霍人（Navajos）和阿帕奇人（Apaches）联系起来——他们所有人都属于阿萨巴斯卡语族（Athapascan Language Group）。提纳人有可能比其他的语族到达北美洲的时间要晚。

最后，西北海岸线——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海岸线向北延伸，穿过阿拉斯加的狭长土地，森林茂盛，气候温和，降水丰富，鱼的供应

量充足，因此，这片地区被称为“采集、狩猎的天堂。”[①] 稳定的食物供应和不同于北美其余部分极端天气的优势使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沿岸地区形成了丰富复杂的文化。而关键原因在于鲑鱼，丰富的鲑鱼。捕捉鲑鱼，并控制最好的渔场成为获得财富的基础。一位考古学家描述西北海岸文化（Northwest Coast Culture）的特点是由“社会的等级连同世袭的奴隶制”组成，而另一位则认为是由“世袭的社会不平等性”和“在永远处于冬天的村庄里的半坐式定居活动”组成[②]。这些反映了约2 000年前该地区的特征。

8

还有北极地区，在林木线北部寒冷且半沙漠的地区，林木线位于北美洲本土和北极群岛中。此地区的农业根本无从谈起：必须猎取浮冰和贫瘠土地上的动物来获取食物。古爱斯基摩人（Paleo – Eskimos）从阿拉斯加来到格陵兰岛，并南下到达远至纽芬兰的拉布拉多。“爱斯基摩（Eskimo）”这一词语的使用随地点及日期而变化，区分位置和时间。从1970年左右开始，在加拿大和纽芬兰，“因纽特（Inuit）”取代了先前的术语“爱斯基摩”。然而，在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仍被沿用。约2 000年前至1 000年前，多塞特文化处于主宰地位，并且具有后来因纽特的大部分特点；多塞特人（Dorset People）很有可能最先与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产生联系。

美洲的土著居民穿越大洲，从北向南，从南向北，自西向东，起初多为步行，虽然在2 000年前小型船只，如独木舟和划子已经出现。然而，在欧亚大陆，大型船只已经可以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海水域航行，而且有时勇敢无畏的水手们会冒险进入无人区。

远离目力所及土地的旅途看上去毫无意义且必然无利可图，特别是进入寒冷的大西洋，而且公元500年左右，欧洲社会的混乱和贫穷

① Dean R. Snow, “The First American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nter Gatherer Cultures” in Bruce Trigger and Wilcomb E. Washbur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vol.* 1,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2.

② James V. Wright, *A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 of Canada*, *vol. II*, 1000 *BC – AD* 500 (Ottawa: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1999), 896.

使向西探险更多出于偶然而非精心策划。尽管如此，还有一种方式，既可以穿越大西洋，也不离开陆地太远：经由多处由小型岛屿构成的群岛，越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达较大的冰岛和格陵兰岛。9 世纪和 10 世纪时，成群由挪威探险家组成的小团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于 874 年在冰岛登陆，一个世纪以后，即 986 年到达格陵兰。［这些挪威人以维京人（Vikings）之名更为人所知。］在这两座岛屿上形成永久定居点后，约 1000 年时，这些挪威人（Norse）向更远的地方探险，在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位被记录下来的人——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son）的带领下，来到北美东北部沿海的"温兰德（Vinland）"。1960 年，人们位于纽芬兰北海岸，即梅多斯湾国家历史公园（L'Anse－aux－Meadows）发现了定居的可能地点。这可以确定为挪威人曾经的居住地；但是否就是温兰德，很多人仍然对此争论不休。

9

那些挪威人发现温兰德，或温兰德附近的地方并非无人居住。他们与被其称为丑人（Skraelings）的土著居民有过几次激烈的冲突，当挪威人远航时，丑人们仍然严守阵地。

丑人被普遍认为是生活在拉布拉多和纽芬兰海岸且以捕食鲸、海豹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为生的多塞特爱斯基摩人。（多塞特文化是唯一生活在林木线南面的爱斯基摩人创造的，这可以从其生活所在地位于纽芬兰来证明。）后来，多塞特文化被技术上更为先进、武器和船只更为精良的图勒文化（Thule Culture）取代。而在有史以来的时期中，正是图勒文化中的因纽特人占据了所有的北极海岸。

向南，东部沿海和五大湖区林地社会的特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再向南，墨西哥的农业在发展，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产生了大型城市，成为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在墨西哥，财富和权力来源于玉米，或称玉蜀黍的栽种与耕作，从这里它逐渐向北推广，约 200 年时，美国南部也出现了玉米。继续向北，由于那段时期良好适宜的气候——是众所周知的中世纪的顶点，也使挪威人穿越大西洋成为可能。仅数百年后，约 900 年，玉米成为现在加拿大南部最主要的农作物。与今天的玉米相比，那时的玉米可能更小且更不易种植。它完全可以生长，因为用较少时间种植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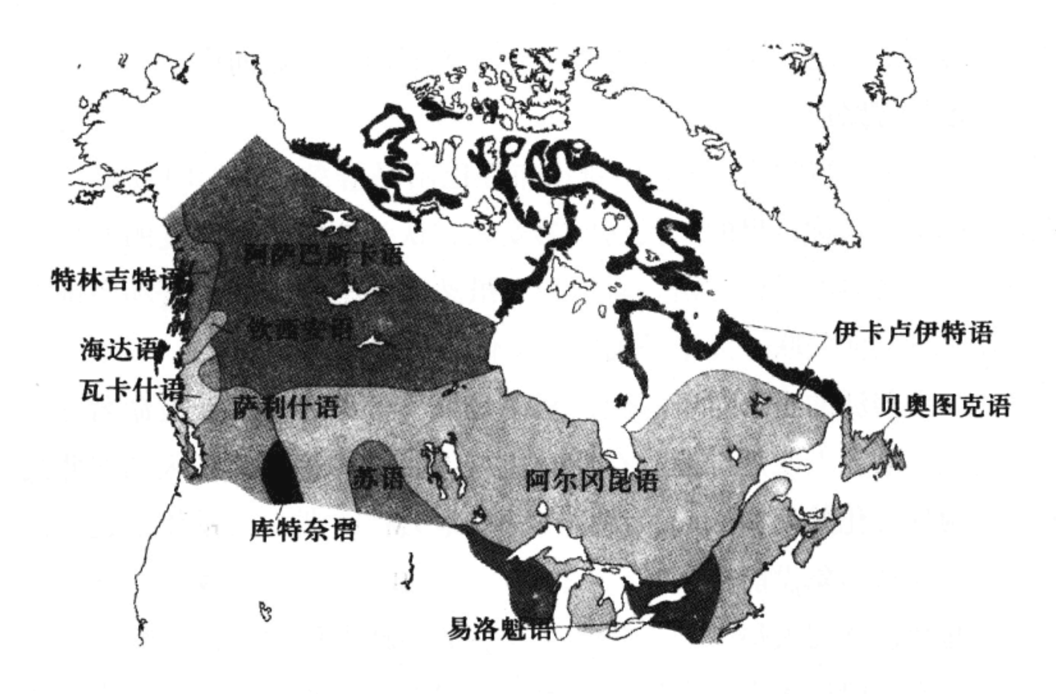
可以在较短的生长季节内收获的品种出现了。

农业改变了五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居民的文化，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同时产生了较多的人口、更为持久的定居地和等级更为分明的社会基础。这吸引了易洛魁人（Iroquois）的祖先沿萨斯奎汉纳河（Susquehanna）逆流北上，将阿尔冈昆人（Algonquins）的祖先驱逐，易洛魁人的祖先继续向东和向北来到大西洋沿岸、昂加瓦（Ungava）和加拿大地盾，并仍然保持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这是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发现并描述的社会。五大湖区南部尽管进入了现代安大略的区域，但生活着美国原始印第安人（Mound Builders），他们的中心位于印第安那的卡霍基亚（Cahokia），很有可能居住着与很多同时期欧洲城市相同的人口。卡霍基亚也体现了北美园艺的限制，因为当地居民种植的农作物耗尽了土壤中的养分。随着食物的减少，城镇也减少了。卡霍基亚在1500年之前遭到废弃，到了1600年，美国原始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城镇除了被深埋在记忆中，已没有任何痕迹。

北美北部和中部没有大型的城市和城镇并不意味着大洲的人口很少，而是分布分散。这同时也是疾病和战争的后果。虽然15世纪的北美洲人免于遭受横行于欧亚大陆之疾病的蹂躏，如天花，但他们的寿命也不长于同时期的欧洲人。（在与外界接触前的美洲，一些疾病，如疟疾或梅毒的存在仍然是学者争论的主题。）在北美洲，男性的平均寿命估计为25到30岁——与欧洲的情况大致相同。至于总人口，如现在的调查所体现的，“充满争议”。最保守的估计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岸的北美人口为900 000，至多为200 000 000人。两个数字看上去都不太可靠，权威的估计是2 000 000至7 000 000人之间。[①]

---

① Bruce Trigger and William R. Swagerty，“Entertaining Strangers：North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rigger and Washburn，*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362 – 363. 另见 Olive Dickason，*Canada's First Nations*：*A History of Founding Peoples from Earliest Times*，2nd ed.（Don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8 – 9，讨论了人口数字的问题和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北美人被大批杀害与其的关联。



本土语族（National Languages），1600

这么巨大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可从易洛魁人处得到详解。易洛魁语族分为两类——南部［彻罗基族（Cherokee）］和北部（易洛魁族、休伦族等）。北部的易洛魁人居住在下五大湖区（下游）的南部和北部；位于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畔的另一族易洛魁人在 16 世纪的某时便湮灭了。据考古学家迪安·斯诺（Dean Snow）所说，17 世纪初，在受到欧洲人的实际影响前，南部的易洛魁人总数可达 95 000 人，是史上人数最多的时候。山雨欲来的灾难环绕在易洛魁人的身边，但没有人意识到。①

12

首次“邂逅”

降临在美洲人头上的灾难来自欧洲。15 世纪末，除了在格陵兰和纽芬兰短暂定居的少数挪威人，大多数欧洲人并未意识到美洲的存在。突然，在 1492 年，从西班牙宫廷传出消息，由热那亚（Genoese）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带领的探险队发现了

① Dean Snow, *The Iroquois* (Oxford: Blackwell, 1966), 88–89.

遥远的西部土地。哥伦布认为自己发现了亚洲以及通向中国和印度富饶之地的海路通道。

事实上，1492 年 10 月，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the Bahamas）登陆。西班牙人称这里的居民为印第安人，认为他们便是印度的原住居民。这一经典的错误称谓一直沿用，虽然实际上美洲的土著和印度的原住民没任何关联，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语言。

如果美洲的土著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惊喜，那么对于新被命名的印第安人，欧洲人便是奇迹。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相遇，将区别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并列在一起，使得在一些地方，欧洲人被看作是超自然的。但这种印象没能持久。

起初，欧洲人很少。一艘船及其船员穿越大西洋所需的物资是巨大的，而行船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所需要的毅力也是如此。至少，哥伦布和他后续探险家的正式航行即为这种情况。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很多欧洲人——来自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的船员和英格兰西部的渔民——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穿越大西洋。

13

他们寻找鳕鱼，首先绕过挪威，再到冰岛海域（这使丹麦国王非常愤怒），最终到达冰岛西部。捕鱼已经成为成熟的产业，拥有欧洲西部城镇和城市的成熟市场。目前，该产业发展到大西洋的彼岸，以求稳定的供给。

英国西部最大的港口是布里斯托尔（Bristol）。1497 年 5 月，另一位热那亚人乔瓦尼·卡博特，英国人称其为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驶离该港。卡博特由英国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资助。亨利七世是一位谨慎的君王，从不冒太大的风险。那时，哥伦布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已有两次航海到新大陆，并且可以确定的是，只有手持精良的指南针并掌握一定程度技术的船员才有可能西行，发现陆地——可能是中国或印度，而那时哥伦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卡博特并没有发现中国，但他确实发现了陆地，很有可能是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纽芬兰，而且声称其归他的赞助者——亨利国王所有。但是卡博特对陆地的发现远没有他的海上发现具有现实意义。

正如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的大使向国内汇报的那样，卡博特的英国伙伴描述了一片盛产北方鳕鱼的海洋，并且断言“他们捕捞了很多鱼以至于这个王国不再需要冰岛，尽管它与冰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柴鱼贸易。”

但是引起了像亨利七世这样的君主兴趣的是发现印度和中国，而不是发现鱼类的希望。1498 年，他又一次为卡博特筹备了探险，但从那以后，卡博特便逐渐被淡出记忆，而且亨利七世模仿他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手并寄希望于卡氏去发现大洋彼岸帝国的可能性也付诸东流了。

事实上，再次经历真正探险的是葡萄牙人，由一位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的原住民加斯珀·科尔特·雷亚尔（Gaspar Corte Real）任船长进行的。1500 年和 1501 年，科尔特·雷亚尔分别绕过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虽然具体在哪里尚不知晓。不被知晓的还有科尔特·雷亚尔的命运：如卡博特一样，他就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由科尔特·雷亚尔引导，葡萄牙正式放弃了对被寒冷和大雾围绕地区的兴趣——当然还有位于此处的鱼类资源。

鱼仍在，渔民的船队都会满载而归。纽芬兰海岸大陆架的情况对于北部鳕鱼和其他鱼类堪称完美，无论是海岸附近或在大浅滩（Grand Banks）——面积大且较浅的海底高原，深度通常少于 100 米——即纽芬兰的南部和东南，并处于拉布拉多寒流的控制下。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轻易捕到鱼，特别是这种用处甚大的鳕鱼。鳕鱼很容易被烘干，并用盐腌制。一旦被腌制，鱼就变得较轻，可以被轻松运输。 14

一旦知道位置，对于西欧的渔民来说，纽芬兰的鳕鱼场就是一块不可抵挡的磁铁。起初，渔民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此后来自法国的西海岸，特别是布列塔尼（Brittany）。令人不解的是，英国人看上去仿佛被固定在了家门口，继续在冰岛沿岸捕鱼，直到冰岛（Iceland）最高君主丹麦国王颁布了一则法令，增加了获得冰岛捕捞许可的费用后，纽芬兰才被看作是最理想的另一处渔场。

过了很多年。在此期间，对北美东海岸的探索成了“三不管”的

事儿。那时，这块大洲有了一个名字，“美洲”（America）。此后另一位意大利水手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对自己航行的描述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名字比哥伦布的更为人熟知。1523年，法国的君主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雇用了一位佛罗伦萨的航海家，乔万尼·德·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去寻找通往亚洲的路线。韦拉扎诺没有发现该路线，但却发现了纽约和它被保护的深海港，并探索沿海地区，一直向北到达纽芬兰。通向亚洲的路线显然不容易被发现：韦拉扎诺的探索似乎指向更北的地方。他对这片土地甚为欢喜，并将其比作令人心旷神怡的古希腊阿卡迪亚地区。从他当时的所在地，特拉华北上，“阿卡迪亚”这个名字被欣然接受，后被用于加拿大海滨行省的常用名。

陪伴韦斯普奇一同航行的可能是来自圣马洛（St. Molo）布雷顿港（Breton Port）的法国水手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圣马洛是很多驶向纽芬兰的渔民的大本营，所以很可能在卡蒂埃向弗朗索瓦一世提议由他带领进行另一次寻找亚洲的远航之前便已向西行驶过了。这则提议非常有诱惑力，不仅因为存在能够与中国通商的可能性，还因为此时的西班牙人已经攻克并洗劫了位于墨西哥和秘鲁（Peru），及拥有相当多财富的阿兹特克人（Aztec）和印加人（Inca）的王国。一位西班牙探险家发现越过美洲便是另一片海洋——太平洋（Pacific Ocean）；1520年，一个西班牙探险队成功地穿越太平洋，环绕地球航行，中途到达文化灿烂、资源丰富且拥有完善市场的亚洲。因此，弗朗索瓦一世委派卡蒂埃前去寻找，并带回“大量黄金和其他珍奇之物”就很自然了。

15

卡蒂埃3次航行来到新大陆，分别在1534年，1535—1536年和1541—1542年。后来，他帮助绘制北美东部的地图，确定纽芬兰为一座岛屿，并且发现了意义重大的圣劳伦斯河。他沿河行至所及之处，即围绕蒙特利尔的急流之上。他将蒙特利尔岛中心的高山命名为“皇家山（Mont Royal）”，这个名字一直流传下来，后来用于命名此处的法国定居点。

同时，卡蒂埃航行使欧洲人与大陆上的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生活在东起加斯佩（Gaspé），西至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河沿岸。来自西班牙的描述清楚地指出，美洲的土著具有本质的不同，不仅与欧洲人，而且土著人之间也是如此。此番描述指出重要的另外一点：新大陆的部族不是天主教徒。

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徒曾经对付过非天主教徒（non - Christians）。古时，异教徒迫害基督徒，而当基督徒掌权的时候，当然以牙还牙。非天主教徒被认为充满敌意，虽然他们的命运根据天主教徒所拥有的权力大小而不同。他们转化了一些异教徒，如卡蒂埃的罗马或德国祖先，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上的挪威人及波兰和波西米亚的斯拉夫人。天主教徒还征服了一些人，并使其成为天主教徒，如德国东部和波罗的海的异教徒部落。另外一些被他们变成了奴隶，如大西洋，加那利群岛（Ganary Islands）上不幸的居民。还有一些，他们与之斗争，如亚洲和北非的穆斯林政权———一场困兽之斗，斗争中好胜的穆斯林政权土耳其攻克并转化了欧洲东南部的的天主教徒，直捣维也纳的门户。在美洲就没有如此强烈的对抗——所以西班牙人往往将自己的经验用于加那利群岛，首先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然后是墨西哥和南美。

16

欧洲天主教徒（并非只是欧洲人或只是天主教徒）的第一个假说是他们的宗教与行为规范凌驾于（甚至否定了）非天主教徒的信仰和行为准则之上。就如何对待非天主教徒，神学家和政客们的意见没有达成一致，但针对新大陆的未来，探险家和他们的赞助者，即谋求利益的投机商所阐述的哲学和有政治家风范的克制很有限。对于欧洲入侵的抵御使欧洲人大动干戈——当然属于自我防卫——打败敌人，并开始了对他们的奴役。

基督教从充满异教徒、犹太人和穆罕默德信徒这样重重威胁的世界中发展而来，而且继续这样发展着。16 世纪，基督教被土耳其人包围，形成外患，内部又分崩离析。当卡蒂埃驶向美洲，基督教被分成了罗马天主教派和新教派，欧洲的国王们有些支持前者，有些支持后

者。16世纪30年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爆发了，而且长此以往地进行下去，持续100多年。如历史学家米勒（J. R. Miller）所说，“欧洲人探索和深入北美的早期也是宗教关系的紧张时期，是一重要的历史性巧合。”[1]

一种宗教处于威胁之中，这种感觉急切需要观念的转换并忽视一些人的抽象权力，这些人无论蓄意与否，都忽视了基督教教义。需要说明的是，北美北部以乡村为主的社会并非欧洲人所理解的政治实体。他们没有真正的君主，也几乎没有正式的统治体系，因此很容易（也很有利可图）被认为美洲是“无主之地”，一片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因此，探险家发现土地后，宣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授权并资助探险家来到美洲的君王是很自然的。因此，1534年，卡蒂埃在加斯佩竖起一座十字架来标记第一次驻足的美洲大陆，宣布这是基督的领地，同时也是弗朗索瓦一世的领地。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法兰西，就如同墨西哥已经被它的征服者标记为新西班牙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土著理解或是接受卡蒂埃的做法，虽然随着西班牙在更远的西部出现，它的影响会更加深远。

17

显然，1520年在墨西哥、1532年在秘鲁的西班牙人拥有控制权，但是卡蒂埃没有。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来到圣劳伦斯河的法国探险队并不比由成功的西班牙探险家所带领的探险队的数量少。（事实上，1541年，卡蒂埃在第3次航行时便拥有1 500个船员，远多于征服墨西哥或秘鲁的西班牙敌人。）而且，西班牙面对富饶且组织分明的社会，而法国却没有。但卡蒂埃本质是一名水手，残忍且贪婪，他的同伴与他有着同样的背景。他的武器很少，手下的船员也不是一支纪律严整的军队。然而，西班牙的领导却是军事化的，船员均为士兵，过去便纪律严整。他们带着马匹、钢甲和枪支，甚至是大炮，因此在技术上远远胜过土著对手。他们的领导者也有适

---

① J. R. Miller,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A History of Indian – White Relation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18.

当的激励措施——黄金——而且可以看准机会，带走它。不难想象，奖赏是很丰厚的。

1534 和 1535 年的圣劳伦斯河畔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卡蒂尔在第一次航行的时候就遇到了土著，并绑架了两个，将他们带回法国，作为缔造成就的活证据。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好展示的。有毛皮，但与黄金相比，令人兴趣不大。但有毛皮总比什么也没有好得多。还有岩石，但毫不值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西班牙的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一度要求阻止法国在圣劳伦斯河畔的殖民行为。查理五世当然也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片“没有价值的土地，即使法国占领了它，也会被迫遗弃的”。 18

从这一角度看，卡蒂埃的第 2 次和第 3 次航行代表了希望压倒经验的胜利。他至少设法活了下来并返回法国，这点说明了一些事。当然，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生还的。他幸运地遇到了两处易洛魁村庄：位于现在魁北克所在地的斯塔达科内（Stadacona）和位于现在蒙特利尔所在地的霍什拉加（Hochelaga）。卡蒂埃造访了村庄，重要的是被如客人般对待。1535—1536 年，他们依靠本地的易洛魁人度过严冬。否则，在冬天气候严寒的加拿大，他们将面临痛苦并有可能面临死亡。没有新鲜的食物，加之遭受坏血病（scurvy）的折磨，法国人不得不在易洛魁人的指导下煮食树皮，得到抵抗坏血病的必要之物，维持生命。即便是这样，船员中有 25 人（共有 110 人）死去了。

卡蒂埃以为自己在斯塔达科内和霍什拉加发现了稳定且持久——即使野蛮——的社会，但是情况并非如此。1580 年前的某时，易洛魁居民消失了，可能正在与位于更西边的另一支易洛魁族裔交战，前者被分散且被其征服者吸收。这些征服者，即休伦人（Hurons），将与卡蒂埃最终的后继者相遇。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卡蒂埃的角度来看，圣劳伦斯河畔几乎没有希望可言，不仅天气恶劣，土著不配合，而且具有黄金的消息也只是愚人的笑谈。

另一方面，渔猎是很大的买卖。至少从总体上看很大，因为它的

参与者只代表自己，并只需投资足够资金来建造船只，备齐船员。但是到了16世纪后期，这里只有400条船，约12 000名船员，大部分是英国人或法国人。

英国人在靠近海岸的位置捕鱼，在岸上的晾晒架上晒干所捕到的鳕鱼。由于在本土很容易得到盐，法国人在大浅滩上捕鱼，并将捕到的鱼拖至岸上，进行腌制，包装起来并装进桶中。就土地而言，英国人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的捕鱼方法至少能够使其成为岸边季节性的定居者，即每年的5月至9月。

19

鱼类并不是北美海域中唯一被发现的有价值的商品。在圣劳伦斯湾的海岸上，渔民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海象。他们可从海象身上得到象牙，从它的脂肪中得到油，从皮肤中得到皮革。阿尔冈昆部落带到海岸的毛皮扩充了猎杀海象的成果，这些部落利用毛皮换得所需要的欧洲产品。差不多3个世纪以来，都有足够多的海象被捕杀，但最终人类将其捕杀殆尽。约1800年，报道指出圣劳伦斯湾仅剩最后一只海象。

如果16世纪北美东海岸的探索活动有模式可言，那么这一模式便是一路向北。通往中国的预定路线非常具有吸引力，这些便是确凿的证据。韦拉扎诺和卡蒂埃认为，如果有这样一条路线存在，很可能位于圣劳伦斯河北部，越过拉布拉多的某处。这条通道称为阿尼安海峡（Straits of Anian）和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20世纪时吸引了很多探险家，并成为为探险筹集资金和谋求官方支持的主要因素。

无知是进行北部探险的另一前提。欧洲人对北部知之甚少。他们的地图告诉他们的，即使不荒谬怪诞，也只是海中如点缀般散布的想象中的土地，海里住着臆造出的可怕怪物。经验也毫无用处，因为与蛰伏在拉布拉多以北的冰雪相比，即使是欧洲北部的陆地也相对温和。

对于学者和投机商来说结果确实充满了机会，对于易受骗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是致命的组合，其中有一些已经慷慨解囊。发生骚乱的

中心位于英国，这里的商人们急于与通常的目标，即亚洲的富饶建立稳定且有利可图的关系。根据并非精准的地图和疑点重重的文件，知识渊博的学者“证明”了确有这样一个西北通道。此后投机商全力以赴，燃起了多大希望，就筹集了多少资金。

16 世纪后期的英国由充满智慧的、谨慎明智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她是位新教徒，因此注定会陷入与举国上下各种天主教势力和公国间的冲突。她拥有大批想要出海谋利的探险家——通过实施海盗行径获取西班牙珍宝或通过探索和发现得到美洲，乃至此后中国的黄金。 20

16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伙英国人组织了探险队，主张英国的利益跨越北大西洋。[也有一次由勇敢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r）领导的惊心动魄的航行，驶向太平洋，虽然他没有到达，但非常接近加拿大的西部海岸。] 在纽芬兰和弗吉尼亚（Virginia），有两次尝试性的殖民，弗吉尼亚这个名字便是为了纪念英国的“童贞女王”。当然，也有直接为寻求西北通道（尽管弗吉尼亚探险对此充满疑虑）的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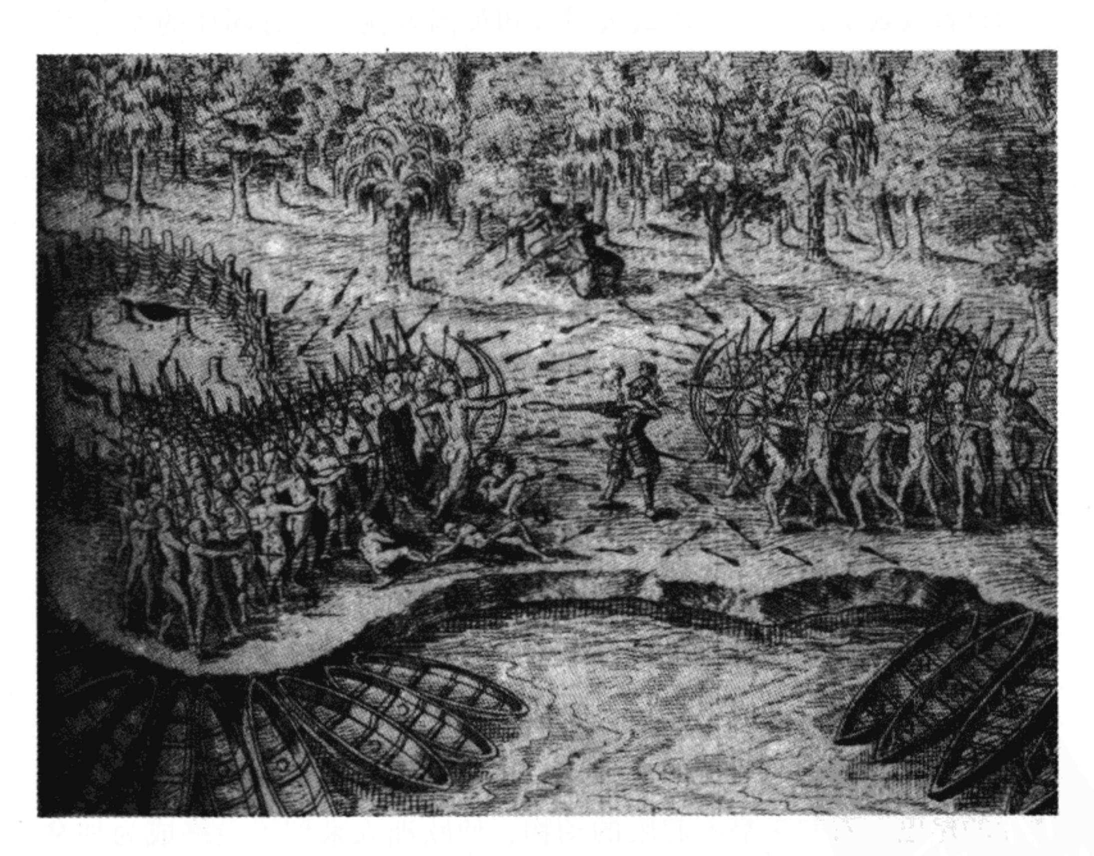
这些计划最终毫无价值，只留下了一堆名字——弗罗比舍湾（Frobisher Bay）、戴维斯海峡（Davis Strait）等。结果表明，更远处还有情况，因为北极区内严寒的气候和短暂的航海季节表明通向太平洋之路的重重阻碍。这是令人灰心的消息，虽然这种挫败感并没有持续太久。

欧洲的宗教战争填补了余下的空白。英国和西班牙在陆地和海上交战了近 20 年。爱尔兰处于持久的叛乱状态。法国和荷兰被叛乱和国内战争席卷。欧洲的能量都集中在本土，还有仅存的少部分注意力观注着众所周知的北大西洋渔业和与居住在圣劳伦斯湾周围的阿尔冈昆族裔的小型商贸。

客观地说，16 世纪时，探险家和投机商对加拿大的土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些土著并不知道自己在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臣民”——生活在被一个王国或另一王国宣布拥有的土地 21

上的居民。16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兑现对广袤的加拿大土地的占领，如此广大的面积带来了不错的副作用，即没有一方做好准备去攻打另一方。而且北美洲仍然被认为不够舒适，不够理想，而如果对其进行占领并设立定居点会耗费过多的时日，且过于昂贵。在当时，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了爱尔兰的头上，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继承者旨在“培养”殖民者。爱尔兰的残酷经验对于新大陆来说是一个不幸的先例。

第二章　无主之地



这块铜版雕刻以塞缪尔·德·尚普兰的画作为基础，表现了 1609 年易洛魁人同阿尔冈昆人及其法国盟军之间的战斗。

25 随着16世纪的探险家探究美洲大陆的轮廓，地图绘制应运而生。由此产生的地图绘出了一条沿大西洋和太平洋几近明确的海岸线，凹入处为加勒比海和圣劳伦斯湾。沿着向北和向西的走向，海岸线逐渐失于精确，最终凭想象绘出。随着17世纪的到来，通往中国的海上之路，即西北通道，仍吸引着渴望成功的探险家们。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也许第一批探险家遗漏了什么，或是走得不够远。在拉布拉多半岛的海岸线中，会不会有一段缺失？把太平洋放在另一侧，北方大陆会不会比巴拿马这样的地峡略大一点？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片土地的确值得拥有。西班牙人已经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了黄金，为什么法国人和英国人就不会有同样的发现呢？如果沿着海岸线再转一个弯就会找到隐藏的西北通道，那么翻过下一座山，就会有黄金。事情理当如此，否则道理何在？这片大陆的东北沿岸寒冷、多岩石、常刮大风——“是主赐给该隐的土地”，这是雅克·卡蒂埃的名言。这片土地“没有价值”，这是1541年一位西班牙人对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讲的话。那么，就让法国人占有它吧。

这样的看法合乎实际，但却目光短浅。北方大陆的确条件艰苦，土壤贫瘠，严寒是它最大的威胁。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北美的某26 些地方已经有利可图——尤其是纽芬兰的鳕鱼业。渔民们时常上岸，四处寻找木头生火，也找些肉食换换口味。找到了肉，他们也同时得到了动物的毛皮，并将其运往欧洲老家。起初，北美的毛皮是罕见之物，但很快就成了能赢利的珍品。在西欧，毛皮成了奢侈品，用于装饰富人们的礼服。做成毛毡后，又成了制帽匠们换取的商品。用处尤大、价格尤高的则是北美的海狸皮。正是这种长着橙黄色牙齿和覆盖鳞片的尾巴，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动物，使欧洲人来到了最终成为加拿大的这块领地，在此换取商品，并最终定居于此。

如果仅凭欧洲人自己季节性的、时断时续的行为，他们就几乎做不成毛皮贸易。贸易需要本土的供给者，于是开始了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当地猎人间的合伙生意，而后者很愿意将那些无穷无尽的

海狸换成铁器、钢刀和枪支。生活在海岸边的土著有其优势，因为他们掌控着和欧洲人的接触，而后者并不冒险深入腹地。

如果不考虑欧洲商人带来并传染给土著的疾病，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就商人们而言，主要的艰苦工作是由土著人完成的，他们通常被称为印第安人，这源于一个错误的理念，即美洲人生活在亚洲的香料群岛之外。交易的商品相对廉价，包括铁、铜、布，以及逐渐增加的酒，并成为许多土著人的钟爱。北美东部的土著对于铜并非没有概念，但这种金属十分稀有且能保持柔软。黄铜和钢铁更受欢迎，它们也只能由欧洲人供给。

在圣劳伦斯河流域，法国人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一直热衷于开疆拓土，再由雅克·卡蒂埃宣布为法国所有。但法国在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中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难以有所作为。当战争最终于 1598 年结束时，登上王位的亨利四世（Henri IV）由新教改信天主教，并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于是，法国对美洲的关注便急剧增强了。 27

17 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政府没有多少资源和能力去推行殖民。在没有大规模有战斗力的陆军和海军并缺乏长期有效的管理能力时，他们只能依赖私有企业主，授之以王室的特许，诱之以赢利的希望。这些特许给予一些人各种程度的垄断权，他们通常是贵族，于是可以尽其所能随意处理北美这片广阔的土地。同时，在使任何人顺从和皈依基督教时，他们需尊重其他基督徒的权利。

1604 年，在皮埃尔·杜瓜（Pierre du Gua）、西厄尔·德蒙（Sieur de Monts）的率领下，开始了对北美的探险。他们的活动集中在芬迪湾（Bay of Fundy）附近，即介于后来的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之间。法国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准备在此度过第一个冬天。但法国人不明智地选择了圣克罗伊（Ste. Croix）这个离岛，在那里散建了一些营地，忍受着严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从欧洲带来的补给，这使他们吃不到新鲜的食物，并由于缺乏维生素 C 染上了坏血病而死。

令人惊奇的是，有些法国人（他们均为男性）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意识到如在圣克罗伊岛再呆上一个冬天决不会幸存，就开始寻找气候较好的地方——他们在芬迪湾的南岸找到了，并将其命名为罗亚尔港（Port Royal）。

他们对罗亚尔港的设计和建造胜于圣克罗伊岛，四周的建筑物取代了散建的营地。当这块土地的统治权落到一位名叫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的地图绘制师和航海家的手上时，他也同样治理得不错。

尚普兰很可能在1570年左右，成为了注定的新教徒。但和有同一信仰的许多人一样，他大概于16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皈依了天主教。他生于一个航海家庭，后来成了皇家陆军的一名上尉。他实际上处于贵族中的最底层，并将那时经常用于显示贵族身份的“de”，加在了他的名字中。然而，尚普兰的不同反响在于，他有一个强烈专一的目标：在北美的北部，建立一个法国人永久的定居地。

28

他起初想在芬迪湾的阿卡迪亚实现他的目标。但这是一块不毛之地，于是他相继放弃了圣克罗伊和罗亚尔港。1608年，尚普兰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作为德蒙的中校（系正式任命），他于1608年4月航向圣劳伦斯河，并于当年7月3日抵达河的峡谷魁北克。他在那里建造了设防营地，即定居点，用木栅和城壕环绕。他还种上了小麦和黑麦，但这些庄稼却没使他的定居点免受坏血病之灾，他们25人中有16人死于这场无法避免的灾难。

对殖民地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与法国之间交流的节奏。从11月到5月是圣劳伦斯河的封冻期，此时的殖民地便与世隔绝。漫长的海上航程通常要两三个月，这意味着某一年下达的政令，只能在下一年实施。耐心是这种环境中无可比拟的美德，而品行则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当需要维护秩序时，尚普兰出手果断：在魁北克的第一年，他揭露了一起挑战他权威的阴谋，并很快将其头目送上了绞刑架。

尚普兰战胜了天气、时间和阴谋，并在得到法国的再次补给时，于1609年夏开始向腹地进发。作为数百名法国航海家探索这片大陆腹

地的第一人。他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尚普兰不是独自旅行。陪伴他的有两位法国人，但其团队的主体是阿尔冈昆人和休伦人。休伦人是指讲易洛魁语，并与阿尔冈昆人和做毛皮贸易的法国人结成联盟者。在一次短暂的战斗中，阿尔冈昆人和休伦人打败了其对手，即在今天的尚普兰湖畔形成五部落联盟的易洛魁人。在这次战斗中，尚普兰使用了火器，用笨重的火绳枪威慑敌人，并似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29

尚普兰于1609—1610年的冬季回到了法国，向亨利四世和他的上司德蒙报告，之后又返回进行了一次新的探险和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被易洛魁人打伤。他再次于冬季回到法国，此行的目的是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以保全他那块小小的殖民地。他成功了，赢得了权贵们的支持，能在新的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面前对他施以援手。同样重要的是，他于1613年发表了记述他在1604至1612年期间探险经历的作品《航海记》。这部作品奠定了他作为英雄探险家的地位，并有助于巩固其殖民地从而使其有幸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在接下来的年份里，尚普兰继续着他的内陆探险，并绘制了渥太华河及大部分五大湖流域的地图。同时，他在诡异多变的法国政治中幸存下来。他的支持者中有的在王室失宠，有的得宠，而尚普兰却一直是“中校”，统治着魁北克殖民地，又称新法兰西（New France）。（“新法兰西”这个词始于1529年，在这块领地被发现并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宣布拥有后，作为地图绘制的标识。）

新法兰西在许多方面是幸运的。它地处严寒的北方，这固然易使居民患坏血病，但严冬也使其免患其他疾病，如黄热病。[1] 尽管实际定居者的数量不大，但土著盟军为这块殖民地起了缓冲作用，使之免受土著人的战争之苦，这些毁灭性的战争曾几乎摧毁了英国人的弗吉尼亚殖民地。

然而，欧洲的政治一直很危险，但尚普兰在宫廷政治的险境中，

---

① 坏血病几乎不是新事物。最先在法国探险家当中，卡蒂埃曾面对这一问题，但每一代人似乎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疾病。一种治疗坏血病的特效药柠檬汁早在1617年就得到认可，但接下来该药在世界海军中见效却花费了150年。

游刃有余地操控着他的殖民地。他赢得了国王的首席大臣、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的青睐。此人于1627年组建了百人公司（Company of the Hundred Associates）来管理新法兰西，而最重要的是为之筹措了资金。尚普兰成了主教的私人代表，但当1629年一支敌对的英国舰队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时，代表身份对他本人和殖民地都没起作用。（英法两国于1627年开战。）尚普兰很快被送往英格兰囚禁，后于1633年返回魁北克。在英国人占领魁北克之前，那里实际上已实现了和平，尽管身处其中的人们均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人发现了毛皮贸易赢利后，就想永远呆在那里。

30

英国人的介入没能继续殖民地的幸运，但也没有完全扼杀它，这才使尚普兰得以重建英国人留下的废墟。他生前没能看到殖民地的繁荣，于1635年12月死于魁北克。

尚普兰的成就依然是巨大的。沿着卡蒂埃的足迹，他为法国攫取了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这是唯一一条深入到这片大陆纵深可以通航的水路，从加斯佩暗礁一直延伸到五大湖之外的草原。尚普兰是无可争议的地理家和探险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政论家和不知疲倦的鼓动家，这些素质有助于他游走于法国宫廷的险境里，周旋在一系列支持他的富豪和权贵中。他预言他的殖民地适合发展农业，当他去世时，农场刚开始起步，种植适应寒冷气候的作物。

但尚普兰的殖民地自始至终都完全依赖法国政府的定期资助和青睐。17世纪20和30年代的法国政府坚定地信奉天主教，并且在强势且反叛的贵族阶层的默许下，实行独裁专制。1608年以后，新法兰西只允许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踏上其土地。事实上，这块殖民地的一个诱人之处正在于它提供了天主教会传教的沃土。

贸易和救赎是法国人自觉传输给北美土著的，对尚普兰及其后继者皆然。对于法国，这块殖民地提供了毛皮、利润和灵魂，并希望由此换取投资商、士兵和定居者。

但是，法兰西政府要优先考虑其他方面。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消耗着金钱和士兵。在黎塞留主教于1642年、路易十三于1643年

相继去世后，法国的政局飘忽不定，开始了由年仅5岁的路易十四（Louis XIV）统而不治、不稳定的太后摄政的时期，这也注定使贵族阶级焦躁不安。

于是法国政府同意将新法兰西交给百人公司，由其全力治理。该公司任命一位小贵族夏尔·于奥·德·蒙马尼（Charles Huault de Montmagny）为总督——这是未给予尚普兰的头衔——命其为这块殖民地筹措资金、迁入人口、开拓领地、守护安全。1634年，一个新的营地三河城（Trois－Rivieres）在上游建成。宗教具有和防御、贸易同样重要的地位，也是1642年西厄尔·德·迈松纳夫（Sieur de Maisonneuve）建立蒙特利尔的起因。1641年，蒙马尼在黎塞留河和圣劳伦斯河的交汇处建立了对外抵御易洛魁人入侵的防卫要塞。

蒙马尼最为逊色的工作是筹措资金。百人公司从未在这块殖民地上见到一丝利润，于是在1645年认输，并将对毛皮贸易的垄断权转让给当地的商人，即当地社区的居民（Communaute des Habitans），而每年坐收租金。在其他方面，百人公司较为成功。在其治理下，小规模但数量稳定的移民流向了新法兰西，使其人口在1663年达到了3 000人——按照法国政府的规定，均为天主教徒。这样的人数已不易移走或灭绝，在此意义上，百人公司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

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的战争

新法兰西代表的不仅是欧洲或法国对美洲的入侵，也是北美北部势力均衡的一个因素或力量。尚普兰不明悉阿尔冈昆人与易洛魁人冲突的始末，然而他于1609年在战场上的出现足以表明，作为盟军，法国人将对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更有利的是，法国人作为贸易合伙人，会带来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巨大优势。而关键之处在于地理位置：休伦人与阿尔冈昆人坐拥通向魁北克的水上通道，是法国人得到五大湖以

① Gilles Havard and Cecile Vidal, *Histoire de l'Amerique Francaise* (Paris: Flammarion, 2003), 65.

32 北和以西的中介，那里有大量海狸。其他族裔从事打猎并接受休伦人选定的价格；休伦人自己与法国人做交易。

然而，法国人不是北美北部唯一的欧洲人。荷兰人（Dutch）紧随其后；当尚普兰从北部靠近时，荷兰人正从南部开始，沿哈得逊河逆流而上进行探险。他们将相继建立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现在的纽约（New York）］和奥兰治堡（Fort Orange）［现在的奥尔巴尼（Albany）］。奥兰治堡靠近易洛魁人联盟，即五部落联盟的东大门，且易洛魁人很快也装备了欧洲的武器。

法国人不想成为五部落联盟的敌人，但无意中陷入与另一个讲易洛魁语的部族，即休伦人达成的一次协定中。1615—1616 年，尚普兰在五大湖探险时，与休伦人进行交往，并与他们一起度过了冬天。休伦人清楚地看到与法国人做交易的好处；法国人则看到将休伦人与相邻的易洛魁人分开的好处，因为如果他们联手，将会针对新法兰西发动一场严重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军事挑战。法国人在这些符合常理的考虑之上还加入了精神元素，因为耶稣会会士（Jesuits）从休伦人的精神追求中看到了可皈依的理想条件。因此法国人将精神条件附加到他们之间的贸易中：休伦人必须身着代表其身份特征的黑色礼服接待耶稣会会士，且后者可自由劝说其改宗。

耶稣会会士（称之为耶稣会更妥）不是第一批到达新法兰西的天主教修道会（Récollet）。区别在于黑克雷修道会。他们于 1615 年到达新法兰西。信守神召，自我约束，而耶稣会会士于 1625 年才到达新法兰西，他们更为世俗化，两者成为对手。1634 年，耶稣会会士接管了黑克雷之前在休伦人中传教的一个团体，但这并未改善两者之间的关系。

神职人员的对抗虽有敌意，但对于耶稣会会士在加拿大传教而言微不足道。耶稣会会士的传教计划经过精密策划并严格执行。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传教修道会，且至 17 世纪 20 年代已具有在亚洲传教 70 年的经验。因此他们顺理成章地将此经验运用到美洲。他们与将来可能 33 皈依之人一起生活，先后学习了土著语言和当地文化。耶稣会并无通

过暴力使其皈依的意图——最近的法军驻扎在魁北克，有 800 公里远——而是通过例如不辞劳苦和旷日持久的传教活动使其皈依。

许多休伦人抵制皈依。他们的宗教文化基础牢固，与法国牧师相比，他们更喜爱自己的萨满教巫师。法国人则持另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比较危险：他们（在其他人之中）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在 17 世纪 30 年代席卷五大湖地区的易洛魁民族。耶稣会会士指出，如果萨满教巫师可以胜任，他们定能阻止疾病蔓延。他们当然不能——但耶稣会会士也无能为力。

随着耶稣会会士传教计划的形成，休伦人中虽然不是全部皈依，但大批都皈依了。15 个牧师一度在休伦人中传教，而休伦区圣玛丽（Ste. Marie among the Hurons），这个至关重要的传教团总部，是一个围有木栅栏的城堡，周围有教堂、房屋和长屋环绕，供休伦人中的皈依者使用。

就目前的结果而言，耶稣会会士的皈依方法是有效的。耶稣会会士适应了土著风俗并讲其语言，他们抛弃了大部分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损欧洲人对待美洲土著人的观念。然而，考虑到在休伦人中传教的时间短，一些局限性不能被完全克服。皈依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牧师的守卫者，他们当然被关怀且被施予人道的对待，但他们被寄希望于融入到以耶稣会会士为主导的农业共同体。除了在日本，耶稣会会士没有令皈依者发展为牧师，这一点不言而喻地证明皈依者并不认为自己与牧师处于同一级别。[1] 与此同时，木栅栏不足以将易洛魁人拒之门外。传染病使得大批休伦人丧生，受相同传染病的袭击，易洛魁人口减少了至少一半，社会遭到破坏，许多村落空无一人，五部落联盟的未来受到威胁。人口可以由战争中的俘虏来补充，这成为易洛魁人——包括休伦人——使用的方法，且易洛魁人确实开始那样做了。如果休伦人不主动加入五部落联盟成为一

---

① Diarmuid MacCulloch,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 – 1700* (London: Allen Lane, 2003), 440.

个团体，那么他们会被迫为之。

34 休伦人与易洛魁人之间的冲突业已存在，有时为了毛皮，有时因为抢劫。而之后发生的就不只是关于贸易或俘虏的冲突了。1648—1650年间，易洛魁人彻底摧毁了休伦部落，杀死或俘获了耶稣会会士，众多皈依者被按例施以酷刑处死。但摧毁这个部落并不意味着摧毁其成员，作为俘虏，他们被赶至易洛魁人的老家，即安大略湖南部，常被俘获他们的人接纳并同化。一些休伦人在耶稣会会士的陪同下，在法国人位于圣劳伦斯河畔的定居地附近寻找避难所。另有一些休伦人跨过密歇根湖向西逃去。在那里，他们与残留的中立部落、烟草人和一些其他部落汇集，这些部落也都被易洛魁人打败、驱散或同化。

如果易洛魁人没有入侵，又或休伦人在耶稣会会士的保护下得以幸存，那未来会是怎样？答案或许可以从西属美洲瓜拉尼人的耶稣会殖民地找到，此殖民地相对比较成功——是一块可长久栖息的农业型飞地，在西班牙帝国及其属地的劫掠下，牧师倾力予以保护。但殖民地本质不变，牧师居上层，皈依者居下层。最终，牧师和瓜拉尼人被外部成长起来的非宗教武装力量摧毁，如同易洛魁人摧毁休伦人般残忍。

事实上，法国人确实为休伦人和其他被易洛魁人驱逐的土著修建了避难所，一个位于魁北克外的古洛雷特，另一个位于经蒙特利尔渡过圣劳伦斯河的卡纳瓦加。那里的土著全部皈依了天主教，生活在一种宽松的宗教保护状态下。但这些“祷告的印第安人”既不长久聚居于此，也不反战，这种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对传统和宗教的妥协。既汲取了欧洲人和土著人的双重特征，又不是单一的欧洲人或土著人的方式，而是两者的动态结合。

正如历史学家J. R. 米勒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没有引起摧毁休伦人的战争，尽管在众多方面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5 欧洲人到来之前，贸易和战争已经存在，而之后也将继续。仅仅使用欧洲人的火器

和其他交换商品并没有从根本上重塑土著社会。[①]

新法兰西的幸存者

摧毁休伦人只是易洛魁人60年战争的第一步，战争沿着新法兰西边界和为殖民地提供毛皮贸易的腹地激烈进行。17世纪50年代初，易洛魁人一度成功地阻止了新法兰西向西推进，同时也中断了毛皮从五大湖上游［被殖民者称作在高处的地方（le pays d'en haut）］的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易洛魁人耗费的精力过大而不能维持现状。

最终，土著商人与法国人取得联系。到17世纪50年代中期，毛皮贸易又开始繁荣起来。这次，阿尔冈昆部落，尤其是渥太华人（Ottawas）运送毛皮，但法国人并不是被动地坐等收货。定居点的年轻人西行与印第安人交往，同他们一起在树林里生活，并以土著人的交易方式作为赢利的最佳手段，当然，这也是一种冒险活动。这些人被称作树林里的奔跑者。殖民地官方对他们的定期离开并不看好，毫无疑问，这一行为使殖民地丧失了稀缺的劳动力，更糟糕的是，为急躁不安的年轻人树立了坏榜样；也许，树林里的奔跑者的离开反而使新法兰西更加和平有序，更适合君主独裁专制下的属民生存。

17世纪的独裁主义可能是——就是——残忍的而且反复无常，并通过要手腕得到大部分统治力量。另一方面，权力机构相距遥远，大西洋海面宽阔，且即使在新法兰西领地行走也很艰难腻烦。世代的加拿大人将会知道，国王的诏令只传至树林边缘，而树林之外的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谁在新法兰西掌握权力？诚然，是总督，但总督由百人公司指定，而百人公司在殖民地行使象征性的裁夺权。殖民地不只包括这家经营毛皮的百人公司，还有毛皮商人和一些农场主，也包括教会。 36

新法兰西意图成为只有天主教的圣地。考虑到宗教战争使16世纪的法国分裂，使17世纪的德国分裂，该想法有一定的意义。一个简单

① Miller,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55 -57.

的约束就能保持殖民地精神上的同一性，为何还要寻求宗教差异自讨苦吃呢？

天主教严格控制着新法兰西，但它没能阻止宗教纷争；只是纷争的性质有所不同。天主教传教修道会之间存在对立——黑克雷会、稣尔比斯会（Sulpicians）与耶稣会。有“在俗”神职人员——即居住在修道院之外的普通牧师。有女性修道士，她们设法在社会上自主独立生活，而不被男性主宰。此外，涉及的问题是，如何管理教会及其会如何影响管理机构。

据新教徒传记记载，法国天主教绝非屈服于罗马教皇。法国君主嫉妒新法兰西教会，并将控制教会的权力据为己有。枢机主教、主教、牧师、僧侣与修女都臣服于君主，在不同程度上都遵从王室意志。罗马发现与其并不投机，法国牧师也同样如此。

路易十四是一位新教徒的孙子，但他尤其坚持与天主教士一起处事，且在众多方面，他都是一名虔诚过度的天主教徒，急于得到并扩充法国及国外的教会。路易十四驱逐了许多（并非全部）法国新教徒，这些人为英国殖民地及其本土提供了辛勤工作的劳动力，而他对天主教觊觎英国王位的支持使法国卷入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新法兰西的未来。

天主教在新法兰西最直接的代表人物是弗朗索瓦·德·拉瓦尔（Francois de Laval）。拉瓦尔代表的天主教更喜欢与国王疏远，或不与国王有任何瓜葛，并且希望教会尽可能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1658年，拉瓦尔到魁北克赴任，但他并不是由国王选出并臣服于国王的主教，而是教皇任命的代理主教，享有与主教同等的级别与地位。[1]

37

为了表明他的权力和地位，拉瓦尔坚持在宗教庆典上走在总督前方，引起后者的极度不满。双方开始争论并制定阴谋；从此，殖民地政治分成两派——宗教派和世俗派。前者越过巴黎的君主，寄希望于

① 拉瓦尔曾被任命为一个不起作用的教区的主教，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基督徒居住在那里；但不管起不起作用，主教的头衔依然保留。

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从穿过高山这一概念得出词语“教皇至上论者”，以代表与教皇的关系。当魁北克不再被法国国王统治时，这一意图被证明是有用的。

拉瓦尔对争取优先权的事情毫不犹豫。作为代理主教，后成为主教（1674 年获得此头衔），他着手建立一所神学院培养牧师［魁北克神学院（Séminaire de Québec），是未来拉瓦尔大学的核心］，并建立了教堂和医院（由修女担任教员）。拉瓦尔将教会置于殖民地社会的核心地位，他及其继任者对公众和道德允许的事务施以非比寻常的控制。例如，即使个人舞台演出也须接受严密监督。这个极小的殖民地可能没有专业的剧院，因此舞台演出仅限于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实际上，直到新法兰西灭亡，英国人到来之后，才有了公共剧院。在1693—1694 年的一起著名事件中，教会干预以阻止莫里哀（Moliere）的戏剧《伪君子》的演出，因为这部剧直指宗教的虚伪性。①

王室政府

如果百人公司按照其构想执行下去，新法兰西到 1660 年将拥有 30 000 名居民，并将成为一个繁荣的农业社会，可供应自身所需食物，也将源源不断地将金钱返回到法国的所有者和投资商手中。相反，殖民地仅有 3 000 名居民，一部分散居在芬迪湾周围或纽芬兰，而大部分居住在圣劳伦斯河沿岸的飞地。新英格兰（New England）有 50 000 名英国居民，弗吉尼亚有 30 000 名居民，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有 10 000 名居民，新法兰西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比都自惭形秽。 38

新法兰西在一个方面事务繁多：政治。商人与官员之间、教会与商人之间、教会与总督之间以及教会内部都存在纷争。宗教掌权者反对与土著进行烈酒贸易，并说服总督予以禁止，此举令商人极为苦恼和愤怒。但下一位总督取消了禁令，烈酒贸易又变得空前兴旺。

---

① 有一个对此事有趣的叙述，发生在 1694 年，见 W. J. Eccles，*Frontenac：The Courtier Governor*（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59），297 页。

这一切的发生均以与易洛魁人无休止的战争为背景。1658 年后，战事又起。法兰西不仅遭封锁，还受到抢劫团伙的折磨，他们在魁北克、三河城、蒙特利尔三个防御营地的范围内杀害或绑架居民。即使魁北克以外的奥尔良岛（Island of Orleans）也未能躲过易洛魁人的抢劫。易洛魁人游荡至遥远的北部，一直到哈得逊湾，在西部，将相距遥远的苏人赶至五大湖西部。1654 年，来自新英格兰的一支远征队侵吞了阿卡迪亚，并无意归还——事实上，只是到 1670 年才将其归还。[①] 由于受困，力量被削弱，法兰西需要援助。但可能得到援助的途径只有一个。

而在当时的法国，王室政府正忙个不停。1661 年，23 岁的路易十四取得了对其行政机构的控制权。这在短期内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路易十四世要为自己和国家争得他渴望的荣誉，就必须整顿政府秩序，抽调政府收入。只要执行路易十四的指令，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进而影响到新法兰西，从而，路易十四世也可以恢复那里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路易十四世对荣誉的渴求为他的失败埋下祸根，因为其野心需要无休止的战争才能实现。这些战争将新法兰西卷入其中，实际上也大大超越了他毕生所能达到的高度。

路易十四决定使新法兰西成为王室行省，像其他法国行省一样，直接受巴黎统治。按照国王的要求，百人公司于 1663 年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权力，而得到的是数额不详的补偿。毫无疑问，这些补偿是不够的。之后，国王任命了总督，建立了咨询性质的政务会议。这使得主教至少在短期内得到安抚。路易十四命令一支正规军，在一位富有经验的贵族指挥官的带领下开赴殖民地。路易十四承诺，这只是开始。

39

但这个开始已是结尾。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法属的、英属的、荷属的——是公共部门与私有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虚弱的欧洲国家依赖个人与公司，渡过大洋，宣布、占有、开发土地并在上面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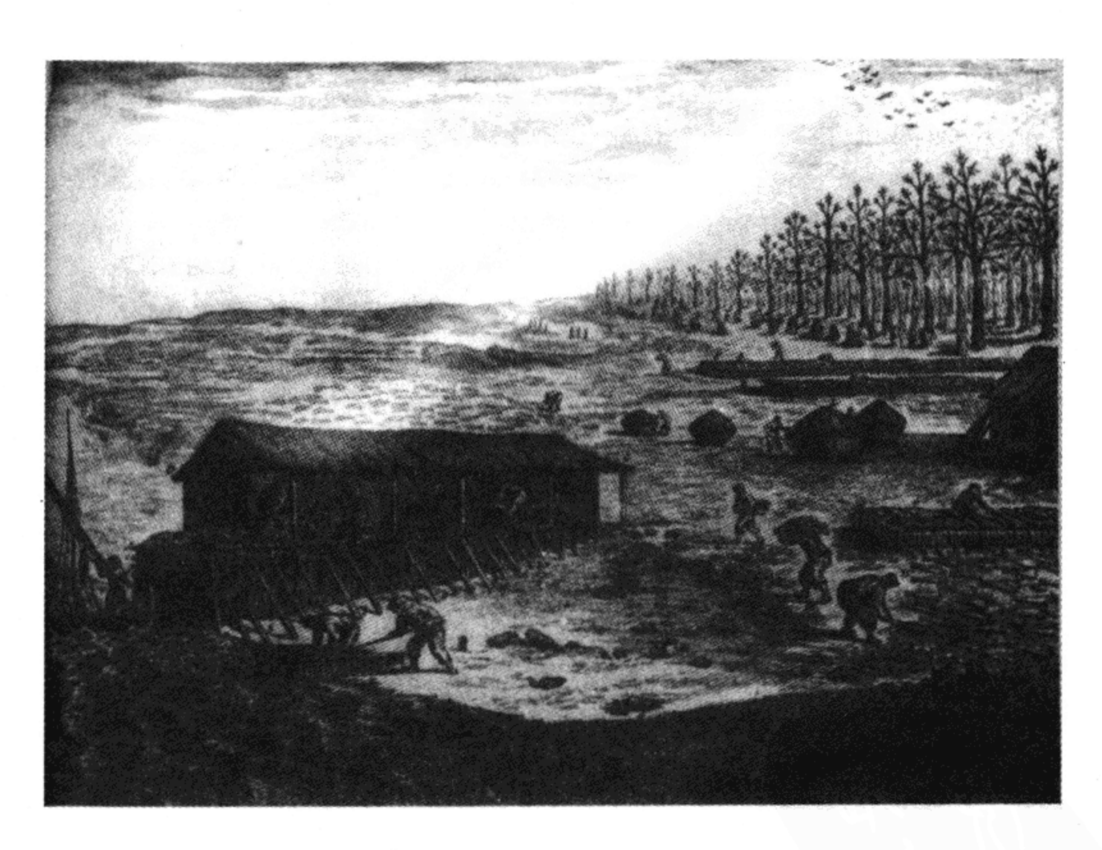
---

① John Mack Faragher, *A Great and Noble Scheme: 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 (New York: Norton, 2005), 58 - 59.

受巨大财富前景的诱惑，首先是东方财宝，其次是毛皮财富，企业主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历尽风险、千金散尽。

然而，新法兰西是幸运的，他的建立者尚普兰，是一位极有远见之人。他精心挑选魁北克作为基地和新法兰西的首府，为殖民地提供了一道可防守的堡垒，即使遭遇恶劣天气，或南部英国殖民地的封锁，魁北克也安然无恙。在下个世纪，这些事实将很好地为新法兰西带来益处。

第三章　扩张和巩固



18 世纪，纽芬兰的鳕鱼业及海岸上法国人的晾晒架。

43 1663 至 1713 年间，北美洲的均势有所变化。17 世纪 60 年代，东部沿海的欧洲殖民地靠近海岸线，依附着印地安部族，以确保安定和繁荣。他们的存活已不再是问题，但前景渺茫，变幻莫测。

发生在 17 世纪 60 年代的事件改变了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生活的构架和前景。他们因为遭受着印地安人的不断袭击和苦等下一次供给船的到来所造成的窘境，处于长久依附又贫穷的境遇，而后却变成了西欧两股势力——法国和英国的代言人。因为 17 世纪后期发生在西欧的事件决定了北美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下面我们将考虑那些完全不在美洲定居者控制范围之内却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情况。

塑造美洲的欧洲

战争的有无决定了殖民地的最终模样。到 17 世纪 60 年代，欧洲几近持续了 150 年的混乱，充斥着由宗教及摧毁大洲中心地区的野心而引发的战争。在法国，亨利四世于 1610 年遇刺；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于 1649 年被斩首，英国建立了共和政体。17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法国及英国的内乱从未曾停歇。

44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忙于安定内乱，无暇顾及殖民地。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两国政府发现，自身组织的有条不紊将使战争变得更有效率。而且 1660 年后，几乎同时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内乱减缓，为两国政府加强自身实力以为后续战争做准备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开始放眼殖民地的利用。

攘外必先安内。英国的共和政府在 1659—1660 年间已江郎才尽，正在协商君主立宪制的回归，并立被处死的查理一世之子为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结束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活，离开了堂兄路易十四的宫廷，于 1660 年 5 月回到伦敦复辟。随着对权力的执掌，查理二世决心不再重复流亡的生活，于是便如履薄冰地统治着英国。虽然宗教争端的战火已被抑制，但却并未熄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敌对、新教各教派之间的敌对贯穿查理二世的一生，乃至在此后的岁月里仍然支配着英国的政治。

查理二世不仅是英格兰的国王，同时也是苏格兰（Scotland）和爱尔兰的国王。（他还宣称拥有法国王权，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国王已不可能据此来干涉与法国正常的、大体相安无事的关系。）大多数苏格兰人是新教徒，但也有少部分活跃的天主教徒掺杂其间；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但也有少部分近期定居于此的新教徒。在三大王国中，天主教是被公开抑制的宗教，天主教徒遭受着来自政府不同程度的迫害。政府由新教议会把持，它要求——需要——焦躁不安的君王将它们平息。查理二世掌管国家，但却不是在统治。这是一种尴尬的，甚至不合逻辑的妥协，但却是形势所迫的产物。

很多家庭都融合了不同的宗教，其中包括斯图亚特王室，即查理二世的家族。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天主教徒，他的兄弟约克公爵也是。查理二世更倾向于天主教，但他聪明地将此隐藏了起来。他自知是被一群新教狂热分子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新教君王。因此如果表现出来，不是他的脑袋就是他的王位将会受到威胁。

45

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宗教政治的窘境施以同情，但同时也夹杂着些许蔑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目睹过民间动乱，并决心不再重蹈覆辙。路易十四打算成为一个拥有绝对皇权的君王，而且他做到了。此后将没有来自议会、选举和群臣奋起反对君王的无稽之谈。三级会议，即国家不同社会等级的议事会间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 1614 年，即路易十四父王在位时期。而直到 1789 年他们才得以再次会面。

路易十四同样也用偏执的眼光看待法国的新教。他的祖父曾经是个新教徒，也可说是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并将这个分支奉为被保护教派。然而，他的孙子却信奉“一朝天子，一朝法规，一朝信仰”（*roi*, *loi*, *foi*），在 1685 年废除了对该分支教派的保护，将成百上千的胡格诺派教徒流放到相对友好的新教国家，也包括英属美洲殖民地。胡格诺派流亡教徒的数量，无论如何都远远超过那些为数不多但却源源不断地被诱使定居在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定居新法兰西的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人数。

路易十四的政府制度废除了首席大臣这一职务。国王在年青时代

饱受来自拥有过多权力的顾命大臣之苦，于是决心不让那段经历重演。但是他并不厌恶起用有才能的大臣，特别是在财政方面。财政给养战争，战争又是国王政策的重要产物。工业生产战争用具，并提供税金。法国的经济政策被重新进行整顿，鼓励国内工业，抑制海外消费。不能在法国本地生产出来的，很可能，在殖民地上发现——如果在新法兰西，就是毛皮；如果在西印度群岛上的法国岛屿，那就是甘蔗。

为了管理经济运行，创造税收，路易十四命任让 - 巴蒂斯特 · 科尔贝（Jean - Baptiste Colbert）为财政大臣（1662 - 1683）。科尔贝应付自如，偿还了国债，整顿了税收，鼓励工业——特别是那些能够支撑国家扩张的工业。为了海外贸易及海军的发展，他特别支持造船业，以保护航运，增强国力。

46

就欧洲均势而言，法国拥有天然的优势。在欧洲中西部，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具有大部分绵延的防御性边界，而且，得益于路易十四稳定政局的国内和平。人口孕育了数以万计的庞大军队，成为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西欧最为庞大的军事力量。雄厚的财政实力——长期积累而来的丰裕税收——意味着国王可以犒赏、给养部队，并令其身着制服，而这必然会令士兵服从军令、严守纪律。

法国迅速地开疆扩土，它的影响力更是迅速显现。1665—1667年，法国与英国（由法国国王堂兄执政）发生了小型战争，显然是在为当时路易十四的盟国荷兰进行敷衍式的支持。幸亏进攻不列颠群岛对于路易十四来说是不愿为之的事：他的野心已置于他处，其作战效率不断攀升的职业军队向由野心和荣誉发号施令的地方进军。只要涉及殖民地，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当局意识到之前，战争就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英法之间的这次战争并没有就美洲问题产生太多的隔阂，但确实重新划分了北美洲沿岸的政治边界，而且对新法兰西并无益处。一支英国探险队驶进新阿姆斯特丹港，迫使其投降，并占据了荷兰的殖民地，令之臣服于英国并将此港改名为纽约。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殖民地归为英国的一个行省，使新英格兰和新泽西（另一次巧取豪夺）联

到一起。纽约并不是英格兰在美洲的最后一次扩张：查理二世时，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均设有殖民地——殖民地的命名当然由国王完成。

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名字，但纽约距离哈得逊河（Hudson River）很近，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哈得逊河在新法兰西的边界旁可以船运和货运。沿着此边界，生活着易洛魁人，他们还保留着持久的惶恐状态。

印第安式的民主

47 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科尔贝为新法兰西制定了三管齐下的战略。第一是使它正式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所以在1663年，新法兰西变成了皇家行省，与地处欧洲的法国行省相似，来自皇室的总督以国王的名义被派遣于此。但碍于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即使是重要官员的权力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行省的总督尤为如此，他们必须出自贵族，享有尊贵和荣耀，但事实上却不被委以无限权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另一位皇室官员手中，就是执掌财务、经济政策、基本的民政事务，包括司法和执法的地方行政长官。最终，与行省总督竞争的还有神职人员，主教在道德和教育这样的事情上行使权力。那些触怒主教的官员承担着被逐出教会的风险。路易十四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在他的统治下，这样的官员不太可能再晋升官职，甚至会更为遭糕。主教也是统治过程中的枢纽：因为在新法兰西，体制中最基本的单位是教区，于是教区牧师作为主教和首府的纽带，成为信息的来源和沟通的渠道，意义非凡，举足轻重。

最乐观的时候，新法兰西的行政可能会被描述成具有创新性的张力，最糟糕的时候，二权分立的殖民地会产生困顿和不和。然而，从法国君主的角度看，即使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也会受到自治省的青睐。毕竟，效率低下的政府是一个虽然隶属需远渡重洋、耗费数月才能到达的法国但却相对独立的政府，必须靠它来解决重大问题。

行省的总督、地方行政长官和主教定期在政务会议中聚首。部分

作为法庭，部分作为内阁，理事会在没有地方行政长官[1]的情况下听从会议主席，达成共识。理事会裁决重要的法律问题（小争端由地方行政长官独自处理），但是理事会的判决书可以，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被频繁地向法国政府诉请裁决。1677 年，由于诉请裁决的数量太大，科尔贝将它们全部驳回。自此，理事会实际上成为新法兰西法律问题的终审机构[2]。

政务会议位于魁北克。为了当地的行政，也有较小的法庭设在三河城和蒙特利尔（在那里也有当地的总督和次级地方行政长官）；他们的决定可以向魁北克的理事会诉请裁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被固定在首府。总督的职务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夏季是与新法兰西深处内陆的贸易伙伴和生活在五大湖区及北方的印地安部族们开展贸易和外交的季节。每个夏天，他们来到蒙特利尔，在易洛魁人允许的情况下，参加一轮宴会，酒足饭饱。（虽存在一旦参与贩卖烈酒就会被主教逐出教会的警告，但根本不起作用。）在宴会上会有庆典和礼物的交换，为了能够保持适度的庄重，总督的在场通常是必要的。所以每个夏天，总督并没有移居蒙特利尔，而是留下来享用美食，或是储备远征内陆的基地，因为在形势所迫[3]的情况下，新法兰西的大多数总督要领军作战。德·弗龙特纳克伯爵年近七旬时率领远征军与易洛魁人作战——他的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王室政府征收新税后，将供养军队。作为原有事物新规则的标志，新地方行政长官让·塔隆（Jean Talon）率领军队乘船从法国到来。塔隆符合科尔贝对这个职位所有苛刻的要求；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确保士兵们寝食无忧，馈有军饷。卡里格—南撒利耶军团约由 1 000 人组

---

① 会议真正的管辖权有时存在争议，见 Havard and Vidal，*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caise*，107 页。

② W. J. Eccles，*Canada Under Louis XIV*（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64），32－33.

③ Havard and Vidal，*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caise*，106.

成，至少有 117 位军官，其中有 5 位年过七旬，30 位年过花甲。当他们知道军队去向的时候，曾经滋事，但无论情愿与否，他们在拉罗舍勒被一并推进船舱，并于 1665 年的夏天抵达魁北克。

他们的使命是去威慑，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去击垮易洛魁人。49 一些易洛魁人十分愿意被慑服，而且将和平请愿送到了蒙特利尔。至于那些莫霍克人（Mohawks），法国人在 1666 年 1 月试图在他们的领地上行军。幸运的是，这次远征避开了灾难，而且军队能够在奥尔巴尼从荷兰商人那里得到食物的供给。（法国人第一次认识到，英国人已经攻克了荷兰殖民地；但双方都不知道在欧洲，英国和法国也在开战）。夏季的战役又打响了，而且实现了预期的结果：与被削弱的易洛魁人之间缔结了和平，事实上他们被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削减实力，并非完全受挫于法国。

双方之间的和平并不是长久的。需要进行更多的远征，因为更多的易洛魁人在新法兰西制造了袭击，尤其在 17 世纪 80 年代，但是对于移民和定居活动来说，和平年代却已足够了。这正是科尔贝计划的一部分。

定居新法兰西

在新法兰西超过 150 年的历史进程中，大约 10 000 人移民到了殖民地。这些移民大部分都自法国而来；而且大多数，如路易十四所愿，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诺曼族人中能够吃苦耐劳的农民。最多的一部分来自普瓦图，位于拉罗舍勒的东部，但是几乎所有法国西部的行省都没有移民代表，从南部的阿基坦到北部的皮卡第。大多数人来自巴黎，一些来自其他城市。一些人通过军队被强制到此，还有一些因为在本土轻度的作奸犯科在此受罚。士兵可以在新法兰西提前离开军队，一些人发现这个提议非常诱人，不忍拒绝。还有一些人是契约佣工，用前往新法兰西的做法赎回了自己的劳力。正如地理学家科尔·哈里斯和约翰·沃肯廷所言，“大多数来到加拿大的［移

民］都是不得以而为之。”①

新法兰西事实上不是一片诱人的土地。17 世纪中期之前，关于殖民地的两件事昭然若揭：时常有印地安劫匪出没，还有就是刺骨的寒冷。那里的确寒冷。温度比法国任何一寸土地都要低很多。植物的生长季节要短一些。生长在法国的农作物轻意不能在加拿大的气候中存活，有一些根本无法种植。在种植任何作物之前，必须砍倒一片森林，而从罗马时代开始，生活在本土上的法国人就不曾面对过这样的艰辛。虽然圣劳伦斯河谷的土地很肥沃，但既没有沿河向北也没有沿河向南延伸太远——北向 8 公里处终至魁北克，南向 48 公里处终至蒙特利尔。加拿大地盾位于更远的北面，阿巴拉契亚山脉坐落于南。新法兰西在中间绵延，如紧随圣劳伦斯河的一条缎带。

50

如此前的百人公司，为了组织定居，政府信赖并将土地授予庄园主即贵族们，他们可以吸引农民种植庄园。农民们并不拥有土地，但是从庄园主那里承租。理论上，庄园主是庄园的主人，但是不像欧洲的庄园主，新法兰西的现实和理论相去甚远。庄园主很少拥有资本开发土地、修建一座宅邸和供佃民研磨小麦的磨房。他们不能从租赁中获得补偿，租金很低，还是以劳力而非现金的形式支付。为了生存，他们要么经常在田地里和所谓的低等人一起耕种，要么在县城里谋得一官半职，仅聊以自慰。很多新法兰西的贵族们受雇于军队，有的是民兵，有的是陆军，还有的是法国本土的海军。他们是法国的支柱，是雇佣兵，绝不是带有半封建性质的贵族。理论上，庄园主体制（Segneurial System）保证了政局稳定。但事实上，在这里它们却风马牛不相及。

移民定居的模式取决于河流，直到 18 世纪中期，河流是唯一可靠的运输方式。庄园主和农民寻找临河之处，实际上是寻找陆地通道，沿河狭长的村庄就这样形成了。随着道路在仅有的 3 处居民点附近无

---

① R. Cole Harris and John Warkentin, *Canada Before Confederation*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1.

休止地扩展，农民从圣劳伦斯河畔迁走，但这是后期的发展。

5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本国政府赞助和养护新法兰西的庄园，但是将权力授予了另一个地方组织，即民兵。民兵首先在蒙特利尔组建，而后遍及殖民地。16 岁至 60 岁间每一个身体健全的男性都属于民兵，军队在军事将领——*a capitaine de milice*——通常不是当地的民兵的带领下在每一个教区都被组织起来。然而，贵族被免除了民兵义务。（民兵统帅在法国的社会制度下存活下来，甚至依然存在于 20 世纪魁北克的乡村地区。）[①]

除了贵族以外，其他人也设法逃避民兵义务。义务兵役制依赖于是否一个人能够被强制，很多男人在壮年的时候从事毛皮贸易，就不是民兵。这是民怨沸腾的部分原因，但是直到新法兰西的最后时期，这种怨愤才升级为抗拒义务兵役制，殖民地的防卫正依赖于此。

当让·塔隆同意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前往新法兰西的时候，以该职位限期为条件，他同时开出了如下条件：可以私下贩卖毛皮，同样他利用职务之便也这样做了[②]。通常认为他积极而聪明，创立了可以被叫作加拿大第一“工业政策”的机制。这是一种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在下列理论，即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要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将自己的经济活动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确实其他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有类似的政策。）制造业通过直接和间接补贴得到鼓励，进口被抑制。使新法兰西自给自足、鼓励它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引导其有利于法国的经济，对于塔隆和科尔贝来说是合乎逻辑的目标。

耕作需要人力，然而，人力供应不足。部分原因是人口稀少，部分原因是男人在壮年的时候被毛皮生意吸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皮生意的需求和收益相抵了，所以到了 18 世纪早期，农场的劳动力变得很充足，不仅可以维持生计，而且所种植的小麦还有一些剩余，一

---

① Marcel Trudel, *Memoirs of a Less Travelled Road: A Historian's Life* (Montreal: Véhicule Press, 2002), 22.

② 塔隆可以免关税进口且利用国王的船只运货。货物是这样进口的：比如 220 桶白兰地一定会被二次出售，见 Eccles, *Canada Under Louis XIV*, 56 页。

且国内的需求被满足了，这些小麦随即被卖到法属西印度群岛。 52

在新法兰西建立的工业没那么成功。磨房是庄园主所占有的一部分，谷物必须磨碎。由于高成本的船运费抑制了竞争力很强的进口物品，事实上是不存在竞争的——但是同样成本很高的船运费使得新法兰西的产品回到法国本土也毫无竞争力。塔隆建立了一个酿酒厂和制皮厂，而且鼓励铁和大麻烟卷的生产。结果都令人失望，但是即使重复的失望也不能阻挠法国政府出台发展工业的政策。

新法兰西发展经济的关键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法国制度内外的毛皮交易，它使参与者——印地安人和白人富了起来。另一方面是土地，很多的土地。土地可以用来耕种，意味着有粮食可以供给城镇居民和农民及其家人。新法兰西的居民很年青就结婚了——要比在本土早。在没有避孕或是其他原因的情况下，他们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因而出生率比法国高，虽然比不上英属殖民地的情况。与此同时死亡率降低了，或者说与欧洲相比变慢了，可能是因为与易洛魁人的战争一结束，社会变得更加平静，威胁生命或致残的因素变少了[①]。人口因此增加，从17世纪60年代的3 000人到17世纪80年代的10 000人，最终变为75 000人。

法国政府的性质和政府颁布的政策同样使得殖民地的人口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分布。下面我们将分析政策原因。当前，我们应注意到，与南部的英属殖民地相比，这里的政府机构很庞大。军队和政府官员必须供养，而且总督的小型宫廷被保留了下来。履行作为楷模的义务，贵族在这个社会中被承认和嘉奖，政府授予其工作、抚恤金和礼物[②]。

在一些方面，而且必定是在战争时期，新法兰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座要塞。在17世纪60年代与易洛魁人的战争阶段，国王的职业军 53

---

① Allan Greer, *Brève 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 Nouvelle France* (Québec: Boreal, 1998), 32－37.

② 见对圣乌尔斯（St. Ours）家族的分析，参见 Allan Greer, *Peasant, Lord and Merchant Rural Society in Three Québec Parishes 1740－184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105－112页。从17世纪70年代的军官创始人开始，圣乌尔斯享受一系列来自国家的官方（军事的）任命、津贴和捐款，甚至持续到1760年法国殖民政权结束前夕。

人占殖民地总人口的1/4。但是这些士兵没有被换防，虽然很多人选择作为定居者继续呆在新法兰西。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派出海军，听命于负责管理殖民地的海军大臣（troupes de la marine）。这些职业军人直到新法兰西土崩瓦解都听从总督调遣。首先他们在法国本土应征入伍，但是1690年后，新法兰西的居民——新法兰西的贵族——有资格接受在任政府官员的委任。至18世纪50年代，海军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但是士兵和以前一样，在法国本土招募。

1760年，在法国旧制度的末期，只有大小不同的3处定居点——魁北克、蒙特利尔和三河城。仅魁北克就有8 000人，蒙特利尔有5 000人。如哈里斯和沃肯廷指出的，这意味着新法兰西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①] 另一方面，人口的3/4（估计1760年时在大约70 000到75 000人之间）住在乡村。此间的大多数人已心满意足。

阿卡迪亚

新法兰西可不仅仅囿于圣劳伦斯河谷。捕鱼业将法国人带到了北美洲，带到了远离纽芬兰的水域，而后上溯至圣劳伦斯河，收获了毛皮和鱼。最初的法国定居者只在大西洋沿岸的阿卡迪亚定居。那里虽然很封闭，但是慢慢的，在17世纪法国的定居者又回来了。

殖民地的中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法国要塞，即位于芬迪湾东侧的罗亚尔港。殖民者为他们的农田筑堤以防护沼泽区，这种做法沿用至今。护堤虽小但可抵御海盗的侵袭。17世纪中期，殖民地被转让了几次。然而，当1670年阿卡迪亚重返法国人之手的时候，只有350个法国人了，而到了1700年，又增加到了1 200人。

54

殖民地的控制权重归法国看上去是殖民地扩张的信号：新殖民地在希格内克托地峡建立起来，沿着米纳斯湾连接着现今的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省。有趣的是，虽然英国和法国频繁交战，但阿卡迪亚人

① Harris and Warkentin, *Canada Before Confederation*, 57 – 58.

并不避讳与敌人进行贸易，不论是既定的敌人还是潜在的敌人。阿卡迪亚有时不愿与法国当局合作将新英格兰的船只赶走，即使在战时亦然。

阿卡迪亚最佳的屏障就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息事宁人的关系。过长的海岸线不可能被防御，与新英格兰相对亲近的关系说明英国船只对交易来说是长久的机会，但在战争时期却是长久的威胁。

殖民地的扩张和毛皮贸易

只有在 17 世纪 60 年代与易落魁人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新法兰西在圣劳伦斯河位置的真正优势才变得明朗。旅行的工具唾手可得——轻便、可携带的桦树皮独木舟，制作简单，容易替换，能够在浅水中行驶，在急流中自如灵活地从一个水域到另一个水域。法国皮货商可以在蒙特利尔乘上独木舟，沿渥太华河北上，前往苏必利尔湖北部富裕的皮草地区。

皮草商的公司并不是时常能够讨好殖民地当局。殖民地统领与两个大胆的交易商皮埃尔・拉迪松（Pierre Radisson）和梅达尔・舒达尔・德・梅罗塞耶斯（Médard Chouart de Groseilliers）之间的冲突促使他们二人带着自己的生意和有关皮草交易的知识来到了英国和查理二世的法庭。

但是，结果促使了另一个财团的形成，它在 1670 年得到了国王的特许——哈得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它的目的就是为股东在北美的北部内陆寻找发迹的机会，并非通过圣劳伦斯河或是哈得逊河，而是通过 1610 年探险家亨利・哈得逊（Henry Hudson）发现的内陆海——哈得逊湾（Hudson Bay）。虽然哈得逊已经过世，但哈得逊湾却长存于地图一角。哈得逊湾是因为被认定成所谓的阿尼安海峡的出口，直通大西洋、中国和财富吗？毛皮交易的情况又如何呢？海湾从 11 月到次年 6 月被冰封起来是事实，而且沿着海岸线都是些湿地、岩石和青苔沼泽地，但人类的恶梦却是海狸的乐园。如果有人相信拉迪松和梅罗塞耶斯，那么海湾以外的印地安人会因为有机会与英国交

55

易而欢欣雀跃。

查理二世特意宣称哈得逊湾水域附近的土地归英国所有，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但这是一片西至落基山脉，覆盖大部分加拿大平原的地产。他随即将其分派给了哈得逊湾公司，派遣船只停泊在海湾以交易货物。哈得逊湾公司提议沿着哈得逊湾的海岸建立长久的贸易点，向南延伸到詹姆斯湾。（原因是只有建立了一个固定的贸易点才足以吸引印地安人时常来交易毛皮。）因为冬天被滞于此海湾又侥幸活了下来的人们不想重蹈覆辙[1]，这个提议尝试了很多次。虽然无尽的冬天和坏血病的煎熬成了严重的阻碍，但却无法阻挡贸易点的建立，最终在17世纪70年代中叶，许多英属贸易点建立了起来。

这些举动并没有用太长时间就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路易十四已经派遣了一位新的总督，即德·弗龙特纳克伯爵（Comte de Frontenac）前往。弗龙特纳克很快总结得出，在新法兰西，唯一的财富来源就是毛皮贸易，而且为了保护这一贸易，他迫切需要将殖民地扩张到内陆，并建立自己的贸易点。这当然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但是在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通常是统一而相同的年代，弗龙特纳克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中捞到好处。他试图引诱拉迪松和梅罗塞耶斯重新信任法国官员，并派特使出访哈得逊湾的英属贸易点。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他的代理人报告说内陆的印地安人——克里人（Cree），向海湾转移毛皮，因此这样就可以到达法国人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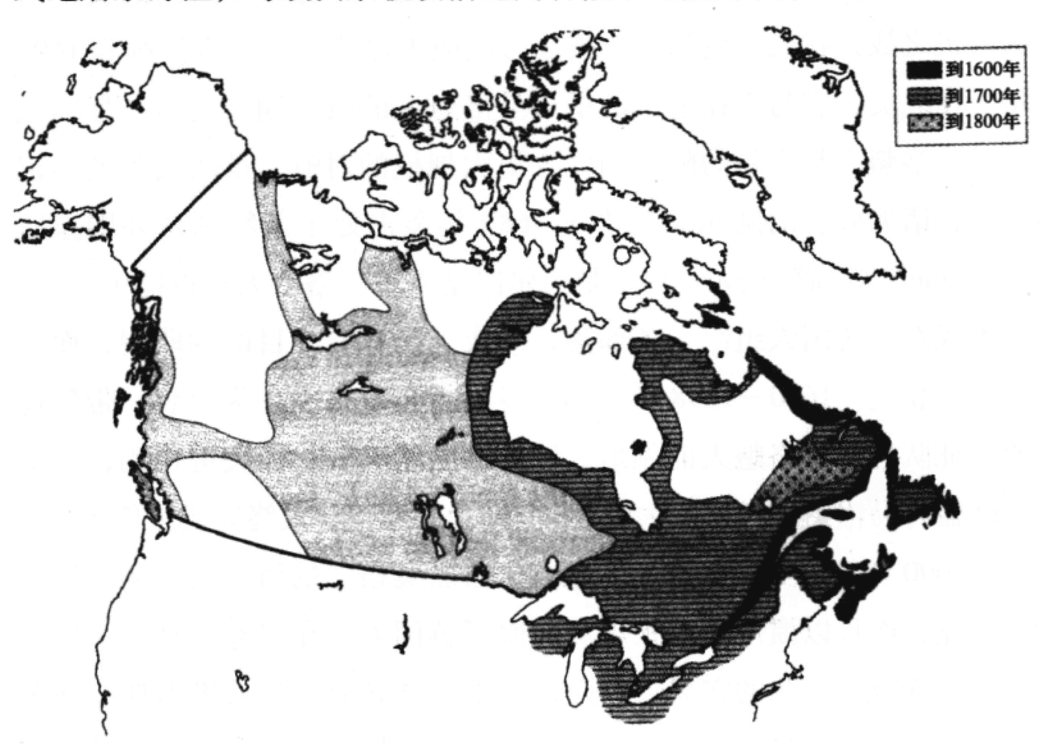
57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商业竞争从17世纪70年代延续到了80年代。然而，因为英国和法国正处于和平阶段，商业竞争不可能被极端化。路易十四及其斯图亚特家族的表兄们，即查理二世及其弟弟兼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处于亲好时期。路易十四尤其热衷于鼓励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在坚定信仰新教的国家推行天主教。詹姆斯二世也意识到他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不会倾向于激怒堂兄。故越过哈得逊湾，各国竞争

---

① E. E. Rich, *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tt, 1967), 36 – 37.

式地屠杀海狸，与欧洲宗教政治之间看似不可能的联系出现了。



探索加拿大

新法兰西的新总督德农维尔侯爵（Marquis de Denonville）确信其殖民地的存活需要与英国对抗，这种对抗不仅是在哈得逊湾，而且也在纽约。他几乎不能直接对纽约做什么，因为与法国开战的易洛魁人就在纽约。至于哈得逊湾，在1686年，德农维尔以模棱两可的理由派出了一支小规模的远征队。在一位年青的军官，特鲁亚的骑士皮埃尔·勒穆凡纳（Pierre le Moyne）和蒙特利尔的年青人迪贝维尔（S. d'Iberville）的带领下，占领了位于詹姆斯湾的英属奥尔巴尼堡。

当命运的捉弄使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11月被罢免时，海湾的英国人和"法属加拿大"也因此已经燃起了战火。新教国家拒绝天主教的君王，这使得查理二世的另一个堂弟，荷兰人奥兰治的威廉成了国王。詹姆斯二世试图重获王位已无济于事，他在路易十四的安置下，领取抚恤金，终其一生。奥兰治的威廉成了威廉三世，继续着与法国的战争。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成了更大冲突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奥格斯堡同盟之战，在北美更简单地被称为威廉王之战。它一直持续到1697年。在北美，它与正在进行的抵御易洛魁人的战争同步进行。那场战争是易洛魁人与内陆的阿尔岗昆人更大规模的对峙，虽然战争被铭记下来，诸如残忍的阿尔岗昆人于1689年袭击处于蒙特利尔外围拉欣（Lachine）的易落魁人，但正是阿尔岗昆人将易洛魁人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法国人组织了各部落，形成了抱有同一目的的联盟，而且给养该联盟。1690—1698年，弗龙特纳克再度被委任为总督，带领他的远征队进入易洛魁人的领地。因此，虽然法国起着关键作用，但却是联盟将易洛魁人撵回安大略湖[1]南部中心地带，最终完成了任务。

1690年，弗龙特纳克率队抵御来自新英格兰的海上远征队，保卫魁北克，而且以惯用的虚张声势降服了英国人。在纽芬兰岛，鱼船停靠处逐渐成为长久的定居点，由迪贝维尔领导的法国人极力地驱除英国人。但是他们只得到部分成功，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战争同样在北方肆虐，那时法国和英国在哈得逊湾为追求胜利和利益打得不可开交。然而，在欧洲和北美，没有一方取得决胜的优势。战争尚无定论便结束了，纽约还是隶属英国，新法兰西隶属法国，哈得逊湾和纽芬兰岛徘徊在二者之间。

1697年的和平对于新法兰西来说，较之其他的和平如1701年在埃克托尔－路易·德·卡利耶（Hector Louis de Callière）——弗龙特纳克的继承者的领导下——于蒙特利尔取得的和平，意义远非重大。这次和平终止了法国与阿尔岗昆人对战易洛魁人的战争。它是易洛魁人不得不拥有的和平。拥有了它，他们可继续作为在北美英国和法国均势之因素，但从更广意义上说，易洛魁人已经不再起决定作用了。

法国人也不再被限制在圣劳伦斯河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们向北到达哈得逊湾，向西挺进到苏必利尔湖的方向。法国人的贸

①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

易点建在了弗龙特纳克堡（Fort Frontenac）［现在的金斯敦（Kingston），位于安大略］和底特律（Detroit）。弗龙特纳克的一个拥护者，勒内－罗伯特·卡弗利耶·拉德萨莱（Robert Cavelier de la Salle）发现了从五大湖盆地到密西西比河的路径，随后到达了密西西比河，进而于1682年到达了墨西哥湾。很自然地，他宣称密西西比河谷（Mississippi Valley）归他的主子路易十四所有。

帝国的气息

事后想想，我们看到了17世纪90年代路易十四和他的帝国度过了巅峰。路易十四执掌着法国而且将其为战争而进行了武装。到了17世纪90年代，他所经历的战争基本取得胜利，众多的战利品让法国声名鹊起。甚至将遥远的加拿大殖民地经过主战政策和谨慎的经济发展也稳定了下来。

下面该做什么呢？谨慎带来巩固；法国取得了从路易十四战争中恢复的机会。而且新法兰西最终有了机会逃避易洛魁人战争，在和平中发展起来。毛皮交易显然实现了对法国及法国人有利的均衡，即使英国人没有完全被从哈得逊湾驱赶出去。

路易十四没有做出抉择。当他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当法国影响在扩大，荣耀在提升的时候，他选择了追求财富。他不顾欧洲的其他大国的反对，将自己的孙子推上西班牙王位。在北美，他决定创造一个建立在探险者发现基础之上的帝国。法国不会试图去侵略或是摧毁大西洋沿岸已经存在的英属殖民地；而是通过控制密西西比河谷包围它们——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将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运用这些政策，路易十四试图扩大他的实力和保持自己的战略优势——战争升级到此时所为他带来的优势。然而，恰恰相反，他发起了新一轮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使位于北美的法兰西帝国的毁灭而告终。

第四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1）



这幅画作由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统帅一位傲慢的下属，乔治·汤曾德（George Townshend）准将绘制。沃尔夫以一种厌恶女人的口吻对一对年轻的魁北克夫妇解释附带损失。他们恳求到："发发慈悲吧，将军。"沃尔夫回答："我的命令不能改变，每个被俘的男人，一颗子弹。每个被俘的女人——两颗。"

63

在1689—1815年的百多年里，北美战火频仍。这些战争起初是其他冲突，有时是旧时冲突的延续——例如，易洛魁人与法国人或易洛魁人与阿尔冈昆人间的冲突——但这些战争融入到法国人与英国人、西班牙人与英国人的对抗中，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战争导致军事力量被摧毁，从而造成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独立。战争标志着大不列颠的崛起，也标志着法国维持海外帝国的能力相对衰退。此外，战争使北美沿着未曾预料的线路被划分，加拿大的法国定居者成为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大部分英国殖民者不再是英国人，而成为美洲人。

法国政府做好了准备。由于抵挡不住大批移民涌入英国殖民地，法国人于是决定在内陆建立营地。1701年，印第安人与法国人和平相处，法国人因此可以沿五大湖自由行走。为保全他们的地位，法国海军大臣，即掌管殖民地的官员，在底特律建立了一座要塞。诚然，底特律将起到维持毛皮贸易的作用，但其真正目的在于协助法国的印第安人联盟阻挡英国人的扩张。

底特律要塞的建立符合连接魁北克与路易斯安那这一策略，路易斯安那是在墨西哥湾上新建立的。理论上，法兰西帝国被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圣劳伦斯河水系连在一起，而现在，帝国范围延伸，至少在地图上如此，从纽芬兰到墨西哥湾，再到热带地区，一直到西印度群岛的法属岛屿殖民地。

64

正如地图绘制师所绘制的，新法兰西幅员辽阔，令沿岸的英国殖民地相形见绌，也使法属岛屿，像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和圣多明哥，即现在的海地黯然失色。法属美洲超过一半的人口为印第安人——事实上大大超过一半。法国对北美、新法兰西、阿卡迪亚与路易斯安那的直接统治少之又少，仅仅掌控着圣劳伦斯河流域、阿卡迪亚的几小块定居地和内陆的几个营地。实质上，地域大小和权力相互抵消。

从经济上讲，法属岛屿瓜德罗普岛（Guandeloupe）、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和圣多明哥（Saint Domingue）拥有可赢利的砂糖出口贸

易，而与其中任何一个岛屿相比，新法兰西都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地方行政长官做了最大努力，本国政府也给予鼓励，新法兰西所得一切利润仍然都来自于毛皮贸易。即使如此，利润还是猛烈地波动着。17世纪 90 年代，政府甚至尝试短期内阻止交易商进入西部，因为过多的毛皮已令法国市场饱和。

内陆要塞也不仅仅是法兰西的小前哨。法国政府打算把西部的毛皮工厂租给企业主，由这些企业主承担成本并取得利润。此举本来意味着政府成本，即维护法国人对内陆这片荒野之地的主权的掌控的实际成本由市场承担。不幸的是，理论与实际只是偶尔相符。当利润极少或毫无利润时，营地被归还给政府，企业主成为公职人员，一直到变幻莫测的巴黎毛皮市场活跃起来。因为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营地及其所代表的帝国。

安妮女王之战

英格兰与法国在 1689—1697 年间的战争没有取得最终结果。北美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或许可以说，通过夺取英国的哈得逊湾要塞和入侵英国在纽芬兰的渔场，法国保存了优势。大西洋西侧没有大规模军队，几乎没有职业军人，当然也没有大型舰队：战争的最终结果决定于欧洲，并且是为了欧洲方面的原因。

65

路易十四没有放弃他的帝国梦想。在底特律建立营地、在路易斯安那建立殖民地、在内陆的印第安人中组建一系列联盟，这些只是大法国政策中次要和局部性的政策而已。

1700 年，路易十四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的表兄，即被英格兰驱逐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死后，路易十四承认詹姆斯二世的儿子为英格兰国王。好寻衅的法国天主教国王信赖一位要求英格兰王位的天主教徒（或“觊觎王位者”）。第二，路易十四帮他的孙子得到了西班牙王位，成为西班牙菲利普五世（Philip V）。虽然菲利普有资格得到王位，但奥地利王室也具备资格。尽管有比利牛斯山脉阻隔，法国与西班牙还是结为家族联盟；可能路易十四死后，他们才真正团结起

来。这无疑是一个强大的组合，如果加入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帝国，它将更加强大。

有结果的战争大部分发生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她是詹姆斯二世信奉新教的女儿，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即觊觎王位者、所谓的詹姆斯三世（James III）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在欧洲，这次战争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原因显而易见。在英属美洲，被铭记为“安妮女王之战”，原因同样显而易见。

战争主要在欧洲进行，我们对欧洲大陆上的战斗细节不必深究。然而，战争策略是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的不仅是正在进行的战争，还有将在北美发生的战争。英国人可能享有一种经济优势——即英国财力基础稳健，这使得伦敦的政府可以建立、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而逐渐令法国海军相形见绌。法国人或许可以在海上与英国人相匹敌，但却在德国陷入对抗奥地利和英国陆军的无休止的战斗中。在这些战斗中，路易十四的将军们大多以失败告终，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失败从德国和比利时转移到法国。最能保护美洲帝国的是欧洲，无论它属于英国还是法国。但这一点未被充分意识到，且时常被遗忘。　66

在美洲，新法兰西受两个主要因素支撑。第一，法国殖民地与最近的英国定居地之间是数百公里人迹罕至的荒野，而最近的英国定居地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第二，印第安人的存在。

易洛魁人在安妮女王之战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关注的是将交战双方置于他们的领地和事务之外，并从双方的战斗中获取任何触手可及的益处。一些英国殖民者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合乎实际，尤其在印第安人的突然袭击证明英国的边界定居地事实上多么脆弱之后。在这次战争期间，来自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使者走访了魁北克，并与法国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在英国殖民地与新法兰西之间确立某种临时协定。① 然而，协定并未达成，原因或许是，法国官员对分

① 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使者停留在魁北克城，度过了1705年夏天，与总督沃德勒伊就一项中立提案进行谈判。见 Dale Miquelon，*New France*，*1701 - 1744*（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87），40 - 41 页。

散且不统一的英国殖民地可能会带来威胁这一点不是非常重视。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英国殖民地在战争期间都处于危险之中。纽约几乎逃脱了法国人的入侵，但新英格兰就不同了。在殖民地边界，欧洲殖民者没有超过印第安人的强大军事优势：民兵训练不足，易怯阵，而印第安人令英国人的恐惧更加强烈。由于新英格兰的定居点从海岸伸出，因此极易受到攻击。

定居者自然害怕暴力和屠杀，也害怕被俘。在1689—1760年间的战争中，约1 600名新英格兰人被印第安抢劫团伙俘获从而沦为俘虏，如一位波士顿牧师所描述的，“俘虏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活活烧死，供那些可恶至极的食人者娱乐消遣；俘虏必须承受最严酷的冰冻和寒冷，没有衣衫可以遮盖赤裸的躯体；俘虏可以将一丁点肉放进嘴里，但这一丁点肉连狗都不愿碰；俘虏必须看着他们最亲近的人在眼前被屠杀，但由于害怕不敢掉一滴眼泪。”①

67

有时，英国人遭受酷刑之后被屠杀。这些酷刑惨绝人寰，单在18世纪欧洲的堡垒或监狱的高墙内实施。还有食人者，这些人在欧洲被称作极端恐怖和厌恶之人。许多囚犯，很可能是绝大部分囚犯，被施以仁慈的对待，他们被赶至印第安人的定居地，被印第安家庭收留。②之后，一些人被赎回，许多剩下的仍然与俘虏他们的人一起生活，融入到曾囚禁他们的文化与社会中。尽管最终的和平条约规定，确保俘虏返回原来的领地，但一些人一去不复返。

新英格兰殖民地没有采取手段报复印第安人及其支持者，即远在魁北克的法国人。不过，他们确实侵扰了距离最近、最易接近的法国殖民地阿卡迪亚。1704年，海上抢劫团伙侵犯一些偏远的法国定居点，但未袭击狭小的首府罗亚尔港。1707年对罗亚尔港的两次突袭无疾而终。经由陆路入侵新法兰西的计划在殖民地激起些许兴趣，但最

---

① 语出 Cotton Mather，1691年，引自 Linda Colley，*Captives*：*Britain*，*Empire and the World*，*1600–1850*（London：Pimlico，2003），147页。

② 在最有名的事件，即1704年的迪尔菲尔德（Deerfield）大屠杀中，47名定居者当场被杀，111名被囚禁。见 Dale Miquelon，*New France*，40页。

终被英国政府否决。

最终，在1710年，英国殖民者如愿以偿。在得到本国政府提供的船只和士兵增援的情况下，他们于9月出现在罗亚尔港，围攻此地一周并接收了要塞投降者，人数超出其9倍。1711年，阿卡迪亚人与印第安人联合尝试夺回此堡垒，但以失败告终。①

在欧洲的战争中，法国处于不利地位。路易十四求和，但拒绝对方提出的条款。之后，英国政府决定入侵法国人的海外殖民地。1711年，一支花费昂贵的大型海上远征队组建，目标是夺取魁北克。64艘船只载着5 000名士兵——多于魁北克人口的总数——驶离不列颠。由于航海图不精确，天气恶劣，再加上航海技术不精，舰队在圣劳伦斯河下游遭到重创：8艘船只沉没，英国人无功而返。②

英国的政治均势正在丧失。主战方，即辉格党失去了女王的支持，权力也随之失去，而托利党的继任者急于尽快取得和平。和平仍需几年时间，但英法双方最终于1713年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了一项条约。

《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使法国赢得和平，超出了路易十四的预料。由于实力遭到重创，法国政府急需和平，《乌得勒支条约》的一些条款也体现了这一需求。就美洲而言，法国人放弃了哈得逊湾的营地、“整个新斯科舍或阿卡迪亚”和纽芬兰。他们设法保留了圣劳伦斯湾的岛屿，包括两个最大的岛圣让岛（Isle St. Jean）[现在的爱德华太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和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法国人原本打算放弃布雷顿角岛，即使丢失此岛屿会将新法兰西置于英国岛屿和基地的围困之中。）他们没有放弃路易斯安那和内陆要塞，因此，1701年的帝国战略得以幸存。

---

① Faragher, *Great and Noble Scheme*, 135. 这里的印第安人是指阿布纳基人、麦勒席人（Malecite）和米克马克人的联军。

② Bruce P. Lenman, “Colonial Wars and Imperial Instability,” in P. 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2,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6.

但条约存在歧义。因为缺乏绘有阿卡迪亚边界的地图，因此法国人将边界尽可能缩窄，只包括新斯科舍大陆。原阿卡迪亚，也就是现在新斯科舍的法国定居者可继续留下，可继续保持天主教徒身份，“只要大不列颠的法律确实允许”。这是英国人造成的歧义，至少可以说，英国法律对天主教问题的规定令人失望。

无论是不是天主教徒，英国人都想让阿卡迪亚人仍然呆在新斯科舍，因为没有了他们的农场，那里少数英国军队的处境确实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法国官方力劝阿卡迪亚人动身去往保留下来的法国领地，尤其是到布雷顿角岛。结果，大部分阿卡迪亚人留了下来，他们不愿抛弃财产冒险到一个新的殖民地。然而，他们告知英国官方，对英国王室的效忠有严格限度——之后的任何战争，他们将不会对法国人作战。英国人虽有不满，但接受了这些条件——当然也像他们一样附加了条件，因为目前英国人不得不这样做。①

战争中的和平

69

法国与大不列颠和平相处长达 30 年，尽管在此期间，英国人几乎与其他任何国家都有交战。法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已经输掉战争，路易十四的好战政策毫无成果。法国需要在继承人路易十五（Louis XV）的领导下花费时间恢复元气，路易十五的曾祖父于 1715 年去世后，年仅 5 岁的他登上王位。

新法兰西同样需要和平。战略优势使得英国人在 1713 年取得胜利，这种优势依然未变。与法国相比，英国的经济规模更大，可支配收入更多，舰队更庞大。如果战火再起，只要在海洋上，英国人就可以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新法兰西就会在海上被敌人切断。新法兰西需要得到法国持续的补给，并有赖于输送到欧洲的毛皮运输，因此它别无选择，只能感激和平带来的好处，并祈祷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和平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新法兰西几乎没有移民进入，但每 30

---

① Faragher, *Great and Noble Scheme*, 136 - 145.

年人口增长一倍。定居点从河堤向外延伸，狭长的农场沿河流铺展开来，呈规则的排状，或是政府特许开采的土地。道路与河流平行，联接着农舍。

房屋类似法国西部，尤其是诺曼底的房屋样式。有时，定居者使用大块垂直木架建造居所，用黏土或碎石作为填充材料，这是常见的法国式建筑技巧。他们极有可能是北美第一个建造原木屋的定居者——原木平行排列，以黏土作填充，这种经典的原木屋在北美讲英语的地区俯拾皆是，但实际上，直到18世纪，这种房屋才被引入到英国殖民地。[①] 原木房屋一直是新法兰西和魁北克乡村最主要的居所。

直到18世纪，新法兰西才很有可能使用石头建造城镇。频繁的火灾烧毁了大部分木制房屋，因此官方责令用石头代替木材建造房屋。然而，正是由于城镇的繁荣、政府契约和军队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使得定居者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建造石制房屋。在魁北克，下城区的房屋又高又窄，簇拥在悬崖下方长满树桩的半岛上；在上流社会居住的上城区，即总督与主教的居住地，房屋较低且更宽敞。 70

总督与主教的生活讲究各种礼仪。在殖民地允许的条件下，其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总督有自己的护卫。当他出行时，即使是到邻近的教堂，护卫也为其举枪致敬并击鼓开道。但教会在魁北克占据首要地位，拥有众多教堂、女修道院和一所耶稣会神学院。1749年，一位瑞典的游客描述到，这所神学院比总督的“宅邸”大3倍，“是城里最好的建筑”。[②]

总督——叫“大总督”更恰当——在魁北克管理着数百万公顷的帝国。大部分“臣民”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白种人，而是印第安人，他们与法国国王的关系确实困扰着巴黎的官员。对印第安人而言，大总督是他们的 Onontio——之前一位总督蒙马尼的莫霍克语说法，这一名字适用于之后所有的继任者。Onontio 是神父、庇佑者、赐予礼物

---

① Harold Kalman, *A History of Canadian Architecture*, vol. 1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8 - 50.

② Peter Kalm,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 vol. 2 (New York: Dover, 1964), 428.

之人，因为正如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所说，“这些部落进行任何交易活动都要制作礼物，以证实他们所说的话。”① “这些部落” 指法国的印第安人盟友。

然而，这些部落指的是哪些呢？大多是位于五大湖地区，讲阿尔冈昆语的部落——例如，渥太华人——但也包括相当数量的易洛魁人（尤其是莫霍克人）以及在17世纪战争期间残余的休伦人和四处分散的其他部落。莫霍克人分为两类，一类拥护英国人，另一类则拥护法国人。一些人以避难者的身份，其他人以天主教皈返者的身份来到法国人的领地。他们被给予土地，这些土地位于新法兰西的边缘，蒙特利尔以外（给予莫霍克人的）以及魁北克城外的古洛雷特（Ancienne Lorette）。这些定居点是后来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体系的直系祖先，这一体系被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因袭。

在议会上，总督被称作“父亲”，他也对“孩子们”给予答复，但并不是说法国人可以命令或强迫印第安人遵循他们的意志。在典型的家庭中，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其中加入了英国这个竞争对手，他们也想争得印第安人的关注，融入他们的风俗。新法兰西以北和以南、哈得逊湾周围及俄亥俄河谷的英国商人，对法国人主导的毛皮贸易构成挑战；如果失去毛皮贸易的主导地位，法国人对内陆的占领将衰落以致消亡，因为毛皮的经济效益与帝国的权力紧密相连。

71

然而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大多数方面，法国人成功地维持并扩展了他们的毛皮贸易帝国。他们在几个营地，主要是五大湖上的底特律和米奇里马基纳克（Michilimackinac）经营，捞取了从北美出口的大部分毛皮。面对哈得逊湾公司营地的建立，法国商人和探险家在18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向前方推进，深入大草原，一直到达可以看到落基山脉的地带。同往常一样，他们要寻找一条通向太平洋的线路，然而此事常常令他们迷惑，但他们也试图吸引大草原的印第安人到法国人的毛皮市场，在这一方面，他们成功了。哈得逊湾的商人发现，

① 语出地方行政长官丹尼尔，引自 White，*Middle Ground*，36 页。

他们的毛皮供给停止，利润下降，但这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开发内陆。

法国人的内陆营地驻军稀少，武备废弛。除了经济上的功能和残存的象征价值，这些营地也充当着内陆交通线路的中转站，此线路联结魁北克与新奥尔良——现实中的一条小路将法兰西帝国各部分联结在一起。

大多数毛皮贸易公司并不依靠长期从事交易的商人，而是依靠每年从蒙特利尔出发前往内陆的毛皮队伍，如此年复一年。这些人出生在殖民地——渐渐地被称为法裔加拿大人（*Canadiens*），以区别于身份上离他们日渐遥远的法国人。他们必须相对年轻、健康、精力充沛以适应艰苦的行程，还须具备冒险精神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为他们将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那里的风俗习惯和精神寄托与法国亦或新法兰西的情形相差甚远。他们大多来自农场，并且最终也将回归农场。与此同时，一旦越过米奇里马基纳克，他们将经历没有总督、牧师和军官的生活。

72

只有去往底特律和米奇里马基纳克的商人有希望在当年返回家中。其他大部分毛皮商人必定两三年不能回家，也没有希望得到家里的消息。他们只好逆来顺受，在村里与印第安人同吃同住，从印第安女人那里得到满足。这种与印第安妇女同居的关系并不总是基于生理需求或欲望，也给双方带来好处——使法国人融入到土著社会，与土著政治体系建立有价值的联系。① 一些人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之情，与他们的妻子和混血孩子呆在一起，这些孩子通称梅蒂人（Metis）。曾在18世纪初，一位目击者称内陆的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人邻居、联盟及主人为“一个部族”，确实有如此多的法国人融入到印第安人当中，因此上述评论不无道理。②

梅蒂人通常依靠自己成为商人，代表“中间地带”，这一说法出自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指位于沿海欧洲殖民地与

① 例证见 White，*Middle Ground*，70－75 页中对 1694 年一次复杂的婚姻纠结的描述。

② 在 Havard and Vidal，*Histoire de l'Amerique Francaise*，251 页中有引用。

西部土著社会之间的部分。18 世纪，中间地带一直在扩大——这是一个新的群体，既不是纯粹的欧洲人，也不是纯粹的印第安人，它反映了双方的冲突和需求。然而，中间地带决定不了哪个帝国在争夺北美的战争中获胜。

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成联盟的策略既是必要的，也是拒绝征服新法兰西土著人口的开明做法。新法兰西的人口数量不足以支持内陆的殖民化。17 世纪，法国人已经进入到圣劳伦斯河畔的空旷土地上，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 18 世纪末，空旷的土地为法国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提供了享用不尽的住所。法国人经常向印第安人联盟和附属民众讲述法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法国人进入美洲是友善的，给予印第安人礼物并对他们进行保护，而英国的殖民化扰乱印第安人的秩序，吞噬边界土地。

73

法国人在内陆的真正定居点少之又少——几个为贸易营地提供食物的农场、几个要塞，如密西西比河上的底特律或圣路易斯（St. Louis）。底特律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那里的法国人与印第安人并非一直相安无事。在路易斯安那，遥远的南部是大一些的法国殖民地，例如，密西西比河畔的纳切兹（Natchez）部落周围。那里的法国人凶残傲慢，导致印第安人于 1729 年发动全面反抗，227 名法国定居者被屠杀，50 名法国妇女和儿童被掳走。考虑到路易斯安那稀少的法国人口，这次事件对殖民地来讲是一次明显的倒退。

法国人进行了反击。他们争取与纳切兹印第安人为敌的部落的支持，杀死并奴役尽可能多的纳切兹人。“当达到目的后，”历史学家阿兰·泰勒（Alan Taylor）写到，“法国人屠杀并奴役土著人，同英国人一样凶狠。”一位法国牧师从这次经历中得出教益：“上帝希望他们（印第安人）腾出自己的地方给新来的民族，”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①]

来自英国的挑战

大英帝国成为法国在北美至高无上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它已不再

① Alan Taylor,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 Viking, 2001), 389 - 390.

是英格兰王国，而业已成为不列颠帝国。英格兰与苏格兰王族举行了王室婚礼，宗教改革使大部分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成为新教徒，这些为共同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基础。1707 年，依据宪法，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它的居民成为不列颠人，而这一新创造的身份被一直沿用。入侵新法兰西的是英国军队，而不是英格兰军队。苏格兰人成为"不列颠身份"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是新教徒君主体制。国王和女王必须是新教徒，且只有新教徒才可以被选为下议院议员或担任公职。虔诚的英国人保留了天主教，即令人厌恶的法国人的信仰"罗马教皇制度"。法国人是可怕的，不仅因为他们是法国人——见证了英格兰与法国的中世纪战争——更因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皇卑躬屈膝的追随者。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愈加宽容，虽不是每位英国人都这样认为，但如果忽略这一点，就可能会有危险。① 直到 1780 年，伦敦为反对天主教的动乱所震撼，宗教（至少包括天主教—新教这对分支）仍是大不列颠政治中一个活跃且通常是决定性的争论点，对所有英语民族皆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之后也将如此。

74

与对手法国相比，大不列颠的人口稀少，面积狭小。但它正逐渐富裕起来，到 18 世纪中叶，大不列颠在财富、工业及税收方面超过了法国。② 其中，税收用于支持与法国的战争和舰队建设，英国舰队在欧洲首屈一指。应该在此强调，所有这一切与北美几乎没有关系；1689—1697 年的战争和 1702—1713 年的战争使无比激烈的欧洲冲突深入到殖民地，而不是由殖民地引起的。殖民地几乎没有对英国的财源

---

① 在一些方面，1520—1648 年的宗教战争令许多欧洲人"厌恶"，但尽管如此，宗教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欧洲宗教平衡的变化使人担忧。詹姆斯二世认为其天主教的重要性足以在 1688 年令他的王位冒险——甚至失去王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被大不列颠的许多人视为新教反对存在时间长且具有挑衅性的天主教势力的斗争。见 MacCulloch，*Reformation*，669－671 页，18 世纪初的心理状态。

② 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指出了英国在高效的国内运输、可利用的煤和高效农业方面的优势，所有这些促成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增长。Davi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New York：Norton，1998），chapter 15.

贡献力量，直到18世纪中叶，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贸易所得才对大不列颠产生重大意义。

不过，法国依然比较富裕——这可弥补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造成的损失。割让阿卡迪亚与纽芬兰给大不列颠，危及到法国至新法兰西的海上交通。只剩下圣劳伦斯湾的岛屿，特别是最东端的布雷顿角岛。官方调查发现东海岸有一大型海港，此地成为法国人的堡垒，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堡（Louisbourg）。

路易斯堡被设计成军事基地和贸易港口，也是战时法国船只躲避英国人追击的避难所。那里精密而昂贵的防御工事守卫着港口，有防御要塞和大量火炮，可以说是军事科学设计的最出色的防御工事。［多亏路易十四的军事建筑师马歇尔·沃邦（Marshal Vauban），法国人在堡垒设计方面世界领先。］法国政府提供了不计其数的金钱和供给来建造路易斯堡，但最终完工的却比计划的要少。政府官员抱怨工匠人数不足，建筑材料质量低劣。此外，存在一处设计缺陷，因为靠近陆地一侧的防御工事是于之后的18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添加的。维护堡垒又是一个问题，并且卫戍部队的士气也存在问题。路易斯堡的官员发出警告，称没有大量的增援装备，尤其是船只，就无法保卫路易斯堡。

然而，当战争——在美洲被称作乔治王之战（King George's War），因英王乔治二世得名——最终于1744年爆发时，路易斯堡那里没有船只，更谈不上派遣船只。［这次战争事实上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双方对一位叫做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的女性继承奥地利王位的权利存在争议，或者说普鲁士无论如何想得到奥地利任意几块土地。——因此，在欧洲被称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法国主要投身于陆地上的战斗，与英国相比，法国海军力量薄弱。于是英国人掌控了大西洋西部，稍作迟疑之后，将法国舰队围困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港口。路易斯堡的军队随后哗变，成为又一个不祥之兆；只有当路易斯堡的官员卑躬屈膝时，军队才重返岗位。

战争的爆发也为英国殖民地敲响了警钟。40年前，由于法国人与

印第安人的抢劫，马萨诸塞损失惨重，并且和平年代只是巩固了印第安部落对法国人的依附感，这些部落位于英属与法属殖民地交界。阿卡迪亚的情形不甚明了。边界不明确，印第安人［主要是米克马克人（Mi'kmaq）］不友好，而法国人在附近的路易斯堡有很强的吸引力。事实上，阿卡迪亚割让给英国并改名为新斯科舍之后，居民到18世纪40年代末接近10 000人，并且仍然呆在那里，这一点值得怀疑，因为这些居民充其量持中立态度，或许还欢迎法国人归来。最终，马萨诸塞成为一个经营渔业的殖民地，并对新斯科舍的渔业产生浓厚兴趣。76 无论怎样使得捕鱼业的成功率更高，消除其竞争对手，或更牢固地依附马萨诸塞，都注定会寻求那里的支持。

在皇家海军的帮助下，马萨诸塞总督雪利（Shirley）于1745年春发动了对路易斯堡的海陆攻击。他的这次远征证明了之前提出的路易斯堡防御工事不健全的正确性。法国人守住堡垒唯一的希望是等法国海军到来，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马歇尔·沃邦不仅构建了防守堡垒的方法，也构建了占领堡垒的方法。利用他制定的方法，英裔美洲人将战壕与火炮攻击集中到一点，迫使法国守军投降。

对路易斯堡的围攻是北美1744—1748年战争中唯一的一场大战。这几年战争中的主要事件发生在欧洲和印度（India）。在欧洲，法国人占优势；在印度，法国人比在美洲运气更好一些，占领了马德拉斯这一重要的英国贸易要塞。英国在海上的支配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且天气也眷顾了英国人，当法国舰队于1746年试图夺回路易斯堡时，途中遭遇风暴，舰队沉没。

在大陆内部，法国人与印第安部落结成联盟。易洛魁人依然保持中立，俄亥俄河谷（Ohio Valley）的部落普遍支持法国人，但却与英国人进行贸易往来。法国人的联盟并不稳固，但在交易商品稀缺的压力之下也未崩溃，这些商品被渡过大西洋的英国海上力量从源头上截走。

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的签订结束了战争。英国人以路易斯堡换回马德拉斯（Madras），却激怒了占领路易斯堡的新英格兰人。然而，路易斯堡有其重

要性，正是因为它归英国人所有，才说服法国人接受相持不下的战争结局，使双方都恢复到战前状态。① 但条约并未确定新斯科舍的精确边界，当然也并未消除路易斯堡对阿卡迪亚的法国人的吸引力。

不战不和

77 乔治王之战使魁北克的法国官员明白，他们的美洲帝国在英国海军与不确定的联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稳定，而且这些不确定的联盟使法国人边界的印第安人依附于路易十五，而不是乔治王。新法兰西依赖母国提供金钱、供给和军队，要使这些人力、物力在战时渡过大洋需要一支海军增援，也需要维护法国人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从路易斯堡稀稀拉拉延伸至新奥尔良。对印第安联盟而言，他们需要大量廉价的交易商品——换言之，是持续不断的补贴——目的是与来自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英国商人竞争。这些在本质上是财政问题——对于一个不愿考虑大数额新支出的法国政府而言，是不愿提供交易商品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按照大多数政府做的那样——采取折中办法，让印第安联盟看到希望，同时也表现出法国人的决心。这种决心表现在大力推行法国人的利益，以对抗俄亥俄地区的英国商人以及新斯科舍英国人的不景气的企业。不久，军队便行动起来，建造要塞并执行法国人占据领地的要求。

这是一次危险的游戏。乔治国王的首席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马上抱怨“美洲这些野蛮的法国总督”。法国人不能证明这些侵犯性政策的合理性，对英国人而言，正如纽卡斯尔所说的，“我们不能忍受［这种做法］”。

法国人侵性政策的第一步由新斯科舍的阿卡迪亚人承担。18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无限期的和平近在眼前，法国定居者与罗亚尔港的小型英国卫戍部队和平相处。英国人没有打算在新斯科舍定居，而

①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0), 36.

法国传教士保持着他们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影响，包括阿布纳基人（Abenaki）、米克马克人和麦勒席人。这些部落也没有受到英国定居点的直接威胁或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

战争改变了一切。法国传教士带头恐吓阿卡迪亚人，并怂恿印第安人骚扰英国人。战争于阿卡迪亚边陲燃起，尽管法国人未能成功占领位于安纳波利斯罗亚尔（Annapolis Royal）（之前的罗亚尔港）的英属殖民地首府。阿卡迪亚人憎恨法国人只有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才要求援助和补给。但他们也不会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这样一来比什么都不做更好，但还是激怒了一些英国官员。 78

因此，新斯科舍的和平不过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休战而已。为了巩固权威和保持路易斯堡均势，英国人倾注 3 000 名定居者及 700 000 英镑于一个新基地，这一基地位于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天然良港附近，哈利法克斯这一名字是为纪念一位英国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然而，这一定居地并未繁荣起来。法国人与他们的印第安人联盟骚扰定居者，使殖民地处于危险和原始状态，不久，殖民地的名声打消了潜在定居者的念头。但并非所有人都裹足不前：新英格兰人被吸引到这个滨海殖民地，如同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一般。

阿卡迪亚人展示了如何在芬迪湾的沼泽地创造一种体面舒适的生活。至少在经济方面，他们的实践具有典范性。然而在政治上，他们易受攻击。阿卡迪亚人认为自己只是附带条件的英国臣民，而法国国王通过传教士深入到他们的村落。18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初，英国人未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当地官方甚至允许阿卡迪亚人不必为保卫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而战。但在 18 世纪 50 年代，总督们不像前任者们一样心安理得了。对他们而言，如果阿卡迪亚人不是完全意义上可信赖的英国臣民，那么必定是其他人——如果不是不列颠国王的属民，一定是法国国王的属民。在一个边界不明确、刚结束的战争没有结果的地区，阿卡迪亚人对法国人而言则是一个诱惑，对英国人而言是一个负担。法国人将不费太大力气使阿卡迪亚人回到原来效忠法国的状态；而英国人又能抓住这次机会吗？

79 法国人现在开始调动军事力量来支援他们宣布占有的领地。一支分遣队被派往希格内克托地峡，介于现在的新不伦瑞克与新斯科舍之间，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要塞，称为波塞诸尔（Beausejour)。英国人也派出军队，大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并建立了他们的要塞，称为劳伦斯（Lawrence)，是以新斯科舍总督的名字命名的。整个18世纪50年代初期，双方卫戍部队隔一条狭窄的河流怒目相视，等待一场必将到来的战争。

法国官方也在俄亥俄地区整顿军备，蓄势待发。他们的行动凸显出与英属殖民地的不同，那里的部队看起来分散，不统一，不符合军事规程，而新法兰西可以很容易聚集到大量民兵，并沿殖民地河流的大路进行远程部署。

18世纪40年代末之前，法国人可以依靠易洛魁人的力量来保持边界均势，并充当英属殖民地与法国宣布占有的土地——但未占领——之间的屏障。易洛魁人——先是五部落联盟，之后于18世纪20年代，成为六部落联盟——追求自身利益，同时接受英属人和法国人给予的礼物，但拒绝干预任何一方。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易洛魁人及其扈从与联盟控制了俄亥俄地区。俄亥俄内外部落的加入使易洛魁人的力量增强，可置于战场作战的士兵数量扩大至10 000多人。(易洛魁人自身士兵数量共计仅1 100名。)[1]

由于扩张，带给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压力不断攀升，然而此刻，易洛魁人对内陆的控制松弛。易洛魁人对殖民者作出名义上的让步，他们认为是名义上的，然而事实上，易洛魁人给予或似乎给予了远远超出他们所认为的——占领整个俄亥俄河谷的权利。

英国的定居者和土地投机者跟随本国商人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令不再受易洛魁人保护的现有居民惊慌失措。定居者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印第安人离开他们宣布占有的土地。定居者的借口以及他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对法国人而言是一件政治上的幸事。法国人告诉印第安人，是英国人

80 要驱逐他们离开家园，而法国人没有对他们构成这种威胁。而另一方面，

①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18－20.

英国人却对印第安人说，法国人阻止竞争和自由贸易。

脆弱的易洛魁帝国不能维护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利益相悖之处以及其自身与其属地间的矛盾。18 世纪 40 年代，易洛魁人的支配地位逐渐削弱，随后彻底消失。法国人于是开始更加激烈地干预土著人事务，起初，表明他们宣布占有之土地的所有权，之后在 1753 年，魁北克一个“野蛮的总督”派出一支军队，这是目前在新法兰西招募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300 名正规军［海军陆战队（the *troupes de la marine*）］、1 700 名加拿大民兵和 200 名印第安人从蒙特利尔出发到俄亥俄地区。按照欧洲的标准，这一数目不算大，但对一个人口总数为 55 000 人的殖民地而言，却是一项重大成就。他们将修建一条从伊利湖到俄亥俄河源头的短距离的道路，并在沿线建造要塞。目的是阻止英国人进入，无论是商人还是定居者，也借此加强法国人与内陆印第安部落的联盟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征取得了成功。军队修建了道路和要塞，也提升了法国人在那一区域的威望。另一方面，当远征队到达伊利湖与俄亥俄河间的陆路货运线时，只剩 800 个士兵可以搬运货物；最终，2 000人中有 400 人死于疾病，这对于一个小殖民地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损失。① 幸存者怀有之前留下的怨恨，因为众所周知的是魁北克的官员，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弗朗索瓦·比戈（Francois Bigot）通过欺骗国王和军队取得丰厚利润。随着魁北克军队数量的增长，欧洲定期提供增援物资，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及其同僚赢利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他们克扣运往军队的补给，再转售出去。士兵确实加强了对殖民地的防御，但当地的地理状况——可用遥远、无路的荒野以及疾病来形容——仍然是新法兰西的主要防卫力量。

七年战争

野蛮的总督导致战争沿阿卡迪亚与俄亥俄地区的防御边界爆发。　81

---

① Eccles, *Canadian Frontier*, 160;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32. 估计法国人在远征冒险中花费了 400 万里弗。

英国人先是发出恫吓作以回应，之后动武。弗吉尼亚派出22岁的年轻军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路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达俄亥俄河谷。正是华盛顿的军队，对法国人打响了第一枪。华盛顿在1754年被法国人俘获，但侥幸逃生。

英国人1755年的又一次远征却未必如此幸运了。英国政府筹集了100万英镑，并派遣增援部队到新斯科舍和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的军队由爱德华·布雷多克（Edward Braddock）将军统率；华盛顿为副官。军队进入荒野，向法军要塞迪凯纳（Duquesne）前进，迪凯纳位于现在的匹兹堡（Pittsburgn）旧址。他们从未到达那里，因为遭到法国与印第安小股部队的伏击，大部分士兵阵亡。布雷多克亦战死。

另一场激战发生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南端，新法兰西与纽约的边界。尽管英国人试图拦截，法国人还是成功派出2 600名正规军到达新法兰西。（英国人俘获总人数3 000人中的大约400人。）法国人派军队向南，沿黎塞留河（Richelieu River）与尚普兰湖北上，到达现在的乔治湖（Lalce George）上的克朗波因特（Crown Point）。英国人在那里击败了法国正规军以及他们的民兵，并俘获指挥官巴龙·迪斯考（Baron Dieskau），使新法兰西的军队群龙无首。

最终，英国军队——事实上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地方军队——占领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边界的波塞诸尔要塞。现在，新斯科舍政府在马萨诸塞军队的支持下将注意力转向阿卡迪亚人。新斯科舍人被最后一次召集起来，宣誓无条件效忠于英国人，并同意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乔治王作战。然而，阿卡迪亚人再次拒绝了英国人。

阿卡迪亚人的拒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英国人抓捕了尽可能多的阿卡迪亚人，将其集合在一起，扣留下来，于1755年秋装上船只运往其他英国属地，有的被运到大不列颠。在这一过程中，骨肉分离，农场被付之一炬。保护农田的宝贵堤坝被遗弃；新英格兰人当然不知道如何维护堤坝。对阿卡迪亚人的驱逐并未导致法国定居者也遭如此下场——一些逃至荒野，一些逃至法国人的领地——但它永久改变了新斯科舍的人口平衡与权力均势。阿卡迪亚人很快被来自新英格兰的定

82

居者取代，新斯科舍事实上成为名副其实的英属殖民地。

这一切发生在和平时期，这一时期，英国与法国政府在欧洲维持着外交关系。但美洲系列事件的压力促使外交关系首先破裂，之后于1756年5月正式宣战。（后来被称为七年战争。）在欧洲，战争主要在德国进行，一方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与俄国，而另一方则包括大英帝国与普鲁士。

实际的宣战日期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在美洲及美洲海域，战争正在进行。当法国人依然可以派兵之时向魁北克派遣了增援部队，由一名新将军——蒙特卡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率领。也有一位新总督，沃德勒伊侯爵（Marquis de Vaudreuil），顺便说一句，此人出生于加拿大。

蒙特卡姆行动迅速。1756年8月，占领了五大湖上唯一的英军营地奥斯威戈堡（Fort Oswego）。英国官方此时举棋不定，而众多殖民地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差别极大，这场战火危机注定燃至他们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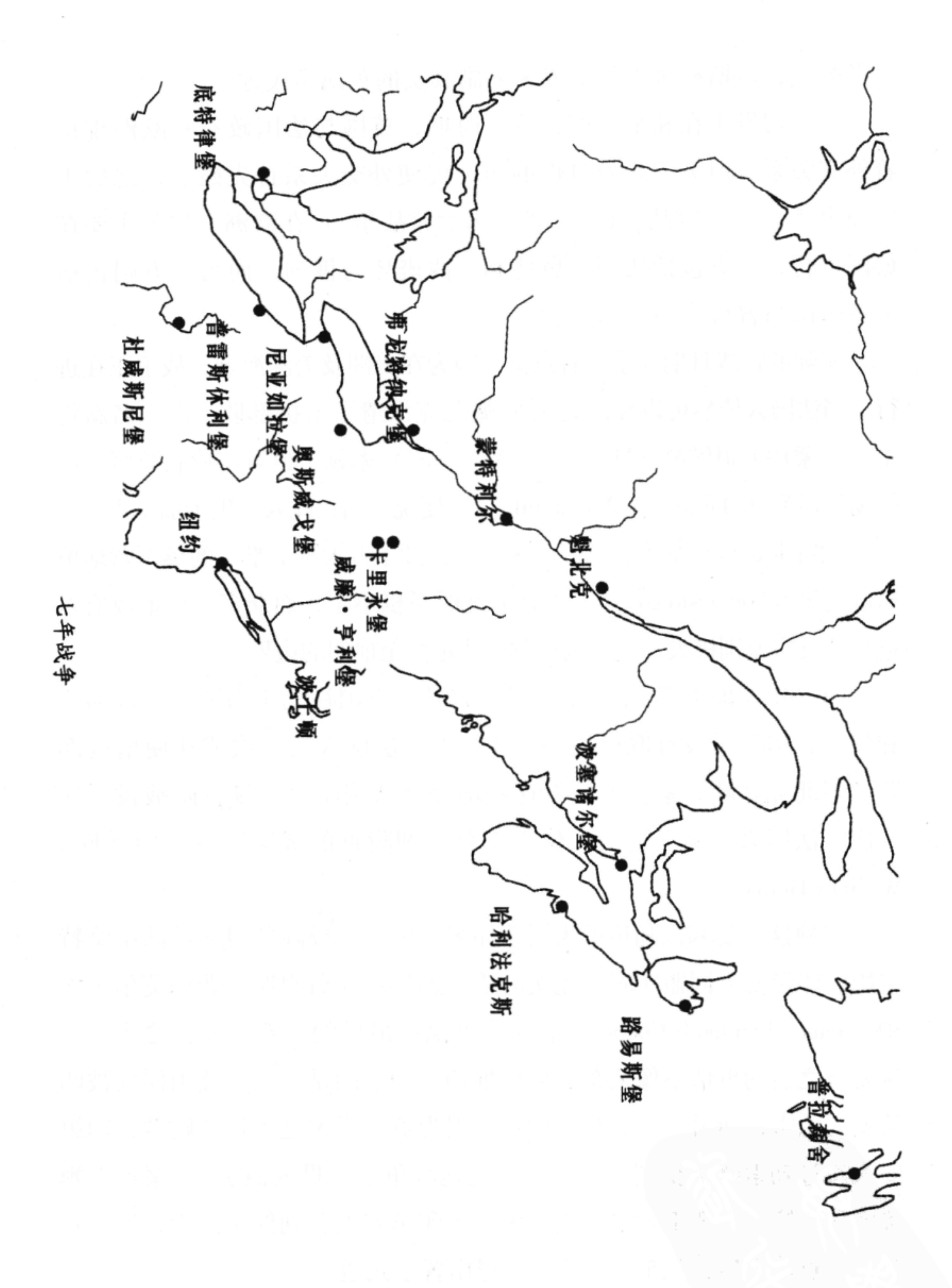
第二年，即1757年，形势未有好转。英国往北美部署了大量部队和将军，但几乎没有取得战果。在海上，法国人又一次成功使增援部队在魁北克登陆，蒙特卡姆将这些增援部队用于另一场冒险战役。这一次，法国人占领了英国人位于尚普兰湖附近的威廉·亨利堡（Fort William Henry）。

占领这一要塞以随后的大屠杀闻名，由一些投降的卫戍部队中蒙特卡姆的印第安人同盟实施，此次屠杀永远记录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后来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之中。占领要塞之后的事情不像公布的那样准确。确定的是，一些英国俘虏被印第安人杀害，而另一些只是被掳走，因为英国俘虏是难得的财源，印第安人通过勒索赎金获利——这是殖民地战争中一贯的做法。[①] 蒙特卡姆确实从印第安人那里救出一些俘虏，当印第安人看到俘虏减少，赢利希望一点点消失后，几乎确定将其他俘虏置于死地。

84

---

① Ian K. Steele, *Betrayals: Fort William Henry and the "Massac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7 - 122.



七年战争

这是文化的冲突。对法国人与英国人而言，投降的俘虏神圣不可侵犯。对印第安人而言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蒙特卡姆将军对他们在战争中的一贯做法进行干涉，印第安人感觉遭到背叛。许多印第安

人不会再为法国人服务，这对这场战争中的法国军队而言损失严重。蒙特卡姆当然对印第安人联盟愈发厌恶，更不必说不守军纪的殖民地民兵了，威廉·亨利堡发生的事件属于法国殖民地军事力量瓦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最终，殖民地和本土的英国人都被抢劫和谋杀的情节所震惊，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有许多——将经历告诉了其他同胞。这标志着英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看法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前，印第安人有时被看作浪漫的人类，未被文明罪恶玷污的"高贵的野蛮人"。威廉·亨利堡事件后，一些看法变得更为强硬。与文明开化的欧洲人相比，印第安人并不是更具人性之人，相反更加没有人性。然而对此并未形成一致意见，英国人也因此创造出新的对印第安人政策。[1]

时运不济的两年过后，1758 年，英国人否极泰来。以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为主导的本土政府更加强大，再加上更优秀的将军及更强大的财政支持，所有这些开始发挥作用。皮特对殖民地豪掷补贴，以说服殖民地为他派出的军队和舰队渡过大洋提供人员、补给方面的重要帮助。英国舰队，即皇家海军，令法国海军被迫龟缩在法国港口。

85

蒙特卡姆和其他殖民地指挥官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或至多依靠殖民地所能提供的一切供给。令法国人感到不幸的是，加拿大殖民地收成糟糕，供给开始短缺，进而价格上涨，而这一情况令地方行政长官比戈及其密友十分高兴。蒙特卡姆将军与沃德勒伊总督在战略及战术上发生分歧。然而他们的争吵几乎不能改变战争的大致前景，这一前景由英国在海上的支配地位控制。英国人能够切断将新、旧法兰西连在一起的大部分链条——他们做到了。

1758 年，海上力量使英军在路易斯堡如入无人之境。一旦英国人

---

① Linda Colley, *Captives*, 181－182 页用大屠杀暗示英国对印第安人态度的变化，从世纪初的浪漫赞颂转变为 18 世纪 50 年代及其之后的一种消极的现实主义态度。但英国的态度是简明的，但当其态度具有暗示性时，就几乎无法下定论了。似乎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在威廉·亨利堡前后都有很大不同。

登陆，胜利唾手可得，因为他们的人数和装备都胜过法国人。1758 年 7 月，路易斯堡投降。考虑到威廉·亨利堡事件，英军指挥官杰弗里·阿默斯特将军（General Jeffrey Amherst）拒绝授予法国人在战争中的一般荣誉。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内陆取得胜利。一次远征占领了安大略湖上的弗龙特纳克堡（现在的金斯顿），另一次远征占领了俄亥俄地区的迪凯纳堡。只有在尚普兰湖，蒙特卡姆取胜，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打败英国人。但面对其他法国人取胜的战役，蒙特卡姆认为下一年一定发生的战役的前景黯淡。

蒙特卡姆判断，英军将进攻殖民地首府魁北克，这一判断完全正确。1759 年 6 月，一支英国舰队载有一支由詹姆斯·沃尔夫将军率领的 8 500 人的军队去往魁北克。沃尔夫似乎不太可能被选为将军——他只有 32 岁，体弱多病、特立独行，被年长、经验更丰富的下属嫉妒。然而，沃尔夫野心勃勃，而且有良好的政治背景，足以让他得到魁北克远征军的统帅职位。

蒙特卡姆已经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沿圣劳伦斯河北岸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处于岬角上的魁北克被悬崖峭壁和一条狭窄的河岸所保护。任何人想要占领这座城池，必须绕过或翻过那些悬崖峭壁。

86

沃尔夫似乎未采用其中任何一个办法。他用火炮轰击魁北克，使大部分地区化为废墟，而没有攻陷蒙特卡姆任何重要的防御工事。之后，沃尔夫下令烧毁圣劳伦斯河沿岸所有农场和居所，这一明显的野蛮人的行径对马上要击败蒙特卡姆的任务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这一行径或许在中期有利于使法国人对英国保持一种正常的敬畏心里，或者至少当法国人被激怒时，英国人将如何应对。）

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到 9 月初，沃尔夫已经对他的任务丧失信心，正如蒙特卡姆对他的任务丧失信心一样。沃尔夫决定孤注一掷，令他的军队在夜色掩护之下在一处防卫松弛的河岸登陆，翻过魁北克上方的悬崖，在城墙外的战场——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与法

国人对峙。[①]

沃尔夫也许本可以寻求一种壮烈的牺牲方式，以弥补他预料到的失败。相反，他发现一种莫以成败论英雄的壮烈牺牲方式——由于他的对手蒙特卡姆疏忽、鲁莽的回应，一次偶然的胜利唾手而得。对这场战争的描述集中在1759年9月13日早晨攀爬悬崖到达亚伯拉罕平原的难度。问题是如果碰到顽强的抵抗或如果法国人取胜，那么英国人将无法爬下悬崖。

法国人没有取胜。蒙特卡姆也许可以躲在魁北克城墙后面；也许可以等待援军或包围沃尔夫的军队。如果全体集合，法军的数量超过英军，且法国人拥有可以胜任的军官领导他们进行一场组织严密的战斗。然而蒙特卡姆没有等。他过于依赖加拿大民兵——英勇但缺乏组织性——将自己的军队派往英军的防线。18世纪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训练出来的：他们站成一排，沉着镇静，有规律地向不断靠近的敌人开火。然而，英国人开枪时法国人的防线崩溃了，四处逃散。蒙特卡姆受致命重伤，在城内被俘。

几天之后，魁北克投降。而法军主力完好无损，绕魁北克城逃往蒙特利尔，蒙特利尔仍在法国人手中。英国人当前面临占领魁北克的艰难任务，这座城市在他们的炮火下几乎化为废墟，缺乏供给来维持生存，直到次年春季才可以缓解。于是英国军队和舰队离开了，魁北克进入漫长的冬季隔离期。

87

第二年春季，蒙特卡姆的继任者——能力出众的希瓦利埃·德雷维斯（Chevalier de Levis）带领法国军队回到魁北克。法军适时击败了沃尔夫的继任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将军的不明智的回击，他照搬蒙特卡姆的战术，令军队行进至魁北克城外。受到惩戒的默里坚守在城内，希望圣劳伦斯河上游到来的第一条船是英国人的，而不是法国人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

① 此地最先被一位早期定居者亚伯拉罕·马林（Abraham Marin）的农场占据，因此称为“亚伯拉罕平原”。

法国人竭尽全力到加拿大解救被英军围困的法国舰队。但警觉、有才能的英国海军上将令其受挫——尤其在1759年11月，霍克上将（Admiral Hawke）在法国西海岸的基布伦湾击败了法国人。霍克的胜利至少与沃尔夫的胜利一样重要或更为重要——但霍克有幸没有阵亡，也因此逃过像沃尔夫那样军队取胜但壮烈牺牲的命运，后者的这种结局使他和亚伯拉罕平原之战名垂青史。①

征服加拿大的最后一战发生在1760年夏。在杰弗里·阿默斯特将军的整体指挥下，3支英国军队集结在蒙特利尔——分别来自安大略湖、尚普兰湖和黎塞留河下游、圣劳伦斯河上游。3支军队于1760年9月在蒙特利尔前汇合——这是18世纪军队组织上一次极不寻常的壮举。由于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少于对手，德雷维斯于是寻求和解，阿默斯特按照在路易斯堡的方式给予准许。法国人不会得到战争荣誉，不能举旗、拖引（象征性的）火炮行进。德雷维斯烧毁旗帜，法国人于1760年9月9日正式投降。德雷维斯和他的军队乘船回到欧洲，最后回到法国。

投降的军事条款在那一时期饱受争议。民事条款则更为重要。这些条款强制规定，高级民事官员必须离开，剩下的人服从英王；继续保持现有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对新法兰西居民的财产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予以保证，尽管英国在法律形式上坚决信仰新教。这是一种临时决议，确切地说是停战协定，搁置了正式和平条约的签订。

88

缔结和约

英国人捷报频传。他们告捷于美洲，同样也在海上、欧洲及印度

---

① 使沃尔夫的名誉受损花费了很大力气，而且很可能无果而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Ashfield Press，1983），108］表示，沃尔夫在英国军队中即使有实力相当的对手，也是少之又少，在七年战争或世纪末都是如此。W. J. 艾克尔斯（W. J. Eccles）认为沃尔夫和蒙特卡姆都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后者：*Canadian Frontier*，181－182。弗雷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在其 *Crucible of War* 一书的351－355页中认为，1759年9月，沃尔夫在寻死，强调“他冷酷的沉思”，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

取得巨大胜利。他们接着于1762年包围并占领了哈瓦那（Havana），此地属不幸的法国盟国西班牙所有。位于加勒比海的大部分法国岛屿也落入英国人之手——这是最丰厚的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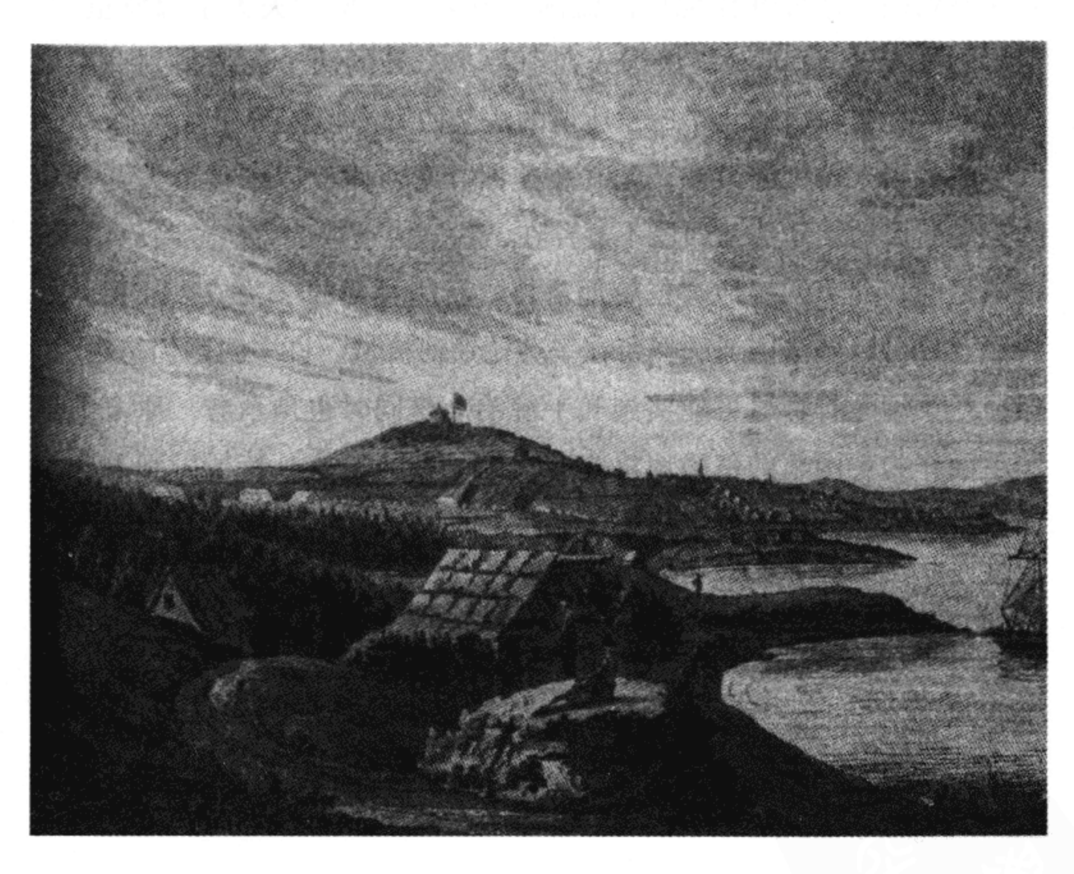
加拿大还有最后一战——法国人于1762年入侵纽芬兰。因法军人数太少最终投降——这是法国军事力量对现在加拿大这片土地的最后一次入侵。

英国政府强烈倾向于缔结和约，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及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国内由新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新大臣和新政策掌控，因此急需和平，并且英国人愿为和平做出一些让步。法国人无疑是最大的输家。他们放弃了加拿大，即之前的新法兰西。路易斯安那部分归大不列颠，部分补偿他们的盟国西班牙。西班牙失去了佛罗里达，但得到了古巴（Cuba）。法国人在纽芬兰之外的两个岛屿得到一小处立足点，拥有在岛屿北岸——所谓的法兰西海岸晒鱼的权利。

而英国人得到的最多，尤其在美洲。密西西比以东整个大陆都成为英属殖民地。新法兰西已不复存在，法国人造成的直接危险已消除，法国之前在北美的属地被仁慈地对待。新法兰西的居民或去或留，如果愿意，可以到法国或选择留在圣劳伦斯河流域。许多问题仍待解决，但显然英国人打算尽可能实施和平统治。这同时也预示着，原来的新法兰西作为英国新的殖民地将含有法国的特征，这一特征区别于现有的旧殖民地。而法国人也将被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所改变。

89

第五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2）



1780 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位于哈利法克斯的英国港口及防御基地。

18 世纪的英法战争使北美的法兰西帝国被大英帝国取代。同时代的人们认识到了该事件的重要性，并正确地预测出它的结果必定会事关重大。当诸如此类的预测层出不穷时，对未来细节的预测往往会相去甚远。 93

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确信无疑的。北美法国人和本土的法国人之间的政治关联中断了。法国的军队绝不会再度行军穿过加拿大的森林。路易十五及其继承人从皇权、共和、帝国的角度权衡，均认为耗费金钱、船只或士兵开拓北美洲毫无价值——虽然，在一次明显的不寻常场合下，他们可能会用言语来尝试改造北美。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见 15 章）

令法国纳税人安心的是，联系新、旧法兰西的经济纽带也中断了。军用支出不存在了，为维持毛皮贸易和向印第安盟友示好的补贴也随之消失了。

而在文化上，这种中断还不明朗。法律和宗教采用典型的法国模式。加拿大教会不仅与罗马密切相连，还与法国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主教是由法国国王任命的，所以对法国殖民地的教会如何行事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于司法方面，新法兰西的法律自然是法国法律，是“巴黎习惯法”（*Coutume de Paris*），它规定了契约、义务和受保护财产。世俗文化必定也来自巴黎，因为除了法语的出版物别无他物。在物质文化方面，就没那么严重了。那些可以在法国生产的东西同样也可以在大不列颠生产，并且有时甚至更物美价廉。可以在加拿大生产、种植或猎取的东西仍可出口欧洲，虽然是运往大不列颠而不是法国。而传统的敌意也没有排除赞赏和模仿——不列颠的风格、物品和文化受到赞赏和艳羡，尤其在欧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模仿——当然，在海外也概莫能外。① 94

如何与法国永久断绝关系是魁北克的新主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① Ian Buruma, *Anglomania: A European Love Affa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从伏尔泰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年代感染了某些类型的亲英人士。

但是在伦敦的皇权官员眼中，这仅仅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如何运作仅在北美洲面积已逾过去两倍的帝国；如何为刚刚过去的战争埋单；还有如何为帝国日后的统治埋单，这些只是1763年乔治三世和他的群臣所面临众多问题中的几个。比财政（与之相伴的恶梦是税收）更棘手的是文化问题：如何吸收大量的天主教徒进入从法律界定上要求信奉新教的王国和帝国?

英国政府试图表现得富有责任，但是其行为反而触及了税收和宗教所潜藏的隐患。他们想要将帝国的根基建筑得更稳固一些，但却恰恰破坏了它，在这个过程中痛失了大多数的美洲殖民地。如果从1763年向前推50年，确保加拿大成为英国的属地，那么从1763年开始，50载后也绝对不会是美国人的天下。

帝国的理由（1763—1774）

1763年，北美北部约有300 000人——200 000名土著和100 000名包括欧洲人或是欧洲后裔的白人。这里主要被分成两个殖民地——魁北克和新斯科舍，一个坐拥纽芬兰渔场，另一个坐揽哈得逊湾公司及附近的商业区。得益于法国的战败，新斯科舍合并了先前全部的阿卡迪亚，包括布雷顿角岛、圣让岛和后来的新不伦瑞克。总督定居于哈利法克斯，在此统治新斯科舍，并且当选议事会也在此定期召开。在政府、法律（英国普通法）和语言（英语）的结构上，与南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相同。人口稀少的部分原因是1755年阿卡迪亚的驱逐事件，这种情况因新英格兰的迁入者和来自苏格兰及欧洲其他地方如德国持续的成批移民而有所缓解。他们填补了阿卡迪亚的其余部分，这些阿卡迪亚人一部分免遭驱逐，另一部分从战场返回。新斯科舍的陆路通讯困难，大部分地区呈现一片寂寥的荒地景象，与其说是一片不可被继续利用的殖民地，还不如说是位于沿海的一系列面积很小的欧洲人聚居区。此外，它还受到仍生活在落后内陆的印第安部落的侵扰，尤其是米克马克人和马利塞特人（Malecites）。

95

纽芬兰的捕鱼业是北美的一部分，这是欧洲的世代居民最为熟知

的。它吸引着每年从西欧到大浅滩的无数渔船，来捕捉无穷无尽的鳕鱼。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定居下来。由于两大帝国间的战争，事实上只有英国人有权留下，虽然法国在北部海滩有暂时的居住权，用以烘干和腌制所捕到的鱼。英国人反对当地人的介入使渔业的利益减少，因为当地人很快也会对捕鱼感兴趣，并瓜分捕获物。故定居活动是被抑制的，但是阻止那些少数心意已决要扎根于此的人十分困难。至于渔场的价值，毋庸置疑：1768 年价值约 600 000 英镑，雇佣 20 000 名渔民，其中 12 000 人来自不列颠群岛。

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纽芬兰才有总督、议事会、民选的和有组织的政府。当总督被任命下来，他把驱逐尽可能多的居民当作己任。然而，官方估计常住人口为 16 000 人，分布在数公里的海岸线上——人口的数量和定居的地点都可以抵御政府削减人口的努力。[1]

另一族裔人口的减少，岛上土著人贝奥图克族（Beothuks）的消失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定居者。与其他地方一样，疾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纽芬兰岛上，没有通过毛皮进行的贸易往来，就无从谈起共同利益和相互包容。他们的人数从未增加过（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的时候，他们的人口约 1 000 人），18 世纪末期，贝奥图克人屈指可数。尽管政府努力与其建立友好的关系，留心令其长存，但在 1829 年，他们的最后一个族人去世了。截止到那个时候，生活在最终变成加拿大的大西洋地区的土著人口可能不足 10 000 人。

96

在更北和更西的地方，在位于哈得逊湾公司的商业区，印第安人与白人定居者和商人的往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陆的部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采用欧洲模式的战争和贸易，用步枪和其他商品武装自己。再向西的草原上，从欧洲引入的另一物种马匹，被大草原印第安人接纳了。当然，越向西和向北，印第安人因疾病大批致死的几率越小。事实上，上溯至 18 世纪 60 年代，那里很多

① W. S. MacNutt, *The Atlantic Provinces: The Emergence of Colonial Society, 1712 - 1857*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5), 72 - 75.

人都未曾见过白人。[1]

相对于交易所产生的诱惑力，与欧洲人文化上的差异几乎不值一提。即使遥远北方的因纽特人也未能抵挡诱惑：他们沿水运路线或贸易路线而居，如哈得逊海峡，虽获利于商品交易，但受害于疾病和烈酒，体现了与哈得逊湾公司船只交易所产生的复杂结果。

英国政府对北美土著感到不安。一些土著部落的相互援助或结盟和另一些部落的中立态度，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土著已经变成了英王的卫士，必须加以考虑和保护；在占据大洲内陆之际，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或至少是默许，将会非常艰难，并耗资巨大，这一点也同样重要。英国政治应该精心策划如何使印第安人缓解恐惧，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不巧的是，英国的一位高级将领杰弗里·阿默斯特偏偏喜欢背道而驰。

97

似乎为了突显这一点，1763 年春，战争在五大湖西部周围打响了。一个英军营地——米奇里马基纳克被由奥塔瓦族酋长庞蒂亚克（Pontiac）领导的部落联盟攻克；另一个叫做底特律的营地，侥幸存留。庞蒂亚克的“叛乱”直到 1765 年才结束，而庞蒂亚克自己在此后的一年就向英国投降了。

英国政府试图利用 1763 年 10 月 7 日发布的皇室公告（Proclamation of 1763）争取时间。公告粗略地沿阿巴拉契亚山划下界限，为印第安人保留了西面的土地，并严格规定此处的商贸，此举令东面现有殖民地上的投机者、定居者和商人异常愤怒与失望。公告正式设立了“魁北克行省”，基本覆盖圣劳伦斯河谷的长方形地带。魁北克将变成行省，不像南面的殖民地或新斯科舍。它暂时没有议事会，将被总督和指派的政务委员会管理。

公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沦为一纸空文。到它颁布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定居者已经蜂涌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在随后的几年里也

---

[1] T. F. McIlwraith,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53 - 1967*,” in T. F. McIlwraith and E. K. Muller, eds., *North America: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 Changing Continent*,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207.

有数千人抵达，直到 1768 年作为腹地部落有名无实的宗主，英国政府才通过与易洛魁人缔结条约，割让位于俄亥俄河谷且属于其他部落的土地。

公告只是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一部分。真正引起政府注意的是财政收入。在积累资金的同时，政府也发现了其他的事情——议会并未维护殖民者的利益，所以后者发动叛乱来反对由议会强制征收的国税。

魁北克行省几乎未对战争和革命起到推动作用。从一开始，英国官员就意识到了魁北克存在问题，即天主教、广泛使用的法语和对法国国王依稀存在的忠诚。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当地的总督詹姆斯·默里和盖伊·卡尔顿（Sir Guy Carleton）主张和解。但他们的选择其实少之又少。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驻守如此之大的行省，也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嚣张跋扈的行政部门。魁北克政府必须倚靠与被统治者达成共识，无论这种共识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而确保这种共识的最佳办法就是雇用前朝的遗老遗少。

98

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天主教会，18 世纪 60 年代初，前任主教于 1760 年去世后，天主教会呈现出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主教，牧师就不能被圣化；而没有牧师，那么教区——乡村里最基本的社交和政治单位——将最终失去本堂牧师。问题在于大不列颠的统治者都是新教徒，他们相信天主教是自由的敌人，尤其是新教自由的敌人和暴政的捍卫者。与天主教暂时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包括容忍其宗教活动，但是作为长期的措施，如果不暗中加以控制，这样的政策是不可取的。新教自由的至高无上确实在英军的凯旋上得到印证，这份自由在战争后期得到了英国（和殖民地）繁荣的给养。

尽管存在这些反天主教的情绪，但居住在英国领地，甚至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因为信仰而遭到真正意义上的迫害。如果天主教的牧师不是过于张扬，就不会引火烧身。清教徒牢牢地控制着政治力量，即使在像爱尔兰这样的地方，清教徒仅占岛上人口的很小部分。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屈服的，而作为回报，清教徒对于他们

小型的宗教活动也视而不见。这样很自然地也使在殖民地的天主教徒视而不见，即使有很多殖民者还热诚地相信天主教是国家安定的不利因素。

碍于宗教，英国政府还在犹豫魁北克的统治形式。即使像马里兰（Maryland）（有一位天主教的贵族领主）这样的殖民地，也于1718年剥夺了天主教徒的选举权。魁北克的人口有70 000人，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还在增加，比佐治亚（Georgia）、特拉华（Delaware）和新斯科舍的人口都多，按理说应该选举出一个议事会。但真正的问题所在
99
其实就是几百个信奉天主教的居民。

人数有几百的新教徒认为这样的观念非常正确，那就是只有他们可以选举，并垄断日后自己的议事会，充任所有的公职。但总督继任者詹姆斯·默里（1760—1766）和盖伊·卡尔顿（1768—1778）均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如何维持秩序、贯彻法律，又如何在这个令几乎所有其他行省内居民受到歧视的体制中受益？

默里是一个苏格兰贵族家庭的老么。他发现，无论是来自美洲殖民地还是来自大不列颠的英国商人都很令人讨厌：他怒称其为“一群放肆的小贩”。默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得的利益既不是他的，也不是整个殖民地的。他所管理的政府遭到了反对，并且传到了伦敦，为其政治对手提供了罢免他的口实。商人们希望默里的下一任，即署理总督卡尔顿能够使情况好转，但是卡尔顿令他们失望了。

从随后几个世纪的观点看，1760年后魁北克真正的问题是加拿大法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他们在政治、社会生活和经济上的地位。在那个时期，很多经济领域的活动者都活跃在政治领域，并且试图通过影响英国政府来满足他们的自身利益。

事实上，经济本身发展得很好。新法兰西有来自法国的补贴，而法国注入的黄金使得社会结构得以稳固，并且拥有法国的荣耀以及贵族为战争所筹备的雇佣军。毫无疑问，很多雇佣军前往法国寻求熟识的有钱人。至于新法兰西的商人，有些离开，有些留下，但是他们倚赖的贸易往来不可避免地随着帝国的更替发生了变化，相

应地从一个资金来源和市场变成了另外一个。在一个重商的社会——也就是说，被重商主义理论主宰的世界——这样很容易会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

总督们不断地向伦敦表达对魁北克的看法，包括它的居民、经济和前景。从魁北克派来的官员要经过大臣们的详细考查，后者必须严格考查他们是否符合标准，并令他们适应大不列颠的政局现实——那就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长期不稳定的政局，优柔寡断的乔治三世主持、干预他的政府，但不是控制。

100

18世纪70年代早期，魁北克的问题耗用了英国首都很多官员和大臣的时间，因为政府对如何解决此事的方案无法达成共识，犹豫不决且拖沓耗时。1773年，由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 Lord）把持的政府终于鼓起勇气出台了一项草案，规定了4件事：撤销天主教在魁北克的限制，允许天主教徒在政府任职；扩张行省边界，南至哈得逊湾，东至密西西比河，北至俄亥俄，包括其中所有的英国领地；批准使用法国民法（不适用于刑事犯）；总督和指定的政务委员会制定法规，不设当选议事会。

直到现在，其中意义最重大的条款就是第一条，并不是因为它在魁北克所起到的作用，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先例，并且此后被用于本土、大不列颠和爱尔兰。①

叛乱的过程

同时，英国政府也要处理其他事务。比如，与法国的后期战争必须支付费用。可以说，战争的最主要受益方是美国殖民地，因为法国对其边界、贸易和领土扩张的威胁不复存在。因此，英国政府认为，殖民地应该协助偿还因其而起的战争债务。

殖民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通过筹划抵制和引起骚乱反对税收，

---

① Philip Lawson, *The Imperial Challenge: Québec and Britai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4 - 145.

并最终迫使政府向抵制活动最为激烈的中心地区波士顿（Boston）派兵，但却发现想要震慑美国人，再多的军队也不够。

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叛逆。一位抵御英国的领导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事后分析说，1/3 的殖民者热衷于抵制活动，1/3 忠于英王，还有 1/3 的人是中立方或尚未拿定主意。称自己为抵抗者或爱国者的人有更强的组织策划能力，在政治上也更精明强干。他们善于利用殖民地人民对内阁阴谋的恐惧心理，因为那些阴谋会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因此，保护财产和捍卫自由是政府的主要目的，一切与其背道而驰的行为必然是不合法的。

101

而 1774 年《魁北克法案》（*Québec Act*）的出台纯属偶然。但对于那些忧心忡忡并充满忿恨的殖民者而言，事情并非如此。《魁北克法案》与大不列颠所面临的较大的殖民地问题几乎没有联系——它只是令人不悦的巧合。但这个巧合足以提醒殖民地当局应该对天主教的进犯产生恐惧，也提醒了殖民者，法国的专制政权是由顺从的教会支撑的。

审时度势的马萨诸塞亲英派总督盖奇（Thomas Gage）将军建议大臣们招兵买马，筹集 1 000 000 英镑或是更多的钱财。为安全担忧的亲英派美国人从偏远的地方到达波士顿。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排挤、汪达尔人作风和偶尔的暴力行为。盖奇认识到权力正在从他的手中溜走，逐步受控于省级和“大陆”会议，后者于 1774 年和 1775 年两度在费城召开。

等到伦敦的大臣相信盖奇，为时已晚。直到盖奇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民军包围在首府波士顿，大臣们才派出了军队，但人数远远不够。他请求其他总督派出救兵，魁北克的卡尔顿派出本来人数就不多的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同时，费城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邀请魁北克和新斯科舍的代表前来，加入反对殖民政府的联合前线。

新斯科舍没有采取行动。魁北克没有指派代表的机制，即没有议事会；甚至连《魁北克法案》中涉及的政务委员会直到 1775 年 5 月 1

日才得以生效。卡尔顿断定直接的破坏不足为惧，他说对了。但是颠覆活动刚刚穿过了纽约州（New York State）和新英格兰的边界。在那里，叛军攻占了尚普兰湖沿岸的要塞，从而为入侵打通了方便之门。 102

大陆会议禁止与未派出代表出席会议的任何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此后授权武装民船掠夺包括来自新斯科舍和纽芬兰在内的英国船舶和其他财物。经济武器是强大的，也是把双刃剑：当它太过锋利的时候，也会危及自身。叛乱为帝国经济留下了一道沟壑，而这把双刃剑则为新斯科舍提供了抚平它的机会。新斯科舍自己装备私掠船也是可行的，以所得利益抵消其邻省造成的损害。

一些刚刚来到新英格兰的移民对叛乱的原因表示理解。（但是最近来自大不列颠或是其他部分的移民对革命情绪并不抗拒。）这是一场远离首府哈利法克斯的边远地区的运动，与其他殖民地相比，那里的议事会如果对皇权没有卑躬屈膝，仍然会受到尊重。那里与最近的新英格兰城镇也相去甚远，被人迹罕至的大片荒芜之地和对叛乱持中立态度的印第安人隔开。

叛军的指挥官乔治·华盛顿批准入侵魁北克，同时他希望魁北克能和新斯科舍一并变成第 14 和第 15 个加入叛乱的殖民地。1775 年秋，两支叛军力量在魁北克汇合，其中一支由卡尔顿在蒙特利尔指挥，进行牵制；另一支则经由陆路，翻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军魁北克。

卡尔顿希望依靠经历过七年战争的 9 000 名法裔加拿大老兵或是他们的数目众多的子女进行抵抗，实属徒劳。一些庄园主联合了起来，但杯水车薪。大多数的法裔加拿大农民——当地居民——感到对乔治三世并无忠诚可言。七年战争时，他们在法国官员的统治下受尽煎熬，承受了很多的伤亡和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英国人在圣劳伦斯河畔大肆抢掠，进而平息了战争。是否参战给了那些庄园主一个充分的警示，他们曾热衷于通过一场战争显示其社会地位（作为官员），带给其荣誉和回报。 104



美国独立战争

从1775年开始，卡尔顿得到了一群没有想到的人的支持。在魁北克讲英语的移民，无论来自不列颠群岛还是殖民地，为支持政府组织起来。他们的兴趣是毛皮贸易，而且其市场在大不列颠，而不是美洲。战争减缓了他们与美国人的竞争，并使蒙特利尔重新成为北美毛皮贸易的中心。更有利的是，从事毛皮贸易的法裔加拿大人也很可能看到了与英国人结盟的好处。在此后的战争中，这种情绪越来越浓。但是最初并未给卡尔顿带来什么利益。

最终，11月中旬，总督将蒙特利尔放弃，留给了美国人，而后沿着冰冷的圣劳伦斯河顺流而下逃到魁北克。在那里，美军正严阵以待。

幸运的是，他为数不多的军队和城内的志愿者可以形成一股抵抗力量；这股力量足以抵挡美军，正巧后者缺少攻城大炮，不得不只依靠封锁和强攻来夺取魁北克。由于很多美国军队在年底之前就应征入伍了，他们的统帅里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在1775年除夕夜的一场暴风雪中命令发动强攻。英国人击退了此次进攻，而蒙哥马利阵亡，围城军在继任者本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带领下，坚持到了春天。

春天为英国人带来了船只、军队和补给。美国人逃到蒙特利尔，而后沿黎塞留河北上。卡尔顿慢慢地尾随，也许是希望杀戮的减少会使美国人重新归顺国王的机会变大。

但这一希望是徒劳的，且卡尔顿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坐失了在魁北克一举歼灭美军的绝好机会。美国人先撤军，但择日再战，正是在阿诺德的带领下，于尚普兰湖发起进攻。结果，在1776年，相当数量的英国军人没有沿尚普兰湖逆流而上到达阿尔巴尼向纽约进军，而是在蒙特利尔附近的营地中坐等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征收税款、雇佣军队来镇压叛乱的军官来说，这样的撤军有些可悲；卡尔顿再也不可能统领进攻力量。

105

1776年3月，英国人撤离波士顿，乘船前往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新上任的英国将军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组织了一支北美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军队。当城中叛乱者正在庆祝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的时候，军队走水路来到纽约，在近海伺机进攻。但是从那一历史时刻起，任何调解都徒劳无功：英国人可以选择的唯有战争或是投降并承认美国的独立。

雄兵在握，他们当然选择战争，并且在开始的时候，好运青睐一方。夺回如此之大的美洲土地是艰巨的任务；战略上仅仅依靠英国的军队是行不通的，但英国政府可以依赖，或者相信可以依赖支持他们的很多美国人，可以依赖“好的美国人征服坏的”。正如历史学家皮尔斯·麦克西（Piers Mackesy）指出的，“英国军队可以消灭叛乱的核

心力量，并组织和支持效忠派（Loyalists）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①他们相信在正面战场上，英国人一定能击败美国人。当 8 月豪将军在长岛打败华盛顿的时候，这句话得到了印证。他于 9 月收复纽约市，通过了新泽西，直捣叛军总部费城。豪希望一股强大的英国力量的出现，可以联合先前被叛军威慑的顺民。在短期内，他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如果英军继续铲除眼前的叛军，如果英军继续看上去坚不可摧，那么叛军可能会对自己的初衷感到绝望，并且那些效忠派最终可能会取得对各殖民地的控制。

然而，为了表现军力，豪不得不占领土地，而占领意味着他不得将军队分散，安置在通过新泽西的要塞中，这就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从而令叛军有可乘的反攻机会。华盛顿，即叛军的统领就是这样做的。他摧毁英方位于新泽西的前哨基地，迫使英军撤回纽约城，而且更重要的是，夺回了豪从美国人手中捞取的政治利益。对于英国人和效忠派来说，这是一次很严重的挫败。在美国这边，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赢得了时间来巩固军队、寻找作战盟友。在欧洲，英国的敌人，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正观察着这一切。虽然法国政府过于谨慎，行事小心，但政治分子却十分热衷反叛的理由，这些人日后被称为“进步”阶层。温和宽大的英国人也发现自己无法对大洋彼岸的兄弟真正地愤愤不平。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哈克特·费西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观察得出的一样，英国的辉格党“不可能在扫清美国叛乱的同时，不背离政府所代表的信念”。②

106

在法国权衡利弊进而介入战争之前，英国政府还有一年时间，即 1777 年来平息叛乱。通讯上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信息要花费数周才能穿过大西洋，甚至仅仅从魁北克到达纽约也是如此——给整体战略的实施带来挑战。他们对与法国先前战争的回忆——3 支军队集结

①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 – 178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511.

② David Hackett Fischer, *Paul Revere's R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4.

在蒙特利尔，迫使法军投降——还清晰可辨。这次英国政府试图以蒙特利尔、纽约城和五大湖区的要塞为基地对阿尔巴尼和哈得逊湾进行三管齐下的攻击。如果成功，发动叛乱的殖民地将会被以叛乱的中心新英格兰为界划为两部分，并与其他殖民地隔绝。

但所有的行动都必须齐头并进；军令一旦下达，就必须执行、必须遵守。但军令并没有被遵守，这次计划失败了。而北部的军队在约翰·柏高英（John Burgoyne）将军的率领下，必须弥补去年痛失的机会。他们有条不紊地向阿尔巴尼缓慢推进，但却给叛军留下了可乘之机，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南部的军队在豪将军的带领下，根本就没有移动，而当他们真正行动起来时，却朝着错误的方向行军，绕过新泽西，进军叛军的总部费城。1777 年 9 月，豪顺利地攻取费城，但并不确定将对它如何利用。这次攻占除了对柏高英有所帮助之外，毫无意义。柏高英的那支队伍被叛军反复侵袭和围困，于 10 月在萨拉托加（Saratoga）被迫投降。由正规军和印第安联盟组成的另一支英国力量也被打败了，这使整个行动距离攻占阿尔巴尼的目标相去甚远。 107

一场无用的胜利和两次严重的挫败对英国来说，可谓灾难。外交上，来自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促使法国政府于 1778 年初与美国叛军缔结了联盟。战争紧随其后，大大改良的法国舰队夺得了英国在海上的统治权，并迫使英国政府将海军物资从北美转移到本土水域。1778 年，英国人离开费城，撤回纽约。当 1779 年西班牙也宣战的时候，其战略地位进一步恶化。

英国政府试图使殖民地与帝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但是为时已晚。1778 年的《声明法案》（*Declaratory Act*）同意了殖民地的主要要求：议会正式承认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自此以后，在殖民地征收的税款供自己留用，而不被用于满足帝国目的的事务。此法案不是一则形同虚设的规定，因为它可以用于英国政府的文件仍然有效的行省，即新斯科舍和魁北克。《声明法案》随后成为被革新的帝国具有开创意义的原则，但是在收复失去的美洲殖民地这一方面，此法案没有任何作用。

在北美，叛军无法攻击纽约的英国人，因为没有海上力量进攻新斯科舍，而且不能抽调队伍进攻魁北克。与纽约和费城边界农场主为敌的易洛魁人帮助了叛军的游击队，沿着阿巴拉契亚山和效忠派展开较量。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巨大，而且亲英派的易洛魁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居住地，在尼亚加拉堡（Fort Niagara）的炮火中成为难民。随后尼亚加拉堡成为残忍的效忠派的基地，而且莫霍克人也在殖民地的边缘发起进攻。①

豪将军离职了，但他的继任者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除了继续试图联合效忠派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最终重建了英国统治。豪的希望并不是完全没有实现，虽然在萨拉托加大捷和法国进行干涉以后，实现的可能不大。大量的效忠派已经在南方。1779 年，克林顿被美国军队围困在纽约市，无奈突围南下，攻占了萨凡那（Savannah），收复佐治亚，而后收复南卡罗来纳。在那里，效忠派人数众多且最为积极。暂时来看，英国成功将叛军打散在各州；在北方，则利用对方的厌战情绪逐渐瓦解了美国人的初衷。

108

机会又一次溜走。1776 年，在新泽西，英国人不得不再次分散队伍去保护支持王室者，而且因此正中叛乱游击队不断骚扰的计谋。效忠派则以眼还眼。最终的结果是，像大多数国内战争一样，血流成河，但是徒劳无功。英国人被迫退回海边城镇萨凡那港和查尔斯顿（Charlestown），其在南方的主力被法美联军困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被迫于 1781 年 10 月投降。

从此以后，查尔斯顿、萨凡那和纽约成为逃避叛乱者报复的主要难民聚集地。一些难民沿尚普兰湖顺流而下到达魁北克，那里的官员在索雷尔（Sorel）设立了一个营地。很多效忠派迁居英国，另一些人则逃往百慕大群岛（Bermuda）或是西印度群岛。

1781 年底，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国人凯旋的希望落空了。英国

---

① Alan Taylor, *The Divided Ground: Indians, Settlers, 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2006), chapter 3.

人把赌注下在其军力上，镇压叛乱；镇压按自然规律进行所发生的叛乱；镇压骚动和暴力，但骚乱和暴力却正在肆虐。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前往巴黎的外交官能够与美国、法国和西班牙达成怎样的和解。

和平、美国人与效忠派

英国试图镇压美国叛乱，但遭到惨败，美国人的抵抗大获全胜。这场战争也被命名为美国独立战争。然而英国人并未完全失败。在海上，美国人除了袭击船只和抢劫英国商船以外无所作为。有时英国舰队还可以在大西洋地区构成威协，足以使新斯科舍、纽芬兰和魁北克免受侵略。通向魁北克和五大湖区的荒野保障了其安全，而且游击战争并未威胁到居民生活的主要地区。

109

当英国、法国、西班牙，还有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坐下来商谈和平条款时，新斯科舍和魁北克已经成了效忠派的难民营，英国政府自然会眷顾到他们。战争并没有改变英国人对于殖民地价值的观念。虽然政府要如何或应该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假设受到了影响。因此英国没有太多想要放弃殖民地的想法。法国不想占有殖民地，美国不能占有殖民地，而且英国人知道在最可预见的情形下，他们要保卫殖民地，防范美国的侵略。法国人也知道这点。随着英国收拾带有敌意的美国民主政府，未来的北美很有可能大量地消耗英国的资源。

英国对美国独立的承认对和平条约的签定至关重要。其次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对他们不能把英国人完全赶出北美这一事实的接受。那里将会有两个说英语的国家存在，即美国和英属北美，后来成为了加拿大。条约规定边界是从芬迪湾到密西西比河的上游源头。为美国渔民提供了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海岸，允许渔民在无居民海湾停泊和进行装备。条款通过美国唯一的机构国会“提议”，各州都要向效忠派返还财产。在国会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这项条款的切实执行令人怀疑。效忠派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群人。

在巴黎，印第安人没有代表来洽谈他们的未来，其主权不被任何

一个与会者承认，其土地像其他土地一样被瓜分了。[①] 纽约州的易洛110魁人遭到骚扰，他们中的一些被驱逐。现在同样的命运等待着生活在美国俄亥俄河谷的印第安人。

谁是效忠派？他们来自每一个殖民地，但来自中部、纽约和费城的人数多于新英格兰。他们同时也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北部殖民地，作为王室官员，英国国教徒自然可能更支持英国。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及近期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也支持英王。一些分支教派，如教友派（Quakers）和门诺派（Amish）教徒对战斗和暴力尤为反对，而且也不能与革命者达成一致并给予支持。

很多效忠派拿起武器为乔治王而战。特别是在南方，黑奴逃往英占区以寻找自由。[②] 一些战役，尤其在南方，完全是美国人之间的战斗，叛乱者也不总是取得胜利。效忠派的小股部队造成了许多人丧生，这是其新的定居点鲜明的特色。

在很多，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效忠派并没有与共和党人有很大区别，甚至在政治上亦然。他们接受了英国政治实践的假设，相信代理政府，珍视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他们比叛乱者更乐观地看待英国的体制，当然他们相信救济和对财产的保护更可能是来自英王，而非叛乱的美国人抵御敌人所用的暴民统治。[③]

英国人同意从美国撤军，英军的统帅盖伊·卡尔顿爵士被派到纽约监督英国卫戍部队的解散和效忠派的撤离。（萨凡那和查尔斯顿的英国军队已经辙出。）卡尔顿拒绝向与其官职对等的统帅乔治·华盛

---

① 英国人通过攻占（从法国人手中）来执掌美洲，来自英国的美国人也是通过攻占来继承（从英国人手中），这样的理论在巴黎被接受，见 Michael D. Green，“The Expasion of European Colonization to the Mississippi Valley，*1780 – 1880*，” in Trigger and Washburn，*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465 –466 页。争论升级：国会主张，由于印第安人支持英国人，应没收其土地，而不只是主权。

② Simon Schama，*Rough Crossings*：*Britain*，*the Slaves*，*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oronto：Viking Canada，2006）.

③ “暴民”一词被约翰·亚当斯用于描述在 1770 年“波士顿惨案”中抵抗被控谋杀的英国士兵的暴乱者，引自 Hiller Zobel，*The Boston Massacre*（New York：Norton，1970），292 页。最终，士兵被无罪释放。

顿交还在逃的奴隶。这些奴隶相信英国人可以给他们自由的承诺。他们被送往新斯科舍，大多数来到西非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这片自由的土地。[①] 1783 年 11 月，英国的旗帜徐徐降下，最后一只船也返航了。

战争的后果

美国独立战争使得北美东部和北部各产生了一个司法权，而以前仅有一个。战争使很多美国人，大概 80 000 人被撵走，变成了内陆的难民。这些难民中的一半人来到了新斯科舍和魁北克，得到了英国政府发放的土地和金钱作为补偿。迁往几乎是无人区的效忠派人数意味着在这些地方——新斯科舍未开垦的土地和蒙特利尔上游的魁北克西部——难民变成了大多数。作为英国忠诚的臣民，他们的身份和忠诚的美国人同等重要，并以在大西洋西侧形成的态度和身份左右着他们将占据的殖民地的政治和发展。[②]

111

革命将每个美国人都分割开来，就像将英国和美国分开那样。战争的经历使很多人备受创伤。对于那些曾经为作战双方都效力的人，战争从没有真正结束，而且只要这一代人一息尚存，那么战争的结果就看上去很偶然，且不得长久。

美国自己也无法确定能否容忍一个新的共和政体，就算能够容忍，这种新共和政体将采用何种形式也不确定。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共和政府还是非常陌生的观念，当美国宪法在 1787 年被采用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很难适应联邦政府这种形式。在加拿大居住过的前美国人对于美国这种万事开头难的窘境泰然处之。当然，他们希望这种窘境不要或不会长久下去。

穿越新立边界的通讯没有停止。边界绵延 1 500 公里，大多数都是水域，无法目测，遑论管辖了。不想承认边界的印第安人和寻找土

---

① Schama, *Rough Crossings*, 144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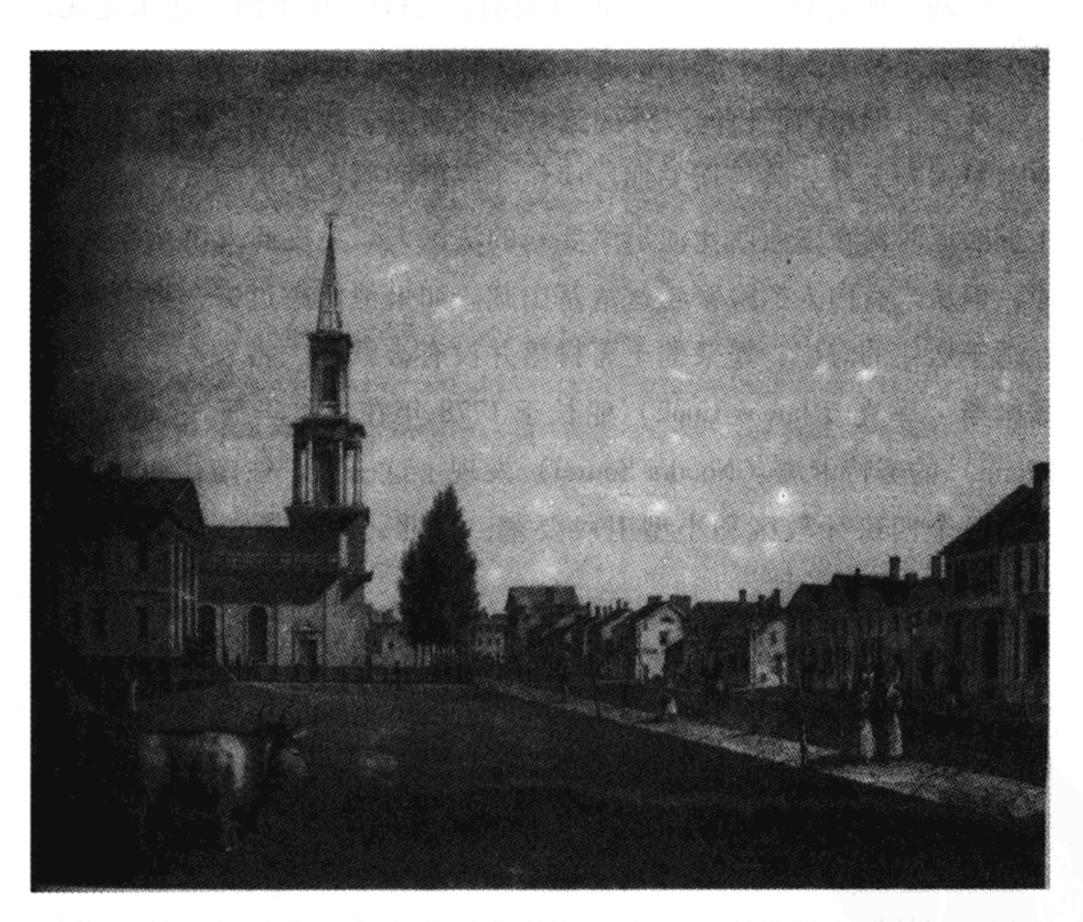
② 关于这点见 Jane Errington, *The Lion, the Eagle, and Upper Canada*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 5, 28 – 30 页。

地和安定的定居者，对于边界还是相对漠视的。在南方，美国人继续研读英国的出版物；购买英国的产品；与苏格兰商人交易。英国的产112 品并没有停止运往美国，英国移民也没有停止前往美国。围绕着大西洋，说英语的世界并没有被分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敌意也没有结束。英国的激进分子欣赏美国的创新精神，而美国的保守派和效忠派继续与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共鸣。[①]

遗留下来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英美关系（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再会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如果英国政府和当权者中的上流社会统治者急切想要采取报复行动，并因为痛失大片美洲土地而感到耻辱，那么新斯科舍和魁北克及加拿大未来的核心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但是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曾认真考虑要重新占领美洲。遗留下来的殖民地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① “我认为我们都是亲英派，”1961 年历史学家和国会图书管理员丹尼尔·布尔斯廷评价说，“我们怎样能不成为亲英派呢？除非我们痛恨自己。”布尔斯廷在 *Blood，Class and Empire：The Enduring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hip*（New York：Nation Books，2004），14 页中有引用。

第六章　争夺美洲的战争（3）



19 世纪 30 年代，殖民地的一处城镇景观：上加拿大多伦多的国王街。

115

独立战争改变了北美东部的政治形态。然而直到1783年，美洲大陆的外貌与之前几乎并无二致。阿巴拉契亚大部分未被破坏的森林与山脉将大西洋海岸与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分开。美洲最常见、当然数量也最多的动物是海狸和野牛，前者生活在加拿大地盾，而后者则生活在大草原。对人而言，北美北部（英属）的土著居民人数超过了当地的欧洲人及其后裔。

西北的土地仍不为人所知，在地图上一片空白。在理论上，谁拥有美洲大陆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五大湖、圣劳伦斯河与分水岭高地成为英国与美国主权之间的分界线——但没有人100%确定高地在何处，并且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继续占领五大湖南部的要塞。他们对美国领土的占领表明，《1783年条约》还未完成，至少是不完整的。和平或许只是下次战争到来前的几年时间。

往西，即密西西比河以外的路易斯安那属于西班牙，但西班牙没有力量占领大部分路易斯安那。居住在那里的白人是法国人，是路易十五撤退时留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要塞的法国人。毛皮商人游荡于大草原，但从未有白人探险家越过落基山脉。如果他们越过去，将会发现 116 在适于居住的海岸，繁荣的土著村落并没有被欧洲人占领——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于1778年在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的努特卡湾（Nootka Sourel）发现了这一点。往南，加利福尼亚有几个西班牙教区和小型卫戍要塞；往北，阿拉斯加有几个俄国（Russian）贸易营地。

1783年之后的30年里，以上的大部分格局发生了变化。探险家填补了地图上的空白，来自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沿西部大河到达北极（1789年），之后到达太平洋（1793年）。西班牙人从加利福尼亚沿岸北上，到达努特卡湾，之后面对来自英国人的压力，西班牙人撤退。18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使其领土扩大至原来的两倍，路易斯安那是法国人不久前从西班牙人手中要回的。这一事件扭转了美洲大陆的政治局势，但人口格局的变化更大。1790—181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一倍；整个国家人口达7 200 000人，几乎有

300 000人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对面、五大湖南部的新领土。在整个美国大陆上，居民向西部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沿圣劳伦斯河北上，一直到达五大湖最西端。

生活在多岩石、沼泽、冰川的北美地区的英国人数量要少得多，并且具体数字的可靠性较低。可以说出的最可靠数字是，1784 年大致有 166 000 名白人居住在新斯科舍与魁北克省，1806 年为392 000人。[①]

穿行意味着划驳船沿通航的河流航行，遇到众多湍流或分割大西洋与内陆的高地便取道陆路。一些新来者受到政治上的鼓舞，最好的例证是忠诚的美国人——效忠派——移民到新边境北部的英国领地。然而，之后来自南部和东部的不忠诚的美国人到达英国领地范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止他们——反而有很多诱惑因素，因为那里的居民稀少，土地辽阔。定居的逻辑决定发展，发展则需要人口。然而虽然不缺人口，但他们却来自美国。

定居者到达之时便是定居点遭殃之时。农场虽提供生活必需品、但必须被清除，树木以每年几公顷的速度被砍伐，树桩也被拖走、烧毁。一个农场或一些农场虽然能够产出作物，但在当地市场出售之前需要花费时间、金钱，还需要运气，多亏道路状况好，否则就算用不了几周，也得几天才能将作物运至市场。最好的交通运输方式是水运，但在英属北美（不久将被称为加拿大），受解冻期、冰冻期，当然还有陆地降雪的限制，交通运输具有季节性。湖上有小型帆船，河流上有独木舟和驳船，但这些船只装载的物资是有限的。

117

对英属北美的居民而言，欧洲在空间和时间上似乎遥不可及。消息最快也得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大西洋沿岸，到达内陆所花费的时间更长。然而假使消息、货物、理念与新鲜事物真地抵达，它们将因为来自遥远的欧洲而更加具有价值。殖民者的身份、自我形象与欧洲及宗主国英国有密切关系。英属北美只是反映了大不列颠对北美的入

---

① www. statcan. ca/english/freepub/98 - 187 - XIE/pop. html，Statistics Canada 估算的加拿大人口数量，从 1605 年至今。

侵，除此之外别无意义，但在大不列颠所做的决定深深影响着大洋彼岸的殖民地社会。

不只殖民地如此，殖民地之外的美洲土著人部落也是如此。直到18世纪80年代，大部分北美印第安人与欧洲和欧洲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靠近定居地的印第安人受欧洲商品影响深远，甚至在许多方面依赖于欧洲商品——最明显的是布匹和金属。[1] 大草原的印第安人捕获离群的马匹，这些马匹被西班牙人带回墨西哥。直到18世纪，大草原上的狩猎和战争都是骑在马背上持枪进行的。

商人寻找着毛皮，尤其是海狸皮，越往西部和北部走，毛皮质量越好。北部的海狸皮更厚，在伦敦市场受到青睐且有利可图，而最好的海狸位于大草原西北端的阿萨巴斯卡地区以及流出密西西比河与哈得逊湾，向北去的河湖中。来自蒙特利尔的商人已经于18世纪80年代初到达那里。和平条约中的任何条款都阻止不了他们走得更远。

帝国政治

118

魁北克在1783年后仍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领地，而且如果按人口论，是定居点中最大的殖民地。魁北克既不是最富裕，也不是经济上最重要的英国属地，但由于它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对当时的政治至关重要。

维护北美殖民地的代价不匪。为平息美国人的情绪，议会在1778年通过一项《声明法案》，声明放弃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这次尝试其实为时已晚。此法案仍记录在册，并支配着英国与殖民地未来的一切关系。事实上，征税意味着在殖民地征得的税收必须用于殖民地。但具体操作中有另一原则：魁北克的居民不同意征税，而征税必须经过批准，否则不能征收。居民同意征税涉及组建议会，且议会成员必须经过选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但做什么，无人知晓。

---

[1] Taylor, *Divided Ground*, 17－18. 书中指出了18世纪末易洛魁人的物质需求是如何大大超过17世纪他们祖先的物质需求的。

独立战争没有改变英国人的帝国观念，他们将帝国视为一个封闭的政治空间，如果宗主国政府不再直接征税，帝国将得以控制。宗主国为殖民地生产商品，殖民地以此换取他们所需的物质。新斯科舍或纽芬兰的鱼供给西印度群岛的英属奴隶殖民地，而魁北克的小麦或新不伦瑞克的木材满足了英国人的需求。殖民地被认为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也是政府的商业活动造成的。

效忠派于是形成了一个更大政治实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对独立战争的结果很失望，将其归咎于他们之前的近邻，即叛乱者，还有英国将军的无能，两个原因各占一半。他们忠诚但又多疑，并不是自动被英国政府的每一种行为所吸引；相反，他们希望政府亡羊补牢。

大约40 000名效忠派到达加拿大沿岸。许多人在独立战争中为保卫国王而战，战争结束后，他们发现自己和部队都在加拿大，并且自己几乎身无分文，这些财产被回到美国的叛乱分子所没收。短期内他们不得不接受施舍；最终，他们为曾经放弃的得到了补偿。

119

普通效忠派得到了政府给予的200英亩土地（合80公顷多一点）。军官按照军衔，最多得到5 000英亩（合2 000公顷）。由于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才能使这些土地适于居住并赢利，政府于是提供了工具、住所和食物。有一位效忠派这样描述，城镇在“荒僻的旷野”拔地而起。在1783年一年的时间里，1 500座房屋在圣约翰（Saint John）和新不伦瑞克的新城镇建立起来。更多的房屋在芬迪湾对面的谢尔本（Shelburne）建立起来。

圣约翰位置优越，背靠良港和肥沃的河谷。谢尔本则不然，最终，那里的效忠派逐渐离开，其中一些人去往新斯科舍，另一些人则回到美国，还有一些去往遥远的上加拿大。

严格来讲，1783年时新不伦瑞克与上加拿大都不存在。它们是政府于1784年、1791年分别设立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效忠派的需求。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权力机构，辅以熟悉协调的制度体系。忠诚似乎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些人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恰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区别于他们的美国同胞，甚至可以说在以后的时间里，政

治将界定他们的本质。而在其他方面如选举议员上，双方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

18 世纪末，英国的政治如同北美一样，几乎不能与党派纷争区别开来，政党极其不确定。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利益，或在美国这个新国家，以总统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均凌驾于政治之上。魁北克与新斯科舍的英国总督在这一点上与乔治·华盛顿别无二致。问题一如既往，即发现国家利益并在这一点上取得众多政治家的赞同。

在边界的另一边，根据刚实行的美国新宪法，乔治·华盛顿将军成为总统。在加拿大，将军盖伊·卡尔顿爵士于 1786 年再次成为魁北克总督，代替另一位将军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Frederick Haldimand）。卡尔顿的弟弟托马斯·卡尔顿（Thomas Carleton）上校已经在掌管新不伦瑞克了。

政府、土地与印第安问题

18 世纪 80 年代的政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包括中央行政机构、总督、议员和职员；有法院，并且除了魁北克，其他法院都使用英国刑法和普通法；有军队，包括陆军、海军以及民兵，民兵由 16 至 60 岁之间的每一个壮丁服役而来；有征税官，负责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赋。此外，设有一个邮局和一个印第安部门。

法院不是一个独立部门，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法官通常也是议员，并且与总督及其政策联系紧密。总督的薪酬很高，掌控公职并分配土地（公职人员参与运作政务委员会）。土地是大不列颠的财富基础，在殖民地亦然。不列颠群岛的贵族和上层绅士继承、积累并开发了大量地产。他们常常驱逐土地上的居民，之后，这些居民被迫移民到遥远的殖民地。

政府的朋友被奖赏数千公顷土地的屡见不鲜。比如，一位英裔爱尔兰绅士，上加拿大副总督的大臣托马斯·塔尔博特（Thomas Talbot）上校得到政府给予的 5 000 英亩土地（合 2 000 公顷多一点儿）。塔尔博特不久离开行省去带兵作战，但在 1803 年与法国战争中的短暂休战

期返回上加拿大，并与政府达成一笔交易。此后，他成为一名地产商兼投机者。塔尔博特令移民在 50 或 100 英亩（合 40 公顷）的土地上定居，并且从每个人那里得到 150 英亩的土地。伊利湖北岸的大片土地留出来供他经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交易，然而却发挥了作用。塔尔博特的定居者最终将底特律河至长角的 27 个镇腾出。

121

这位上校统治着他的地产（他称之为“封邑”），方式古怪但并非不公平。他本人对定居者进行监督——这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塔尔博特坚持令定居者立即清理 10 英亩（合 4 公顷）土地进行耕种，并清理土地前方的道路。只有那样，定居者才有占有土地权的保障，如果他们不遵守规定将被立刻逐出。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塔尔博特确保了道路的建成，这条路从安大略湖源头到底特律边界，几乎长达 500 公里。[①] 当政府需要塔尔博特的帮助时——1812 年战争或 1837 年上加拿大叛乱期间——他提供帮助。尽管塔尔博特具有中产阶级血统、军衔和关系，但他就像周围的定居者一样生活。他在原木屋一侧的窗口开展工作，分发土地，施予恩惠，报复那些令他不悦之人。与其他投机者不同，塔尔博特将他所有的钱用于开发土地，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于 1853 年去世——与他到达上加拿大时相比，并没有变得更为富有。他将其土地给予每一位到来者——不同宗教的人、对以何种最佳方法使社会有序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塔尔博特不是加拿大森林的封建贵族，也没有建立一个位于边远蛮荒林区的王朝。他的习惯是未受宗教改革影响的英国官员所具有的——对宗教事务漠不关心、嗜酒、言谈下流，令他身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作家感到骇然。[②] 他去世时，未婚、无后，将财产留给了佣人。

真正不同于前几代经历的是，现在缺少了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

---

① Gerald Craig, *Upper Canada: The Formative Years, 1784 - 1841*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3), 142 - 143.

② Edward Ermatinger, *Life of Colonel Talbot and the Talbot Settlement*. 由 J. J. Talman 作序再版（Belleville: Mika Silk Screening, 1972），原版书出版于 1895 年，见 111 - 115 页。这位上校用餐时的双关语令当地英国国教牧师如此震惊以致于他再也没有来访。

从本质上讲，独立战争前的统治方式仍应用在英国土地上——被英国人与印第安部落的旧时协定支配［与米克马克人在1752年签订的《哈利法克斯条约》（*Treaty of Halifax*）是一个例子］，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763年宣言》。宣言规定的原则包括管理内陆白色人种定居点以及以购买方式和平取得印第安人的土地。

122 印第安部落占据的领地仍被视为属于英国人，这些印第安人不想拿起武器反抗新的定居者。部分原因是，一些印第安部落几乎完全依靠英国人——魁北克西部的六部落联盟避难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印第安人数量太少从而不能进行激烈的反抗，并且印第安人与来自蒙特利尔的英国商人在毛皮贸易上有联系。最后，大部分印第安人认为美国人带来的威胁要比英国人更多。当反抗美国人时，他们还希望英国人能够给予他们帮助，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此期间，魁北克的英国长官与当地印第安人——五大湖北部的奥吉布瓦人（Ojibwa）谈判，目的是为效忠派和易洛魁人购买土地，即位于昆特湾沿岸的土地和效忠派中的白种人附近、格兰德河沿岸的“哈尔迪曼德土地”。奥吉布瓦人几乎不能反抗，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据估计，仅有200人居住在安大略湖北部的领地。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发现英国人提供的交易商品能满足其需要；但不知道割让土地给国王的奥吉布瓦人是否完全明白，土地一旦割让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他们认为，自己割让土地的使用权是为不确定的未来换取安全和支撑。这种困惑后来引起持续两个世纪的政治辩论和法律论证，然而目前这种做法使数千得到国王担保的移民可以自由、和平定居。

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领导下的格兰德河易洛魁人的历史凄凄惨惨。布兰特希望他的部落成员有相同的命运，即出租土地获得收入，用收入改良土地并定期取得现金收入。但他的这一构想被挫败，正如依然留在美国领土上的易洛魁人一样。

如果此事由效忠派或当地英国长官负责，那么新边界南部的印第安人或许就很幸运了。然而决定权在于伦敦，英国政府最关注的事务是整顿国家财政，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这一政策主宰着与美国的和平，

也限制着军备。令大不列颠感到幸运的是，战争使法国及其欧洲盟国的财政状况更加糟糕。就这样，18 世纪 80 年代在没有严重外交纠葛的情况下过去了。 123

如果没有税收来源，政府几乎是不完整的，这就是独立战争后殖民地体系的弱点。问题始于最好的意图。英国政府尝试从美国独立战争中汲取经验。首先，它认识到不能再寄希望于向殖民地征税以达到帝国的目的。[①] 留在美洲的不列颠卫戍部队须由本国的纳税人维持，殖民者将不会被要求偿还英国的债务，即使是保卫殖民地带来的债务。殖民地可以征收地方税满足自身需要，但这些税收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帝国梦想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其次，任何一种税收以被统治者，即仍呆在殖民地的英国臣民的同意为前提。

但如何征得他们的同意呢？

土地与忠诚

《1783 年和约》维持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1789 年，法国发生大革命，3 年后，革命推翻了法国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其领导人实施恐怖统治。欧洲的君主们联合起来对抗革命分子并入侵法国。作为回应，法国人处死了被废黜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英国人于是在 1793 年 1 月不情愿地加入战争。

革命分子本来可以依靠他们在美国的革命伙伴，利用共和政体的团结一致，实现美国人与法国人结盟，因为法国人曾经帮助美国人取得了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的胜利。当前，英国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人难道能袖手旁观？如果美国人加入战争，加拿大的法国人必定参与到法国大革命中。当英国在欧洲忙得不可开交时，更大、更强的美国可以迅速摧毁加拿大的英国军队。不列颠帝国在美洲的前途似乎很黯淡。 124

---

① 这种对原则的遵守或面对政治现实的注册需花费钱财。18 世纪 80 年代末，本国的政府每年支付 150 000 英镑补贴魁北克。见 John Ehrman, *The Younger Pitt: The Years of Acclaim*（London: Constable, 1969, paperback ed., 1984）, 364。

然而，18世纪90年代与19世纪发生的事情没有按照逻辑推断的情节发生。1793年，美国人没有加入战争。相反，与法国人的联盟正在悄悄结束，甚至可以说，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在10年间恶化了。尽管法国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其间1802—1803年稍有间歇，尽管美国最终于1812年加入战争，然而美国人并没有成功征服加拿大。最终，加拿大的法国人也没有加入到本土的法国人中去推翻英国的统治。尽管有来自英国的诅咒，但加拿大的法国人——法裔加拿大人培育他们的园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乐于保护自己的法律，确保其当选议事会、天主教信仰以及下加拿大（Lower Canada）省自治权的安全，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他们是下加拿大的主体。

下加拿大的创立是复杂的边界重新界定达到高潮的产物，反映了18世纪80年代经济与人口的发展。问题是英国人住在一个讲法语、保留天主教的行省，那里没有代表他们的当选议事会。于是，矛盾不断升级。许多新定居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被解散的英国高地兵团的士兵，都是天主教徒。半个世纪以前，他们在苏格兰反抗英国的（事实上是德国的）新教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直到18世纪80年代，他们成为英国军队的支柱之一，效忠于乔治二世的继承者乔治三世。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许多人定居到圣劳伦斯河北部一个叫做格伦加里的地方，该地以他们苏格兰家乡的名字命名。①

到18世纪80年代末，带状定居地沿芬迪湾的东侧边缘延伸，沿圣约翰河向北，再沿蒙特利尔西部的圣劳伦斯河一直到金斯敦，即之前的弗龙特纳克堡，位于安大略湖的最东端。（King's Town不久被缩写为Kingston。）在更远的西部，小块儿定居地沿安大略湖和伊利湖北岸、昆特湾［Bay of Quinte，（一群易洛魁人在这里被给予土地）］、格

---

① 一段时间之后，接着是一支高地分队，即Glengarry Fencibles，它是英国军队中的第一支天主教军团，由一位天主教牧师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ell）在1794年招募组建，只在战争开始时反抗革命的法国；麦克唐纳作为此军团的牧师。当战争在1802年暂停时，该军团解散，士兵失业，也激发麦克唐纳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使他们定居在上加拿大。休假和土地得到批准，每位士兵得到200英亩土地（合81公顷）。

兰德河［Grand River，（又一片属于易洛魁人的土地）］与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分布。[1]　125

定居者的存在使得英国人的直接控制扩张至底特律河。然而，英国势力的最大规模扩张发生在五大湖之外更遥远的西部。在那里，来自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与来自哈得逊湾沿岸的哈得逊湾公司营地的商人竞争。蒙特利尔的商人具有一个商业优势：他们将商品直接带给顾客，而哈得逊湾的商人犹豫不决；如果哈得逊湾公司进入内陆，则需几年时间才能超过蒙特利尔的商人。

并非所有土著-白人的联系都是市场力量的良好运作。商人有时对不讲信义的客户使用暴力或依赖——用对酒或烟上瘾这一方式吸引顾客。此外，总是有债务将不幸的土著消费者束缚在掠夺性的贸易制度中。

1789 年，一位蒙特利尔毛皮商人亚历山大·马更些（Alexander Mackenzie）从阿萨巴斯卡湖（Lake Athabasca）的奇普怀恩堡（Fort Chipewyan）（一年前建立）顺流而下，经过 2 000 多公里到达北冰洋；他经过的大河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马更些河。马更些失望了：他原本希望能够到达太平洋，而不是北冰洋。1793 年，他再次出行，越过落基山脉，最终到达太平洋的贝拉库拉河（Bella Coola River）口，成为穿越大陆到达太平洋的首位白人。

马更些代表蒙特利尔利益的一个新的联合，即西北公司（North-West Company），由西蒙·麦克塔维什（Simon McTavish）和弗罗比舍兄弟（Frobisher brothers）控制，还包括许多英国出生的商人和美国商人。他们继承了法国人同时也是印第安人先于法国人使用的一种传统技术，即桦树皮独木舟，但将其扩大成大船，可承载 6 至 12 名船员和重达 1 360 公斤的货物。这些商人从蒙特利尔向渥太华河上游行进，经过五大湖到达大波蒂奇（Brand Portage）。大波蒂奇联结圣劳伦斯河水系和西部河流，为从苏必利尔湖延伸至落基山脉的一系列营地提供

---

① Taylor, *Divided Ground*, 119 - 136.

126 了补给。他们做出了巨大努力，利润也非常令人满意。蒙特利尔的合伙人购买领地，与贵族的女继承人结婚，在“海狸俱乐部”进行社交并建立宅邸——弗罗比舍兄弟之一建立了“海狸府邸”，以展示他们的财富。

马更些的发现增添了这种满足感；因为阿萨巴斯卡（Athabasca）地区——北纬55°以北，西经110°到120°之间——是最好、最厚、最昂贵的毛皮产区。[①] 毛皮通过大船运送到蒙特利尔，用来交换由那里的商人运送的布匹、火器和烈酒。直到18世纪80年代，这些商人几乎全部讲英语，因为正是他们有关系、资本，可以接触伦敦毛皮市场——实质上这是重商主义制度下的唯一市场。[②]

与伦敦的贸易和金融密切相关的蒙特利尔商业精英的出现，为魁北克太大、太重要以致于不能被剥夺建立代表其政治利益的机构这一争论增添了分量，此争论在《1774年魁北克法案》中被回避。代表蒙特利尔利益的伦敦委员会的建立，旨在敦促英国政府对魁北克政府进行改革。效忠派大量涌入遥远的西部的半个行省，强化了发生改变的环境需要新的措施这一论据。英国政府不得不鼓起勇气，使魁北克成为一个像其他地方一样的殖民地。

英属北美的立法

北美的旧殖民地，即在1783年丢失的殖民地已经完全成为独立的实体，拥有各自的总督和众多政府制度。魁北克与新斯科舍早期的英国总督与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或佐治亚的总督具有同等地位，别无二致。这种情形在1783年后发生变化：布雷顿角岛、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与新不伦瑞克都设置了副总督，这是在单一政

---

① J. M. Bumsted, *Fur Trade Wars* (Winnipeg: Great Plains Publications, 1999), 39.

② 向英国人（与法裔加拿大人相对）支配地位的过渡并不是立即实现的，但到18世纪80年代已明确完成。见 Kenneth Norrie and Douglas Owram,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1st ed. (Toront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134-135页。

府体制下巩固英属北美的第一步。[1]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魁北克城的总督得到了头衔，但并未得到权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每一个“总督”相当于一个无用的名号，只授予正式荣誉。[2] 在下加拿大之外的任何一个殖民地，由副总督处理事务，与伦敦沟通并尽最大力量管理殖民者。[3]

127

盖伊·卡尔顿爵士于1786年得到这一头衔——不是他想要的——但他得到另一个人多尔切斯特男爵（Baron Dorchester），这便加快了他通往魁北克的时间。这种任命象征着恩惠，也暗示政府——以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为首的托利党政府将听从多尔切斯特对管理和维持剩余殖民地事务的意见。政府也确信，作为《1774年魁北克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多尔切斯特不会急于将其改为另一种体制。[4] 政府的希望合乎情理：多尔切斯特见风使舵，优柔寡断，对于该做什么没能给出结论性意见。这理所当然地只是激发了对于变化的需求，这一需求传到伦敦议会在野党的耳中。

1791年春，一项加拿大法案在议会上被提出、辩论并通过。毫无疑问，这项法案在皮特的权力控制之内，这位首相在辩论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但法案的主要支持者是内阁国务大臣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之后称为格伦维尔勋爵）。有趣的是，1791年辩论在英国政治中，比之后任何一次议会考虑加拿大事务持续的时间更长、更重要——按照不列颠主要政治家的观点，这意味着不仅政府，甚至对加拿大的占有都处在紧要关头。

首先，根据《加拿大法案》提案，加拿大将受英国宪法支持，将成为英国政治原则的指向标。潜在的观众是美国，但1791年春，法国

---

① 圣约翰岛小型殖民地事实上已经有一位副总督，作为其狭小面积和从属地位的标志。

② 单一总督的观念得到魁北克前任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的强力支持。他成功完成了和约签署之后将英国军队从新建立的美国撤出这一令人厌烦的任务。卡尔顿被肯定的成就和专长使他在18世纪80年代末的伦敦成为当时关于加拿大事务的专家。

③ 在下加拿大也有一位副总督，只有总督不在时掌权，除此之外没有权力。

④ Ehrman, *Pitt*, 363.

发生大革命，暴力气息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对于《加拿大法案》的立场认为其与自己的关联更为紧密。

《加拿大法案》中规定的比在之后的实施中更接近英国模式——128 上议院、下议院和国王。议员花费大量时间就什么是本质上的加拿大上议院——一个指定的立法政务委员会进行辩论。法案甚至对世袭的议员作出规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政务委员会成员都是终身任命。将设立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事会，每 4 年选举一次（皮特提议 7 年，像英国议会一样）。也将设立一个与英国内阁类似的执行政务委员会，为加拿大的总督或副总督提供建议。但相似之处也仅有这些了。加拿大执行政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由总督决定，而不是世袭制、终身制或通过选举。因此，他们完全依赖于总督，是总督的顾问——很像美国内阁成员，由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组阁。在 18 世纪 90 年代，无人能预知美国的政府体系在实质上如何运行，但美国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原则已然明了。在加拿大殖民地，皮特与格伦维尔的权力未加制衡，因为除了抽象爱国主义的激励和公共事业概念，几乎没有其他激励因素使产生收入的部门议事会与消耗收入的机器——总督和执行政务委员会共事。

《1774 年魁北克法案》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存在比没有任何教会好，据此通过征收什一税，强制不情愿信教者信服这一法律力量，支持天主教会。《1791 年法案》几乎不能否定不久前对教会的许可，但它详细地对英国政府的真实目的作出表述，即在殖民地建立新教徒教会——英国国教会。《加拿大法案》赋予英国国教徒事实上在殖民地唯一可转让的资产：土地——每个镇区土地价值的 1/7。这部分土地可以自己保留，也可售出，但收入归当地英国国教会的牧师，不依赖于当地议事会希望做的任何事情。只要英国政府能够对其进行控制，英国国教会就独立于当地的政治和政客之外。

129 在魁北克，这也意味着英国国教会独立于多数人信仰的天主教——1790 年，90% 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一个行省将被一分为二，且都称为加拿大。（这一名称对大部分英属北美人来说已是一个常用词；

《加拿大法案》只不过使之成为正式的称谓。）行省西部将是上加拿大，人口稀少，不发达，但几乎全部讲英语且当前绝大多数是效忠派。圣劳伦斯河下游的东部行省将是下加拿大，大部分人讲法语，经济发展比西部好很多。然而从经济上讲，下加拿大的语言是英语，而非法语，因此，蒙特利尔的毛皮大亨反对划分魁北克也不足为奇。魁北克的划分使他们立足于法语这片海洋中的一个英语小岛。

在一些方面，《加拿大法案》是旧不列颠帝国的回光返照，它被定居点的殖民活动支配，定居点则尽可能地复制母国的特征和机构。这样的殖民地以前是，并且被期待仍然依赖、遵循重商主义这种限制性的贸易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大不列颠规定了殖民地政府、社会以及为宗主国利益做交易的模式，也为当地的多样性留有余地，但不允许本质上的偏离。重商主义对原始英国模式的忠诚表现在它的力量和鼓舞精神上，而这正是效忠派所为之奋斗的。

战争与殖民地的安宁

1791 年的辩论是 30 多年来的最后一次辩论，在这 30 多年里，加拿大受到大不列颠的关注。新危机令英国政府分心——例如与西班牙在西北太平洋的紧张关系。在那里，两帝国宣布占有的领地在温哥华岛的努特卡湾有重叠。（此危机曾得到解决，现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被移交给英国，西班牙人则被限制在加利福尼亚。）

130

与英国政府觉察到的来自法国的危险相比，与西班牙的争执更显逊色。法国君主制于 1792 年瓦解，被革命的共和制政府代替。欧洲大陆各种力量企图取代王位上的法国国王，结果却是革命者于 1793 年 1 月将前国王送上断头台。大不列颠现在对法国开战，这场战争将持续一代人的时间，直到 1815 年。

1793—1815 年的战争不只是普通的王朝战争。法国经历了一次社会和政治革命，此次革命似乎威胁到政府、制度与社会的根基。即使在大不列颠，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似乎也处于危险之中。17 世纪发生在英国的革命造成君主、上议院未经选举的贵族王公与选举出的下

议院之间的妥协——这是18世纪的制衡体系，由皮特这样的政治家从中斡旋。他们通过得到议会多数席位，同时密切关注王室赞成或反对的迹象来管理政府。关注而不是接受君主乔治三世的态度这一内容，是英国政治体系与政治党派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国大革命令大不列颠的统治者惊恐万分。革命情绪被认为是可以传染的，皮特政府对他们怀疑的革命者保持警惕并进行压制。1791年，《加拿大法案》——对自由的表示，因为急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巩固本土与殖民地的权力而被遗忘。1792年，新的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立法机构第一次开会，这一年也是发生暴力革命的一年，是巴黎的王宫风暴及法国血腥恐怖统治的开始。因为殖民者举行宴会，并为英国的自由举杯祝酒以庆祝他们的新立法机构的运行，其中“希望自由延伸至哈得逊湾”的举杯开始让英国大臣们将“自由”的理念看做是从法国输入的危险物。①

欧洲事件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来讲，虽然遥远但并不陌生。131 即使经过几周或通常几个月才能到达殖民地的——常经过纽约——关于欧洲事件的消息，并不会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够令人兴奋或感动。殖民地政府的一些人突然意识到法国发生的事件可能在讲法语的魁北克发生。那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惊恐地注视着南部共和制的美国，并设想民主从共和制的北部蔓延至英属殖民地。那种情况下，与其说危险在下加拿大，不如说是在上加拿大——讲英语的英国人，还有效忠派，即美国人。

战争的进展并不顺利。革命的法国将敌人击退，之后占领了欧洲大部分与法国相邻的地区——莱茵兰（Rhineland）、比利时与荷兰，还有意大利大部。英国皇家海军在法国海岸与地中海游弋，保卫着不列颠群岛与海外贸易，但它无法阻止陆上获胜的法国人。与此同时，法国从一个独裁国家变为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

① 关于庆典和祝酒，见 Mason Wade, *The French Canadians, 1760 - 1945*（Toronto: Macmillan, 1955), 94。在一次盛宴上，爱德华太子贡献出他的私人乐队。他是乔治三世的儿子，之后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父王，后又成为驻魁北克的军官。

卓越领导之下的帝国。波拿巴痛苦地意识到他不能在海上打败英国人，于是拿起经济武器，禁止与英国人的贸易。英国人从欧洲获得的众多供给、食物、尤其是海军建造船只的木材的来源（更近、更廉价）被切断，于是转而依赖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生产英国最需要之物——粮食与木材。英国人调整了关税和补贴，以便于抑制不可靠的欧洲进口货物和鼓励殖民地的商品生产，效果令人满意。英国人以补贴换取安全保障并得到了有保证的供货；殖民地获得了一个可预测的新的赢利市场。联结殖民地贸易与英国的重商主义制度当前处于后期兴旺阶段，因此殖民地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

殖民地也向帝国出口商品。他们向西印度群岛输入食物，如小麦和鱼类，而之前是美国人与之交易。美国人反对殖民地的这一做法，并且最终取得成功，但在40多年里，此事成为英国与美国之间争论的源头，但也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获得额外利润的来源。

132 受战争带来的变化影响最大的两个殖民地是下加拿大与新不伦瑞克。那里森林茂密，尤其是五针松，高大挺拔，适宜做成桅杆。两块殖民地都有宽阔的河流深入到港口腹地。木材贸易技术简单：伐木工使用宽刃斧砍倒树木，然后将其“削成”长方形状。之后，扎成木栅或木排的方形木材被滚进附近的河流，漂流到最近的海港，一般是圣约翰或魁北克，再被装上运送木材的船只——方形形状更易堆积，并且遇到大西洋风暴不会滚动——运到大不列颠。在没有大河只有森林的地方，如新斯科舍，木材工业衰落下去。一旦水运便利的森林被采伐，这一交易才得以持续。

木材贸易带来了移民并重塑了定居地模式。1800年，菲利蒙·赖特（Philemon Wright）带领马萨诸塞定居者中的一伙人沿渥太华河北上；到1806年，他将木筏一直送到下游直至圣劳伦斯河，到达魁北克。赖特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但木材商人有时是英国公司的雇员——例如威廉·普赖斯（William Price）。他于1809年到达魁北克。普赖斯的公司，即普赖斯兄弟（Price Brothers）公司掌控着魁北克地区的木材生意，直到20世纪。

木材出口数量可观：19 世纪初期为 9 000 载荷，到 1807 年是 27 000载荷，到 1809 年达到 90 000 载荷。在下加拿大，农产品与木材代替毛皮成为殖民地“主要的”出口产品，而毛皮仍然左右着蒙特利尔商人的命运，但行省只有一小部分人受雇于毛皮贸易，并且这一人数正逐渐减少。

繁荣吸引了移民并促使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新不伦瑞克的人口从 1806 年估计的 35 000 人升至 1824 年的 74 000 人。下加拿大人口数目的增长实在不同寻常：从 1790 年的 165 000 人到 1815 年的 300 000 人——是 1760 年人口的 4 倍多。在新不伦瑞克，定居地沿河流扩展；133 而在下加拿大，人口则向北部和南部延伸，越过圣劳伦斯河到达加拿大地盾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界限。讲英语的人数也增加了，到 1815 年粗略估计达到行省人口的 15%，这得益于从佛蒙特（Vermont）到蒙特利尔南部和东部，即后来的东部城镇（Eastern Townships）的移民。下加拿大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但不如乡村的增速快。

上加拿大

上加拿大立法机构的第一次会议在纽瓦克举行，之后于 1792 年 9 月在滨湖尼亚加拉（Niagara - on - the - lake）举行，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John Graves Simcoe）上校出席并担任新的副总督。西姆科曾在独立战争中指挥一支效忠派兵团；他本人及其士兵的经历使他极其反对美国人，或在西姆科看来，他就是一名反革命分子。西姆科依赖效忠派中的老兵作为他的小型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依赖英国军队为他的小殖民地——人口 20 000——建造必要的基础设施。西姆科发现其首府纽瓦克离美国边界太近，于是将它移至安大略湖对面一个被岛屿环绕、宽阔的港口沿岸。他将此地命名为约克（York）并设计了道路，并以英国大臣们的名字命名了从安大略湖向北［永日大街（Yonge Street）］、向西［登打士街（Dundas Street）］的道路。他将另一处定居地称为西伦敦（West London），沿用了泰晤士河畔的英国伦敦的名字。泰晤士河是一条污浊的河流，蜿蜒向西流入圣克莱尔湖。

（首府实际上于 1796 年移至约克，1797 年，立法机构首次在那里开会。）

西姆科将土地调查和定居地模式条理化，建立了棋盘状的农场模式，位于乡村道路旁，点缀着《加拿大法案》授予的教会保留地。英国政府已经授予高级效忠派官员大片土地，此举确实将其与低阶官员加以区分，但这并没有如计划中运行的那样好。因为没有必要的资金清理土地使其变为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场，被授予土地者的土地通常还是原样——一片私有林地，一片等待它的近邻努力去开发周围的土地。134拥有土地的上层绅士成为投机者，他们是行省发展的障碍。领导者往往为其收拾残局。

西姆科的改革包括提供交通运输、防卫设备、定期交流和有序的定居点，这些改革对维持和吸引人口来讲不可或缺。在这一点上，西姆科和他的政策是极其成功的。上加拿大的人口从 1792 年西姆科获悉的 20 000 人猛增至 1806 年估算的 70 000 人。一部分是自然增长，而增加的大部分人口来自于毗邻的美国数量稳定的移民。西姆科已令土地在合理条款下可以占为己有。上加拿大是一片好地方，通过水路和日益增加的陆路都能到达，但不可避免的是美国人跑来占领这些土地。

西姆科曾经希望他的行省，还有笼统的说英属北美，在创建者的痛苦经历下与共和政体和叛乱这股瘟疫相隔离。他希望“在最琐碎及最重要的事情上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英国的习俗、礼仪和信念[并且]……被反复灌输得到应有的支配地位以使殖民地与母国相一致。”① 但地理条件使他未能取胜，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同样是独立战争中英国将领受挫的原因。在这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去处理琐碎之事，对于重要的事务而言，最重要的是将殖民地置于一种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最终减轻英国纳税人忠于北美的负担。

西姆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远远不够。凑巧的是，在西姆科离

---

① 在 Peter Marshall，“British North America，1760 – 1815，” in Marshall，*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 2，385 中被引用。

去的时候，美国定居者，以前或许是效忠派或许不是，开始涌入上加拿大。他们每人得到200英亩（合80公顷）土地，前提是占有并改良土地——十分诱人的条款，尤其因为上加拿大肥沃的土地横跨最直接联结纽约北部与密歇根的区域。西姆科的继任者将掌管这样一个行省，在自然条件下再现五大湖南部各州的状况——在地形、气候、土地多产方面相似，最终在社会与经济方面也变得相似。

135

事实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方面都相似，即使政治上有所不同，但这是实质上的不同吗？确实是，这里有效忠派的传统、对忠诚的要求以及对美国缓慢发展的共和政体的恐惧。然而直到1812年，据一位可靠的评论者估计，后到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数目不低于60%。[1]西姆科通过执行理性的定居点政策，有助于确保上加拿大在吸引移民方面成为极具竞争力的目的地；在这方面及其他众多方面，西姆科是上加拿大行省的真正创立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将不会看到上加拿大今后的发展极其符合他所推崇的方式。

下加拿大

下加拿大立法机构的建立是有一定风险的，它的英国支持者对此焦虑不安。投票权分布广泛——在男性特权占优势、一切性别漏洞被填补之前，的确有一些女性在下加拿大早期的选举中可以投票。然而，与其说民主这种形式令英国人担忧，不如说讲法语的多数派政党这一事实令其担忧。他们的担忧似乎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1792年6月的第一届选举中，种族界限混乱。然而种族差异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当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怀有党派目的。在下加拿大第一届议事会的50名成员中就有16人讲英语，尽管讲英语的少数派人口不可能超过10 000人，而总人口为156 000人。[2]

---

① Michael Smith, "Upper Canada During the War of 1812," in Gerald Craig, *Early Travellers in the Canadas, 1761 – 1876* (Toronto: Macmillan, 1955), 33. 史密斯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浸礼派牧师，在1813年出版了对行省进行分析的书。

② Wade, *French Canadians*, 94.

立法机构的所作所为完全在预料之中。从讲法语的多数派中按等级选出一位议长，并决定辩论和立法以双语形式进行。此外，通过了必要的财政立法以保持省政府在经济上应付自如（1795），还建立了一套法院体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这样做：1792 年，一位英国商人含糊地写到，他害怕大多数加拿大人“被当前在法国盛行的可恶信条侵扰。”① 这位商人在这一点上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没有确切的办法估计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对下加拿大的吸引力，然而公众对刚开始的战争中的法国或法国人并不抱太多同情。

136

法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着很多疑问。法国驻美大使号召法裔加拿大人起来反抗英国压迫者并加入到自由事业中，但并不清楚有多少法裔加拿大人听到这一召唤。那些听到的主要是牧师和庄园主，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令人不满的提示，即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制度、权威、特权和天主教。这些人向政府保证了他们的忠心并发誓保护下层阶级，即定居者不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793 年 11 月，魁北克主教告知他的牧师，“他们之前对法国国王的一切忠诚和顺从现在归于尊贵的大不列颠，”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定期重申这些训诫。②

下加拿大的上层人士即讲法语和英语的人为此感到恐惧。下层阶级的成员——定居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十分恭顺，甚至不顺从。多切斯特企图增加下加拿大的民兵数量，但受到抵制。定居者拒绝从事修理道路的工作。据说，红色“自由帽”露面了——还不止一顶。法国革命的颂歌《马赛曲》传到了恐惧者耳中。难道革命即将到来？忠诚的天主教居民会像旧法兰西时期他们的同胞一样，杀死他们的牧师或将其流放吗？教士、庄园主和政府希望不是如此，但他们并不确定。于是在 1793 年 11 月，立法机构暂停人身保护权——一直保持暂停状态。政府现在可以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提请不同意判决理由而施行人身监禁。

---

① John Richardson to Alexander Ellice，16 Februray 1793，引自 Wade，*French Canadians*，97 页。

② 休伯特（Hubert）主教写的信函，引自 Wade，*French Canadians*，99 页。

或许未被审判的人是幸运的。一场真正的革命阴谋的发生有效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和所有忠诚的臣民受到惊吓反而更好。这次阴谋以137 佛蒙特为中心，一群政治家与法国人密谋入侵加拿大并唤醒法裔加拿大人。为达此目的，法国政府为定居者的武装力量提供了20 000支火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定居者得到这些火枪后将做什么，因为这些枪支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皇家海军截获。其中一个同谋戴维·麦克莱恩（David Mclane）于1797年7月在魁北克由于叛国罪被执行绞刑。他的头颅被砍下，内脏也被取出。而他的法官则被称为"新大陆上的暴乱和煽动暴乱的镇压者。"①

魁北克议事会在这一时期被庄园主代表与蒙特利尔讲英语的富商控制，极其忠于英国。1799年，议会投票通过为英国政府提供20 000英镑用于战争。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争中，纳尔逊上将（Admiral Nelson）战胜法国舰队，公众为此欢呼雀跃。1805年，纳尔逊于特拉法加去世后，蒙特利尔的商人为纪念他竖碑立传。到那个时候，战争已经归结为直接反抗法国侵略和暴政的战斗，因为革命先是向独裁政府投降，之后又屈服于拿破仑·波拿巴帝国。波拿巴为主宰世界而战，而英国人经常孤军奋战。

拿破仑时代对加拿大的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兴趣，已不如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极端派或雅各宾派。革命的可能性，即下加拿大居民——和其他行省的居民，出于那个原因——并没有深切依附于宗教和君主权力这一理念最终被忘却了。没有反抗，也没有革命这一事实至关重要。正如魁北克主教指出的，现在的法裔加拿大人与过去的法裔加拿大人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鸿沟。1760年的征服，从其产生的影响来看是一件好事，它将魁北克从革命和无神论的恐怖中拯救出来。这一消息通

① Douglas Hay, "Tradition, Judge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Canada,"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XLI/2 & 3, 320 – 321. 麦克莱恩面对法官是不幸的，首席法官奥斯古德（Osgoode）对他进行了审判，因为奥斯古德将当时流行的对叛国罪的阐释推向极限并超出极限。反对麦克莱恩的证人被允诺给予土地，作为对他们的证词的回报；麦克莱恩的一个法律顾问和法官都参与到这项交易中。

过效忠派和天主教避难者得以强化，这些人中包括来自旧法兰西的50位牧师。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非常热情，说服力很强，对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学与宗教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他们带来的消息是，旧法兰西已经抛弃了真正的宗教信仰，1760 年的征服并不是一次可悲的历史事件，而是上帝的杰作。[②] 英国的新教比法国人的无神论更受欢迎，幸运的是，法裔加拿大人有自由——英国人的自由——选择宗教。

138

真正的自由通常与革命的热情和革命最后带来的暴政形成对比。较之美国，法国的例子对这一观点的阐释更为直接，“雅各宾派”的阴谋较之美国政府的阴谋，目标更为简单。雅各宾派阴谋的问题是，1797 年后这些阴谋不复存在，只留在了官员激动不安的头脑中。

然而在政治生活活跃的行省，问题很自然地集中在金钱上——如何筹集金钱，如何花费金钱。蒙特利尔商人倾向于向土地征税，而大部分农村人绝不喜欢征税。指定政务委员会不同于当选议事会，讲英语的人不同于讲法语的人。一个组织松散的地方党派产生——加拿大人党（*Parti Canadien*），到 1810 年，党派就最佳的英国原则敦促政府对立法机构负责，依靠被选举出的多数派的赞成和投票。

此事导致加拿大人党与被指定的政府、总督发生冲突。当时的总督是将军詹姆斯·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Craig）。他于 1807—1811 年任职。他武断地认为不同意代表不忠，囚禁加拿大人党的领导者并解散议会，希望通过新的选举达到更好的结果。然而事与愿违，之后的骚乱促使伦敦用一位不太好战的将军替换了克雷格，即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Sir George Prevost），此人曾任新斯科舍副总督。

在令克雷格失败的政治方面，普雷沃斯特却成功了。而这正是伦敦所需要的，因为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在恶化，1811 年的战争已箭在弦上。

---

① Wade, *French Canadians*, 100 - 101.

② 英国征服的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是下加拿大耶稣会会士的幸存，是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耶稣会教宗的镇压过了很久之后。加拿大的耶稣会会士保留了他们的财产，其财产没有被新教国家没收——不同于天主教君主制国家中他们的同侪。

1812 年战争

正式宣战之前，战争已在北美打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从未139停止过，因为美国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土地的占领，与当地居民，即俄亥俄河谷的印第安部落的要求相悖，这些土地根据《1783 年条约》被割让并在 1794 年的《杰伊条约》（*Jay's Treaty*）中得到确认。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力量和精明的外交手段切断了连续的条状领地从而迫使印第安人向后越退越远。印第安部落的人数由于磨难、疾病和战争大幅减少，无法与到来的美国人竞争。到 1800 年，美国人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印第安人。

美国政府没有寻求冲突。它用尽全力试图将与印第安部落的关系置于安全、稳定的基础之上，初步结果是与土著人达成了一系列条约（最终超过 400 个）。美国人试着打破印第安人依附英国和蒙特利尔人的经济联系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直到 1812 年还未完成。

易洛魁人不再控制其他印第安部落。独立战争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永久粉碎了易洛魁人联盟。许多易洛魁人跟随英国人北上到达上加拿大，那些留下来的则分散到纽约北部的保留地，周围都是美国移民。然而易洛魁人中有一个精神布道会，在某些方面与他们周围邻近的宗教布道会相差无几。布道会的领导者汉森·莱克（Handsome Lake）宣讲这样一种宗教，既强调易洛魁人的传统，又敦促人们适应一些美国人的方式，至少足以保证易洛魁人的生存，否则他们将置身于一种陌生而消极的环境中。[1]

来自另一部落，即肖尼人（Shawnee）部落的两兄弟——坦斯克瓦特瓦（Tenskwatawa）和特库姆塞（Tecumseh）接受土著人生存这一主题，但汉森·莱克默然承认印第安人的未来存在于白人主宰的世界，

---

① Michael D. Green,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Colonization to the Mississippi Valley, 1780 - 1880," in Trigger and Washburn,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492 - 493.

而这一点是肖尼兄弟不能接受的。坦斯克瓦特瓦（被称为“先知”）宣讲这样一种愿景，即劝诫“个人和社会的忏悔”作为一种不仅是恢复精神完整的方式，而且是战胜白人的方式。两兄弟都谴责与白人相处，并力劝众多印第安部落联合起来反抗美国人。

140

然而，美国人抢先发动了攻击。他们于 1811 年 11 月向坦斯克瓦特瓦的兵营进击，而两兄弟中更具军事天赋的特库姆塞却不在营中。在接下来的小规模冲突中，坦斯克瓦特瓦的符咒未能保护他的战士，结果他的预言不再令人信服。

那时，美国与英国的战争即将爆发。英国负责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官员与美洲西北部的土著人过从甚密。随着战争不断逼近，礼物和劝诱也在增加。上加拿大的英军指挥官艾萨克·布罗克（Isaac Brock）劝告特库姆塞重建印第安部落联盟。布罗克认为，他只能依靠一小部分英国正规军，而且确信这远远不够，因此需要可以得到的一切援助。

战争真正的爆发过程很复杂。美国的外交未能保护美国商船与欧洲交战方，即英国和法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掌控着法国海岸附近的海上霸权，封锁法国港口并没收与美国做交易的船只上的货物。海军搜查美国船只以寻找违禁品的同时，也在寻找违禁的海员——这些英国海员离开他们的国家和船只，受雇于更具利润诱惑的美国船只。与此同时，尽管没有像英国人一样的力量来执行本国的宣告，法国人仍然要求与中立商船一样的权利。

两位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801—1809）及其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809—1817）曾尝试处理“中立权”的问题，但面对经济冲突的事实，未能成功。英国人在陆地上的力量薄弱，但控制着海洋。拿破仑的海上势力弱小，因此禁止他的属地和他可以占领或威慑的任何国家与英国人做交易。

英国人应付美国人的情况很糟糕，即使发生战争的可能很明显时，还是一直抵制美国人的压力。法国人在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似乎对美国人的要求给予了让步。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被呼声越来越高的战争所掌控。对美国“主战的鹰派”而言，战争过于简单。

141 1776年，英国人是美国的敌人。当初，英国人被打败，所以现在、以后都将被打败。英国人忙于欧洲战事，因此不能在美洲做出有效反击。加拿大的英军力量薄弱，但英国对西北部好战的印第安人有很强的影响力。近期移民到上加拿大的美国人将起来支持美国人的入侵，因此与其说入侵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走向胜利的进程。整个北美将统一在一种共和体制下，革命的任务最终完成。

另一方面，美军同样力量薄弱，4 000名士兵分散在半个大陆上。尽管麦迪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但它面临联邦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从南部、遥远的边界和西部征兵以增强兵力，那里的人口至今仍稀少且分散，大部分兵员来自遥远的边界。在新英格兰与纽约，无人热衷于战争，然而对加拿大的有效进攻将不得不以这两个地区作为基地。尽管加拿大的英军数量少，但一直在得到增援。皇家海军控制着海上，包括北美附近水域，美国海军虽然有能力进行单打独斗，但规模太小而无法与英国对付美国的战船数量相抗衡。一旦宣战，美国海军被摧毁是迟早的事。最后，欧洲的战争进展并非那么糟糕。威灵顿（Wellington）侯爵领导的一支英军将一支大规模的法军钳制在西班牙。1812年，威灵顿率军不断挺进。拿破仑在欧洲的另一端准备率领当前最强大的军队入侵俄国，此举意味着他在西班牙的军事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弱小，因此将成为威灵顿的囊中之物。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于1812年6月18日宣战。消息传播迅速，也确实证明了当时比1776年的通信手段要好得多。魁北克总督普雷沃斯特在一周之内得知这一消息，上加拿大指挥官兼副总督布罗克稍后也得知这一消息。于是，西北部的英国毛皮商人迅速令他们自己及其142 印第安客户听命于英军。一位当地的英军指挥官利用毛皮商人和美军对印第安战争的恐惧，迫使位于米奇里马基纳克的美国要塞投降。

米奇里马基纳克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小营地。底特律要塞更接近于战场，并且拥有一支大规模的美军卫戍部队——这里所谓的大规模，是按照战争伊始的标准而言的，而5 000名士兵确实是很大规模的兵力。［比较来看，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6月入侵俄国时的兵力是

691 000，而在战争中英国集结起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支军队数量为10 351人，是1814年进攻纽约的普拉茨堡（Plattsburgh）时集结起来的。］位于底特律的美军指挥官威廉·赫尔（William Hull）被独立战争的记忆所鼓舞（他是一名老兵），受上加拿大居民将奋起加入他的军队这一信念的支撑，跨过底特律河，开始向位于约克（多伦多）的首府进军。赫尔发出一则公告，他将解放加拿大人民。因此，所有接受这一思想的上加拿大人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英王并加入到赫尔的军队中。如果他们抵抗且误入歧途、被发现与印第安人联盟并肩作战，将被处以绞刑——由于他们遵循对英王的誓言，抵抗入侵者，所以“被毫不留情地杀掉”，一位住在上加拿大的美国浸礼派牧师如是说。[①]

上加拿大的许多居民作为美国人，并不想对美军作战——赫尔这样认为并非大错特错。赫尔的对手布罗克将军同意这一观点并对招兵买马不抱希望。但赫尔的公告激怒了许多人，他的一贯做法对支持美国的居民没有造成任何鼓励作用。而布罗克没有放过这一机会。他带领一小部正规军并取得特库姆塞驻军的帮助，向赫尔发动进攻。赫尔由于惧怕印第安人的屠杀，与他的小部队——尽管人数多于布罗克——逃至底特律。心理压力以及对森林和印第安人的恐惧使赫尔一命呜呼。美军放弃要塞投降了，赫尔被自己打败了。

赫尔的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人起初中立上加拿大的美国居民，然后又吸引他们，而赫尔的入侵表示美国人拥有最好的机会去拉拢那里的居民。他的失败逆转了殖民地政府及其支持者的低落士气但鼓舞了当地正规军，使他们能够抵挡足够长的时间以等待从蒙特利尔来接应他们的援军。 143

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尼亚加拉，时间是1812年10月13日。美军的部分士兵乘小船渡过尼亚加拉河（Niagara River），在对岸的昆斯顿高地（Queenston Heights）遇到布罗克带领的一支英军。布罗克阵亡，但英军继续抵抗。然而，美国援军，即纽约州的民团却拒绝渡河。美国

---

① Smith, *Upper Canada During the War of 1812*, 44.

援军未能到达这一事实注定了对面的美军不得不逃跑或投降。

相比在昆斯顿的失败，美国人切断圣劳伦斯河供给线的失败更为糟糕。边界沿圣劳伦斯河中部向下，这条河是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唯一一条重要的纽带，但美国人没有能力切断英国的河运，后者通过这条河流将来自蒙特利尔的补给、援军运到金斯顿。蒙特利尔与边界相距不到50公里，美国人的战斗也未波及那里。更有利的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佛蒙特的农场主和商人乐意为下加拿大的英国卫戍部队提供补给；而从法裔加拿大人的角度来讲，英国人购买军队所需的补给和设施是当地经济的一个刺激因素。（天主教主教和牧师谴责美国人入侵的罪恶，殖民地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支持感到欣喜，对每一位臣民站起来承担保卫殖民地的责任感到欣喜。）[1] 在新斯科舍，另一位将军，即副总督约翰·舍布鲁克爵士（Sir John Sherbrooke）提出使新英格兰的居民，尤其是缅因（Maine）居民不受干扰——如果他们为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做出以上相同的举措。[2] 然而，沿海诸省确实配备了私掠船（特许的私有船只以攻击敌方船只和货物）来掠夺美国商船以获取可观利润。

在接下来两年的战争中，补给和运输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补给沿大西洋一路漂流，直到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圣劳伦斯河被美国一项消极的政策保卫着——1813年初之后，甚至没有美军驻扎在奥格登斯堡这一最重要的边城。[3] 英国与美国海军在安大略湖上进行了一次军备竞赛，双方都努力建造更多、更大的船只。1813年4月，美国人偷袭省府约克。他们烧毁了公共建筑并从立法机构偷走了议长的权杖。奇袭约克是一次孤立事件。任何一方都未取得支配地位，这意味着英国人可以在上加拿大拥有军队，即使1813年见证了海军失去对伊利湖

144

---

① Helen Taft Manning, *The Revolt of French Canada, 1800 - 1835* (Toronto: Macmillan, 1962), 102 - 103.

② 1812年7月3日的宣言，在 J. Mackay Hitsman, *Safeguarding Canada, 1763 - 1817* (Toronto: University of Tóronto Press, 1968), 89 页中有引用。

③ J. Mackay Hitsman, *Safeguarding Canada*, 87. 当地人反对“麦迪逊先生之战”。

的控制，因此也失去了对行省西部（和底特律）的控制以及泰晤士战役（Battle of the Thames）中特库姆塞的兵败和伤亡。美军穿越尼亚加拉的入侵取得部分胜利，但在圣劳伦斯河与下加拿大的边界上，美国人未能切断英国的补给线。英国未输给在当地占优势的武装力量并且保持它在上加拿大的军队毫发无损，实质上，英国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海战更令其满意。与美国战船交战中存在个别损失，但英国的战船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并成功封锁波士顿港和纽约港。最令美国羞辱的是，皇家海军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建立了一个基地并向沿岸的城镇索要“捐赠”，否则它们将被夷为平地。

发生在上加拿大的战争以同一类劫掠为特征。英军于 1813 年从底特律撤退到尼亚加拉时，整个伊利湖北岸没有官员和军队维持秩序。那里的游击队员——部分人由几乎很少的上加拿大人构成，他们站在美国这一边——随意游荡，对他们之前的邻居实施抢劫并烧毁他们的农场、磨坊和房屋。即使有正规军也无能为力。美国人在 1813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烧毁了昆斯顿，当地居民只能自谋生路。而后，英国人与加拿大人实施报复，烧毁了布法罗（Buffalo）和布莱克罗克（Black Rock）。正如其他事件一样，上加拿大的战争性质证明原来的美国居民对美国军队怀有敌意。在允许游击战的情况下，美国指挥官放弃了实现战争早期的目标，也就是吞并加拿大的所有机会。

145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战场上难以招募、训练和维持任何大规模的军队。在上加拿大边界进行的战斗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但在战术方面，他们却不能与同时在欧洲调遣的大规模军队相比。而且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到 1813 年，英国人已经在上、下加拿大成功集结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共计 15 000 人，这与美国可以投入加拿大边界战场的军队相比非常可观。（尽管 15 000 人散布于 1 300 公里范围内，也从未凝聚成一股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加快耗尽了美国人对战争的热忱。1813 年末，战胜

美国的几率正在上升的事实已然明了。拿破仑入侵俄国遭到挫败并在入侵过程中失去了大部分军队。中欧国家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并联合起来越过德国追击法国军队及其皇帝。英国人从南部入侵法国，已是公爵的威灵顿将西班牙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西班牙王室的统治。如果美洲的战争继续，那么，得胜的英军在伟大将军的指挥下跨大西洋进行重新部署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争以1814年4月拿破仑·波拿巴的退位告终。英国政府通知普雷沃斯特总督，增援部队已在途中，为专属威灵顿指挥的15 000名最精锐的部队。关于密歇根成为印第安人领地这一争端，包括对尼亚加拉和底特律要塞的扣留，取得可喜结果的希望很大。威灵顿没有征服美国或逆转美国独立战争结果的想法：他怀疑基于欧洲模式的大规模战争用于北美是否可行，而且他无论如何都对政府再三强调，自己不想去美洲。

146 但1814年又是一个僵持之年。激烈的战斗——尤其是齐佩瓦战役（Battles of Chippewa）和伦迪小路之战（Lundy's Lane）——沿尼亚加拉边界继续进行，此时英国正在调整他们的阵势，但双方命运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东部海岸，舍布鲁克占领了缅因东部并将那里的税收和关税收入转移到哈利法克斯，最终捐赠给了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英国政府犹豫不决，权衡是在欧洲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还是动用它在北美新近取得的军事优势取得一场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从而争取有益于和平的局面。威灵顿建议讲和，理由是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足够事实证明加拿大的可防御性。“[这]是我的意见，”威灵顿写到，“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战争，对不列颠军队来说无上荣光”。确实，美国人依然占据上加拿大的一些领地，但可以用美国的领土与之交换——缅因东部与尼亚加拉要塞被英国人占领。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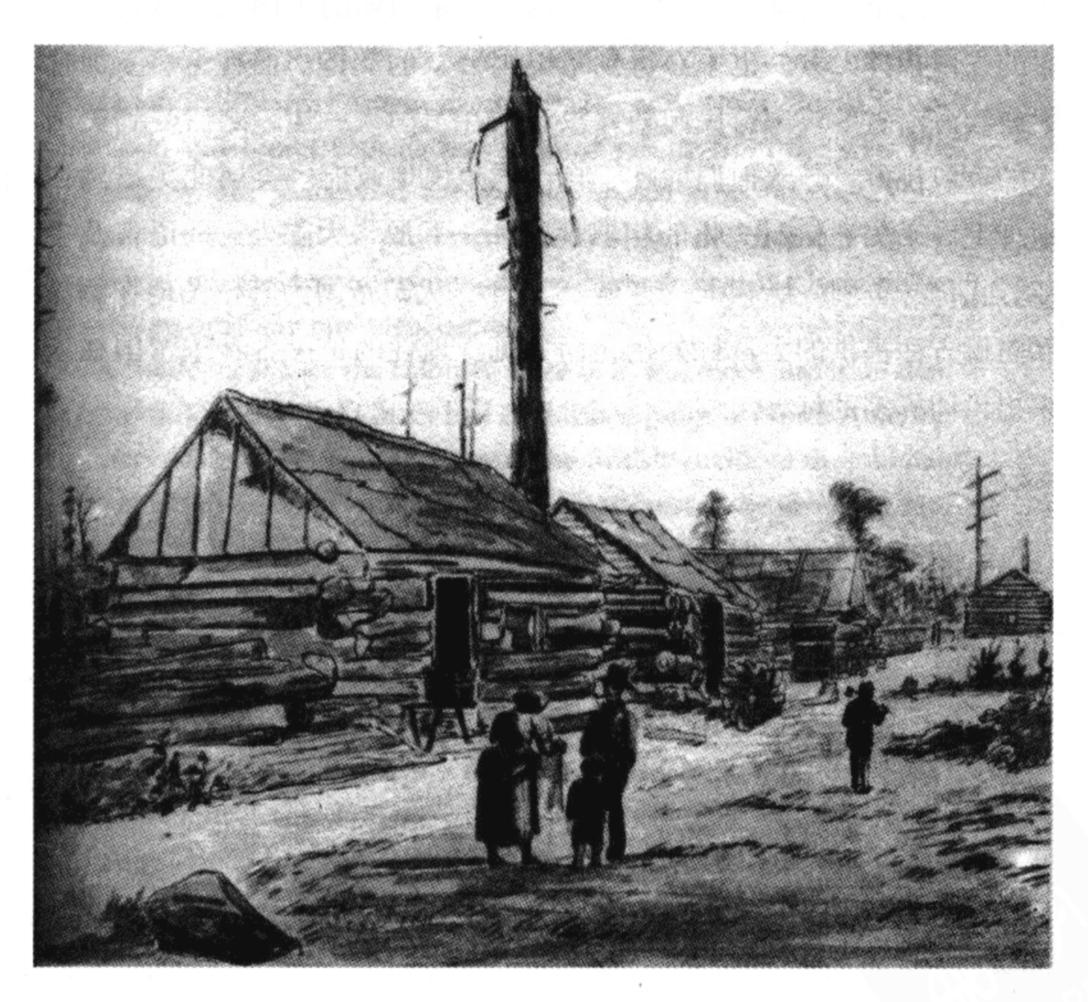
① Wellington to Prime Minister Lord Liverpool，9 November 1814，在 Hitsman，*Safeguarding Canada*，109 页中有引用。

确实如此。1814 年圣诞，英美代表齐聚比利时的中立城镇根特（Ghent），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规定回到战前状态，边界及其他事务与 1812 年 6 月宣战之前相比保持不变。《1814 年和约》结束了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多年的敌意。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关于一代人的事——那些年轻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战的人依然在 1812 年战争中掌握着权力，如麦迪逊总统或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其他人，如未来的国务卿和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或他的对手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都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牢记着独立战争。

战争现已结束。英国的军事力量并未打败受到公众强烈支持的且领导卓越的革命运动。他们只是击退了力量微弱的美国人的入侵。美军的入侵指挥无方，也未必得到了美国公众的支持。而在上、下加拿大或滨海诸省的英国臣民起初并没有站在美国人一边，之后受到美国人的百般挑衅，导致他们助阵于自己的殖民地政府。英属北美虽然在地理上属于美洲，但文化的相似性和——下加拿大除外——语言及生活方式仍与英国一脉相承。直至 1814 年，大英帝国为其殖民地在贸易和防御方面提供的大量好处仍显而易见。理性的殖民者希望帝国在未来提供同样多的好处。

147

第七章　转变与联合（1815—1840）



乡村定居点：1830 年，上加拿大，里多河畔近期闲置下来的农场。

1812 年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属北美呈现内外稳定的状态。殖民地平安渡过战争。他们属于大获全胜的一方，参战的陆海军几乎所向披靡。北美各行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下加拿大均未发生明显变节和叛乱，从战争中受益颇丰。商业主义体系确保殖民地获得特殊经济利益——在国内优惠的税制和受保护的市场。同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商机使当地的政客喜出望外，或者至少令其专注于此。 151

世界或至少殖民地比其所呈现出的更多变。《根特条约》在北美建立了和平，但这种和平岌岌可危。为了获取和平，英国人牺牲印第安盟友，使其听任美国人的摆布，最终被纳入共和体制。边境问题仍悬而未决；美国的共和体制处于狂妄、激进的状态；在远近适中的地方，美洲的西班牙帝国正因为革命动荡不安。英国政府惧怕国内革命，正如其盟国惧怕海外革命一样。不能保证或确定美国不可能再次想要强占加拿大，实现独立战争时的意愿。

但事态的发展迥然不同。英属北美和美国之间从未相安无事，但是 1812 年战争被证明为沿边界发生的最后一次官方战争。1815 年后，美国人逐渐将注意力移置他处，集中于西部边陲而非北部的移民事端、与墨西哥而非与英国的战争、奴隶制及国内冲突。加拿大和美国并没有产生隔阂，但是却变得更加疏远。 152

与英国修好及加拿大的英国移民迁入均与此关系甚重，移民总数最终达几十万——这意味着，与 1800 和 1815 年相比，1840 年从英国移民至加拿大的人口更多了。据估计，自不列颠群岛到达英属北美的移民从 1816 年的 3 370 人增至 1819 年的 23 534 人，再至 1832 年的 66 000人。整个 19 世纪 40 年代，移民人数继续增长，直至 1847 年，从英国到达英属北美的人数几近 110 000 人。[1] 移民大多来自爱尔兰，

① Donald Akenson, *The Irish in Ontario: A Study in Rural History*, 2nd ed.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 12, tables 1 and 2, and 31, table 4.

并且在他们当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比例约为2：1。[1]

移民大批到来是因为英属北美进入了经济混乱增长、乱世变革的状态。伐木业带动新不伦瑞克和上、下加拿大发展起来。而科技是变革的一大动力：1815 年后出生的一代人见证了蒸汽动能的使用——锯木厂、工厂、蒸汽机船和铁路上使用的蒸汽机。精心开凿且耗资巨大的运河使五大湖与海洋可以直接通航。铁路的发明和完善缩短了行程，蒸汽船缩短了欧洲和北美间的距离。通迅不再需要运输——电报取代了信使，铁路取代了驿马车和运货马车。

政客试图对时代的奇迹作出回应。发展自会带来回报，因为相对发达的经济会产生更富裕的工人。生活仍很艰难，但比以前要好得多。木材被运往大不列颠，满载移民返航——开始时进程缓慢，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后移民人数已非常庞大。随着蒸汽动力日渐强大，船只航行得越来越快。航行时间的减少和越洋费用的降低使得更多的移民纷纷签约，奔赴航程。这也促使了政府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先开凿运河，而后兴建铁路（Railways）。所筹集的钱部分来自税收，但也出自贷款，进而产生负债。税收和纳税人满足开发商和商业投机者的需要；同时，纳税人足以满足其对资金的需要，来解决移民和人口不断增加的问题。

153

随着人口的增长，英国政府越来越难以满足殖民地的需求。很快，英国政府就不愿为之。原因有二：帝国的重心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正在转向东方，不仅是印度，还有中国和澳大利亚（Australia）。18 世纪 90 年代，下加拿大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与印度相比已相去甚远，位于北美的英国要塞与驻扎在印度的兵营相比也微不足道。1815 年时驻北美人数为 29 000 人的军队到 19 世纪 50 年代缩减为仅 3 000人。同时，拥有较多人口且相对发达的殖民地意味着帝国补贴也减少了。

---

① Akenson, *The Irish in Ontario*, 25 – 26. 与通常的印象相反，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确实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即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前大批来到加拿大。又一次，他们的数量超过爱尔兰新教徒数量。

英军的重新部署反映了帝国的重新安排。英国的殖民地并非只有英属北美，澳大利亚（始于1788年）、南非（始于1806年）、新西兰（始于1856年）都与英属北美一样，在英国管辖之下并相互匹敌。诚然，到达北美更容易了——1820年时仅需航行4周——而前往澳大利亚则需耗时9个月或10个月。[①] 相对较短的航行用时和对穿越北大西洋的熟知鼓励了前往大西洋地区行省和上、下加拿大的移民及与其进行的贸易往来。木材交易尤为促进了航运的实行，因为运木船只尽管造价低廉、做工粗糙，但很容易被改装成载人船只从而将移民运抵加拿大。所乘人数不必受到承载量的限制，一些感到不适的移民总是呆在甲板上，或呆在救生船上。因此殖民地官员抱怨移民所处的环境确实合乎情理，“船上狭窄、拥挤和肮脏”。[②]然而，虽然加拿大仍为帝国明显的一部分，但在众多殖民地中，已不再处于特殊地位。　154

英国和殖民地间的关系仍很紧密。首先，重商主义殖民制度的存在。殖民地的物产，尤其是木材和粮食受到英国市场的青睐并且这一市场正在扩大。随着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全面展开，在英国，工厂不断涌现，房屋也拔地而起，甚至开始产生新城市。加拿大的木材是建造海军舰艇的主要材料，建筑房屋时更不可或缺。木材在英国的需求刺激了圣约翰河、米拉米奇河（Miramichi River）和渥太华河下游伐木业的兴盛，为殖民地的木材商和居住在加拿大森林边缘的移民带来了大量财富。

英国政府修建并重建了在美国边界上、哈利法克斯和魁北克的防御工事，促进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开凿新的运河是为了避开渥太华河和圣劳伦斯河的急流，但是，惦记着圣劳伦斯河畔沿国际边境暴露

---

① 这是较长的航程，然而是标准的。航海者对穿越大西洋航程的叙述以百无聊赖和晕船为中心。见 Charlotte Gray, *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The Lives of Susanna Mod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Toronto: Viking, 1999），Chapter 4。然而，也有关于更有知识、更富裕的移民的故事。他们有时间和文化水平记录下自己的故事。通常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要更险恶，在传染病泛滥的时候则更危险。

② 在 Marcus Tanner, *The Last of the Celt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292页中有引用。1827年，消息来源于新斯科舍（Nova Scotia）省悉尼的一位医疗官员。

的运输路线，英国军方的工程师建造了当时在帝国范围内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公共工程项目——里多运河（Rideau Canal），连接西南走向的渥太华河与位于金斯顿的安大略湖。运河的造价的确巨大，耗资达800 000英镑，筑有庞大的石闸，绵延于数千英里的水路；就其防御功能而言，可以说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包括渥太华河及圣劳伦斯河段的完善和兴建绕过尼亚加拉瀑布的新韦兰运河（Welland Canal），英国纳税人挥金1 069 026英镑改善加拿大的水路。］[1]

巨型水闸依旧巍然，运河成为19世纪的遗迹，虽然里多运河现今主要被用作旅游胜地。运河为住在上加拿大东部的居民带来了便利，并对木材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渥太华河畔上的一处新定居地，被称为拜城，位于里多河和运河的交汇处，得名于兴建该工程的军官约翰·拜（John By）上校。拜城（Bytown）从未被用作军队待命或军用物资储备的地区，但促进了伐木业的昌盛和此后伐木厂的兴建。

155

19世纪早期，运河是吸引科技、投入的工程，吸引投机商和投机政府注入数以亿计的资金来兴建和维护，但是对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圣劳伦斯河或里多运河，情况却不尽然。而赢得资金的是由纽约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构想的工程，将哈得逊河及位于布法罗的五大湖区与安大略湖周边的定居地连接起来。完成于1825年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与圣劳伦斯河沿岸未完成的运河竞争，确保纽约城成为进入大洲必经的重要港口。毕竟，纽约是全年不冻港，而蒙特利尔——纽约理论上的竞争港，从12月至次年4月或5月被冰封停用。

到19世纪20年代，蒙特利尔失去其标志性产业，而正是该产业令这座城市的商人发家致富。150年来，贩卖毛皮的一派人春季乘坐独木舟出城，沿渥太华河逆流而上，谋求丰富的上等毛皮，秋季带着

---

①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 - 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40 - 41.

可以换得丰厚利润的船货归来并向伦敦和巴黎的毛皮市场进发。蒙特利尔的西北公司与总部设在伦敦的哈得逊湾公司正面竞争，在通常情况下均取胜。哈得逊湾公司最终振奋精神，开始与蒙特利尔人展开直接竞争，派出商人深入内陆并穿越西部建立营地。直到1819年，竞争毛皮贸易的敌对派商人开始与之洽谈来结束竞争为其带来的窘境。沿着红河，在今马尼托巴，哈得逊湾公司的一个苏格兰籍主管塞尔扣克（Selkirk）伯爵为无家可归的苏格兰人建立一处殖民地，但那里暴力横生，一些居民被谋杀，其负面影响引起了本土政府的重视。[①] 到1817年，伯爵与西北公司的争端卷入了加拿大腐败的司法体系，如果西北公司与其关联者未能控制局面，将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影响。（塞尔扣克的一个手下对此的陈述是准确的，"法官、陪审团及加拿大国王的官员是一群被诅咒的流氓，"而且最终伯爵脱离"加拿大的无赖政府"，独立行事。）[②]

156

可以理解，塞尔扣克伯爵并不急于得到西北公司与哈得逊湾公司竞争的最终定论，对多数西北公司的合作伙伴，并未作出充分的让步和起诉。但伯爵于1820年初去世，也标志着他实际上的彻底失败。加速行程的协商使伯爵引起的争端和他们所代表的竞争戛然而止。然而结束公司间的争端并非事态发展的唯一推动力。西北公司内部就"雪藏合伙人"和终结蒙特利尔的该产业产生了分歧。这里的"合伙人"是指内陆从事贸易的人。

在这种形势下，西北公司的人倾向于妥协。在1812年于威廉堡（Fort William）召开的解决"雪藏合伙人"问题的政务委员会上，西北公司大部分积极的员工都转投哈得逊湾公司。因为哈得逊湾公司交易的人（"总经理"或"首席交易员"）能够得到公司利润的分红。文件规定，该分红称为"单务契约"。长期以来，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毛

---

① 一度，伯爵占据苏必利尔湖畔位于威廉要塞的西北公司营地，而且逮捕了他在那里发现的西北公司的合作伙伴。如 J. M. Bumsted 指出的那样，他在对西北居民暴力且不合法的行为予以回应。Bumsted，*Fur Trade Wars*，157 - 161.

② 在 Bumsted，*Fur Trade Wars*，224 页中有引用。

皮贸易的中心从蒙特利尔和威廉堡移至地处哈得逊湾的公司营地。由行事干练、雄心勃勃的苏格兰人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后来的乔治爵士（Sir George）］掌管公司的运作，加之缓和的英国政府鼓励，哈得逊湾公司因为能够控制从拉布拉多到太平洋地区和从北极圈到美国边界的毛皮贸易。但是，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划定与保卫边界

1812 年战争未能奇迹般地清除或减缓英国和美国之间、或英属北美与相邻美属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政府有想要开展贸易的野心，请求英国人允许美国商船在其西部印第安哨所开展贸易，不然就施以报复。19 世纪 20 年代，发生了一次小型海战。大西洋沿岸行省对渔业监管常有抱怨。美国媒体也曾报道此类抱怨，最终，19 世纪 30 年代，一群人组织了暴乱。很多美国人仍然坚信，如果给予他们机会，这些英国臣民会加入他们。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相当数量的美国政务人员被认为患有恐英症，并且很多英国政坛的活跃人士若在提及美国人时未流露出轻蔑的态度，会被认为自贬身价。

157

边界的防御工事继续修建，驻军仍在。英国人耗巨资修筑防御工事，如里多运河，并保养有佳或不断扩大工事，如魁北克的星堡（Citadel）。美国人也修建很多要塞，其中包括由于测量员的错误而建在英方边界里的一处。此处要塞耗资 100 000 美元，位于尚普兰湖畔的 Rouse's Point，但不得不被遗弃。英国政府派出一批将军掌管北美殖民地——舍布鲁克（Sherbrooke）、里士满（Richmond）、达尔豪西伯爵（Earl of George Ramsay Dalhousie）、梅特兰爵士（Sir Peregrine Maitland）和科尔伯恩爵士（Sir John Colborne）。他们可以胜任与美国的战事，但战争从未发生，而他们却被用于处理当地政务，正如我们可以看出的，这往往很失败。

幸运的是，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必须偿还由于过去的战争所产生的债务，并修复与具有选举权的纳税人间的关系。英军将领，包括终身公爵威灵顿认为，如果发动战争，美方的胜算在增加，虽然英国首屈

一指的海军能够占领港口城市和沿海地区并封锁美国的海岸线。英属北美的防御渐渐变得不值得继续耗费资金，自然地出现了其他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如政治或经济。

英国政府处于本国的政治困境中：解放天主教徒（赋予天主教徒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政治变革（调整丑闻横生的落后议会制度），还有爱尔兰政府（1801 年英国政府轻率地收纳了爱尔兰）。此后就是简单、纯粹的解放，解放全国的奴隶，结束已是习以为常的奴隶制。整个不列颠帝国都需要管理，并非仅仅加拿大。 158

19 世纪 30 年代后，这些顾虑使英国内阁对用于殖民地，特别是加拿大的经费开支越来越谨慎。只要政府与殖民地间存在和谐关系，并且殖民地接受英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体导向，那么重商主义的情绪将被抵消，英国政府用于殖民地曲折的政治路线则不太可能被改变。但结果经常是，经济不能改变政治路线。

美国逐渐忘却了英属殖民地。战后，数量减少的英国卫戍部队显然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而那些要塞和运河虽然造价很高，但明显用于防卫，并非进犯。英国人停止资助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任其自行处理与美国政府间的事务。

五大湖区的海军舰队成为最早的战争受害者，亦成为裁军的动力。1817 年的《拉什 - 贝哥特协定》（Rush - Bagot Agreement）批准了裁军，限制但没有废除五大湖的水军。随后 1818 年协议规定了英美边界为北纬 49°纬线圈上从伍兹湖到落基山。更进一步的协议规定了落基山以西，西属加利福尼亚以北及俄属阿拉斯加以南，即后来被称作俄勒冈的地区，作为共同属地，行使共同所有权。这并不是项稳固的安排，但 1818 年，该地区不需要政府、驻军和法律条文。就像位于美国以北、阿拉斯加以南及以东的英属地区那样，哈得逊湾公司成为俄勒冈最主要的贸易商。当时可以随便追逐利益。在东部，位于新不伦瑞克和缅因之间的阿鲁斯托克县引发了长期未决的边界纠纷；直至下一代人，此纠纷仍悬而未决。

这些安排的漏洞最终导致了纷争，并伴随着大量言辞激烈的争论。

大不列颠和美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也有时需要绕过妥协、吞并
159 英属北美来得出结论，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约翰·J. 奥沙利文（John J O'Sullivan）便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杜撰了“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一词，用以概括美国必然会吞并整个北美洲。

最终，在1846年，共同所有权被妥协终结，将俄勒冈分成包括温哥华岛在内的北纬49°纬线以北为英国属地，以南为美国属地。更东的边界由条约［《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Webster – Ashburton Treaty*）］和1842年的仲裁规定，将备受争议的领土沿着圣约翰河上游确定了边界，规定新不伦瑞克和下加拿大在一边，缅因在另一边。

所有情况都是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定居地、被吸纳的大量的移民及始于19世纪20年代，此后扰乱并左右美国政治的奴隶问题。美国与刚刚独立且军事薄弱的墨西哥共和国之间存在争端，最终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使得克萨斯（Texas）和加利福尼亚合并及其间土地尽归美国所有。这些耗用了美国人的时间和精力，使其仅存微薄的政治意愿来处理英属殖民地问题。

没有理由去打扰那些在说英语方面酷似美国人的臣民。至于下加拿大的法国人，则变得越来越有异国情调。他们簇拥在教堂尖顶下的圣劳伦斯河畔的乡村。被允许保留天主教和法语的他们已不再是威胁，而更像是一处旅游景观。“对于那些来自本土的人，东部加拿大［下加拿大］可能更像一个新的国家，这里的居民很像殖民者，但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1850年亨利·索罗（Henry Thoreau）写到，“（我）来自新英格兰，作为毫无经验的旅行者……它（指魅北克——译者注）像诺曼底一样古老，令我联想到了欧洲和中世纪。”①

加拿大人对于美国人的看法更加消极。在战争中，大多数出生在
160 美国的殖民地居民仍然忠于英国，或至少没有帮助美军。但是另一些

① 见 Henry David Thoreau, *A Yankee in Canada*（于1853年首次出版）, Chapter 3, www. walden. org/institute/thoreau/writings/canada/03_ St_ Anne. htm。

人，特别是在上加拿大西部的人，则倒向了美国。1814 年 5 月，在安卡斯特，8 个上加拿人由于为美国而战被捕、受审和被声讨，最终被绞死，财产则被剥夺。

战后，“美国人的”忠诚度问题一直徘徊不去。行省内上流社会的掌权者利用忠诚度问题或美国的问题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对英王过于忠诚，力图使前任美国人脱离公职岗位。由于有很多在美国出生的人，上加拿大有半数的人可能受到歧视，即使未被完全剥夺公民权的话。“我们的社会制度得以建构的最主要元素，”1837 年一位多伦多的女士写到，“就是对美国新体制的抵触和蔑视以及对美国人的厌恶。”①

透过 200 多年的棱镜，在英国人看来，“英属北美”是很自然的事——这些英属殖民地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渊源。政治体制、经济纽带和共同文化，这些都是下加拿大所期待的。但是 19 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英属北美有名无实。魁北克总督的头衔亦然。大西洋地区行省的副总督直接从伦敦得到指示，而且上加拿大的副总督绝非下属，各行省的政务人员并无关联，人们的活动在各行省间也没有交集。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爱德华太子岛和纽芬兰均为外向型经济，面向海洋，越洋直至西印度群岛或大不列颠。

大西洋地区行省与新英格兰关系的密切程度胜过上、下加拿大，旧关联很难解除。就新斯科舍人而言，波士顿仍然是该地区的大都市。当然边界两边的人们仍然相互熟知。新斯科舍的律师兼法官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虚构了一个美国商贩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穿越新斯科舍的历险记，并加以连载，在美国名噪一时。第一个美国版本指出，新斯科舍人与美国人有着同样的起

161

① 安娜·詹姆士（Anna Jameson），“一位上加拿大温柔的英国女士，1836－1837，”见 Craig, *Early Travellers*, 124 页。安娜重新提及省内效忠派的根基，但也描述了 1837 年她发现的他们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

源，并预示最终北美将会重新统一，成为“紧密的友好联合的帝国。”①

哈利伯顿笔下的美国北方人形象山姆·斯利克是一位很能干的经销商，积极而有魄力。英国臣民虽然亲切，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那些品质。这些品质是19世纪早期穿越美国和英国行省的多数旅行者所具备的。一位官方观察员达尔豪西勋爵，19世纪20年代时任总督，持负面观点。“结论一定是，”他写到，“大众性情的改变并未自然而然地发生——即使天荒地老，他们也总是好吃懒做、胸无大志、不求上进、固步自封。”②

一位来访的法国地方法官，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观察法裔加拿大人后表示，“总之，这一族人于我们而言，在知识储备上不如美国人，但是德行更高尚。他们没有充斥在美国人行动和言语中的重商主义精神。”③ 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亦被说成如此，虽然被委婉地道来；他们更文雅，至少没有英国旅行者和一些加拿大主人所发现的美国人那样粗俗。④

这是政治不同但文化相似的情况。然而即使政治区别也不是太明显。随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政治危机的深入，殖民地可能会放弃君主立宪制和与不列颠的联系，趋向共和主义，或可以推定的是，与美国合并。

重要的一点是，与英国的关联未必代表保守主义（Toryism），这

---

① 凯莱布·厄帕姆（Caleb Upham）在 Reginald C.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75–187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98页中有引用。哈利伯顿笔下的美国小贩被叫做“斯利克维尔的滑头山姆。”

② 在《加拿大传记辞典》“乔治·拉姆齐，达尔豪西第九伯爵”词条中有引用。

③ 1831年8月28日日记。George W.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191. 另见 www. tocqueville. org/ca. htm。

④ 不应该忘记在这一时期各省和邻近州正在为定居者展开激烈竞争，一些书被撰写用于帮助失去竞争的一方或另一方。

是一种对联邦或传统的社会或行为的固守。[①] 当然，行省内也有保守党人在政府和英国国教会中握有很大权力，他们渴望能够守住这些特权，相当于可以垄断公职和从公职人员的任免中渔利。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保守党人，他们属于新教的不同分支教派，也想在政府分得一杯羹，掌握部分政府项目——公路、学校、运河及其翻新。臣民们不止一次地向边界的另一侧张望，窥视其进步、企业和繁荣。他们的敌意，甚至是嫉妒，给政治带来了特殊的优势。正如它将证明的那样，殖民地的体制在包容种种重大的政治差异上几无适应能力。

162

停滞的政治经济

18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为殖民地设计的宪法构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时就废止了。条款因行省而异：所有的政治都很地方化，这一点尽人皆知，沿海行省和上下加拿大人都没有共同的目标，当然也没有公认的领导力量。而纽芬兰则向来自成一派。

纽芬兰是最古老、最落后的英属殖民地。该岛在多数情况下被看成是一块被鱼围绕的多石不动产。对于渔业的经营，这里是一个好去处，这才是最重要的。政府仅会不情愿地接受和承认沿海定居地的长久居住权，而 17 和 18 世纪的战争阻止了像以前那样的定居生活。官员的任用具有周期性，具体表现为英国海军军官同捕鱼船队一同出现后又消失了；1825 年，总督到达首府圣约翰并定居于此。7 年后，英

① 关于政治的性质和加拿大人与美国人间区别的问题在 19 世纪 20 年代被很多人提及，而且时至今日，仍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本质上，学术上的一个派别认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加拿大人在态度上更传统、更保守；而美国人则并非惯于顺从，与传统和权力联系更少。加拿大人更具有集体主义，更倾向于依赖国家，而美国人更个人主义，更有个人进取精神。最近，美国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了文化差异上的例子，特别是在他的书 *Continental Divide*：*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New York：Routledge，1990）中。另见两位加拿大社会学家的著作 Edward Grabb and James Curtis，*Regions Apart*：*The Four Societies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书中提出了强烈且令人信服的相反意见。自然地，人们怀疑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间的差异这一主题仍是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在本世纪初，这甚至成为一部同时以一名加拿大骑警与一名美国警察为主角的电视剧《正南方》（*Due South*）的主题。

国最老的殖民地终于启用当选议事会。在那以后，就收益和支出问题，当然还有公职人员的任免权，这使议事会与总督产生分歧。

爱德华太子岛仍在使用很早以前的政府结构，自 18 世纪 70 年代便设有副总督和议事会，但是其社会和政治大致与纽芬兰一样不同寻常。政治的中心并没有掌控在殖民地内的知名人士手中，而是掌握在非知名人士手中——那些不出席议事会的领主。他们拥有行省内大量肥沃的土地，但不希望因为这个特权而被征收税金。

163

在新不伦瑞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拥有土地，而是谁可以租赁土地。除了肥沃的圣约翰河流域和一些可耕种的飞地，用来种植树木的土地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并非用作耕地。森林被出租，而不被授予和卖出。那么，谁可以或应该砍伐树林，出售木材并为此付钱给国王，即行省政府所得收益呢？因为树林成了在新不伦瑞克获取财富的通行证，也因为是政治和政府决定租赁，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易如反掌。英国政府在行省政府坚持这项利益之前便作出了让步。1831 年，王室土地的控制权被从帝国官员的手中交给当地政府。虽然这些精英人物仍需任命，但利润归己。

新斯科舍是大西洋地区人口最多的殖民地，特别是 1820 年与布雷顿角岛合并后。新斯科舍的问题始于地理因素，其地形复杂，行省内各地多分散、少集中。作为最大的城镇和行省的首府，哈利法克斯也是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和英国主教的驻跸地，亦是卫戍部队和皇家海军基地之所在。[①] 但放眼英国，乃至世界，哈利法克斯仍是远离繁华的穷乡僻壤——居民不是英国国教徒，他们从事种植和渔猎或在布雷顿角挖煤。

即使哈利法克斯具有英国的或是效忠派的气质，但是行省内其他部分仍是苏格兰人的领地。18 世纪 70 年代以前，新斯科舍被叫作“新苏格兰”，但仅此而已。1773 年，苏格兰人在此登陆，并定居在皮

---

① 233 882 英镑被用于为哈利法克斯修筑防御工事，包括哈利法克斯堡的完成。Bounc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48.

克图。一段时间以来，在战争的间隙中，在苏格兰地主们的鼓动下，更多的荷兰人来了。地主们期望以人口数量换取羊，这些人虽不产出利润，且统统贫穷又苛刻，但对财富有较好的认识，并可以转换为利润。这些人都是生活在高地上的苏格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说盖尔语（Gaelic），被部落酋长逐出："现在统治我们的胆小鬼，"一位移民诗人写到，"赶走了自己人，没剩下几个了/他更喜欢山上的羊群，胜于穿苏格兰裙的侍从。[1] 164

后来的移民不再奔向皮克图，而是布雷顿角岛，他们称那里为"自由和食物的土地"。仁慈的是，没有那么多地主。[2] 他们形成的主要是乡村社会，大多数人为天主教徒，少部分人为长老派，与其他的新斯科舍人几乎没有交往。异乎寻常的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岛上 3/4 的人说盖尔语，部分因为布雷顿角地处偏远，独立发展。岛上缺少城镇中心，没有其他移民到来。

19 世纪，布雷顿角并未对新斯科舍的政治造成太大的影响。政治活动必然以哈利法克斯为中心，而且发生了第一起政治分歧。不温不火地开始，慢慢升级成了当选议事会和指定政务委员会间就税收所引发的争端——该政务委员会最终成为极为不详的"12 使徒大会（Council of Twelve）。"（《山姆·斯利克》的作者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称他们为"12 个老妇女"，但是仍然有很有抱负的政治家虽然不属于那个小圈子，但很想加入。）1835 年，名叫约瑟夫·豪（Joseph Howe）的记者，一个效忠派的后代、波士顿的难民平息了因其对当地知名人士言形粗鲁而引起的控告。他以诽谤罪被起诉。豪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经过 10 分钟的庭审，哈利法克斯的一个陪审团判他无罪，当庭释放。

豪对语言文字特别有天赋。"这个政府就像一个古老的埃及木乃伊，"他写到，"包裹在狭隘和陈旧的偏见中——死气沉沉又毫无生

---

① 在 Tanner, *Last of the Celts*, 293 中有引用。

② Ibid. 294.

机，但是仿佛会永垂不朽。”[1] 豪出发去扒开这尊木乃伊。1836 年，豪入选议事会并于次年组织了一群并非权贵的人。他们多数支持改革，通过《12 种方法》要求政府对当选议事会负责，就像在大不列颠那样。豪提议的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政教分离，即英国国教与政府分开，所有的宗教教派被一视同仁。没有别的要求可以更好地表达殖民地社会的非保守党特点；这也同样代表了行省内大多数非英国国教徒居民的意愿。这项意愿一定会激怒哈利法克斯的英国人，而且确实如此。

165

英国政府的反应软弱无力、前后矛盾但持续很久。在伦敦，辉格党掌权，利用议会改革的方法得到权力。辉格党利用允许先前没有选举权的阶级可以选举的方法扩大了权力。因此，政府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不能轻意否定或反对当选议事会的意愿。“你们欺骗了自己，”一个殖民地总督在写给上加拿大一位保守党朋友的信中提到，“真正显现的保守主义旧类型的精神已经灭绝、消亡、战败了，再在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出现的机率要比火焰向下燃烧和水往高处流的可能还小。”[2] 慢慢地，英国政府不再那样气焰嚣张了——在很多方面给予让步来保留通过副总督控制的权力，这份权力至为重要。整个过程令人不解且程序混乱，没有得到及时令人满意的结论。

不能变化得再快了，因为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情况不是孤立的。在一个殖民地得到让步最终能惠及其他，而且变革的节奏并不被沿海的殖民地掌控，而是被内陆的较大行省把持。

上、下加拿大

大西洋沿岸行省在人口方面少于下加拿大，但是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人口总数甚至比上加拿大还少。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这

---

① MacNutt, *The Atlantic Provinces*, 200.

② 1837 年，约翰·哈维（John Harvey）爵士对司法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哈格曼（Christopher Hagerman）如是说。见《加拿大传记辞典》“约翰·哈维爵士”。哈维虽为前军官，但善于调和，大体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军官，相继统治过所有 4 个大西洋沿岸省份——爱德华太子岛、新不伦瑞克、纽芬兰、新斯科舍，并颇有建树。

是最令英国政府头痛的两个人口大省，直到 1837—1838 年武装叛乱正式爆发。

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大多数地方居民逐渐认为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需要。立法体系令这些问题的改正成为不可能，因为指定政府和当选议事会是相互独立的。拖延回应、拒绝回应，无论是地方总督还是伦敦的殖民部都会激起民愤，最终激怒地方领袖。 166

地方改革政治家仍有一柄利器在手。如果他们能够控制议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就可以拒绝向政府缴纳税款，而政府就会绕过议事会筹集钱财。早期通过关税——按照上、下加拿大的比例——出售国有土地。如果出售大量的土地，总督和其所属官员及支持者能够靠此收益生活。1815 年后，加拿大政府的商业贸易无疑都是这样进行的：使行省内人口多起来并得以发展。政府急于使居民定居在闲置的土地上以及出售土地，因为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中叶，有迹象表明帝国政府将不再资助北美殖民地。[①]

在上加拿大，移民定居是一项相对明确的事务。政府寻找定居者，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如殖民地代理或土地公司这样的中介。有时帝国政府鼓励迁出，或分散拿破仑一世战争后残留的兵团，或鼓励多余的人口，尤其是爱尔兰岛上的居民迁出。

加拿大公司（Canada Company）采取了最特别的解决方案。它来自小说家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的灵感：公司从上加拿大政府购买了一大片土地——250 万英亩（约合 100 万公顷），3 先令 6 便士 1 英亩，或相当于 295 000 美元，16 年内付清。[②] 英国政府发现了为上加拿大筹资的另一种来源，非常高兴。尽管早期有一些损失——高尔特因为负债入狱一段时间——但是公司还是盈利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下

① Craig, *Upper Canada*, 134.

② Douglas McCalla, *Planting the Province*: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Upper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163 - 166 and 298 - 299, table 9.2. 加拿大公司每年的收入在 22 000 英镑上下。

去。在20世纪50年代，公司卖出了最后一块地，了结了这件事。①

167 土地政策还发生了其他变化。虽然退伍老兵和效忠派仍可以得到免费的土地，但其他人要付现金购买。定居地的边界向北和向西延伸了，1850年时抵达加拿大地盾的边缘，西至休伦湖。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上、下加拿大的人口急剧增加。在上加拿大，这种情况缘于移民，但是在下加拿大，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下加拿大

语言或语言上的差异使下加拿大与众不同。当然，这里的移民多数来自不列颠群岛。结果下加拿大一些地区的人具有英语的语调。19世纪时，蒙特利尔的居民多数是说英语的，甚至魁北克也有一小部分坚持说英语的人。在蒙特利尔的南面和东面，有讲英语的人所占据的飞地，位于旧庄园与美国的边界之间——东部城镇；加斯佩半岛附近及沿着圣劳伦斯河北岸的小片定居地上，也有讲英语的人——这里被称为下拉布拉多海岸。法裔加拿大人带着自己的特质，也成为加拿大人的一部分，而且人数与日俱增。法裔加拿大人主要集中在圣劳伦斯河谷，而且人数飙升。19世纪30年代，他们来到了此前由英裔居民占据的土地。

同时，殖民地的农业也正在发生改变。那是非常确定的事：但为什么会改变？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相互敌对的历史学家眼里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在18、19世纪之交，即1800年前后，下加拿大是小麦的主要产区，同时伴有大量的出口盈余。到了19世纪20年代，事情发生了变化，农民从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耕牧混合作业。②

人口的压力仍然很大，造成了对农场的分割和侵占边际土地的农

---

① 高尔特此后与英属美洲土地公司联系，该公司在下加拿大大部分东部城镇有分支。"John Galt,"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② 对争端有用的总结，见 Norrie and Owram,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141－145页。

场扩张。一些旧农场变成了边际土地，因为多年来过度种植造成了土壤退化。小麦的品种也存在问题——这个世纪后期才有更优良的小麦品种更好地适应加拿大的气候。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说明下加拿大的种植活动与上加拿大或新英格兰的不同或逊于它们。但另一方面，也没有结论证明法裔加拿大农民在经商方面逊于英裔加拿大农民——也没有这个可能性。 168

小麦的种植远没有消失那么严重，但即使行省内部分地区的居民没有过得困苦不堪，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一些历史学家指出，19 世纪 30 年代时，经济危机导致了下加拿大政治问题的激化，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处贫穷的乡村地区，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位农民都非常激进，或者当 1837—1838 年政治诉诸暴力的时候，农民想要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下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蒙特利尔并未裹足不前。随着下加拿大经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时的昌盛，也随着上加拿大财富的积累和人口的增加，蒙特利尔变成了圣劳伦斯河谷地的配销、经济和金融中心；城市里的商业佼佼者们轻松地将自己从毛皮商人转变为商人、银行家和生产商。魁北克城太孤立了，只有小块腹地用于耕种，而蒙特利尔地处渥太华河、圣劳伦斯河和黎塞留河三条大河的交汇处，所以成为供应和服务上游行省的贸易中心。运河和蒸汽船能够提供便利，所以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陆路的交通很繁忙，沿河的水上交通也很有规律。[①]

受繁荣的鼓励，蒙特利尔商人联合会于 1817 年建立了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并于 1821 年创建了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城市向西北扩展，崭新的街道不断拓宽，用石头垒起来的建筑物令游客非常吃惊。来自康涅狄格耶鲁大学的地质学家爱德华·西利曼（Edward Silliman）1819 年在城市中旅游的时候写道，他“一进入城市便喜出望外，第一次看到用石头垒起来的美洲城市。”商人的 169

① Frank Mackey, *Steamboat Connections: Montreal to Upper Canada, 1816 - 1843*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新豪宅，他热情洋溢地写道，“被巧妙地削凿，非常壮观，并将成为伦敦城里的装饰。”（港口附近19世纪早期的街景依然还在。）西利曼下笔太早而未能描述建于1824年至1829年的雄伟的圣母大教堂（Notre Dame Church）。它是当时除堡垒外，英属北美最大的建筑物。1832年，商人之城变成了英属北美最大的城市，需要一位市长和城市政务委员会成为其新地位的讯号。①

蒙特利尔是一座很混乱的城市，被语言、宗教、经济利益和种族弄得四分五裂。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当然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在说英语的人为主的社区——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存在次级团体，即信奉新教或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19世纪被称为Scotch），还有英国人——以及美国人，他们保持着属于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和法国人争得不可开交是自然的事——如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指出的那样，下加拿大就是“由于强烈的党派情绪，使得生活在这片乡村的臣民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英国人和法国人。”②虽然在1820至1828年作为总督执政期间，达尔豪西做了很多事情加剧党派间的怨恨和种族对立情绪，但他仍有些夸张。几年后的另一位总督，德拉姆勋爵（Lord John Lambton Durham）“发现两族人持续发生冲突。”

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下加拿大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分为商人和农民。通常情况下商人来自蒙特利尔，说英语；农民则讲法语。他们根据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划分，也根据地域的不同划分，通常分成蒙特利尔派和魁北克派。最后，划分成老牌精英派——庄园主、地主、军官和地位显赫的牧师——和希望取代他们的新生代政治家，其间也不乏身为庄园主的改革倡导者、富人或军官。最重要的是，两种语言关乎

170

---

① 1796—1832年，蒙特利尔被法官董事会掌管。1836—1840年，依然如故。西利曼的话被引用在Jean - Claude Marsan, *Montreal in Evolution*（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1），146页中。1825年，蒙特利尔的人口为26 154人，讲法语和讲英语的人的比例大体为55：54。

② 见《加拿大传记辞典》“乔治·拉姆齐，达尔豪西九世伯爵”。

两派的政治活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是世界范围内为自由而战的时候。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波兰的动乱强烈要求反对帝国和古老君主的民族权利得到认可。最明显的是拉丁美洲，在那里多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切断了与欧洲的联系，赢得了独立。（大部分成为共和国，只有巴西成为帝国。）在美国，共和体制内部也有改革，在新生代的兴趣变得炙手可热之前，年老的当权者自动让位，这种情况在 1828 年安德鲁·杰克逊，一位民主党人及政论者参选成为总统一事中得以体现。

19 世纪早期，下加拿大便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迹象。爱国党（*Patriote Party*）成立了，到 1810 年，开始支配当选议事会，不过其进程很温和，并受宪法限制。该党派的领导人看到了英国体制的救赎和英国臣民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这样的观念，政府应该对立法机关所花费的税款负责。副总督极力抵制任何这样的想法，而且爱国党人未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就此放弃，直到 1820 年达尔豪西勋爵任总督的时候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威灵顿的一位部将达尔豪西是积极且具有改良精神的总督。即使面对新斯科舍爱争论的副总督，他的意见还是很具有建设性，并留下最后成为达尔豪西大学的一所学院。达尔豪西的傲慢使其在下加拿大任职期间行事糟糕，而且高估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低估了所面临的政治处境和所处职位的真正限制性。①

没有总督可能逃过通过某人或某事管理行省的事实，在加拿大的例子中，意味着管理指定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和立法机构。在下加拿大，政务委员会的成员主要说英语，虽然也有少数法裔加拿大的庄园主和官员。总体来说，魁北克的总督定居下来后，他们有时被称作“英国党（English Party）”，有时被叫作“城堡派（Chateau Clique）”。达尔豪西赞成立法委员会“坚定和稳健”的特点，但是从

171

① Manning，*Revolt*，126－127. 达尔豪西认为，国内一些保守的大臣会成为危险的激进分子，而且强烈不赞成改革英国的观点，更别提加拿大的宪法了。

最开始，他便与议事会存在嫌隙。[①] 在这种体制中，国会是很难驾驭的因素，但是通过一些调解，合作还是可以进行的。

议事会并非那样激进。它的政治可以被描述成中庸的自由，接受了 1791 年宪法所带来的益处，并倾向于尽可能将益处普及开来。议事会中最显著的人物要数它的议长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他本身是一个庄园主［来自蒙特贝洛（Montebello），位于渥太河畔］。帕皮诺是相对年轻的人——1820 年时 34 岁——并已经是一位议事会中的经验丰富者（从 1809 年始）。1812 年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民团军官，并于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时相信并宣称自己是忠诚的臣民且坚定地支持与英国修好。他很赞赏英国统治带来的自由，尤其是可以使大多数法裔加拿大人在下加拿大保留自己语言和传统的能力，即使受说英语的人和新教徒的统治。

然而，帕皮诺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逻辑上自相矛盾、性情多变、机会主义，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费尔南德·维耶所描述的那样。[②] 他个人并不信奉天主教，但视它为法裔加拿大人身份的壁垒，并认为作为庄园主，他应该通过参加弥撒的形式为佃农们作出表率。（但即使在临终前，他仍拒绝天主教的圣礼。）1815 年后，帕皮诺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爱国党、温和的自由党的领导人。爱国党人拥有适度的自由，议事会中为数较多的民族主义者数量适中，在此后的 20 年里，扫清了任何可能的对立方。爱国党是众望所归，无论无如可能被期待追随帕皮诺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像帕皮诺一样，这些人经常思维困惑且迟疑不定、言语夸张但行事胆怯。由于经常与胆大的演说家一起，帕皮诺认为语言是一种武器，可以更深地挖掘其影响力；但是他不明白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也不能被其他妥协性的情感所代替。

172 对下加拿大政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在 1822 年。“英国党”一直想要改变宪法来增强自身的地位，削弱以爱国党为主导的议

---

① 在 Manning，*Revolt*，137 页中有引用。

② Fernand Ouellet，“Louis Joseph Papineau，”：*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事会的实力并主要通过修改《1791 年宪法法案》的几个重要条款来实现。该法案将加拿大分为上、下两部分。在英国政府的配合下，加拿大要重新统一了，但未得到议事会的同意，甚至开始的时候未得到其认可。因此，1822 年，殖民地的副总督向英国下议院提交了《联合法案》。

当下加拿大的居民知道了法案的条款时，产生了轩然大波。条款使得英语成为行省内有记录可查的唯一语言，15 年的间歇过后，议事会只能使用英语。法案将政府的控制权分散给了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以向领受圣餐者征收什一税，只要这些什一税获得总督的批准。随着上加拿大的人口不断增加，迟早在联合后的加拿大，说英语的人会占大多数，这样的前景也越来越明朗。

毋须赘言，议事会不同意条款的施行，而且派出帕皮诺前往伦敦施加影响，提出反对意见。法案已经成了反对派议会成员的目标，这些人有权利令此事的辩论推迟，这已足以使得法案搁浅。因此帕皮诺指出，在发生改变的伦敦，殖民地事务将不会是最后一次成为重大进程中的阻碍。

这段插曲看上去圆满地落幕了，但却将一些事务调动了起来，使得下加拿大从虽难以对待但却相安无事的殖民地变成 1837 年时发生武装骚乱的状态。起初，爱国党将矛头直指英国党，而英国党的计划就在于此，使得总督必须对建议者做出选择，当然不在个人喜好和偏见的影响下，较好的一方会被选出。议事会的武器是税收。显然，它用以支付官员的俸禄，即使是那些对议事会持反对态度的官员。达尔豪西拒绝全力以赴，直到 1828 年发生的事件迫使其卸任。 173

英国政府也全力以赴，在税收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它派出特使，至少可以说流利法语的阿尔默勋爵（Lord Aylmer）（1830—1835）和在爱尔兰享有盛誉且心胸开阔的斡旋政治家戈斯福德勋爵（Lord Gosford）（1835—1837）。他们两位半斤八两。正如阿尔默的传记作者菲利普·巴克纳（Phillip Buckner）观察到的，帕皮诺领导下的下加拿大

的政治家们决心证明即使是最优秀的总督也必定会失败。[1] 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帕皮诺从自由党的立宪主义者变成了民主党的激进主义者，1830年法国大革命的敬仰者和美国式民主的狂热者——当然，如果他作为庄园主的特权，其特权及此类若干细节在革命后被重视。到了1832年，帕皮诺背离了很多以前温和的伙伴，他的说法指向对下加拿大宪法脱胎换骨的修改。

他和他的属下拒绝了英国试图就税收控制所作出的妥协。如果要消费公共资金，特别是花在公职人员身上，他们要决定是哪些公职人员。提议的否决至关重要：如果帕皮诺来选择总督的议员，统治这个省份的将不是总督甚至并非英国政府。

19世纪30年代，政治上的歇斯底里不断升级。一些爱国党人怀疑政府正在通过移民政策对其进行打压。但是1832年，当移民发现霍乱蔓延的时候，500 000人中有7 000人丧生，一些爱国党人推测政府确实正在试图消灭法裔加拿人，以使其被说英语的移民代替。同年，蒙特利尔的选举暴乱迫使英军出动以维持秩序。军队向暴动者开枪，174 杀死了3个人——如果需要证明英国的暴政，那么会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证据。

1834年，帕皮诺及其支持者经由议事会通过了"92条决议"（Ninety - Two Resolutions），要求通过民众的选举对政府进行控制；由于倡导选举，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利用这些支持阻止包括税收在内的立法，直到修改宪法的要求得到满足。要么就得到全部，要么就一无所有，虽然帕皮诺可能并未理解得如此透彻。但是总督们认识到了，而且最终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了。

作为回应，英国政府做了3件事：经验丰富的将军约翰·科尔伯恩爵士（Sir John Colborne）被留在加拿大，开始与温和的政务人员建立关联；尽可能稳定收入，因为可以不受议事会的控制榨取钱财，可以使政府看上去正常运行。科尔伯恩是上加拿大倍受争议的副总

---

① 见《加拿大传记辞典》"马修·惠特沃思-阿尔默，阿尔默五世男爵"。

督——对于辉格党控制的帝国政府来说，他确实备受争议（见下文）。因此1836年时，辉格党召回了他。但是作为将军，他确实可以在危难之时身担重任。戈斯福德勋爵是一个爱好和平且善于妥协的人，但1837—1838年间，他想要与在野党建立联系的妥协政策失败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是，它并未失败。戈斯福德在1837年11月自行辞职，于次年离省，没能看到事情的近况。[①] 事情的发展使科尔伯恩为招兵买马和巩固地位做好了准备。

帕皮诺和科尔伯恩的意见正在趋于一致，只是二者都没有意识到。1837年夏、秋两季，帕皮诺在全省范围内召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议。会上的措词越来越大胆。正如历史学家艾伦·格里尔指出的那样，为了从传统君主制看待世界的方式中把法裔加拿大人解放出来，这是必要的。如果民主观念被反复灌输，帕皮诺和与他有着相同立场的人必然会反对君主，并将废除君主使用的语言作为废除君主立宪制的前奏。刚刚君临天下的年青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成为人身攻击的众矢之的。[②] 此后，回想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叛乱，帕皮诺建立了“通迅委员会”。

175

被夹在语言和现实中间左右为难的帕皮诺更信任前者。为了以防意外，他与上加拿大激进的领导人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取得联系，希望同时起义，以此压倒性的攻势控制分布甚广的英军哨所。利用言语的攻势失败，不但没有达到威慑英国政府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反而使其采取了行动：英国在当地的爱国者组织起来，抵制宪法，以此反对帕皮诺。受众人欢迎的领导人处于劣势。总督暂停了宪法的使用，批准了由忠诚的（讲英语的）臣民组建的预备队，并发出逮捕帕皮诺及其同伙的命令。

---

① “Archibald Acheson, Second Earl of Gosford”,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讽刺的是，如戈斯福德的传记作者菲利普·巴克纳观察到的，戈斯福德对危险的感知能力比他的军事统帅科尔伯恩强，而且在后者意识到从新斯科舍调兵是必要的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

② Allan Greer, *The Patriots and the People: The Rebellion of* 1837 *in Rural Lower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193 – 194.

南、北蒙特利尔之间的战争于1837年11月打响了。行省内其他的地区——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参战。科尔伯恩已经准备就绪，经过最初的几次挫败后，他一举剿灭了叛军。科尔伯恩的正规军和预备队烧杀抢掠，昭示叛军和抵抗的下场。[①] 帕皮诺和他的一些随从逃往附近的美国地区，而剩下的一些人，或战死或被逮捕。

在一年的时间内，叛军的拥护者在美国零星地发起了叛乱和入侵，但是他们都被击退了。纵观这次叛乱和对它的镇压，历史学家艾伦·格里尔（Allan Greer）得出结论："这是一次代价惨痛、结果既定而持久的反叛。"[②] 1830年发生的巴黎叛乱推翻了不受欢迎的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Charles X）；拉丁美洲的革命结束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叛军了解太多关于这些革命的资料。他们设想和遵从了这样的场景，以为英国政府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不可能召集善于作战的军队，现有军队会无法固守，并溃不成军；但没料到这样的情况，即其剩余的军队不仅能够供官员调派，并能追剿叛军的首领。

当然，帕皮诺没有被捕。多年后，再提及此事对于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1837年他出逃时的情景已经被他的敌手演练过无数次了，这些人包括很多追随他谋划叛乱，甚至参与叛乱的人。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帕皮诺最终得到特赦，返回加拿大——他成了令人讨厌的人，而不再是法裔加拿大人的灵魂人物。

176

那些留下来的人承受了恶果。有些人被处死，一些被流放，[③] 还有一些被捕。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机遇。1837年，政府推迟了人身保护法的使用，直到1840年才得以恢复，这意味着那些被怀疑是叛党的人不必经过起诉和审叛便被送进监狱。丹尼斯－本杰明·瓦伊格（Denis－Benjamin Viger）在这次半途而废的叛乱中担任会计，被判入狱2年，直到1840年刑满释放。在他服刑期间，下加拿大发生了巨大的变

① 1808—1813年间，科尔伯恩是血战西班牙的老兵。这场战争，产生了名词"游击战"（小型战争），意指市民与士兵间基本没有区别。

② Allan Greer, *Patriots and People*, 328－329.

③ 流放者被分别遣送到百慕大群岛和遥远的澳大利亚。

化。上加拿大的政治对这次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

上加拿大

和在下加拿大一样，上加拿大激进的政治和有缺陷的领导炮制了毒酿。上加拿大的问题远远不只是地方性的，虽然正是地方事务产生了这种问题。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时代的精神。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同样也出现要求结束特权和不公平的呼声。在上加拿大，特权和不平等体现在宪法和行省的结构中。由上加拿大上流社会掌权人士制定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中的等级制度，顺从维护着英国的统治，并抵制民主的施行。正如历史学家卡罗尔·威尔顿（Carol Wilton）指出的那样，对现存体制的忠诚和顺从对于他们来说是公理。上加拿大已经被进攻了一次，而且一定会有下一次。分歧和不协调已经昭示了殖民地面对美国人时的软弱。①

美国人的威胁不只来自外部——在上加拿大内部也有数千名出生于美国但定居于此的居民。19 世纪 20 年代，对国内民主主义的恐惧使当局政府和其支持者试图限制美国人的政治权利。结果却反而激起了而非限制了反抗。在这次事件中，出生于美国的马歇尔·斯普林·比德韦尔（Marshall Spring Bidwell）不仅两次被选入上加拿大议事会，还成为了议长。 177

美国人或“外来人口”的问题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由于 1791 年《宪法法案》所规定的英国国教的特殊地位，宗教派别也成为问题。由于信奉良好的宗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皮特和格伦维尔向国教提供了行省唯一的资产——土地，撇开新教牧师和国教牧师的支持。拥有了上加拿大 1/7 的可用土地，牧师储备会等待土地涨价并将其出售。发展依赖于工作在毗邻土地上的定居者。他们砍伐树木，修建公路和农场以增加土地的价值，为远方的牧师谋利。

① Carol Wilton, *Popular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Upper Canada, 1800 - 1850*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上加拿大的定居者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是官方教会的成员。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即使在英格兰，大多数新教徒都不是英国人，而是支教派的成员——浸信会（Baptists）、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和近期成立的卫理公会（Methodists）。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宗教复苏席卷了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美洲——如 18 世纪 40 年代、18 世纪 70 年代、19 世纪初和 19 世纪 20 年代。带着鞍囊的传教士、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巡回牧师”通常是美国人。他们带着圣经和个人救赎的信息来到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上、下加拿大说英语的偏远地区。作为非官方的传教士，他们靠智慧和施舍度日。卫理公会的教士抚平了由国教酿成的沟壑，甚至克服了他们不能为之的事情，即举办合法的婚礼，这种权利只存在于行省内极少数神职人员的身上。语言成为法裔加拿大人聚居区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其他地方，信件都能被收到，即使是那些早期居住在英国的家庭或个人。

178

雷森一家就是这样的家庭。他们是来自新泽西的效忠派安立甘教徒，住在伊利湖北岸的诺福克郡（Norfock County）。约瑟夫·雷森（Joseph Ryerson），一位治安法官和民团陆军上校，拥护英国国教。当他的儿子埃杰顿·雷森（Egerton Ryerson）转向卫理公会时，他禁止儿子进这个家门。尽管父亲担忧，埃杰顿并未将自己对宗教的选择当作对政治的坚持；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亲身经历过 1812 年战争①时美国人的暴行，所以对民主政治和美国政体没有任何好感。当加拿大卫理公会有机会脱离美国同宗教会，转回英国本源的时候，当时身为教会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和记者的埃杰顿毅然抓住了这次机会。但是当官员意识到，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持有异意的新教徒不是不忠诚，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崇拜国教时，宗教问题已经破坏了行省内的和谐。

卫理公会派教徒的厄运在于面对约翰·斯特罗恩（John Strachan）一成不变的目标，斯特罗恩是纽克郡的圣公会领班神父，后来成为多伦多的圣公会主教。他是苏格兰人。起初是长老会成员，对英国国教

① 美国人及其追随者加拿大游击队烧掉了他叔叔的磨坊。

极其抵触，也最为疯狂和强烈，虽然他不是最有能力的拥护者。[①] 后来的总督埃尔金勋爵（Lord James Bruce Elgin）称其为“上加拿大最危险、最恶毒的人。”[②] 斯特罗恩奋力建立一个行省，即使不能被他的教会控制，也要基于此教会。一位前男教员，看到他的学生成为当权者，并借此巩固教会的地位。斯特罗恩自己也在政务委员会中，为副总督提供建议，后者也非常乐于接受。在这个职位上，斯特罗恩并不孤单，他得到了紧密团结的政务委员会同僚们的坚持。此外，如果将上加拿大作为一方的话，他还得到了另一方要人的默许，尽管未必是热情的支持。

这段时期上加拿大的三位副总督，佩里格林·梅特兰爵士［（Sir Peregrine Maitland），1818—1828］、约翰·科尔伯恩爵士［（Sir John Colborne），1828—1835］和弗朗西斯·邦德·黑德爵士［（Sir Francis Bond Head），1835—1838］皆不乏天赋，虽然黑德非常古怪，他的自嘲酷似他真的是被错误地指派到这里一样。他们都致力于英国体制的原则，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包括英国国教。他们也极力地诠释了自己的职责及殖民地与帝国之间正常的关系。由总督管理，如果殖民者真正忠诚，他们会接受这样的安排。结果，总督断然拒绝了所有可能的妥协——（是为凌驾于牧师联合会、教育和被指派官员之上的行为。

179

在下加拿大，顽固直接引起了对抗。斯特罗恩和他的朋友打消了出生于苏格兰的激进分子罗伯特·古尔利（Robert Gourlay）对其行为的质疑。古尔利被捕了，虽然两次被判无罪释放，但是最终还是于1818年被判刑、逐出加拿大。他的离开给另一个苏格兰人让出了位置。

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henzie），1795年生于苏

① 斯特罗恩起初是一位校长，试图成为加百利长老教会的牧师，但却失败了，事后成为英国教徒，这是他的对手时常提起的细节。

② 埃尔金，苏格兰人，本处在杰拉尔德·埃尔金有见地的《加拿大传记辞典》中关于斯特罗恩的条目中有引用。

格兰，挥霍了青春后，于1820年到达上加拿大，1824年最终定居在首府约克。他将自己的报纸《殖民先驱》也带到了殖民地，连同他不安分的性格、甘为别人或集体受害的情结和无与伦比的批判才华。在约克，他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很多素材，但很快激怒了首府的少数上流人士。这些人的儿子为了报复，于1826年将他的印刷机扔进了港口。这使麦肯齐成了并非想象中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受政府迫害的受害者。他起诉了使其受折磨的人并胜诉，用得到的赔偿重建了自己的报纸并博得名声。

麦肯齐开始了在上加拿大的事业。他相信并指出如果能够恰当地施行英国体制，足可以满足殖民地政治的需要并促进日后的繁荣。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的革命者没有区别，如威廉·沃仑·鲍德温（William Warren Baldwin）或他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Baldwin），甚至是马歇尔·斯普林·比德韦尔。但如下加拿大的帕皮诺一样，他脱离了典范形象，即政府从未听到人民或他的呼声。

事实上，除了麦肯齐要求改革，还有很多呼声——卫理公会派教徒和其他新教徒要求政府平等地对待并结束约翰·斯特罗恩建立的教会所独享的特权；农民要求农场开通更好的公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学校；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好的价格，还有就是降低税收。所有这一切都被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否定了。麦肯齐可以自由地借用美国同时代的激进分子的观点来充实经济项目；其原始的美国版本令人费解，但是直到麦肯齐完成经济计划的时候，也同样只是绝望的大杂烩。

180

细节几乎不重要。正是麦肯齐与寡头执政者之间的斗争左右着政治舞台，而寡头执政者却无意中尽其所能地帮了麦肯齐，迫使他离开议事会，又确保他的改选。结果引起的骚动使英国政府很担忧，因为它不仅在国内极力压制政治改革，由此对于加拿大殖民地所发生的武断且强制的行动非常敏感。

政府的回应仰赖忠诚感和与英国之间的联系。稳定的英国移民、解散兵团的安置和半薪军官的流入都增加了英国政府面临的逆境，有

些地方军官流甚至多于先前在美国出生或与美国有关联的人。人口统计学的政治往往缓慢和不稳定，所以需要较快的方法。在英国国教徒的眼中，卫理公会派教徒是很偏狭的，不体面，但对于自己教派的事务很有激情。他们主要的痛处就是所处的地位和所得的补贴——或可以说是缺少补贴。如果两者都有了，如果卫理公会派教徒不再被排斥，并与英国的同宗教派关系密切起来，难道就一事无成了吗？

殖民地政府选择了低调行事。英国卫理公会教徒在政治上绝非激进——事实上是英国体制的一座堡垒。他们被邀请去加拿大，在那里，他们给予加拿大的卫理公会教徒以及与他们有共同来源的美国人很高的政治地位。由埃杰顿·雷森带领，上加拿大的卫理公会教徒抓住了支持政府的机会。如雷森解释的，由于“一个简单而充分的原因，政府对于他们的管理开始改变了。”对宗教的宽容自然伴随对政治命令的遵守，至少在只要不允许英国国教徒唤起福音派信徒的情况下是这样。

181

这很难办到。特别是约翰 ·科尔伯恩爵士决定公平对待英国国教徒，而且作为离职礼物——在这个过程中，被激怒的殖民地大臣罢免了他——赠予44 块英国国教管区大约9 000 公顷土地。因此科尔伯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府与卫理公会派教徒之间缓和的关系，并造成了政府与激进分子最终的对峙。

对峙源于他的继任者弗朗西斯·邦德·黑德爵士，起初黑德想通过指派包括罗伯特·鲍德温在内的温和改革派任职于他的政务委员会来安抚民众。他渐渐忽略改革派的建议，使不仅改革派，而且所有政务委员会成员都递交了辞呈。此后又以可预测的结果面对议事会。面对与议事会的僵局，黑德解散了它，并举行了一次大选，由副总督面向全省发表演说，公然抨击敌人，称其为不忠诚的人。他得到特殊联盟的支持——温和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如托马斯·塔尔博特上校这样的地主、反天主教的橙带党［Orange Order（近期来自爱尔兰）］、上

加拿大的天主教牧师，像在下加拿大一样，站在合法官员一边。[1]（橙带党徒感动于天主教徒的忠诚，取消了每年7月12日为纪念新教于1690年在爱尔兰的胜利举行的游行。）1836年的选举毫无悬念地任用了大多数的效忠派。

黑德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这并未带来政局的稳定。他们被剥夺了一项重要的武器，即失去了通过与立法机构联系进而制约政府的能力。麦肯齐倾向于发动叛乱。他们建立了具备革命功能的通迅委员会、秘密的议会，诸如此类，令其支持者在多伦多北部的田地里来回练兵、游行，为即将来临的战事作准备。对于政府，幸运的是，叛军由麦肯齐带领。因为当真正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他变得优柔寡断且能力不足。[2]

182

黑德尽力想要扳回劣势，派出行省内驻扎在堡垒的正规军干预下加拿大更为严重的危机。有组织的军队和激进的叛党由各自的笔杆子带领。为了鼓励属下，麦肯齐准备了“独立宣言”，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他许诺将把日后没收的保守党土地和战利品作为奖励。但这些奖赏还远远不够。麦肯齐的军力不足，即使足够了，他也没有能力统领他们。1837年12月初，他向多伦多进军、停止、撤军，而后又一次进军。他行军的暂停使政府支持者乘坐蒸汽船增兵多伦多成为可能。现在该政府军进军了。麦肯齐逃走了，最终逃到美国以求安全。

因此叛乱将以美国为基地，而不是加拿大。得到了美国同情者的支持和美国人所提供资金的帮助，麦肯齐试了几回，想要进军上加拿大。英国官员就地征兵，镇守边关，用正规军替换了临时招募的兵勇。美国政府告诫驻守北部边陲的士兵，要尽其所能切断叛军的供给，挫败其在美国的支持者。在这点上，他们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3]经过了一年间歇的游击战争，叛乱平息了下来。

---

① S. J. R. Noel, *Patrons, Clients, Brokers: Ontario Society and Politics, 1791 – 189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95 – 96.

② Craig, *Upper Canada*, 247 – 251.

③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142.

政府最终胜利。在事件的余波中，上百个，甚至可能上千个乱党及其支持者离省。留下来的多数被捕。1837 年，两名乱党被绞死。[一些 1838 年的入侵者，包括乔装的瑞典人尼尔斯·冯·舒尔茨（Nils von Schoultz）也被吊死。舒尔茨在一次审判中得到一位金斯顿的律师新秀约翰·A. 麦克唐纳的辩护]。

政府的得胜改变了政治的平衡。1838 年后，政治仅在关于忠诚这样的基本问题，如上加拿大是否属于英国上发生了不同。如何最有效地使其仍然为英国的领地成为时至今日的问题。 183

德拉姆伯爵与加拿大联邦

加拿大发生叛乱和叛乱被成功镇压的消息使英国政府陷入一种更为活跃的冥想状态。戈斯福德勋爵已经从总督职位上卸任，而且他调解的使命也显然没有完成。为了取代他，辉格党政府派遣了一个更加杰出的人物约翰·兰布顿，即德拉姆伯爵。德拉姆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富有矿主。在 19 世纪 20 年代激进的政治中，他表现得非常活跃（由此得名"激进的杰克"）。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德拉姆当了一小段时间的大臣，因与同僚发生争执，被迫退出，并成了英国驻俄大使（1833—1835）。在英格兰，他是辉格党内部一股生事的力量，总是就被派往远方的使命是否及时或合适鼓动大臣们的想法。

1838 年 1 月，德拉姆接受了派驻加拿大的使命。① 他认为自己拥有莫大的权力，可以成为总督，管辖大西洋地区的行省和加拿大，可以在这些行省里明显比他前任少受那些宪法和政治的掣肘。德拉姆作出了比统治更多的事。他会调查出现差错的事并向伦敦提出建议。这些均相应地开展起来。

审阅了殖民部有关加拿大的文件后，德拉姆带着一批随从驶向殖民地并于 1838 年 5 月到达。作为总督，在大多数迫切的问题上，他都

① 他拒绝了最初 1837 年 7 月时的加拿大岗位，但仅在 1837 年 12 月后，起义的消息传到伦敦时便接受了它。

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如怎样处理被捕的乱党和那些囚徒。德拉姆将一些人流放到亚热带的百慕大群岛，免去了大多数人的极刑。不幸的是，百慕大群岛不在他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他的行动迅速被当地的政府否[184]决了；当官方消息到达加拿大的时候，德拉姆已经辞职了并于10月乘船离开，结束了史上最短的任期之一。

如果事情就此完结，德拉姆便如昙花一现，不会被人们记住。但是这个总督度过了一个相当勤勉的夏天，在旅行的过程中，寻问和调查了英属北美的问题。当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和他的随从准备了一份关于殖民地及其问题和如何解决的详尽报告。

最基本的体制难题就是民选议事会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僵局。政府信赖议事会可以征收税款，但是拒绝允许它决定如何花费税款。殖民地终究是殖民地——从定义上说，它们不能自己管理自己，除非它们不再是殖民地。德拉姆指明，问题其实非常肤浅：只要英国政府控制对外事务和防御，那么与殖民地的关联就会丝毫未动。

正如德拉姆所写，“事实上，我所建议的体制会使殖民者自己掌管政府……政府体制的形式，——对外关系的监管，与本国、其他殖民地和其他国家交易的进行，——公共土地的支配，是英国政府能够对其取得控制的关键所在。”这是“责任政府”的一种形式，对纳税的公民有所交待，而不是地处远方的帝国政权。新斯科舍的约瑟夫·豪会相信这种政府，上加拿大的鲍德温家族也会同意，但是英国政府会吗？英国的纳税人仍然有责任出资修建北美的军事要塞和海军基地，甚至当德拉姆假设，英国政府而不是殖民地政府必须调控——如税收——贸易的时候，一个真正自给自足的殖民地政府仍然遥不可及。

德拉姆不认为责任政府仅靠一己之力便可以令殖民地满意。如果不满意仅仅在政治层面上，那么政治改革就可以解决。但是，正如他写在报告中最为著名的话语所说的，他发现“两个民族在同一个国家的怀抱中斗争”。在两个民族变成统一的国家之前，是不可能达成和[185]平的，而且这个国家必须说英语：政治和谐因此而达成，经济发展也是这样。

“同一区域”就是下加拿大。下加拿大人大多数讲法语，德拉姆认定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方法就是修改两地的边界，使上、下加拿大融合到一起，而且给予相同的代表权。（这事实上是德拉姆的第2个选择，基于英属北美所有行省的联盟。1838年秋持续在下加拿大的动乱令其感到果断的、有力的军事行动是很有必要的。）① 在日后统一的加拿大，法裔加拿大人会成为少数，因为蒙特利尔和东部城镇的讲英语的人来到上加拿大，使讲英语的人成为立法机关的大多数。而且，法国人将失去其在政府中和法庭上的特权；另外，德拉姆提议废除法国民法和庄园主体制——事实上，还有使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国民区别开来的一切。

自此，德拉姆的提议引发了争议。这个加拿大的自由党总督是否抱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种偏见态度？一些人，包括很多法裔加拿大人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但是其他人，像历史学家费尔南德·韦莱一样，认为德拉姆更多是一位推广现代化的自由党人。“［他的］结论没有太多的种族因素，而是更多地考虑到自由主义和对中产阶级历史角色的同情，”他写到，“因为在法国时他发现存在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法国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作为一名优秀的自由党人，他主张将这些聚集起来，由此可以感到他对专制者和封建法兰西的鄙夷。”②

同时期的另外一位学者诺埃尔（S. J. R. Noel）坚决反对德拉姆。他认为德拉姆对于加拿大的理解，特别是法裔人居多的加拿大是“肤浅的”，仅有“少部分的事实”，总体上充满了“庸俗的种族偏见。”至于德拉姆的建议，都太“幼稚”和“不成熟”。③真理可能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德拉姆自然采用自由党人和激进英国人的角度看待他的臣民——而且很可能掺杂一些对于法国人和法国专制制度的负面理解。 186

① Craig, *Upper Canada*, 263.

② Fernand Ouellet, “John George Lambton, First Earl of Durham,”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③ Noel, *Patrons*, *Clients*, *Brokers*, 108.

他对于法裔加拿大人的看法远非像数年前托克维尔那样存有同情心。并不像托克维尔那样，德拉姆确实基于当今现状——至少有被立法者认真对待的约束。

这是一剂猛药，几乎欲罢不能。下加拿大没有议事会，指定特殊政务委员会。法裔加拿大人的观点是混乱不堪，士气低落的；帕皮诺流放法国，他的前任助理人员——那些不与叛乱相妥协的人——就他的遗产和领导权争辩不休。甚至出现一个小集团，希望接受德拉姆同化方案的提议，继续生活并谋求繁荣。上加拿大的议事会很高兴能够通过选举组成联盟，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债台高筑的上加拿大可以与无债一身轻的下加拿大联合来减轻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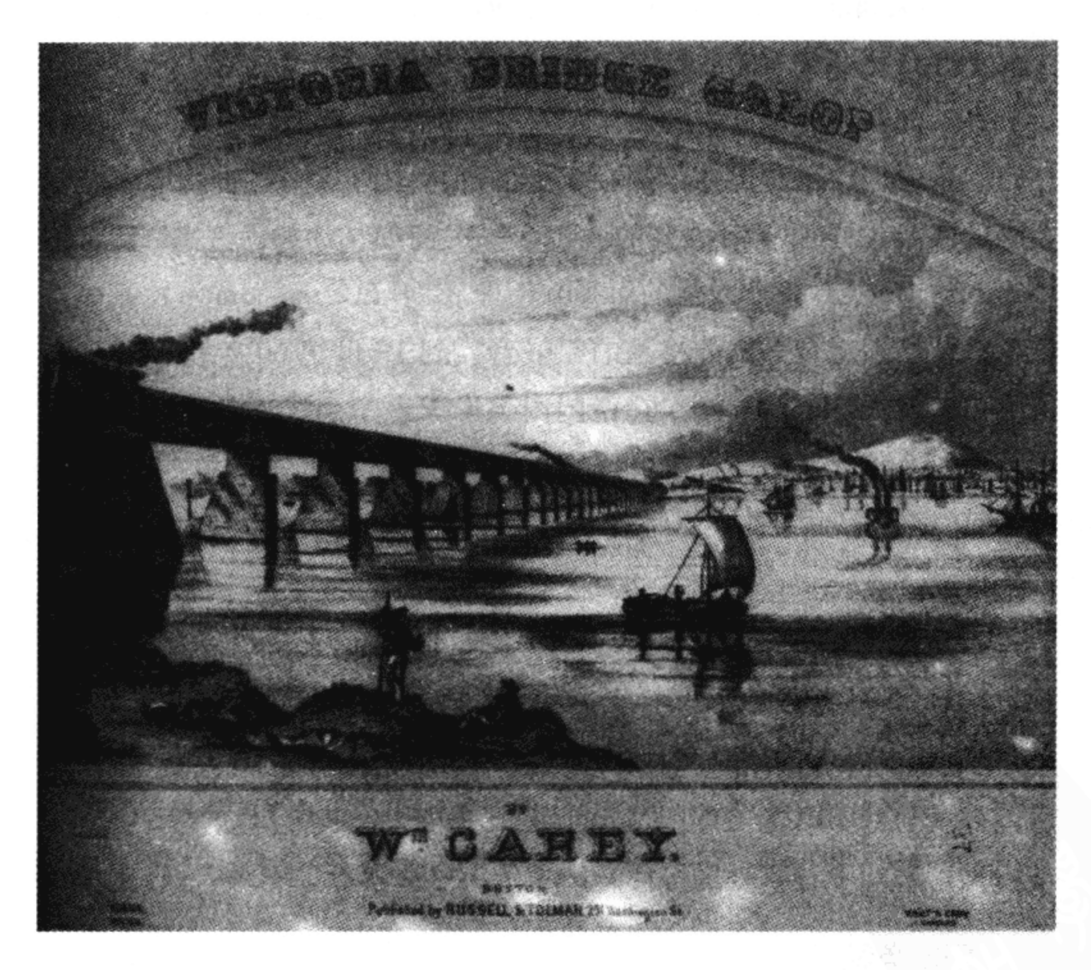
被保留下来的只等辉格党政府采取行动。首先，他们任用了一位新总督查尔斯·普莱·汤姆森（Charles Poulett Thomson），另一位辉格党政治家；他于1839年10月到达魁北克。[①] 而后他们开始希望得到长期的解决方案。他们通过了《184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of 1840）。该法案启用了德拉姆的形式，但并非其实质。上、下加拿大联合到一起，被授予它们与此前所有的相同的政府形式——指定执行和立法政务委员会，和一个共有80位成员的当选议事会，40位来自上加拿大，40位来自下加拿大。法案，像1778年和1791年它的前身一样，允许新"加拿大省（Province of Canada）"依靠自己的资源。与此前两法案不同的是，必须先支付薪酬给选出的官员和法官。在贸易上，殖民地仍然受到英国政府的控制。

这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是恐惧而非希望的产物。它防止了过去的危险，将希望，如果仍有希望存留的话，留给了前途未卜的未来。

---

① 与德拉姆不同，汤姆森是一流的政治家。几乎整个19世纪30年代，他任贸易董事会（贸易部）主席，而且在1839年早期为国库（财政部）大臣提供了位置。他拒绝了请求，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内阁同僚对他认为是必要的财政改革持反对意见，见《加拿大传记辞典》。

第八章　从殖民地到省



时代奇观：位于蒙特利尔，横跨圣劳伦斯河的维多利亚大桥（Victoria Bridge）常在歌曲中被赞美，画于1860年。

[189] 叛乱之后的几年见证了一次与以往不同的革命。英属北美没有摆脱不列颠的枷锁，也没有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断绝关系。恰恰相反——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通过殖民地居民的呼声，在自治发展为政府制度的鲜明特征中表达出来。大英帝国被认为是典型的由不同经济与政治的附属国环绕的宗主国，从来不能容忍权力如此转移，但是因为英国政治在19世纪30年代革新了，所以大英帝国在19世纪40年代改变了它的形态和意义。

帝国的联系确实更加紧密了，原因是一场交通与通讯方面的革命开创了利用蒸汽船与蒸汽铁路出行以及电报传输的新时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几乎能够立刻获悉远方发生的事件。战争结束后，士兵不会再死在偏远的战场上，如1815年的新奥尔良。

帝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还由于另一个原因——更多臣民从不列颠群岛迁到殖民地周围，包括英国在美洲的领地。纽芬兰的居民带有爱尔兰人的口音，而加拿大重要的政治家——例如，约翰·A. 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或他的对手乔治·布朗（George Brown）——讲话含有从出生地带来的苏格兰的粗喉音。到19世纪60年代，有足够的人可能成立一个新国家，在帝国内部形成一个殖民地的联邦——新大陆的一个独立发展、自给自足的君主国。尽管这样的事情在1837年 [190] 或1840年就算不是连做梦都想不到，但也似乎极不可能，其可行性令人怀疑。

人口是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外在标识。19世纪头10年，北美英国领地的总人口大约为70万人，可能还包括10万名印第安居民。19世纪60年代，人口稍稍超过350万，其中土著人口可能为15万人。与美国、大不列颠或大英帝国任何一个地方相比，北美殖民地人口数量都很少，但如果合成一个单一实体，就足以形成一个国家。

再造帝国

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洲人一直紧紧附着在北美的边缘。东海

岸的人口极其稠密。尽管定居者已经进入到了内陆，但即使是五大湖周围的景观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森林依然覆盖着土地，人类的定居地仅仅是偶然所得的树林中与杂乱无章的道路相连的空地。夏季，帆船和蒸汽船缓和了这种隔离状态；冬季，雪橇穿过雪原，但像上加拿大多伦多这样的城镇需要几周才能收到最新消息，而得到新鲜事物或新发明的时间则更长。确实，与 18 世纪 30 年代或 17 世纪 30 年代的情形相比，东西的传递更快、更可靠了，但在早期的几个世纪中，信息的传递是依靠直接的口头传达方式或书面形式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

疾病也在传播，来自欧洲的移民将疾病带到像哈利法克斯、魁北克、蒙特利尔这样的港口，霍乱于 1832 年 6 月在那里出现了。那一年，蒙特利尔有 1 800 人死于霍乱；而魁北克城则有 2 200 人死于霍乱。而后，霍乱沿水路向内陆传播，到达西部的约克和底特律，沿哈得逊河谷到达纽约城。霍乱极其令人恐惧，因为出现征兆之后马上痛苦致死，其本质是由于腹泻、呕吐、脱水而死。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它是如何蔓延的（医学权威指责“有害的蒸汽”），仅仅知道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的，于是官方采取由来已久的做法，那就是将被感染的人口和地区隔离。在魁北克城圣劳伦斯河下游的格罗斯岛（Grosse Isle）设立了一处专门的隔离场所，下层阶级移民被安置到那里；而乘二等舱迁来的移民由于能够支付起更高的费用，直接搬到魁北克或蒙特利尔。[①]

191

隔离对另一种病，即斑疹伤寒几乎不起作用，因为此病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播。1847 年，只在金斯顿就有 1 400 名不幸的爱尔兰移民为躲避家乡的饥荒来到加拿大，但由于斑疹伤寒，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坟墓。[②] 在内陆，不断传播的欧洲疾病继续杀死大量土著人口和毛皮

---

① 尽管在 1832 年有人怀疑水是流行病的基础，但直到 1849 年，一位善于观察的伦敦医生才得出结论，疾病确实是由水传播的，并且直到 1883 年，芽孢杆菌引起的霍乱才被隔离并得以确诊。

② Akenson，*The Irish in Ontario*，241.

商人。之后，蒸汽船沿平原的大河溯流而上。由于在西海岸的传染病接触者大量增加，相同的症候群出现了。

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些城镇和城市的人口很少。1850 年，哈利法克斯的人口约 20 000 人，而蒙特利尔几乎达到 50 000 人，多伦多则为 25 000 人。并不只是人口的不足限制了城镇的大小。关于一个地区可以发展为多大规模有实际的限制条件，需达到以下程度：有挖掘的下水道排泄废物；有可靠的水源供给来代替个人水井；煤炭代替木头成为取暖的首要方法。在多伦多，第一批下水道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挖掘的，煤气（由进口的煤制成）用于照明始于 1840 年。1842 年，在此游览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对这座城市的“繁忙、商业及改观”给予赞扬。他告诉他的读者，那里有铺设的街道、煤气路灯和“极好的”商店。[1] 显然，狄更斯在加拿大期间没有因为水而中毒，也没有被疾病击倒，当然，狄更斯在这方面是幸运的。像其他殖民地的人口中心，如圣约翰一样，多伦多是第一个作出反应的，现在仍一直摸索着通过私人自来水总管道取得安全卫生的水源。[2]

将货物运到城市“极好的”商店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运输方面同样存在难题。生活必需品得通过进口到达城市，马车行驶在时而泥泞、时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运输货物，或者费力地将货物卸至芬迪湾、圣劳伦斯河及五大湖之一肮脏的岸边。在旧定居地区域，作为燃料的木头更加难以找到，用 4 轮货车将其拉到城镇又堵塞了肮脏的殖民地道路。当然，蔬菜农场和其他农场可以供养当地人口，但进入市场对农民来说是一件主要的事情。

192

政府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试图改善道路。政府用原木作成“木排道”或研究出“碎石铺设的”人行道（以英国发明家命名），还

---

① 在 J. David Wood, *Making Ontario: Agricultural Colonization and Landscape Re－Creation Before the Railway*（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139 页中有引用。

② Letty Anderson, "Water Supply," in Norman Ball, ed., *Building Canada: A History of Public Work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200. 蒙特利尔在 1801 年之后有一套“分系统”。圣约翰的自来水公司始于 1837 年，而多伦多的自来水公司则始于 1841 年。

特许企业修筑收费公路和带有栈桥、码头的收费运河。在大西洋沿岸诸省至今没有多大改善，因为从连结岩石区和沼泽区的一小块定居地与另一块来看，新斯科舍复杂的地形造成其自身固有的问题。除了新斯科舍，绵延数英里的林地上零星散布着一些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在到达分割圣约翰河谷与圣劳伦斯河谷的高地之前已经销声匿迹了。

在大西洋沿岸诸省，农业发展很快并达到极限。即使在下加拿大的东部城镇，最后一大片肥沃的耕地也即将告罄。与北美诸省绝大部分地区一样，那里的经济作物也是木材。有用于燃烧的木头；也有用于建筑的木材。新不伦瑞克与上加拿大的伐木业为大不列颠的城市化提供了原料。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获得海外供给的欲望显然没有止境。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人口得以重新调整，农民陆续进入不断扩展的城市，而且繁荣促进了出生率的增长。家庭必须有房屋居住且房屋必须用木材建造。此外，人们必定需要由小麦制成的食物。

在偏远的北美，森林的边界在后退。清理空地的频率和大小都在增长，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土地被转化，森林植被似乎在走向消亡。[①]（矛盾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开始造林，因为人们开始放弃大西洋海岸的边缘土地，去往内陆寻找更好、更肥沃的土地。）英属北美大片森林的砍伐证明了殖民地体系的效率。这是重商主义理念的副产品，宗主国及其殖民地依靠这种理念生活在一种互相扶持的保护层下。地方总督确实仅仅表达了一种传统想法，即殖民地与宗主国是一种恰当关系，反对豪、帕皮诺和麦肯齐徒劳抨击的观点。 193

19 世纪 40 年代，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发生了转化。殖民地第一次几乎做到了自给自足——在任何事件中有能力自己支付费用，而不需要从宗主国不断注入资金。殖民地对帝国的依赖从物质领域——更多移民、更多士兵、甚至更多用于发展殖民地的补贴——转

① Wood，*Making Ontario*，158. 安大略南部大约 1/3 的森林覆盖面积到 1850 年已消失，到 1914 年该数字将达到 90%。

移到精神领域。

与此同时，英国对殖民地作为战时供给的可靠来源的精神依赖——为了食物或木材——随着对拿破仑一世战争记忆的淡化而降低。即使如此，旧的习惯在后期很难消失殆尽。安抚殖民地仍然有一定吸引力。19 世纪 40 年代初，英国政府允许殖民地谷物（在不列颠群岛被称为“玉米”）自由进入本国市场，此事被证明是最后一次。然而这是一次多余的举措，因为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继续表达着他们的不满。

法国这一传统的敌人在 1815 年被彻底打败，不再拥有军事、经济或政治意向来威胁英国的利益。工业革命以及英国财富和力量的增长使大不列颠到 19 世纪中叶时，已无敌于天下。英国工业及其产品不畏任何对手。它们不需要昂贵的关税和严格的保护，并且有比殖民地更加便宜的供给来源，离本土更近。为暴乱抵制生活中的高花费，而减少粮食与建筑材料的关税是回应公众不满的一种明显的做法。不足为奇的是，英国政治家和更为普遍的英国的想法开始形成适当的结论。

194

对殖民者而言，不幸的是，关税和殖民地因此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大不列颠是否应该奉行自由贸易，放弃保护关税，如同其《谷物法》那样，采用将其与殖民地紧密相连的操纵和激励机制？经济学家自此拥护一种原则上正确的解答，但往往在政治上，真正的问题稍微有所不同。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大不列颠应该放弃把昂贵的粮食和进口产品提供给难以控制、易发动暴乱的人口这一政策吗？面对爱尔兰由于土豆种植失败即将发生的饥荒，英国应该继续维持昂贵的粮食价格政策吗？托利党（Tory）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在 1846 年作出决定，不应该维持。这一决定导致他的政党发生分裂，但在自由贸易这一重要问题上，他胜利了。自由贸易在接下来的 90 年中成为英国的国策。

皮尔的决定在殖民地极其不受欢迎。英国政策之前鼓励依附，这种有利可图的依附是用商业优势奖赏殖民地的忠贞。1846 年以前，从加拿大出口到大不列颠的谷物享受关税优惠。基于此，加拿大人在农

场种植小麦，通过运河运输，使用磨粉机将其加工成面粉。在当前的殖民地体系下，从美国进口的面粉转化成加拿大人的产品，然后运至圣劳伦斯河下游出口到大不列颠。一位英国的旅行者评论说，他看到了加拿大人的磨粉厂，“一座非常大的新建筑，建造过程中一定花费了数千英镑……巍然不动”，这是英国最新政策的结果。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使贸易转向纽约，而不是蒙特利尔。[①]

不尽责帝国的责任政府

大英帝国的经济转型有助于刺激政治上的转变。如果帝国重新考虑与殖民地的关系，那么后者也同样在考虑与她的关系。19 世纪 40 年代初的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持观望态度。它试图对北美殖民地政府维持直接的帝国控制，同时又对一些原则点头同意，这些原则是连英属殖民地臣民都应赞成的实现殖民地统治的政策原则。此举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妥协，只在下列情况下切实可行：总督本人起到政治家的作用，发挥自身能力，获得地方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一些总督对此进行了尝试。1839—1841 年，加拿大总督西德纳姆男爵（Lord Sydenham）在选举中击败对手，因此获得暂时但有用的多数席位。他的继任者首先尝试安抚，接着是对立的形式，怀着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期望分化并联合地方官员。这一做法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几乎是自由选举的体系下，必定会产生由反对派政治家领导的政府。

195

这种情况在大不列颠已经出现，皮尔奉行的自由贸易导致他的托利党分裂，对手辉格党获胜。辉格党对殖民地采取宽容态度。德拉姆勋爵的女婿格雷勋爵（Lord Grey）出任殖民地大臣，于是自然重启岳丈的建议，即政府应该体现选举中表达出的公众意见。结果正如德拉姆所希望和建议的，政府要成为责任政府。

作为新总督，埃尔金伯爵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接下来的选举

---

① James Dixon，“The Canadian Temper at the Start of the Free Trade Era,” 1849，引自 Craig，*Early Travellers*，167 页。

虽没有启迪作用，但却是决定性的。责任政府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改革家谴责高薪酬和对精英人物的偏袒——是为平民主义的产物和党派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在新斯科舍，副总督仅仅赢得一次近期选举，而组建政府后则需政府发挥最大能力，成败在此一举。[①] 在欠发达的纽芬兰，改革的趋势仅在代议制政府的获准上体现出来，完全意义的责任政府还需时间。在加拿大省，政党制度草案已经呈上，1848 年的一次选举见证了改革党大胜对手保守党。

196 加拿大的政党制度具有一个特定的限制条件，是其他行省没有的。下加拿大的政治通常带有种族或语言色彩，1837—1838 年的叛乱尽管没有完全沿语言界限开战，但还是感染了省内大多数讲法语的人。叛乱结束后，德拉姆正式提议将法语从公众生活中去除，鼓励讲法语者讲英语，以此促进团结。上、下加拿大的联合以及之前在两个省的立法机构中双方占有平等的代表席位，不过是走向统一的第一步。

19 世纪 40 年代的政治现状颠覆了德拉姆统一语言的希望，但充分证明了他的关于殖民地自治观点的合理性。罗伯特·鲍德温与弗朗西斯·欣克斯（Francis Hincks）领导的上加拿大改革家和路易斯 - 伊波利特·拉方丹（Louis - Hippolyte LaFontaine）领导的下加拿大改革家联合起来反对众多总督及其持保守思想的支持者。1848 年，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鲍德温和拉方丹被任命领导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二人不得不面对随英国政府采取自由政策而来的危机。他们有能力予以处理，证明责任政府的灵活性和政党制度的牢固性。后者激发了责任政府的活力。

帝国的改革并不是很彻底。虽然取消了《谷物法》和保护关税，但《航海条例》的一些残渣余孽在 1849 年之前尚在苟延残喘。此条例规定了在殖民地交易的主体和对象。[②] 之后，残留的《航海条例》

---

① MacNutt, *The Atlantic Provinces*, 228 - 229.

② 从 17 世纪开始，英国对谁可以在殖民地港口做什么贸易进行控制或试图进行控制。新建立的美国当然遵守《航海条例》，该条例在违反条例上比在遵守条例上更加有效。1822 年，跨五大湖的商业被正式从法律上去除且很快消失，因为强制执行事实上已不可能。

在取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得以废除。一些人确信，其他人害怕这一做法是彻底消除北美行省的第一步。适合英国的就是适合所有的，尤其是殖民地，这一态度已经受过一次挫折；但是如果英国不再直接统治殖民地，那么殖民地不就只是一个花费既高又差强人意的累赘吗?

大不列颠仍然致力于保护它的海外领土，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面对好战的美国宣布占有土地，英国政府于1846年同意沿49°纬线划分俄勒冈；英国的势力和商业范围退至温哥华岛。俄勒冈这一短暂危机的结果提醒英国政府，保护它的美洲殖民地将是何等昂贵，通过外交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是何等幸运。[①] 同样幸运的是，美国没有极大的热情对大不列颠开战；它于1845年陷入合并德克萨斯以及之后与墨西哥的一场战争中。间接来看，这些事件对加拿大极其重要，因为美国得到了领土、财富和势力。其人口数量第一次与大不列颠持平。英属北美与美国的地域大小和战略实力已不成比例。当前，这种情况仍会持续下去。

197

在此阶段及其他阶段，用“国家的”或“边境”这样的词语谈论北美，在某种程度上有误导作用。边境代表着某些事情，但边境承担的行为有限。人们几乎是自由穿越边境。此外，理念、新鲜事物和习惯也在移动。[②] 移民到北美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几乎经常从欧洲，尤其是不列颠群岛穿越大西洋。多亏了《航海条例》和木材贸易，通往英属北美的海上航线的船舶众多，向西航行的船舶舱位也便宜。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埃肯森（Donald Akenson）指出的，“到达美国的最廉价方式是取道加拿大。”[③] 因此，许多移民到达蒙特利尔或圣约翰却不打算停留，但是，当他们经过这些地方时，很可能会给当地官府造成负担，有时因为生病，有时因为贫穷。

当地官府尽最大努力应对这一现象。相对而言，几乎很少有移民

---

①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164 – 169.

② Donald Akenson, “Irish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1800 – 1920,” in Andy Bielenberg, ed., *The Irish Diaspora* (Harlow, England: Longman, 2003), 120 – 121.

③ 同上，121.

想要留在下加拿大，但接待费与过境费落在地方政府身上。因此，省府开始征收人头税以支付费用并增加税额，用以支付治疗疾病和住院的费用，甚至还有丧葬费。

198 被铭记或被记错的一群移民来自爱尔兰。[①] 他们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事实上是1815年后所有年份中最多的一次移民。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爱尔兰人改变了殖民地。一般认为，"爱尔兰人"指"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但多数情况下却不是这样。到达北美的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来自爱尔兰边境南、北的都是新教徒。这种情形引起更深的曲解，因为新教徒一般被认为是"北爱尔兰长老派成员"，也就是所谓的有苏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人，是克伦威尔拓居地移民定居者的后代，这些克伦威尔拓居地定居者将操盖尔语、信奉天主教的土著爱尔兰人赶至别处。但来到英属北美的大多数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很可能是爱尔兰安立甘宗成员，换言之，他们是英国国教徒，并非长老派成员。上加拿大于1840年之后被称为加西（Canada West），这里吸收了数量最多的移民，地理条件上足以容纳，因为有用于耕种的面积最大的闲置、可利用土地，大部分爱尔兰移民占据了这些土地。然而，新不伦瑞克也吸收了许多爱尔兰人，从事耕种的不如从事伐木业的人数多；许多爱尔兰人也到渥太华河谷（Ottawa Valley）从事木材贸易。

所有移民都带来了在出生地形成的风俗习惯，爱尔兰人概莫能外。新教徒引进了橙带党，这是为纪念在前一个世纪宗教战争中新教徒（和英国人）的胜利于1795年建立的一个半秘密性质的社团，并将新教徒君主威廉三世（William III）——追随者和仰慕者称其为"比利王"，作为它的象征。此类社团，又如共济会（Masons）为渴望转化和团结的团体提供必要的慰藉和支持。除了教会成员之外，这些社团还对英国在美洲边远省份的大部分团体给出了定义。

---

① 电影《纽约黑帮》（2002）以一种极为令人不悦的方式展现出一幅爱尔兰移民的图景和美国人对此的反应。对1814年伦迪小路战役的描述涉及加拿大，被作为美国爱国主义的素材。

在爱尔兰，教会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断定教会在英属北美也将是极其重要的。主要界限是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野。穿越界限需要一定的交流，这种交流则通过皈依或同化而变为另一种信仰，但总体来说，天主教徒依然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亦然。区分众多新教宗派的界限非常灵活。正如埃肯森指出的那样，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如果不是忽略的话，（英国的）爱尔兰国教会。实际上，在爱尔兰、苏格兰与英格兰有分支的英国国教会是殖民地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教派忠诚反映的不仅是深层的宗派信仰，还有教堂礼拜仪式的可行性。由于缺乏教堂和牧师，宗教集会的担子很可能落到另一宗派的肩上。

199

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建立国教，即英国国教会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到 19 世纪 30 年代，殖民地长官无奈地接受他们的子民在宗教事务上自行其是这一事实。随着从宗教中清除压制与偏袒，宗派之间的合作或存在于宗教之中的更现实的中立有了回旋的余地。和谐的前景或至少没有激烈的冲突，使考虑像教育这种与教会息息相关的事务的进步有了可能。

理论上，义务的、以税收为支撑的普通教育受到欢迎，但很难实施。所有殖民地都有专门针对这种学校的法案。一种模式来自爱尔兰。它设立了一整套“国立学校”，包括共同的课程，但绝不包括任何可能触犯爱尔兰基督教派别，即天主教或新教的任何内容。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人多势众，大权在握；然而在英属北美，他们只在下加拿大占据多数。在其他地方，天主教的严格与新教的偏执共存，掩饰这一事实需要政治家召集所有才子。结果是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在加拿大省，由一位天主教政治家倡议的立法在加西炮制出两个平行的、由本地区支持的体系。一个公共体系，事实上是新教体系；一个天主教体系，被称为“独立”学校。在新斯科舍与新不伦瑞克，安排稍有不同，但实际结果异曲同工。一些学校是天主教性质的，而其他的则为新教性质。

政府的作用

学校的意图自然是灌输宗教信仰，这正是众多教会关注之事，但

200 学校也鼓励良好的公民价值观，从爱国主义到有序的行为规范。良好的秩序一直是殖民地所渴望的。早期定居者非常重视法律和法庭来处理扰乱秩序的案件，保护生命与财产安全。最高层有一个小型审判机关处理更严重的案件，通常是恶性案件，如我们所看到的（前文136—137页，原书页码），但大部分的社会治安由地方司法维护，这些杰出的个人不怕执行处理他们邻居的任务。地方法官也管理镇区、辖区和郡的事务，如道路和桥梁。

随着人口的增长，森林被清除；农作物种植扩展；计税基数也随之增长。邮局不只设立在大一些的城镇，也在偏远乡村设点。运河沿圣劳伦斯河延伸。1829年，韦兰运河（Welland Canal）作为众多运河中的第一条运河，将伊利湖与安大略湖连在一起。有时，运河属于政府工程，是公共建筑，政府完全拥有；有时，运河属于私有工程，得到政府大量补贴。但运河很快被铁路取代，铁路是那个时代的奇迹，最终也由公众支付费用，因为对于更远的距离而言，既没有公路运输也没有水路航运，方便公众出行。幸运的是，多亏了责任政府，用于运河和铁路的税收在立法机构上经公民代表同意顺利通过，也就是被政治家批准。此外，一个生命力旺盛但有些不同的政治派别在众多殖民地兴起。自由放任的公民对自己造成的结果只能怪自己。他们自然使政治家成为替罪羊。

这是一个适合轮流执政的制度。这些党派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表面上脱离实际。改革党与托利党最终成为保守党与自由党。这一分类几乎不能表明左右倾向：政党制度的本质在19世纪60年代最终出炉的“自由－保守”党中被发现。这两个党派都具有一些特性且这些特性都涉及某些熟知的利益。例如，加西的自由党往往追随或至少是关注出色但不易相处的多伦多《环球邮报》编辑乔

201 治·布朗。出生于苏格兰的布朗经纽约到达加拿大，参与长老派的派系政治。他具有一种强硬但并非专横的个性。在其影响下，自由党摆脱了无数年轻的政治家，这些人攀附在约翰·A. 麦克唐纳的自由－保守党（Liberal – Conservative Party）的庇护伞下。

麦克唐纳按血统来说也是苏格兰人，性格柔和，而布朗则直率。前者随和而后者严厉，正所谓“包严欧宽”。布朗被认为缺乏魅力和对他人的关怀，而这些正是麦克唐纳充分具备的。布朗认为麦克唐纳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酒鬼，而麦克唐纳则认为布朗是一个偏执的宗派主义者。的确，麦克唐纳经常酗酒，布朗经常口诛笔伐其他宗派，尤其是爱尔兰或法国天主教的教派与种族缺陷。但布朗清楚，在党派轮流执政的制度下，妥协是有必要的，而且麦克唐纳也承认，在政治上一定有更大的想法实施的空间。

麦克唐纳也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法裔加拿大人合作伙伴乔治 – 艾蒂安·卡蒂埃（George – Etienne Cartier）。他是蒙特利尔的律师，像众多法裔加拿大律师一样，是以前的准革命者。[①] 卡蒂埃之前追随帕皮诺，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之后转而追随改革家拉方丹。他继承了拉方丹的联合与安抚的准则，找到英裔加拿大合作伙伴，与之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基本原则。体制上的需求满足后，卡蒂埃的法裔加拿大改革家发现，他们的利益，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与其选民的利益表明应该与上加拿大的保守党人结成联盟并最终与约翰·A. 麦克唐纳联手。麦克唐纳与卡蒂埃，或者说，卡蒂埃与麦克唐纳掌控着 19 世纪 50 年代末的政治。

19 世纪 50 年代的创新是关税与铁路。关税先被提及，不得不这样，原因是当时不完善的行政制度为自身找到了增加税收的最好、最可靠的方式。没有关税就没有政府这一说法可能稍有夸张，但相去不远。殖民地政治家观察南部发现，美国各州已经设法使税收充分发挥作用，结果明显十分繁荣。繁荣的秘诀何在？英国人已然废除了作为原则性的关税，英国也兴盛了。结果，英国人口得到了廉价的食物，英国工业得到了廉价的海外投入。这一结果令人满意，尤其对那些掌

202

① 根据《加拿大传记辞典》中的记载，他之后会笑着说自己在 1837 年是一个“叛乱者”。在 1838 年致德拉姆勋爵的一封信中，他声称只反对当地寡头政治，而不是英国王权。德拉姆不信任他，并把卡蒂埃的名字置于一份因叛国罪而受通缉的逃亡者的名单上。然而，卡蒂埃确实创作了一些伤感且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令人难忘的歌曲。

控大英帝国及其陆海军的政治家而言。难道英属殖民地就不能如法炮制吗?

殖民者并没有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问题。英国已经很繁荣，以自由贸易提升自身财富并用其工业产品主宰世界市场，这些对英国而言无可非议。英国已然拥有工业、产品与过剩的人口。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没有，其他国家亦然，例如普鲁士或美国。这些地区或国家在可以签署望眼欲穿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前，必须先达到英国的产品生产与繁荣程度。

针对为何自由贸易不适合作为发展中的经济体的政策，普鲁士的理论家和美国的实践者均对此做出解释。在可以与英国或其他任何更发达的经济体竞争前，民族工业需要时间发展成熟，只有到那个时候，自由贸易才成为可能（“新生工业”保护理论）。另一个理由建立在殖民地最近一次痛苦的经历之上，它太过于依赖单一的出口产品，将“大宗产品”小麦和木材出口到大不列颠。殖民地没有使其经济多样化，结果大不列颠取消关税优惠后，殖民地没有任何其他可依靠的自身优势。只有通过保护关税鼓励当地产品生产，才能保住未来殖民地人口的生计。

殖民地最初的想法是从依附一个合伙人转而依附另一个。如果英国削弱旧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那么后者为什么不能放弃与大不列颠的政治联姻呢?一股合并论的情绪蔓延在殖民地，尤其影响到了资产阶级。在蒙特利尔，托利党被英国政府激怒，同样被鲍德温和拉方丹的省府激怒，于是起草了一份“合并宣言”，要求与美国合并——以加入美国为代价进入其市场。

203

这次事件只是昙花一现，但危险如影随形，然而总督埃尔金伯爵使用某种技巧将其平息。19 世纪 50 年代初，殖民地重又繁荣起来，鼓舞殖民地的宣言和情绪也被遗忘。然而这是一个标志，即必须将殖民地经济置于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基础之上，并且，如果不能保证与英国的贸易，为什么不利用合并的平台寻求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呢?

这一次，埃尔金伯爵又起到关键作用。早在 1849 年，他就认为与

美国安全、优惠的贸易将削弱殖民者对政治的不满。矛盾的是，殖民地与大而繁荣的美国市场联系越密切，寻求与之合并将越发不可能。[①] 然而美国对此事无意，使得大英帝国在北美更加安全。由于额外所得，英国政府可以放心地减少部署在北美的“吞金”的卫戍部队，而殖民地居民可以专注于行省的发展和致富。

似乎为了要强调殖民地有多么昂贵，皇家海军奉命巡防新斯科舍海域以阻止美国渔船进犯或侵入传统的沿岸 3 英里（5 公里）主权界限以内。此举诱使新英格兰的捕鱼团体考虑妥协，使大西洋渔业成为美国与英属北美之间一项重大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在与美国谈判的贸易条约中，满足新英格兰的渔业利益虽然重要，但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宪法在关税与贸易上为国会保留了权力，而不是将其赋予行政机关；而是由后者处理外交事务。在美国政治中，关税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1833 年，南卡罗来纳州事实上对联邦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挑战，征收比本州政治家认为可取的更高的关税。 204

然而在美国，奴隶制这一更具危险性的政治话题代替了颇具争议的关税话题。奴隶制存在于南部 14 个州，被认为是经济社会的基础。英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已废除，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北部各州的奴隶制也已废除。[②] 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南北方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南方要求有足够的蓄奴州抵制北方废奴州的势力。[③]

当然，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定的首要问题是，条约将如何影响奴

① 总督埃尔金伯爵在 1848 年 5 月 23 日写的一封信中，向殖民地大臣格雷勋爵解释这一问题：“根据我的判断，这件事情的真实政策是——为君主的加拿大臣民得到自由进入美国的权利以及关于运费减少的所有利益，在圣劳伦斯河与海洋上的竞争将承担此运费…你之后必须依赖［加拿大臣民］对自己的体系的钟爱…说服其保持稳定，而且要抵制‘星条旗国家’的劝诱。”见埃尔金致格雷的信。Elgin to Grey，23 May 1848，in Sir Arthur Doughty，ed.，*The Elgin - Grey Papers*，vol. 1（Ottawa：King's Printer，1937），178.

② 上加拿大在 1793 年时已规定解放奴隶，尽管进展缓慢。1833 年，英国议会在整个帝国通过立法，终止奴隶制，并于 1834 年生效。

③ 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州在参议院都有平等的席位。1850 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之后，有 14 个废奴州和 14 个蓄奴州。

隶制这一重大问题以及美国的政治平衡。对于北方各州而言，与英属殖民地确立贸易协定的吸引力除了经济成果之外，还在于它将有助于把殖民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星条旗将随美国贸易进入北方。如果这意味着纳入 3 或 4 个新州，那么将足以扭转局势。

对于南方各州而言，观点恰恰相反。如果英属美洲人在经济上依然孤立、不满，他们将被诱使摆脱大英帝国并寻求准许并入美国。另一方面，如果英属美洲人不加入美国而能保持繁荣，那么他们将依然分离、独立，因此也就挫败了北方大多数废奴州的梦想。

原则（即使矛盾的原则）是一回事，策略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的行政机构弱小，几乎持漠然态度，但掌握贸易的权力并不在此。加拿大人被迫同行政机构共同努力并集中精力说服立法机构。而加拿大政府深知，赢得美国国会支持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加拿大人勇敢地肩负起这一重担，雇佣“国会代理人”，并派内阁大臣，甚至是埃尔金伯爵到华盛顿，借助香槟、威士忌和雪茄来游说其政治家。[①] 这是加拿大谈判专家第一次参与到美国的政治中，当然不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加拿大人旗开得胜。

205

这一成就实属难得。1854 年的《互惠条约》（*Reciprocity Treaty of* 1854）是 1789—1934 年间美国批准签署的仅有的 3 个贸易条约之一。该条约涉及贸易、航运和渔业。其中列举的一系列天然产品可以免税——之后被称作经济领域的自由贸易——进入双方市场。这些产品包括小麦、煤炭、木材和“未加工的”原木。美国人确保可以到达圣劳伦斯河的运河以及大西洋沿岸诸省的渔场。[②] 同时，殖民地居民可以在北纬 36°以北的美国水域捕鱼，可以在密歇根湖航行。该条约将

---

① 一位有经验的美国人的来信表明了或许是预料之中的事。“不少于 5 万美元花在设法使建立一艘蒸汽船的法案通过上面，”加拿大政府在 1850 年 12 月得到通知。在总督埃尔金伯爵致殖民地大臣格雷勋爵的机密附件中，1850 年 12 月 4 日，见 Sir Arthur Doughty, ed. *Elgin – Grey Papers*, vol. 3, 752。另见 Alfred Eckes, *Opening America's Market*: *US Foreign Trade Policy since* 1776（Chapter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67 页。

② 可以发展渔业是指在海岸捕鱼和晒鱼。英国渔业在第 1 章中有介绍，美国渔业在第 2 章中有介绍。

维持10年，之后，提前一年终止。

《互惠条约》的运行适逢经济繁荣期，因此条约的积极成效由于经济的繁荣成果而得到巩固。1857年的急剧萧条对加拿大和美国都产生了影响，但之后爆发的美国内战确保了殖民地的市场，为与南方交战的北方提供工业及军事需要。

政治与发展

1820年后，美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加拿大。高速公路、运河和铁路从美国西部修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之后穿越大草原和群山到达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淘金热诱使移民前往。除了定居者，北部边境还有商业活动。当时美国正在发展，遥远的州际之间的交流相对困难，商业活动受到这一情况的鼓励。北部边境的商人可以更加简便、容易地从加拿大或新不伦瑞克得到商品，而不是威斯康星州和密苏里州；反之亦然。然而跟美国与大不列颠的贸易相比，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相对来说是地方性的，而且是次要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不列颠一直是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206

在美国人心中，加拿大逐渐成为一潭死水。法属加拿大的发展尽管确实落后，但具有一种外来事物的奇异特点。另一方面，英属加拿大与美国人所熟悉的更为接近。跨越边境的旅行者评论说，很难分清他们位于哪一个国家。熟悉的事物并不危险，也不令人恐慌。

令人恐慌的是奴隶制。英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出逃的奴隶借助统称为“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成员的帮助，到达加拿大。一旦踏上英属殖民地，他们便获得自由，也免于合法引渡。[①] 可能最终有30 000名之前是奴隶的人到达那里，大部分定居在加拿大。

他们并不是很受欢迎。一方面，加拿大有大量反奴隶制的团体，

① 根据1842年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可以将人从一国引渡到另一国受审，只要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在两个国家都是常见的。奴隶制只存在于一个国家，即美国，因此该条约不能用来将奴隶从加拿大驱除，再回到他们的美国奴隶主手中。

愿意支持从美国来的难民；但另一方面，许多加拿大人害怕他们不了解或不能接受另一种肤色的人。[①] 由此产生的种族偏见使黑奴如同在美国北方一样被边缘化了。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走向分裂，许多加拿大人发现，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都卷入其中。尽管加拿大有自己的理由关注此事，但极端的美国政治在遥远的加拿大找到共鸣，这不是最后一次。如往常一样，经济状况赫然显露：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繁荣直至1857年的崩溃。经济繁荣促使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与新斯科舍的政治家坚决支持铁路建设。在加拿大，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之一大干线（Grand Trunk）最终从圣劳伦斯湾的沿岸低地一直延伸至底特律河及其以外的地方。除铁路里程之外，还有政府对铁路投资者的全程担保。没有这些，加拿大的铁路毫无疑问将是纸上谈兵。大干线造就了那个时代的工程奇迹之一维多利亚大桥。该桥位于蒙特利尔，横跨圣劳伦斯河，于1859年通车。

可以确信的是，大干线这一功绩耗资巨大。修建完工的唯一途径是过多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加拿大省的经费。[②] 加拿大政府可以因完成工作赢得声誉，但它也为被感知的行为与罪行首当其冲地受到指责，这些罪行是由之后成为行省最大、最引人注意的公司带来的。这家公司不属于加拿大所有，而属于英国。如果加拿大人抱怨英国的投资人，投资人便抱怨加拿大人。“此事对我而言，已然很清晰，”一位投资人写到，“殖民地从［铁路］线路得到的实惠似乎比股东能得到的要多。”[③]

大干线与大西线（Great Western）这样的平行线路在设计时只是为了部分满足英属殖民地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被设计用来接近美国中西部的商业，就这一点而论，殖民地的铁路成为北美更大的铁

207

---

①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175 - 176.

② G. R. Stevens,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46 - 47.

③ E. G. Hornby，在 Stevens,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48 页中有引用。

路网的一部分，使英属北美与毗邻的美国融为一体。毫无疑问，当经济衰退袭击美国时，如 1857 年的情形一样会同样影响到英属殖民地。

1857 年的经济崩溃削减了加拿大省的财源，使数千名个人投资者破产。房地产价值暴跌，办理过多抵押贷款的银行遭到破坏。（上加拿大银行由于投入的抵押贷款太多，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终破产；蒙特利尔银行没有过多投入，得以幸存并繁荣起来。）但政府不得不坚持下去，因为运河与铁路的运营费用须由政府支付。而政府不情愿地进行征税。在加拿大，税收指关税。

关税涨幅很高，引起了英国出口商的注意。他们抱怨自己的商品被殖民地市场渐渐排除在外。于是发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殖民地竟然令来自宗主国的进口商品受损？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加拿大政府回复道，除非英国纳税人愿意为加拿大政府纳税，否则他们最好不要干涉加拿大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增加税收。英国平静了下来。更意想不到的是，加拿大，最终还有其他所有殖民地跳过了法律上的障碍。（自治殖民地目前包括纽芬兰，它于 1855 年成立责任政府。）关于税收与贸易事务，当前的殖民地自治政府本质上不受任何限制。 208

在一些花费高的事务上，殖民地继续依赖大不列颠，最显著的是防御。进行防御的骨干力量是皇家海军，基地位于大西洋上的哈利法克斯。[太平洋基地位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1865 年才移至温哥华岛的埃斯奎莫尔特（Esquimalt）。] 19 世纪 50 年代，地方没有动乱需要镇压，北美也没有向英国求助增援。然而加拿大人的确以个人方式加入到帝国的战争中。例如，1854—1856 年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 1857 年的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①

南北战争

俄国人和印度人都不可能或者说事实上没有能力进攻英属美洲殖

---

① 两名加拿大人获得了新设立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帝国对勇敢行为的最高奖励，一枚是 1854 年在巴拉克拉法（Balaclava）（以轻骑兵进击著称的一场战役）获得的，另一枚是 1857 年在勒克瑙（Lucknow）获得的。

民地。唯有美国人可以做到。由于美国处于内战边缘，北方的一些人动了吞并加拿大省的念头，或可用来补偿南方脱离带来的损失，或可作为联合分裂的美国的最后手段抵御南方。[①]

南北战争于1861年4月爆发，持续4年之久。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领导下的北方起初是为维持美国的统一和阻止分裂而战，而南方是为独立和保留奴隶制而战。最终，在1863年，废奴成为北方的战争目标。因此，1865年北方的胜利使南方的"特别制度"终止。

南方自身几乎没有希望打败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的北方。因此南方的策略是谋取外援，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支持。英国政府认为南方是"好战的"一方，此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正中南方下怀；逻辑上的第 209 2步是认为南方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使内战升级为国际冲突——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样。

北方憎恨英国的态度。这种憎恨在1861年秋的一次事件中体现出来，一艘来自北方的船只拦截了英国的"特伦特"号，此船载有南方的"外交官"，正驶往欧洲。这一事件侵犯了英国的权利，尽管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也做过此类事。英国政府要求释放这些南方人，北方如果拒绝，真正的危险将来临。汽船载着11 000名增援部队离开英国港口去增援英属北美的卫戍部队。一段时期，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好在冷静占据上风，南方人被释放，因此战争并未爆发。与此同时，加拿大省也欣赏到了英军不同寻常的风采。殖民地社会欢迎年轻、极具资历的英国军官，并且殖民地经济欢迎他们的消费。英国财政部对此感到不满。将军队置于北美的开销昂贵而且似乎在军事上又徒劳无功。从芬迪湾到休伦湖，军队沿2 400公里长的边境部署，可以被任何一支大规模、领导有方的美国军队切断并消灭。更糟的是，殖民地对其自身防御不能达成一致，一旦开战，这种情况可能使英军在很

---

①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177. 一位社论撰写人将英裔美国人描述成"吃苦耐劳、节俭，与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盎格鲁－凯尔特人同种"。这事实上是理想的美国人。

大程度上得不到支持。渐渐地，看来殖民地最好、最廉价的防御方式是维持与美国的和平关系。英国当然也想如此。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指责防卫加拿大的代价。他指出，“在殖民地维持军队，而殖民地甚至不允许我们对其控制”这一“异常现象”。①

由于南方的目标在1863年后受挫，位于殖民地的南方特工采取极端措施煽动战争，这绝不符合殖民地的利益。他们筹划了几次从殖民地到美国领土上的劫掠并取得胜利，但确定无疑的是北方的回应将比1861年时更强硬。对过境游客的护照加强控制，这令游览多伦多、圣约翰或哈利法克斯的无防备的美国人陷于困境。《互惠条约》在1865年3月被声明无效并于一年后的1866年3月17日失效。条约的终止很容易被归结为美国对边境事态的愤怒，但很可能更多地归因于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其制成品关税不断增长的厌恶。互惠并未通向经济的联合，合并还更遥远。互惠没有得到政治利益，经济收益没能超过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接下来的70年中，将不会有另一个这样的贸易协定。 210

还有一次穿越边境的事件。北方军队的许多士兵是近期从爱尔兰到达此地的移民。他们渴望在革命的芬尼兄弟会（Fenian Brotherhood）的领导下争取爱尔兰独立。芬尼会员提出袭击大不列颠，但不是在遥远的爱尔兰，而是在毗邻的英属殖民地。这无疑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警觉，于是不得不调动他们自己的军队对芬尼兄弟会的威胁予以反击。

芬尼兄弟会确实在不断地侵袭，特别是1866年4月在新不伦瑞克边界的侵袭，之后于6月穿过尼亚加拉河。美国政府并不支持他们，而是没收其武器并切断其供给。芬尼兄弟会的威胁终于平息，但这对殖民者而言是一次昂贵的教训，他们不得不第一次郑重其事地为自身防御支付费用。有钱能使鬼推磨，具体到这个事件，它告诉殖民者要保护英属殖民地及其代价。

---

① Disraeli to Prime Minister Lord Derby，30 September 1866，在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294页中有引用。

联邦

多年以来，英国官员和殖民地官员一直在考虑统一殖民地的可行性。每个殖民地都实行自治，都有一套独立的，与其他殖民地互不相干的政治制度。双方官员一直在不断讨论这一可行性，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时机才成熟。

211 统一背后的动力是加拿大省西部地区的不满情绪，此地区指之前的上加拿大，有时称为加西。大多数上加拿大人讲英语，占绝对优势，超过下加拿大讲法语的人数，但被宣布在立法机构占相等席位，因此上加拿大多数人不断要求"按人口确定席位"，或"rep by pop"。下加拿大人自然抵制任何变化来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或降低他们对讲法语的这一大团体的控制力。加拿大立法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因为没有党派或党派联合——有4个，双方各两个能够掌控稳定的多数。

最终在1864年6月，4个党派中3个党派的领袖乔治·布朗（自由党）、约翰·A. 麦克唐纳（保守党）与乔治－艾蒂安·卡蒂埃（保守党）同意形成一个联合政府，目标是寻求建立一个联邦。下加拿大保守党对重新恢复他们在上、下加拿大统一时于1840年失去的自治权感兴趣，证明了他们与上加拿大自由党有类似的兴趣。上、下加拿大将被分开，但也将被合并到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如果可能的话，这一更大的统一体将包括大西洋殖民地。碰巧，3个沿海行省，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与爱德华太子岛正在酝酿一次会议，讨论沿海的统一。加拿大政府获悉此事后，宣布他们也愿意参加。

结果，来自4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864年9月初齐聚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统一殖民地的想法被证明极具吸引力，于是决定10月10日在魁北克城再度聚首。魁北克会议包括纽芬兰和原来夏洛特敦的4个殖民地。这次会议又一次取得高度一致，致使会议产生72条决议，概括了殖民地联邦如何统治。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殖民地结成联邦这一主要议题上并

未发生争执。权力分配使被提议的中央政府拥有比省大得多的权力，212 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严重分歧。将产生 6 个行省：4 个大西洋殖民地，重新分割的上、下加拿大行省——安大略与魁北克。对新联邦议会的构成以及两个议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特征有进一步的讨论，持续时间更长。但将有一个单独的实体代表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被称为加拿大。渥太华将成为新的加拿大首府，雄伟的议会大厦正在渥太华修建，及时迎接新加拿大议会。这次会议在 10 月末休会，将结论提交给几个殖民地的立法机构。

新“联邦”提案的进程并不顺利。随着反联邦情绪的增长，纽芬兰犹豫不决并继续如此。最终它还是置身事外，直到 1949 年仍是如此。塞缪尔·伦纳德·蒂利（Samuel Leonard Tilley）领导的新不伦瑞克政府举行了投票，被反联邦政府彻底击败。查尔斯·塔珀（Charles Tupper）领导的新斯科舍政府没有必要冒险选举，因为在一年前，即 1863 年已经选举过；因此塔珀使提案在立法机构获得通过，即使明显有大量的反对人数，后来估计有 65% 的人口反对。所以塔珀要做的是坚持下去，直到联邦成为现实，这里指伦敦的帝国议会使之通过。在爱德华太子岛，当地的武装力量非常强大。此岛屿非常小，在像“加拿大”这样地域宽广、人口众多的联邦将被吞没和忽略。1865 年之前，联邦陷于沿海行省的困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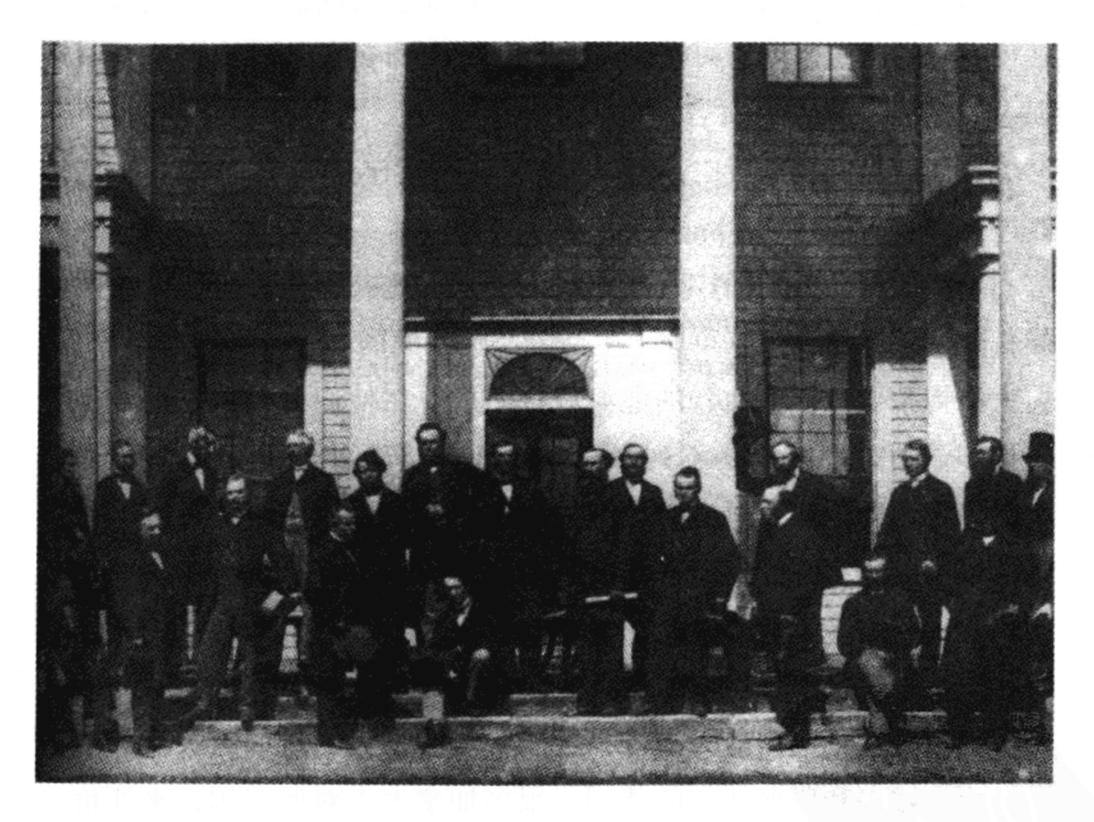
对联邦提案的最大支持来自加拿大省，但即使在那里，事实上有多少支持率仍具争议，尤其是在下加拿大。在加拿大，地方自由党被称作“Rouges”或“红党分子”，谴责联邦是一个骗局。卡蒂埃的保守党，或称为“Bleus”（“蓝党分子”），辩论说联邦对法裔加 213 拿大人而言是一个胜利，因为它最终给予了他们一席之地，即未来的魁北克省。在那里，他们将是无可争议的多数。红党分子回复道确实如此，但政府对铁路、电报、邮局、贸易和税收的权力属于新的联邦政府。

按预期的运作，“加拿大”必须至少包括大陆殖民地，因此关键是新不伦瑞克。幸运的是，这一行省的反联邦政府于 1866 年解体，将

被坚定的蒂利领导下的亲联邦政府取代。芬尼兄弟会在边境制造的激烈混战是有用的，鼓舞了与帝国和其他殖民地团结一致的情感，这种情感有助于新不伦瑞克的防御。

行动现在移至伦敦，在殖民地代表的协助下，帝国政府起草了一份法案，使 1864 年魁北克会议上的 72 条决议生效，创建了加拿大自治领。最后的法案于 1867 年 3 月 29 日在议会上通过，称为《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于当年 7 月 1 日生效。

第九章　扩张与失望（1867—1896）



夏洛特敦会议成员合影，留下永恒瞬间：查尔斯·塔珀，新斯科舍（上排，左三）；托马斯·达西·麦吉（上排，左七）；乔治－艾蒂安·卡蒂埃（麦吉前）；约翰·A. 麦克唐纳（坐中）；约翰·汉密尔顿·格雷，爱德华太子岛（麦克唐纳右二）；塞缪尔·伦纳德·蒂利，新不伦瑞克（第三柱前）；乔治·布朗（最右）。

217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辜负了其创始人的一片希望。他们预想了一个处处繁盛且横贯大陆的广大区域并在人口上与美国匹敌。他们并非大错特错。1896年，加拿大自治领成为世界第三大政治实体，占地逾77 000 000公顷，仅次于俄国和中国。1870年，它买下哈得逊湾公司的所有土地，领土延伸至大草原；1871年，增加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延伸至太平洋沿岸；1873年，当爱德华太子岛最终加入的时候，一并将大西洋沿岸地区也收入囊中。1880年，英国政府将大片空旷的北极群岛区（Arctic Archipelago）让与加拿大，使自治领名义上的司法权一路向北直到北极。

然而，人口仍然稀少。这个事实首先令爱国的加拿大人困惑、窘迫，随即引起了怨恨。与美国相差无几且横贯大陆的领地的取得，加之较完善的英国制度与可以和美国媲美的人口数量，看上去符合区域强大的标准。就人口而言，3000万、4000万、1亿都是合理的数字，至少合理得足以在这段时期的跌宕起伏中未引起严重的冲突，平稳地渡过。

现实却有几分不同。西部地区无疑是首先获得的。当得到它的时候，附带条件出现了。草原上生活着心怀不满的当地人，由印第安人、白人与梅蒂人，即前两者的混血后代组成。在他们被统治之前，需要218　安抚和资助。再向西是不列颠哥伦比亚，1871年它开始依附于加拿大，因为后者承诺修建横跨大洲的铁路，但是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且旷日持久。由于19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的低迷，用于修路的资金比预想的少。较之于预期的情况，区域建设成为更加沉重的负担，而且经济状况不景气且前景黯淡的地区，很难吸引移民前来。

加拿大被判定为低人一等，这通常与它强大的近邻有关。加拿大人钦佩、嫉妒和厌恶他们的邻国。很多加拿大人对照美国，来评价自己的地位并妄下结论。美国的繁荣是一种自我宣传且太过兴旺以至于

在 1867—1896 年间，2 000 000 名加拿大人向南和向西出发，去往别处。[①] 移民到来，虽然得到很少的机会，也比在加拿大时多——但不曾足够。

大批加拿大人的迁出掩饰了人口的另一趋势：加拿大人能活得更长了，城市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在延长，不仅反映医疗的进步，还有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纪末时，女人的比例比世纪初时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更安全的分娩。生活水平的提高吸引人们从乡村搬到城镇或为数不多的大城市。

即使加拿大人口稀少，迁出者多于迁入者，它仍被分化。按种族分化，分成土著人、半土著，如混血儿和大多数白人；按语言，仍分为土著和白人，还有讲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按宗教，分为天主教和新教，还有不同的新教宗派；地理上，分为穷乡僻壤和丰腴之地；最终在机构上，分为加拿大联邦体制中政府的不同等级，即自治领和行省。

也有令其统一的因素。加拿大的英国身份唤起了不同程度的激情，但是极少有抱怨帝国和它的一切主张的情绪。它的政治，特别是政党制度，基于整个加拿大被组织起来。对党派的忠诚包括宗教、地区和语言的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发现，有时赢得利益不分边界，经济优势应运而生。存在大型的公司，特别是铁路，还有银行、制造商和零售商，它们雇佣整个地区内数以千计的人供职于不同等级且管理有序的公司。科技通过铁路和电报将加拿大东西两边连接起来。19 世纪 80 年代及此后，这一点通过电话和电力实现。

219

最后，19 世纪后期，政府在扩张。有时，政府通过代理行事——如政府银行家、蒙特利尔银行或由政府资助的铁路公司。有时，政府代表利益方进行竞争或试图垄断回报和其他特许权。

政府首脑由那些政治家担纲，其中最成功的是约翰·A. 麦克唐纳

① 那段时期，穿越未设防的加美边界的移民没有完全精确的数字；200 万是一个估计值，引自 David Corbett，*Canada's Immigration Policy*：*A Critiqu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121 页。

爵士。作为自由－保守党任期的领导人，他于1867年7月1日出任总理。麦克唐纳非常有能力，以至于在此后的24年中，有19年担任总理一职；他是大多数加拿大成功政治家效仿的榜样。麦克唐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的一些同僚，如伦纳德·蒂利爵士、乔治－艾蒂安·卡蒂埃爵士和查尔斯·塔珀爵士都是前省总理。麦克唐纳的才能将他与他的党派用忠诚联系在一起，因为正如他和他的追随者知晓的那样，在党派中，政治忠诚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加拿大分三级统治：行省，处理地方事务；联邦，政府总部设在渥太华；帝国，位于伦敦。伦敦政府并不总是直接处理加拿大事务，虽然如此，加拿大人依赖于它给予的身份和支持。米字旗在加拿大土地上自豪地飘动。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星罗棋布。在大城市里，女王的雕像就是她有形的存在。但是对于加拿大人而言，女王和她的君主政体所带来的主要收益是心理上的。成为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意味着身份、传统和稳定，至少是因为这些，加拿大人没有选择移民美国去收获共和政体下的繁荣。

220

加拿大在一方面是幸运的：没有来自外部的攻击。美国人正忙于自身的发展，无暇理会北方的殖民地，与其几无差别，但竟分处两国。加拿大人与美国人分享着地理隔离的益处，这份隔离被由于欧洲干预而派来的皇家海军保护——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有组织的侵略。因此国防的需要变得微乎其微。加拿大的国防机构，正如它现在的情况，主要是个社交俱乐部，为身着亮色制服且看上去英勇强悍的加拿大男性提供的场合。在加拿大存在的前30年里，军队面对真正敌人的情况只有两次，都是发生在遥远的西部。

里埃尔与铁路

直到1869年，英国的领地在北美的最大一处为鲁珀特地区（Rupert's Land），它是哈得逊湾公司的私产。公司的规定对于鲁珀特地区的居民来说并不苛刻。即使不苛刻，对于公司和住在西部的臣民来说规定也太多了。当加拿大政府访问位于伦敦的公司总部时，带着

一份帝国贷款保证并发现了潜在的卖家。为了300 000英镑、西部要塞附近的土地和西部估计可耕作土地面积的5%（约合2 800 000公顷），公司让渡了390 000 000公顷的土地。土地的转让从1869年12月1日起生效。

在渥太华，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的政府非常高兴。他指派了一个副总督管理鲁珀特地区，并派遣他经由明尼苏达（最近的铁路线在那）到达红河河畔，该地区仅有的大块定居地即位于此处。

居住在红河河畔的居民另有打算。在一位风华正茂且魅力超凡的人物路易斯·里埃尔（Louis Riel）的领导下，一些当地人在允许外来的加拿大人接管他们及其土地和财产之前索要承诺并提出附加条件。里埃尔的追随者是梅蒂人和白人——他自己也是梅蒂人——但是这次事件通常被称为里埃尔叛乱，载入史册时被说成主要是由里埃尔挑起的事端。

221

红河边住着很多加拿大人，他们大多来自安大略。他们胆大但却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期望控制加拿大，并推翻里埃尔，但自己却被打倒。这是非常愚蠢且没有意义的行为，因为19世纪70年代早期，平息红河问题的谈判正在顺利进行。里埃尔接下来的做法非常愚蠢。他命令行刑队处死了加拿大一方最易起事的年青人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我们必须得到加拿大的尊敬，”里埃尔热忱地解释道，但是他已然选择了错误的姿态。拿起武器但不见血光的叛乱是一回事，处死斯科特又是另外一回事。

斯科特不合时宜的死惊醒了安大略的牛鬼蛇神。作为一个英国人、新教徒和橙带党人，他可以被塑造成一个英烈，至少被封为反抗法国和天主教徒里埃尔的英国新教烈士。[①] 由帝国和殖民地军队共同组成的远征队在英国军官加尼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上校的率

---

① 根据《加拿大传记辞典》的记载，斯科特（Scott）是一个北爱尔兰人，一个不折不扣的橙带党员。橙带党请求麦克唐纳“为他的死报仇”，麦克唐纳并不是残忍的人，但他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顺从。在这起事件中，直到1885年，麦克唐纳尽力控制而不是消灭里埃尔。

领下，整装待发。里埃尔已经为远征加拿大准备了战斗口号。但沃尔斯利从加拿大中部启程，乘坐蒸汽船和独木舟经过长时间旅程——乔治亚湾的北或西面不通火车，并于1870年8月到达位于红河畔的旧哈得逊湾要塞时，里埃尔已经逃之夭夭，溜到美国。

红河叛乱（Red River Rebellion）令马尼托巴（Manitoba）省形成，成为麦克唐纳草率处理红河居民举措的一部分。［起初，它只是温尼伯湖（Lake Winnipeg）南岸的小块长方形土地。］如加拿大其他行省一样，马尼托巴拥有政府和自治的指定立法机构，该机构是地方政治和尊严的象征。不像其他先前就存在的行省，马尼托巴完全依赖自治领政府的资助。就麦克唐纳而言，政府给了他某种公共事业。因此，马尼托巴成为加拿大的第5个省。

222 作为总理，麦克唐纳的麻烦够多了。他必须成立机构来配合加拿大横贯大洲的愿望，而且他先前的努力已付诸东流。迫于银行政策，两位财政部长辞职；只有第3位——弗朗西斯·欣克斯成功地通过了银行法，虽然不太明显，但此法有助于蒙特利尔银行和蒙特利尔的金融界凌驾于其他地区的金融中心之上，如哈利法克斯和多伦多。

政府需要资金。它在财政、关税的范围内极尽所能征税，但想要完成需要做的事情，必须举债。领土的扩张耗资巨大：购买鲁珀特地区需要成本，此后还有不列颠哥伦比亚。1871年，加拿大承诺横贯大洲铁路与地区剩下的部分连接起来，于是不列颠哥伦比亚被引诱加入了加拿大。麦克唐纳承诺10年内修建一条铁路，这使不列颠哥伦比亚人起初既惊讶，又开心。他们知道，其实麦克唐纳也知道，修建铁路会耗费巨款。地广人稀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成为加拿大的第6个省。

接下来是爱德华太子岛。19世纪70年代，该地拥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几倍的人口，外加一个渔场和一条铁路。岛上居民担负不起铁路，便开始考虑其他方法为其埋单。或许加拿大没有那么多资金，但是总会多于该岛，而且沐浴在帝国的恩泽之下。1873年，爱德华太子岛加入加拿大，成为第7个省。

麦克唐纳获得了一个属国的基本部分。目前他必须将各部分结合

起来。他并不期待太多来自外部的帮助，如英国政府。它由很有经济头脑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把持，不希望被提醒加拿大已经花费了多少。作为他的部分经济规划，格莱斯顿从加拿大撤回了剩下的两支驻军，仅在哈利法克斯和位于温哥华岛的埃斯奎莫尔特留下两个残存的海军基地。必须承认的是，大不列颠成功组织加拿大陆上防御的前景非常渺茫。

223

然而，大不列颠保留了国防和外交的责任。作为前者的标志，一位英国军官统率加拿大民团和规模很小的常备军。虽然加拿大不控制自己的外交关系，但是加拿大的心志仍能被帝国听到。因此英国政府委派麦克唐纳作为3位行政长官之一，出访华盛顿，去解决英美外交上的显著问题。多数问题都出于美国对英国的不满，而且在美国内战时表现出来。

这种不满非常真实。英国人允许南方邦联建造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如英国船坞中的阿拉巴马号。对圣阿尔班（St. Alban）的袭击发生在1864年，还有其他同时发生的跨边界掠夺事件。另一方面，芬尼亚组织入侵加拿大，这被证明是美国官方的疏忽。美国人抱怨加拿大的渔业政策限制美国鱼船进入加拿大水域，而加拿大人则希望《互惠条约》得以恢复。事实上，麦克唐纳希望以允许美国人进入加拿大渔业为诱饵，引诱其恢复互惠。来自马萨诸塞的共和党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并非正式地提议所有的争端都一并通过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解决，那就是将加拿大拱手送给美国，使美国取消对大不列颠的索赔。

事情不可能这样进行，互惠也不会如此进行。英国反而为阿拉巴马号和相关要求慷慨耗资，而美国租来10年可以进入加拿大渔场的权利，代价将通过仲裁的方式决定。芬尼亚的损失被忽略不计。所有的这些被概括在签署于华盛顿的条约中。

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对麦克唐纳的影响。英国人牺牲加拿大的利益来满足与美国重建和平、保持和谐这样更大的目标已成事实，这一事实令麦克唐纳很厌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3方参与协商，但由势

力更为强大的两方决定结果。加拿大的角色不是障碍。

224 这个教训证明了日不落帝国不是一个会提供平等机会的联盟。像加拿大这样的殖民地可能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但也绝对不可能与大不列颠平起平坐。殖民地的要求可能被考虑，或甚至被英国大臣满足，但是从内容、紧迫性和重要性上都无法与深思熟虑的英国利益相提并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美国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恶化且协商无法解决重大的问题，那么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加拿大的利益就得遭殃。[①]

如果是加拿大，能凭自己赢得更好的协商结果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麦克唐纳很可能知晓的那样，是否定的，而且如果像萨姆纳提出的半认真的提议那样，即加拿大被吞并，那么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对有限问题的讨论。美国人也许不喜欢在大英帝国所看到的，但是该帝国是个非常强大的实体，一些事情必须被考虑。[②] 加拿大却不是。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麦克唐纳都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想法，即如果加拿大存在未来的话，他需要英国为这份未来提供资金。他需要资金修建连接魁北克与哈利法克斯且来往于殖民地间的铁路（Intercolonial Railway），还需要资金修建通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铁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868 年，美国用它的财富和资源恰好完成到达加利福尼亚的铁轨，穿越了并非复杂的地形。

1876 年，连通各殖民地的铁路终于竣工，仅此一项耗资 21 000 000美元，全部来源于借款，并且估计耗时为本该用时的 2 倍。总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Sir Sandford Fleming）将负责把该项目的经验用于麦克唐纳很有远见的项目——太平洋铁路的路线制定。[③] 麦克唐纳的朋友及政治同盟看上去得益于将资金用于政治敏感地区的经验。因此来往于殖民地间的铁路，在形而上学和实证的双重意义上成功地将分散的各殖民地连接起来。

---

①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17 页中指出“在北美洲，加拿大成为英国人行为的人质。”

② 在美国，对于大不列颠的态度是复杂的，而且远非统一，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

③ Stevens,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94.

修建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耗时更长，当然需要更多的资金。金钱的气息吸引了铁路鼓动家，例如蒙特利尔的造船业巨头休·艾伦爵士（Sir Hugh Allan）。艾伦认为，主管铁路企业的前景非常可观，以至于在1872年的联邦选举中能为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慷慨解囊。明白艾伦兴趣所在的约翰爵士随 225 意利用他。麦克唐纳曾发过一封电报，内容为“我必须再得到1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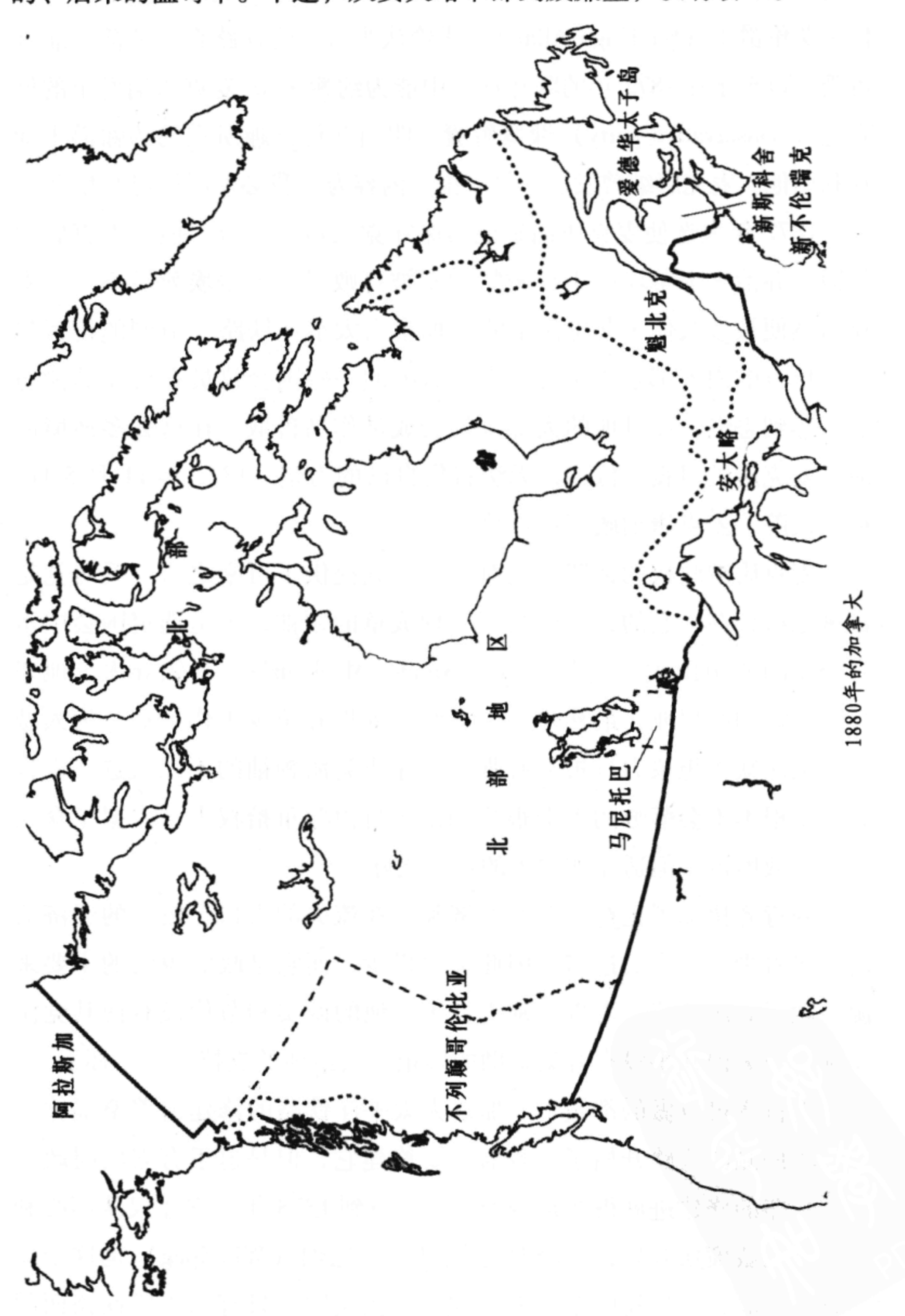
1872年大选使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人再度执政，但是麦克唐纳的盟友乔治·卡蒂埃爵士在蒙特利尔被打败了。卡蒂埃死后不久，麦克唐纳便被涉及休·艾伦爵士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丑闻的传言包围。传言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麦克唐纳的一些国会议员在公众的愤怒之下感到恐惧，而且他的大部分议会成员作鸟兽散。在这么多逆境面前，麦克唐纳沮丧、低迷，无法召集自己的力量。1873年11月5日，在众议院，麦克唐纳政府被打败。

麦克唐纳政权的瓦解为反对党自由党提供了可乘之机。反对党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没有顺理成章的领袖，于是选定国会中富有经验的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为领导人，他来自安大略的萨尼亚，最初是一位石匠。麦肯齐至少工作勤奋，为人诚实，虽然缺乏想象力且报复心强——并非党派领袖的不二人选。麦肯齐甚至根本不会落败的大选很快到来。自由党重拾权力，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但适逢加拿大的萧条之际。

麦肯齐执掌了正在萎缩的经济和正在流失的人口。较少的经济活动意味着少之又少的进口，因此关税极少，而它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除了开源节流，麦肯齐别无良策。他的诚实和节俭没有使其党派获利，因为他几乎没有筹集赞助的妙招，去给他的支持者分一杯羹。

麦肯齐可以做的都做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沿着桑福德·弗莱明勘测的线路开始了。政府将要修建它，但是迫于有限的财政资源，铁路的修建进展得非常缓慢，所以直到1878年，它才仅从苏必利尔湖畔的威廉堡开始，途经马尼托巴。温尼伯（Winnipeg）是这个新行省的首府，马尼托巴东起五大湖，南接美国。只有一小段铁路西起 227

弗莱明选定的终点，即位于太平洋上的巴拉德湾（Burrard Inlet）沿岸的、后来的温哥华。中途，从安大略中部到威廉堡，没有动工。



1880年的加拿大

自由党人同样处理西部事务，即越过面积极小的马尼托巴省。起初，加拿大的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的首府为贝福特，1882年后定为里贾纳。所有的问题都在渥太华处理——尤其是土地、定居点和自然资源。像东部行省一样，这里的土地被不受约束地给予那些能担负得起定居于此的人，而后进行耕作。但是从1881年的人口普查来看，只有很少的56 000人居住在该地区。

到1878年，自由党丧失了权力，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和保守党卷土重来。事实上，他们靠一家私人企业的巨款资助恢复了对铁路建设的把持。铁路必须被看作是加拿大的，政府的出资由于对民族情感的呼吁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条铁路全部位于加拿大，穿过安大略北部贫瘠多石的加拿大地盾。由乔治·斯蒂芬（George Stephen）和唐纳德·史密斯（Donald Smith）掌管的蒙特利尔资本家企业联合负责寻找必要的资金来源，并且在美国工程师威廉·范霍恩（William Van Horlle）的策划下，铁路的建设开始取得进展。政府提供了美国模式的诱因——5 000 000英亩（合2 020 000公顷）的土地和25 000 000美元的补贴，已存在的由国家修建的铁路（耗资约38 000 000美元）和南至美国的铁轨的垄断权。大草原的居民将付钱给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或是无所事事。

虽然政府出资慷慨，但仍不够。联合企业从可以发现资金的地方带回投资——在大不列颠，同时也在美国，这是一个不被政府和公司舆论强调的事实。工人被输入，在最西的地方工作——很多来自加拿大中部，一些来自欧洲，还有很多人，约15 000人来自中国。直到1885年初，落基山和北安大略之间只有数条铁路线未被连接上。

平定西部

228

铁路是需要的。因为那一年，路易斯·里埃尔沿着萨斯喀彻温河发起了新一轮的叛乱。1885年的里埃尔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他。阅历和厄运令里埃尔伤痕累累。更老成、更悲观的他确信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自己和他的人民，即梅蒂人捍卫正义，从更广意义上说，为

了生活在西部的人民。麦克唐纳对西部几乎漠不关心，仅派出总督和处理印第安事务的政府官员并用一支宪兵队镇守，即西北骑警（Northwest Mounted Police）［简称 NWMP，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简称 RCMP）的前身］。

政府与草原印第安人签署条约，使其让出土地，迁入政府支持的保留地。在近邻美国发生的印第安战争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抵抗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印第安人忍受的饥饿帮助了政府的政策：那些不倾向于迁往保留地的土著人发现如果想要养家糊口，舍此无他。

一小股居民从东部迁来，他们大多数来自安大略，其中很多留在了马尼托巴。梅蒂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已令人失望：毛皮贸易萎缩，野牛被杀光，定居者开始从事其他的事情，引入行事的新方法，政府也来治理他们。梅蒂人以向更西的地方迁移的方式作出回应，来到萨斯喀彻温河畔。在这里，他们也有白人邻居。这里的很多白人为被官方忽视和东部的剥削所遭受的损失感到不满：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渊源理应追溯至此。[①]

定居者心怀不满是肯定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吗？他们的问题大多与土地、土地普查和土地的名称有关。渥太华政府派人前去处理，但是因为很多原因——一些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回应得太慢、太晚。所以 1884 年夏，居住在萨斯喀彻温河北岸的共同体，包括当地居民和梅蒂人，邀请了流亡美国的路易斯·里埃尔返回加拿大。他们希望在处理与自治领政府争端的时候，即使里埃尔不代表他们，也可能提些建议。里埃尔接受了邀请。

229

里埃尔的计划当然与定居者不同。他正在寻求赔款和补偿，一些为自己，一些为他的人民——说法语的梅蒂人。他相信梅蒂人及印第安人是这片土地的继承人；但是不像印第安人那样，他们没有将祖传的遗产通过条约让与加拿大政府。在里埃尔的世界里，除了作为闯入

---

① Doug Owram, *Promise of Eden: The Canadian Expansionist Movement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176.

者，没有留给定居者的位置。事实上，政府确实有与他协商，而且很可能就沿萨斯喀彻温河畔梅蒂人对沿河区域的要求达成协议。但现实与里埃尔救世主似的热情产生了冲突。他视自己为先知和一种新宗教的组织者。在这个宗教里，他所崇拜的蒙特利尔主教会成为最有权威的教皇。

麦克唐纳看到了里埃尔的贪婪和其不道德的行为，而后者则看到了政府的拖沓和欺骗。当里埃尔发起武装叛乱后，麦克唐纳动员了8 000人的军队，派他们利用新建成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行。利用太平洋铁路行军并由哈得逊湾公司负责后勤，士兵们轻松地到达里埃尔位于巴托什的老巢，于1885年5月荡平乱党。一些叛乱的领导人落荒而逃，但是里埃尔向加拿大军队缴械投降。在他短暂的叛乱中，80人丧生。

里埃尔在里贾纳当地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并被判叛国罪。他的律师力劝法庭相信由于他的宗教妄想，被告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陪审团相信这起案件至少看似合理。然而，里埃尔迫切想要建立作为先知的威信，为个人的不满和受到不公的真实感受所激励。他极力令法庭相信自己确实思维清晰得足以被判叛国罪。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

1885年8月发生了一场持久且激烈的政治危机。里埃尔终究是法裔加拿大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叛乱的原因在魁北克已妇孺皆知。在那里，他成为少数人的权力被冷酷的多数人不公地践踏的象征。事实是这些多数人被激怒了，而且要求根据法律绞死里埃尔。来自魁北克的压力要求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饶里埃尔不死，但是安大略方面却要求行刑。 230

麦克唐纳不倾向于同情，但是也要完成对里埃尔的检查以得到他精神错乱的证据。两位医生，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被派到里贾纳对囚犯进行检查，但是他们两位却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报告。那时及此后，麦克唐纳将医学意见当成儿戏，误导了众议院并成功地把问题搅乱。杰出的加拿大历史学家 J. R. 米勒说过“麦克唐纳相信无论他的政府做什么，都会被某个团体诅咒。做会被诅咒，不做也会被诅咒，

既然都会被诅咒，那么他会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①] 1885年11月16日，里埃尔被绞死。直到最后，他仍坚信自己在死后的第3天会复活。

自从那时开始，关于里埃尔之死的是是非非在加拿大的历史中一直饱受争议。在魁北克仍郁积着怨恨。麦克唐纳的一些法裔加拿大人支持者（包括部长）试图为政府辩护，而其他人则谨慎地沉默着，希望雨过天晴。

另一方面，自由党在里埃尔风波的过程中找到了事儿做。自由党领导人爱德华·布莱克（Edward Black）质疑麦克唐纳政府的政治表现。一位魁北克自由党国会议员威尔弗雷德·劳里埃（Wilfrid Laurier）更为激进。他在蒙特利尔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称，如果他住在萨斯喀彻温河畔，也会肩扛步枪，与里埃尔并肩战斗。这并未帮助安大略的自由党，但是最终将给魁北克带来影响。

魁北克的保守党在处死里埃尔的余波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省内的保守党在188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由奥诺雷·默西埃（Honoré Mercier）领导的自由党（他们与以国党自居的一些前保守党人来往），而且联邦党在此后连续的两次大选，即1887年和1891年联邦大选中均处于劣势。然而，保守党人并没有彻底在省内销声匿迹，而且在其他地方，麦克唐纳的西部政策及其对待里埃尔的立场，都为其党派带来了好运气。

231

里埃尔变成了传奇人物。他是西部的象征、梅蒂人的英雄、法裔加拿大人的烈士和土著人的卫士。大概从1940年开始，加拿大西部的历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从正面的角度重新诠释了里埃尔。[②] 政治家们唤起了对他的回忆，这种回忆通常出于善意。一部歌剧详细描述了他。1999年，加拿大的众议院甚至进行辩论，并通过了一则法案，明确肯定了里埃尔起义的正义性。（但“路易·里埃尔法

---

① Miller,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187.

② 对里埃尔的历史评价最广为人知且最有影响力的是 George F. G. Stanley, *The Birth of Western Canada*（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0; original edition, 1936），但还有很多其他评价，既学术，又流行。

案”从未成为法典，在2000年大选进行时终止。）总督受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仪仗队的侧面攻击，他们身着梅蒂人的肩带，庄严地称颂了里埃尔，事实上是在承认里埃尔进入加拿大英雄的圣殿。就加拿大历史来说，里埃尔就是被塑造出来的烈士。

然而从里埃尔时期开始，西部便修建了不同的铁路线。当1885年梅蒂人拿起武器进行叛乱的时候，铁路线已成形。在西部，对野牛的猎杀和不尽的大草原已经消失，就这样，西部土著部落所从事的狩猎经济的基础就此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人仅占加拿大西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邻近的居民甚至想到了事后的补救之法，他们依附于这个社会，无力与之抗争，几乎也得不到正视。

定居者和他们的政府考虑的是小麦，还有定居活动和发展。安大略因小麦而繁荣，但从1860年开始，省内便没有产量高且可耕种的新土地了。西部的获得给了安大略人充满希望的理由：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会得到土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可以找到消费的市场。这是一个“伊甸园的承诺”。政府手册赞颂了西部的富饶——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和令人信服的农产资源。沿北纬49°纬线的半荒漠地区以它第一位勘探者的名字命名为“帕利泽三角（Palliser’s Triangle）”，这里也在纸上被划入富饶的园地。[①] 但是定居活动仍很缓慢且人烟稀少：到1886年，只有163 000人住在加拿的大草原上，包括马尼托巴先前的社区居民。完成于上一年秋天的铁路可以促进变化的发生，但却非常缓慢。

232

19世纪70年代，自治领政府作出实际行动，建立实验田系统来帮助农业的发展。在这项实验中，就小麦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草原上较短的生长期，而这里的霜降来得早，结束得晚。直到1903年，当生长期短的小麦得到培育的时候，解决方法才浮出水面。这种小麦被

① 1858—1859年，约翰·帕利泽（John Palliser）在加拿大南部草原上存活下来；同时他确定了适于开展畜牧业的土地。（相关信息可详见帕利泽所著《草原游猎记》——编者注）

称为侯爵小麦（Marquis Wheat），生长期短，在很大程度上与随后的小麦大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农业机械化在19世纪得到飞速发展——首先是钢犁，其次是机械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将种子或谷物与干草分开。机械的联合使用令大规模的农耕轻松完成，所需劳动力的密集度大大降低，所以支付的薪酬减少了。所有的这些都促进了定居活动的进行。

大多数的定居者都讲英语，但并不是全部。讲法语的人——其中的5 000人——从新英格兰来到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政府鼓励更多的人从新英格兰或魁北克前来，但皆为徒劳。）讲德语的人和反战的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从俄国来到马尼托巴，为能够在不被强制征兵的国家定居而欣喜。这种国籍的转化在马尼托巴最为明显。行省的人数从1871年的25 000人增长到1891年的152 000人。但是在马尼托巴，最初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人数相同、讲英语和讲法语的人数相同的均势变为19世纪90年代时新教徒与讲英语的人占压倒性的优势。

再向西，落基山的山麓丘陵上，经营大牧场的事业逐渐形成。虽然与边界南部的畜牧业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土地占有制是不同的，牧场主的社会构成也是不同的。（土地由政府出租，采用澳大利亚模式，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擅用土地的优先购买制。）[①] 牧场主利用新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来运输他们的牲口。1886年，第一批阿尔伯达（Alberta）牛肉到达英格兰。

铁路与国家政策

233 在境内，铁路将物资运给了西部的农场主，其中很多都是在加拿大生产的。作为修建铁路的部分代价，政府要确保它的垄断地位。目

① Graeme Wynn, "Realizing the Idea of Canada", in McIlwraith and Muller, *North America: Historical Geography*, 363.

前，面对没有事业发展的西部，这看上去是个上算的交易。此后，由于西部还有很多农场主选民，所以政府承受的政治代价是非常明了的事。马尼托巴的政治取决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铁路运输的垄断权。

但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只是连通西部的居民与加拿大中部和东部的一小部分。它与连接中部和东部的殖民地间铁路平行。由政府拥有且操控的殖民地间铁路为东部的政府支持者提供了奖赏和雇工，并加固了赞助结构，促进了19世纪后期以党派政治为特点的影响。[①] 更为明显的表现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主干道公路为执政党提供了资金，在野党可以将资金以优惠和贿赂的形式花销在自认为合适的地方。[②]

铁路不仅只穿越加拿大的荒原：人们为了促进商贸修建铁路，与19世纪80年代同时发展的电力相辅相成。蒸汽时代得到了电力时代的补充，而不是被取代。就加拿大中部而言，位于远处且开采成本颇高的煤炭被安大略和魁北克河流和瀑布所产生的水力代替。从18世纪起，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最显著的功能，即作为旅游胜地，最引人注目。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大瀑布成了别样的目的地，以拥有一处最大的水力发电厂著称。

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电力和丰富的水资源使伐木场和此后位于北方针叶林之中的化浆造纸厂成为可能。在铁路线外围进行爆破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萨德伯里（Sudbury）旁的镍，随后一处储备量巨大的镍矿被发现。

政府积极地干预经济。农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产业，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农业。联邦政府发展实验农场，促进农业 234

---

① 1873年，当爱德华太子岛加入加拿大的时候，它是属于殖民地间铁路的部分，同时必须被完成。后期加拿大全国铁路的历史学家称它为“从开始就很愚蠢的项目”且没有必要，使得海上运输投入使用，修建昂贵，执行起来具有破坏性，收益的每一美元值1.44美元。Stevens，*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98. 在殖民地间铁路执行的任免权和腐败中，史蒂文斯的形象非常鲜明。同上，99－105页。

② 这一现象被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描述，见他的 *The Race Question in Canada*，特别是第20章。该书1906年的第一版在法国出版，而且1907年被翻译，1966年以英语再版（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66）。

生产力，并将农业扩展到那些先前认为因为太冷或太热而不能耕种的地区。行省也涉足了教育领域。成立先于省联盟的联邦勘探队探测到了加拿大内陆的地形并出版了所发现的内容。政府资助铁路达成公众的意愿，修建运河和船坞并疏通河流和港口。

这点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与这时在美国发生的事也别无二致。这两处的科技发展也非常相似。例如，电力在加拿大出现的时间和其在美国第一次投入应用相差不过寥寥数年。电话——19 世纪 70 年代的另一项发明——事实上，由于它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两个国家均有住所，所以在两国均有发展。美国也资助铁路并涉足农场主和矿工的技术支持，在经济中实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这一点值得强调，考虑到后来在学者和理论家中形成的趋势，描述加拿大时，其君主立宪制的社会、以政府为主导的农耕型共同体与美国重视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共和政体间有本质不同。19 世纪，能支持这种分析的因素极少，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更少。

在两处均发生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科技经济依赖时间，包括及时的物资递送与人口运输。这意味着运输物资、人口或将贮备物装配为成品的公司必须讲信用且表现出色。铁路具有等级分明的组织、分部的管理和人数众多的劳动力，且具备典型的形式。保养车行道、确保发动机锅炉的水供应和火炉的煤供应，这些都需要体制。[①]

其他的公共事业也随之而来，组织进行为人所知且精准无误的日常事宜。在城市里，百货商店（Department Stores）取代了干货店、杂货店或毛皮贸易站。多伦多的伊顿购物中心（Eaton's）和辛普森百货商场（Simpsons）、蒙特利尔的摩根大通（Morgan's）和银壳开面怀表公司（Dupuis Frères），还有温哥华的哈得逊湾公司和伍德沃德

235

① 军事类比非常明显，而且军队确实是加拿大最大规模的组织，但他们具有受到工程训练的素质，而且还有铁路建筑和维护所需的专业工程师。见 Alfre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94 - 109。

（Woodward's）公司。大城市的中心出现了大型且引人注目的多层零售宫殿，顾客可以通过马拉的有轨电车和后来的电气车辆前往。但是销售规划的进步没有仅仅局限于城市，随着铁路可以可靠地运输物资和运送乘客，一些百货商店采用邮购的方式与大型存入仓库建立了目录销售业务。

电力使很多大型企业成为可能，扩展开来的市场使它们成为人们理想中的模样。19 世纪后期，脱浆造纸厂、化工厂和车辆厂也发展起来——这都取决于一点。到了 1910 年，安大略的工厂平均只雇佣不到 30 名员工。当然多于 19 世纪中叶的铁匠铺，或是 20 世纪末仍在乡村星罗棋布的水力面粉磨坊。[①] 除了在一些大型的城市，“管理者”或是职员，或是工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处于社会中等地位的阶级突然产生所仰赖的基础。在大多数的加拿大城镇，当地上流社会的掌权者包含神职人员、律师或二者兼有，医生和当地的银行分行经理（本身即为较大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或在魁北克还涉足法律兼银行业（或令二者完全交织）的公证人。

组织和等级制度也使暴政的实施有机可乘，将大多数的劳动力从企业主的直接管理甚或最高管理中移走。“中层管理者”出现了，监督着企业组织的所在部门或产业。而且随着很多工人受到监管和被付以报酬，他们发现共同利益并非难事，这种利益通过工会的发展被表现出来。

在 19 世纪后期的加拿大，工人和投资商是移动的，事实上既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资本被限制在自治领北部。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时起步的加拿大工会，情况亦然。工人们不断转移至工作的所在地，自由地穿越边界，去往美国。他们来到遥远的城市，渴望自己的资质能被认可，特别是像印刷这样的纯熟的技能。加拿大地方工会与美国地方工会之间的交流和双方工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最终导致大型美国联合企业的 236

① Ian Drummond, *Progress Without Plann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Ontari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114 – 115.

兼并，如全国印刷联盟（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1]

加拿大工联主义中的美国特色是值得推崇的。很多加拿大工人出生在英国，来自一个即使工联主义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却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虽然英国的工联主义存在于加拿大，大多数的加拿大工人还是穿越国界去加入美国的工会。全国印刷联盟并非仅有的一个。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组织，而且当它不复存在的时候，其他的组织此伏彼起。也有一些加拿大本土的工会，但与强势的美国工会相比，它们逐渐退居次要的位置。[2]

雇员们并没有被工会的出现而吸引，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老板——专横的乔治·布朗是其中最为不屑的。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布朗与工人便开始发生冲突并贯穿其一生。1880 年，他被一位气愤的前雇员枪杀。

1872 年，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布朗强大的政治对手，激怒了新闻记者，因为立法机关使得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令其可以正式存在。其他的监管开始得要缓慢得多。雇员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监管的抵抗使得联邦政府无法行事，至少在麦克唐纳的领导下是这样；监管责任被留给了省政府，如果没交给省政府，也会被交给有关部门。1884 年，安大略确实进行了监管，雇用了一个巡查员巡查省内所有的行业。在安大略的法律中，12 岁以下的男童，14 岁以下的女童禁止工作。一旦进入工厂，他们一周只许工作 60 小时，一天工作 10 小时，虽然他们也可以完成最大工作量，即连续 6 周每天工作 12 小时。情况最终得以改善，这些体现加拿大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很保守而并非后退的例子为它带来了美名。

237 加拿大的地方、全国和国际间工会都面对着愈演愈烈的挑战。他们组织活动、收集应缴款并发动罢工，但是雇主可以通过雇用工贼的

---

① Eugene Forsey, *Trade Unions in Canada, 1812 - 190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27.

② Norrie and Owram,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383 页评论说"发生在商业中的大洲整合因此并行不悖，甚至被发生在工联主义中的超越。"

方式给予回应。暴乱时常发生，使得雇员们常常面对当地的民团。但民团是否能使指派他们的人满意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没有向罢工人员开火或刺伤他们，”一份工人报欣慰地报道，“他们自己也是劳动人民。”[1]

然而，即使工会没有分裂也被阉割了。“劳动人民”也具有职业的身份，当然也有些阶级凝聚力。但是他们中也存在宗教、文化、地区上的忠诚者。利己主义并非想当然地甚或经常意味着左翼或劳动阶级政治，或被解释为与包围他们的中产阶级完全不同的劳动阶级文化。[2] 较大型和偶尔好战的工会，如劳工骑士团用符号、仪式和典礼组织自己，模仿同时期的秘密社团，如石匠行会。这几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兄弟之谊——工会运动中的“兄弟姐妹”——是团结工作的核心。

就当时的普通文化而言，这种团结既不奇怪，也不惊人。工人并非与周围世界隔离。事实意味着工人经常听到保守党给予“保护”的承诺，也意味着关税高得使低收入或低成本的管辖权无力竞争。因为他们经常得到同教派人士的支持，如果在大选之日没有表现对集体的忠诚，有时就会被威胁将有来自上天的报应。

但是，在同等条件下，关税问题和政府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决定着直至1896年的投票模式和其他信仰（民族、语言和宗教）一起产生选民意愿去支持国内的政治党派。关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补贴，使钱从消费者手中转至被保护产业，但是对于政客而言，他们的最大吸引力是（现在仍是）大多数的消费者选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关税是19世纪政治的重大问题，而不仅只在加拿大如此。虽然英国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辩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但是它仍然存在于暗处，成为国内的忌讳之一。在美国，关税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话题，特别是在花了高价在农业机械或纺 238

---

① 在前引书47页中有引用，指1876年大干线铁路大罢工。

② Drummond, *Progress Without Planning*, 242－243.

织业却回报甚小的农民中。奇迹就是出现在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里，关税被如此强烈地维持下来，可实际上却难以触及。

加拿大政府本想对美国恢复较低的关税，但这是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还有国内市场要考虑，政治也在左右它。政治优势导致高关税的政策，使这些利益被公然地留给美国邻居，关税是牢固的纽带，使生产商与高关税的共和党联系在一起。利益的汇聚被蒙上了民族主义的薄纱，使选民确信支持高关税是爱国的表现。麦克唐纳没有看到需要模仿民主党的任何理由。他称自己的关税制度为“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自1879年他就职时开始，加拿大贸易政策的基础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一成不变。

技术很简单。加拿大的市场虽小，但却足够大得使地方产业得以存活，前提是该产业被保护以免与国外的产业相竞争。所以政府要求与赢利产业进行交涉，并通过渥太华的一小组顾问传达这个想法。消费者的兴趣只是偶尔起作用——如果消费者是能使其所发挥的影响被渥太华感知的另一种产业兴趣之所在的话。政治当然会起作用：关税的榨取必须与各地区的不满相权衡。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关税是对被承诺的铁路的交换。[①] 在乡村地区，关税是不受欢迎的。在安大略，抵制关税的情绪可以被其他兴趣和问题平衡，而在加拿大西部，人口非常稀少以至于兴趣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产业是国家建设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论断是很有力量的，说明为高价格所作出的牺牲会被日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补偿。结果当然是关税足够高，虽然不比美国的关税——仅表现出如经济中的关税一样，有增长的空间。

239

又是美国人——交易与互利

在19世纪后期，贸易如同政治的侍女。它不仅是加拿大政治的产

① 这一过程被描述在 Ben Forster，*A Conjunction of Interests：Business，Politics and Tariffs，1825－1879*（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6），Chapter10 中。关于关税最显著的妥协与煤有关。安大略希望从邻近的美国进口煤，但出产煤的布雷顿角希望垄断。结果产生关于煤的数目相当大且不可禁止的关税，而且因此充实了联邦国库。

物，也是美国政治的产物。（由于大不列颠与所有的来者均保持自由贸易，活跃的英国政治并非其中一个因素。）美国的保护主义在19世纪末非常高调；反对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观点局限于经济学家、农场主和其他天生的愤世嫉俗者。这是一段政府软弱而国会强势的时期，而且国会只能听到付清竞选费用或偶尔用现金买选票的论断。

此时普遍盛行的观点是加拿大的贸易商品应该被逐项地考虑，所以引起了国会的注意；它依赖于是否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可以阻止特殊的加拿大进口商品。渔业是被定期提及的问题。渔业的选民抱怨时，新英格兰的议员游刃有余地回应，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是坏消息，议员奋力保持来自加拿大渔场上的海滨行省渔民的首要位置。

《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为美国人提供了可以租赁进入加拿大捕渔区的权利，并通过仲裁决定租费。《1877年的哈利法克斯裁决》（Halifax Award）的结果使得加拿大得到了5 500 000美元，比美国人预料得多。由于美国政客的严辞谴责，美国政府勉强支付了赔款。1885年，国会通告美国现任政府废除对于渔业的安排，但是结果渔业问题还是回到最初迟疑不决且相互对峙的状态中。[①] 国会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留给了可怜的行政人员去尽力处理。

240 双方政府都没有特别希望对峙，而且通过一系列的临时措施，从而避免了情势的恶化。19世纪80年代后期，渔业形成一系列协商的基础，虽然对解决问题没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对于加拿大而言，可以重塑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很多加拿大人苦于他们国家滞后的经济。加拿大经济的缓慢增长，政治上持久的地方风格，还有相对于美国较差的繁荣和较少的机会，使得很多人来到合众国寻找更大型的工会。这个观点的最杰出的支持

① 在法律上，渔业政体重复了1818年惯例。惯例禁止美国人进入加拿大近海捕鱼，也就是说，在公认的3英里国家管辖权内。没有必要阻止美国船只进入加拿大营地，它们可以通过海关检查，而后购买包括鱼饵在内的供给物。见 C. C. Tansill，*Canadian – American Relations*，*1875 – 1911*（Gloucester，Mass.：Peter Smith，1964，a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1943 edition），23 – 25 页。

者是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牛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前教授，19 世纪 80 年代定居在多伦多的招人厌者。无视当地压力的影响，由于他妻子的资金，史密斯大胆地写出加拿大在现实中的失败并强烈要求与美国合并。

史密斯的观点激怒了麦克唐纳和他的政府，这并不意外，但是他们不安地意识到很多加拿大人会倾心于要求 19 世纪 50 年代的互惠条约和仍在公众记忆中的繁荣的回归。麦克唐纳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上述不太可能被其党派和国家接受的情况，因为诱使美国人接受任何复杂且有效合约的唯一可能是使经济协定与政治工会相结合。

麦克唐纳幸运地与他的政治对手周旋。自由党人渴望自由贸易，但也知道这不能得到足够的利益，像约翰爵士的保护主义计划——极大地为国家政策塑造了形式——吸引保守党那样。自由贸易加之进入美国市场——这是挫败托利党人并赢得下一次竞选的伎俩。从 1887 年开始的自由党领导人威尔弗雷德·劳里埃发现前景不可阻挡。对于 1891 年大选，自由党会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势不可挡的互惠主义。

1891 年，政治又一次打败了经济。约翰爵士亮出忠诚的底牌，暗示自由党人至多是一群笨蛋——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最坏的情况下，是流氓和叛徒。“我生是英国的人，”麦克唐纳声明，“死是英国的的鬼”。在他 76 岁时，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完全能够实现的承诺。他带领自己的党派赢得了 1891 年 3 月的大选，随后在 6 月与世长辞。所有的这些给一方留下了小问题，就是没有很好的理由期望华盛顿的政客考虑势不可挡的互惠主义时，不加考虑他们无法拒绝的好价钱。

241

饱经磨炼的劳里埃只有考虑为什么互惠的宝剑在他的手中钝掉。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淡化加拿大的英国身份是一剂政治毒药。忠诚是最好的政策，而且高关税是加拿大不可辩驳的象征。麦克唐纳已经使关税带有加拿大的政治色彩，而且在下一个世纪中，政治和保护主义在加拿大是共生的。

1893 年的自由党大会批准了政策上的变化。在理论上该党仍喜欢自由贸易，但是从选举成功的前景看，自由贸易无足轻重。因此，自

由党不会篡改加拿大关税的本质。由于安大略和西部的农场主选民，修补关税的利润是允许的，但是与美国的互惠不予以考虑。至少在1891年大选的记忆被遗忘之前是这样。

宗教与爱国主义

19世纪在加拿大应该以宗教分歧结束，如它的开始那样，这种说法再恰当不过了。宗教在加拿大至关重要，正如它在西方世界每一寸土地上所体现的那样。在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如在加拿大一样，政治行为被植根于宗教差别当中，宗教信念是一个人会如何投票的最可依赖的唯一预言者。

至少在表面上，最主要的差异存在于相互以恐惧和厌恶对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新教的家庭以出版于1563年的福克斯殉道者名录（*Foxe's Book of Martyrs*）为特点，详细叙述了新教圣徒在天主教迫害者手中的血腥结局。奥伦治会对1688时英国的自由险些葬送给天主教的暴政仍记忆犹新，而且7月12日的奥伦治游行在喜爱军乐队和作为免费公众娱乐活动一部分的行军队伍的国家，仍是一件大事。如其他的爱国活动一样，加拿大的7月12日聚焦于传统和外面的世界——宗教和帝国为加拿大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242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而且在魁北克，如果缺少主教的轻步兵（Pontifical Zouaves），宗教游行是不完整的，主教的轻步兵是由1870年为时较短的一场战争中的老兵或是将要成为老兵的人组成的，这场战争保护教皇国免于遭到吞并，并入统一的意大利。如魁北克的历史学家阿瑟·席维（Arthur Silver）所指出的一样，在魁北克有"宗教与爱国主义结成的婚姻。"[①] 如果说英裔加拿大注意到了大不列颠及相关的新教君王和政治建设，那么法裔加拿大人则思考着天主教更广阔的世界。天主教的现实将受到民族主义、新教、

---

① Arthur Silver, *The French - Canadian Idea of Confederation, 1864 - 1900*,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228.

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威胁，这些因素在加拿大同样也起作用。

1870年和1885年的里埃尔叛乱在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间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关系中都留下至关重要的一笔，但还有其他的摩擦。宗教与教育不稳定地交织在一起。教育被高度重视，与进步、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塑造了未来市民的道德观。教育是行省的事，所有的行省都通过税收支持学校。在安大略和魁北克，公众（事实上就是新教徒）与天主教集团和平共处，符合宪法精神，超越了当地大多数宗教人口改变的能力。马尼托巴的机构设置反映了讲英语和讲法语的议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间最初的平衡：法国人被正式认可，并且还有独立的天主教学校系统。在别处，少部分的天主教徒依赖大多数新教徒的宽容，将施行天主教教育的学校体系与之作出一定的隔离。语言的使用同样也是优雅和美好之事，因为除了在魁北克，马尼托巴、联邦的国会与法庭，其他任何场合人们都没有权利使用法语。

243 不仅如此，无论讲英语还是法语，加拿大天主教徒和其他加拿大人及整个加拿大间的关系非常模糊。天主教会与新教国家共存超过100年，而且魁北克也接纳了这种情况。安大略已经通过独立的天主教学校系统适应了天主教为数不多的教徒。一些天主教徒怀疑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臣、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善意，但是其他人没有。可以感觉得到这些少数人不会做得太过份去激怒大多数人；从另一方面想，很多天主教徒非常希望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们的宗教像其他教派一样忠诚和爱国。①

天主教和法国的耐心遭到马尼托巴政府的活动的挑衅。19世纪80年代，行省内有很多英裔的安大略定居者，而讲法语的人数在稳步减少。1888年的省内选举认可了人口情况的事实。托马斯·格林韦（Thomas Greenway）领导下的自由党人掌权，迅速废除了法语和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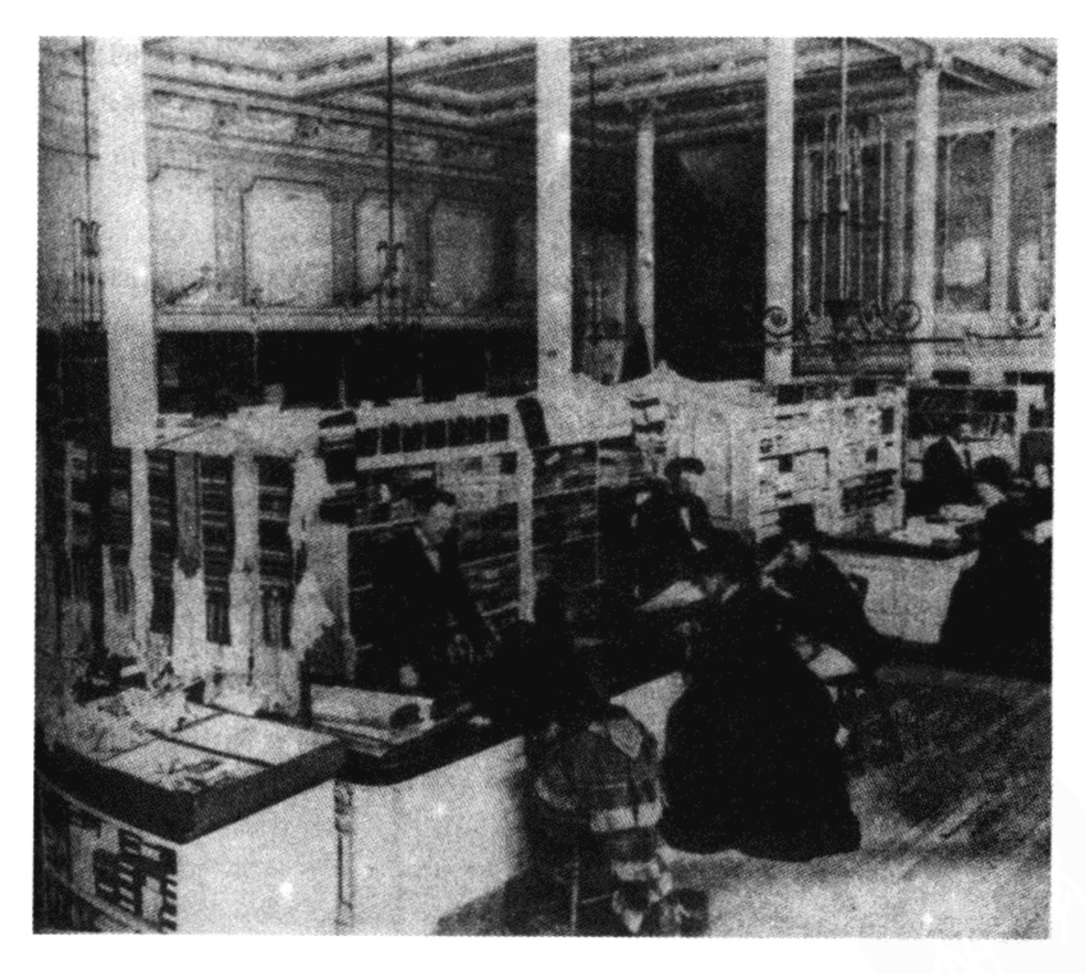
① 见Mark McGowan, *The Waning of the Creen*: *Gatholics*, *the Irish and Identity in Toronto*, *1887 - 1922*（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2: "1887至1922年间，多伦多的天主教学校致力于培养加拿大和帝国中品格高尚的基督徒和优秀的市民。"

学校的官方地位。

《英属北美法案》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联邦议会有权通过法律安抚马尼托巴少数人的不满，最终，渥太华的保守党政府鼓励自己仅为此事。直到1896年，这件事情风平浪静之时，保守党正处于失去权力的边缘。4任总理如走马灯般轮换：约翰·阿博特爵士（Sir John Abbott，1891—1892）、约翰·汤普森爵士（Sir John Thompson，1892—1894）、麦肯齐·鲍威尔爵士（Sir Mackenzie Bowell，1894—1896）以及1896年的查尔斯·塔珀爵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博特是橙带党人，负责处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Manitoba Schools Question），但是阿博特将被自己的党派扫地出门。所以，1896年联邦大选时，面对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的是塔珀，后者决然地失掉了大选。塔珀受到马尼托巴学校保守立场的约束，而劳里埃在整个纷争中的位置不可能被认清。并非与马尼托巴对峙，劳里埃提议“光明的道路”和调解作为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的关键。他本身不应该对魁北克提出建议，但这木已成舟。

244 左右劳里埃大选胜负的关键是魁北克。保守党支持法语和西部的天主教权利，在寻找为什么魁北克抵制保守党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在选民面前还有其他问题和情况。保守党的领袖落伍于时代且不堪一击。伴随任何一个不容撼动的政府，保守党都会广泛地产生不快。较年青且聪明的政客变得灰心，或像魁北克能力超群的伊斯雷尔·塔特（Israel Tarte）那样脱离了党派。55岁的劳里埃已经青春不再，但无论从哪方面，都胜过75岁的塔珀。在那个崇尚雄辩的年代，劳里埃是位才华横溢且富有雄辩能力的议长，还是足智多谋的的领导人。1896年6月，他从赢得多数席位，即30个席位的下议院的大选中脱颖而出。他将成为此后15年间的总理。

第十章　繁荣与萧条（1896—1914）



19 世纪的消费者：19 世纪 80 年代蒙特利尔高雅的摩根百货公司里的女顾客。

加拿大应该被一位19世纪的人带入20世纪的说法是恰当的。威尔弗雷德·劳里埃或许是加拿大造就的最完美的政治领袖——他身材高大（超过6英尺），玉树临风，相貌堂堂，栗色头发已现白霜，口若悬河，掌握双语（英语带苏格兰口音），天资聪颖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劳里埃出生于蒙特利尔北部乡村的一个爱国家庭，但与许多之前的爱国者不同，他仍是“红党分子”。他被培养成一名律师，是麦吉尔大学的金牌得主。一次，教区监护对教徒宣讲“Le ciel est bleu, l'enfer est rouge”［天堂是（保守的）蓝色，地狱是（自由的）红色］时，劳里埃坚信自由主义信仰。[①] 他将自由主义融入活跃的政坛，先成为一名魁北克立法机构成员，之后成为一名联邦议会议员，1877年最终成为亚历山大·麦肯齐自由党政府的部长。 247

劳里埃年轻并且充满青春活力，有创造力又积极主动。他代表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典型的加拿大人的优点。然而就像他领导的国家一样，价值观和看法与其说带有他声称要认识的新世纪的特征，不如说带有即将过去的世纪的特征。许多加拿大的党派人士通过继承或私利得到政治仕途，而劳里埃则把自由主义看作一套清晰的原则。他对自由主义的定义塑造了他的党派，并将其转化为加拿大政治舞台上的主导机构。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劳里埃不得不定义他的党派立场，这一做法是从非常保守的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那里得到启发的，因为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当代的最大错误之一。

1877年6月在魁北克城，劳里埃面对2 000名观众，宣布自己是一个改革者而非革命者。“我和一些人都相信，在人类事务中，需要改革陋习，发现新视野，发展新力量。”英格兰是加拿大应该学习的典范。自由主义改革已经“使英国人成为最自由的民族，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最幸福的国家”。他继续说到：“自由党的政策是保护［我们的］体制，保卫它们，传播它们，并且在这些体制的支配下去发掘国 248

① “天堂是蓝色的，地狱是红色的。”加拿大政党颜色依然是自由党红色，托利党蓝色——与美国的左－右党派颜色相反。后来的新民主党专用橙色，已不起作用的社会信用党则使用绿色。

家的潜在资源。这就是自由党的政策，仅此而已。”

劳里埃对英格兰或大不列颠的仰慕是发自内心的。他欣赏英国的体制并且敬畏大英帝国而对英国的财富和势力并不是漠不关心。他希望英国的财富会壮大加拿大经济，因皇家海军而无懈可击的英国军事力量会保护加拿大不受伤害——或至少不受海外势力的伤害。美国就在那里，然而与其作为一个蜷缩在大共和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国，不如作为强大帝国的一部分与美国打交道更好。

爱慕英格兰并不意味着爱慕英国人，尤其是加拿大的英国人。劳里埃充分意识到了国家的教派分歧和民族仇恨。他希望超越这些难题，但在现实中，他尽力退避三舍。在国家的某些地区以及对极端的新教徒而言，他总被质疑是法国人和天主教徒。（他确实是法国人，但很难说他是一个与实际相反的信仰天主教的教徒。）在家乡魁北克，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也怀疑他，他们认为接纳英国人并与新教徒交往是通向地狱的第一步。

尽管加拿大的制度对他而言是既成事实，但劳里埃很好地掌管了加拿大的体制。他的加拿大与其说是个孤立的国家，不如说是个孤立的殖民地。当他谈到民族和民族主义时——用两种语言——他并没有想快速达成结果。加拿大最终将沿着自身的趋势成为一个民族，并且劳里埃并未打算加速。这就是大英帝国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劳里埃直到生命的尽头还一直认为，大英帝国几乎无所不能，在北美以外无可匹敌，即使在北美也不太可能遭到挑战。他心中的世界是 19 世纪中叶的世界，英国在这一世界里将永远强大。在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帝国中，加拿大可以关注自己的事务。

249

劳里埃重视对大英帝国内的加拿大及其省份的地方自治。他明白省份的力量，也重视省份的权利，甚至他或许是历任加拿大总理中最注重分权的政治家。劳里埃在 1896 年选举中的胜利是省份对联邦政府不满的结果，同样是对一个衰老保守党政府的拒绝。作为时代的标志，劳里埃令安大略［奥利弗·莫厄特（Oliver Mowat）］、新不伦瑞克［安德鲁·布莱尔（Andrew Blair）］与新斯科舍［W. S. 菲尔丁

（W. S. Fielding）］3 省的省督和马尼托巴的首席检察官克利福德·西夫顿（（Clifford Sifton）进入他的内阁。除了莫厄特已过壮年之外，其他人都是年富力强、颇有势力的政治家，如果他们能够为劳里埃效力，那么盎格鲁－撒克逊选民当然就能信任他。

劳里埃在 1877 年就在强调“发展”，但这一名词需要做一番解释。劳里埃和他同时代的政治家将加拿大看作一个“年轻”的国家。那一时期的宣传形象通常是朝气蓬勃、品貌端庄的年轻女子——正如帝国吟游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描述的“白雪佳人”或者是年富力强的男性，同样是道德高尚且前途光明，但并未完全成熟。在劳里埃看来，加拿大需要时间和空间变得成熟、昌盛。“加拿大的前景无比光明”，那个时代的一位狂热者如是说，然而那只是前景，目前还未实现。加拿大需要独自利用这些前景。

发展中的政治

谈到经济，劳里埃像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他在选举中获得青睐的部分原因。劳里埃也很幸运，250 因为他掌权时，正值经济情况好转、繁荣之时。运输成本降低为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更好的途径。由于使用了更好的栽培法，包括马奎斯小麦品种的使用，贫瘠、易遭霜冻的加拿大草原顷刻变得引人注目。移民到“最后、最好的西部”这一极其空旷的加拿大草原本不足为奇，此刻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足为奇。

劳里埃将移民定居草原的任务交给他的内政部长克利福德·西夫顿（Clifford Sifton）。西夫顿设法通过广告吸引移民，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移民很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来。他将东欧（Eastern Europe）的移民也纳入到其中，使沙皇俄国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Slavs），其中大部分为乌克兰人来到加拿大。这一做法在保守的加拿大人中引起往昔的仇恨，保守党在众多联邦选举中不明智地试图利用这些人。这使得西夫顿接下来的任务变得容易。他是第一个，尽管不是最后一个提醒移民他们来到的是自由党政府领导的加拿大的自由党政治家。

总体上，移民和人口的统计数字增长比较显著。1891年，加拿大草原有大约250 000名居民，主要位于马尼托巴。1911年的人口不低于130万。移民数量从1896年的17 000人增至1900年的42 000人，到1905年增至141 000人，1913年将达到顶峰400 000人。[①] 面对如此多的人口，劳里埃于1905年创立了两个新省份阿尔伯达（Alberta）和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到1911年，萨斯喀彻温省人口在加拿大位居第3，位于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之后，但领先于新斯科舍与其他沿海省份。沿海省份在这一时期继续作为迁出之地，这些迁出者或去往其他省（安大略和西部），或去往新英格兰。

在某种意义上，魁北克是一个特例。魁北克省的出生率和新生儿数量都很高——比安大略省或沿海省份高得多。但被普遍的婴儿高死亡率和疾病以及移民明显偏好定居大草原和安大略省这些因素抵消了。251 事实上没有来自法国的移民，确实，到达魁北克的移民大部分使用英语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语言。与此同时，法裔加拿大人继续去往新英格兰。[②] 尽管魁北克人口在1871至1911年间增长了1倍，但由于疾病和向外、向内的迁移模式，魁北克人口的实际增长（68%）比国家其他地区（95%）要少。[③]

小麦播种面积是另一个增长指数。1890年的小麦英亩数是270万，1900年是420万，1911年是1 100万。小麦产量按蒲式耳计算，1890年为0.42亿，1911年为2.31亿。（其他作物，如燕麦和大麦，在产量和价值上均有增长，尽管不是如此突出。）温尼伯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交易中心之一。[④] 1900年以前，加拿大在国际小麦

---

① 1913年的总人口预计有760万。

② 有趣的是，加拿大的帝国主义者乔治·帕金（George Parkin）作了这些观察，这些观察在1892年似乎依然合理。Carl Berger，*The Sense of Power*：*Studies in the Ideas of Canadian Imperiali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0），145.

③ Jean – Claude Robert，"Québec，" screens 25 – 26 and table，in Bob Hesketh and Chris Hackett，*Canada*：*Confederation to Present* CD – ROM.

④ Norrie and Owram，*History of the Canadian Economy*，321. 1909年，温尼伯经营着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同类中心都多的小麦。

贸易中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小麦生产国，如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加拿大不再是一个裹足不前的殖民地。

尽管大草原定居地在劳里埃时期是最有名的移民迁入地，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加拿大的工业城市接收了数十万移民。事实上，加拿大所有城市区域的人口都在增长，其中，温尼伯增长最快。第一大城市蒙特利尔接收了最多、最引公众注意的移民，将圣劳伦斯林荫大道的“主道”变为事实上的城市中的犹太人（Jewish）社区。在多伦多，这一区域叫“病房”，位于大学南部。在温尼伯则有个“北区”。

新种族移民的到来超过了加拿大人所能容纳的限度，并且从未如此强烈过。这种宽容并未恩及亚洲移民，他们因一系列巧妙而沉重的负担受挫：中国人因人头税；日本人因经日本政府同意的配额；“东印度人”（来自印度）因旅途的不可行。为了表明当地态度，温哥华（Vancouver）的滋事者于1907年筹划并发动了一次反日暴乱。这次事件尤其对事先考虑下一届选举的紧张不安的政治家产生了影响，而且来自美国的黑人也遭阻挠。加拿大显然是白种人的国度，虽然官方并未如此宣布。

252 然而，如果能够到达加拿大并且得到认可，就会得到工作——并且很可能是报酬优厚的工作。从统计数据来看，所有类型的工作都在增加，而从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来看，工资正在增长。[①] 不应该被忘记，美国经济向来自加拿大和欧洲的移民开放。由于失误来到加拿大的人或感到失望的人都可以离开，但大部分没有。全国的“技工”，即工人数量从1891年的543 000人增至1911年的933 000人。其他种类的雇员数目也增长了——例如，所有人和经理。这些人中包括建筑承包商，他们使得世纪之交的建筑业自此繁荣起来。

电力是工业发展的关键，而加拿大有很多水流湍急的河流与瀑布，因此非常适合利用水力发电的新技术。就国家整体而言，水电站从1890年的72 000马力升至1910年的977 000马力。接下来的几年里，

① 见 Robert Bothwell，*Ian Drummond*，*and John English*，*Canada 1900 - 1945*（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9），81 - 82 页中的分析。

这一数值增加了一倍，到1914年几乎达到2 000 000马力。电力对安大略至关重要，因为当地没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也极少，不能维持工厂运行和居民取暖。对安大略而言，水电意味着人身安全和工业竞争力。用一位水电开发者的话来说，水电是一个“跳出瓶子的妖怪”；或者如多伦多《环球邮报》所说的，是“融合在商业中的魔力”。[1]电力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如此深刻、显著的改观，使得人们很快将其看作一种绝对必需品。它很快为政治议程创造了启示。

电力为地面电车提供了动力，后者不必再用马拉。电“射线”连接起五大湖周围的城市，使从多伦多通过转乘地面电车到克利夫兰的旅行在理论上有了可能。电器开始出现在非常富裕的家庭——电炉、真空吸尘器，甚至还有冰箱。

矿产品也在增多。最突出的体现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淘金热，位于加拿大新成立的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的克朗代克（Klondike）。1896年，在道森（Dawson）附近发现黄金。到1898年时，估计有10万矿工或潜在的矿工打点行装通过陆路或水路前往育空，并且通常是经过美国的阿拉斯加由海路到达。道森镇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一座真正的城市。1898年，居民达30 000人。淘金热在那一年达到高潮，事实上到1900年才结束，留下一条从海边的斯卡圭到怀特霍斯的铁路和各种工矿企业。淘金热也刺激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纠纷，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下文，第271页，原书页码）。

253

其他工矿企业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专业。自治领地质调查局负责勘测加拿大的岩石，寻找有开发前景的地质结构。私人地质学者也和地质勘探者接踵而至。到1914年，从落基山到魁北克的矿山，金、银、铅、锌和罕有的镍都在开采。阿尔伯达南部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已有煤矿，布雷顿角有持续时间长、矿藏丰富的矿山，钢铁工业在那里扎根。

在某种意义上，其中的某些发展造成一种假象。矿业、林业和农业

---

① 在H. V. Nelle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Forests, Mines and Hydo - Electric Power in Ontario, 1849 - 1941*（Toronto: Macmillan, 1974），220和221页中有引用。

用地是“边境”活动，助长了加拿大人的这一想法：即使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仍然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根据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观点，美国的边境已然“关闭”；而加拿大的边境则依然开放。即使如此，到1914年大部分可用耕地已经被农民占据。然而与此同时，大城市——如哈利法克斯、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尼伯、温哥华，甚至是维多利亚出现新贵居住的豪宅。加拿大依旧处于发展中，其政治，甚至文化按照经典定义来讲仍旧不发达。

铁路与过度发展

幸运孕育乐观，而乐观则产生自信，劳里埃正是如此。劳里埃（1897年之后被称为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以1900年11月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和对国家发展继续管理的委任迎接新世纪。在这位总理看来，国家需要的是更多的定居者。为了吸引定居者，他命令修筑铁路。

254

劳里埃已经介入铁路事宜。西部农民需要进入市场的廉价手段，是故铁路对补贴的需求永无止境。于是在1897年，劳里埃和内政部长西夫顿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达成一笔交易，后者降低谷物的铁路运费，为此能得到现金但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南部建设铁路线，这就是《鸦窝关协定》（*Crow's Nest Pass Agreement*）。

铁道部长安德鲁·布莱尔从次要角度讲是一位改革家。他既不倾心于私人铁路，也不惧怕公共管制。他将仍属政府所有的殖民地间的铁路延伸至蒙特利尔并在重要事务上使之脱离党派赞助。他还成立了一个铁路委员会（Board of Railway Commissioners），对铁路费用这一难题给予专家指导和公正的监督，至少他希望如此。①

劳里埃铁路政策的主要部分是另一条横贯加拿大的铁路线，这一议题得到广泛讨论和很大期待。劳里埃对这样一条铁路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铁路不应该始于蒙特利尔，而应始于魁北克城，即自己的政

① 《加拿大传记辞典》中布莱尔的传记作者D. M. 扬（D. M. Young）所引用的委员会的一句评价是“联邦行政法庭的模范和第一个现代管理国家崛起的重要的国内表现形式。”

治基地。它应该径直穿过魁北克中部到达安大略北部，寄希望于开放那里的领地来取得发展或成为定居地，正如安大略其他地区经历的一样。但这一前景虽然在政治上很诱人，但在经济上很不乐观，因为魁北克北部线路可能没有收入，任何修筑此路之人都要承担亏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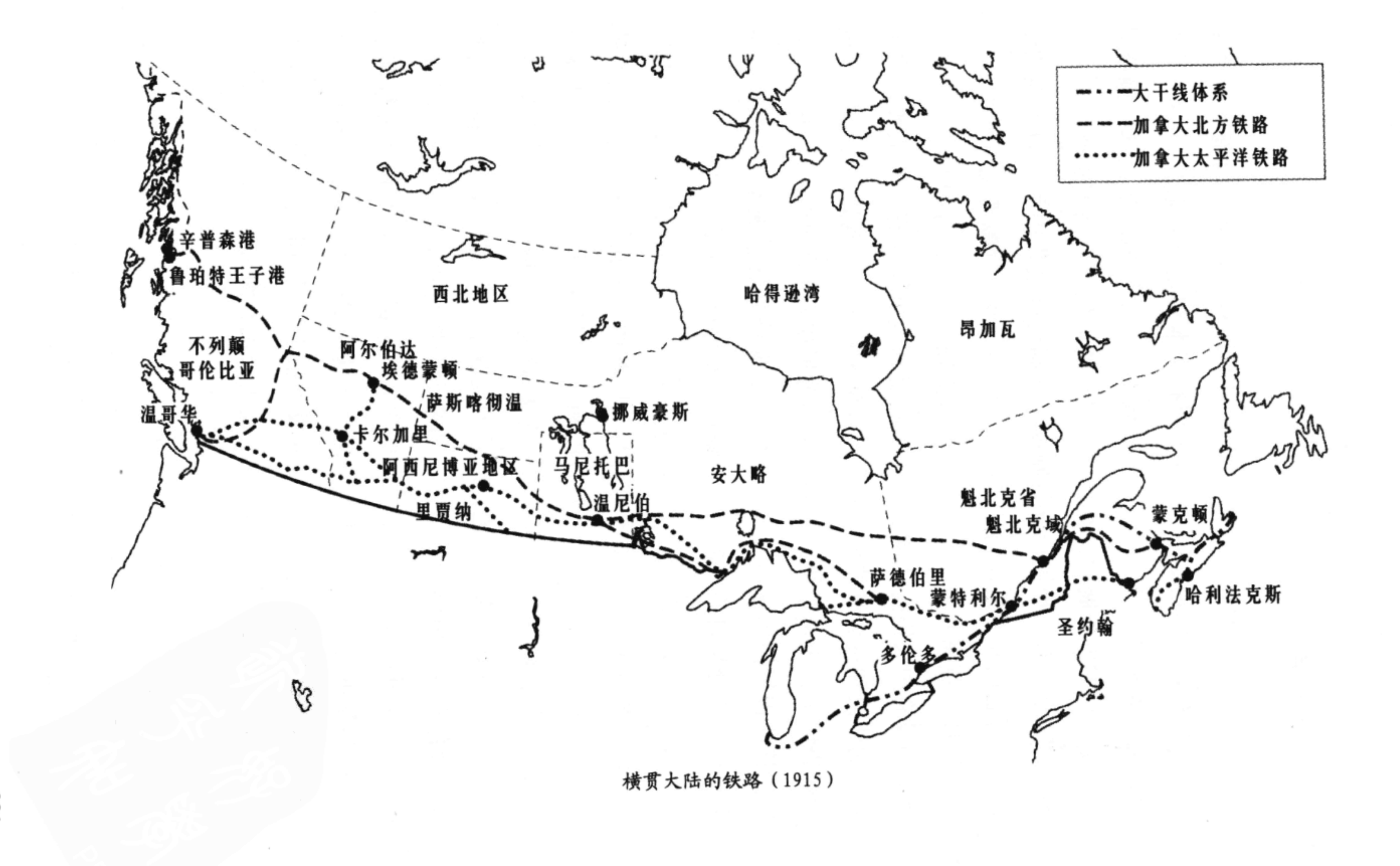
布莱尔有更强的谨慎感和对公共资金的责任心。他倾向于在原来的铁路线基础上拼凑成一条新的铁路，只在必要之处重新修筑铁路。在他看来，魁北克城线路毫无必要。劳里埃坚持己见，与大干线谈判。他的计划在 1903 年几乎达成。布莱尔辞职了，称劳里埃的计划“野蛮、不实际、不合商业常规及其他一切”。

从长远来看，布莱尔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合同中修筑铁路的附带利益和地区发展极具吸引力。最终，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横贯加拿大的新铁路线建成，一条是太平洋铁路，是现有的大干线铁路的延伸，另一条是加拿大北方铁路。它们是两位多伦多资本家威廉·麦肯齐爵士（Sir William Mackenzie）和唐纳德·曼爵士（Sir Donald Mann）的杰作。

256

新铁路线主要由英国资本出资，由著名的老贵妇和退伍军官提供，他们是描写投资的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就利润乃至投资安全而言，资金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全方位同意从而投入到深渊中，政府本身也投资于麦肯齐和曼的计划以及大干线铁路不断增长的债务中。正当铁路线接近尾声时，利润已被失望和战争取代。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北方铁路均告破产，投资者变得一无所有，留给加拿大一堆永远也不能偿还欠款的钢铁，已经支付款项的人更没有希望拿回了。（大干线铁路与加拿大北方铁路被合并到一个单独的政府体制下，即加拿大国家铁路。）多年以后，加拿大报纸仍刊登了一封来自一位被赖账的英国投资者请求正义的偶然来信。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国有化。早在加拿大政府找到这一特殊解决办法之前，劳里埃已不执政。他可以慰藉自己并不是因为其铁路政策导致自己下台。这张网太错综复杂，以致选民无法将之解开。



横贯大陆的铁路（1915）

经济繁荣

从铁路得到的经验表明，20 世纪的加拿大仍是英国资本的“前哨”。加拿大也正在成为一个自主拥有资本和投资的来源。1867 年以前，殖民地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成效不一。殖民地政治大部分围绕某一特定银行的事务展开，并且国有银行的地位得到高度褒奖。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有一种银行分行制度。此制度鼓励集中和实力更强的银行，尽管它们并不是强到足以拯救一些银行及其存款者免于破产。

257 尽管《英属北美法案》赋予了自治领政府对银行的明确责任，但自治领没有中央银行。从麦克唐纳政府到劳里埃政府，都依赖加拿大银行的建议和资金维持加元稳定及经济平稳运行。例如，在 1907 年的金融恐慌中，正是蒙特利尔银行告知劳里埃采取何种措施，并且渥太华依赖此银行使国家渡过难关，没有出现挤兑货币现象。（然而，货币只有一部分是自治领政府的；银行也发行自己的纸币。）

加拿大投资者很早就开始转向海外，银行紧随其后，尤其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沿海省份与英国和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早已存在联系（西班牙对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占领一直持续到 1898 年），不只是通过鱼类贸易，还有砂糖贸易。砂糖带动的繁荣使得古巴成为一块极好的投资之地，而且即使政治、叛乱和战争令在古巴的投资逊色不少，但仍有利可图。加拿大的银行建立了公共事业公司、铁路和矿山并扩大了银行系统。加拿大皇家银行与新斯科舍银行都是哈利法克斯的公司，二者成为哈瓦那和其他城市金融区的主导特征。[1]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加拿大的投资很重要，有时是“英国”投资的主导部分。一般而言，本国政府监视公民在海外的利益，但加拿大

---

① 尤其见 Duncan McDowall, *Quick to the Frontier: Canada's Royal Bank*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3), 171 - 187 页。

却不然。监视加拿大海外投资者的是英国外交官而不是加拿大人。[1]

英国的投资流向铁路、公共设施、矿山、保险、抵押贷款公司、银行业、[2] 土地，甚至建筑。1900—1913 年间，英国资金和美国资金合计为 24 亿美元。1913 年，英国投资额占加拿大外资的 75%，与 1900 年的 85% 相比降低了。美国则由 14% 增至 21%。

英国与美国支出费用的不同不只是在数量上。英国的资金主要成为贷款——通过债券贷给政府或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北方铁路（Canadian Northern Railway）这样的大公司。英国的资金提供给了温哥华的新污水管道系统。除此之外，还用于铺设使大干线穿过落基山到达鲁珀特王子港（Prince Rupert）的轨道，即这条铁路到达温哥华的另一路径。许多加拿大人将现金存入英属北美银行或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这两家银行均属英国所有。

258

总的来说，英国没有做的事情是建立制造业分厂——越过关税壁垒为加拿大市场生产产品的外国公司的子公司。他们的产品比原来的更贵且缺乏多样性，因为其并没有支付外国投资者来为加拿大这个小市场生产各方面的产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在生产加拿大制造的产品的同时，也增加了加拿大的就业岗位。

分厂通常是美国人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一些美国人事实上随着他们的投资来到加拿大，随工厂一起加入加拿大籍。大部分木材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从“美国人”转到“加拿大人”手中，尽管转手的通常是同一个人。后来，这一方法适用于另一家公司，即加拿大阿尔肯铝业公司。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CGE）经常被认为是美国通用电气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都归加拿大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行业，美国投资者确实买下了最初是合伙人的加拿大人的全部股份。新兴的汽车公司也是如此。

---

① 在 1913 年的墨西哥革命中，英国驻墨西哥公使馆询问渥太华方面，它应该采取何种做法来保护加拿大投资。渥太华当然一无所知。然而 6 年之后，加拿大内阁开始对使用各种力量干预墨西哥感兴趣，这发生在国际联盟的建立禁止这种国际管制之前。

② 银行不允许为抵押贷款提供贷款。

例如，福特与通用坐落在安大略南部，靠近边境另一侧位于底特律的美国母公司。

加拿大政府也为其铁路生意筹集资金，但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税收，而关税是税收最重要的部分。在财政部长 W. S. 菲尔丁的努力下，劳里埃政府在关税上最具创意。首先，劳里埃因急于向大英帝国作出表示，于是为其商品制定了较低的关税（或称“特惠”）。英国在那时并没有实行互惠关税，但加拿大的这一关税举措持续了大半个世纪；

259

可以说超过了帝国存在的时间。这样就使得加拿大的关税分为 3 个等级：英国特惠关税，是最低费用；“最惠国”关税，指与加拿大有贸易协定且最终减免关税的国家；最后一种是“普通”关税或最高税率。

菲尔丁还引入了专门的惩罚性关税用于反“倾销”。“倾销”是指商品在加拿大被以比原产地更低的价格出售。倾销被称作掠夺性做法，目的是消除竞争对手，使本国制造商破产。一旦市场竞争对手被消除，进口商就能把价格抬得过高，因为他的商品垄断了市场。根据菲尔丁的反倾销法，可以通过关税将进口产品价格提升到一个“公平”的层次，从而保护当地工业，抵制“不公平”（超低价）竞争。正如研究加拿大贸易政策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所观察到的，这一措施是加拿大独创的，因为很快被广泛运用，不久便对国际贸易实务产生影响。[①] 贸易谈判代表，包括加拿大人，仍然试图消除这一措施。

尽管政府弄虚作假，但经济状况普遍可观。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萧条业已过去，1907 年很短时间内的股票市场恐慌只是股市短暂的跌落。只有在 1913 年萧条才重现，伴随着经济急剧衰退或不景气而来。因此，1913—1914 年的众多失业者将有时间做其他工作。

组织改革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以及人口的增长和分散超越了当前的社会形式，

---

① Michael Hart, *A Trading Nation* (Vancouver: UBC Press, 2002), 74, 182.

并使社交准则和其他将加拿大人结合在一起的期望值放宽。在应对变化这一方面，政府与其说是领导者，不如说是一个不情愿的追随者，而且没有比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更不情愿的了。

这一时代的英雄是特立独行的改革者——如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她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促使英国政府令伤员得到系统护理。再如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伟大的法国科学家，他使卫生保健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又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他发明了电话——贝尔也在加拿大有个家。为了人类的进步第一个明显运用组织政府原则的是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之后称为查尔斯爵士），即马奎斯小麦的发明者。 260

桑德斯是一名公职人员，是令政府里的个人能够有所成就的启示者。此外，一些事情只有政府能够处理。城市的组织是最明显且恰当的例子。随着城市的发展，街道下面的排水沟和自来水总管道也在增加。然而在19世纪，这些工程是私人企业所有的，在20世纪则愈发倾向于国家所有。

公共企业的标准首先被应用于大草原，那里没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基于痛苦的经验，对垄断的不信任激励的不只是“改革家”，还有商人——他们发现其经济福利被私有公用事业公司的所有者破坏了。尼亚加拉瀑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的发电牢牢掌握在私人利益手中。很快，一个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在安大略南部组织起来，要求公共资源应该归公众所有。公共力量的支持者作为正在改革的保守党政府的一部分重新当选、执政，政府迅速创建了一个国有电力公司，即安大略水电公司（Ontario Hydro）。[①] 它将成为北美最大的公用电力公司以及当时国有企业的典范。

最明显的非政府组织是教会，无论是旧教会还是新教会。加拿大是一个教堂遍地开花的国家。在除了一少部分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最高大、最华丽的公共建筑就是教堂，这些教堂使世俗权力的一般象

① 官方称之为安大略水电委员会，即HEPCO。

征，如邮局或法院大楼或学校相形见绌。旧教会，即天主教会及英国国教会，由于一些困难已失去在政府精神层面的地位，尽管在魁北克，教会与国家仍是共生关系，至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是如此。新教徒推测天主教会本倾向于国家和教会连为一体，国家如果不服从于教会，可以是次要合伙人的身份。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无疑对此表示欢迎。但大部分教会领导人，无论天主教的或新教的，并不是非常超俗而去相信类似中世纪真正的教会——国家关系确实具有可能性。[①]

261

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甚至国教是天主教的国家，其中的实例并没有很大前途。在那些国家，教会通常不从属于政府，反之则不然。或者教会成为众多政治派别中的一支，失败与成功的所有风险都存在于党派政治中。[②]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很可能被打败。这就是法国当时发生的事情，国家使之前属于天主教体系的教育与宗教分离，此举令法国和魁北克保守的天主教徒感到惊愕与愤怒。[③] 当然有另一种选择，在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国家回归实行独裁形式的统治，然而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这一选择未被慎重考虑。

教会本来可以满足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可以坚持认为因为他们的工作，社会变得更好——更加有序，暴力更少并且更关注公民在社会与精神层面的幸福。对一些教会来说还不够。正如两位历史学家观察到的，“1900—1930 年间，卫理公会和新教长老派（Presbyterian）设想他们的天职无异于使加拿大的生活全部基督教化。”[④] 这一含义更加复杂。在激进的神职人员看来，基督教代表正义，不只存在于来世，

---

① 魁北克天主教右翼集团的一些人如此害怕被英国人和新教玷污，以致于为一个独立的讲法语的天主教国家做宣传。见《加拿大传记辞典》Jules - Paul Tardivel 词条。

② 有一个对（天主教）奥匈帝国的讽刺，据说帝国通过以下 3 支军队统治：“一支由士兵组成的站着的军队、一支由官僚组成的坐着的军队、一支由僧侣组成的跪着的军队。”尤其见 William J. Callaha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pain 1875 - 1998*（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0），46 页。

③ Lionel Groulx, *Memories*, vol. 1（Montreal: Fides, 1970），106 - 108.

④ Nancy Christie and Michael Gauvreau, *A Full - Orbed Christianity: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Social Welfare in Canada, 1900 - 1940*（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xiii.

还存在于现世。正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创立者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指出的，通过说教方式拯救饥饿之人毫无意义。[①] 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的神职人员是加拿大知识分子精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共享或致力于一种观念不足为奇，这种观念就是社会必须组织起来反对社会罪恶的各个方面，这种罪恶存在于——尤其是加拿大的城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冥思或通过说教回到过去牧羊式的神圣生活——恰恰相反，他们幻想这样一种社会，即通过关注所有成员的福利这一神圣目的团结起来，而不是因为阶级斗争而分裂。262 对过去完整社会秩序的怀旧之情依然存在——早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尽管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在魁北克，一些神职人员建议将农耕边境扩展到北部阿比蒂比的岩石和沼泽。面对从过度拥挤的乡村移居到新英格兰这一情况，教会准备好了适应魁北克的工业化，并且如果创建工厂的资金正好是英国人或新教徒提供，那么这不过是完成了上帝的意愿，将那些讲法语的天主教徒与其故土联系得更为紧密。[②] 总而言之，教会希望建立社会福利的代理机构，这些机构将尊重和反映其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教会深知，这样做需要国家的帮助。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团体或个人以及众多教会宣扬禁酒。到20世纪初，他们已能够迫使劳里埃就此事举行公投。禁酒主义者险胜，领先对手几张选票。然而劳里埃指出，魁北克以其他方式强烈反对，劳里埃拒绝执行禁酒，而不是冒险去分裂讲法语和讲英语的人民。他将这一事务交由当地人民抉择，通过此法，市民就能投票赞成“禁酒”且各省亦然。

---

① 布思曾经是一位卫理公会教派牧师，19世纪60年代在伦敦贫民窟工作，但面对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就存在的社会问题，他改变了说教的重点，在1878年建立了救世军。救世军于1882年开始在加拿大进行活动。

② 这一点见 William F. Ryan，*The Cl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Québec*，*1896 - 1914*（Québec：Presses de l'Universite Laval，1966）。

禁酒运动产生了另一影响。它动员并激励了女性改革者并教授她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技巧。如果女性的呼声在类似这样的事务上起到重要作用，为什么这一呼声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被听到？在一个男性为主导，女性被合法地排除在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也是一个可以潜在地组织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以满足对选举的需求，即选举权的观点。主张妇女参政的人问到，为什么值得尊敬的、努力工作的妇女无论受过教育与否都没有选举权，而任何一个酗酒的男性无业游民都可以行使选举权？

主张妇女参政的人一直在发问，但多年来从来没有足够的激励因素给予他们肯定的答复。显然，妇女运动没有动员足够的女性战胜这一固有观点，即女性的地位是在家中，所需做的一切只是作出些许调整以适应家庭生活，以照顾可能发生的真正不公平或不幸的极少数事例——例如，众所周知的酗酒丈夫。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特殊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农场，家庭就是工作场所且直接依靠女性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大约占工业劳动力总数的5%。

263

尽管如此，当劳里埃或众多反对派领导人制定适于选举的事项清单时，妇女的选举权从未出现过。常有其他待辩论以作出决定的事务，例如，帝国事务。

帝国政治

大英帝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它的象征意义渗透到加拿大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普遍贴在厨房墙壁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平版画到高傲地飘扬在公共建筑上方的联合王国国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无一例外。女王的金属雕像伫立在公园和渥太华议会大厦周围。王室家族对于加拿大人而言是兴趣的不涸之源，从他们的报纸中可以看出，报上报道了所有事情，从王室私生子的故事到提高道德水准的寓言，甚至涉及女王对已故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无尽哀伤。

女王从未访问过加拿大，如果她到访，就会发现“阿尔伯特亲王”，即位于萨斯喀彻温中部一城镇的象征，或看到在阿尔伯达地区

（之后成为省），人们对他的纪念。[①] 女王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首府、魁北克的一个城镇［维多利亚维尔（Victoriaville）］以及新不伦瑞克和安大略的郡，这仅是几个例子。如果说美国是华盛顿的国家，那么加拿大是维多利亚的国家。

女王的父亲、叔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几个孙子皆曾到过加拿大旅行或在那里住过，但直到1939年，才有执政君主真正踏上加拿大的土地。[②] 而这位君主由渥太华的一位总督代表。这一重要人物通常是一位有着政治关系的英国贵族，他意识到，在一个裹足不前的小殖民地，常年居住在这个略小的宅邸并没有害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督这一职位的声望似乎增长了，尽管这一职位很少被头号政治人物占据。[③]

一些总督比其他人更善于做好总督这份工作。19世纪70年代的总督达弗林伯爵（Lord Dufferin）就是一个技巧娴熟且思维敏锐的外交家——这预示着之后他非常成功的外交生涯。接替达弗林伯爵的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对加拿大问题有独到见解，但他并没有在加拿大政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具有同等职位的自由党的阿伯丁伯爵在1896年保守党过渡到自由党统治时任职。他坚持认为大败的塔珀应该通过立即辞职承认这一既成事实，阿伯丁的坚持使这一过程顺利进行。阿伯丁伯爵的妻子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力。她协助创办了国家妇女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这是一个备受尊重的、持久的女性压力集团。

与两位更加积极的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与格雷勋爵（Lord

---

① 她曾在19世纪50年代受到阿谀奉承的加拿大政客的邀请。

② 这些人分别是肯特公爵、克拉伦斯公爵（后来的威廉四世）、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七世）、洛恩（Lorne）的女侯爵和总督夫人、路易丝公主、约克公爵（后来的乔治五世）、1911至1916年任总督的康诺特（Connaught）公爵。

③ 第一任总督蒙克（Monck）勋爵和第二任总督里斯格（Lisgar）勋爵无疑都是本国二流的政治人物，但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职位被政治关系更好的个人担任，康诺特的阿瑟王子，即维多利亚女王最小的儿子达到顶点，他以血统和善意弥补了智力上的不足。

Grey）共事，是劳里埃的不幸。这二人都是大英帝国的狂热支持者——当时的术语称作“帝国主义者”。明托是一名军人，下决心整顿属于加拿大防卫体系的但具有党派性质并充斥着恩赐的烂摊子。

明托想当然地认为加拿大的军队是用于防卫，甚至是战斗的。由于在北美这一环境下，几乎很少发生战斗，因此这只能意味着军队可以或应该用于它处，即帝国战争。然而在付诸实践之前，必须整顿不称职的军官和软弱无能的士兵，否则他们就应被立刻赶走。

劳里埃眼中的军队——几乎全部是自发加入的民团——截然不同。[1] 在他眼里，这是一支身着制服、类似兄弟会的组织，像共济会、慈善互助会或秘密共济会一样，但他们持枪，身着女王的制服。后面265 这些特征对民团的社会地位给予认可，令其尤为吸引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会所——兵工厂——他们可以聚在那里讨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可以欠大笔账；可以购买华丽而俗气的制服。建兵工厂是一种有益的资助，可以提醒社区在政府中谁是它的朋友。授予军事委员会权力更好，因为它用极少的花费以荣誉和威望奖励政府的朋友并授予军官地位。

只要当兵是关于游行、聚会和胆量的事，那么无论对于哪个党派执政及其军队，这一体系都能很好运行。加拿大的防御——被帝国、海洋以及美国无意于军费开支所保护——是低成本，高回报的。至于加拿大对帝国的防御，依劳里埃之见就是一个矛盾。

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属国的不反抗以及敌人的弱小。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守卫着大英帝国及其利益，辅之以一支旗帜遍布全球的大规模舰队。由于被察觉到的对帝国的威胁，英国的公众舆论时不时被激起。1885 年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鲁莽、喜欢冒险的将军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在苏丹执行任务。他设法使自己被穆斯林叛乱者围困在喀土穆。在大不列颠，公众舆论迫使格拉德斯通的自由党政府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尼罗河上游解救戈登。英国陆军部的一位人士记

① 有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小规模常备军，但人数远远少于民团夏季的士兵数量。

得，加拿大拥有大河和筏夫——就这些。

英国政府立即求助于加拿大总理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麦克唐纳的确派遣了非作战人员——筏夫，但随着戈登的处境恶化——他终于招架不住并且在1885年2月被叛军杀死——加拿大面对压力需做得更多。

麦克唐纳顶住了压力。格拉德斯通是一位有经济头脑的首相，他于1871年命令英国卫戍部队从加拿大撤回，将当地的军事防御留给加拿大人。格拉德斯通政府一直依同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安抚美国政府。麦克唐纳记起来了。他问到，为什么应该“牺牲我们的人员和金钱去解救由于自身愚钝才陷入重围的格拉德斯通和那位指挥官［?］”[①]尽管不怎么好，加拿大军队依然呆在本土。唯一的对外行动是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的毕业生的离校，这是加拿大新成立（1876年）的为英国海外军队服务的军事院校。[②]

266

麦克唐纳为抵制帝国的冒险主义制定了一个标准，但这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格拉德斯通放弃了对苏丹的干预，转而关注于得到爱尔兰政府这一永恒的问题。他在那里同样未获成功，并将一个由其最有前途的大臣之一约瑟夫（乔）·张伯伦（Joseph［Joe］Chamberlain）领导的“联合主义者”派别从自由党中驱除。张伯伦最终带领持有异议的前自由党人与保守党结成联盟。保守党于1895年赢得选举，张伯伦于是具备了内阁职位的选择权。奇怪的是，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张伯伦选择的是之前没有名气、还有几分低人一等的殖民部。

张伯伦从1895—1903年任殖民地大臣。在他的管理下，殖民地的生活当然不是枯燥无味的。他想把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拉得更近。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家，张伯伦认为大不列颠面对美国与德国的军事力量，不久将不再强大。他在伦敦召集了一次殖民地会议，时间正好

---

① Sir John Macdonald to Sir Charles Tupper, 12 March 1885，在C. P. Stacey, *Canada and the Age of Conflict*, vol. 1, *1867－1921*（Toronto：Macmillan，1977），43－44页中有引用。

② J. L. Granatstein, *Canada's Army*：*Waging War and Keeping the Peac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27.

与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的钻石大庆相符。

殖民地会议是在殖民地大臣的主持下，各个自治殖民地的首脑聚在一起召开的会议。[①]“帝国联邦”这一说法在传播中，尽管至今仍没有人给出一种对帝国的组成部分有任何吸引力的说法。英国政府不想在帝国外交政策或普通关税政策这些方面给予其殖民地任何重要的话语权。与此同时，殖民地惧怕回到英国的监管之下，因为大不列颠在权力、财富与人口方面令各个自治殖民地相形见绌。

267

张伯伦希望从会议上获得统一的结果，但充其量只取得了表面上的和谐。殖民地大臣几乎没有什么给予与会首脑。就英国内阁而言，重新给予殖民地优惠关税和在英国市场的特权地位是不可能的。英国的政治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如想象的那样，这一点接近普遍共识；对此质疑的是鲁莽的政治家。张伯伦个人质疑自由贸易，也终将反对自由贸易——但目前还没有。不管怎样，英国移民和资本一直在流向殖民地，并且英国政府不需要想或做任何事情对此给予激励。

劳里埃观看游行队列，参加宴会，醉心于贵族女主人必不可少的偶然事件并到柴郡去见他真正的英雄，即退休的自由党领袖格拉德斯通先生。得到骑士身份之后——劳里埃会说他不知如何拒绝这一头衔——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返回加拿大。

张伯伦则忙于其他事情。这位殖民地大臣决定解决南非“问题”。在那里，两个英属殖民地与两个独立的、讲荷兰语的共和国，即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关系紧张。（那里的居民将自己称为南非白人，但他们通常被称为布尔人，是荷兰语中对农民的称呼。）更有趣的是，德兰士瓦拥有大量黄金和钻石，吸引着矿工前往南非。其中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讲英语，他们事实上是英国臣民。布尔人由于害怕会受制于移民，所以限制移民的政治权利。为解决这一问题及其他“迫害”问题，张伯伦选择了武力。

---

① 它们是纽芬兰、5个澳大利亚殖民地、新西兰、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以及加拿大。

对武力的信仰是19世纪英国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特点。它来源于在漫长的英法战争中以及1815年战胜拿破仑的战争中获得的优越感，并且接下来80年中发生的100次小型冲突令英国人更加迷信武力。敌人在变，但有一次当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时，一首流行歌曲唱道，“我们不想作战，但如果我们作战是因沙文主义者，我们有船只，我们有人员，我们还有金钱。”这首歌谣使“沙文主义”这一名词产生，意指狂热的、带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①] 就布尔人与帝国而言，张伯伦是一位沙文主义者，而且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可以诉诸沙文主义这一情感，不只是在英国，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帝国内其他英国人的定居地。在劳里埃的政治词汇中，几乎没有充满更大恐惧的名词。沙文主义是一支不可估算的力量，使公众朝着具有潜在危险的方向行进。这更加危险，因为在讲法语的加拿大，沙文主义几乎得不到共鸣且没有有效的政治支持。[②]

268

张伯伦首先于1895年尝试了一次非官方的冒险入侵行动，即所谓詹森袭击（Jameson Raid），目的是推翻布尔政府以统一南非。但这一偷袭失败，显示出英国的政策不仅是好战，而且还搞两面派。詹森袭击对大不列颠而言是一次一级外交灾难。这似乎是一支强大力量对两个比之小很多的国家的攻击，是一次披着虚伪外衣的战斗，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已相信这是英国人性格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英国在欧洲只得到了敌意和孤立。

张伯伦只剩下直接采用武力的选择。他开始在南非集结军队，而且开始考虑使帝国其他地区卷入一场他知道为时不远的战争的最佳之

---

① 沙文主义歌曲和其他许多歌曲当时在音乐厅进行演唱，而且在英国，很可能也在讲英语的加拿大“极为受欢迎”。John M. Mackenzie，“Empire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s,” in Andrew Porter，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 4，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78－279.

② 有一些法裔加拿大帝国主义者，如珀西·吉鲁阿尔爵士（Sir Percy Girouard）因为帝国开拓大片非洲土地而出名，而詹姆斯·勒莫因爵士（Sir James LeMoine）（该名字是赐名，勒莫因有一半法国人血统，但明显是一个英国国教徒，非常适合于魁北克社会）可以被用来从魁北克的城垛上挥舞英国旗帜。

道。布尔人购买了武器，以最好的状态组织起来，并于1899年10月抢先发起进攻。但英军还未准备好，而且指挥无方。在一系列小规模战事中，英军被打败并被迫撤退。其威望大跌，深深伤害了英国人的骄傲感。

南非问题在加拿大受到密切关注，至少在英语加拿大是这样，毫无疑问，张伯伦和英国一定是正确的，而由古怪、蓄胡须的总统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领导的布尔人是完全错误的。劳里埃无此看法，但他对此既怀疑又漠不关心，直到最后还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

269 当战争爆发时，劳里埃身在芝加哥。返回加拿大后，劳里埃被其讲英语的顾问告知，他必须出兵。张伯伦已经要求加拿大出兵，负责指挥加军的英国将军已经公布了这一要求，并且总督明托勋爵对此表示赞同。计划木已成舟，媒体也已获悉。[①] 更重要的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的舆论对此一致支持。

值得赞扬的是，劳里埃确实坚决抵制出兵，只是在杰出的英国大臣告知他，他们将放弃并分离党派时才让步。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的舆论已然明显："加拿大受辱"，《蒙特利尔星报》如是说。来自哈利法克斯、多伦多及沙文主义者繁多的其他任何地区的更多人将追随这一决定。[②] 劳里埃有能力更改英国对出兵的要求。英国陆军部想要可以任意整合到英军的连队。而加拿大政府想命令加拿大军队以更大规模协同作战，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军队占优势。一旦加拿大人到达战场，英国将承担军费。

在另一件事情上，劳里埃则不是很有道理。他宣布，加拿大军队的派遣将不被认为是先例。在其魁北克副总督伊斯雷尔·塔特的坚持下，劳里埃在一份枢密院敕令中具体表达了这一主张。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他。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是一位年轻、有前途的自由

① Carman Miller, *Canada's Little War: Fighting for the British Empire in Southern Africa, 1899 - 1902* (Toronto: Lorimer, 2003), 21 - 23.

② *Montreal Star*, 5 October, 1899.

党国会议员，还是帕皮诺的孙子。在他看来，向南非派兵是导火线。布拉萨已不情愿地赞同了劳里埃对马尼托巴学校的妥协，尽管他确切地感觉到这使得讲法语的少数人即使不是孤立无援，也是处于不利地位。他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即加拿大确实能成为一个讲英语和法语的人共同享有的统一的国家，但他也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是说服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将加拿大置于首位，而不是大英帝国。显然在1899年，事情并非如此。布拉萨乘机从众议院辞职，并竞选连任省总理，反对劳里埃的南非政策。布拉萨再次当选，但在1900年11月的普选中，劳里埃在全国获胜，事实上在魁北克也赢得更多选票，占据了该省65个席位中的57个。 270

约6 000名加拿大军人在南非作战。称职的将军已掌握英军并为攻取敌方首府的战役重整军队之后，他们适时到达。加拿大人参与到军队前进和辅助战斗中，以1900年6月攻占德兰士瓦首府比勒陀利亚告终。布尔军队败下阵来，但结果证明，布尔人并没有被打败。

加拿大人可以从报纸上追踪那些运动。加拿大最易激动的沙文主义报纸《蒙特利尔星报》尽最大努力鼓励国内和国外的对抗。当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在“被怀疑不忠”的所在地——蒙特利尔法语报社前游行时，星报为这一运动捐助了啤酒。很显然，如果有暴乱，民团不得不出动且总督发送急件给宗主国，告知其有“焦虑的理由”。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卡曼·米勒（Carman Miller）对蒙特利尔“黄色报刊的污言秽语和暴力”进行评论，而这恰是劳里埃害怕的。[①]

尽管战争还在持续，但这一焦虑消除了。布尔人对帝国军队发动了游击战，后者予以回击，将布尔人中的非作战人员集中到一起并将其关入集中营，许多人在那里死于疾病。此举意图切断对游击队员的供给和支持，通过消耗敌军力量来帮助己方。最终，布尔人消耗殆尽并投降。

---

① Carman Miller, *Canada's Little War*, 52.

维多利亚女王在战争结束前驾崩，主持和平公告的是她的继任者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适逢1902年6月他的登基大典。因为所有殖民地首脑都要到伦敦出席这一大典，张伯伦于是筹划了又一次殖民地会议。①

尽管在南非取胜，但形势并不像1897年那样乐观。南非战争期间，英国在外交上已是孤立无援，而且很明显她在欧洲大家庭不得271 人心。在殖民地会议上，劳里埃又一次对张伯伦关于帝国联合的劝诱加以抵制，然而这可能被具体化；但即使他没有抵制，也没有理由认为英国政府自身会接受帝国法律的重大改革。一切几乎照旧，尽管张伯伦已不再任职，对此也看不到了。他于1903年在“关税改革”问题上退出英国内阁，即重建关税壁垒以保护英国经济免于外国竞争。张伯伦的离开使关税改革从帝国会议桌上移走，时间长度跨越一代人之久；当关税改革在1931年重返会议桌时，情况将迥然不同。

对帝国不满的理由还有很多。尽管《华盛顿条约》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毕竟不至于是加拿大的灾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美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尽管这种愉悦会偶尔被来自华盛顿的爆发所中断。这些爆发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征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指出的，美国与大不列颠被同一种语言分开，即他们可以表达各自的不同意见，而且心知肚明。还有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此外还有种族，这在有种族意识的19世纪90年代极为重要。在美国独立战争很久以前，从不列颠群岛继承的古老观念和风俗习惯一直保留着。②

英国政府隐约意识到美国可能不是明确表示友好，但无论如何也

---

① 澳大利亚殖民地在1901年已经按联邦形式组成了一个单一的自治领，从而减少了会议桌上的省督人数。

② 在最近的2003年，美国人制作出了关于民族记忆的最好例证：恐法症，其必然能够回忆起从12世纪延续至19世纪的英法战争。最近对这一现象的最佳分析是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并非敌意。英国在欧洲被孤立，权力制衡也不稳定，于是英国人理性地选择谨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①] 英国与美国的利益并没有根本冲突，并且英国人急于清除他们可以发现的尽可能多的烦恼。[②] 因此，英国人对劳里埃沿阿拉斯加狭长边界制造出的事端不甚满意。

这条边界是大不列颠与阿拉斯加的宗主国，即俄罗斯帝国在1825年签订的条约中确立的。俄国割让内陆给英国，自己得到海岸。俄国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时，边界没有变化，直到克朗代克淘金热，利益各方才对改变边界有了兴趣，在这一点上兴趣大增。加拿大政府当时宣布，条约实际上给予其到海上的通道；美国政府则持相反观点。这一事件在若干年中不断恶化，直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执政时，于1903年由6名“声誉很高的法学家”予以仲裁。

272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仲裁。有3个美国人都偏袒美国。有两个加拿大人同样偏袒加拿大，还有不幸的英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阿尔弗斯通勋爵（Lord Alverstone）。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阿尔弗斯通皆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这也正是他期望的。罗斯福已接受仲裁，只是因为他确信会赢，此举使仲裁过程具有了缓慢哑剧的性质。[③]

劳里埃被激怒了，或许比仲裁引发的情绪更加恼怒。1903年10月，劳里埃在众议院发言，宣泄他的情绪。“我常常很遗憾，议长先生，”他说到，“而且没有比现在这一场合更加遗憾的了。我们呆在一个强大的邻居旁边。我认为，我的说法不会被认为对其不友好。他们国家的行为很贪婪，在任何场合都下决心从他们签署的每一项协定中

---

①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19.

② 举一个例子，英国人废除了一项旧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在中美洲运河的共同利益，而美国政府判定，独一无二的美洲运河——只属美洲——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结果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满意，就是如此。

③ 罗斯福认为加拿大的权利宣言最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最差可以看成是卑鄙行径。甚至对加拿大的权利宣言的仲裁作出让步也主要用于为加拿大人，引申开来是为大英帝国顾全脸面。

得到最大利益。"①

一笔勾销

阿拉斯加边界争端或许是与美国持续一个世纪的纠纷的前兆，但结果并非如此。劳里埃政府与罗斯福政府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而且第一次称加美关系为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有可能。

罗斯福希望占支配地位且无挑战对手，但他并不希望不友好。其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持相同态度，而且他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那里得到很友好的回应。布赖斯有自己的议程。事实上，英国大使馆处理的大部分事务是加拿大事务，即与4 800公里长的边境联系在一起的1 001件日常问题。得到劳里埃的指令是一个费力复杂的过程，有时还一无所得。

273

布赖斯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劳里埃回复他从华盛顿发出的邮件；第二个任务是确保邮件的内容友好、有建设性且不对立。布赖斯说服了加拿大的一位高级公职人员约瑟夫·波普爵士（Sir Joseph Pope）在渥太华组建一个办公室，处理发往国外或从国外收到的信函。② 它不能是外交事务的一个部门——这样对加拿大作出的让步太多，从法律上说，加拿大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殖民地。相反，它被标上了对外事务的部门标签，这一说法不言自明且不是非常确定。该办公室坐落于渥太华市中心一家理发店的上方，尽管之后将搬至更繁华的街区。工作交由一位基层官员处理，但更重要的是，约瑟夫·波普爵士负责此办公室。

布赖斯转向解决紧迫的加、美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因此不需要重大谈判。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了

---

① 对边界争端最合理的解释见 Stacey，*Age of Conflict*，vol. 1，86－103页。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忽略了判决背后的政治性及其提前谋划的本质。见 *Theodore Rex*（New York：Random House，2001），281页。他确实准确地将其描述成"接近全胜"。罗斯福将满足于这一切。

② 约瑟夫·波普爵士来自爱德华太子岛一个有名的保守党家庭，早年曾是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的部长。

出来。许多河流穿过加、美边境，而边境从五大湖中部穿过。定居者在一些边境土地上居住已超过百年且定居越来越稠密。

位于五大湖盆地、圣约翰河谷、红河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的居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进行了开发。他们建立了城市，城市需要水，而且他们也将污水排入河流。芝加哥（Chicago）甚至计划让五大湖的水改道以便于冲走城市污水，最后到达密西西比河下游。进步的代价是工业，因为工业产生污染、化学废料、煤尘和有毒废水。城市通常掩盖各自的问题，如曾经波光粼粼的溪流如今成为受污染的水沟，然而不可能大规模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加拿大与美国的经济习惯相冲撞，边境利益也发生冲突。谁在污染谁？

没有什么问题是政治家更乐于解决的。污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274 事。城市的污垢和造纸厂或矿物冶炼厂散发的臭味是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繁荣引发的活动的信号。彻底消除污染是动摇社会的根基——有些事最好留给教会。

而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政府与美国政府于1909年签署了一份《边界水务条约》（Boundary Waters Treaty）。他们建立了一个国际联合委员会（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简称IJC），由双方各3名成员构成，这一次没有规定英国成员资格。国际联合委员会对与边界水域——包括五大湖相关的事宜进行调查、汇报，并且如果被要求，还要予以仲裁。[①] 如果被要求，国际联合委员会还可以行使更多职能，作为解决加拿大与美国政府所关注的任何问题的法庭。

条约签订的时候，罗斯福在白宫还有最后几个月的任期。担任条约实施的是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与罗斯福这位有名的律师不同，塔夫脱将国际联合委员会视为一个法院，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国际版本。他似乎乐意接受与加拿大的这样一个法庭，因为塔夫脱认为从加拿大的普通法惯例和相似的风俗习惯

① 该委员会还将管理介于加拿大和美国利益之间的某些河流水域的划分，而且控制排水道和障碍物，例如水坝或堤堰。在工作中，平等原则被运用到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权利中。

来看，加拿大在限定美国与加拿大边界主权的协定中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合作者。换言之，两国利益共享，而且这样做双方没有发现任何矛盾。

然而，国际联合委员会并不是完全像塔夫脱希望的一样运行。劳里埃并未赋予它任何重要性，事实上在他结束执政之前，劳里埃没能任命任何一个加拿大成员。是劳里埃的继任者罗伯特·博登第一次任命加拿大成员并将国际联合委员会变为一个办事机构，在华盛顿和渥太华都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室。在实践中，国际联合委员会通过详细的调查确立事实，根据证据和专家意见得出结论。与代表各自政府的身份相比，其成员更像是国际公职人员。[①]

白雪佳人

275 劳里埃与 W. S. 菲尔丁在 1897 年发明优惠关税时，在忠于英国的支持者中引起好感。一位年轻的、侨居印度的英国诗人兼记者鲁迪亚德·吉卜林赋诗一首表达对加拿大的敬意，名为《白雪佳人》。或许因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被不断引用："虽然在母亲房中是女儿/但在自己这里是霸主"。

母亲的房间在 1900 年之后越来越需要维修。大不列颠在布尔战争（Boer War）期间外交孤立，于是着手结盟：首先与日本在 1902 年正式结盟，之后，更为非正式地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与法国和俄国的协定很不正式，导致一些内阁成员浑然不知；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协定还是存在的。）与法国和俄国的联合几乎完成并一直发挥作用至 1908 年，这令德国政府及其君主威廉二世（Wilhelm II）皇帝非常恼怒。

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个性易激动、易怒、易变。作为皇帝，他是德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意志不坚定，而且他充

① William R. Willoughby, *The Joint Organization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22.

分意识到他需要得到德国社会重要阶层的好感。因此，威廉二世表现的不仅是个人愿望，还有德国浓厚的政治局势。他于 1898 年着手组建一支大规模的德国海军，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要取得成功，他的海军政策需要他能够使船只驶离德国港口，穿过北海到大西洋。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以某种方法无所畏惧地面对英国舰队。反过来，这意味着他必须拥有比英国更多、更好的船只，能在大不列颠与德国之间的水域游弋。

威廉二世的愿望在遥远的加拿大看起来实在很古怪，但在北美自治领超过他们产生共鸣的其他任何外交事务。威廉二世成为结束加拿大殖民地与世隔绝的一个因素。他也将最终促成大英帝国的终结，通过揭露其内部矛盾和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包括加拿大之间利益的不同达到这一结果；但此结果的发生还很遥远。 276

欧洲宫廷的阴谋诡计和遥远的联盟的组建对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而言没有意义。如果他曾经认真地思考此事，就很可能认为英国的资源几近无限且权力至高无上。他或许承认英国有时候需要时间来加快速度，但他们最终将到达那里。在外交政策方面，加拿大的角色是观察并赞同伦敦所设计和指导的壮举。劳里埃曾经只有一次作为“母亲房中的女儿”的经历，是在布尔战争期间。他不希望这种经历成为家常便饭。

然而，劳里埃的确意识到英国政治家是像他一样的政治家。他并不敬畏他们，因为他们被大型舰队和遍布全球的陆军环绕。舰队和陆军像任何其他政府活动一样须花费费用，而且为这样的活动筹钱是政治过程中最伤脑筋的部分。英国弱小而非强大，处于危险之中而非安全，并且资金不足而非极其富足，这是帝国主义自我界定的基本原则。劳里埃将会与其中任何一点产生纠纷。

他勉强赞成英军的一些改革。他几乎不关注帝国会议（原名殖民地会议）上英国大臣的陈述，事实上作为回敬，那些大臣没有告知劳里埃他们在欧洲联盟承担的角色。

像国家其余的人一样，劳里埃花去 1908 年的大部分时间仔细考虑

这个可怕的事实，即在加拿大已经有长达300年的永久性欧洲定居地。受来自魁北克城的地方支持者联盟与总督格雷勋爵联盟的推动，劳里埃与魁北克省省督洛梅·古安（Lomer Gouin）为30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提供了资金。威尔士亲王驾临，讲一口流利的法语，颇像总督。277 具有古老、天主教血统的贵族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rk）也来到此地，令主教们备感喜悦。美国副总统也来了，还有一位法国上将以及沃尔夫、蒙特卡姆、莱维、默里和卡尔顿的后代。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它留下魁北克壁垒永久性历史重建的残余和城市周围有用的公共工程。①

因此当歇斯底里的浪潮横扫这个国家讲英语的地区时，劳里埃在1908—1909年没有做好准备。德国人计划使用当时海军的象征，速度更快且具重型装备的无畏舰突袭英国舰队。英国一定需要无畏舰这种装备的及时帮助。新斯科舍人罗伯特·博登领导的保守派反对党给予危言耸听的辞令。这一唇枪舌战的结果是，博登在某种程度上获胜。

劳里埃确信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平息公众舆论，而且他提议以加拿大海军的形式来做。加拿大海军将包括较小的船只，而不是笨拙的无畏舰，并且这些船只会与加拿大在其海岸或海岸附近实际所需的船只相当。②（无畏舰包括类似船只作为英国联合舰队的一部分只能用于远洋作战。）

一项《海军服役法案》（*Naval Service Act*）在1910年正式通过，海军基地建在哈利法克斯和之前皇家海军所在的埃斯奎莫尔特。此外，当加拿大正在建造自己的船只时，得到两艘退役的英国军舰，两海岸各一艘。依反对党和关注帝国的加拿大人的意见，这还不够。批评家嘲笑到，这是一支“低劣的海军”。

---

① 1908年的事件在H. V. Nelles写的一本极好的书中有描述，*The Art of Nation - Building : Pageantry and Spectacle in Québec's Tercentena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

② 对后一代人来说，劳里埃提议的由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似乎过于浪费。与联合舰队中1艘或2艘额外的无畏舰相比，驱逐舰当然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护航任务中更加有用。

依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者来看，这远远不够。1910 年，在位于魁北克乡村中心地区的德拉蒙德 - 阿萨巴斯卡（Drummond - Arthabaska）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反对党将其代理人乔装打扮，身着蓝色套装，并将其派出去假装计算年轻、军事上可行的男性海军军官人数。这是为劳里埃先生的海军准备的，他们有助于向选举者做出解释。候选人劳里埃因此被打败。

反对党也寻求丑闻这一灵丹妙药作为撬动自由党内阁下台的方式，通过“酒、女人和以权谋私”的方式，然而他们的努力虽然令媒体兴奋，大多数却对劳里埃没有效果。然而，这一党派如其领导者一样正在变老，而且部长们也疲倦了。“我虽然还不显老迈，但我不再拥有对作战相同的热情。今天出于责任我承担了，因为我必须承担过去的‘冲突的喜悦’”，劳里埃在 1909 年 12 月写到。政府在保护政策和劳动法上作出一些较小的进步，但政府需要更多来说明自身确实是与时俱进的。只有一位部长，36 岁的麦肯齐 · 金（Mackenzie King）的确可以说是年富力强，而劳里埃则已年近古稀。

278

为了帮助总理集中精力，西部的农民于 1910 年派代表团到达渥太华，要求对一系列农业问题采取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关税的抱怨，因为关税通过迫使西部的农场主 - 消费者购买昂贵的加拿大制造品而使东部生产者受益。与此同时，农场主不得不在世界市场卖出其产品——谷物。有人提醒劳里埃，多亏了移民，才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农民和更多的西部人。加拿大的政治平衡可能倾斜，而且偏离政府倾斜。

运气和时间选择在政治上是重要的资产。劳里埃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幸运的。他的幸运似乎一直保持着，而威廉 · 霍华德 · 塔夫脱的共和党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其面临与西部农民的问题。如同其在加拿大的同侪一样，西部美国人憎恶高关税，而且他们令华盛顿得知了他们的不满。面对西部共和党人的一次叛乱，塔夫脱寻求与加拿大实行互惠以证明其政府事实上极为关心农场主的利益。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代表达成了一项及时的协议，这一协议恢复了天然产品的自由贸易，而限制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劳里埃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加拿大的农产

品得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而加拿大制造商则保留大部分他们钟爱的保护性关税。一位洋洋得意的财政部长于1911年1月26日对众议院宣布了这一协议。

279 保守党陷入绝望。由于受控于不具号召力的领导者博登以及策略的不成功，他们已经受到加拿大政治终极武器的猛烈袭击。互惠曾是一代人的梦想，由于美国人甚至对此拒绝考虑而总是遥不可及。保守党陷入绝境，于是使出政治家的最后一手：诉诸原则。

幸运的是，有一个现成的原则。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曾在1891年以大英帝国爱国主义的请求反对“不受限制的互惠”。这或许可以再次发挥作用。劳里埃严重低估了加拿大制造商对保护关税的依赖。得以平息的自由党商人由于互惠这一前景而变得蠢蠢欲动，自由党1893年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化曾使他们平静下来。在劳里埃的前任内政部长克利福德·西夫顿爵士的领导下，他们涌向博登。保守党在议会上使用了拖延战术，最后，劳里埃于1911年9月愤怒地要求举行选举。他认为他很有可能获胜。

然而，劳里埃失算了。在英语加拿大，保守党垄断了爱国一方的两个问题：海军恐慌与互惠。互惠被抬高为远远大于通向繁荣的商业安排。相反，它却是导致合并的危险滑坡。“我们必须作出决定”，罗伯特·博登平平地说，“无论加拿大主义或大陆主义在大陆北半部盛行与否”。再没有其他政治人物像美国众议院议长这样说的：他希望看到，有一天“美国国旗将飘扬在英属北美的每一寸土地上，在北极也赫然可见”。

此言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国旗在影院受到一片嘘声。访问加拿大的美国人不幸受到人身攻击。星期天报纸、犯罪和离婚这些美国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将开始盛行。只有博登可以对其加以阻止，如果他对帝国的全身心投入需要证据的话，其对皇家海军“贡献”无畏舰的坚定方针提供了证明。这是在英语加拿大。

280 法语加拿大以一场不同的竞选活动为特征。在这里，幽灵是大英帝国，而不是美国。依据为劳里埃的《海军服役法案》。魁北克保守

党高层意识到他们的政纲与博登的矛盾之处，但他们分析，主要目标是打败劳里埃和自由党。

反对党占上风。在英语加拿大，劳里埃由于支持美国和反对英国而失败，在魁北克，他由于太过于支持英国而失败。保守党赢得 134 个席位，而自由党为 87 个。令人惊喜的是，罗伯特·博登成为加拿大总理。劳里埃以 69 岁高龄再度成为反对党的领袖。

萧条与战争

博登掌权后，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互惠协定》已沦为一纸空文，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海军这一重大议题怎么办？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在魁北克得到 26 个国会议员席位（总票数只比劳里埃的低 0.5 个百分点）。如果博登如其讲英语的加拿大支持者期待的那样继续向伦敦提供资金建造无畏舰，那么将发生什么事情？

像任何明智的领导人一样，博登推迟了这一议题。他将亲自去伦敦，询问英国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这真是令人惊愕的天真行为。至少他不必去若干个月。在此期间，博登推迟了劳里埃《海军服役法案》的实施以及与之相辅相承的“低劣海军”的建设。

总理于 1912 年夏按时出访伦敦，途中获得骑士身份。他问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否需要资金建造无畏舰。不出所料，丘吉尔说需要。此外，博登被允许参加帝国的内部议会，出席了名称堂皇的帝国防御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的一次会议。他未被告知这一委员会实际上运行不良，由于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争论而终止。在任何情况下，出席会议的英国大臣都没有告诉博登真相，即他们需要额外的战舰，因为他们想和其非正式的联盟，即法国人就战船作一复杂的转换。[①]

281

罗伯特·博登爵士高兴却又无知地返回加拿大。他告诉同僚，对

① 为保护英国大臣，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整个英国内阁，更不用说议会了，这一点值得注意；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告诉博登？

海军的捐献将不得不完成。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想要。他的一个魁北克籍部长辞职了，但其他魁北克同僚视党派优于承诺。博登的海军捐献方案在下议院通过，只在加拿大总督指定的参议院受阻。在此滞留是因为自由党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而且在海军事务上，他们可以据理力争，认为博登行为的合法性可疑。博登随即要求针对此事进行选举，但延期了。

此时已经是1914年，保守党的选举前景愈发暗淡。1913—1914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损耗着加拿大，几乎耗尽国家有限的社会服务。有饿死的谣言，但没有自治领政府弥补不足这一建议。春季，博登忙于驱逐一船锡克教信徒（Sikhs），他们以包租日本船只驹形丸带他们到温哥华的方式来逃避加拿大的移民法。在那里，他们处于加拿大旧时的海军的严密监视下，同时，博登与法律作斗争（但他的良心不想这样做）以找到遣送他们回印度的方法。博登是幸运的：锡克教信徒放弃移民并同意回乡，正好赶上总理夏季去马斯科卡的度假。他没有太多关注报纸，尽管他意识到巴尔干半岛地区有一场危机——这已是多年中的第3次。毋庸置疑，这一危机将得到解决。这是英国政府的事，与加拿大无关。

在这个问题上，博登与英国政府完全一致。它关系到的根本不是博登对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刺杀事件的想法。博登对奥匈帝国的危险政治及其如何配合奥地利对制造麻烦的邻居塞尔维亚的支配权的需要一无所知。奥匈帝国得到德国的支持，与塞尔维亚对峙，后者调动了支持它的俄国以及支持俄国的法国。到7月末，双方各摆开阵势以备厮杀，只有大不列颠徘徊不定造成障碍。最终，英国政府意识到如果德国战胜法国，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将大大加强，给自己带来风险，因此不能背叛其对法国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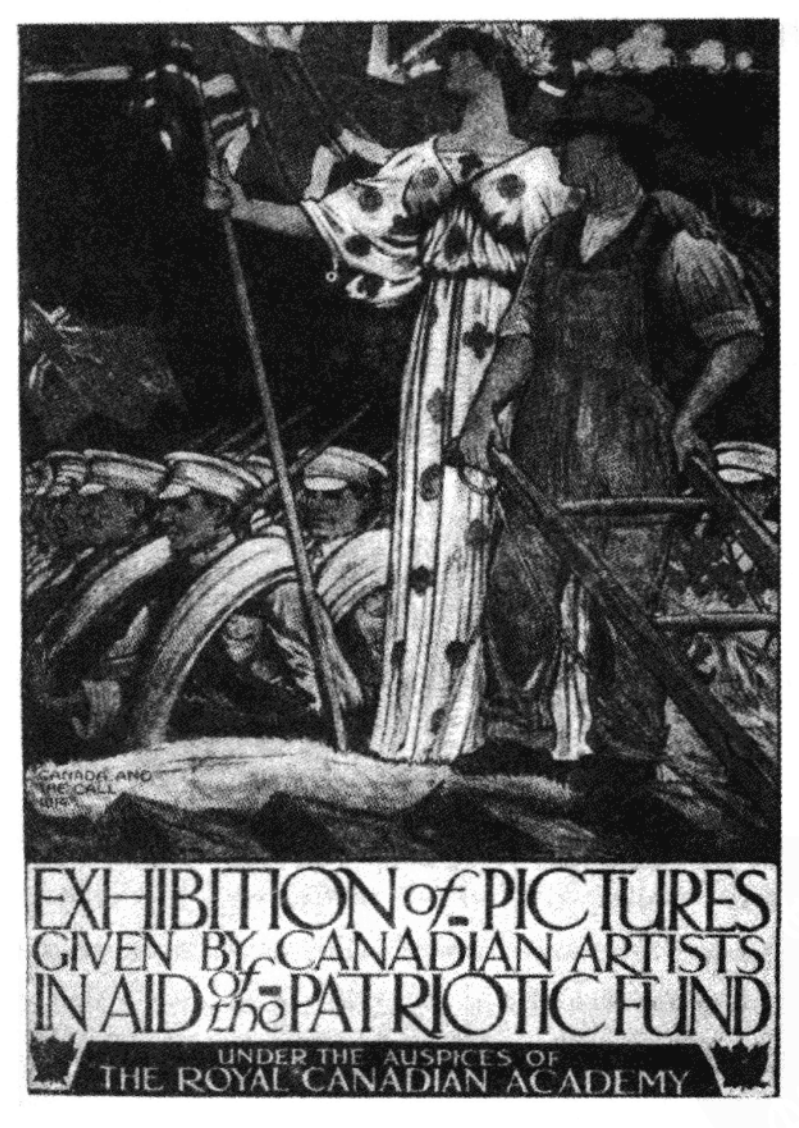
282

德国总参谋部完成剩下的部分，主张取道中立国比利时入侵法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任何国家曾一致同意在任何冲突中都不干涉比利时并保持其中立。因此英国可以加入战争捍卫比利时的中立权——这

是可以告知帝国成员的。英国于 1914 年 8 月 4 日对德国宣战。

这一消息在加拿大某些领域激起很大反响。像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政治与社会似乎不匹配。抓住世界问题表面的政治家的展示激怒了认真的国家。曾经有过太多妥协方案，太多数目小的腐败，加拿大和世界需要果断行动。加拿大军队及国防大臣萨姆·休斯（Sam Hughes）爵士感受到这一需求并听到了动员令。他曾害怕自己或许不能，他和他的命运毕竟不匹配。似乎和平暂时有可能占优势时，他令飘扬在其总部之外的英国国旗降下。8 月 4 日，休斯自豪地将其重新升至旗杆顶端。毕竟，作为英国属地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第十一章　摆脱束缚（1914—1930）



艺术和爱国主义：在这张标牌广告中，一位加拿大佳丽鼓励一个农民为1919年的加拿大爱国基金捐款。

1914 年，加拿大卷入战争；1939 年，又一次因为大不列颠的开战，加拿大被卷入了战争。在许多方面，1812 年战争是 1776 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和清算，所以 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是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285

表面上，1939 年的加拿大与 1914 年比大相径庭。更短的裙子、更鲜艳的衣着和更快的生活节奏成为变化的鲜明标志。但若站在超越人群之颠的地方，街景的画面一如既往。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穿越时间的长河，加拿大道路两旁的纪念碑鳞次栉比。教堂仍司空见惯，也是最明显、为民众常用的建筑。哥特式的、华而不实的或新古典主义的政府建筑颇为引人注目。商业的殿堂，如银行和保险公司亦然。一位评论家指出，位于蒙特利尔多米宁广场上的太阳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坚固而高大，“让人想起罗马帝国”。[①]这些历史的遗迹更令人印象深刻，更加伟岸，因为透过外围的柱子、石块和水泥，其内部由钢梁构架，通过电梯上下。于是，加拿大城市商业区建筑物的高度不断攀升，而小得如里贾纳般的城区在 20 世纪初期和 20 年代时，也修建了 10 层的“摩天大楼”。

市中心仍然是最繁华的地区，也是各要害部门、购物场所和金融机构的中心。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加拿大的中心地带出奇地相似，不仅表现在建筑或街道景观的风格上，还表现在建筑的名字上。加拿大正在变成一个大型公司的聚集地。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的银行系统集中在总部位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且相对较少的银行之中，但每一家银行都有很多支行。（只有在魁北克，合作储蓄的活动，即大 286 众银行设有不同的准则，但即使在这里，国家银行，即加拿大银行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百货商店也很相似，总部设在多伦多的伊顿百货公司和辛普森百货公司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伊顿和辛普森百货公司不仅在城市里发展，还进入了规模不等的小镇，设置了存有商品目录

① 语出埃里克·阿瑟（Eric Arthur）。Kalman, *History of Canadian Architecture*, vol. 2, 738. 卡尔曼（Kalman）指出，太阳人寿保险公司大楼是“拥有大英帝国最高大楼头衔的几个理赔人之一。”

的办事处。加拿大最老牌的公司——哈得逊湾公司也很繁荣，坐拥遍及北部的交易网点。它同样也将业务扩展到了西部的零售业。

生活节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星期天为宗教而留，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除了宗教以外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人们很少有外出就餐的地方，而除了在魁北克以外酒水也几乎没有，从图书馆到电影，一切世俗娱乐都被禁止。对于1900年时的游客来说，所有这些并没有使其惊讶，虽然战争以改革为幌子增添了很多附加限制。

服务并定义日常生活的技术是25年前业已存在的技术的发展。电影院更大、更常见了：任何规模的城镇至少有一处。1927后，有声电影出现了；电话的使用更为频繁；天空中出现了更多的飞机。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只属于私有企业的范围，人们仍然依赖报纸来获知信息。1914年时，人们仍然使用流线型燃煤机车旅行。这种机车将人们载往各处，此外，载客飞机也带有异国风情。柏油路和轿车确实比1914年时多了，但大多数的交通仍像1880年时那样以铁路运输为主。铁路拥有不同的名字并属于不同的人。博登政府被迫将破产的加拿大北方铁路与大干线铁路合并，成为加拿大国家铁路，与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私有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竞争。电报和邮局仍然是城市之间常用的通讯手段。就员工的数量来说，在1914年和整个20世纪20年代，邮局是联邦政府中最大的部门。[①]

287 进步和改革并非只关乎技术及其应用。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家力图限制社会上的恶习，特别是酒类的饮用，并在1914年这一代人身上取得了成功。战争提供了机会，因为在英雄主义的背景下，怎样牺牲也不够伟大。效率和道德共同使禁酒合法化，也就是停止贩卖酒类。结果1939年时，在加拿大想要得到酒远远难于1914年。到1939年，不同之处在于对法律禁令或禁酒令过于严格的顾虑——虽然对很多人来说，禁酒令并不过分。

①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Canada*, 2nd ed., tables D 125, Y 235, and Y 241.

各级政府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繁荣于这段时期的私人酒店之外，饮酒变得极为不舒服——大多数“有执照的啤酒店”存在限制。在这里，人们可以饮用酒精含量较低的啤酒。与通常情况一样，魁北克是个例外。在魁北克，正如渴望饮酒的那一代安大略人了解到的，在和善且可贿赂的警力的监视下，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自然地，魁北克成了其他地方禁酒主义者所引用的坏榜样。

禁酒令和反对饮酒只是1914年出现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趋势之一。城市化是另外一个趋势。直到20世纪20年代，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中，生活在城市的加拿大人占人口总数的大部分，这些在1914年已可预见。随着旧日邻里和乡村关系的远去，城市产生了新的需要。社会和教育服务扩展开来以满足这种需要。

专业素养（Professionalism）——客观、公平、专业——成为1914年以前进步时期的特点之一，在1939年更为明显。从工程师到医生，比1914年更为多样化并且很有可能在加拿大和国外受到更好的训练。在政府和大公司就职的人增加了。总之，出现了更多的管理岗。

1914年的总理——律师罗伯特·博登爵士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作为杰出的专业人士，他曾经在哈利法克斯的一所大学任教，即达尔豪西大学。继他的前任，出生于1841年的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之后，他执政半代人的时间，比劳里埃更加支持这个观念，即进步的果实——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在加拿大可以被大量地发现，并且仅需要适合的沟通，如果必要的话，由国家提供。博登唱出了合理组织的赞美诗，这个组织是进步分子的腔调。 288

与生于1854年的博登相比，生于1874年且于1939年在任的金总理领导了另一代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如劳里埃那样，也是一位律师，也和博登、劳里埃及大多数的加拿大总理大同小异，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以后。他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专业的劳资谈判专家。劳里埃政府将麦肯齐作为专家聘用为首任劳工部长，而他则将自己的才能带入政治生活从而成为劳里埃内阁的成员。1919年劳里埃死后，金成为自由党的领袖。

就个人行为和国家政策而言，没有一个加拿大总理是彻底的禁酒者。[①] 禁酒令是在博登的领导下强制执行的，但是随着强制变得松动，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迅速地预订了苏格兰人的酒水供应。外表诚恳的麦肯齐·金是一个不会拒绝雪莉酒和马提尼的人；在国家正式场合中，他提醒自己只为两件事饮酒——自己和祖国。一想到加拿大，人们便能听到他的轻言细语。如果国家场合需要一个宴会，可能会从清教徒和新教徒为主的安大略开始，跨渥太华河举行，也就是在天主教和自由主义盛行的魁北克——如果考虑到酒的话。

无论博登还是麦肯齐·金都不会过分否定社会传统。事实上，二者通过实现传统来成就事业，自由党的领导人更甚于保守党的领导人。于是，麦肯齐·金成为看上去比博登更为安全的赌注，从而使经历了比前人更多战争和分裂的一代人安下心来。

战争与分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几个月，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加拿大，289 人们是很乐观的。人们欢呼，乐队演奏，政客彼此交换充满决心和团结的誓言。目前，毋庸置疑，帝国发起战争的原因是公正的。正确和错误正在角逐，加拿大必须努力使正义大获全胜。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宣布政治休战，取消了他的所有党派会议。当国会于 1914 年 8 月召开紧急会议时，自由党人全力配合；引导博登使政府的紧急立法《战时措施法》（War Measures Act）成形的是劳里埃。[②] 甚至亨利·布拉萨——蒙特利尔“成功的”报纸《责任报》[③] 的编辑（及创始人）

---

① 消息灵通的读者反对作为施洗者和禁欲者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迪芬贝克以痛饮奇特的啤酒著称。

② 该行为意在赋予政府紧急权力。劳里埃建议在措辞上应该泛泛而谈且留有余地。在宣布战事紧急时，因为它授权枢密院便宜行事，结果将导致联邦政府绕开国会制定法律。

③ 在这一点上，布拉萨对宗教是热忱的。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和“优秀”政府间奇特的混合意味着，他与劳里埃的自由党人共同正确认定的腐败旧模式的终结。作为回应，自由党人将布拉萨的日记和其他相似的文件称为“La bonne presse”。在这个语境中，“bonne”意为“伪善的。”

也认为德国对布鲁塞尔的进攻证明不了英国及其盟国抵抗侵略的正当性。[①]

政府承诺了对战争支付资金、提供物资并派出军队。资金无疑是一个问题。国家正处于萧条期。交易活动萎靡，进口减少，所以成为政府支柱的关税也在减少。政府只有很少的、可支配的经济手段。没有中介银行和所得税。各省有它们自己的税收需要，联邦政府采用了加拿大各级政府面临资金短缺时的做法——到伦敦货币市场贷款。他们贷款成功，但也得到了以后不能再依靠伦敦政府的警告，因为英国政府几乎没有资金可以用于殖民地。在加拿大的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选择——纽约。它是时代变革的标志，而在未来的几年中，时代的变化将更为剧烈。

至于物资供应，加拿大有大量的小麦且收获在即。加拿大向英国提供小麦，礼物被欣然接受。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民兵渴望服役。只有很少的职业军人去抑制有过咨询经历的新兵的热情。国防部长萨姆·休斯爵士极其富有热情，惟恐在他的军队到达欧洲之前，战争可能结束。

休斯对战事的敏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新兵令兵站应接不暇。仅在埃德蒙顿（Edmonton），2 000 名士兵从三军俱乐部行进过来，前面的乐队演奏“大不列颠颂”和法、俄的国歌。[②] 一种似曾相识的激情席卷了全国。显然，魁北克说法语的部分地区是例外。政客们紧随民心，公开反对党派偏见，号召团结。但如往常一样，在未来几个月里，对政治能力和妥协艺术的需要将使党派偏见卷土重来。

290

休斯迅速集结军队，将其安置在魁北克城外的营地，并将他们在未做好准备且未经训练的状态下派往国外，利用了第一次可用的船运。加拿大远征军（Canadian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 CEF），顾名思义，

---

① 1914 年时的“协约国”指英国、法国、俄国、比利时和塞尔维亚。意大利于 1915 年加入，罗马尼亚于 1916 年加入。他们的敌人是“同盟国”——1914 年 8 月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土耳其于 1914 年 11 月加入，保加利亚于 1915 年加入。

② J. L. Granatstein，*Canada's Army*，55.

是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但在加拿大人到达法国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必须学习如何行军、射击和挖战壕。医疗队必须学习如何处理卫生设备和死亡。加拿大远征军处理的第一批伤亡人员是在位于英国的帐篷中，远离战场。

加拿大远征军以业余军人的身份行动，在业余且富有激情却未经训练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开始行动了。[①]（讽刺的是，在技术方面，很少有长期服役的军官被需要——例如，导火线技术和炮术——而且很多军官被留在加拿大以使这里的军事组织正常运行）。一到大不列颠，部队就被英国职业军官增强了实力，特别是在正常的工作岗位上。军衔越高，所需要的技术越高，那么相关的军官就越可能是英国人。

士兵亦然。1914 年前，加拿大欢迎人数众多的英国移民。（1911 年时，加拿大 1/10 以上的人口出生在英国。）[②] 很多移民对自己的所见感到失望：加拿大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1914 年，有很多单身汉，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工作，结果流动性很强。加拿大作为机会土壤的盛名变得牵强，特别是在面对有关城市中贫民窟里第三世界国家般的生活状况的报道时。据说在蒙特利尔，婴儿的死亡率与加尔各答相同。很明显，加拿大士兵并没有太多顾虑。第一支人数为 36 267 人的分遣队——1915 年 3 月底才开拔——有 23 211 人是英国移民，其中，10 880 人在加拿大出生，在出生于加拿大的这些人当中，有 1 245 人是法裔加拿大人。[③]

291

很明显，加拿大从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战争。确实，没有对参战的真正抵抗，但是不安的迹象潜伏在表面的

---

① 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散文的一处错误，“大英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见 in Judith M.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0，文中声明加拿大军团统帅，将军阿瑟·柯里爵士（General Sir Arthur Currie, 1917 – 1919）是“战前就很专业的军官”。事实上柯里是一位不动产代理商和民团军官。J. L. Granatstein, *Canada's Army*, 94 – 95 页评论，直到 1916 年，将加拿大军队通常理解为市民的军人“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士兵和军官通过艰难的经历变得很专业。

② 720 万中的 804 000 人。

③ J. L. Granatstein, *Canada's Army*, 57.

激情之下。蒙特利尔的报纸指出，也许法裔加拿大人可以参加与法国军队并肩作战的队伍。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参军。加拿大通过船运小麦和其他商品就可以很好地服务帝国。一方的犹豫与另一方的怀疑相配。在蒙特利尔，警察甚至劝阻国民唱《哦，加拿大》，而鼓励唱官方国歌《天佑吾皇》。

存在使英国人摆脱法国人的话题。通常也有嫉妒，即对其他语言和天主教的害怕，另一方面是对新教徒的害怕。在说英语的省份，就法语作为教育用语充满争论；在西部抵制法语；在安大略，法语受到攻击。在那里，省政府禁止在学校体制、公共和私人场合中教授法语。政府的行为得到了安大略说英语的基督教阶层的支持，并由学校的督学小组强制执行。[①] 那么，当留在本土遭到否定的情况下，法裔加拿大士兵如何能够在国外为正义而战呢？

联邦政府对学校和语言几乎束手无策。1896 年在马尼托巴的最后一次尝试受到严重挫败。博登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更不关心他内阁中软弱的法裔加拿大团体会告诉他些什么。保守党的安大略政府，一如博登，内阁中有其强有力的支持者，拒绝改变。于是，博登袖手旁观。

安大略学校问题必定使加拿大法语和英语世界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雪上加霜，而且在冲突中，并未能鼓励法裔加拿大人征募新兵。但是法裔加拿大人对出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厌恶已然形成——南非战争和 1909—1913 年海军争议的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就加拿大一些重大的公共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西部的语言和学校、里埃尔叛乱都是鲜活的例子。 292

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和解和妥协也有很强的传统，特别是在两大政

---

① McGowan, *The Waning of the Green*, 244 -246 页中指出安大略说英语的主教害怕天主教徒的教育作为整体将会受到安大略人对使用法语教育的怨恨的威胁。在这一时期，对移入安大略东北部说法语的移民有很大担忧。有些人认为，这样危及了说英语的和新教省份的特征。该观点见 Susan M. Trofimenkoff, *The Dream of Nation: A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Québec*（Toronto：Gage，1983），203 -205 页。

党，即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劳里埃几乎是传统的完美化身，在层层阻碍中迂回行进，权衡利益与偏见，在必要时让路，一路前行。像蒙特利尔和魁北克这样的城市，都有它们自己较小形式的体制。政治和商业中的掌权者使用两种语言，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在蒙特利尔，1914 年前，市长由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轮流担任，甚至在 1914 年后，虽然市长的职位长期掌握在法裔加拿大人的手中，说英语的人仍然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帝国的重大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法裔加拿大人并非共和党人。杰出的法裔加拿大人接受了被授予的大量骑士身份并热心地参与君主国中的民间风俗活动——各种盛况、游行和仪式，还有对到访皇族的顶礼膜拜。同样重要且生动的教会仪式也属于民间活动，教会也更加普遍，因而被认为能够更多地服务日常生活。罗马天主教会不过是破坏性力量，它的等级制度从未质疑当权者，至少是在公共场合——教会和主教当然也是当权者的组成部分。教会也为那些不满于法国少数派或在新教徒居多的国家里难于成为天主教徒的人提供了选择。

然而在加拿大，英语和法语人群之间长期紧张的局势正在酝酿之中。英裔加拿大人同意只有一个加拿大民族，一个大英帝国的构想和多种加拿大特性。少数民族（Ethnic Groups）从属于这个民族的个性。至多，这些种族的差异可以加强这个国家里人数较多的民族，而不是与其发生冲突。[1] 正如史学家阿瑟·西尔弗认为的那样，这种方法使法国人并没有严格地区别于威尔士人，可能还有爱尔兰人。[2] 但爱尔兰裔加拿大人能通过语言表现出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前，他们可判断与国家中说英语的（虽然为新教徒）大多数人之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同宗天主教徒。

293

① Bill Waiser, *Saskatchwan: A New History* (Calgary: Fifth House, 2005), 73 -74, 231 -232.《新编萨斯喀彻温史》追踪大草原上非英国移民的反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少数民族和对一致及同化与日俱增的压力间的鸿沟变得更大了。

② Silver, *French - Canadian Idea*, 263 -266.

此外，法裔加拿大人没有被相同的情感触动，也没有像他们的同胞那样，受到心理诱惑的影响。加拿大的政治通常会顾及这种区别。一般情况下，政客避开区别，这是劳里埃的伎俩。即使是亨利·布拉萨在承认现今存在区别的同时，也预测了有朝一日说英语和说法语的民族会合二为一，只要英裔加拿大人放弃帝国的荒唐事，放下他们种族优越感的借口。不像劳里埃那样，布拉萨没有试图逃避或避免加拿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且不像那个时期的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那样，他并没有躲入分离主义的幻想。①

而布拉萨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无论何时何地都向说英语的加拿大人解释，将对帝国的奉献表达为全心全意地参战是错误的。安大略的法裔加拿大人所面临的悲伤才是最应该被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远处欧洲的不公正和帝国的兴致。但不幸的是，1914 年 12 月，他几乎是在渥太华的戏台上被围攻，最终被经理落下的幕布所救。② 对法裔加拿大人，他说了同样的话，甚至更决然。在那里，他的话引发更为强烈的共鸣。“在宗教的名义下，对英国国旗的自由和忠诚，”布拉萨在《责任报》上写到，“法裔加拿大人被命令攻打欧洲的普鲁士。应该让安大略的普鲁士人像主人一样统治他们的自治领吗…在英国国旗和制度的庇护下？”③

1917 年 6 月前，估计在服役于加拿大远征军的 619 636 人中，有 35 000 人是法裔加拿大人。这些人当中有 14 000 人于 1917 年 7 月之前志愿参军。实际数字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多，因为 619 000 人中有 228 000人出生在英国。总体来说，只有一半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英国移民和未婚男性比其他省份都少。（在移民人数较少的海滨省份，　294

---

① 霍兰的《大英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制造了布拉萨是一个分离主义者的荒唐说法。

② 渥太华报纸《周报》上激烈的社论，与产生和激励一群急于登上政治舞台的士兵有很大关系。布拉萨的一位英裔加拿大赞助商 A. C. 格伦尼（A. C. Glennie）遭到殴打；第二天他的妻子痛斥报社主编。然而，格伦尼还是被解雇。Wade，*French Canadians*，659 页对这起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③ 引自 Wade，*French Canadians*，660 页。

新兵的人数比安大略和西部都少，虽然不像魁北克那样少。）与其他少数族群相比，更多的加拿大人是农民。农民想要穿越国土，参军入伍的速度很慢（如果可能的话）。然而，无可争辩的是，法裔加拿大人参加武装部队的数量或所占比例都比不上英裔加拿大人。当时，这个事实本身被很多人评论，特别是在英语媒体中，而且可能使魁北克的新兵人数更少。

法裔加拿大人的新兵招募并非完全失败，而且一些民族主义者也入伍了——如杰出的政治家奥利瓦尔·阿塞林（Olivar Asselin）。布拉萨的堂兄塔尔博特·帕皮诺（Talbot Papineau）也参军了，而且与自己的亲戚就参战的正确性在媒体上展开了广为人知的辩论。虽然休斯并未直接鼓励清一色的法裔加拿大人部队，但是一些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部队形成了，最成功的当属第 22 营（现在的皇家第 22 步兵团），至今依然还在。

直到 1916 年，战争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完结，加拿大的政治进入了一个僵局。新兵的招募变得如同涓涓细流。对牺牲、正义和共同事业越来越疯狂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应。在劳里埃的赞同下，博登政府把本来将于 1916 年秋就会结束的任期延长了一年。那时博登踌躇满志地讲出，劳里埃不太可能同意另一年的延长任期。无论有无战争，1917 年初，政治回到了过热的状态。

政治、资金和军需品

加拿大的问题看上去被总理罗伯特·博登爵士犹豫不决的领导恶化了。博登，新斯科舍人，当时是加拿大顶尖的律师之一，从 1900 年起成了保守党的领导人。1911 年成功当选总理之前，与劳里埃的两次竞选均落败。到了 1915 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无论下次竞选什么时候举行，他都会遭受另一次失败。

295

博登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作风都慢条斯理。他的决断和党纲宣言表明，他是一位改革家，但在其前 3 年的执政生涯中，鲜有成就。1914 年，他应时机所需行事，但并非大胆而主动。博登通过政客们完成事

务，即部长——他的党派所提供的人。他们是一群靠不住且没有价值的废柴。1915 和 1916 年，保守党正处于衰落阶段。随着马尼托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保守党政府每况愈下，看上去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要做什么呢？

当他的国防部长萨姆·休斯爵士引发了政治问题时，博登的行事更加缓慢。不久，休斯便在他的军队中变得不受欢迎。军中流传着与该部长相关的故事——他的密友如何得到供应合同（确有此事）；如何荫庇自己的公子变成和其父一样的将军（不容辩驳）；他的行为如何反复无常，古怪难测。听说有一个服务生，因为提供快速服务而得到了成为军官的奖励。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只要貌似可信，便有人相信。

最声名狼藉的就是罗斯步枪事件（Ross Rifle）。它是制成于魁北克且又因一位神射手得名的枪。休斯偏爱罗斯步枪，不喜欢英国规格的步枪，即李·恩菲尔德短步枪，即使前者很难上膛、经常卡壳且在泥水中根本无法使用。军队一有机会便以骗取李·恩菲尔德短步枪作为回应，同时因为罗斯步枪诅咒这位部长。

结果，休斯消减了政府的实力，甚至在政府的支持者中亦然。关于生产大炮炮弹的承包商的丑闻爆发了，直指生产的炮弹质量差且数量不足，而且丑闻的根源在于休斯。

作为回应，博登逐渐解雇了当局的部长，并于 1916 年任命了一名领导新海外军队的部长。让博登放心的是，休斯辞职了。休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在战争时期治军所需要的只是旧政治中经过检验的方式——偏爱、赞助还有爱国主义。博登知道，这些条件不再管用，而且除非政府更多地表现出专业性和客观性，否则它是不会生存下来的。

296

博登无法接受很多政治上的普通事务。他与政府部长的相处很不融洽。他们认为，他不能理解保守党需要比“好政府”的“稀粥”更强的生计。从短期看，他们是错的；但是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很难逃避这样的结论，即博登毁掉了现存的政党结构，没有将政务落到实处。当事实变得明朗之时，战争结束了，博登也离开了。

总理并未因为休斯的插曲而蒙受太多的损失，但并不能因此说明他是个自信且坚定的领导人。外部情况刺激他改造政府及其目的，随着加拿大的伤亡人员的增加，军队被派往国外，在此时存在的政治体制下，很难维持他们的生存。博登得出了结论，即对他们的牺牲需要给予不同的回应。战争打破了加拿大的政治模式——这取决于博登通过什么来转变它。

战略与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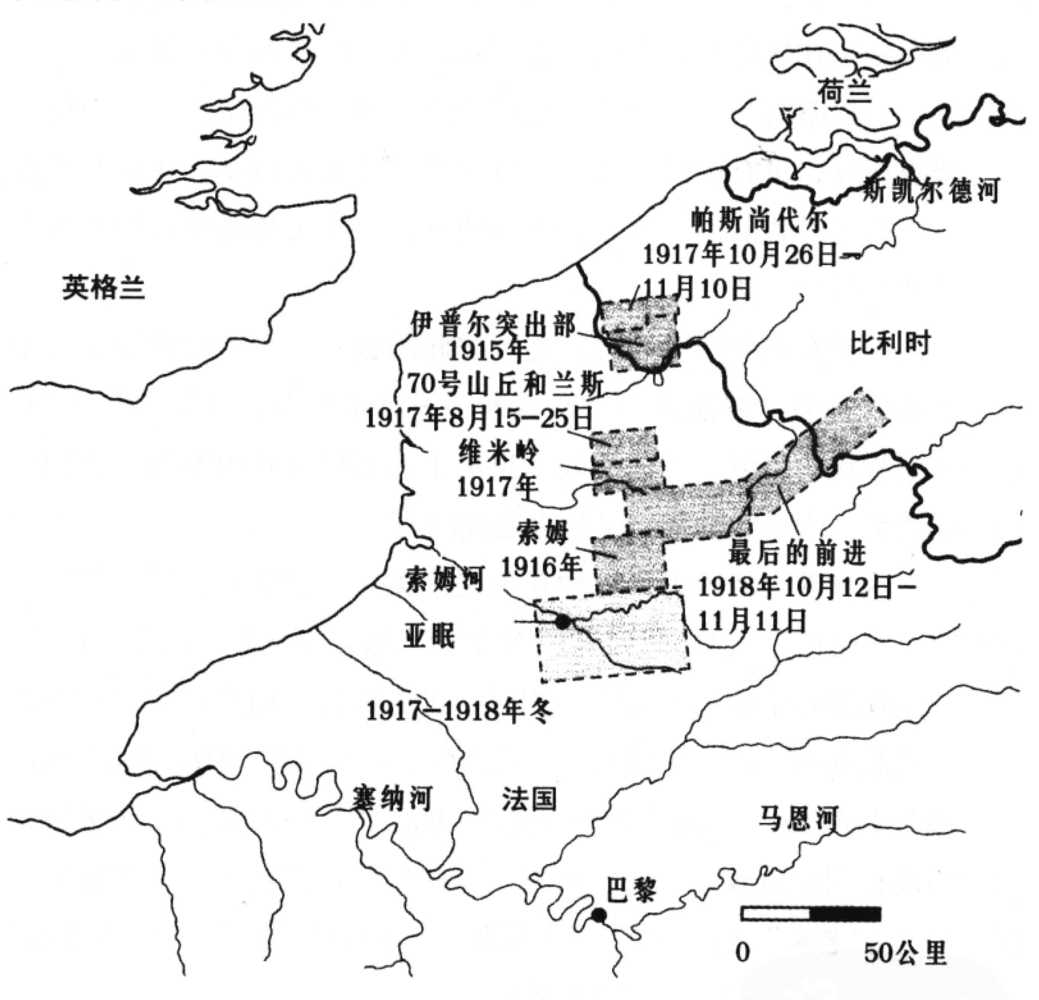
加拿大志愿军，即加拿大远征军，被编入英国志愿军，即英国远征军（BEF）中。1914 年，大不列颠是唯一不必依靠征召来补充军力的参战国。结果，与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军队相比，英军的数量很少。这些军队已经为战争计划了很多年，还有基于铁路线和时刻表精心安排的运输计划。行军且维持军队是一项巨大工程，一旦开始，很难收手。

297 1914 年的战士不愿意停战。他们在两条战线展开了战斗，即在德国的东西两处边界上。德国人在与俄国人交战之前，先在西部边界发动攻击，对战法国强大的军队。他们没能打败法国人，也没能攻占巴黎。虽然伤亡惨重，但法国人在其攻打巴黎之前拖住了德国人，并使用一系列战术从侧翼迂回，将战线拉至比利时的北海岸。沿着这条路线，他们挖掘战壕。直到 1914 年 12 月，一条战壕——“西线”从瑞士的边界开始，因为瑞士是中立的，直达伊普尔（Ypres）。

英国与法国的军队在伊普尔会合。1915 年春，第一批加拿大士兵被部署到前线。德国人选择伊普尔试验新型武器。他们的化学家调制出毒气。德国的指挥官命令向协约国战士释放毒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效果。一些协约国战士撤退，但是加拿大士兵坚守战地，德国人终究没有突围出去。毒气标志着这场战争比以往的冲突更为可怕，但却是唯一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他战争不同的武器。毒气被双方均用作攻击武器。对于协约国而言更为容易，因为盛行风来自西方。防毒面具很快衍变成长袍，而毒气并没有成为像它的投资者希望的

武器。

坦克是战争后期的产物。1916 年，坦克第一次在西线上被应用，开始的时候作为可运动的炮台。由英国人发明，坦克被其他主要的参战国模仿，重装但动力不足，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应用便出现故障。由于这些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只是边缘武器，有时有帮助但绝非具有决定性。



加拿大远征军的主要战役，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前线充斥着大炮和机枪的战争，供应品——食物和军火则在后方。对于步兵，大炮应该通过炸毁敌人的战壕清理出一条道路来进行攻击。此后，步兵将“突破”，骑兵则穿过步兵取胜所形成的缺口。几乎 4 年来，骑兵一直在等待，对于他们来说是幸运

299

的，因为双方的步兵都没能突破防线。他们没有取胜的原因是防御的力量，又一次关乎双方：战壕内置机枪且设有据点。据点由水泥筑成，在大炮轰炸时，军队可以在此避难。数以吨计的被进攻方[1]使用的炮弹可能更有利于防守，而非进攻，因为它以相当机械且可预测的方式标志着进攻正在进行和将会在哪里进行。

虽然战术很奏效，但是军队的目的并不是获得土地，而是击垮敌人。敌军必须在战场上被击败、杀死或俘虏。战术本身有意义，问题在于战术与战略的脱节。特别是在协约国方面发生的情况，因为德国的战壕更深厚，筑有更好的防御工事而且设计更为精良。在这些战壕的后面，火车沿着前线，从后方呼啸驶来，将援兵和物资运给人数众多且彼此交战的军队。

军队并没有花费全部的时间进攻彼此的战壕。大多数的战争处于令人厌倦的时期，被强烈的恐惧打断——对站在自己战壕的最上面，直面敌人战壕的恐惧、对一个敌军狙击手的恐惧或对敌军炮兵压倒性炮击的恐惧。大多数的伤亡是炮火造成的。[2]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另一种现象受到关注。它是现代时期的第一次大战，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战死人数多于病死的战争。医疗、组织、运输和补给的进步意味着相对于过去而言，伤员可以得到更大的机会获救和被运出，并得到更好的治疗。（“一战”中加拿大士兵的死亡率是114‰；“二战”时这个数字更低。）[3] 一旦受伤，伤员将向后方撤离，到达急救站或战地医院。那些伤势严重的人，将被送回英国（“英国老家”是当时的流行用语——这样的伤痛是“英国老家”的伤口）得到更好的护理和康复治疗。

300

军队技术和组织的日趋完善，使458 000名加拿大士兵漂洋过海

---

① 12 000吨炮弹被射出，成为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前奏。

② David Stevenson,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149. 战役中58%的死亡是拜大炮所赐。

③ www.junobeach.org/e/4/can-tac-med-org-ep.htm: “The Army Medical Organization.”

的，那些有效率的工作人员，令士兵能够穿衣吃饭、训练他们且疏散伤员并提供护理，所有这些使战争的继续成为可能。

战争持续了 4 年多。统帅们所设想的大决战根本没有发生。每年，将军们都向政客们呈递计划。由政客们决定扩充军力、补充供给和为战争花费多少资金，但他们发现这些永远不够，政客的承诺融进了战壕的泥土中。

政客责怪统帅的失败，这些失败都是真实的，而统帅责怪政客的补给不足，而这些不足部分是想象的。他们并没有责怪政客们真正的失败，即设置了不可谈判的战争目标，或者通过取胜达到目的，或者被迫接受失败。有时，政客们鼓起勇气想要开除一、两位将军，但是由于军事指挥官已经变成了值得崇拜的人物及希望、本领和勇敢的象征，所以很难这样做。英国远征军中只有两位最高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Dir Douglas Haig）。1915—1919 年，在法国领导大英帝国军队的黑格见证了 1916 年灾难性的索姆河战役、同样惨烈的 1917 年进攻佛兰德斯的战役和 1918 年亚眠英军的几近失败。战争的结果只以成千上万英国人的死伤衡量，包括 200 000 多名加拿大人（56 000 人阵亡，150 000 人受伤）。

政客们怨恨统帅所做的事，但是他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毕竟政客是决定战争目的之人。交战国之间对战争目的的绝对不一致决定了战争的旷日持久。协约国——大不列颠、法国和俄国很早便达成协议，不求一己的和平，而是要努力坚持下去。他们宣布，要为正义和法治的原则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阻止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而战。虽然协约国不知道细节，事实上这正是德国人的目的。

301

从耗资和用人这些方面来看，战争比任何参战国预测的成本都要高，在平民中对牺牲的超凡价值的宣传是很有必要的。胜利的果实增多了，而失败的危险也增多了。敌人的恶行并没被留给想象力，而是由宣传机器释放出来。加拿大人从报纸和公开宣传中得知，德国人（继古时的野蛮人后被称为匈奴人）在经过比利时和法国的时候，一路烧杀抢掠。战争海报描述了残忍的匈奴士兵；政客和宣传家以此为

平台传递信息；大臣和牧师在教堂里进行详述。成年累月，修辞上的犀利使其越来越难达成任何妥协式的和平，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是一无所有。在国内方面，战争将在战场上决出输赢，不是在议院中。

后方是一处弱点。在俄国，软弱的政府、混乱的政局，加之经济的瓦解和军事上的失败动摇着帝国的根基。1917 年 3 月，沙皇被废黜，由资产阶级政客和工人中的好战者组成的不稳定联盟取而代之。而后者在 11 月时被 V. I. 列宁（V. I. Lenin）领导的俄国社会共和党中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推翻。列宁宣布自己代表着工农的利益。1918 年 3 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将俄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同意任何能够令德国人高兴的条件。德国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以此给世界上其他各国一种德国独裁下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证明了战争结束和自身的生存是有可能的，而且在 1917—1918 年的环境中，他们的例子是可以“传染”的。

意外与先例：加拿大和大英帝国

302 1914 年前，加拿大没有，也不能拥有外交。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加拿大享受着内部自治，包括立法规定税收的权力，关税也包括在内。作为关税自主及与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各国协商和实施贸易协定的扩展，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通常经过英国的同意）得以执行。但是在国防政策和其他政治层面的外交政策方面，加拿大接受宗主国选择的任何事。如果事件足够重大，如南非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拿大注定要参加。1914 年 8 月，当英国内阁决定参战的时候，没有加拿大代表在场。当英国大臣收到关于战争的情报或决定战争政策时，也没有任何加拿大人在场。

显然，英国大臣对本国选民而非对加拿大选民负责。他们的决定涉及加拿大，而也合法地代表了加拿大的外交事务，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要管理加拿大的政治或处理帝国决定在当地引发的结果。那些问题被留给了博登和加拿大内阁时，与帝国的王位和战争相距 6 400 公里的博登才有自己优先考虑的权力，即使在 1914 年夏、秋两季，它们仍

被帝国的职责所取代。

1914 年之前，帝国的职责都没有对加拿大施加太大的压力和成本。现在，他们这样做了，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呈现出与 19 世纪 30 年代前一样的状态。如果殖民地以现金或实物为补偿，它的部长假定存在在继续且似乎不确定的基础上榨取人民和钱财的政治危险，那么帝国政府与殖民地联盟之间必定存在磋商和责任。

问题在于代表和责任共存的地方没有制度和组织，也有交流和距离的老问题。这是习惯的力量，因为英国的大臣不习惯与殖民地同等官职的官员议事。一些英国的政府成员想知道作为对英国主权的分享，如果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独立，会不会一劳永逸地将事情解决。[①]

303

1915 年夏，博登出访英国。他发现了犹豫、困惑和不团结，而非意志和决心。加拿大的贡献——到此时派出的几个师的军队——得到赞赏，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加拿大总理如何或是否战争会取得圆满的胜利。当他返回加拿大时，博登又一次发现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怒不可遏的他于 1916 年 1 月起草了一封信，信中将自治领在帝国中的地位比作"玩具机器人"。他接下来又问道，"这是仅由英国发起的还是由整个帝国发起的战争？"[②]

然而，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英国的政治也摇摆不定，而政客们则不专心于政务。同时，博登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加拿大，1916 年新兵的招募很不顺利，安大略学校引起的争端愈发棘手，而且有关散布战争条约的丑闻更是使政府陷入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登使自治领在战争的规划中争得更多发言权的要求变得力有不逮。

当出现答案时，是大不列颠而非加拿大的政治发生了变化。1916 年 12 月，英国政府中资格较老的自由党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即前军需大臣击败了前任首相自由党人 H. H. 阿斯

---

① 一位蒙特利尔保守党党员写给博登的报告中尖锐且不赞成地提到英国自由党政府成员是这种情绪的来源。Stacey，*Age of Conflict*，186.

② 博登致加拿大驻英国联络官乔治·珀利（George Perley），1916 年 1 月 4 日，在 Stacey，*Age of Conflict*，192 – 193 页中有引用。

奎斯（H. H. Asquith）。劳合·乔治暂时认识到了从军事和经济上自治领对英国战争的重要性。作为具有善于思考新模式头脑的实用型政治家，劳合·乔治发现很容易将自治领作为英国政治的一个因素。他立即要求包括博登在内的领导人来到伦敦共同协商战争策略。为了管理自治领的代表，劳合·乔治组建了帝国战时内阁（Imperial War Cabinet）——本质上就是由大多数高级大臣和自治领代表组成的英国战时内阁。①

1917年2月，博登到达伦敦，正好见证了英国人对俄国内战和4月美国参战的反应。[博登对美国政治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的了解不如其英国同僚，虽然他并不承认。]帝国大臣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由菲尔德·马歇尔·黑格领导的，在法国新一轮进攻的批准，如同他新近获得的一样。黑格很乐观，帝国战时内阁给了他所需要的。大臣们也讨论了在英国和加拿大开始变得枯竭的人力。这一点博登从自己的经历中便可得知——在法国为军队招募更多的新兵已经变得非常困难，登记男性人口服役年龄并没有引起军队人数的激增。因此没有足够的兵员补充。

博登利用出访伦敦的机会，慰问了位于法国的加拿大军队——现有的4个师被组织成“加拿大军团”，由加拿大军官阿瑟·柯里（Sir Arthur Currie）爵士有效地带领，在最后对维米岭（Vimy Ridge）的一战——算得上大型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博登在军医院时尤其受到感动，且在离开时确信为了保持前线军队的信念，必须派出援军。

1917年5月，博登返回加拿大，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要通过征兵的方式强制入伍。他知道这样的方式具有争议，尤其因为征募新兵的人数表现出，法裔加拿大人自愿入伍的人数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本不能对等。于是，博登努力说服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为他和自由党人保留半数的内阁席位和除总理外的任何职务。

① 自治领代表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纽芬兰的总理，还有南非国防部长杰·史墨兹（Jan Smuts）将军。当然，就对英国参与和提议的价值来看，史墨兹是最重要的。

劳里埃拒绝了要求，这也可能是他最重要的政治决定。党派的忠诚很强烈，老牌自由主义者对征兵和强制的厌恶也是如此。征兵和强制并没有使加拿大和加拿大自由党人受到限制。劳里埃意识到并害怕魁北克的结果。如果他加入联盟或联合政府，将会把魁北克拱手让与亨利·布拉萨和民族主义者。他不会这样做，而且呼吁自己的追随者以其为榜样。 305

自由党中很多说英语的领导人本来更愿意接受博登的提议，但是，对于他们还存在一个问题。甚至在英语加拿大，党内的普通成员都不愿意与劳里埃分裂。在安大略和西部，很多自由党人是近期的移民，对不列颠民族和爱国主义没有感情。很多人是农民，而且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抵制征兵。沿海省份中传统意义的自由党人也在犹豫。

博登不得不提议必要的政策，还有政治上的安全。他通过《战时选举条例》（*Wartime Elections Act*）完成。该条例剥夺了1902年之后从敌国移民加拿大的任何公民的公民权。这意味着大多数奥匈帝国人被剥夺了公民权。有良心的科波尔派和门诺派的反对者也失去了选举的权力。条例产生了真正的选民——军人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在另外一则法案中，他们的投票可在其任意选定的选区或已为他们划定的选区进行。1917年8月，博登通过议会与征兵发生摩擦。政府的选举立即变得明朗，通过博登将农民从征兵中免除的承诺得以进一步兑现。给农民和其他魁北克以外选民的印象是增援部队将在这个省份中被找到。[①] 非魁北克的乡村选民突然对保守党人和其他选择在博登的旗帜下行事的人变得更加友好。

选举被安排在1917年12月。正如博登所期待的那样，他聚集了持有不同政见的自由党人。这些人为安大略和西部的政府注入了力量。问题因为党派的目的被简化了："我们想要德国人的统治吗？"萨斯喀彻温的一份报纸问道。[②]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选劳里埃；如果不是，

---

① J. E. Rea, *T. A. Crerar: A Political Life*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55 – 56.

② 在 Waiser, *Saskatchewan*, 282 页中有引用。

博登才是要选的人。劳里埃发现，在自己领导的法裔加拿大党派中，

很少伴有党派忠诚。这些在劳里埃的旗帜下行事的英裔候选人知道他们已几近失败——像前任劳工部长麦肯齐·金。他开始犹豫，但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者说是正确的决定被强加于他。1917 年，他将败北，但在失败的过程中，他将建立一个忠于劳里埃的公共纪录，而且成为加拿大英裔和法裔之间妥协的原因。

博登赢得了大多数席位，而且他得到了兵员。他的追随者也赢得了几近宣扬种族仇恨的竞选，种族仇恨在魁北克是不能被遗漏的。1911 年，博登并没有对于取胜的方法过于挑剔——这是不择手段的典型例子，急功近利，但是政治并不只为现在行事，也会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1917 年魁北克的竞选在此后的 20 年中一再被重复，保守党承担了严重的后果。

为数不多的增援部队来到法国，包括来自魁北克的应征入伍者。博登实现了部分目标，但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代价。事实上，如果劳里埃赢得的不能称为竞选，那便是斗争，虽然这是一场他宁愿希望没有参与的竞争。作为自由党的领导人，他觉得被自己过去的一些伙伴抛弃和背叛了。但是在魁北克，是劳里埃而不是布拉萨取胜。布拉萨成为了局外人。对博登及其政策的反对仍在魁北克自由党人的手中，且自由党人是执政党的精华。即使此后布拉萨不是分离主义者，且没有鼓动魁北克从加拿大联邦分离。①

当然有对征兵的逃避，也有其他形式的反抗。在魁北克，来自安大略的军队对乱党开火，但是叛乱并没有扩张而是平息了下来。至 1918 年春，发生在魁北克的反抗是博登最不担心的。3 月，德军袭击了法国的英军战线，而且几乎突破了进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军事失败，博登违背了竞选时的承诺，开始对农民子弟征兵。②

---

① 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声称，“布拉萨作为魁北克公认的领导人代替了劳里埃”。其论据明显是错误的。见 Holland，*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126 页。

② 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农民特别生气，而且大声表达出不满。J. E. Rea，*T. A. Crerar：A Political Life*，55 –56.

1918年春，博登前往伦敦，又一次出访帝国战时内阁并待到8月。笼罩在议会、大臣心里的就算不是绝望，也是满腹狐疑。毋庸置疑，战争会继续，问题是它将如何进行。答案如常简单，更多的一切——更多的援兵与更多的为一切所支付的税收。与实际相比，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在经济战线上，加拿大政府做得比预期的好很多。 307

虽然博登的征兵措施的结果令人失望，但他对工业的动员没有重蹈复辙。一旦生产军需品的责任从萨姆·休斯身上转移，军工生产（War Production）就变得兴旺起来。在加拿大，军备生产的责任由加拿大政府转给英国人。在一位多伦多商人约瑟夫·弗拉维尔爵士（Sir Joseph Flavelle）的指导下，1918年时，所有种类军需品的生产均大幅度增加。估计西线有25%的弹壳来自加拿大。

更令人惊奇的是，支付军工生产的资金均来自加拿大。博登政府向伦敦借钱以开始战争，然后是纽约。税收增加了，适度的个人所得税被征收。[①] 联邦政府对此事很纠结，因为这样做代表对以前被留给省或自治市的征税权力的侵犯。然而，大多数资金来自在加拿大出售债券——1917、1918和1919年的胜利贷款提供了几十亿加元，被超过100万名认购人购买。[②]

结果，1918年，博登代表更加强大、更少从属的加拿大。甚至可以说——而且就是——现在英国人才是依附的一方，利用加拿大资金购买军备；用加拿大制造的武器开火；吃加拿大出产的食物；依靠自治领的士兵（大多数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作为英国远征军的奇兵。博登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陈述了不胜任的将军、不称职的参谋人员和误导的战略。与乔治和其他自治领的首脑一起，他接见了能接

---

① 虽然叫做战争所得税，但它不仅代表强制税收类型上的革新，还有对“直接税”的介入。这最终会扰乱各省，限制它们提出的共享税务司法权。在1918年自治领－省级会议上，各省催促联邦政府将所得税的一半转交给他们。Christopher Armstrong, *The Politics of Federalism: Ontario's Relation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1867－194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128－130.

② 1915和1916年间存在几个小问题。见R. C. Brown and G. R. Cook, *Canada, 1867－1921: A Nation Transformed*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74), 230－231页。

308 替菲尔德·马歇尔·黑格作为英国远征军统帅的候选人，为其下一次失败做出了妥当准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8 年 8 月，黑格成功了。德军被 4 年的战争拖垮了，连从以前的东线调来的援军也人手不足。加拿大军队在法国的亚眠（Amiens）取得了突破，带领英国人进攻比利时。加拿大士兵 3 年来首次穿越如地狱般的弹坑和战壕，深入还未被战争摧毁的田地和树林。随着 10 万美军的到来，德军彻底溃败了。他们的最高统帅要求立即结束战争。随着德国使者急于面见协约国的统帅——法国人马歇尔·斐迪南·福煦（Marshal Ferdinand Foch），威廉二世逃走，共和党人在柏林掌权。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时，战争停止。此时，加拿大军队兵临比利时的蒙斯城下。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一次小规模冲突中，一些加拿大军人阵亡。（一个来自萨斯喀彻温的加拿大人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协约国士兵，此时为上午 10 时 58 分）。德国人与协约国签订了停火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和平将于数月后在巴黎和会召开后到来。

战争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巩固了大英帝国。德国海军的威胁完结了。代表英国的猩红色遍布世界地图。1919 年大英帝国的力量占据着多于地球 1/4 的大陆块。英军在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巡逻；巴格达和耶路撒冷被英军占据；海参崴和摩尔曼斯克有加拿大军队，作为英国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干涉的一部分。

协约国及其“参战国”，即美国的领导人在巴黎会晤，确定德国有义务接受的和平条约。罗伯特·博登爵士作为大英帝国的代表，同309 时作为加拿大总理参加了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加拿大在巴黎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博登坚决要守住这块地方，劳合·乔治确保他的盟友对此安排的赞成。博登认为加拿大在战争中的牺牲需要得到承认，他指出，无论军事成就还是经济上的重要性，现在的加拿大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博登并没有将加拿大完全成形的独立计划带到巴黎。独立的主意会吓倒他；他想要的就是一个可以使自治领和英国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共同统治权。1917 年，放弃承认英国的任何优越和监管，博登与南非将军史墨兹劝说帝国会议承认他们的自治政府。两者直到战后才离开，那时帝国的体制安排进行了完全的修改，而且最终的权力在英国议会和如今的英国政府手中。

劳合·乔治并不介意。与自治领总理的合作使其得到了他想要的和所需要的——这是比因此统治政府的保守党政客有利的优势。如果劳合·乔治代表海外帝国，总理们的帝国神经可以指望适当地被激发。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想到试图阻止不可阻止的宪法变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博登对巴黎和会的结论存在忧虑。尤其是它的主要成果，即致力于维护持久和平的国际联盟，触犯了他的想法。如果和平的定义是 1919 年达成的协议，国际制度的永存像它在此刻存在时一样的话，博登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是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特殊的计划，且博登并不是阻碍威尔逊道路的人。加拿大获得新的国际地位，需要威尔逊的默许，而且得到了它。加拿大通过在和会中现身的美德和在最终的条约签字中获得了最终的条约［《凡尔塞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成为国联的创始成员国，而且不仅只是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310

博登在条约签订之前回到加拿大。加拿大也有很多问题。“布尔什维克主义侵入加拿大”，《纽约时报》告诉读者，而且博登的部长们似乎相信这个说法。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全世界被激进主义的浪潮席卷，加拿大也不例外。1917 年的俄国革命鼓舞了各地的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列宁作为未来的典范夺取政权——不远的未来。列宁相信，只有武装行动能牵制资产阶级，而且变成共产主义者力量的信号。

加拿大的激进分子非常高兴。加拿大的资产阶级，包括博登及其

政府很忧虑。博登从西伯利亚撤回了加拿大军队,[1] 但是他和他的伙伴决心在加拿大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政府面对的是温尼伯那些浪漫的、想当革命家的人们。1919 年 5 月在温尼伯发生了总罢工。该罢工是工人力量的形象展现，如此想要威慑对手。通过允许这样的活动，罢工委员会潜在地代替了现存的政府。这些举动被阵阵革命论调支持。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罢工者并未想推翻政权，他们的目的主要是经济的而且相对适度。但是很多事情会偶然发生，先例很重要。没人忘记几十万军队于数月之内返回。在俄国，被遣散的士兵成为十月革命的重要力量。当权者行动坚决。他们逮捕了罢工的领导人，以西北骑警应对罢工者，动用枪支，两名示威者被击毙，30 人受伤，人群四散而逃。即使不是数小时，也是在几天内，罢工结束了。

温尼伯大罢工（Winnipeg General Strike）是“一战”最后几年中 311 众多罢工中的一起，事先并未精心计划，博登政府执掌着繁荣的经济——充分就业、批量生产、供应短缺，增加的工资和物价。然而，物价比工资增长得快，所以 1916 年之后，就他们的购买能力来说，加拿大的工人逐渐落后。工会兴起并昌盛起来。罢工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工种也在发生变化。即战前，女性就业增加，一些专业人士，如教师、文秘和速记员由女性主导，而且保持下来。“一战”时工人数量的短缺促进了雇用女性来代替参战的男性，但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的这些回到男性手中，并且只是男性手中。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政治上。多年来，妇女积极参选，令女性选举与无党派人士以及革命联系了起来。1916 年，马尼托巴和萨斯喀彻温首先妥协，然后轮到博登。博登政府首先决定某些阶级的女性可以参加 1917 年的选举，第二年则将联邦的选举权授予 21 岁以上的所有女性，如男性一样。除了魁北克以外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效仿。魁北克像

[1] 一旦红军有可能，就会在行动上从西伯利亚和摩尔曼斯克消灭加拿大部队，并因此决定在这两个地区英国干涉军的命运。

法国和瑞士一样，为了本省的目的，只为男性保留特权。这种“特殊体制”的盛行直至“二战”。

还有另一政治变化。1919 年 2 月，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去世。8 月，自由党召开会议商讨接替他的人选。在他的最后几年中，劳里埃成为自由党分裂的象征。死去的他成为了过去荣耀的象征和自由党未来灵感的基准。他的继承者是麦肯齐·金（44 岁），他之所以胜过那些党内的年长者，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于 1917 年公开表示对劳里埃的忠诚。1919 年，很多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党人重返组织，或像博登的农业部长 T. A. 克里勒（T. A. Crerar）那样，从博登的“联邦政府”转而成为反对派。

那些情况尤其符合农民们或议会中的特殊成员的利益。像工人中的激进分子，农民要求获得认可和对其阶级利益的照顾。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可比性，但仅此而已。阿尔伯达、马尼托巴和安大略形成了“农民联合（United Farmers）”政府，取代了一自豪得农民选票的自由党。在渥太华，农民的代表联合成“进步分子”，决定实行偏袒他们自己的政治纲领。[①] 那意味着低关税，特别是农场用具和针对农场利益的特权。它决不意味着对工人友好的政策或其他可能禁止农业自由的任何事物，如牛奶的巴斯德氏杀菌法（pasteurization）只应用在可能阻止牛结核病蔓延的土地上。 312

博登在农民运动（Farmers' Movement）的全面开展影响全国政局之前退休了。自 1920 年 7 月起，他的后继者，是有才能且尖刻的内务大臣阿瑟·米恩（Arthur Meighen）。人们很容易景仰米恩的行政力量，也很容易敬畏他的智慧和能力，但很难喜欢他。他并非天生适合作政治领袖，因为他无视当时的政治示威活动，并相信 19 世纪 70 年代塑造和统治加拿大的旧政治事实上是最好的政治。米恩是一个高量刑标

① “进步分子”报道了形态学上的模式。一些人在对政府、税收和监管的态度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保守主义”的标准上明显保守。一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使情况更糟的是，以小写“p”开头的保守主义者在加拿大通常在国际概念中被使用，这种概念在政治身份和定义上令人有很大的困惑。

准的人，对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摇摆的人均不留情面。“我对他的雄辩能力印象非常深刻，但不喜欢他的政策”，在成为自由党人之前，一位年青的保守党人写道。[①]

正如政治上常常发生的，米恩继承了前任产生的怨恨。博登因为努力改革传统政治，触怒了很多人。赞助，作为加拿大政党长存的万能药，事实上被废止了，而且政客们没有时间找到代替品。对许多人来说，自由党和保守党战时的密切联合不是自然的联合，而且没有时间产生对米恩联合政府的忠诚。征兵在法裔加拿大人和农民的记忆中仍很清晰，这使政府候选人在陈述之前，已几乎注定失败。最终，米恩允许他的偏见轻易控制了判断力。很多年来，他一直不喜欢并蔑视大学时便相识的麦肯齐·金。他不能相信选民会认真考虑不像样且不成气候的麦肯齐·金。所以选举的结果对米恩来说难以置信，他连续几周呆坐在办公室里，不得不被他的工作人员用肘推醒，而且卸任。他只得到了下议院235票中的50张，而麦肯齐·金得到了116票。在64名进步分子的帮助下，更不用说那5位无党派人士，麦肯齐·金确保了起作用的大多数。

313

20年代的政治与经济

麦肯齐·金占据了非常有用的政治特点：幸运。1920－1921年，加拿大经济急剧下滑。无业和经济失调导致米恩的失败，一段缓慢的恢复将有助于金的政治前景。

在很多方面，金是美国式或英国式的进步分子，这些在赞同国家责任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中体现了出来。但是金政策中的一个控制因素是对赤字和负债的极度讨厌。1921年，加拿大有$ 30.18亿的负债，而1914年为$ 7.5亿。在20世纪20年代，侵蚀其基础的是保守的金，而不是富有改革精神的金。虽然并非绝对，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

① J. W. Pickersgill, *Seeing Canada Whole: A Memoir* (Markham, Ont.: Fitzhenry & Whiteside, 1994), 74－75.

的一个百分比，联邦债务在下降。这得益于金早期的内阁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在年龄还是资历上，这些阁员都长于金。他们不再冒新的预算风险，代之以偿负国债。他们自然理解金必须降低税收——比如家用机械上的税收——为了收买进步分子并获得他们的支持。结果，大多数时间里，进步分子支持自由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难从自由党人中分清一些进步分子。党纪不强，当他们的党分裂时，进步分子相互争吵。在幕后，金悄悄地帮助资深部长退休，并招募了省内杰出的自由党人接替他们的位置。①

后来金作为政治领导人被铭记，但这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他给人的印象。1925年，他的党派在阿瑟·米恩和其他复苏的保守党人手中接近失败，但是在少数人的议会中，金在进步分子和很少的工党党员的支持下勉强坚持。从局外人的观点看，他确信赢得了议会的早期选举，因为他在自己选民当中宣布了个人的失败，而且不得不等待萨斯喀彻温联盟为他提供一个开放席位。就在那一刻，丑闻在海关总署爆发，而且被揭露的真相对小政党来说太严重而不能承受。他们遗弃了迅速投向总督宾勋爵（Lord Julian Byng）并要求解散议会的金。 314

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在做什么的宾勋爵拒绝了。金辞职，宾派人去请米恩来组建一个政府。政治上的问题是当进步分子和工党党员可能愿意对金投反对票时，不愿意对米恩投赞成票。② 因此，米恩在下院被打败了，然后要求宾解散议会，以达成他的愿望。

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一生中仅有的机会。选举问题被简化成下列事实，即宾已经给了米恩他曾拒绝给金的东西，那就是解散议会。这是人民与权贵的对决，它是一次非常不公平的比赛。代表人民的金取

① W. A. 马瑟韦尔（W. A. Motherwell）和查尔斯·A. 邓宁（Charles A. Dunning），二者都是萨斯喀彻温省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加入金的内阁，前者任农业部长，后者任财政部长。

② 还有更进一步的混乱。在数世纪英国的实践中，接受新政要机关职务的下议院成员不得不辞掉他们的议员职位，在补缺选举中寻求返回新的部长级职位。在少数人的机构中，米恩担负不起在整个内阁中的承诺，而且因此他独立就职，最终不得不观看从画廊人手。这种做法很快被终止了，而且魁北克人党不必放弃他们的席位，现在就可以接管政要机构。

得胜利，而对同伴负责的米恩则失败了。宾随即离开，米恩就任保守党领袖。

1927年，主持加拿大建国60周年纪念的是麦肯齐·金。（1917年，半个世纪的标志到了，但人们认为1917年不是进行庆祝的好年份。）所有人都来了，至少是重要的人都来了。从大不列颠而来的富有魅力的艾伯特·爱德华，即此后进入阿尔伯达牧场的威尔士亲王。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也来了，他是第一位出访加拿大的在任英国首相，“西方的不列颠”，在富有激情的加拿大吟游诗人的词中。唱诗班演唱，大炮发出隆隆声，乐队演奏，这些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海岸被广播。麦肯齐·金准备了很大一笔钱，共250 000加元，为活动和自己做铺垫工作，嵌入他长老会式的敏锐。（经发现，庆祝手册触犯了天主教徒的清规戒律，但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在金身上。）

315

外交，对内和对外

就职业而言，金是劳资谈判专家。调解自然向他涌来，妥协和权宜之计亦然。“得过且过，从不激进，”一位加拿大诗人这样记述总理。这是一个精明的评价，而且是金也可能同意的一个。他本应该已经看到少部分措施对他的成功有帮助，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为最大数量的利益，竭力维持最高水平的满意。

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以法国人为主的区域的调和方法，特别是住在魁北克的90%法裔加拿大人，在那里，这些人占据人口总数的80%。在他的梦里，因为不学法语而受到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的拜访并因此而责备他。但是金做了一件退而求其次的事。他早年得到了一位杰出且能干的魁北克中尉埃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的帮助。拉普安特缩短了法裔魁北克人对天主教的忠诚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距离——对天主教的足够虔诚使大多数牧师满意，有足够的自由去了解此时政治趋势的新情况。

诚然，在大多数问题上，拉普安特比头脑非常保守的魁北克自由党

总理路易－亚历山大·塔什罗（Louis－Alexandre Taschereau）更自由。塔什罗是1897年第一次被选出的省级自由党王朝的最新代表，且于1920－1936年作为总理担任公职，拉普安特比他有更好且更自然的政治触觉。在魁北克，更年青且有更多社会责任感的自由党人指望着拉普安特，并通过他指望麦肯齐·金。“Rouge a Québec，Rouge a Ottawa”是当时的口号。意志坚定的自由党人有因征兵的记忆受辱的保守党反对派的额外利益。征兵授予自由党人无尽的选举优势，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继续着问题——即总是这样。同时，自由党人对征兵的招募通过使保守党派，即另类党派成为残余令魁北克旧的党派体制变弱。但当时，政治的阳光照在麦肯齐·金的身上，同样也照在塔什罗的身上。 316

20世纪20年代，渥太华和各省为发展共商大计。看起来如果不解决联邦和省之间的纷争，繁荣将被掩饰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看看总数，确实可谓繁荣。1921年之后，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稳定上涨，受到出口繁荣的刺激，从1921年估计的35亿美元升至1929年的61亿美元。加拿大政府——联邦和省级赞成并做了他们想做的。在极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向美国出口，加拿大对英国的贸易份额减少了。后者对加拿大的投资也减少了，既因为它用于出口的可用资产减少了，也因为投资者在大干线和加拿大北部铁路的失败中损失惨重。

受要求成品出口而不是原料出口的省级贸易的限制刺激，纸浆、纸、矿物和小麦贸易出现了繁荣。结果，纸浆的生产从美国移至北部边界，美国报复的威胁几乎没有阻止这一过程。联邦政府看到了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和安置退伍军人的好机会。他们为耕地面积得到了有利条件和用于开始农耕所需的贷款。定居活动扩展到大草原的边缘地区、北部的开阔草地和南部干旱的帕理塞三角带，这些地方以前被认为只适合放牧。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到1928年，萨斯喀彻温创造了3.21亿蒲式耳的记录。铁道部修建支线将谷物、矿物和纸运到市场。新动力工程被建筑来支持矿山、磨坊和加拿大扩展城市的电力供应。 317

麦肯齐·金认为，繁荣带来了问题。10年间，大草原上的省份获得了信心，就联邦政府对公有土地和定居地及他们的收益保持控制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他们要求政府放弃源于他们的土地、资源和税收，而且得到更老的省份的支持，如安大略和魁北克。

安大略处于和联邦政府展开司法战争的状态，事实上从省联盟开始便已这样。首先被保守党统治（1905—1919），然后是农工政府（1919—1923），然后又是保守党（1923—1934）。它的政府与不能在自己的省份当选的麦肯齐·金几乎没有任何相同点。更坚定地支持自由党，沿海诸省有他们自己的不满。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被困在经济的衰退中，而且需要渥太华的帮助。

除了魁北克，所有的省份都面临真正的税收问题。他们有高速公路、学校和医院要修建，还有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的福利责任及有限的税收来源需要形成。如其他北美司法权，他们发现了汽油税是一个新的生财之道，但是他们花在汽油税上的钱也花在高速公路中。就省份而言，道德也有价格。禁酒也好，但是酒税安慰了政治道德。犯罪结果有利可图，不仅对于罪人。但是就算有了汽油和酒，最富有且资源最具多样性的省份安大略也经常出现赤字，并借钱勉强维持。[①]

保守党的安大略和自由党的魁北克想要从麦肯齐·金那得到同样的待遇——资金，与所有其他省份的目标一致。安大略引领需求，渥太华退出它已在1917年介入的个人所得税领域。[②] 渥太华拒绝了。战争带来了10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联邦政府要独自承担。无休止且难以对付的谈判随之而来。联邦政府有自己的希望，在加拿大内部设立一种修宪的方式，即《英属北美法案》。战争是各省最不想要的，最终既不是金也不是拉普安特的想法。到那时，他的司法部长可能设计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318

最终，金给了各省能够接受的方案。大草原得到他们的自然资源，

---

① Armstrong, *Politics of Federalism*, 140.

② 安大略和魁北克同样想要从国家最大的通航水道网中得到对水力的控制，即圣劳伦斯河及其支流。然而，即使"自然资源"归各省所有，航运还是在联邦的控制之下。

像其他省份一样，还有一些额外的补贴。安大略和魁北克对就水力做出的让步感到心满意足。滨海诸省得到了皇家的许可、怨怒的平息、对省际铁路（Interprovincial Railway）所引起的动乱和更多的补贴。

麦肯奇·金不只因为通常修辞上的原因想要找到修宪的方式。加拿大对外的名声正在发生变化。1926 年，英国承认了自治领事实上的独立，并承诺了将与正式立法原则接轨。

1920 年博登卸任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17 年签署的帝国战时会议第九条决议为大英帝国政府中各属国提供了平等，但也承诺了战争结束后重要的宪法会议，就会议的结束而言，没有任何承诺。诚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虽然印度几乎还没有脱离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的独立成员。一般来说，加拿大在联盟中的代表团与英国的代表团合作，但并不是从伦敦得到指示，而是从渥太华。

然而，工会会员博登和米恩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将加拿大置于一个共同的帝国外交政策中。这符合他们对加拿大传统的理解，而且他们还相信，如果它作为伟大皇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陌生的半球与美国北部隔离的前殖民地，会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1921 年，他们的政治在帝国会议上受到了考验。英国首相仍是劳合·乔治，而且他的政府，如米恩一样，是战时联盟不稳定的继续。乔治想要帝国会议批准他继续令英国与日本结盟的决定，因为已逾期限。对于需要联盟给予保护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个决定很重要。在作出决定时，劳合·乔治忽略美国敌意的迹象不计。美国合乎情理地问到，现在德国的海军在海底游弋，英日联盟会与谁作对。加拿大是帝国中与美国最近的部分，对于美国的怒气，也是最暴露的地方。 319

帝国会议在两个帝国的战术中产生了冲突——与加拿大，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与美国间的和谐；而且与劳合·乔治（和澳大利亚），认为帝国防御的合理设计一定要对冒犯日本的危险加以考虑。米恩坦率地告诉会议，加拿大不可能也不会接受激怒美国的政策。最初，劳合·乔治固执己见。如果必须这样，就让加拿大人离开。

但是劳合·乔治的位置更像是愚蠢和误报的产物，而非原则问题。他不相信美国政府真的恼怒了。当他很晚才得知（米恩一直是对的）时，来了个180°转弯。英日联盟被搁置，大英帝国同意在华府举行与美国和其他大国协商的海军会议。1922年，那次会议后，英日联盟不复存在，被多边海军裁军协定和太平洋沿岸特定裁军的协议代替。澳大利亚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当然加拿大也接受了。

直到华盛顿会议的尾声阶段，在渥太华产生一个新政府。战争时期，麦肯齐并未经历帝国团结；与博登不同，他在加拿大看到了主要为决定性的战争，虽然他没有打算质疑加拿大为了赢得胜利而付出的牺牲。虽然金继承了劳里埃对帝国阴谋的不信任——同样也如劳里埃一样——他并不怀疑加拿大的身份大体上是英国的。但是作为英国的属国也有限度，早年当1922年10月劳合·乔治想要将帝国拖入与土耳其（Turkey）计划不周的战争时被金刨出——叫做地理中心的查纳克事件。查纳克毁掉了劳合·乔治并摧毁了他的政府。与土耳其并未开战，如果开战，金公开明确地指出，加拿大将不会成为机械的参与者。

1923年的帝国会议，金对新任英国首相、保守党人斯坦利·鲍德温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他说，“一个伟大而清晰的使命召唤”到来，那么加拿大将会像在1914年那样站在英国一边。Chanak并没有这样的号召，由此及彼，帝国的其他小规模冒险活动亦然。

他通过指派女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具有民族主义的O. D. 斯凯尔顿（O. D. Skelton）博士成为他的高级文职顾问来巩固地位。斯凯尔顿赞同金欲令加拿大独立的趋向。20世纪20年代，这种趋向占了优势。他希望在和平的10年中，“伟大而清晰的使命召唤”不会使金的英国维多利亚传统受到考验。

金和斯凯尔顿很幸运。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Lord George Nathaniel Curzon）无意执行“一个帝国的外交政策”，如果这意味着他必须就不列颠外交政策请教自治领的话。自治领可以有所表现，也可能安静下来。由于金选择拒绝，他的命运便由英国的政策所注定，而且在柯曾及其继任者的指导下，加拿大和其他任何一个犹豫不决的自治

领皆被从英国的条约中删去。如果愿意，英国加拿大可以加入，但并非必须。在未来就像在过去发生的一样，英国通知帝国成品而非与之商议，而且与此同时，像加拿大一样，英国会碰运气。

1926 年，另一次帝国会议令该进程达到了顶点。通过受尊敬的前首相鲍尔弗勋爵（Lord Arthur Balfour）呈递的报告（Balfour Report），会议正式承认英属自治领的完全自治。鲍尔弗也承认了自治领作为英联邦成员选择继续代替"帝国"的名词，而且他们因为对君主共同的效忠而团结在一起。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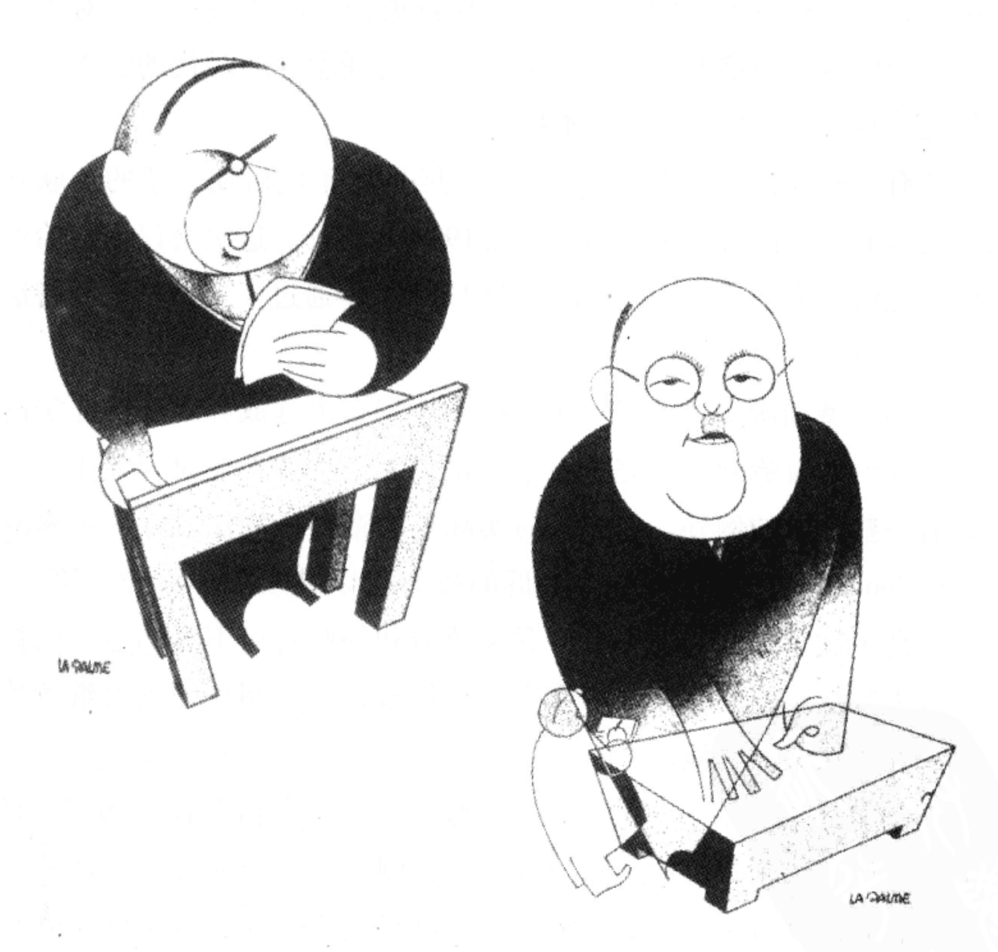
麦肯齐·金非常满意。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想起了自己的祖父、反叛者威廉·莱昂·麦肯齐在金生动的梦中因为加拿大自治而微笑。事实上，金喜欢君主政体的壮丽，仍保持英国人的核心地位。对于加拿大总理而言，加拿大是"西方不列颠"的观念并非时代的错误，但深切地感觉到加拿大身份的根本特点。

还有一些细枝末节需要收尾。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新的英联邦成员之间的讨论使另一次帝国会议在 1930 年召开。这次会议为自治帝国的新宪法划上了句号——英国议会于 1931 年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

直到《威斯敏斯特法案》英国议会才宣布永远放弃对帝国立法的权力。自治的自治领因此完全自给自足，无论法律上还是体制上——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首先，向实际上的帝国最高法院，即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司法委员会上诉的权力得以继续除非废止。第二，法案承认了加拿大联邦的组成，联邦政府和一些省份不会同意如何修改加拿大宪法，但有时宪法确实需要被修改，并抵制英国议会继续修改英属北美法案的可能性。

加拿大正式开始了它的自治——独立——有资格存在的国家。任何必要的政治决策都可能被作出。只要它倒向了《英属北美法案》中联邦和各省权力分配的正确一侧，就能在任何有加拿大人的地方践行其司法体系。《威斯敏斯特法案》生效时，加拿大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也许这对加拿大政府来说是幸运的。毕竟，这是大萧条的第 2 年。

第十二章　敌意的世界（1930—1945）



M. 金（上）与 E. 拉普安特向加拿大公众发表演说。此漫画由杰出的漫画家 R．拉帕姆所作。

1931年，凭借《威斯敏斯特法》，加拿大实际上已成为主权国家，但结果没有太大改变。加拿大或许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它是众多主权国家之一。如果加拿大具有特殊身份，那么它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传统和贸易将其与大不列颠联系起来。英国米字旗飘扬在加拿大各地，尽管黄白相间的罗马教皇旗帜在喜庆的宗教节日也飘扬在魁北克。 325

加拿大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即“Mounties”。他们身着英式猩红色制服。当然，在电影中亦然，因为美国电影业钟爱这一题材。加拿大人反过来欣赏性地观看好莱坞对加拿大的再创作。这大部分由冰、雪、树木以及游走于犯罪边缘的、疯狂的盗猎者和强夺他人土地所有权的人组成，而不是标准电影中的走私犯和歹徒。[①]

当然，据大多数加拿大人所知，这些歹徒属于美国。加拿大确实拥有自己的走私犯和歹徒，但他们从未达到美国的阿尔·卡彭（Al Capone）和约翰·狄林杰（John Dillinger）臭名昭彰的水平。没有人知道如果与狄林杰这样的歹徒对峙，加拿大皇家骑警将如何处置；皇家骑警忙于执行作为省警的公务或密切监视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

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是20世纪30年代形象的另一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展现给公众一种外人的形象，讲话带浓重口音并显出可疑的卫生标准。虚伪的激进分子至少比电影中的皇家骑警较接近现实，尽管与国家警察部队有联系。皇家骑警应付的是大量初级产品，即毛皮、黄金，有时候是木材——经济学家在当时及以后称之为“大家产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人们偷窃这些有价值的产品，而且在大规模程度上讲，他们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对的。毛皮、黄金和木材是加拿大经 326

① 20世纪30年代至少有13部皇家骑警题材的电影。最著名的很可能是《罗斯玛丽》，由珍妮特·麦克唐纳（Jeanette MacDonald）与纳尔逊·埃迪（Nelson Eddy）这对银幕情侣领衔主演，其他电影包括《小特使》、《皇家骑警朗福》和《育空河上的谋杀》。还有一套儿童系列丛书，始于1935年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山谷》。

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小麦和其他谷物以及少量贱金属可以加上去。加拿大的出口产品——其主要产品——包括大部分这样的商品，即被挖掘、砍倒，之后堆叠或扎捆的商品。

尽管如此，还有其他出口产品，由不同的工人进行生产。事实上，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口相比——尤其是美国——加拿大的劳动力令人遗憾地平淡无奇。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在工厂工作——或不工作，因为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处于最严重、持久的低迷期的记忆犹新。正是经济的低迷促成 20 世纪 30 年代的 10 年危机——大众记忆中的“肮脏的 30 年代”。诗人 W. H. 奥登（W. H. Auden）称之为“低迷、欺诈的 10 年”，但他指的是除失业、福利和沮丧之外的一些事情。他的意思是民主制下的政治家竭尽全力处理对他们而言没有训练、没有风向标、没有政策的形势。他们由于缺乏处理危机的实际政策，于是假装拥有这些政策。至于选举人，他们不得不相信民主制下的政治家，否则会对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失去信心。因此，在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20 世纪 30 年代不是革命性的变动期，而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年代。在加拿大，这一时期的象征是长期执政的政治家麦肯齐·金。他于 1930 年在任，而且 1940 年仍在任（或更确切地说是连任）。

加拿大的政治通常被视为地方事务，集邻里问题和次要特性于一身，所有这些问题都证明了，用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意思是所有的政治都是有局限的。这一说法有时正确，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绝非如此。

327 加拿大人有报纸、电影，尤其是新闻短片带给他们的另外一种政治，如果他们有条件看这些报纸、影片和听广播的话。他们知道大萧条远远超出加拿大之外，美国发生经济萧条，而且英国和欧洲概莫能外。在英国，有反饥饿游行、政治危机以及一个“国民政府”，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保守党支配的爱国政治家联盟。在德国，大萧条破坏了民主并孕育出一位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新闻短片中，希特勒在有恶意的、身着统一制服的人群前尖叫，他们

先是扛着铁铲，之后是步枪。此用意是加深印象，而且确实做到了，但毕竟德国是在千里之外。

加拿大人看到的离本土和现实更近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其新政（New Deal）。罗斯福于1933年3月就职时告诉美国人，它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除了恐惧本身”。他是以大萧条的深度讲的。那时，美国国民收入自1929年以来缩减了一半，并且有1/4或更多的劳动力失业。加拿大人对此感同身受——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拿大。他们专心倾听罗斯福的训诫，将其与加拿大自己的总理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Richard Bedford Bennett）——“R. B.”的疯狂演说作比较。

老计策，新挫折

贝内特受困于自身的局限性。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老练的公务员，还是一位智力甚高的利己主义者，喜欢将自己的政策个人化。在1930年联邦大选期间，他告诉选举人，“我将闯出一条进入世界市场的道路”。其听众对此产生共鸣。像贝内特一样，他们明白加拿大必须搞出口，否则就得灭亡，也明白繁荣来自加拿大人在本土生产大量产品并将其出售至海外。这是对大宗出口理论的呼唤——尽管令人怀疑的是，除了几个专业学者之外，贝内特或他的听众或任何人是否曾听过，更不用说使用过这一术语。但大宗出口理论体现出大部分加拿大人对他们国家的理解——加拿大依靠其他人购买他们的出口产品。没有出口就没有钱，没有工作——这也是他们所明白的。 328

因此贝内特抛出一条进入世界市场的承诺使人们抱有希望，且希望带来了选票。在一次实质上是两党争夺的选战中，他的保守党赢得48.5%的选票，自由党为45.2%。保守党赢得下议院137个席位，自由党为91个席位。[1]

麦肯齐·金没有料到选举会失败；他愤愤不平地辞职并回到老家，

① 进步党得到剩余的12个席位，主要在阿尔伯达获得，也有一些工党成员。

即渥太华北部的金斯麦尔（Kingsmere）来静观其变。因此，贝内特是这样一个总理，他不得不面临远远超过他想象的问题。这一问题将破坏他的健康、政府和事业。加拿大人在1930年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意味着，将针对大萧条提出第一个解决方案的是保守党。

当然在1930年，没有人称之为大萧条。不可否认的是一次经济衰退。市场疲软，小麦和纸张价格下降。1930年，国民总收入明显降低，与1929年的水平相比低7%。尽管如此，仍高于1927年，还算是美好的一年。当然有自信的理由，如果不是完全出于乐观主义。

然而萧条的趋势在继续。1931年比1930年更糟，1932年又比1931年更糟。贝内特提高了加拿大的关税，这是他的“闯关”方案的第一步，其想法是这之后可以廉价出售，以获得其他国家在关税上的让步。这是一个不成功的策略，因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在如法炮制。结果将慢慢压制其余的国际贸易。贝内特的闯关枪其实是一支玩具气枪。

总理可以认为，他需要增加关税来产生收入——尽管基于减少了的商品流动——因为他不得不偿付失业成本。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如贝内特所知，他不必这么做。一位英国法官曾将加拿大法律中联邦-省的权力分配比作远洋轮船上的密封舱。法官不必说明密封舱的目的是保证船只处于漂浮状态。

329

20世纪20年代已经表明，各省正努力应对收入的不足。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介入并指望经济的扩张来保持其收入上升。因此当经济开始收缩时，各省不能应付——至少不能应付很长时间。他们的问题由于其下级政府，即市政府的问题而成倍增长。城镇和市专属省负责，省允许它们通过财产税、所得税和营业税提高自身收入。20世纪20年代期间，市政府发现发行债券是获得收益的一个好方法。收益用来建设学校、道路和下水道。他们和省一样，也依赖于持续的繁荣。

市政府并不是唯一听天由命的机构。在大草原，与铁路和私人谷物经销商的斗争令农民感到怨愤，于是他们进行“联营”以管理数百

万蒲式耳的收成。联邦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制性联营机构——谷物监察委员会（Board of Grain Supervisors），后来成为加拿大小麦局（Canadian Wheat Board）——但在战争结束时放弃了这一尝试。之后的联营，每省一个，是自愿的，但它们总共控制了大约60%的加拿大小麦。[①] 联营尝试使不确定的耕作技术规则化和可预测：按照种植面积提高其农民成员的费用，然后卖掉小麦来补偿他们的损失，当小麦售出并回款时才结账。这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一价格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增长。

1929年，价格下降，而联营毫无准备。3省政府焦躁不安，对其紧急救济，但1930年形势并未好转。当前，低价与帕利泽三角洲（Palliser's Triangle）开始的干旱结合起来。轮到渥太华了，金额由强硬的贝内特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卡尔加里的国会议员）。贝内特予以支付，但以接管小麦销售为代价。联营被管制，从散布在大草原上的地方谷物仓库征收谷物，输入到位于加拿大谷物装运港的更大的仓库。[②] 价格继续下跌而且旱情加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热风吹走大草原上的土壤，土地急剧流失。观察家从遥远的大草原东部边缘的温尼伯看到，往西的天空在变暗。农场被丢弃，十室九空。那些留下来的人遭受了自上世纪以来未在加拿大定居地看到过的贫困与物资匮乏。（尽管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保留地，贫困与物资匮乏司空见惯。） 330

袭击联营的灾难很快对大草原省份的政府产生恶果。他们已经负债累累。现在，为了给失业者和赤贫者提供福利，他们不得不再次借款。城市的财政同样也已耗尽。纳税人无力缴款，而且尽管城市可以取消房产抵押赎回权，违约仍很普遍，导致房产销售无法指望抵消城市债务。银行开始恐慌。

---

① Waiser, *Saskatchewan*, 261－263.

② 港口升降舵在大小和升降幅度上都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阿瑟港的萨斯喀彻温7号，由C. D. 豪公司建造，被建筑师勒科比西耶（LeCorbusier）称作现代设计的典范。

甚至在经济多样化而且相对繁荣的安大略，他们也感到惊恐。那里的农民正处于绝望的苦难之中，造纸业正进入萧条的漫漫长夜。闲置的工厂证明了可感知的剩余人口——受过训练的工人、现代工厂以及一贫如洗。安大略一些乡村地区及其他地方重返以物易物经济，支付服务——例如医疗——以鸡或牛奶交换，这是提供服务者——例如医生——乐意接受的。加拿大医学协会（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开始印发关于公费医疗的文章，供其成员阅读与思考。一些事情或许优于市场。

甚至连贝内特总理也不得不承认此利害关系。贝内特专注于公众的不满——他具备"芝加哥歹徒的行为方式"，一位英国政治家如是描述——但只有如此多的羞耻令他可以给予他的省级同僚。多亏了麦肯齐·金在20世纪20年代时缺乏想象力的财政管理，联邦政府在加拿大才最具偿付能力。贝内特知道如果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省政府失败——破产——将影响渥太华自身的信誉。他不能对各省的困境漠不关心。一些小城市将破产——一些确实已破产：温莎（Windsor）和萨斯卡通（Saskatoon）仅是其中的两个——但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没有破产。一些省政府只能用渥太华提供的钱支付其债券持有者，从而保持了流通。如果此补贴龙头某时被关闭，9个省中的4个或5个将面临破产。

331

在贝内特执政的5年里，应付补贴占据了他的国内政策。其对外政策无疑成为次要考虑的事务，即使最初其竞选演说的主要特点是贸易和贸易政策。情况确实使这位总理在贸易上取得一项成就。有利的是，大不列颠已走到自由贸易的尽头。英镑已被迫脱离金本位制，而且英国贸易正饱受其他非信任国家征收的高关税之苦，那些国家无视自由贸易的逻辑和法则。英国政府——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在1931年的选举中击败其反对党后，政府的确采取了行动。政府将征收关税。自治领被临时免除税收，因为一套帝国关税优惠制度被预见到了。将举行一次规定英联邦内部贸易条件的帝国经济会议。此会议将于1932年7月在渥太华举行。

渥太华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令人遗憾。加拿大首都只有一个场所足够容纳来自帝国各地的代表——众议院，位于近期重建的国会大厦中座。众议院并不是为合作而建，其专长是对抗且设计与功能相匹配。更糟糕的是，似乎没有人把渥太华的气候考虑进去。7月份，首都尤为炎热、潮湿。

大家大动肝火，尤其是英国人与贝内特之间，因为英国代表发现，虽然贝内特支持帝国经济联合，但他认为对此支付费用是其他人的事。加拿大已经给予了英国减低的关税，该由英国人及其他代表采取方法与之匹配。结果达成一系列协定，形式是双边主义。其中，帝国的众多组成部分在贸易方面彼此提供优惠。尽管他们对贝内特压力重重的开端不满，但《渥太华协定》（*Ottawa Agreements*）涉及范围广泛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以汽车为例，加拿大可以凭优惠条款出口到整个帝国。“三大”美国汽车公司——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已在加拿大设立分厂并且现在将扩大规模。此后多年，加拿大制造的福特与雪佛兰行驶在帝国的乡间小路上，证明了非凡的（最后一次）帝国关税协定的功效。 332

像其他加拿大关税一样，《渥太华协定》有鼓励美国对加拿大投资的效果。此协定同样给美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并非通过协定自身，而是与袭击美国的单一的最大经济灾难一起，这次灾难是任何人都能够记起的。美国人为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寻找原因，却在美国自身找到了，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国国会。

对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而言，国会对贸易的权力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在这一事实上超过加拿大的了。国会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关税定期扫除了加拿大的出口。最近一次以提案人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命名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几乎同样如此。当然，加拿大有自己的高关税政策，尽管给予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较低的税率。确定的是，加拿大没有与美国签订的发挥作用的协定，而且自从1854—1866年的《互惠条约》期满以来一直没有。（不仅仅是加拿大如此。在美

国存在的150年中，只与其他国家签署生效3份贸易协定，国会就是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卫其国家主权的。）因此美国面临的不只是对加拿大出口的高关税，而是更高的关税。《渥太华协定》似乎告知美国，帝国的各个国家没有美国也可持续下去。

美国人对此的解释是，“是我们使之这样做的”。此言不虚，尽管毫无疑问也有其他因素和解释予以考虑。消除这一危害需要美国表达 333 善意，如果不是悔改的话，这在罗斯福政府早期的一项法案，即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Trade Agreements Act*）中有系统阐述。此法案第一次规定，总统可以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关税减少（互惠）额是当前美国关税水平的一半左右。

贝内特立刻抓住了这一机遇。他的谈判代表在整个1935年努力争取达成一项协定。协定即将达成时，加拿大国会的5年任期届满，贝内特非常不情愿地不得不面临大选。他知道，加拿大人事实上在1934—1935年对美国很欣赏，不止将其视为一个富裕的贸易合作伙伴，而且视为解决大萧条危机的一个榜样。

罗斯福的“新政”具有前途光明这一巨大优点。它花费公共资金，有时还很挥霍，用于改善国内建设。它力图引起“被遗忘的人”的好感。新政内容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不起作用，无关紧要。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尤其包括加拿大公众——是采取行动，予以关注。大萧条消除了罗斯福的敌人的杀伤力，也损坏了其敌人的名誉。敌人是指先前的商业领导人及其政治盟友。罗斯福定期使用无线电波，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谈话也传到加拿大。

贝内特得到这一消息。令加拿大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于1935年冬听到其总理用粗哑的嗓音通过广播宣布了自己的新政。他将建立劳工标准；将为所有人的公平待遇立法；将代表不幸者行使政府职权。在议会的春季会议上，贝内特确实这样做了。

麦肯齐·金的反应具有启发性。金在日记上写到，贝内特已经疯了。如果他没有发疯，那么就成了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像希特勒或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样。他们同样代表受压迫者承诺强有力的行动，

对像金一样的传统自由党人而言，这就是暴政的本质。金没有分享贝内特新发现的对罗斯福或新政的热情。他没有自己的方案，但这无关紧要。金指望着贝内特突然转向社会行动以破坏他为残忍的保守主义建立起来的名誉，于是以静制动并坐视贝内特自毁前程。 334

自由党参加了 1935 年大选，其口号是“金不上台，乱象必来”。不用花费太大想象力就能确定乱象是谁——当然不是温和、矮胖又熟悉的麦肯齐·金。金轻松赢得选举，尽管低于 1930 年得到的支持率。保守党取得前所未闻的 29% 的得票率，它的崩溃使金获胜。两个新的党派也在 1935 年获得席位：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集中在不满和贫困的阿尔伯达以及平民合作联盟（Co – 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简称 CCF），后者是大草原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①

金与乱象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金是一位很幸运的政治家。到他执政的时候，经济形势正在好转。大草原的情况极为严重，但安大略和魁北克由于各自多样化的经济，情况并不十分糟糕。还有省的财政危机，指对各省进一步的紧急援助，金本着与他前任一样勉强、吝啬的精神控制紧急救援。然而贝内特已经承担了大萧条的重担。加拿大人的怨恨大部分已发泄，他们多半没有责备金。这还算好，因为金绝对不知道如何应付大萧条，并且他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可能会令事情更糟，因为正统经济学家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

然而，金的确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个《互惠贸易协定》（*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贝内特曾与之谈判的那个。金后来在 1937—1938 年捍卫加拿大在英国、加拿大及美国三角贸易谈判中的地位。金认为英国人会先顾自身利益，而且加拿大的利益远在其后，因

① 社会信用党最终成为一个右翼党派，但当时希望使金钱和信用发生革命性变化来解决大萧条危机的是一场改革运动。

此他坚持要英国向美国做出的任何让步给予补偿。

335 在与英国人、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金得心应手。他在两个国家都呆过并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与罗斯福几乎同一时间在哈佛，并且两人立即造出一段证明他们现在的官方友谊的往事。从某种独特的角度来看，金和罗斯福其实很友好。金有许多可接受的社会相识，而且谨慎小心。最好的是，这位总理小心翼翼，避免对总统提出过多要求，但当他提出要求后，罗斯福便听之任之。罗斯福甚至为金提供政治建议。他注意到金在协调法语和英语加拿大人这一问题上有困难，就建议他尽快同化讲法语的加拿大人。这一措施在美国可行，那里有大量法裔加拿大人集中在新英格兰；是故在加拿大也应该可行。[①] 金没有作出有记录的回复。

金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英语和法语加拿大人之间的关系，罗斯福抓住这一点是正确的。20 世纪 20 年代，金完全依靠魁北克在议会中产生自由党超出的票数。其魁北克副手埃内斯特·拉普安特带领一支强大的魁北克自由党代表进入议会，并于 1935 年进入内阁。金信赖拉普安特，而且有证据表明，即使当他不赞同或甚至可能不明白拉普安特的观点时也会接受，这就是金对其副手判断力的信任。

拉普安特知道，魁北克部分地区受到大萧条的严重破坏，大量社会和政治骚动正在省内酝酿。魁北克的政治指向标指向右而不是左，大草原亦然。拉普安特是一个具备几分自由风格的人。他强烈反对放任自流，但他作出结论，要保持魁北克在加拿大相对平静并具有合作能力，就必须按照魁北克的方式行事而不能按照他想当然的方式进行。他感觉到，并且金也知道，国际形势反复无常而且有潜在危险。全面战争有可能爆发，如果爆发，加拿大很难置身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拉普安特和金而言是一个永恒的记忆。在魁北克没有好的反响，而且如果有可能，征兵在 1935 或 1936 年比在 1917

① 路易斯安那，即美国另一个讲法语的大型飞地正在被同化，尽管和与其处于同等地位的新英格兰“法裔加拿大人”相比，这个州的“法裔路易斯安那人”在法律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有更稳固的地位。

或1918年是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显然，拉普安特害怕了，尽管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他怕如果另一场战争到来，魁北克可能不会配合或更糟糕。 336

在魁北克，向右转不是普遍的，但下面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即在20世纪30年代，魁北克省讲法语的这部分人几乎是固步自封的，除了上层一小部分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交往以及普通的讲英语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之间大量却无关紧要的联系。在省内一些地区，英裔加拿大人在公司生活区建立了管理"卫戍要塞"，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学校，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置法裔加拿大人于不能超出工厂领班水平的一个范围。[①] 位于蒙特利尔高处山上的城中城威斯特蒙特（Westmount）做着自己的梦，过着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是英国式的生活，无论人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最顽固的托利党人。

民族主义者尤其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弗朗索瓦·埃泰尔（Francois Hertel）在1936年写到，"倾向于新教的联邦政府、新教帝国至高无上的控制、已成为新教喉舌的无线电广播、伤风败俗行为的载体——电影院、很大程度上只在名义上是天主教性质的法语出版社。"[②] 当一位年轻、出身高贵的法裔加拿大人安德烈·洛朗多（Andre Laurendeau）想研究英国人及其见解与习惯时，他意识到自己不了解居住在距离他自己房屋几公里之内，几十万讲英语的人中的任何一个。

这一时代刻板的法裔加拿大人，即在代表性小说中找到的那一种，如果不是被蹂躏，也是受压迫的，英裔加拿大人尽管不是普遍带有恶意，也被视为感觉迟钝、麻木不仁。这并不是说没有绝不受蹂躏，富有、享有特权的法裔加拿大人，也并不是说像管理魁北克城这样的地区不需要过多考虑英裔加拿大人。现象证明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

---

① 克劳德·朱特拉（Claude Jutra）很晚的一部电影《我的叔叔安托万》中描述的正是这个世界。

② 转引自 Max and Monique Nemni, *Young Trudeau, 1919 – 1944: Son of Québec, Father of Canada*（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6），72 – 73 页。

不是合作或同情加拿大讲英语的大多数的同伴。

不是所有讲英语的人都是英裔加拿大人。还有 *les Juifs*，即犹太人。法裔加拿大人认为他们不同于英裔加拿大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英裔加拿大人确信如此，而且在其他有无资格的考虑中有对犹太人进入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配额限制。犹太人还被看作是聪明、有能力和脆弱的人，因为作为近期的移民，许多犹太人仍被雇佣做低贱的工作——店主、旧货商人或普通工人，和与他们同等地位的法裔加拿大人一起。20 世纪 30 年代上演了针对犹太人的抵制犹太商店运动，敦促法裔加拿大人光顾他们自己的商店而不是那些外族人的商店。然而自相矛盾的一种观念是，犹太商人优于法裔加拿大商人。

337

自由党是加拿大移民选票的最大受益者。自由党一直支持移民，或人们认为其支持移民。移民大量涌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始于劳里埃执政期间，而且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蒙特利尔的面貌。移民支持联邦的麦肯齐·金和拉普安特及省政府的塔什罗。魁北克立法机构的一位犹太成员，自然是自由党人，在其选区的选举中获得超过100%的得票率。这一事实被蒙特利尔的“优秀”报纸《责任报》（*Le Devoir*）及时注意到并加以谴责。

但塔什罗政府已落伍、腐败而且支离破碎。1935 年，塔什罗失去了其自由党中大多数具有前途的年轻成员的支持，而且几乎输掉了选举。这位省督不知道如何处理，大溃散的气氛笼罩着他的内阁和决策机构。政府在官方保守派反对党一位警惕、无情的领导者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的刺激下解体。由于人群涌到立法机构周围，塔什罗于是在 1936 年 5 月辞职。“许多人群起攻击塔什罗和犹太人，”《责任报》如是报道。[①]

1936 年 8 月，魁北克自由党被赶下台。人们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失败上，然而自由党在选举中得以幸存，尽管与过去相比，有

① “人群对塔什罗和犹太人发出嘘声。”

更有限、更多的城市政治基础。那一年真正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省级保守党的消失及其被纳入新形成的政治党派，即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Nationale”在英语中的真实意义并不是“民族的”，尽管官方翻译如此；它是指且被理解为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1] 这一事实令拉普安特忧心如焚，因为如果允许民族联盟巩固其对权力的掌控，它将不是与魁北克城的省级自由党竞争，而是与渥太华麦肯齐·金的自由党竞争，引申开来是与整个政治协调体系的竞争，而渥太华政治就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2] 杜普莱西斯总理非常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演说家，同样是一位高超的煽动家，杜普莱西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掌权。渥太华自由党正确估计了他扩大政治中可为之事的范围这一意愿。如果他这样做，自由党担心其会失败。

338

所有这些都有政治意义。这意味着自由党政府不敢做出可能使魁北克形势恶化的决定。“民族联盟”——这次指加拿大联盟——成为金的口令。它对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由于被民族主义者想利用自由党与魁北克犹太人的联系吓倒，金和拉普安特收回所有行动——接纳犹太难民——这些行动在选民看来，可以巩固上述联系。[3]

“民族联盟”是什么意思？如何被付诸实践？金可能是全身心做事，也是心不在焉做事——他通过在模糊话语的困惑中绕开风暴、避免辩论以及（他的专长）掩盖争议创造出平静水面的假象。[4] 他喜欢

---

① 不管怎么样，事实是一些以前讲英语的保守党人继续留在新党派。同样，民族联盟中一些讲法语的保守党人比民族主义者更保守。其中一些人在 1939 年离开民族联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多人离开，但党派中经常剩有讲英语的人。

② 因为魁北克天主教会首领罗德里格·卡迪纳尔·维尔纳夫（Rodrigue Cardinal Villeneuve）明显乐意拉拢民族主义者，拉普安特感到尤为担忧。见 Lita Rose Betcherman, *Ernest Lapointe: Mackenzie King's Great Québec Lieutenan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233 页。

③ Betcherman, *Lapointe*, 269 – 270. 书中讲述了拉普安特拒绝接纳圣路易斯号船上的难民到加拿大以及麦肯齐·金的配合。

④ 金在这一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绰号为“老明天（Old Tomorrow）”，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约翰爵士被认为是一个行动果断和目标明确的人。

的口头禅是"议会会做出决定"。这句话被批评家嘲讽似地重复着。[①]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威廉·莱昂·麦肯齐是由平民选出的护民官，作为他的孙子，金以其民主根源为豪。然而金经历了公众舆论的反复无常，在1911年的选举中从个人角度看失败了，1925年再次失败，而且在1917年目睹被种族和省的憎恨动摇的加拿大。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象。

金竭尽所能对公众舆论给予不同寻常的关注。推测人们正在想什么是优秀政治家的特征，因为没有塑造政治艺术的民意测验。鲁莽的政治家认为，如果他是正确的，公众就会追随。这是米恩的风格，是金所鄙视的。相反，总理恰恰害怕公众舆论可能说什么，这种害怕更甚，因为他意识到数个公众团体存在于加拿大，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相矛盾。这是一个有待处理和改变的问题，谨慎且缓慢——或与不在金控制范围内的事情允许的那样慢。

339

复杂的姑息政治

时间没有治愈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所有伤口。在法裔加拿大人这一方，20世纪30年代末的情形比1914年之前更不稳定，英裔加拿大人这一方稍好一些。法方的一派，始于一伙不成气候的左翼激进者。教会谴责之，主流社会回避之，通过规模不大、温和的自由党，再通过一个大型的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保守的多数党，最终成为了右翼的另一派。民族主义被置于这一派之上，然而尽管很可能正确的是，右翼的大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主义者，但最大程度的右翼，即民族社会基督党（Parti National Social Chretien）的法西斯主义追随者事

① 金最有力的批评家是蒙特利尔诗人、法学教授弗兰克·斯科特（Frank Scott），尽管死后才这么称。他的诗《W. L. M. K.》在其诗集《针眼：讽刺、出击及其他》（Montreal: Contact Press，1957）中发表。

实上是泛加拿大人，由于反犹主义加入到极右的英裔加拿大人中。[①]

与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是英裔加拿大人的帝国主义。在缺乏公众舆论取样的情况下——第一个“科学的”民意调查直到1939年之后才出现在加拿大——我们必须依赖于观察家，包括政治家的猜测结果。政治家及其同僚、新闻工作者和公职人员当然相信帝国主义依然存在。O. D. 斯凯尔顿博士在成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副部长（1925—1941）之前，通过训练成为一名政治学者。他希望随着老一辈带着他们的政治信仰逝去，死亡就会解决问题。斯凯尔顿博士自己认为，加拿大不会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场帝国战争中幸存，

339

① 在加拿大，反犹主义这一问题与里埃尔叛乱并列作为学者和其他评论者激烈争论的话题，因为像里埃尔一样，反犹主义问题切中了讲英语的人与讲法语的人之间分歧的要害。存在反犹主义这一问题是不容置疑的，但谁是反犹分子，他们在哪些方面有影响？还有这样一个隐含问题，即谁更坏，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一般来说，加拿大社会——讲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均显示出反犹太主义的特点。在讲英语的人这一方，犹太人不允许进入富人俱乐部，一些地方有房地产契约限制犹太人居住，加拿大的大学对录取的犹太人有数额限制。在多伦多和其他英裔加拿大人居住的城市有反犹主义事件。另一方面，社会对这些事件持相反态度，这些事件并没有对加拿大普遍性反犹主义运动的肇始产生作用。然而很明显，魁北克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是独自加入到反犹主义事件中的。

此外，一些最恶毒的反犹主义示威游行发生在魁北克，而且正是法裔加拿大人的议会代表团（几乎全部是自由党）对在20世纪30年代接纳犹太难民到加拿大而冒犯魁北克右翼势力感到最为紧张之时。（确定的是，一些“自由党人”与右翼拥有共同的反犹主义偏见。）20世纪90年代，关于法裔加拿大人反犹主义的争论在历史学家当中突然变为一场激烈的公共争论。一方面，见 Esther Delisle, *The Traitor and the Jew: Anti-Semitisma and the Delirium of Extremist Right-Wing Nationalism in French Canada from* 1929 *to* 1939（Montreal: Robert Davies, 1993）。莫迪凯·里奇勒给予支持，尤其在他的下列著作中，*O Canada, O Québec: Requiem for a Divided Country*（Toronto: Viking, 1992）。里奇勒使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沦为一个笑柄，大概民族主义的信徒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此很痛苦。德莱尔（E. Delisle）的书似乎与里奇勒感到愤怒的有争议，但他对她的理由已经烂熟于心。

另一方面，见 Gary Caldwell, “La controverse Delisle - Richler: Le discours sur l'antisemitisme au Québec, et l'orthodoxie neo-liberale au Canada,” *L'Agora*, juin 1994, vol. 1, no. 9。此话题于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上爆发，因为魁北克独立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被许多人认为是反移民和关注“pure laine”法裔加拿大人种族，此为魁北克的一分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诺曼德·莱斯特（Normand Lester）在一本书中将对英裔加拿大人问题的辱骂整理成连贯的4卷，此书被贴切地命名为 *Le livre noir du Canada anglais*（Montreal: Les Intouchables, 2001 and subsequent years）。该书细致列举了英裔加拿大人的缺点，一些是真实的，一些是虚构的，在魁北克得到共鸣，成为那里的畅销书。

但他不得不承认加拿大对英国的依附作为一个政治因素的重要性。

340 斯凯尔顿并不是只反对帝国主义，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行动主义。一些加拿大人相信“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他们希望并期待签订国联基本文件，即如果有任何侵略事件发生的话，缔约的国家能信守承诺加入到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中。有一个拥有数千成员的国联社团（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他们力图对加拿大政府施压使其做正确之事并支持国联。斯凯尔顿将他们视为制造麻烦之人，尽管不是非常危险。所有联邦政治党派中都有国联支持者，但他们绝不会以某种方式被分配安排以确保任何党派的忠诚。对外交政策热衷之人发现加拿大选民和领导选民的政治家从事情多样性角度思考问题，而且外交事务本身在公众心目中很少起关键作用。

起关键作用的是经济。钱太少，工作太少，失业太多，就业太少。这些事项影响到两个与外交事务相关的问题，即贸易和移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同意，只有通过贸易，繁荣才会重现；他们不同意或感到绝望的是如何复兴贸易。对移民之事和移民者而言，国家不想再要了。警察清理了激进移民所在的后街，这些移民可以被驱逐出境或已被驱逐出境，再不需要申请了。

20 世纪 30 年代，反移民情绪强化了加拿大移民主管弗雷德·布莱尔（Fred Blair）的观点。布莱尔确实是一个反犹分子，他任职时正是希特勒开始迫害德国犹太人的行动之时。就布莱尔而言，犹太难民可以去往其他地方。他确信没有政治家会公开主张允许犹太难民到加拿大，这一点他是对的。[①]

麦肯齐·金有其他理由对外交政策犹豫不决。持有怀疑态度的一代评论者详细评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英国的理由公道合理这一信念不如以往那么坚定。在美国，一个国会委员会以最深度的

341 民调，调查是否这场战争不是银行家与军火商的阴谋。金本人似乎没

---

① 关于这一主题的重点著作是 Irving Abella and Harold Troper, *None Is Too Many*（Toronto：Lester and Orpen Dennys，1983）。

有被这些推测所左右，但加拿大舆论并不是对来自美国的传闻无动于衷，并且有些人支持这种看法，即北美在本质上有别于欧洲，且应该仍然远离或脱离欧洲的阴谋。

金尽力避免关于外交政策的危机。国际联盟试图使其制裁制度发挥作用以阻止和逆转意大利于 1935 年对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入侵，而金拒绝派使者到国际联盟。按语言与宗教界线，加拿大舆论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对总理传递的明确信号是加拿大必须避免参与进去。次年，当右翼、君主主义者和天主教势力在西班牙对世俗的社会主义共和政府发动内战时，发生了类似分歧。又是从种族和宗教界线来看，加拿大人对这一问题的对错产生不同意见，金又一次退却了。除了力劝加拿大人不要公然参与之外，他拒绝表明立场。尽管金给出警告，但一些人确实在“麦肯齐 – 帕皮诺纵队（Mackenzie – Papineau Battalion）”为西班牙的共和而战。没有迹象表明金被他具有革命精神的祖父的圣名所打动。

金于 1936—1937 年几度访问欧洲，且成为白宫的常客。这一时期，他是到访次数最频繁的外宾。金在 1937 年出席位于伦敦的帝国会议之前拜访了罗斯福，然而后者因为受困于自身孤立主义的公众舆论，因此无法为英国人提供任何援助或援助承诺，英国人因为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法西斯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事件后对其与英国联盟的背叛越来越担忧。只有法国仍然是其坚定的盟友，正如法国人或许说过的，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1937 年，英国人寻求金的援助承诺未果，但金拒绝明确给予前者承诺。然而在访问柏林期间，金告诉一些不迷信希特勒的部长，如果德国进攻英国，加拿大人将渡过大西洋援助母国。[①]

342

迹象摆在这里供英国人领会。在即将到来的这场国际危机中，加拿大将再次为大英帝国而战。（金将其柏林之行的备忘录送达英国政府，包括加拿大人希望援助母国的言辞。）然而，英国人没有领会这

① 金拜访了希特勒，以德国独裁者农民的特点在他的日记里强加了一些没有实质内容的，尤为令人费解的评论（毕竟金拥有博士学位，而希特勒没有）。

些暗示，因此在1938和1939年一直对加拿大的意图感到迷惑。

事实上，金极力支持当前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37—1940）的政策。张伯伦是乔的儿子，劳里埃的老对头，但在金看来，这是一个可补救的不足。尽管张伯伦在自己政府中专横甚至傲慢，但他坚信安抚手腕，即绥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这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人耳熟能详的策略。任何事情似乎都好于战争及其巨大的人员伤亡、费用和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英国的财务状况，因此英国发动任何新的战争都比1914年的情况更糟。（金及其同僚对加拿大的经济状况有着几乎相同的担忧。）没有人能说出英国将如何在另一场战争中幸存下来，因此避免战争完全合理。

张伯伦继续尝试。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张伯伦避开了对抗。希特勒在接下来的9月策划了一场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危机，张伯伦积极寻求妥协。在极度公开情况下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满足了希特勒大部分要求，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无险可守，而且保证希特勒如果有意，可以吞并这些地区。此项议案于1939年3月生效。

单纯从外交角度来看，1938—1939年的绥靖政策是一件天真、自欺欺人、荒唐的可悲之举。然而，有另一种角度——即当时的政治家的角度。张伯伦和金记得，1914年的英国政府曾因没有全力以赴避免战争而受到指责，1914年7月和8月的外交是秘密进行的，数百万人随后因为一个目标牺牲，他们本来不希望明白这一目标，更不用说解决了。1938—1939年的外交不是那样。希特勒的背信弃义、残忍和鲁莽展现在众人面前；甚至最盲目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同盟国，即英国和法国并未要求战争。当战争到来时，即希特勒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Poland）时，没有观点宣称德国人是被挑衅的或英国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343

战争到来之前，帝国最后一次有喘息之机。1939年5—6月，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及其王后伊丽莎白（Queen Elizabeth）驾临加拿大，进行一次计划已久的王室旅行。乔治六世是名声欠佳的威尔

士亲王的弟弟，受人尊敬。威尔士亲王曾在1936年短期当过国王［称为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他的大臣（包括麦肯齐·金，被征求了意见）反对其选择一个离异的美国女子为妻，因此他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

根据萨斯喀彻温省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次到访是遭受旱灾袭击而且赤地千里的大草原上“10 年来的大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国王夫妇的迎接充分说明了加拿大人的态度和忠诚。5 月 25 日在里贾纳，100 000 人在雨中等候国王和王后。人群数量超过了城市人口数量，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6 月 3 日萨斯喀彻温梅尔维尔（人口 4 000）的迎接。从远至马尼托巴和北达科他州而来的共60 000 人，他们在当地谷物升降机上画的一个标志下等候了数小时——“欢迎他们的国王和王后”①

在魁北克城，像在温哥华、哈利法克斯及其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加拿大人热情迎接国王和王后。这或许只是与单调、沉闷的 10 年的一个壮观对比，但意义一定远大于此。加拿大人明白其重要性，甚至像外交家莱斯特·B. 皮尔逊这样的加拿大人亦然。他嘲笑地评论到，这是英国人巩固加拿大人对必定到来的战争给予支持的一种方法。战争确实就在国王夫妇起航返回英格兰两个半月后到来了。

1914 年，加拿大人很容易地、出自本能地投身到战争中。1939 年，他们经过思考之后才加入战争。犹豫随之而来，部分由于 1939 年春季和夏季发生的悲剧。如果没有热情，还有一种理解是没有其他方法可行。麦肯齐·金以反帝国主义者（包括大部分法裔加拿大人）能接受的理由，将如此多的加拿大人口拼凑到剩余的帝国主义者中。 344

关于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拉普安特与金合作顺利。他们似乎在1939 年初得出结论，战争很可能发生，而且是在这一年内。拉普安特于是在议会发表演讲，概述了如果战争到来，为什么加拿大人会接受战争。金也发表了演讲，强调他会拒绝任何无用或无价值的冒险。

① Waiser, *Saskatchewan*, 324 – 326.

战争不可避免的讯号于8月末到来，此时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共产主义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事实上打开了德国入侵并与苏联人分赃的大门。加拿大政府号召议会，宣布《战争措施法案》并准备召集志愿者加入武装部队。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于9月3日对德宣战；加拿大议会于9月7日开会。政府呈上对德宣战的决议。决议在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加拿大的第一次宣战于9月10日由乔治六世恩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加拿大在1914年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满怀信心。这种信心当然源于无知；1939年则不是这样。空袭、毒气、潜艇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又被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德国人迅速击沉一艘远洋班轮，即雅典尼亚号（*Athenia*），上面载有去往加拿大的英国撤离人员。

加拿大政府走1914年制定的路线，但它可以研究博登政府所犯的错误并力图不重蹈覆辙。政府承担对加拿大外汇储备的控制并对国际 345 贸易采取控制。多亏了R. B. 贝内特，才有了国有的加拿大银行来管理货币并为政府提供建议。政府迅速提高税收，多亏了博登的所得税，政府才有办法这样做。如1914年一样，有一阵“民族团结”情绪，但比1914年的持续时间更短。

问题首先来自省。大部分省都追随联邦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3个草原省以及沿海省份。两个省不追随联邦政府：安大略与魁北克，尽管当他们可以获取联邦救助时也表示感激。在民族联盟的省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管理下的魁北克需要借钱，而且想在纽约借钱。由于战争过早爆发，没能借成。杜普莱西斯可以选择地告诉他的选举人他对财政收入管理不善（事实如此），因此需要提高税收。这将是政治自杀，因此总理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举行了一次省内选举。杜氏指

责渥太华，攻击战争，而且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说，魁北克将不置身事外——不管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戏剧化的示意，不管多么愚蠢，而且一旦做出就不能收回。[①]

杜普莱西斯的威胁极为重要。这对金内阁的魁北克代表而言是一个挑战。在拉普安特的指示（且基于金的目标）下，他们决定面对这一威胁。联邦部长将直接干预省竞选（反对这样做的禁忌不像之后变得那样如1939年一样强烈，即使仍然没有绝对规则和有力实践）。他们将全力以赴击败杜普莱西斯，如果失败，他们就辞职。这意味着麦肯齐·金和讲英语的自由党人将控制加拿大，没有任何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位置——有几分博登在1917年所作所为的味道。魁北克的部长们承诺，只要他们位居内阁，就没有征兵。如果他们下台，杜普莱西斯能保护魁北克省免于征兵的可能吗？这是一次有效的威胁，并得到了由联邦自由党筹钱给予的援助。结果，杜普莱西斯失败了。魁北克将成立一个自由党政府，就战争大部分事宜对渥太华示好而且支持投入战争。 346

接下来是来自安大略的挑战，矛盾的是，那里就是自由党执政。不幸的是，自由党省总理米切尔·赫伯恩（Mitchell Hepburn）憎恨麦肯齐·金。赫伯恩是冲动的牺牲品，而且倾向于高估自身重要性及其省政府的重要性。他也挑战麦肯齐·金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要求建立一个以商人主导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一提议深受多伦多金融区贝街的欢迎。

金迅速举行了一次联邦选举。在选举中，保守派别无选择，只能作为被贝街利用的工具，只能作为未来的民族团结政府。选民发现他们的说理不足以令人信服。自由党——保守党也是——承诺将不会征

① 杜普莱西斯的传记作者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认为魁北克省总理“事实上酩酊大醉”。Black，*Duplessis*（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77），208－209.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不管醉着还是醒着，杜普莱西斯很少能够抵制通过煽动行为建立的最大的政治影响。正如一位自由党国会议员在20世纪30年代末，即斯大林在苏联进行残忍的大清洗的时候所说的“Stalin tue，Duplessis salit”。（“斯大林杀死［你］，而杜普莱西斯使你变得肮脏。”）

兵，这当然在魁北克引起共鸣；但在1940年，这对其他地区也不产生危害。金赢得了大选的多数票，并在1940年3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获得3/4席位。保守党没有足够的席位发动有效反对，更糟糕的是，金及其部长短时间内很容易地招募了一些加拿大商界最热心的人才帮助发动战争。[这些新成员被称作“年薪一加元成员”，其中甚至包括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能干的侄子亨利（Henry）。]

这是胜利之策，但只是从加拿大国内角度衡量的胜利。战争的胜利依靠资历深厚的盟国，即英国和法国，然而他们的前景似乎令人担忧。英国资金短缺并试着在加拿大节省资金，事实上想在英国自身货币区（被称为“英镑区”）之外的任何订单上节省资金。结果，1939—1940年的加拿大工业几乎无所作为。武装部队的征兵吸收了许多失业者，然而还是有剩余工人，尤其如果将自愿的女性工人也算到所有工人总数中。一支加拿大远征军确实于1939年12月乘船开赴英国，而且到春季时，他们几乎准备好在法国和英军一起等待部署。

347 对仍由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而言，事件的进展过于迅速。德国继1939年9月占领波兰之后，于1940年4月吞并挪威和丹麦，迫使英军后退到北海对岸。在挪威的失败导致张伯伦于1940年5月10日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代替，同日，德国人开始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5个星期之后，英军被逐出法国，后者求和。由一位年轻的部长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率领的法国政府残余力量逃至伦敦。在那里，他们尝试在“自由法国”的旗帜下在法兰西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反抗。然而当前，英国只身对抗德国，只有帝国成员给予支持。在大英帝国的国家中，加拿大与其关系最紧密，而且在经济及短期军事支持方面最为重要。考虑到1940年6月加拿大的动员状况，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

在加拿大，新当选的议会开会时就像灾难降落在其身上一样。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金的一个有才之士崭露头角。与博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情况不同，金拥有异乎寻常强大的内阁，他在1940年巩固了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不得不接管军工生

产，而今金安排了 C. D. 豪（C. D. Howe）负责军工生产。他拥有快速作出不同决定的无人匹敌的能力，还拥有政治家常常缺乏的管理能力。财政部长 J. L. 伊尔斯利（J. L. Ilsley）同样被赋予某种能力，并享有解释和为政府在战争上采取"现收现付"政策的决定提供依据的能力。此举使由工资与价格紧缩控制方案支撑的高税收和低通胀方案生效。随着军事工业和征兵对失业者的吸纳[①]以及由于稀缺的供给转为用作军需，材料短缺显而易见，在 1941 年末工资与价格控制成为必要手段。作为司法部长和内阁资政的拉普安特领导一支来自魁北克的强大的代表团，尽管 1940—1941 年间，他的健康状况已开始下滑，后于 1941 年 11 月去世。

348 在金的支持下，豪与伊尔斯利决定冒着政府失信的风险，着手制定一个全盘的战争生产计划。武装力量征兵在 1940 年 6 月之前是自愿的，但之后以修正的征兵法为后盾，此法在法国沦陷之后通过，规定为保卫家园强制征兵，兵役限于北美大陆。志愿者继续前往海外，直至 1942 年，一支由 4 个师组成的军队在英国集结待命。

即使从加拿大派来再多的增援部队和新兵也对协助英国赢得战争产生不了重大影响。后者在对 1940 年成为德国盟国的日本在远东的所作所为保持警惕性关注的同时，自身无力招募足够的军队，只能守卫位于北非的帝国外围。幸运的是，希特勒无法轻易渡过英吉利海峡；同样幸运的是，他的注意力先是转向巴尔干半岛，之后转向与斯大林和苏联的对峙。1941 年 6 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使大英帝国得到一个不是意想中的，但极为重要的同盟，只要斯大林和他的军官能够避免彻底败在德国军队的手下。

苏军的确在设法坚持抵抗德国激烈的进攻，一直坚持到 1941 年

---

① 到 1944 年，110 万加拿大人在军工行业工作，14 岁以上总人口的 37% 在"非农业行业"工作。见 Michael D. Stevenson，*Canada's Greatest Wartime Muddle: National Selective Servic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During World War II*（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1），26 页。此外，超过 100 万的加拿大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曾在陆海空三军服役。

12 月，但即使拥有巨大人力储备的苏联也未必足以扭转对德国的战况。之后在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了大不列颠、荷兰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美国立即对日宣战，日本的同盟，即希特勒通过对美国宣战予以回击。加拿大自然对日宣战。作为帝国驻香港（Hong Kong）卫戍部队的一部分，加拿大军队是首当其冲受到袭击的。遗憾的是，没有办法拯救深入敌方战线的香港，也无法拯救从圣诞节开始被囚禁 4 年的士兵。

掌管战事的政治家在 1941—1942 年惊喜地发现，加拿大人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规章制度，纳税并坚持提供从衣食到汽车的一切短缺品。部分原因是，如此多的加拿大人经历了永久且难以消除的失业，还有部分原因是军工厂的工作薪酬可观，因此尽管赋税沉重，数十万加拿大人比 20 世纪 30 年代甚至之前任何年代的经济境况更好了。1941 年秋，失业率降至 2%——实质上为零——似乎任何想得到工作的人都可以得到。

349

政府试图通过被称作“化整为零”的方案分包生产。这意味着军工生产可以被广泛分包，可以在距离遥远的地方进行，这样的方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事实上，军事工业的最大聚集地位于大都市区，尤其是蒙特利尔，其次是多伦多及其周围地区（“金马蹄区”横跨安大略湖西北岸）、温尼伯和温哥华。[①] 人口涌入安大略、魁北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还有新斯科舍，原因是军事基地在那个省份的聚集。人口从大草原，尤其是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达，还有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涌出。人口从乡村涌向城市。

在众多情况下，当兵被认为比当前的工作与生活更好。矿业和林业格外不受欢迎，但因为如此多的行业依赖矿业和林业，政府于是作出特别努力使矿工和伐木工留在现有岗位上。征兵人员被指示不能接受矿工和林业工人，而且已经入伍的在一些情况下被送回其民事岗位。

战争不是只从森林、工厂和矿山得到供给。农业是加拿大的巨大

① 温尼伯拥有 6 万战时工人，温哥华有 8.9 万。

优势之一，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低价和干旱破坏。加拿大的小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提供了食物，期待小麦再次发挥作用似乎是合理的。然而由于希特勒，顾客不复存在了。被占领的欧洲 350 不能购买加拿大小麦，这意味着1940年丰收的小麦大部分没有卖出，也没有出口。解决办法是使大草原农业多样化——更多的饲料用谷物为更多的肉类生产提供了食物。牛排在战时的加拿大无需定量供应，这一点使自治领成为美国和英国官员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钱再次流向大草原，农民购买了农机，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由于其对生产的重要性而没有定量供应），并缴清了欠税。

国民生产总值说明了许多问题。1939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达56.21亿加元，1945年达到118.63亿加元。以定值加元表示，以1971年为基准，国民生产总值从1939年的177.74亿加元升至1945年的290.71亿加元，增长了63.6%。[①] 家庭收入稳步增长，从1939年的731加元升至1945年的992加元，尽管消费的增长主要出现在战争的前3年。之后的物资短缺限制了购买力，但有益于国家为更好的日子储备能力，不管是什么时候。[②]

因为政府预先调控经济，不如博登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动荡那么惊讶了。尽管确实也发生，劳动力的麻烦之事少了。为了补贴低收入家庭，政府深思熟虑了一项“婴儿津贴”，支付给有孩子家庭的母亲而不是父亲。婴儿津贴（孩子的津贴）成为法律，但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才真正生效，此法律作为避开工资管制的收入补贴的起源已被忘记。

联邦政府做了更多。政府运用《战争措施法案》规范了所有军事工业的劳资关系，中止了省通常的审判权。一项联邦劳动法在1944年通过枢密令落实。它放宽了管理工会的条例，工会无论如何都在扩充他们的感染力并在全国各地与工人签订雇佣合同。

---

① 1944年的数据事实上比1945年的高，军工生产逐渐减少，最终在1945年9月结束。
② R. Bothwell, Drummond, and English, *Canada 1900 - 1945*, 375.

征兵的诅咒

351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在与真正的邪恶作斗争。没有花费许多宣传将希特勒及其盟国描述成令人恐怖的，其政府是恶毒的和他们的胜利前景是可怕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同盟国的宣传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浮夸之风的不良影响，低估了纳粹的暴行和纳粹统治的邪恶。由此可见，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应该使用强大的手段。当时的用语是“全面战争”，意思是社会所有阶层全力投入。报纸和政治家宣扬牺牲，但为了证明牺牲的合理性，他们不得不宣扬牺牲的平等性。

与1914—1918年相比，政府在更大程度上调动了加拿大的经济资源，高收入阶层中的严格高税率接近100%。甚至在中等收入阶层的税收范围，政府也将纳税人的口袋掏空。一些加拿大人在战争期间明显经济状况欠佳，尤其是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只有那些在战争前挣钱很少或不挣钱的人过得更好一些——然而当然有很多这样的人。公司利润被控制，目的是公开尽力阻止战时牟取暴利。

保守派加拿大人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或许除了战争经历之外，他们被20世纪30年代所震惊。他们不仅缴税，还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中。并不只是保守派加拿大人在失败与灾难的1941年开始提出征兵这一问题——且金政府提出的不只是有限的守卫家园的征兵，还有全面义务兵役。考虑到1941年末的军事情形，加拿大采取义务兵役制的要求产生强烈反响。

征兵制度拥护者的情绪再次通过民意测验体现出来。一些民意测验是公开的，而另一些则在政府的监视下秘密进行。1941年圣诞节期间，总理忧心忡忡，但在担忧的同时开始着手作出针对未来的一些部署。

352 首先，麦肯齐·金需要替换作为司法部长和魁北克二把手的埃内斯特·拉普安特。一番犹豫后，他选择了魁北克城一位杰出的律师、加拿大律师协会前会长路易斯·圣劳伦特（Louis St. Laurent）。圣劳伦特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1942年2月正式当选议会中拉普安特原来

的席位。考虑到自由党在魁北克的主导地位，这一结果事实上是预料之中必然发生的，但有一个在魁北克引起详细评论的补缺选举的特征。圣劳伦特没有重复其前任反对征兵的承诺。他不像自1939年拉普安特和其他魁北克部长所做的那样受到相同承诺的约束。

讲英语的加拿大人正密切关注在多伦多郊区同时举行的另一场论战。自1940年选举便群龙无首的保守党请求前总理，亦即金的死敌阿瑟·米恩重新领导他们。米恩接受了，并像1917年一样表明对征兵问题的立场。征兵针对所有人，而且在这一大业中应该是平等牺牲。他当然是指自己所说的，但他也知道支持者明白，平等牺牲意指魁北克和魁北克新兵。他们认为，讲法语的魁北克人的入伍率比国家平均水平低得多；征兵将使其平等化。这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真实——19%的武装部队是讲法语的，与1914—1918年的12%对比明显，金政府作出很大努力创建并维持法语部队。[①]

当他想到不得不与米恩共度剩下的政治生涯时——或许很短，金有点儿着慌。他的日记证明了他的苦恼。幸运的是，他不必如此。自由党组织者拒绝推出与米恩竞争的候选人，相反，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平民合作联盟给予支持并提供资金。平民合作联盟击败了米恩，后者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金感到欣喜，但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他正准备下一步。

政府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将征兵从1939年魁北克和1940年整个加拿大竞选承诺的不会使征兵成为法律中解除。在这次公民投票中，法裔加拿大人总体上投了“反对”票，英裔加拿大人投了“赞成”票。自然也有例外。在魁北克小镇沙威尼根，一个具有极不寻常的名字威利（为了纪念威灵顿）·克雷蒂安且统一使用一种语言的法裔加拿大人投了“赞成”票。威利·克雷蒂安是持相反意见者，在加拿大无疑有很多威利，分布在问题的正反两方。另一位非常杰出的法裔加拿大人，司法部长圣劳伦特也投了“赞成”票，他打算承担他的立场带来的后果。当

353

① Paul - Andre Linteau, Rene Durocher, Jean - Claude Robert, et Francois Ricard, *Histoire du Québec Contemporain*, vol. 2, rev. ed. (Montreal: Boreal, 1989), 149.

总理提交使海外兵役征兵合法化的提案时，他给予金支持。其他魁北克籍部长中有一个辞职了，而其他人则心神不定地来回推诿。对他们而言，金有一个答复，已作为加拿大政治学经典：“未必征兵，但如果有必要便征兵。”法律有案可查，但到目前为止不会被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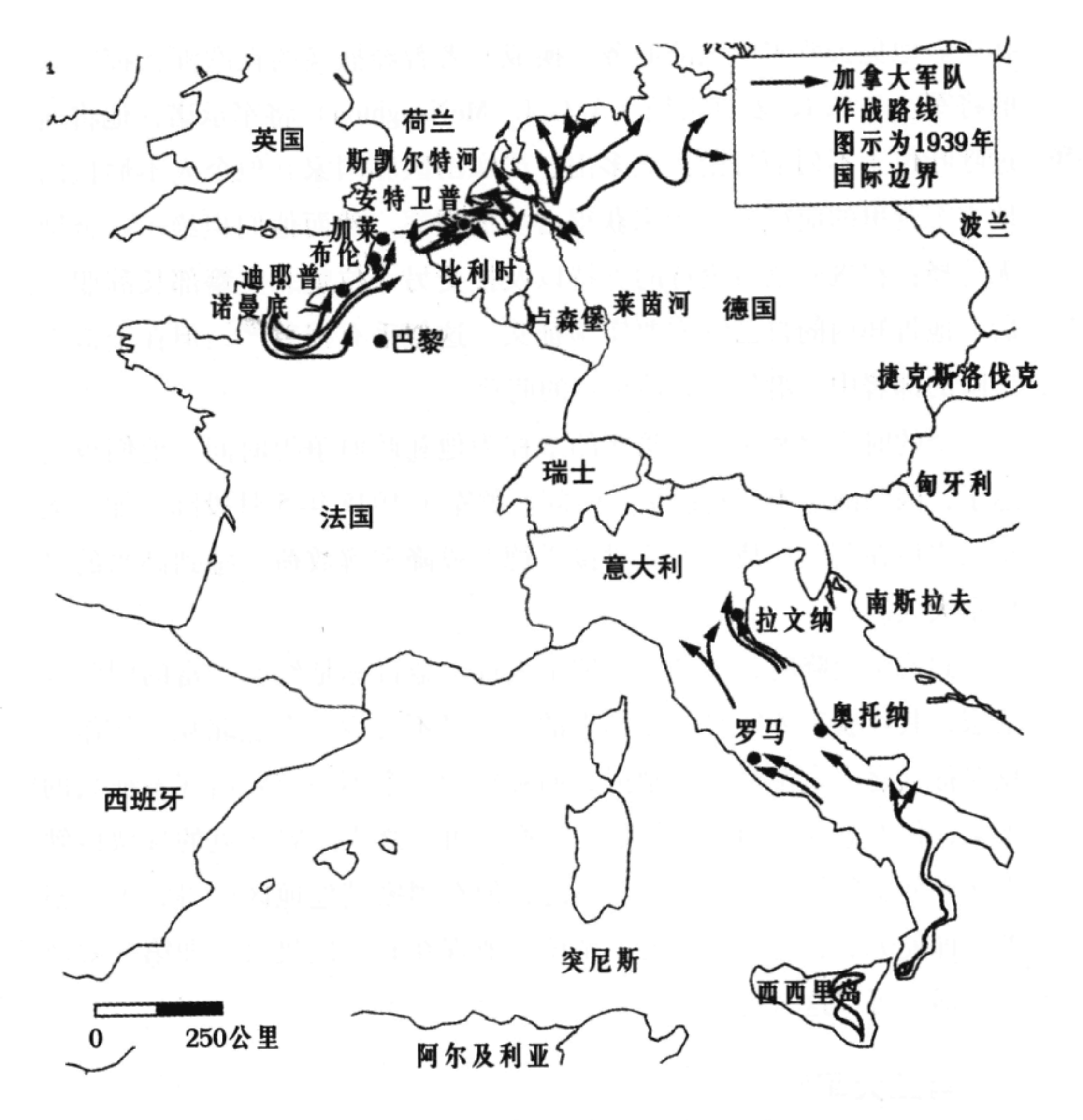
原因很简单：至今不需要增援部队。加拿大皇家空军（Royal Canadian Air Force）在一些任务中，特别是在对德国的轰炸中遭受重大伤亡，海军也激烈交战。大恐慌是当军队交战后会发生什么——但直到 1943 年，除了香港和对法国海边城镇迪耶普（Dieppe）血腥突袭的失败之外，加拿大军队没有直接与敌军交战。它的主要敌人是厌倦，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加拿大政府鼓动军队加入到 1943 年 7 月同盟国对西西里岛（Sicily）的进攻中。这件事以分兵——一部分留在英国，其余的派往地中海为代价完成。

有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亡使下一代英国将军——他们在之前的战争中是中级军官——对耗尽他们的士兵的生命极为谨慎。听命于英国统一指挥的加拿大将军吸取教训，并且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被撤职，像 1943 年末在英国指挥加拿大军队的将军身上发生的一样。英国人通知说继续令其指挥将会很危险，而且加拿大国防部长也同意了。

354

加拿大军队从 1943 年夏到 1945 年冬参与了意大利战役。此战役虽血腥但从最广泛意义上讲不起决定作用。意大利是一个附带事件。德国人可以进行有效防御并可以向北从容不迫地后撤。他们有许多复杂地形迫使同盟国进行战斗。加拿大军队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但与主力战相距甚远。

在法国诺曼底（Normandy），盟军——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于 1944 年 6 月 6 日抢滩登陆。同盟国享有超强的空中优势，并且随着时间临近，他们可以发挥其在装备上的优势。德国人拥有一支精良的军队来击败对手，但还不够，而且他们有希特勒疯狂干涉作战意图的不利因素。加军和相邻的英军坚持与德军作战，但几乎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直到一支美国攻击力量从侧翼包抄德军并于 8 月初打开了通向巴黎的大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军队在欧洲的战斗

诺曼底战役持续了9个星期。对加拿大军队而言，他们的伤亡巨大。以前没有增援危机，现在有了，就在军队北上进行一系列战斗行军，打开通往安特卫普这一比利时大港口的路径以便于供给可以轻松到达同盟国军队的时候。国防部长J. L. 罗尔斯顿（J. L. Ralston）此时检阅了部队，由于对其发现的感到震惊，于是返回加拿大告知他的同僚必须实施征兵且立即实施，以使军队能够有效作战。这并不只是效率的问题，还是荣誉的问题。

这对麦肯齐·金而言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这位总理正处于挣

扎中。他免去罗尔斯顿的职务，换成后者曾经撤换的在欧洲指挥军队的将军。A. G. L. 麦克诺顿（A. G. L. McNaughton）将军承诺，他将通过呼吁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多雨、严寒山区和国家其他令人不愉快的地方军营里的应征入伍者来获得必要的援军。然而他们拒绝了。金别无选择：在巩固圣劳伦特的支持以及接受另一位魁北克籍部长辞职之后，他告知内阁自己终究要实施征兵。这似乎有损尊严，但在金铤而走险的部署中，潜伏着政治生存的萌芽。

356

金的时机感和对政治暗斗的掌控为他和政府争得时间。他们也走运了，因为战争不会持续更长时间。德军于 1945 年 5 月投降。加拿大军队之后在荷兰作战，因此对接受德军投降和解放荷兰感到高兴的是加拿大人。

到德国投降时，加拿大正忙于大选。金自称是经验丰富的国际政治家，其经验和才能对必然到来的和平必不可少。在魁北克，他作为反对征兵之人直至最后压制征兵而被铭记。金不一定要信守不征兵的承诺，但对魁北克而言，他是一个必不可少之人。魁北克的选票以勉强多数使金得以就任，但总而言之，他在国家其他地区做得并不是很差，即使如此，他第 3 次失去席位。他现在有一次机会，即第三次政治生活，可以这么说。

第三大军队

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巨大。首先，国家得以幸存，而且在战争结束时出现比开始时更富裕、更稳定的局面。这主要是政治上的一个成就，归功于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环境和特性的结合。政治稳定保证了国内政治斗争在范围和重要性上受到限制。

同样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人口，加拿大投入战场的武装部队以及生产出的军需品和其他供给的数量令人惊讶。据 1941 年的人口普查，加拿大的人口为 1 150 万，产生 110 万武装部队入伍者，尽管不是所有入伍者在同一时间服役。陆军在顶峰时达到 500 000 人左右，

357

包括15 000名女兵；空军近100 000人；海军大约200 000人。这是很大的数字，1944年，加拿大军人数量在西方盟国中排在第三位。

话虽如此，但还是一个相差遥远的第三。美国与大不列颠拥有比加拿大多得多的部队。如果以经济贡献衡量，加拿大又是排位第三，而且还是相差很远，或许代表同盟国军工生产总量的5%。加拿大政府意识到这些比率，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应该说成很少达到武器级别。加拿大的贡献在需要的时候足以得到关注。在麦肯齐·金执政的加拿大，信誉和影响是配给而不是挥霍的资源。

总理事实上是外交政策上唯一重要的大臣。其他大臣，如军需品之王豪或财政部长伊尔斯利在国外有联系，足以保证他们部门的平稳运行。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实际上，豪抵制加拿大外交家尝试运用他的军需品供给作为讨价还价工具为加拿大从资深盟国英国和美国那里得到更大认可。同盟国得到军需品供给后做什么是他们的事。如果加拿大开始强加条件，在豪看来，其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供给来源的地位不会长久。

加拿大最关心的事与美国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供给和最初的美国贷款对保持加拿大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1939年，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煤和石油。1940年，加拿大战时行政人员发现，没有美国部件，如机床和飞机引擎，加拿大工业就不能装备生产。加拿大外汇储备为支付美国的供给而耗空，而且没有来自英国的援助，英国面临同样的困境。就在此时，即1941年4月，金利用他与罗斯福的良好关系监督建立了一个协定［《海德公园协定》（*Hyde Park Agreement*），以罗斯福的乡村地产命名］，内容是为战争生产装备的美国从加拿大购买所需物资，基于相同标准，加拿大也从美国购买战争物资。加拿大的外汇问题在战争期间因为美国的购买基本解决，而且建立了一个整合加拿大和美国军工生产的先例。与此同时，加拿大能够利用美国对英国援助的部件为联合王国生产军需品。 358

令金及其部长，还有其他官员满意的是，加美贸易和外汇的不平衡基于贸易而不是援助得以解决。是商品的交换，而不是捐款，也不

是对一个相邻的强大的债权人的债务积累。结果，加拿大并没有在战争结束时对美国负债，而且加拿大的主权平等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并没有被损害。自然地，在人口、财富和实力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但正如1909年的《边界水域条约》和之后的国际联合委员会规定的一样，加美关系在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运行，按照双方的共识，理应有对边境双方都公平运行的条例。

对于同盟国中另一个强国苏联而言，相互关系在物质上很重要，但只在特定意义上的政治上也重要。加拿大人——也就是英裔加拿大人——总体上支持英国，也支持美国，钦佩这两个盟国，而且受到两国领袖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鼓舞。苏联通常不是这样，但有一个加拿大人的派别，即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他们非常钦佩斯大林并将苏联看作人类的希望。加拿大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忠诚的马前卒。这意味着，加共接受斯大林时而复杂又经常自我挫败的政策的每一次曲折。1939—1941年间，斯大林与希特勒友好时，加拿大共产党尽其所能阻止本国投入战争。1941年后，苏联处于德军攻击之下，加拿大共产党又变为支持全面战争的过分的爱国者和狂热者。

359

苏联在渥太华设立了大使馆，并利用其征集加拿大的军需品，这些军需品在一个被称作互助（Mutual Aid）的方案下提供。派送到苏联的援助比到英国的少很多，但仍然很重要。苏联大使馆的其他方案都是官方平等的，但很谨慎地不为加拿大官方所知。苏联利用他们在加拿大的支持者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以发现加拿大及其他西方盟国在做什么。这个网络在加拿大是第一个，只是在战争结束后被揭露，它的重要性将留待下一章探究。

继苏联之后是法国。因其在魁北克的重要性，法国同样有与其他任何盟国不相匹配的国内政治的重要性。两类不同的法国人都争夺魁北克和加拿大的支持。有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领导的法国，其政府结束了与德国的战争，这一政府存在于德国默许的位于法国南部一块未被占领的区域。贝当承诺清洗法国的堕落和不纯法因素，这些已经——他是这样宣布的——被削弱并待时机成熟时将其击败。贝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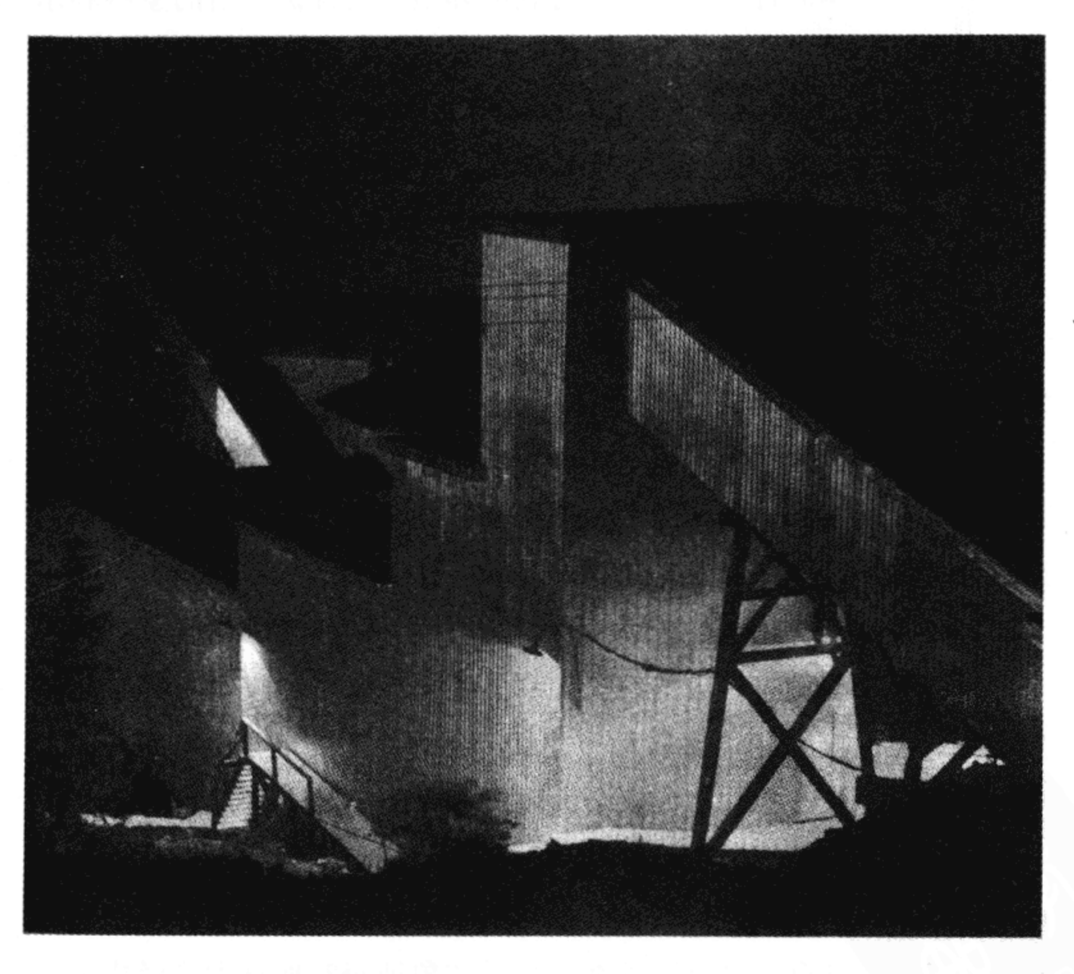
政府得到右翼天主教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但其官方理念“工作，家庭，国家”（*Travail*，*Famille*，*Patrie*）对魁北克右翼天主教阶层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由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自由法国谴责与德国的和平并承诺通过协助同盟国打败德国来光复法国。戴高乐运动起初艰难无力，后于 1941 年发展壮大，是因为海外法兰西帝国一些地区协力支持这一事业。戴高乐严厉、有眼光且不妥协，是英国和美国一个不易相处的合作者；罗斯福总统憎恨他，而起初是戴高乐庇护人的丘吉尔也承认这位将军不易相处。麦肯齐·金做得更好，尽管加拿大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与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都有联系。英语加拿大对自由法国而言证明是一个有利的环境，而且讲双语的蒙特利尔至少是戴高乐的密使劝诱改宗的基地。加拿大政府赞成戴高乐在 1941 年 12 月从维希政府手中夺取圣皮埃尔（St. Pierre）和密克隆（Miquelon），并且当美国政府要求这两个岛屿应该归还贝当政府时（这两个岛屿不属该政府），加拿大政府是一个非常不情愿的合作者。1944 年 6 月，戴高乐对渥太华进行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对加拿大表示出真挚友谊的一切迹象。当他随后于夏季返回巴黎时，加拿大正准备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和信贷。 360

加拿大的战时外交政策适度、均衡而且有效。加拿大不是一个强国，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国的虚荣。但政府能够为了加拿大利益采取有效行动，既不过分超出能力之外，也不滥用信誉。

然而说到底，何为加拿大，何为加拿大利益？就在战争结束时，金的部下决定他们将打破传统。加拿大陆军、海军和空军身穿英军制服作战，但制服上有“加拿大”臂章。金的部下决定尝试对等，而且于德国投降当天，在加拿大议会大厦的和平塔上挂上了加拿大重新设计的国旗而不是英国国旗。这是一种胆怯的姿态，但却令麦肯齐·金的内心颤抖，一是因为代表自己，二是因为他害怕传统上对此在意的选举人愤怒。加拿大可以明确拥有自己的象征吗？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吗？

第十三章　馈赠礼物时期（1945—1963）



原子时代：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大熊河畔雷锭港上的铀矿驱动轴。

1945年，加拿大人有些担忧。担忧的理由是充分的：同盟国通过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结束战争，改变了武器的世界，缔造奇迹的武器万一落入歹人手中，将产生新的危险。但那不是最令人担忧的。加拿大基本以国内的视角看待世界。战争打响，而且加拿大取得了胜利，而今战争也结束了。生活如常，但却与以往大相径庭。过去预示着现在，过去的经济令人失望——大萧条中未达成的希望和失调的社会。过去也是战争中的凯旋——最近就业充分，经济繁荣。哪一部分的过去会在今天盛行？ 363

1945年的春天令人不安，多数加拿大人选择麦肯齐·金和自由党人。即使多数士兵也支持自由党人，尽管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金将应征士兵派往海外的勉强广为人知。[①] 加拿大人没有选择更明了的保守党——自1942年，在马尼托巴前省总理约翰·布拉肯（John Bracken）领导下的进步保守党。他们没有选择同平民合作联盟一起试验社会主义，而是将平民合作联盟留在萨斯喀彻温的堡垒中，1944年后者在那里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在新斯科舍、马尼托巴、安大略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平民合作联盟仍可以作为国家级政党得到足够的支持。

加拿大是一片复杂、广阔且潜在的分散土地。在大萧条和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联邦政府虽然屈从但没有让步。联邦政府，事实上也只有联邦政府拥有金融资源能够平安渡过风暴。地区的，一般是 364 省级的政客在大萧条中沉浮，但是省内资金的短缺意味着他们除了向不受影响的渥太华发动语言上的攻击外，几乎不能做什么。

加拿大的政治被占多数的英裔和占少数的法裔之间的分歧复杂化。但是20世纪30年代，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对待社会和政府的态度非常保守。税收很低，与由税收资助的政府服务的效率相一致。相对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占支配地位，这使到此的美国人很吃惊，这些美国人回国后说如果加拿大与美国相比不算落后，也绝对是一个保守的国

① Jeff Keshen, *Saints, Sinners and Soldiers: Canada's Second World War* (Vancouver: UBC Press, 2004), 262. 书中引用了民意测验的结果。

家。在以天主教徒为主且说法语的魁北克，管理大多数社会服务的是教会。甚至在大多数是新教徒的英裔人口中，教会即使没有在复合型社会起决定作用，也意义重大。终究，加拿大是有人经常做礼拜的国家，而且是基督教的国家，牧师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至关重要。那些从理智、社会甚至是两性方面不同意大多数人做法的人在较大城市的庇护之下独立且悄悄地自行其是。

加拿大的表面形象是未开化、老土且落后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传统上加拿大比类似的国家都落后——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之后。不仅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也落后于大不列颠、澳大利亚，甚至是阿根廷。

1945年，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加拿大从战争中得到益处。1944年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超过了富裕的澳大利亚——这是150年来的第一回。[①]（它远远落后于美国，相当于其60%。）由于实际上未受战火的影响，加拿大旧工业得以发展且建立了新工业。联邦政府试用联邦主义的新形式，为战争所需拨出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政府尽其所能从高额的税收中筹钱支付，借款填补剩余部分。就集体的牺牲精神而言，加拿大对战争的投入可以与英国相比。就人均值而言，甚至可能比美国人付出还大。

365 代价可以从肮脏的运输、磨损的衣服和荒废的住房看出。1945年，虽然很多人比20世纪30年代富裕了，但他们靠延期的希望而不是及时的消费得以维持。（政府确信，与花费相比，节省更容易，并通过严格且有效的控制执行政策）。[②] 战争的成效可以从漆到魁北克悬崖上，用于向靠岸的返乡军队问候的“Vive Petain”中得到体现。[③]

---

①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3), 88, Table 2c.

② 对通常最有独创性的掌管消耗的政府监管之描述见 James H. Gray, *Troublemaker*: *A Fighting Journalist's Record of the Two Booming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Winter Years* (Toronto: Macmillan, 1978), 124-127页。

③ Robert Bothwell, *Canada and Québec*: *One Country*, *Two Histories*, rev. ed. (Vancouver: UBC Press, 1998), 77-78.

政府已经做好准备：汽油配给被废止。如果他们拥有汽车，加拿大人可以驾驶自己的汽车免费行驶在公路上。战时的储蓄计划和其他限制被遗留下来。政府的税收优惠鼓励制造商把他们的工厂转为民用，而且没有比汽车工业更容易的了。手里有钱，加拿大人便想消费。汽车的销售出现回暖——1946 年售出 78 000 辆新车，1947 年为 159 000 辆。统计学家感到惊讶，对汽车销量的吃惊程度远不如对“公众手中大量的现金允许对此项商品的直接购买”且没有贷款的事实。①

这是变化之一，此外还有其他变化。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失业是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特征。经济学家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政客们则紧跟他们的脚步。活跃的政府通过计划和消费结束了失业；随之而来的是现在的政府必须计划经济，提供“充分就业”——这是 1945 年最受钟爱的字眼。4 月，自由党政府制定白皮书，设置了完成或几乎完成充分就业的政策。② 白皮书为当前的目的服务：再次选举政府。而且，奇中之奇，出现了充分就业。政府和它的朋友们将此归因于适当的计划，而且在世道好的时候，人们都普遍忘记其实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什么计划。③

战争结束了，就业率没有降低或是没有降低很多。一种新常态固定下来。加拿大人结婚后，新成立的家庭要购买冰箱、火炉、衣服。他们想买房，但是，使特殊商品系统化要花费一段时间。如果是老兵，他们会投资于教育——对于一些能上大学的人而言是这样，但对于其他人，则是职业培训。政府通过慷慨的福利计划支付费用。 366

老兵们不能拖延的是婚姻和家庭。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婚姻来说是一段惨淡的日子，随着经济的大体前景从不确定到萧条，结婚被推迟。结婚年龄变大，出生率下降。战争令事情发生改变。男人和女人

---

① *Canada Year Book*, 1948 - 1949 (Ottawa: King's Printer, 1949), 822 and Table 24.

② 事实上被政府所用的短语是“高度稳定的就业率”——我们可能称之为并不充分的就业率。

③ 关于此重点见 Robert Bothwell and William Kilbourn, *C. D. Howe: A Biograph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79), 194 - 196 页。

都自愿服役，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设想和性别角色，男人占有相当多的数量。女人接受挑战去取代男人完成地方工作，而且很多人做到了。挑战多种多样，从对于女子大学的学生来说的（在多伦多大学，针织受到偏爱）强制为战争“服务”到在红十字会驾驶卡车，或是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事。[①] 1944 年，女性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达到 30%——总参加率的 33%。还有一个终极挑战——那就是战争将要结束时，从事男性工作的女人会安静且愉快地离开；一些人做到了，一些没有。

年青男女对于破裂的反应是寻找稳定，寄幻想于家庭。[②] 仓促的婚姻、丈夫参战离家，为战争工作的妻子往往体会到的是除浪漫之外的一切。然而，战时婚姻的数量有增无减，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海外的军队中皆然。（后者并不被正式鼓励，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500 000 名年青男兵在海外和大不列颠的堡垒中，这样的事情照样发生）。当加拿大士兵从欧洲返回的时候，带回 43 000 位战争新娘（War Brides）与 21 000 个孩子。（而且留下了 30 000 个非婚生子女）。[③] 他们还带回了这些婚姻所暗示的乐观主义。[④] 他们带有胜利所产生的正面经历，对能够令一切发生的体制的感谢。他们的期望很高，而正是这些期望，而非其他事推动了未来 20 年的进程。[⑤]

---

① Jeff Keshen, *Saints, Sinners and Soldiers*, 146.

② Doug Owram, *Born at the Right Time: A History of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12.

③ 第一次婚姻潮发生在加拿大军队于 1939 年 12 月到达英格兰后 6 个星期。93% 的战争新娘是英国人，剩下的 7% 来自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这些国家都是战争中加拿大军队曾穿越的，该数字是指 1942 至 1948 年这段时期。资料来源：www.canadianwarbrides.com。Jeff Keshen, *Saints, Sinners and Soldiers*, 268 页中提到战争新娘的总数是 47 783 人，而且在 233 页取用 30 000 人作为非婚生子女的数量。

④ Jeff Keshen, *Saints, Sinners and Soldiers* 引用 1944 年后期在士兵中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 54% 的人相信对于他们来说，战后的事态会变得更好，至少不会变糟，而只有 15% 的人很悲观。

⑤ 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与美国老兵比较的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一般来说，我提及的性格来自于这个群体，参见 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 1584 to 2069*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1), 261–278 页。

婴儿潮

战后几年最令人难忘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更多的家庭意味着更多的孩子，随着战争几年中家庭结构的成形，“婴儿潮（baby boom）”这一名词出现了。[①] 由于婴儿死亡率[②]的降低和“特效药”，如抵抗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的沙克疫苗的发现，有了更多的孩子，更多健康的孩子，直到加拿大每年夏天的灾祸。[③] 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的学校。1945 到 1955 年间，多出百万的学生进入小学和中等学校；1955 到 1960 年间，多出 900 000 名。1945 年后，发放子女家庭津贴的联邦政府使他们的就读成为有条件限制的；在战时省内的自由党政府的控制之下，它与魁北克义务教育的颁布一起，成为注册的来源，补充着出生率。 367

带孩子的重担极大地落在了妇女的身上。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对于男人意味着充分就业。工作的模式令男人从家中来到工厂或办公室，从早上 8 点或 9 点直至傍晚 5 点。大多数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待在家中，照顾孩子或做其他家务。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大学中女生的入学人数显著增加，但占总数的比例相当稳定，为 21% 左右。1941 至 1951 年间，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确实有了轻微上升，达到 22%。女性劳动力集中在诸如教育（在小学或中等学校任教）或健康（护理）这样的行业中。[④] 事实上，所有文化行业和媒体，从女性杂志到应召女郎都执行着这样的模式：在女性工作的地方，她们做的几乎都是传统的女性职业。

---

① 第一次有记录的应用在 1941 年的美国。“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要追溯到 1974 年时对这一代人的描述。

② 1940—1945 年间，每 1 000 人中有 61 人死亡，1956—1960 年间变成 31.3 人。*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Canada*, 2nd ed., table B24.

③ 1945 年后，脊髓灰质炎变得非常严重，1953 年时每 100 000 人中有 60 例，沙克疫苗研发成功后，1957 年时，这个数量下降到 1.6，尽管在 1959 年时又达到 15。同上，Table B522。

④ 同上，tables W340 - 438 和 D8 - 85。

重建与恢复

家庭与孩子需要住房，但住房却短缺。住房是社会的需要，但也 368 是经济的工具。严格说来，它在政府的“重建”政策下减少了。重建对于众多小事情来说是很大的名字。它暗示重新建造、设计且制造新鲜事物。就经济而言，结构上并没有改变，虽然提出很多不同观点。优势最大的是社会主义，它可以通过财政和生产手段的政府拨款来达此目的。政府应该利用“计划者”所支配的工具“指挥”经济这个观念不那么彻底，却让人印象深刻——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是战争成功的继续。

金政府拒绝了这两种选择。在责任部长豪的观点中，微观计划超出政府的普遍能力。[①] 就宏观计划而言，政府应该从整体上通过在税收和开支的层面进行调整来监管经济和管理经济情况的观点是部长能够接受的，虽然基本上它是一个奇怪且难以理解的概念。

联邦政府利用双管齐下的政策处理住房问题：第一，居者有其屋被尽可能地贯彻；第二，住房留给私营部门建造。政府鼓励按揭而且通过法律使人们更容易得到贷款。也为老兵可用的住房积累资金，尽快解除对供给的控制。重建国民经济的责任部长豪对抗议的呼声充耳不闻，这些呼声不常来自因为住房市场自我建设且悔于未得到政府资助，而不喜欢短期混乱的经济。就像豪给一位杰出的商人在稍稍不同的语境中写的信那样，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商业重置于私营企业中。

历时 5 年的战争后，如果说联邦政府业已熟谙了这一观念，即有的计划尽管看似奇怪但很诱人的话，那么各省则落后得多。开始时，他们对于资金匮乏的体制几乎没有什么办法。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战争期间，渥太华对于年青人和天才来说是块磁铁。它是激情的所 369 在。1945 年后，激情还在持续。省则没有这样的吸引力。1941 年，联

---

① 见 Joy Parr, *Domestic Goods: The Material, the Moral, and the Economic in the Postwar Yea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87 页中政府对微观调控的拒绝这一例证。

邦政府利用它的支配力量，在体制上但更重要是在政治上，强求省份同意为了战争的继续而放弃大部分收入，接受以来自渥太华的退休金拨款为代价来发挥其最重要的职能。甚至桀骜不驯的安大略和自由党领导下的魁北克也同意了。

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些安排半途而废。然而，对于渥太华的经济学家来说，适合的经济计划要求集中化税收的战时结构为国家宏观经济的安排被保留下来。文职人员更希望乘着战争胜利的浪潮进入一个改良了的政府体制，规定完全的福利社会，包括退休金和政府出资的医疗保险——从摇篮到坟墓的保证。无疑地，体制给了各省它们自己的税收，令其任意支配。但确定的是，为了更大的公益，顾虑可以被超越。1945 年，省级联邦咨询会召开。次年，成熟的省级自治领会议举行。自治领政府制定了绿皮书（因封皮得名），邀请各省将颁布法律和为普遍社会保障体系融资的权力转交给渥太华。它得到了内阁，尤其是财政部长伊尔斯利和司法部长圣劳伦特的支持。在被一个同僚问及是否魁北克会拒绝时，圣劳伦特说会的，但魁北克有望对任何实际的东西表示拒绝。当然，他是完全正确的。

麦肯齐·金视整个计划为冒险行事。他不是宪法专家，虽然金是一个被训练过的律师，而且他虽然有经济学学位但却不是经济理论家。然而，金是一个职业政客，对未来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熟谙加拿大政治游戏中玩家的强势与弱点，而且知道战争的结束允许省内的政客，如果他们选择这样，重新要求他们的宪法权力，而与之相对的联邦的社会福利政策无论如何极力图谋且机智狡辩，都不可能站住脚。 370

这意味着各省，如果它们选择这样做的话，会从其税收力量中恢复过来，包括在任何他们想要的水平上设立税率的能力。金知道自己不能阻止他们立法设置自己的社会福利政策。没有省内的同意，渥太华也不能为他们这样做。他也知道，自己将在会议中面对的是魁北克的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和安大略的乔治·德鲁（George Drew）这两股强劲的行省力量。到此时为止，杜普莱西斯是两者中较为保守的一个，

从哲学的角度反对省内对诸如社会福利这些领域的国家干预。他认为，这些最好留给公益事业或教堂。他是旧学派中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市场和私人企业家武装到牙齿去调整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工会充其量也就是背离了其宗旨。杜普莱西斯会把这些信念与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的灵丹妙药混搭，通过在“英语的”渥太华与他所发现的极讨厌的社会理论之间建立关联，他希望能够将魁北克的观点与国家其余部分的反对加以整合。

在这些问题上，德鲁更糊涂。一方面，他不喜欢专家和理论，特别是渥太华的专家和理论。另一方面，他很好地意识到大多数渥太华人希望他们的政府，无论联邦或省内，寻觅个人的安定。因此德鲁不得不为他的全国选民提供自己及其进步保守党的同伴能比渥太华做得更好的观点，有效地利用渥太华令省份蹒跚前行的看法。

德鲁和杜普莱西斯联合起来与联邦政府做对，扰乱绿皮书的提案。这正是麦肯齐·金所预料到的，而且他并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哀悼对他来说雄心过大且太危险而不能重著加拿大宪法的意图。①

金所做的事是尽快减少了与战争相关的开支，遣散了武装部队且把部队送回了家。金的聪明之处在于，政府将一些省下来的钱直接用于老兵的福利——投入到住房、教育和职业培训。与 1919 年的老兵不同，1945 年返乡的士兵经常被他们保卫的国家明确答谢。最终，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得以避免；而被合理应用的一项慷慨的社会计划，随着它广泛的应用扩展了安定和机会，形成了一个更为保守的社会。

371

制造破坏的怪物

战争打响，与其说是直接避开对加拿大的危险，还不如说是对加拿大同盟国和伙伴的危险。如若封闭和无助，加拿大什么也不是；所以加拿大在海外作战，同于近期的任何时候从空中、海路和陆路到达

---

① 艾尔文·芬克尔（Alvin Finkel）在他的论著 *Our Lives*：*Canada After* 1945（Toronto：Lorimer，1997），15－21 页中换了另一种视角，控诉了国王的虚伪和把重组会议粉饰成看手势猜字迷的游戏。我认为情况更加微妙了。

北美且在北美登陆的机会都微乎其微的敌人作战。唯一的邻居美国因与加拿大一样免遭外来攻击，而且位于非常安全的战争后方的平台，两个国家都前往国外，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那样，为“寻找制造破坏的怪物”。

制造原子弹的科学与技术及令它们穿越长距离的航空舰队动摇了和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20世纪的新事物，马上一个完整的产业便致力于创造“原子时代”的幻想和一切核武器产生的可能。无可否认，它是有关于算术的事——制造足够的炸弹，在愤怒中引爆它们，而文明的结束也就指日可待了。

加拿大以两种方式涉足原子学。在战时，加拿大政府开采和提炼核弹的原材料铀，并且主持由英国经营、位于加拿大的原子实验室。它的目的是军事的，为了制造原子弹，但是它被动作较快且生产于1945年8月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的美国团队赶上。加拿大是“原子弹秘密”的一分子。于是，加拿大与美国、大不列颠一同承担着如何对待“秘密”的决定。它应该成为或可能成为真正的秘密吗？如果不是，它应该作为世界国家间信任和互惠的新时代的基础被分享吗？其他国家能够被信任保守秘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主要是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他是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且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共产主义在加拿大拥有分支。自从1921年加拿大共产党成立，它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它在国内受到了迫害，转而寻求国外支持。最终，它在斯大林“兄弟般的”共产党阵营中找到了归宿，为苏联（Soviet Union）伟大的中央共产党所买卖。支持的代价就是服从，而且加拿大共产党给予了苏共很多支持，追随着斯大林的每一个政治战略。 372

斯大林当然不信任西方的民主主义，而且害怕他们的财富和独创性，他着手发现他们的内容，利用理想主义的科学家撬开“资本家”的秘密，并没有用太长时间便参透了原子的秘密。秘密有一部分是幻想出来的，因为从莫斯科到蒙特利尔，再到马德拉斯，原子物理科学

广为人知。技术无可否认地更难且更昂贵，而一旦斯大林了解原子武器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他便在已经遭到毁坏的苏联投入了每一点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工作。

斯大林的一些信息来自加拿大。在渥太华的苏联大使馆中，有两个间谍网，专门寻找原子弹的秘密。他们发现了一些，便按时呈报给莫斯科。但是他们的隐蔽被来自大使馆的一名叛逃者伊戈尔·古曾柯（Igor Gouzenko）破坏。他在1945年9月将所有事情告诉了惊愕的加拿大政府。对此类行为，麦肯齐·金采用了史无前例的做法，即认真考虑再次利用古曾柯，最终他与资格较老的盟友共同承担——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两人分别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继任者。

这便是后来称之为冷战（Cold War）的开始，即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势力间长达45年的对峙。至于加拿大会在冷战中站在什么位置，在任何人的脑海中都没有任何疑问，甚至是斯大林。加拿大的社会是西方、资本家和自由的。它相对开放，用现代俄语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这是一个很轻蔑的俄语用词。而苏联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从定义上说，是共产党为“人民”说话。共产主义承诺进步和繁荣、启蒙和平等，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它吸引了很多除苏联外的支持者，甚至在进步和繁荣已经存在的北美和西欧国家亦然。关键是共产党员并不否认暴力和革命。他们认识到，在正适用的启蒙时期想要颠覆一个社会必须要威压，而且作为真正最好的对资产阶级政治解决方法的威压观点，在西方，甚至在加拿大都能找到追随者。在动荡的战后几年中，经济萧条的记忆在人们的脑海中还很清晰，还有很多被共产主义残忍的直率和理想主义吸引的西欧人。

373

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威胁，那么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站出来与其为敌——美国。战争衰竭了西欧的经济和社会。英国人牺牲了很多国家的珍宝，而且为了继续进行战争，他们承诺当战争结束时，放弃最发达的部分——印度半岛。事实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英国均无法再承担一个帝国，而且在1947—1948年，他们匆忙地放弃了印

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和巴勒斯坦。无论是否准备妥当，大不列颠帝国正走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而英国人正集中精力重建自己的社会——正如发生在民主社会工党的模式中那样，它是加拿大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即同加拿大平民合作联盟关系密切的兄弟党派。

大体上说，美国政府和政客们起初对他们应该做什么还不确定。1947 年，大不列颠仅仅是称谓上的强大力量这一事实变得明朗之后，杜鲁门总统马上鼓起勇气，带领他的国家成为了被称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度。加拿大政府几乎没有劝他不要这样，虽然美国的外交家 374 知道加拿大的立场。1948 年 11 月前由麦肯齐·金，此后是路易·圣劳伦特领导的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接受并支持美国的领导。如果存在忧虑的话，便是美国人可能感到厌倦或变得没有耐心——更具体一些，在利益和体制得到平衡时，政府的美国体制可能会因为过于复杂或过于缓慢而不能允许杜鲁门和他的后继者提供明智且及时的领导。

一些加拿大人，如后来成为高级且很有影响力的外交家的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痛惜大英帝国的衰落。对英国来说，现在的加拿大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衰落的大不列颠需要且有赖于加拿大的支持。援助即将到来——1946 年时 12.5 亿加元的贷款（相当于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的 1/10），确保廉价谷物进入英国的小麦合同，合作、理解和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英国人将帝国调整成为更为莫名其妙的英联邦后所需的支持。当爱尔兰最终于 1948 年与英国君王和联邦切断本质上联系的时候，它并没有从加拿大得到同情；加拿大紧紧盯着大不列颠，并紧紧盯着共享的体制诸如君主政体。麦肯齐·金的最后一次海外之旅是去大不列颠参加伊利莎白公主的婚礼，这并非偶然。是年初，当审视与大英帝国的旧账时，他决定中断与美国关税联盟的项目。从真正意义上说，一位英国臣民之王诞生了。1950 年 7 月，他作为一位英国臣民死于短暂的退休生涯后。

金不太重视他于 1945 年帮助催生的新国际体制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他对其前身，国际联盟有着相似的低评价，而且随着他逐渐变老——1945 年，他赢得最后一次普选的时候已 70 高龄——他的一

些下属想知道他是否混淆了两者。“联合国组织”（UNO，其中“O”代表“组织”）——当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这样叫，在西方大国和苏联之间的纷争下迅速瘫痪。所有强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 375 国）均有否决权，而且否决，甚至是对否决的威胁也足以令联合国的行动停滞。金意识到了，将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各国外交部长聚在一起的不太正式的外长会议（CFM）到 1947 年也瘫痪了。

美国人认识到，欧洲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可能便与苏联合作，如果有必要就不与其合作。德国已被完全打败、征服和占领，但是占领军并非仅在此固守，还要消费食物和福利。他们在等待更为长久的东西，即从经济和政治上为德国的自我支持提供帮助。而且德国的问题与能够被感知且发生在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在西欧，共产党在政治上很强大，而且当产生了共产党，也只有共产党是欧洲未来关键的印象时，它倾向于通过瓦解当地经济对其产生影响。

美国以 18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的形式作出回应。该计划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名字命名。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重建计划，从字面意义上说是重建破碎的经济。当事实上将实际拨款转向欧洲人自己的时候，它所做的事情就是解决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西欧的美元短缺问题，这些欧洲人不得不设计并证明消费美国资金计划的合理性。加拿大被卷入马歇尔计划，并非作为捐赠者，而是作为由欧洲人用美元购买的产品的供应商。加拿大自己也存在美元短缺问题，迫使政府在 1947 年秋对进口实施紧急限制，启用了曾被金于 1948 年初废止的加美贸易对话。

金主持了北美与西欧国家间长期协商且正式联盟的最初几步。与美国间非正式的联盟业已存在，以 1938 年罗斯福和金协助与支持的互惠且公开的承诺为基础，而且很多联合委员会和合作关系使其表现出 376 来。虽然金认为自己是亲美的，认为由于在选民之中的声誉自己将承受政治上的痛苦，但他不想看到加拿大被美国吞并或与美国人联系得过于密切而没有独立或自主外交的余地。当英国人与西欧之间的协商

在 1948 年春开始时，金希望一个新的联盟可以解决加拿大的经济或贸易问题并确保政治和军事上的稳定。他将它们认为是相同应急措施的一部分，因为没有经济的稳定，加拿大也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希望。

金看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的协商，但并未看到其执行。年迈且疲惫的他知道该是继续向前的时候了。在 1948 年 8 月的自由党会议上，他在幕后操控，令路易·圣劳伦特作为他的继任人赢得了选举。

圣劳伦特保留了大部分阁员。金已经将莱斯特·B. 皮尔逊纳入并使其成为外交部长。皮尔逊被称为“麦克”，有着愉快的微笑和标志性的领结。他经常变换旧式主题的礼帽和条纹裤，都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所特有的。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在伦敦和日内瓦服役。在那里，他看到了集体安全的直接失败。虽然犹豫，他仍逐渐相信那时的公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相信加拿大对整体和平的维持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祖国一定要在外交事务中发挥积极且干涉的作用。

1949 年愚人节，皮尔逊于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 NATO），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演奏了流行歌曲的选集，其中包括歌曲《我几乎一无所获》。北约，正如它最初被了解的那样，是各成员国承诺共同御敌的政治、军事组织。威慑，而非战斗是北约的目的，而且它的创始人认为，动员不是必要的。

事情进展得与北约的创始人设想得不符。1949 年 9 月，苏联试验了一颗核弹，打破了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10 月，在毛泽东（Mao Zedong）的带领下，中国宣布成立共产主义的“人民共和国”。1950 年 1 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联盟。此后，北朝鲜（North Korea）进攻反共的南朝鲜（它们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的占领区）。斯大林和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会有所回应，而且共产党的胜利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377

1950 年春在华盛顿，包括加拿大大使休姆·朗（Hume Wrong）在内的观察家不会不赞同。像加拿大一样，美国在战争结束时遣散了

军队。美国的武装力量被削减得非常没有效率——就像加拿大的军队一样。但是，在没有杜鲁门总统的情况下外界普遍认为，美国不会做任何深思熟虑，但当北朝鲜的进攻在 6 月 26 日发生时，杜鲁门反抗了。他派出了飞机和船只，与地面部队一起来到北朝鲜。他还做了更多的事情，来到联合国，谴责北朝鲜的入侵。杜鲁门利用类比进行推理：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挑衅时，被西方民主主义的绥靖所鼓舞。因此，在斯大林外交蠢行的帮助下——斯大林正在抵制联合国，因而苏联的否决无效——美国确保了联合国授权击退北朝鲜。

加拿大政府很惊讶，但却欢欣鼓舞。即使在通常情况下它不起作用，但终究这是联合国的意义所在。理论上，联合国为诸如加拿大这样势力较小的国家提供了可以发言和施加其所具有的影响力的平台。然而，事实是美国人是进驻朝鲜人数最多的贡献者，南朝鲜随后而来，但支持和供给完全仰赖美国。其他国家仅仅贡献了一小部分军队，正如事情所呈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参与程度就是其影响力的晴雨表。

在加拿大，参与朝鲜战争（Korean War）的外交和政治间存在着适度的分歧。在政治上，加拿大公众希望加拿大做出回应。内阁犹豫 378 了。它的很多成员回想起了“二战”时的征兵危机和发生在“一战”时的事情。但这是反对入侵的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反对共产主义。在魁北克的公众生活中起支配地位的罗马天主教会强烈压制共产主义者，并且魁北克的总理杜普莱西斯是一位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者，当加拿大政府派出军队与共同的敌人作战的时候，他几乎没怎么抱怨。1950 年 8 月，当圣劳伦特号召志愿者到朝鲜参战时，有很多人愿意参加，但在魁北克，这些人却被批评为素质不高且傻里傻气。加拿大派出了飞机、船只和军队进入朝鲜。最终 10 600 人在那里参战，403 人阵亡。① 但这并不是完整，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对战争的回应。

朝鲜战争是意料之外的，颠覆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加

① 相比较而言，美国有 480 000 人在朝鲜服役。

拿大政府视斯大林和他的政权是一个非常糟糕但却没有直接威胁的事物。加拿大外交家认为，斯大林的目标是苏联共产党专制的保留，并且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社会及随之产生的2 000万人死亡的损失。如果事情并不是这样，而且朝鲜战争被认为不是，于是反对苏联对其他地方的入侵变得必要了。朝鲜只是一段短暂的表演，贫穷、落后、孤立，而且危险。如果美国人允许他们自己被卷入其间，或由于战争的过程变得过度恐慌。[①] 欧洲是东西对抗的战利品，而且它也是西方的努力应该集中的地方。

从1950年夏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动员。军力不仅增至两倍，引进了新装备，而且还有用来改良装备的50亿预算。在与美国的合作中，雷达线沿加拿大北部构筑起来，以提防苏联轰炸机的入侵。得到加强的军队作为未来加拿大海外军队的核心被派往欧洲。20世纪50年代，空军师是北约在欧洲部队编制中的重要部分。海军被巩固了，包括一架航空母舰和护航船只。所有的这些需要很多钱，这意味着加拿大的预算也军事化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进入60年代的时候，国防成为了主要的预算项目。

379

外交事务是一种持久的危机，而且波及国内。在国内，公众舆论方面的后果足够清晰。自从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加拿大的反共产主义被批准，甚至被体制化了。共产党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他们被怀疑成苏联潜伏的特工。没有必要担心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加拿大共产党从未被始终列为非法，虽然它一直在监视之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转向求助共产主义的危险，而且确实，共产主义的政治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持续下降。对共产主义的抵制，特别体现在北约中，证明长期地被人接受。

北约与其创立者的初衷很不相同。它被军事化，总部设在巴黎，在一位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它计划着西欧对苏维埃进攻的抵御。苏维

① 1950年秋，看似打着联合国（美国）旗号的军队就要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的时刻，杜鲁门说出了轻率的言辞，听上去他会使用核武器。那不是他的本意，但却在加拿大造成了紧张的担忧。

埃并没有进行进攻，而且今天有些许怀疑它是否曾成为现实。虽然在未来的10年中——尤其是1961年当苏维埃可能继续成为位于柏林且占领西方的孤立力量时，还有顾虑，甚至是恐慌的时候，苏维埃在欧洲的危险减退了。但是随着在欧洲势力的减退，它看上去在其他地方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在亚洲。这证明是不同类型的挣扎，而且激起了加拿大不同的反应。

加拿大与帝国的结束

英国势力的衰落改变了加拿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且最终对加拿大自己的体制和政治平衡产生影响。加拿大通常是某帝国的一部分——法国、英国或罗马天主教，而且加拿大人的身份与其帝国的关系密切，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

起初，还有对“英联邦国家”代替大英帝国的乐观主义。有一位新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经济上，英国开始从战争中恢复；而且一些英国政治中旧时且可信的人物，特别是受到敬仰的温斯顿·丘吉尔仍然活跃在政坛。1950年在科伦坡产生了科伦坡计划。加拿大通过该计划第一次参与了发展援助。从早期开始，加拿大将影响新独立的英联邦独立国家确定为真正重要的事，特别是印度。仅从人口的立足点来看，不将新独立的国家[1]看作世界平衡的重要因素是很难的。不仅如此，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帮助他们且确保其利益，共产主义者会代劳。

一些加拿大外交家意识到老牌西方势力，如不列颠、法国和美国普遍不受欢迎或至少不被独立的亚洲诸国信任。正如其中一国在1947年8月的备忘录中写到的，“在与苏联的交战中，西方势力可能会面对主要是殖民地和有色人种的人群对其持有敌意且不友好……独立拖得

380

① 这些国家将很快被叫做“第三世界”，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被创造出的。通过引申其含义，西方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被称为“第一世界”，共产主义集团被称为“第二世界”。其最初的意义是指大革命前法国的3种社会身份。

越久，在苏维埃的影响或控制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胜利的机会就越大。”① 加拿大应该尽其所能催促帝国的结束，而且清理帝国留下的残局。加拿大人逐渐成长起来，其间的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过渡被英联邦的诞生减缓了。

英联邦的创立部分基于其成员共享着一个共同且有价值的英国遗产的托辞，而且事实上，组织内部的那些前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敌意千差万别且通常相悖。每隔几年，英联邦领导人在会议中聚首。这一事实并没有完全令当时的领导人生气，但是西方的观点不会在亚洲出现，却存在一些浪漫色彩。

这说明，加拿大的一些阶层认为，殖民地的统治特别是用于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本质上是不公平的。② 加拿大总理路易·圣劳伦特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不与别人交流此事。③ 圣劳伦特将反对帝国主义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对于他来说，这是很大程度上将一定数量的加拿大援助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真正理由，虽然起初只是提供给英联邦中的不发达国家。

381

英国正在解决自己的帝国问题，亲英派加拿大公众的观点也给了他们些许信任。加拿大公众更愿意相信如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正在发展着，如同加拿大以前所进行的那样——或是加拿大已经进行的那样——所以加拿大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印度之间存在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个词来自当时的新闻用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一个类似英国遗产的民主政体，印度持有与加拿大相同的“国际标准”，而且在这个想法下，存在着后来成为在加拿大外交中倾向于人权的明

---

① 埃斯科特·里德（Escott Reid）在 1947 年 8 月 30 日的备忘录，转引自 Escott Reid, *Radical Mandarin: The Memoirs of Escott Reid*（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270－271 页。

② H. S.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One Man's Political History*（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172－173.

③ 1956 年 11 月，他的真正观点在对众议院关于“欧洲的超人”的轻率言论中不慎说出。正如对其言论的回应所表现的，很多加拿大人对“超人”一词感到很受用。

显趋势的核心。[①]

20 世纪 50 年代，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对苏联紧迫危险的抵抗。虽然在共产主义方面，加拿大的态度包括对遭受着苏维埃霸权和共产党独裁的人权的强烈亲和力，因此，加拿大人强烈支持北约和美国联盟，而且抵制可能破坏西方团结的情况。皮尔逊和圣劳伦特坚决捍卫美国对持怀疑态度的中立者印度人的良好愿望，甚至当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度的邻居巴基斯坦（Pakistan）进行武装时——为了抵抗共产主义。[②]

加拿大与西方联盟间的团结依然继续，甚至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后与苏维埃的关系变得缓和及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亦然。由于有有能力的外交部门支持，皮尔逊和圣劳伦特仍然在处理冷战的方法中保持传统。但对于皮尔逊来说，在苏维埃政治中“现在冷战”意味着“永远冷战”，这一点并不清晰。

382 圣劳伦特和皮尔逊的外交典范出现在 1956 年秋，正是两个危机同时发生的时候。其中更重大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的是围绕苏伊士运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英法与埃及之间的争执。其次是 11 月苏联入侵其卫星国匈牙利，试图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叛乱。

苏伊士运河 75 年来一直是帝国财产，属于英法投资者且是连接英国和亚洲的水陆交通要冲，英军驻守于此。然而，运河曾经是属于埃及（Egypt）的，并穿过埃及人民居住的领土。这就使英国必须在此驻军，以打击当地游击队，保卫运河和自己的利益。然而，在 1956 年，驻军被撤走——因为其他地方也需要驻军，而且费用也很高——贾迈

---

① 正如马修·康诺利（Matthew Connolly）在 *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 - Cold War Er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278 - 279 页中指出的，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观念”又一次开始“胜过国际主权”，而且如果一个殖民地的力量不能不依靠暴虐保持自己的统治，那么它对整个殖民地地区的控制就失去了合法性。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被人们熟知的观点——19 世纪 60 年代时被意大利采用；80 年代被巴尔干半岛采用，当然，bn 被爱尔兰采用。

② Greg Donaghy,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in the World, Escott Reid in India, 1953 - 1957,” in Greg Donaghy and Stephane Roussel, eds., *Escott Reid: Diplomat and Scholar*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71 - 72.

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政府接管了运河的保卫，并保证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就让英国返回。

1956年7月，英美拒绝为一个重大发展项目提供资金，纳赛尔遂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保证让投资者们受益，否则会继续维持运河的现状。英国与法国，特别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把运河国有化视为对帝国势力到目前为止在中东地区不容置疑的霸权地位的一个挑战。艾登跟法国决定入侵埃及并夺回运河。对艾登来说，这是能够证明英国仍是一个强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拒绝听取任何人的反对意见。

加拿大政府认为是英国离开且不干涉埃及的时候了，美国总统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对英国再次主张帝国的公正性和实用性表示怀疑。英国入侵埃及严重破坏了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对此加拿大非常敏感。“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成为第三世界颇有影响力的词。艾登似乎下决心要证明这些描述是真实的现象。法国还开始担心英法和英美间的争执会扰乱大西洋联盟，也有可能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于加拿大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

383

直到艾登入侵埃及的那一刻，他一直以欺瞒的方式回应与北美盟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他的计划里还存在一个秘密盟友以色列（Israel），它在英法军队计划登陆埃及几天前就已经入侵了。英法侵略军一登陆，就开始出现问题，并不是出现在战争上，而是外交环境方面的问题。美国声称不参与此事，但事实是，他们拒绝向英法支援石油和资金。由于阿拉伯世界对埃及深感同情从而切断了石油供应，英法就需要能够代替中东供给的石油，而且也需要资金支撑由于世界市场严重跌价受到威胁的英镑与法郎。英国和法国没有资源来拯救自己，从那时起他们的冒险就注定以失败告终。

现在，以印度为首的第三世界处于中心地位。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纳赛尔有密切关系，第三世界向联合国提出对英国和法国进行谴责。这对西方大国来说是巨大的宣传失败。这时候苏联正主张其在东欧的支配地位不是依赖于盟国的准许，而是靠自己的

军事力量。苏联残忍地向匈牙利出兵。英国和法国入侵埃及的时候，西方外交官员为这一恶行从第三世界赢得支持是不可能的。驻印度的加拿大高级专员埃斯科特·里德（Escott Reid）完全失望了，但他并没有感到惊讶。皮尔逊部长已经判断出和印度及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抗议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得不到支持是因为其利益完全不一样。[①]

384 另一方面，在联合国，皮尔逊对于美国和印度这一对不可能实现联盟的国家表现得很有技巧。他创建了一个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来掩盖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失败，部队起初隔开了苏伊士运河周围的战斗人员，接着代替了撤出埃及的英军、法军和以色列军队。加拿大也为这一部队做出了贡献，他们将其命名为联合国紧急部队（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起初由一位加拿大将军指挥。对于皮尔逊来说，这是一次外交胜利。这些成就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了皮尔逊非同寻常的外交技能，他很容易就拼凑出一个联盟和一个解决方案。之前的重大战争他也有可能全部成功解决，但这次联合国和西方联盟，还有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

1956年11月，苏联攻击匈牙利一事也对加拿大产生了影响。联邦政府允许匈牙利难民大量涌入。这些难民正逃避苏联的入侵以及苏联扶植的傀儡政府在布达佩斯的报复行为。同时，加拿大共产党处于极端衰弱的状态。对苏联的完全服从让共产党变得空前衰弱，共产主义者发现苏联入侵匈牙利，逐渐削弱了他们得到的权威，并众所周知，广为流传。匈牙利共产党失去了很多最有前途的党员，后来有些人还利用资本主义给予的机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如果持不同政见者向左下沉，那么右面就会上升。进步保守党几十年来一直向执政的自由党发动着毫无意义的政治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从1935年到1953年，保守党创纪录地输掉了连续5次选举。但1956年秋，多亏苏伊士运河、圣劳伦特和皮尔逊，保守党的

① Greg Donaghy, *Escott Reid*, 78 - 80.

精神才得以恢复。由于保守党演说家谴责皮尔逊背叛了英国，加拿大再次出现了帝国精神。1956 年，加拿大站在英国这边。正如 1939 年，385 他们争论是否要抵抗希特勒，还是要抵抗被称为“尼罗河上的希特勒”的纳赛尔。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中不存在），而且保守党发言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为争论带来影响的确切标志。结果，加拿大人民无法确定加拿大站在哪一边或应该站在哪里，政府现在在外交政策上的薄弱意志也体现在另一个领域——能源，更确切地说是能源的安全供应。

能源政策

热能和光能应该与加拿大政治的核心密切相连。加拿大可以判断热能是沿着居民区增加的，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用木材加热是不切实际的。19 世纪的加拿大先后在新斯科舍和阿尔伯达采煤，或者从宾夕法尼亚进口。煤矿和蒸汽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铁路的扩展。由于廉价的城市运输和郊区的扩展，电力使城市成长并发展。电也推动工厂发展，使大量城市劳动力得以就职。加拿大人相信电是国家大河和大瀑布的产物，而且大部分是这样的。但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还是缺乏能够满足需求的水力。加拿大一般用煤烧锅炉来发电，或者把煤转化成人造煤气。20 世纪上半叶，加拿大的城市遭到煤和工业垃圾的污染，但之前也一直是这样的。污染是生活的写实而且是进步和繁荣的条件。

在“一战”期间，电力和燃料不得不被限制使用。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省政府开始担心对家庭与工业的电力供应问题了。例如，乐观的安大略政府与魁北克签订合同购买电力来为工业提供动力，而这时经济大萧条正在逼近。悲观的安大略政府则主张至少要发展一个工业产业，他们花费数千加元的法律费用来逃避合同，只是“二 386 战”把电力需求推到新的高度，再次表达了对电的需求。战后，当安大略政府拼命想要使电的供求平衡时，它不得不解决掉电问题。安大略政府认为，需要免去省公用事业安大略电力主管人的职位，作为掉

电事件的替罪羊。这似乎对电力供应产生了极小的影响，但增加了省内热力发电的可能。加拿大开始逐渐建立热电发电站——1957 年能产出 260 万千瓦的热电，1967 年则增至 930 万千瓦。[①]

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商贸部长 C. D. 豪[②]同时负责了加拿大军工生产及其电力供应。豪失望地发现，加拿大远远跟不上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并且还要依赖通过缅因输送到蒙特利尔市场的委内瑞拉石油。美国是个好邻居、可靠的供应商，可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燃料和电力供应就不是国际能源市场的问题，而是美国政府的问题。豪希望在加拿大找到能源，但在地理上和地质上都存在问题。地理位置是水力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也未能被充分开发的原因，它既遥远又昂贵。而地质上则只留下两个油田，一个在埃德蒙顿附近，另一个在安大略西南地区。[③] 然而，还会有更多的石油在阿尔伯达，但没人能找到。

直到 1947 年，在埃德蒙顿南部的勒杜克（Leduc）开发了一个喷油井。豪和阿尔伯达省政府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至少看到了一个大草原的贫穷地方转化为与德克萨斯匹敌的加拿大省份。一旦石油和天然气进入市场，加拿大会拥有一个安全的能源供应，而且由于加拿大资源的有效供应减少了对美国石油的购买，国际收支差额也必定提高。

豪在使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进入中部省份的加拿大国内大市场这一领域中居领先地位。他鼓励建设输油管，部分贯穿北美，然后被岔开来服务美国中西部市场。

387

主要项目是指到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天然气管道。这一横贯加拿大的管线（Trans - Canada Pipelines）项目要投入时间、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资金。它也耗费很多政府的政治资本。1956 年夏，为建设部分管道从国会众议院接受了补贴。豪无视反对党的异议，认为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价值（基本上是如此）。因此，这一围绕管道的争论让

①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Q82. 到 1976 年，发电量达到 2330 万千瓦。

② 豪（Howe）生于美国，不过他愿意偶尔地提醒自己的内阁同僚们自己选择了做加拿大人。他指出，他们中没有谁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③ 安大略的卓尔不群之处在于，它确实拥有北美的第一口油井。

政府在政治上受到了一个重创。很多抱怨集中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投资和美国的输油管所有权的担心。反对派争辨说，豪把加拿大遗产让给美国，而且不能忘记这位权倾朝野的部长本身生在美国。作为回应，豪保证美国对输油管的投资是暂时性的，只是为这一项目确保来自纽约的资金。按豪承诺的那样，输油管在两年内完工且大部分属于加拿大。

豪也鼓励了另一种能源。“一战”期间，加拿大拥有一个世界上少有的铀矿，还拥有在同盟国中最被认可的铀精炼厂。加拿大从而也加入到制造原子弹的竞争中，在此过程中也建立了实用的核科研机构。该机构首次在美国境外建立了核反应堆。

1947年，位于安大略省乔克河畔的联邦原子研究机构开发出了叫做核反应堆实验术的更好的模型。[①] 加拿大发展了自己的重水和天然铀反应堆生产线，且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为了电力生产扩大了这条生产线。豪和他的顾问希望被称为加拿大加压重水反应堆（CANDU）的模型服务于国内和出口贸易。他们的希望到头来还是破灭了，虽然开始时并非如此。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扩展最大的省电力公用事业，即安大略电力，反应堆成为了焦点。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反应堆，新不伦瑞克为了自己的电力需求，也建立了一个反应堆。70年代，出口市场仍然受限，尽管有销售，但杯水车薪。基于前10年的运作，加压重水反应堆的设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其费用也令人咋舌。 388

加拿大的铀销售在原子能项目中是最有利可图的。由于在西北地区大熊湖沿岸采矿的规模减小，50年代，此行业成为了全世界第二大生产者，并在80年代以来终于成为了最大的生产者。60年代，几乎所有加拿大产品均卖给美国和英国，并适用于他们的核武器项目。然而，最后美国发展了自己的铀开采产业，使加拿大对美国的销售在60

① 由英国工程师设计的核反应实验术，在制造发射性同位素时是例外。这成为加拿大的一个专长。

年代后期停止。此后二三十年，加拿大为采铀业努力奋斗，到 90 年代，终于支配了世界市场。

加拿大的能源政策是不能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需求的。如圣劳伦斯地区的水力发电，两个国家进行了密切合作。然而在与美国有利益冲突的石油产业、原子反应堆和铀产业，急切希望封闭国内市场方面，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石油出口在合作与排斥这两个极端中进行，因为美国的行政部门寻找其政治需求与策略优势的平衡，政治需求在产油州收获多数选票和竞选资金，而策略优势是指保护美国国内石油供应及其安全。通常前者是成功的，尽管加拿大在国外石油供应商中一度处于优先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激怒了竞争对手委内瑞拉（Venezuela）。委内瑞拉抱怨，他们的态度曾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这一石油生产商协会的形成做出贡献。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佩克并不重要，但它的作用很快便会揭晓。

民族主义与反美主义

389 在某种程度上，反美主义贯穿于整部加拿大历史。奥斯卡·王尔德曾嘲讽到，美国和英国是被一种共有语言分开的，这可以扩展和应用于加拿大－美国的经验——地理、历史、政治、宗教和使两国分分合合的经济。（长期存在的法裔美国人社区仍保持着它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与巨大的语言差异同时发生的。）

尽管加拿大和美国共同经历了战争和联盟，并且加拿大人民普遍对美国的政策与领导人（特别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执政后期）持积极观点，麦肯齐·金仍于 1948 年收回了同美国建立关税同盟的想法。他考虑到，加拿大舆论（或大多数人）有可能对此存在消极反应。这种情绪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且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一位美国外交官离开加拿大（同时离开外交部门）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

章中，他谴责了加拿大人的反美主义。[①] 无疑，读者们很震惊，但在他评论的核心存在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

困难之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民族冲突。美国大使馆开始在给华盛顿的报告里插入了名为“加拿大民族主义”的一栏。然而，加拿大外交官抱怨（或根据判断谴责）美国的固执和对加拿大利益的漠不关心。一位美国大使表示，加拿大的反美主义是因为加拿大人对其实际上身为二流美国人感到恐惧。

然而，在处理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的职业外交官之间是存在互相信任的。这种信任会在下一次的加拿大政治事变中被动摇。

迪芬贝克现象

1957 年 6 月 10 日，路易·圣劳伦特与他的自由党政府在大选中以少数差距被击败。圣劳伦特可以像麦肯齐·金那样做，等国会集合后，看看两个少数党平民合作联盟和社会信用党可不可以一同给政府投票以使之幸存。但是他辞职了，把机会拱手让给了由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领导的进步保守党。 390

迪芬贝克是一位新的党派领袖，但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国会议员和党员。他是来自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位杰出的成功律师，从 1940 年开始就是国会众议院议员。他曾 3 次成为党魁候选人，在 1956 年，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终于取得了成功。迪芬贝克是一个反应强烈的人。他的一些党内成员并不喜欢这个领导人。他对真是或想象出来的怠慢记仇，其实他们是正确的。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演说家，迪芬贝克在国会演说或竞选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且准备得天衣无缝，他是名副其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保守党在经历了 21 年的竞选失败之后是需要动力的，而迪芬贝克正是这一动力。

迪芬贝克当然是一个西部人。这在选举中成为一个优势，但真正的优势是他不是来自加拿大的大都市。实际上，这成为了比他是个西

① 加拿大的反应堆计划见拙著 *Nucleu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

部人更大的优势，成为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在政治上，至少在政策策略方面把进步保守党，特别是迪芬贝克与自由党分开的因素。迪芬贝克心目中的英雄是麦肯齐·金。20 世纪 40 年代，他向反对党的麦肯齐学习。金从容地接受有争议的问题，迪芬贝克也效法他。两者在社会层面上存在不同点，保守党传统上是从操英语者、新教徒和高收入群体获取力量的。

虽然大城市很少认同迪芬贝克，但还是把票投给他和他的党，特别是在 1958 年 3 月被他称作临时选举的时候。在那次选举中，自由党有了一个新的领袖，他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斯特·皮尔逊。他在 1 月取代了圣劳伦特。诺贝尔奖并没有给皮尔逊带来好处。绝大多数选民采纳了保守党的口号“跟随约翰”，后者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在众议院 265 票中赢得了 208 票。在全国，加拿大人民为迪芬贝克投票，包括在魁北克，前保守党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和他的组织也在背后支持保守党来击溃自由党。支持者们亲切地称之为“迪芬酋长”之年。

391

然而，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实际上，迪芬贝克政府没有提出不同于自由党的政策。他只处理一些过时的问题，如规模小且没有效益的农田问题，鼓励农民们放弃不能养活他们的田地。他增加养老金，调整能源政策，保证安大略省的阿尔伯达石油市场价格比世界价格稍微高一些。圣劳伦斯海道（St. Lawrence Seaway）竣工了，政府也促进核能，这些都是豪的项目。还有另一个豪的项目，就是加拿大制造箭式歼击机（Avro Arrow）项目，但是他失败了。然而豪没有谴责他。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并不是所有的自由党想法都是好的。几年后，一位迪芬贝克政府的官员沮丧地表示，保守党意识到渥太华的公共服务使自由党表现得很好，现在自由党有机会了。[①] 保守党惊讶地发现，对于自由党来说，迪芬贝克仅是同僚，再没有其他的用处了。

---

① 他的经历几乎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事实上，很多年过后，被美国前驻渥太华大使馆官员大卫·T. 琼斯（David T. Jones）效仿。这位官员在提醒加拿大其自身缺点上成为著名的专家，相关言论登载于加拿大期刊《政策选择》（*Policy Options*）的文章中。

这一事实被很多因素掩盖。迪芬贝克比圣劳伦特更希望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领导人，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名声和信誉。名声——受欢迎的那种——则成为了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需要考虑为其牺牲。迪芬贝克依赖媒体，媒体也依赖迪芬贝克。不像圣劳伦特，迪芬贝克的个人缺点成为了当代传奇 392 的要素。迪芬贝克正确解决了阿夫罗箭式歼击机项目，然而他得到的是恶言及坏名声，更不用说政治破坏了，这使他对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犹豫不决。由于政府部长们没完没了地争论他们的措施产生的政治结果，内阁会议成为拖延盛会。迪芬贝克在内阁里是一个无能的管理人，淘汰长期存在的敌人不应该持续这么长时间。一些敏锐的保守党分析人士主张，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且在政治环境中成了反常的习惯和态度。[1] 他们只顾着满足自己的需求，忽略了反对派。

倘使反对派像平时那样，没有方向性也没有能力的话，这本来是无关紧要的。皮尔逊本身不是一个天生的管理者，他的个人判断也未必总是正确的，但他的领导有幸得到同僚们的尊重，他们恪守古训“如果我们不共赴战场，那么我们将分赴刑场”。自由党整合他们的政治平台，让自己跟上最新的自由潮流，并且从美国自由主义的复苏中受益。1960 年，在总统选举中，年轻大方的民主党人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获胜，这就充分显示出这一点。进步人士被要求阅读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作品。在 1960 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自由党逐渐获得支持且得以保持稳定，这对它是极大的激励。

1960 年，如果 63 岁的皮尔逊提出的新想法和革新被认可，迪芬贝克就不能得到那么多选票。那时候的加拿大是古老的——不一定是不自由的加拿大，但是错过了适应新现实的时机。迪芬贝克看起来非常过时，甚至充满田园风格，是在现代的、明亮的世界里的乡巴佬。

---

① George Perlin, *The Tory Syndrome*: *Leadership Politics in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其实这样说是不太合适的，迪芬贝克不是一个乡巴佬，但他的习惯与观点确实与当时的人口、风格、文化和与日俱增的活力格格不入。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文化与社会

393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是青少年（teenagers）时期。当然，之前也有青少年，但直到 50 年代才由完美的数量、休闲和繁荣的组合推动到流行文化的最前沿。生育高峰仍处在优先地位。儿童节目成为了一个新电视网络的主要特征——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 Corporation）和美国三大电视台，即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都穿越了边界。从表面上可以看出的变化是摇滚乐，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猫王）的吉他、鸭尾式发型和台上的骨盆回转舞就是其象征。摇滚乐（Rock ‘n’ Roll）只对青少年的口味，而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都强烈谴责它。[①]

电视、收音机、转速为 45 的便宜唱机很容易让新式音乐越过边界，但摇滚乐流入加拿大之后并未广为传播。一些人反对摇滚是因为它不道德，或因为它是美国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在 50 年代后期，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是时尚、现代且很棒的东西。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说明迪芬贝克和同时代的老一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不那么酷。很难想象迪芬贝克独舞，更不用说是模仿埃尔维斯的时尚了。[②]

迪芬贝克负责解决加拿大民族性的降低。加拿大人曾经是亲英的，实行君主政体，也很保守。这些特点在 1957 年帮助迪芬贝克获选成功，也帮助留下了迪芬贝克心目中的英雄约翰·A. 麦克唐纳执政时期的加拿大保守党的民族主义这一痕迹。

迪芬贝克还负责了两次伊丽莎白二世的访问，依次在 1957 年和 1959 年。第二次持续很长时间的访问结束时，出现了很多抱怨的声音。访问安排了很多游行和庆典。这在 1939 年乔治六世访问时效果还

---

① Owram, *Born at the Right Time*, 154 – 55.

② 自然也有加拿大歌手，如板刷头乐队（早期组合）、博比·柯图拉（Bobby Curtola）、以及和“猫王”齐名的保罗·安卡（Paul Anka）。

很好，可是在注重娱乐和皇室亲民形象的时代，和名人握握手或只用花束来装饰是不够的。也可能是人们觉得隆重的仪式只是装模作样的 394 行为，掩盖他们的无力而不暴露真实情况。1939 年，英国曾是世界强国之一；而在 1959 年与加拿大相比，就很倒霉。“二战”的记忆开始淡化；而很可能只有参加战争的加拿大老兵才愿意让这一回忆中英国的一面淡化。[1] 无论如何，还是要打冷战，而盛会和怀旧与这种紧迫感不合拍。并且，想让逐渐出现的觉醒扎根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种感悟与说法语的加拿大地区相比，在说英语的加拿大地区更容易被忽略。

矛盾的魁北克

20 世纪 50 年代，说英语的加拿大人认为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特别是生活在“中世纪”魁北克的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否认这一点是有困难的：杜普莱西斯总理表达出的观点是 1900 年的过时观点，更不用说 1950 年了。在魁北克随处可见教会有形的手耸立在城镇、农村和城市里的大教堂和尖塔上；在牧师管理的大学里；在成为城镇和郊区景点的寺院及女修道院里，比比皆是。魁北克进行普及教育既晚又很勉强，而且标准也比国内其他地区低。魁北克的老兵比别的地方少，因此能够享受老兵优惠政策的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也少。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包括说英语的蒙特利尔市民安慰自己说魁北克是落后的城市，或许永远存在明显不可改变的教会力量和保守政治的盛行。

然而，魁北克省出现了很多变化，牌照上出现了警句。一些变化是与杜普莱西斯总理新打出的一面魁北克旗帜有关，这使人们回忆起大革命前的法国旗帜，这面旗子变得很流行——这就是魁北克变化的 395 明显特征。官方民族主义是右翼的，且非常残忍，但并不表示它不为人知或对年轻一代没有产生影响。很多知识分子从杜普莱西斯的政治

---

[1] 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在 50 年代末期的时候支撑加拿大的生活；而且当然，也是他们为青少年们埋单。

实践中退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作为最好的替代品选择了加拿大。一些人确实是如此，但其他人则在等待，利用联邦机构或省自由党——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杜普莱西斯的欺凌不赞同反加拿大这一思想。

1959—1960 年，魁北克的潜在特性达到了顶点。杜普莱西斯 9 月份突然过世，他的继承人保罗·索韦（Paul Sauve）（“二战”英雄）于 1960 年 1 月 1 日逝世。1960 年接下来的继承人安东尼奥·巴雷特（Antonio Barrette），一个目光偏狭的政治家，使杜普莱西斯的国民联盟被打败。胜利的是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1945—1958）和原内阁大臣（1953—1957）让·勒萨热（Jean Lesage）。这一系列事件正好发生在自由主义复苏的时期——杜普莱西斯和迪芬贝克之后的政府出现了对改革和进步持积极态度的现象，也产生了有可能实现的感悟——它穿越了加拿大并在美国选举中肯尼迪当选一事中也被反映出来。

勒萨热支持改革，而不是革命，他的内阁成员里既有老兵也有新兵。勒萨热可以依赖于前者——因为他也是这一辈人。后者包括勒内·勒韦克这样的人。他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法语节目、加拿大电台的记者和播音员。另外还有保罗·热兰－拉茹瓦（Paul Gérin－Lajoie），他是一名著名的宪法律师。作为国家自由党领袖和总理（当然皮尔逊也是），勒萨热认为他是莱斯特·B. 皮尔逊的合理继承人和过去的内阁同僚。但勒萨热不能控制命运，皮尔逊后来试图联系魁北克和加拿大的努力徒劳无功。眼下，加拿大和魁北克是在不同轨道上，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迪芬贝克的衰落

396 迪芬贝克很不幸，他领导的是被几代人和语言分裂的加拿大。在这一分歧上，他还增加了地区不和谐和真正的外交危机。迪芬贝克几乎没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他对政府的态度是已被遗忘的时代的残渣余孽。面对说法语的魁北克人民的不满，他制造出双语这一联邦政府的空头支票——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成为了饱受争论的问题。迪芬贝克意识到在国会辩论或内阁会议中，说法语的议员们打瞌睡或表现出焦

虑，他就采取了同声传译的手段。

说英语的加拿大地区也不支持他，因为他对君主制度的奉献和把过去作为参考的方式被认为是奇怪的、不相关的。在 1962 年的大选中，迪芬贝克发现议会党团从 208 人减少到 116 人，众议院的多数票也随之减少。这时的政治非常脆弱，迪芬贝克发觉周围的很多敌人并不都是反对派。他的支持者们也斥责他失去了令人感到惬意的多数票，也责备不确定的前景是他导致的。加拿大人民已经习惯了金和勒萨热执政时动荡的政府，现在看来，迪芬贝克的未来也将在几个月内被决定。

尽管如此，还有幸存的可能，他仍持有一些资源。这包括魁北克代表团，虽然在减少，但仍然值得尊重。在魁北克，政府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保住了大部分加拿大郊区的选票，也支配了草原省份，这些地方渐渐喜欢上了他，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至少来自西部。两个在野党——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即 NDP（自从 1961 年开始是平民合作联盟的继承者）和经历了奇异的命运转向基本说法语的来自魁北克的社会信用党，但两党都不希望皮尔逊来代替脆弱的迪芬贝克。因为自由党对于他们的政治前景是一个天敌。

迪芬贝克的敌人甚至不全在加拿大。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自从 1961 年执政之后就希望从加拿大得到很多东西。他直接造访迪芬贝克，怂恿他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伙伴关系。肯尼迪提出的建议在思想上是没有错误的，但问题在于细节，这很可能包括了两国间财产和人口上的差别。虽然做决定时肯尼迪都会让迪芬贝克出席，但推测出大部分决定是由谁做出的并不难。决定越重要，磋商就越少。 397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苏联的攻击下保卫北美的时刻。在 50 年代，这种攻击都是来自载人远程轰炸机，它能在以前是无懈可击的大陆上投下原子弹。苏联飞机必须飞跃加拿大，而在这里美国设雷达线和防空组织探测和击落苏联战机。美国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必定的，他们拥有资金和技术。他们绝对可以在原子弹攻击中幸存，在迪芬贝克的援助下，美国还进行空袭警报来让平民熟悉一旦核战争爆发将是

什么样子。

警报（或叫“警钟”）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他们没能向平民提供保证，而只是让他们觉得惊慌——如何在数百万中估计死亡数字这一问题是没有被计划者们揭示的秘密。这一计划要求迪芬贝克和他的首席部长前往渥太华外围的防空洞，一个能动的混凝土架构的洞体，被戏称为“迪芬贝克地堡”。保守党的核心也开始怀疑这一明智的政策正很沉着地应对世界分化的前景。[①] 政府没有选择去打败对手，而是保持一个战略僵局，这种极大的压力对政府带来的破坏是自冷战（Cold War）开始之后第一次经历的。

398 核武器问题在1961—1962年间变的更紧迫，肯尼迪政府施压让迪芬贝克政府信守早在1954年即对北约做出的承诺——用美制核弹头装备加拿大武装部队。（这些会继续属于美国并由美国控制，而且只有在加拿大和美国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运作。）迪芬贝克购买了一个美国导弹系统——波马克远程地空导弹系统（BOMARC）[②] 来击溃苏联轰炸机，波马克远程地空导弹系统只能用核武器来操作。迪芬贝克在加拿大的国际诺言和在国内因这一问题吹起的政治风暴中间进退维谷，更糟糕的是，外交部长霍华德·格林（Howard Green）和国防部长道格拉斯·哈克尼斯（Douglas Harkness）对这一问题完全持相反态度，后者希望采用核武器，而前者则反对。

核武器问题在1962年10月到了紧要关头，这时正好出现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通过1959年的革命，古巴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共产党执政。从佛罗里达海峡至基韦斯特跨越150公里的共产主义使美国政府失望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曾尽全力推翻了古巴独裁者。1961年，肯尼迪支持一场古巴流

---

① 虽然除华盛顿外很少人知道，甚至当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知道如果发生战争，西方的战术是什么的时候，也被吓到了。Deborah Shapley, *Promise and Pow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bert McNamara*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185, 187 – 201. 麦克纳马拉最终将奋力争取对原子武器的限制，特别是在其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当时他“切身地感受到核武器的危险无法被控制或调整。”

② 首字母缩写的词代表波音密歇根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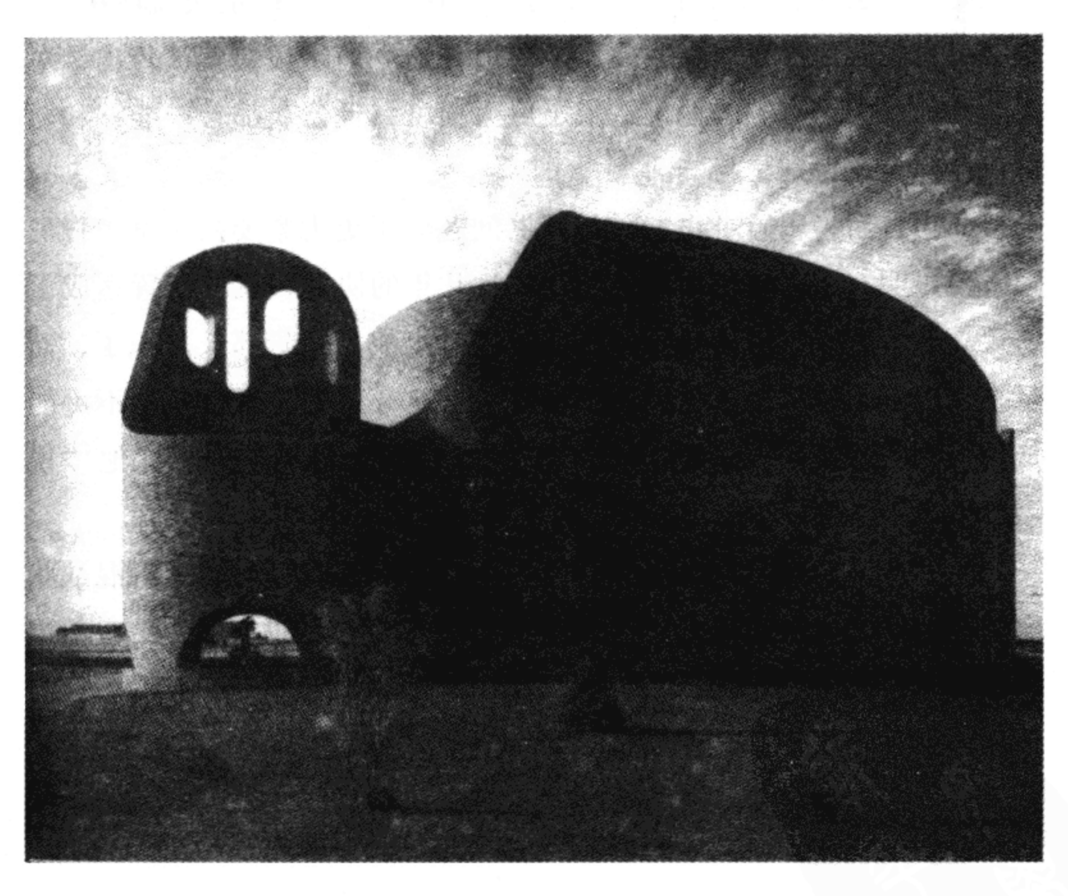
亡者进行的轻率的侵略（失败），还资助各种谋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例如用一个雪茄炸弹。卡斯特罗对此表示愤怒，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告诉他优秀共产党员应该从资本主义那里期待什么。他求助于称得上是所有共产党之母的苏联共产党，后者很乐意提供帮助。如果苏联可以在古巴布署导弹（带有核弹头的），对于美国来说，古巴就是一个桥头堡，古巴也改变了策略平衡。美国是在1962年10月中旬发射台接近竣工时发现这些的，古巴导弹危机开始了。

肯尼迪想从盟国处寻求支持。他派一位高级外交官到加拿大，向迪芬贝克简单介绍苏联在做什么，并且作为回应，他们计划做什么。399 当肯尼迪发现迪芬贝克实际上在为是否有证据提出疑问时，判断出加拿大是最不会与自己合作的主要盟国。很幸运，危机很快就解决了，迪芬贝克的犹豫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是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传出，对总理在加拿大民意中的地位造成了巨大损害，且公众都希望能够和盟国保持联合，特别是与美国。

几个月后，1963年2月，核武器问题到了更为紧要的关头。肯尼迪发表声明，斥责加拿大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协商，就核布置达成了协议。迪芬贝克政府的部长们很快开始口水战，国防部长辞职了，而且在众议院，政府提出的信任案被否决。迪芬贝克完成了一项不可能成功的事，即当仅仅一个党派的支持就足够维持政府的时候，他“说服”其他3个反对党一起投票来反对他。

1963年4月8日举行了一次选举。迪芬贝克政府内阁处于混乱状态，被击败了。自由党领袖皮尔逊甚至连收获无能的迪芬贝克的政治果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迪芬贝克发现结果难以捉摸，也难以接受。这与他天生的报复心理结合起来，加拿大政治在未来几年将会非常精彩。

第十四章　富足及不满（1960 – 1980）



圣玛丽罗马天主教堂，位于阿尔伯达的红鹿，由杰出的加拿大建筑师哈罗德·卡迪纳尔（Harold Cardinal）设计。卡迪纳尔将新旧风格结合在一起，使人想起加拿大的过去和面对焦虑且不确定时代的传统。

写到1980年加拿大的状况，3位历史学家把加拿大现代历史称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许多方面如此，然而成功是有限度的。物质上几乎毫无疑问。1960至1980年间几乎是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加拿大很富有。就购买力来说，加拿大人1985年获得的收入是1960年的两倍。[①] 从加拿大人经常使用的衡量标准，即相对于美国人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来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史上最高——是美国1981年人均收入的83%。[②] 403

还有其他衡量成功的标准，在这些方面，加拿大并不是做得很好。加拿大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繁荣作出反应，不是通过集合而是通过散开的方式。结果表明，富足的问题是没有达到充分富足——或矛盾地说，是过于富足。面对如此之多新创造的财富，用它来做什么这种急躁不断增加，导致决策人试图制定和实施他们认为容易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的挫败。

在年代、地区和语言方面，国家对与钱有关之事和钱能购买的东西进行了努力。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落后的地区要求与国家其他地区同样的机会。少数民族指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公平和歧视，并要求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而且要快。许多年轻人询问，为什么钱对美好生活如此重要，这一诘问以前或许来自教会，但在世俗化的年代则来自世俗的提倡者而不是宗教人士。不满及富足一起设定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议程。

这数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走运的。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稳定增长，事实上一直持续到1974年，之后经过短暂停顿又继续增长一直到1981年。失业率在1966年降至3.4%，之后成波状涨落，每个连续的波谷都高于前一个——在1982年达到两位数之 404

---

① 按定值美元计算，以1981年为基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6倍，从1949年的741亿美元增长到1982年的3445亿美元。Norrie and Owram,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549.

②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Purchasing Power per Capita: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KS): Compared to United States," The Public Purpose, Labor Market Reporter, www.publicpurpose.copm/lm－ppp60＋.htm.

前，1969 年是 4.4%，1974 年是 5.3%，1980 年是 7.5%。加拿大的失业率与美国持平，但明显高于西欧和日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1]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西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意味着收入和购买力越来越类似加拿大的情况。不足为奇的是，从欧洲大陆到加拿大的移民有减少的趋势，来自联合王国的移民亦然。

当你穿越这个国家时，繁荣随处可见。当前的繁荣是新奇之事，但即使是开车穿越国家也是之前贫困的几代人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多亏了 1965 年联邦出资完成的横贯加拿大公路（Trans – Canada Highway），从纽芬兰到温哥华岛的旅行才成为可能。[2] 这条公路将所有省份联接起来且很及时，因为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正在开始萎缩。1969 年之后，不再有可能乘火车穿越纽芬兰。

整个加拿大，不断增多的城市在蔓延。农田消失成为郊区或工业园，被 4 车道公路联结起来。城区不仅横向而且纵向也在增长。“摩天大楼遮蔽了天空，”一位当代诗人如此写到。[3] 照字面上看正确，但象征意义上也正确，因为混凝土办公大楼和公寓大楼远远超过曾主导加拿大的大大小小定居地的教堂尖塔。

从乡村和海外迁来的移民填满了城市。移民数量大幅波动，从 1967 年的最高纪录 223 000 人降到 1971 年的 72 000 人，之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仍保持在 100 000 人以上。1963 年以前和之后的几年，加拿大的出生率对人口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家庭结构在 1945 年后数量充足的节奏变化，学校增多，郊区也在增多。生育高峰在持续，而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没有结束的迹象。这在其自身看

405

① www. publicpurpose. copm/lm – intlunem. htm. 统计数字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可能与加拿大统计部门的数据稍有出入。

② 横贯加拿大公路在 1948 年得到官方批准，位于纽芬兰的最后区段于 1965 年完成。魁北克是一个极为不情愿的参与者，但当联邦资金支付该省新公路系统的数额明确时，魁北克加入到其中。

③ Rita Joe，“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用来作为 J. R. Miller 所作的书的书名，即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A History of Indian – White Relations in Canada*。

来是一个繁荣的迹象，人力资本的增长与钢筋混凝土的资本投入相匹配。

城市化暗示了加拿大人对自身和社会思考方式的变化，但城市几乎不是唯一影响社会如何运行的因素。加拿大社会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各代的平均年龄不断降低。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及政治方式随着几代人的改变而改变，在70年代初产生了一个在1963年想象不出的加拿大。

一些善于表达的加拿大人发现国家在整体上过于满足，过于安静，甚至过于自以为是，但在大众的想象中，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者管理的萨斯喀彻温或大城市；后一种可能被寄希望于迁移到纽约或欧洲，拥有迁移资本或激励因素离开的、不满的加拿大人通常去往那里。"我作为加拿大人是一个失败者，"其中一个人写到，"似乎是小康生活的先决条件耐心、温和、对一致性的喜爱都超出我的理解。"[①]

那些没有资本离开的人通常得不到注意，但他们存在于国家印第安人保留地体系或加拿大大城市的贫民窟或遥远的贫穷乡村的飞地。老年人或病人处于危险中——而且更糟糕的仍是老年人和病人的困境，老年人在他们65岁时便被取消健康保险，对保险公司而言成为一个更大的精算风险。国家一些地区不如其他地区繁荣——如纽芬兰、沿海省份、魁北克乡村以及大草原和安大略中部的边缘农民。在阿尔伯达，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实现了繁荣，但不足以使该省成为北方的德克萨斯或使卡尔加里成为新休斯顿。石油价格低廉，市场不稳定，且距贫困的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很近。

粗略人口统计数据抓住了地区性国家的事实——大西洋省份、魁北克、安大略、萨斯喀彻温与马尼托巴、阿尔伯达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西洋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缓慢。纽芬兰的高出生率曾经在20 406

① 见 Bruce McCall 的回忆录 *Thin Ice: Coming of Age in Canada*（Toronto: Random House of Canada, 1997），此回忆录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偏狭的安大略和多伦多的面貌。另见 Robert Fulford 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National Post*, 26, September, 2000。

世纪50年代令人口保持增长，但在60年代，增长率急剧下降，直到80年代初，几乎裹足不前。魁北克的人口增长了，但并没有与安大略保持同步。萨斯喀彻温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部分年份人口在减少，而马尼托巴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另一方面，阿尔伯达从国外及其他省份吸引移民以分享其以石油为基础的繁荣，人口从1961年的130万增至1981年的220万。[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但稳定的移民流给予这个太平洋省份一张明确的信任票。

政治思想和经济能力也发生了变化。两者相辅相承，因为繁荣孕育或至少是关乎意识形态。60年代初是一个希望和扩张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美已经成熟的工业经济达到顶点——像福特、克莱斯勒或通用汽车（“三巨头”）这样以大型工厂、庞大劳动力和永久利润为特征的公司，每个都在加拿大有分厂。加拿大在众多方面是美国资本主义一个更小的复制品——包括像组织加拿大汽车工厂劳动力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这样的“国际”工会。

经济生活似乎被基于闪闪发光的曼哈顿高塔的大公司主宰。令人印象最深的其中之一是由密斯·范·德罗厄（Mies van der Rohe）设计，于1958年建造的西格莱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以加拿大一家酒业公司的名字命名，这家酒业公司在那个时候的总部设在蒙特利尔。这既是熟悉的，又是外来的，值得羡慕而又被羡慕。

从收入角度讲，美国式资本主义使美国工人阶级正逐渐成长为中产阶级。正离开城市向郊区迁移并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的是产业工人。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加拿大。繁荣抑制了对抗和单一化的美国政治，进而是加拿大政治，而且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此。社会主义成为福利主义的一个变体，福利主义不仅是左派政治的特征，而且是大型企业的特征。后者能够支付的不仅是更高的工资，还有逐渐增多的工人福利。

---

① 1976年至1981年间，阿尔伯达的人口以21.7%这一极不寻常的速度增长。与之相比，安大略为4.4%，纽芬兰为1.8%。

407

存在一些疑问的是，是否旧的“左”和“右”的分类依然适用。美国的一位学者，之前是一位社会党人，认为社会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1] 平民合作联盟于 1956 年抛弃了作为其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之后于 1961 年将自身转变为一个更加中立的政治党派，即新民主党。新民党不要求大型企业大规模国有化；相反，他们集中精力于政府组织和社会福利的规则上——对此毋须赘言，繁荣将付出代价。

政府也享有好的声誉。政府组织了上一次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经过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 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欧洲对峙的逐渐缓解，冷战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了。政府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它处。当前政府可以对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进行改革以使高龄者和病重者充分共享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繁荣和高收入。它可以留意社会的边缘群体以及繁荣忽视了的或繁荣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对加拿大而言不是新的或独一无二的观念，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气息。美国人轻率地把加拿大人的生活等同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倾向冒犯了加拿大的一些人，也许是很多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想当然的”，其身份模糊，考虑的事情闻所未闻。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在给华盛顿的例行报告中对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有定期的文件，并对加拿大批评美国的偏好给予谨慎的关注。

20 世纪 60 年代有许多值得报道的事。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与反美主义同义，尽管前者因为不再拥有过多的“帝国”或英国色彩而不同于前几代人的观点。但反美主义是什么意思？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它几乎与对现代生活类同化的抱怨相同。哲学家乔治·格兰特（George Grant）在其 1965 年所著的《对一个民族的哀悼》[2] 中，谴责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New York: Collier, 1961）以及之后的版本。“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概念不局限在北美，也出现在欧洲。见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 Penguin, 2005），384 页。

② George Grant, *Lament for a Nation*（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5）.

408 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是加拿大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已经抛弃了美国（或美国式）企业和技术提供的闪闪发光的奖励这一遗产。[1] 其他人，如多伦多杰出的商人沃尔特·戈登（Walter Gordon）憎恨管理工作及其管理决策制定转移到加拿大境外这一事实。在戈登看来，除非加拿大也有一个商业部门，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些观念像加拿大的繁荣一样按地区和年龄分布。排斥美国投资的收益对位于繁荣、工业化的安大略的加拿大人来说无可厚非。（安大略已经拥有大量美国投资，不太可能很快撤走。）偏远地区渴望任何形式的投资，而且美国资金看起来与其他任何资金一样好。（事实上有这样的抱怨，即很难得到没有风险的加拿大资金，而且外国人的资金是唯一提供的资金。）牢记大萧条和战争的年长的加拿大人不是很倾向于排斥投资、工业化和工作。

年轻的加拿大人与年长者不同。这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代人是拥护民族主义的一代。他们的穿着不同，蓝色牛仔裤在这个年代首先变得普及。他们追求各异的音乐风格，而他们的父母，像他们的父母的父母一样通常不喜欢这些。他们称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一种"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culture），并将平常浪漫的真实性和自发性的特点，当然还有这一代的独特性归于反主流文化。"不要相信任何超过 30 岁的人"是他们的口号。[2]

婴儿潮出生的人视工作保障和繁荣的经济为理所当然之事，从未经历过其他任何事情。他们是自觉的加拿大人并很快支持皮尔逊政府于 1965 年通过的、新的加拿大国旗。然而，他们并非与年轻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或澳大利亚人在文化、观念或一般的生活方式上有那么大的不同。[3] 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在风格上是国际化，婴儿潮为 20 世纪最后 30 余年奠定了基调。

---

① Owram, *Born at the Right Time*, 207.

② Owram, *Born at the Right Time*, 207 – 208.

③ 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 *1584 to 2069* (New York: Quill, 1991), 299ff.

安全政治

莱斯特·皮尔逊去世后，因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被人们铭记，但皮 409
尔逊政府对国家安全－个人安全，意指加拿大社会安全网的扩充的条文最令人难忘。尽管作为议会的少数党，自由党在 1963 年和 1965 年当选。1963 至 1968 年间的自由党政府对加拿大的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并实施了基本改革，而且设计出一套综合、普及的医疗保健制度。因为这两个方案都不受联邦管辖，因此皮尔逊及其部长和官员不停地与各省进行谈判以得到他们的同意与合作。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常常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私有和公共养老金是加拿大政治中一个持续的刺激物。在议会两位工党议员的极力坚持下，一项联邦－省养老金方案于 1927 年实施。[①] 这一方案在 1951 年被圣劳伦特政府改革并大为扩展。尽管如此，加拿大人继续羡慕地关注边境另一侧的美国的社会保障方案，该计划提供预缴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两方面的保障。

从 19 世纪末开始，医疗保健——它的可行性、负担能力和效能——在众多西方社会成为一个问题。公共卫生——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和传染病的检疫——一直是政府，通常是省政府或市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有属于自身管辖权的责任，如军事力量和退伍军人以及移民。）词语"灾难性的疾病"在加拿大有真正含义，超过对身体或心理的影响。一些长期性的严重疾病可以削弱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尽管有私人和自愿参加的医疗保险，对大多数加拿大人而言还不够。圣劳伦特政府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在各省的支持下确实实施了一项医疗保险方案：加拿大人不再需要支付基本的医院服务（理解为病房护理）费，尽管私人健康保险继续支付像半私人或私人房间这样的"无 410
用之物"。

做一些关于养老金和卫生保健的事是平民合作联盟/新民主党的计

---

① 这两位成为后来的平民合作联盟的成员。

划，但加拿大社会党（1956年后为半社会党）从不去吸引足够的支持以形成国家政府。然而平民合作联盟确实在萨斯喀彻温拥有权力，而且1961年在省总理汤米·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的领导下实施了一项既是强制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政府健康保险方案。经过与省医疗协会及其支持者一场激烈的电视广播争论后，道格拉斯成功地将健康保险置于国家政治的议程。省可以带头，可以开创一项重要的国家创举这一事实是应该铭记的一点。这对新民主党也是一个激励，对它而言，道格拉斯现在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①]

国家自由党党纲承诺改革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两项内容。支持这一改革的政党力量强大但意见不一；然而如发生的一样，改革者掌握了权力和政策的大部分手段。作为财政部长的沃尔特·戈登和作为皮尔逊主要政策顾问的汤姆·肯特（Tom Kent）下定决心推进此事，并且他们影响了时而犹豫不决的总理。尤其因为肯特，加拿大出生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理念或许可以说被完全领会。[②]

养老金是首先被考虑的。皮尔逊提出了一个“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CPP），这一计划可转移但不是普遍性的。其原则可协商，而资金的筹措起初不容乐观。这一计划侵犯了省的管辖权，因此有赖于足够多的省给予支持。结果是，联邦提案与作为未来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基础所采用的并不完全一致。

令渥太华吃惊的是，魁北克是第一个实际应用的，有一套综合性的、切实可行的供款式养老金方案。养老金改革当然对魁北克有吸引力，但令其尤为具有吸引力的是取得投资收益的前景。养老基金将在

① 新民主党理智的结局或许在 Michael Oliver 编辑的论文集中可以找到，*Social Purpose for Canad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1）。它对同时发生的自由党的理智革新提出了挑战。

② 寻求理智的风气极为有利。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多公共讨论集中在这一观念上，即“贫困存在于大多数人中”。关于加尔布雷思的观点，见 Richard Parker，*John Kenneth Galbraith：His Politics，His Economics*（Toronto：HarperCollins，2005），282ff。另见 Penny Bryden，*Planners and Politicians：Liberal Politics and Social Policy*（Montrea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与 Tom Kent，*A Public Purpose*（Montrea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56，81，83页。

相对短的时间内聚集数亿加元，并且魁北克政府可以使用这些钱投资。养老金，更确切地说，养老金缴纳金是魁北克政府希望建立“现代”经济——自治的基石——的关键。因此为了达到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目标，联邦政府必须首先与省谈判而且是认真谈判。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最终于1964年形成，具有分担缴款性、普遍性和可转移性。但这一计划是一分为二的，一是针对魁北克的，即魁北克养老金计划（QPP）；一是针对国家其余地区。这对安大略的保守党政府而言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最终经过国家统一的呼吁之后，安大略接受了。

接下来的是医疗保健。在安大略和阿尔伯达这些更保守的省，关于政府计划是否可取以及可行的私人和自愿方案是否并不充分有很大争议。人们也没有忘记的是，萨斯喀彻温健康保险计划（即医疗保险）的通过激起一场医生罢工和公众的很大敌意。另一方面，萨斯喀彻温医生的手段和过激的语言促使反对医疗保险的运动名誉扫地，不仅在省，而且在全国都是。[①]

1965年夏，处于汤姆·肯特全面监督之下的渥太华官员制定出一个管理上简单、政治上可行的计划。渥太华将支付一半的医疗服务费用[②]。如果省支付另一半的话，根据省接受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定：医保覆盖范围的普遍性；何为医疗服务的综合性定义；利益从省到省的可转移性；公共行政管理。整体称为“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时间选择与自由党政府在1965年选举中党纲的需求直接相连。在这次选举中，皮尔逊费尽全力争取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他未能得到大多数席位，但这一失败对医疗保险没有影响。联邦条款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致于魁北克克服了其对联邦政府共同分担方案的反

① 甚至原来强烈反对医疗保险的萨斯喀彻温自由党也在1964年的省选举中急忙宣布放弃反对并给予支持。Penny Bryden, *Planners and Politicians*, 130.

② 渥太华将在任何一年对整个国家人均医疗服务成本进行估算，之后根据每个省的人口数量提供费用。如果特定的省份想支付更多，可以自由去做，但反之该省将不会得到超过国家平均水平的费用。Kent, *Public Purpose*, 365－366.

对，而安大略则克服了其对私人保险的偏爱，阿尔伯达克服了其对普412遍医保覆盖范围的反对。[1] 到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拥有了一套普遍的、可转移的、公共出资和管理的医疗保险制度。汤姆·肯特将其正确地认定为“皮尔逊政府提出的所有社会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2]

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加拿大”的管理模式。20世纪四五十年代，“加拿大”的事务从本质上讲是战争和外部安全，“加拿大”指联邦政府。但政府，尤其是加拿大政府是一个集体名词。因为防卫紧迫而且费用昂贵，因此各省及其优先考虑之事被搁置一旁。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加拿大是一个小角色，因此如果加拿大要对集体防卫做出贡献并且在联盟体系中占有相应的分量，需要集中其资源。加拿大的防卫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使广泛的社会福利方案没有什么回旋余地。

然而1968年之后，加拿大就有了这样一个方案。其规模很大、成本很高，以致戈登的继任者财政部长米切尔·夏普（Mitchell Sharp）令他的同僚推迟实施医疗保险一整年直至1968年。与此同时，防卫和互助从1961年占联邦政府支出的23.45%降至1969年的13.7%；到1975年是7.1%。另一方面，社会福利从1961年占联邦政府支出的20%升至1969年的23%，再到1975年的33%。部长和其他许多官员没有提醒选民，政府是要做选择的，而且在一个领域的花费不会花在另一个领域。但事实就是如此：加拿大人或许在国内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富裕，因为按照政府的想法，那是他们选择的花费其金钱的领域。因此他们花在防卫以及与防卫有关的行业和方案上的将更少，而且加拿大必定在其同盟中起到次要的作用，必定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沉默。

---

① 省总理曼宁在与皮尔逊讨论中非常细致地反对该方案。根据 Tom Kent, *Public Purposes*, 369，他的反对意见“几乎没有逻辑，但很激烈。”关于共同分担成本的方案，见 Mitchell Sharp, *Which Reminds Me…A Memoir*（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138－139页。

② Kent, *Public Purpose*, 365.

贸易条件

皮尔逊政府在重塑加拿大社会的同时，也通过修订国家贸易政策改变着加拿大的经济地理。皮尔逊及其政府似乎在经验和思想意识上的能力都不足以对贸易做出更多改变。皮尔逊主要是一位外交家，在联合国的谈判或辩论中最为惬意。从意识形态上看，财政部长沃尔特·戈登是一个狂热的加拿大民族主义者，渴望增强地方对经济的控制。这是一个明显与合作性贸易政策相悖的原则。 413

原则与境况几乎无关。加拿大贸易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 年之前，加拿大的贸易在大不列颠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而 1945 年之后这一趋势向南转移。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rifs and Trade*）（GATT），加拿大参与到降低关税的行动中，但这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回合”未从根本上影响保护加拿大工业免于竞争的高关税壁垒。然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做的是限制英联邦国家建立自己的经济或贸易区的能力。属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所有国家必须拥有相同的规则并提供相同的关税水平——尽管像英联邦优惠这样现有的制度安排“免受规则约束”。只有唯一的例外允许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自由贸易区。

1957 年，6 个欧洲大陆国家——法国、西德、3 个低地国家以及意大利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英国选择不加入，之后被法国排除在外。由法国领导的共同市场证明是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使用补贴鼓励欧洲农业方面。结果可能是意想不到的——“酒池油海”本来可以由得到补贴的欧洲农产品构成。当然，属于温带大陆的欧洲生产出许多与加拿大相同的作物。加拿大出口到欧洲的农产品，如小麦、苹果和奶酪逐渐被抑制。尽管这些农产品仍然可以进入英国这一传统市场，但很显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谈及一般的贸易和经济时，加拿大的选择越来越少：美国是唯一的出路。 414

加拿大政府不愿意对更大、更多产的美国经济降低关税壁垒，但

与此同时，它也不安地意识到拥有有限国内市场的加拿大经济不够充分。加拿大产品比美国产品价格更高，而且选择更受限制。这一情况在汽车行业尤为明显，位于加拿大的属美国所有的汽车工业众所周知效率低下。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贸易有巨大赤字，年复一年对其国际收支平衡产生消极影响。

加拿大政府时不时地盘算调整汽车工业。沃尔特·戈登着手此事，在加拿大寻求更多生产和投资并对此给予奖励。他的第一步尝试遭到美国的反对和报复性威胁；但他们并非劳而无功。通过使加拿大人高兴的方式整顿汽车工业这一观念激发了美国政府内部和三大汽车公司的思考。[①]

解决方法是一个加美协定（1965 年的汽车协定），该协定创造了一套行业内管理贸易的制度。作为在加拿大有保证的生产和投资水平的回报，汽车公司得到零件和自由贸易权。他们利用新建立的自由对汽车工业进行合理化改革。他们不是在加拿大成倍生产小数目的高价汽车提供给加拿大市场，而是一个工厂就能供应整个北美。1964 年，7% 的加拿大汽车生产是出口的；2002 年的数值为 60%。另一方面，在加拿大购买的 40% 的汽车是美国制造的，这是另一个重大增长。在加拿大，投资增长；就业人数亦然，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 75 000 人增至 2002 年的 491 000 人；价格下降。产量如此增长以至到 1970 年加拿大第一次在汽车贸易上取得少量盈余。汽车在加拿大制造业——到 2002 年占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及其出口产品中跃居首位，取代了林业产品。

415

一些美国人注意到了。汽车协定成为美国集中在不断增长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系列不满之一。该协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多次接近于单方解除，但没有做到。结果是加美贸易增长，尤其是安大略的经济得以重新定位到南北以及东西向。

---

① 在以下著作中有有力描述，Dimitri Anastakis，*Auto Pact：Creating a Borderless North American Auto Industry，1960－1971*（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第 3 章。

该汽车协定中存在讽刺之处。其主要创始人沃尔特·戈登希望重新控制加拿大经济。而他也希望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制造业的高薪工作岗位来使国家繁荣。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但在严格的经济民族主义方面做得并不好。1965年之前，加拿大汽车公司是美国的下属公司，但由于他们应对的是独立的加拿大市场，所以拥有高度自治权。这一点按照汽车协定不再是必要的了，而且有效决策——事实上是一整套行政职能——被移至美国总部。

汽车协定的经历说明非预期后果法则的运作。它将美国与加拿大拉得更近，在此过程中改变着经济平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即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巩固了这一趋势，减少或取消了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价值数十亿的贸易关税。）然而，大多数加拿大人会惊讶地得知，此汽车协定对国家而言，如果他们住在安大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是多么成功，多么重要。就大多数加拿大人而言，与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正进入衰退期。就政治和文化关系而言，他们是正确的。

越南的阴影

由于位于美国旁边，加拿大人一直处于极佳的位置来掌握边境另一面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美国的后院。通过曝光在美国媒体，尤其是电视上，美国总统及其他杰出的政治家在加拿大变得家喻户晓。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约翰·F. 肯尼迪在加拿大受到欢迎，年轻英俊的肯尼迪更是极受欢迎。当肯尼迪于1963年11月在达拉斯遇刺后，加拿大人分担着他们邻居的悲伤。 416

他们不确定如何理解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这位接替肯尼迪的德州的资深政治家。他并不英俊上镜，但政治技巧娴熟——在1964—1965年足以压制对与加拿大的汽车协定的零星反对。这对于约翰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他邀请皮尔逊及其外交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到他的大农场庆祝签约仪式。皮尔逊并不十分喜欢这种乱作一团的场合——他对非正式会见的理解更倾向于在舒适的炉

火前静静地品味一杯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

参观约翰逊农场包括令人恐惧的开车兜风，由约翰逊亲自驾驶；在总统的坚持下在路边小便；还有成堆不好消化的食物。约翰逊周围的嘈杂和混乱绝非皮尔逊的所好。然而，这是两人进行的最愉快的会谈。他们不久就会发生龃龉，而且是针对国际事务。从最广大的意义上讲，这是美国与加拿大在世界立场上的不同。

令皮尔逊与约翰逊分道扬镳的一件事是对限制因素的理解——在皮氏眼里，美国的力量和资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比约翰逊所见的更为局限，更加脆弱。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看法在南越问题上发生冲突。在那里，共产党人的叛乱以及来自其孪生共产者北越的入侵扬言在20世纪60年代初推翻亲美政府。对约翰逊及其支持者而言，南越成为美国抵制共产主义颠覆决心的象征。约翰逊认定，如果南越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度将受损。他于1965年调动美国部队增援南越。到1968年，位于东南亚的美军达500 000人，大部分为应征入伍的士兵。

417

皮尔逊没有质疑美国政府的反共产主义，而是质疑其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他认为派应征入伍的军队在遥远地区发动战争不是一个已证明的成功秘诀，这一点在朝鲜战争，尤其是法国最近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经历中得到体现。皮尔逊通过在越南担任微不足道的停战协定监督职责的加拿大外交官得知，共产党人不会妥协而且实际上准备好了做出任何牺牲。他担心对美国的影响，其自由党朋友恳请他说一些阻止约翰逊进行灾难性行动的话。

皮尔逊于1965年4月在费城的演讲中作了尝试。即使在今天该演讲读起来也是奇妙的。它竭力赞扬美国及其动机和政策，但也对美国进攻越南之举的悬而未决叫停。

由于异议和可供选择政策的暗示迎合了约翰逊在美国的反对派，因此约翰逊将皮尔逊的行为看作背叛。他怀疑皮尔逊与他国内的反对派勾结，他对此深恶痛绝。约翰逊知道半途而废弃是不行的，除非伴随着对美国撤退以及南越成为共产党人的天下这一未来的认可。这对

约翰逊来说就是政治自杀，尽管他怀疑军事行动可能是一次代价很高昂的错误——政治上也是致命的。接着，双方在总统的乡村寓所戴维营举行了言辞尖锐的会议。约翰逊抓着皮尔逊总理西服的翻领怒吼到，“你故意弄脏了我的地毯。”回到渥太华后，皮尔逊给约翰逊写了一封和解的信，但没有起到作用。这位美国总统一意孤行。

约翰逊的激烈争辩主要是口头上的。他在越南需要全力以赴应对，并且不理会欧洲人和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确实加入了战争并对国内的政治混乱付出了代价，因为它没有能力影响美国的政策或军事战略。但澳大利亚距离偏远、孤立，而且如果被其亚洲近邻攻击则不能指望美国的支持。加拿大正好与美国相邻，没有这种战略困境。 418

越南战争（Vietnam War）分化了美国社会。不得不参加战争的年轻人普遍反战。甚至像之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这样的保守党子弟都设法置身越南事务之外。游行和暴动席卷美国校园。美国军队征召入伍者拒绝入伍，或许有50 000名逃避兵役者及其支持者逃到加拿大。美国舆论逐渐转向反战，加拿大推波助澜。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在各个方面受到抨击并崩溃。在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人选举老练的共和党政客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为总统。尼克松或许不是完全没有经验，但他与众不同。他仍尽力在越南取胜，但作为一位比约翰逊更无情的政治家，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他愿意讲和。至于加拿大，尼克松所要求的全部就是加拿大不要制造麻烦。

脱节的时代

莱斯特·皮尔逊由于担任总理受到挫败而感到厌倦，于是在1968年宣布辞职。自由党用来代替他的人选是不寻常但并非意料之外的司法部长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特鲁多随即在6月举行大选，自由党在一位领导者和至少可以说是没有经验的总理的带领下踏上了竞选、游说的道路。

虽然在政坛历练只有3年，特鲁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其家乡魁

北克省的公众人物。他曾在蒙特利尔大学、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巴黎大学求学，还是一名世界旅行家、公众知识分子，最近还成为一名法学教授。他未婚，身体强健，行为神秘（就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而言）且外表浪漫，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尽管他已是48岁的成熟男人。

419

加拿大人看到的是一个藐视传统之人——身着圆翻领毛衣，足蹬凉鞋，驾驶自己的敞篷梅赛德斯，翻领上衣纽孔或牙齿间放一支玫瑰。他将同性恋行为从刑法中去除并嘲讽到，“政府对国民的床第之声不感兴趣。”特鲁多在电视上，即他常处的环境中露出腼腆的微笑，时而大胆，时而轻蔑，又或魅力十足。

特鲁多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样是一个谜。他在成为自由党人之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非常现实地情愿做出党派领袖所要求的妥协。特鲁多在其演讲中谈到“公正社会”，这一言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60年代晚期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并没有真正将特鲁多或自由党与新民主党或进步保守党区分开来。实际上，3个党派通过相互竞争来展示谁更关心他人，更公正，更有能力使“自由时刻”融入到加拿大历史中。

特鲁多的立场在一点上为人所知而且非常鲜明。他与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毫无瓜葛，而且不重视魁北克的独立主义者。就他而言，凡事有因必有果。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被认作可疑。他或许依靠了自身经验，因为特鲁多年轻时不认真看待法裔加拿大人极端的天主教民族主义，结果随着经验的扩充和思想的成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放弃了这一点。他现在是政府首脑，负责加拿大民族的行政长官。各政府，甚至是特鲁多政府都受到民族主义的推动，如果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化也是由于形势所迫，特鲁多成为一位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倡导者。

这是一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在一些方面并不是加拿大特有或唯一的民族主义。从更晚些时候来看，它可以被看作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主导政治和社会的文化战争的第一部分。特鲁多的“公正社会”反映了城里人和进步党人以及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的要求。

它将是公开宽容的，而且如果有人能指出如何对其管理，那就是给予关心。它是适应即将发生变革而且是根本性变革的国家的哲学思想。其公开性掩盖了事实，导致在很多方面行不通。 420

特鲁多于1968年6月赢得加拿大选民的授权。自由党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在国家的每个地区都赢得席位。总理在其家乡做得尤为出色，那里的主要反对派与其说是保守党，不如说是乡下的带有民族主义的社会信用党。[①] 选举前夜，加拿大人看到总理在蒙特利尔一群投掷石头的独立派暴徒面前坚守自己的阵地，而蒙特利尔市长和魁北克省督则落荒而逃。

之后，特鲁多适应了执政。有一些次要的社会方案适合于一个面向青年的社会——例如青年人机会，为加拿大年轻人自己设计的项目提供资金。存在西部应该如何做的问题，那里有人抱怨加拿大中部，尤其是安大略的繁荣并未共享。加拿大东部和乡村也存在问题，落后于中部繁荣的工业城市。特鲁多政府尽其所能，相信政府拥有资金、时间和专长治理社会。

政府确实拥有资金，因为经济不断产生正常的预算盈余。需要做的是将一些钱转到由皮尔逊政府建立、特鲁多政府扩大的新的社会方案中。政府推动地区经济扩张，尤其是对布雷顿角岛。政府伪造失业保险和贫困。政府认真考虑城市问题，还深思加拿大研发滞后之谜。

资金的明显来源除了正在增长的税收，还有防卫。好运垂青于政府。越南距离遥远，加拿大没有一个重要的团体赞成参战。（这并未阻止数以千计的加拿大年轻人应征加入美国军队并为山姆大叔而战。）欧洲局势稳定。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包括加拿大如果被攻击，将保卫他们的现有空间，但又承认攻击是不可能的。西方的共产党人从1956年苏联在匈牙利镇压叛乱一事中清醒过来。当苏联于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故伎重演之后变得更加清醒。 421

---

① 然而社会信用党领袖里尔·考埃特（Real Caouette）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联邦制拥护者——比他的许多追随者更坚定。

尽管在校园里、街道上和西部城市的广场上仍然有革命性庆祝活动，伴随着纵火和抢劫，自称的革命者或被收买或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姿态。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把苏联当作他们的榜样。苏联腐败、阴暗且顽固守旧。更具传奇性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甚的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人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对阿尔巴尼亚（Albania）了解更少，因此两国成为加拿大和其他地方极左分子的科幻政治的自然吸引之处。在这方面，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尤为不同。尽管不完全是其仰慕者吹捧的那样，但中国有一个优势。毛泽东政权在经济上遭到如此破坏且如此专注于国内阶级斗争，导致对其境外任何国家都构不成严重威胁。

苏联尽管在军事上坚不可摧，但也开始衰退。此外，其领导人倾向于追求稳定甚于对抗。（其在国外的间谍，包括一些在加拿大的间谍不再为革命而是为现金工作。）北约已经同意承担在欧洲与苏联的谈判。70 年代初，这一进程导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的召开以及关于多种形式限制军备的讨论。美国人在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专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带领下，与苏联寻求“缓和”，而在欧洲盟国中已显现出经济上最强大且政治上最稳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者说西德提出一个与东方阵营，尤其是与它的孪生同胞，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说东德（East Germany）进行建设性交往的方式。这一政策被称为“东方政策（Ostpolitik）”，最终达到了其目的，即通过越来越贵重的礼物和补贴收买东德人而又向苏联保证西德不会设法推翻 1945 年的协议。

422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无论需要的是什么都不是加拿大的军事力量。部署在欧洲的加拿大卫戍部队的象征性大于实用性——跨大西洋联系的象征意义大于共产党和莱茵河之间的堡垒意义。（一位曾在欧洲指挥加拿大加强旅的加拿大将军有一次对作者说，如果发生战争，他认为他的部队会与家人一起坐上大众车，朝最近的港口驶去。）特鲁多政府经过一段漫长、痛苦的自省后于 1969 年初宣布，将撤走一半加拿大位于欧洲的卫戍部队，包括陆军和空军。欧洲人，尤其是英国

人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不悦，结果加拿大在北约的发言权，毫无疑问被大大削弱。特鲁多并不太在意。他把北约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准备好的演讲稿和僵持局面的论坛，一个军事呼声过高的地方。[①]

在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加拿大在大陆意识方面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且在自身优先权上完全不起作用。[②] 对于法国和德国，这些情况同样如此，尽管对大不列颠未必。[③] 英国对保护加拿大贸易几乎无能为力。由于英国调整关税，废除帝国优惠关税制而又对欧洲商品开放市场，加拿大的出口不断萎缩。

变化中的加拿大

有另一个原因怀疑欧洲人。加拿大正在发生变化，欧洲亦然——由于欧洲向东面对苏联，向内面对自己的共同市场或者说经济共同体，因此加拿大正寻找代替欧洲人的其他选择。它与欧洲的联系不断减少，尤其在移民方面。比较统计数据可以对此加以说明。1946 至 1966 年间，在加拿大的 270 万移民中，超过 80% 的人来自欧洲；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总数在 5 万左右；而韩国（Korea）并没有被列为单独的移民来源。任何人看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加拿大的移民模式或种族划分得出的加拿大很可能像之前的 150 年那样继续成为白色人种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其文化反映种族划分的结论都可能被原谅。

423

关于北美移民，1966 年的最重要事件不是关于加拿大的，而是美国。美国法律的修订改变了该国对美洲移民的传统喜好——包括加拿大人——同时结束了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移民的歧视。1967 年后，加

---

① 他喜欢简单地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即荷兰外交家约瑟夫·伦斯（Josef Luns）为“General” Luns，指重复真正的秘书长告诉他的话的人。

② 有偶尔对立的项目，见 Claude Julien，*Canada：Europe's Last Chance*（Toronto：Macmillan，1968）。

③ 英国首相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Denis Thatcher）在 1987 年参加温哥华英联邦峰会，在去往加拿大的飞行途中，向一群英国记者发表意见，“你知道加拿大是什么吗？什么都不是。”这在马丁·凯特（Martin Kettle）的文章中被引用，“让我告诉你吧，加拿大事实上很有趣。”*Guardian*，7 January 2006.

拿大人不能再跨过边界自由移动去寻找更好的绿色牧场了。但加拿大繁荣昌盛，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加拿大人传统选择的限制性几乎没有被注意到。

加拿大对非欧洲人的歧视几乎与美国模式相同。随着对非白人种族的偏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减弱，移民实践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加拿大也发生变化。1971年，加拿大非白人移民人数首次超过欧洲移民。非欧洲移民得益于东非一些英联邦国家种族的紧张关系，那里的印度移民不受当地政府的欢迎，尤其是乌干达（Uganda）的伊迪·阿敏（Idi Amin）的食人政权。此经历与之前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难民的流入一道对1978年加拿大移民法的修订产生影响。

加拿大自己的种族也在发生变化。195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是少于10 000名因纽特人，大约150 000名条约印第安人。其人数到1981年超过这一数字两倍，到2001年再翻一番达到675 000人；其中283 000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外。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几个地区和魁北克北部、安大略、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印第安人与因纽特人是一个越来越重要且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人口组成部分。然而他们仍然按照18世纪的标准和做法被统治着，是王权的守卫者，享有津贴但级别低下，由联邦印第安事务部门的公职人员管理。200年的托管制度造成（主要是）乡村贫民窟的聚集，其居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白人同胞的生活水平。

424

这种情况似乎与反歧视、种族分类和二等公民身份地位的时代风气不符。解决方法似乎很明显：废除印第安人的特殊身份并把他们融入加拿大更大的社会团体中。由印第安人及北方事务部长让·克雷蒂安发起的一份联邦白皮书在1969年建议这样做。①

白皮书忽视了另一个时代潮流和一些联邦政策产生的结果。尽管联邦的印第安政策可能不充分，但却培养了一小批积极、受到更好教

① Miller, *Skyscrapers Hide the Heavens*, 227 – 229.

育的土著领导人。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不愿意接受渥太华的指示。对这些领导人而言，联邦提议书只不过是同化、吸收的一剂良方，同时又使联邦政府摆脱因世代忽视和虐待带来的危险。他们抵制克雷蒂安的政策并终止了他提议的改革。不管加拿大土著人日后的命运如何，他们都要求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白皮书的反应使土著与白人的关系步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对印第安领导权而言，它不再是一个处于更大社会团体中贫困或平等的问题。自治权、自治政府、民族，甚至是独立的问题都显现出来。尽管白皮书使政府控制土著种群的旧制度不再可信，但却完全未提及政府的地位。相反，各种印第安组织兴起。其中一些是特定的，在一个专门区域进行管理或因某一特殊原因而建，其他的更普遍且更加组织化，如全国印第安兄弟会（National Indian Brotherhood）。其在 1980 年演变为原住民议会（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议会反而因为一些目的和在一些场合不授予一些更加激进的印第安代表人要求的土著主权而被联邦政府认可。为了结束混乱，联邦的印第安事务部门继续充当为不同印第安族群发放补贴的渠道。

425

联邦 - 省的灾难

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印第安族群反映了加拿大政府其他部门的分权趋势。随着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记忆中远去，一些组建强大中央政府的正当理由也灰飞烟灭。随着时间的流逝，省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政府工作人员，结束了渥太华几近垄断的官员技能。由此可知，省在与渥太华谈判时可以提出更好的观点，或者是双边的，又或是通过正式的联邦 - 省会议这一媒介。联邦 - 省会议是联邦总理与省总理的联席会议，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临近，开会频率显著增加。[①] 起

---

① 根据一项统计，从 1902 年至 1927 年有 4 次联邦 - 省会议，1927 年至 1944 年 8 次，1945 年至 1959 年 10 次，1960 年至 1969 年 15 次。1960 年以前称作“自治领 - 省会议”，之后称作“联邦 - 省会议”。

初，评论员关注这些会议的外交成效，[①] 然而后来，联邦－省秘密会议成为政府第3程序的印象与日俱增。这一印象随着用来描述这些会议的术语的增多而加深。“联邦－省会议”在1974年成为“联邦－省第一总理会议”，之后在1985年成为“第一总理会议”。之前，他们处理特定事务——例如失业保险或养老金——同年，即1985年变为年度化和普遍化处理。

高层政治会议的增加是加拿大政府控制权错综交叉的迹象。皮尔逊政府认识到这一复杂性并投入资金以便省能够应对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同时维护所有加拿大人享有不同省份可交换服务的权利。联邦对省需求的投入也使渥太华免于照单全收，多亏其不受限制的征税权才有了很多钱，而且避免了任何一种基本的税收调整。与此同时，渥太华充足的税收使其在与省的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即使是最大的省。如果联邦预算不断增长，那么经济也在增长且联邦盈余也在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像大多数巧合一样，它并未持续下去。

426

暗夜冰封

这要从一次选举说起。执政4年后，特鲁多政府于1972年10月30日进行大选。自由党愚蠢地对选民郑重宣告：“我国很强大”。这只是其中一个场合，多一些谦虚和少一些夸张或许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家。毕竟失业率保持在6.3%这一低水平，尽管高于1968年的4.8%。经济学家后来将加拿大失业率的增长归咎于更高的利率和更慷慨的失业保险制度。婴儿潮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也产生作用——更多更加年轻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他们经常是找到工作后举行罢工，自从1946年的通货膨胀时起人数就不得而知了。[②] 对于那些没有成为劳动力的人——例如大学生——70年代初同样是走向乱象的混乱时期，因为激进分子抱怨真实的或想象出的不满并采取“行动”反对自满或

① 这一点见理查·西蒙的经典研究，*Federal－Provincial Diplomacy*：*The Making of Recent Policy in Canad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Canada*，2nd ed.，table E190－197.

独断的官方。

特鲁多承担过错不足为奇。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逐渐消失，政府出现只领先对手进步保守党 2 个席位的局面。政府的命运取决于两个少数党，即新民主党和社会信用党以及政府对似乎无可挽回的政治形势的操控能力。为了管理政府，特鲁多任命新斯科舍的一位资深政治家艾伦·麦凯琴（Allan MacEachen）为众议院议长。为了指导其政策，特鲁多没有求助于学术专家或管理学理论家，而是求助于他的专业政治顾问。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建议他做任何大众欢迎之事。着眼于重新树立形象，总理抛开了哲理并伪装成一个街头霸王，轮流藐视和嘲弄反对党。适合他的正是这一形象，而且也被证明很受欢迎。

427

政府在众议院以第一个信任案得以维系。问题是美国在 1972 年圣诞节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加拿大人不赞成。左翼对此发表意见，新民主党要求加拿大应该表态。因此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加拿大确实表态了。新民主党不得不为此投票。与魁北克一样拥有孤立传统的社会信用党也不赞成战争而且也对其投反对票。特鲁多及其部长知道这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愚蠢解决方法，他们为此投票来维持政府执政。尼克松总统恼羞成怒，但他需要加拿大的帮助，即通过组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监督美军撤退来掩饰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这一问题很快被忘记了。不管怎样，尼克松在短期内将被一桩国内大丑闻吞噬，于 1974 年成为唯一辞职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的不幸分散了美国和受关注世界的注意力——因为它是世纪电视剧——在 1973 和 1974 年大部分时间里如此。尼克松自始至终追求与苏联改善关系，与中国友好，并试图控制美国和苏联被威胁牵扯进去进而危及世界和平的中东局势。一场短暂的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于 1973 年 10 月偃旗息鼓，但却是在阿拉伯世界加入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中，禁止中东石油运至“敌对”的西方国家之后才平息的。此次行动开启了能源危机，这一危机将持续近 10 年——事实上永远不会销声匿迹。

20 世纪中期的加拿大人像他们的美国近邻一样对能源司空见惯。北美人控制着明显无限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供给。有优秀工程师开渠筑坝的水力，有加拿大的铀作燃料和加拿大重水铀反应堆系列设计和生产的核能。因此加拿大的能源政策是很多甚至是过多的政策。地质学家每年报道他们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政府每年游说美国给予加拿大——安全、可靠、结盟的加拿大——部分美国能源市场。政府竭尽全力鼓励阿尔伯达，为更贵的国内石油保留大部分安大略市场，但允许政治上易变的魁北克和欠发达的大西洋省份从成本更低的国际市场进口更廉价的燃料。

428

这一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从 1960 年开始，美国的石油储量开始比地质学家能够找到的替代物消耗得更快。加拿大政府更加迅速地尽力游说，结果却发现国会的阻挠胜过任何基于石油储量减少的理由。最终在 1970 年，加拿大也遇到与美国相同的问题：探明的石油储量已达峰值而且开始减少。由于这种情况，加拿大向美国无限量出售石油的热情也开始减退。

阿拉伯石油禁运只是石油危机的最明显标志。以时下流行的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危言耸听之人多年来一直认为世界正面临马尔萨斯所谓的危机——过多的需求追逐过少的资源。由此得出价格应该上涨的结论，而且价格确实上涨了。1973 年之前的许多年里，产油国政府利用他们的贸易协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即 OPEC）组织了一个石油卡特尔，一直为其产品要求并争取更好的条件。联合起来被称为“七姐妹”的西方大型石油公司发现，它们的政府或者将不会（如美国）或者不能够（如英国）维持它们的市场主导地位。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并不断上涨。

这对加拿大来说喜忧参半。对阿尔伯达来说无疑是好消息，阿尔伯达最有利可图的产品石油被国际油价支撑着。似乎其资源型经济最终转危为安，之前它常常是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国际市场的受害者。市场第一次为该省效力，而不是碍手碍脚。对从加拿大进口石油的地区而言是一个坏消息。由于它们的能源供给或因抵制或因难以承受的价

429

格上涨而被切断，不久媒体便宣传老妇在黑暗中被冻僵这一形象。人们普遍认为石油公司是石油危机的始作俑者。由此得出好的旧式国家调控将巧妙控制住一场人为的紧急状况的结论。

少数派政府并非掌控影响很多而不是大部分加拿大人的多变政治形势的最好工具。在一系列特别决定中，特鲁多政府首先保全了加拿大自身的能源供给，并使全国以可承受的价格得到能源。对可承受的定义有争论，但同样不可避免地是政治上的分歧。美国人未在加拿大选举中投票，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人可以支付国际油价并首当其冲受到加拿大石油产量减少的影响。但沿海省份居民和魁北克居民投票了，而且考虑到少数派议会，他们将很快再次投票。由此得出他们必须得到保护的结论——和他们的国内最大石油市场安大略一起。

接着是一场人为的议会失败，选举于 1974 年 7 月提早到来了。特鲁多凭借与以往不同的多数席位杀了回来。自由党在马尼托巴西部没有席位，多数席位建立在魁北克、安大略和沿海省份联合的基础之上。特鲁多不管怎样都勇往直前——尽管幸运的是，没有极具争议的问题要提交给议会。（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即在魁北克选举独立派政府，将在下一章论述。）这有些异常，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经济问题，即滞胀的高峰期。滞胀期的经济不符合一般规律并在同一时间产生通货膨胀和停滞。

滞胀最终被证明在政治上是极其重要的。失业率上升、预算（部分归因于用来支撑石油双重价格制的补贴）出现赤字，联邦政府苦苦挣扎，寻求筹款方法以使收支相抵，不可避免地在减少对各省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的项目支付款项中找到了方法。组织工会的加拿大人以罢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且创下历史纪录（1975 年损失 10 908 810个工作日，是 1971 年损失数量的 3 倍多，是 1963 年的 10 倍多）。[1] 因为其中的许多罢工发生在工会最近得到允许的公共部门，

430

① Ibid. , table E194.

公众必定注意而且确实注意到了，对政府掌控经济能力的信任度在下降。尽管当时不明显，但这在公众态度看来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为未来 20 年的政治做了铺垫。

显然直到 1979 年，总理都令选民恼火，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感觉或许是双向的。特鲁多推迟选举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即 1979 年 5 月。作为一名一直以来都优秀的竞选者，特鲁多尽其对抗性的最大努力，但未能如愿。打败特鲁多和自由党，得到众议院最多席位的是一位年轻（39 岁）、没有经验的领导者乔·克拉克（Joe Clark）领导下的进步保守党。经过几个月的休息和反思后，特鲁多宣布退出政界，投身于自己的年轻家庭。（特鲁多像许多其他加拿大人一样是一个离异的单身父亲。）

克拉克离多数席位只差几个席位并下决心像他已拥有多数席位一样来统治。这将展示他的决心和果断，并抵消他作为一个易出意外的政治弱者的形象。（他的上级同僚、顽固的约翰·迪芬贝克嘲讽地说，"这是孩童之年"。）[①] 克拉克期待一旦他对公众建立诚信，他就能继续要求并赢得另一次选举，如迪芬贝克在 1957 年所为。他提交了一项增加加油站汽油税的预算。从行政上来看，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从政治上来看，则是一个灾难。

即使自由党不确定他们甚至还有一位领导者，他们还是知道克拉克的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落后——远远落后。克拉克及其新的汽油税将陷阱挖得更深，然后铁锹狠狠地撞到自己头上。自由党把不幸的新民主党和社会信用党拖在身后，于 1979 年 12 月 13 日击败政府。几天后，特鲁多终究不离任的消息宣布。

431

选举在 1980 年 2 月进行，克拉克适时落败。在一个难忘的场景里，特鲁多面对来自渥太华沙托·劳里埃酒店他的总部的镜头。他告诉加拿大人"是的，欢迎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无需告诉他们，这将是不同寻常的进程。

---

① 事实上是孩童之年，是联合国用以对儿童及其困境表示关注的一个宣传。

第十五章　两种民族主义



1967 年在蒙特利尔，魁北克的分离主义与政权狭路相逢：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官被一个示威者击倒。

435 当写到加拿大历史上的民族性的时候，需要很谨慎地指出加拿大拥有两种民族性——即说英语的和说法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很仔细地将自己与英国人区分开来，但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人通常一点都没有把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放在眼里。法裔加拿大的民族性在文化、社会，有时甚至是政治上都是一种力量。不可否认的是，说法语的加拿大地区，尤其是说法语的魁北克在政治上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当法国人在附近居住或经常居住在英国人当中亦然。蒙特利尔被公认为世界上说法语的第二大城市，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双语城市。如果说法语控制了市级和省级的政治，那么英语就控制了经济。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魁北克地区的财政主管，即财政部长说英语是一种传统，因为毕竟英语是商务用语。

魁北克说法语的人口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说法语且信奉天主教的魁北克地区的出生率高。除了蒙特利尔之外的其他地方以及在魁北克西部分散的小片地区，法语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是通用的。虽然移民来到说英语的地区，但讲英语的人经常会搬去加拿大的其他地区或美国。确实，魁北克以外说法语的地区随着岁月的流逝往往衰败下去，但是在这些地区也存在发展，例如，1960 年在新不伦瑞克举行的，对阿卡迪亚行政首长路易·罗比肖的选举。[①] 同样地，讲英语的人原来所持有的敌意和偏见似乎也渐渐地平息了。同时，像“摇篮中的报复”（*la revanche des berceaux*）的幻想，即认为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将会使说英语的人远离繁殖，并通过数量上的优势来统治 436 北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的观念也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所依靠的出生率正在下降。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这段时间，魁北克从加拿大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变成了最低的地方，所以发生上述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的出生率都在下降。技术、人们生活的不

---

① 人口学家理查德·乔伊（Richard Joy）适宜地写了 *Languages in Conflict: The Canadian Experience*（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Canadian Library, 1972）一书。

断富裕和城市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69年以前，避孕工具在加拿大严格按照法律来说是违法的，但在现在的城市中更容易得到。总的来说，越富裕的人孩子越少，而加拿大人确实变得更加富裕了。受过教育的女性有自己的职业，结婚也越来越晚。避孕药在1965年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它的出现首先是对大城市，最后对全国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当然，城市里的出生率，包括魁北克省的城市总是比乡村低，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乡村的出生率也降至同样的水平。

在反避孕的法律被废除之后，来自传统人士的抵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教义上反对使用避孕工具的天主教会也承认以前存在的这种法律是不能被执行的，应该被废除。优秀的天主教徒应该避免人为地控制生育，这种事情应该是发自良心的，而非通过法律强制。即使是在魁北克，避孕的观念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胜过了教义。在那里，支持教权主义的报纸《责任报》是最后支持上述观点的组织之一。说到政府最终废除了此类法律，这件事是由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法裔加拿大人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领导的。

说法语的魁北克，就像说英语的加拿大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发生变化——比说英语的人包括那些在魁北克讲英语的人，意识到的还要多。最大的变化正发生在社会中最传统的领域——天主教会。多年来，它都掌管福利和教育。这意味着魁北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教派划分并管理的。这和大多数加拿大省份不同。教堂非常依赖信徒的支持，他们既出人又出钱地来支持自己的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问题的增多，仅有信徒的支持是不够的。以省级政府补助形式获得的政府援助成为天主教福利机构的主要支柱。对于这些要付出一些代价。“主教们从我的手中得到食物”，全国同盟主席莫里斯·杜普莱西斯自诩道。杜普莱西斯用100种独特的方式提醒主教这个事实。最显著的是，当蒙特利尔的大主教约瑟夫·沙博诺（Joseph Charbonneau）在政治上不好驾驭时，他发现自己被调到4 800公里外去管理位于维多利亚的一座老宅，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437

杜普莱西斯的政治风格最终变得尴尬。对说英语的加拿大人来说，

正是他对加拿大说法语的民族特性的迎合给他的政权打上了可憎和过时的标志。对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来说，他所掌管的这个政府腐败、恣意妄为且独断专行，使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缺少资金，无法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杜普莱西斯于1959年去世，这标志着公共活动的扩大。”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正式发生在由让·勒萨热（1960—1966）领导的成功的自由党政府下。勒萨热是来自精英家庭的一位相当传统的政治家，他有时似乎对自己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都感到相当惊奇。

那个时代同样也帮助解释了现在发生在魁北克的事情。天主教会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与在几十年的保守主义之后解放了教会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世俗主义的浪潮以一种特殊的力量席卷了魁北克。政府以前通过教堂或教会资助的人现在仅为自己办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魁北克第一次有了由政府部长领导的教育部门。最终，直到1997年宪法的修改，学校体制在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命令下由联邦主义者占强势的加拿大议会讽刺性地世俗化了。虽然仍然一分为二，但魁北克的教育被官方人为地分成英、法两个方向，不再按宗教划分。

1997年宪法的修改是平静革命在逻辑上真正意义的结束。它并不是悄然无声的。像被婴儿潮和年青人或反主流文化折磨的任何其他部分的加拿大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魁北克忍受着大量的聒噪，大多是演说家的，但与加拿大其他地区不同，在魁北克也有彻底的失败。

438

对那些珍惜民族主义火焰很多年的人来说，对不满的再次出现并不感到惊讶。魁北克的历史一直吸引那些经历过1760年征服和对它的结果有悲伤感的人。民族主义绝对是一种将被对付的力量，但是像总理杜普莱西斯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界定为保卫“省级权力”，与渥太华的集权趋势敌对。不时地，梦想着圣劳伦斯河畔独立的“劳伦蒂”的分离主义者出现了，但是他们的观点在主流政治家或魁北克的选区中没有政治上牢固的立足点。这种分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夹杂在政治上的极右翼分

子中，而且在自由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很容易像曲柄一样被打散。

突然，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分离主义要求力量和责任。在这一点上，它在回应国际潮流——并不像 19 世纪 30 年代的分离主义那样（见上文，第 7 章）。1945 至 1975 年间，欧洲的殖民帝国几乎完全土崩瓦解。帝国的万能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在面对殖民地人民不愿意再被国外或上级力量统治时，失去了权力。在印度支那（Indochina）和阿尔及利亚，法国进行了几场劳而无功的殖民地战争，仅仅发现大都市的人口并不想支持它。在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大不列颠在较小规模上也有此经历，正如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一样。大不列颠、荷兰、比利时、法国，最后是葡萄牙都放弃了自己的海外领地，仅保留了一小部分。（而且，当然，除了错误地相信共产主义会超越帝国历史的苏联。）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突然获得了独立。

独立的逻辑和独立战争在魁北克吸引了注意力。（引人注目的是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政权的反抗在意料之中，但是将被不可抵抗的革命力量席卷。魁北克有代议制政府和民主体制，分离分子认为，魁北克的政客位于西山区的大厦中，真正服务于英国机构。[①] 西山区的大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群，当然，虽然按照国际奢侈品的规格，在英国、美国或法国的顶级建筑面前，它们黯然失色。它们的石墙和镶墙板的房间中时常会有对围绕他们的法裔人的厌恶观点。[②] 理论上，大多数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不以那种方式生活可以被忽略——理论是真正起作用的——如果不是在事实上。而且为了使事情继续发展，理论导致了恐怖。

439

① 最著名的革命文件被冒犯地定名为 *Negre blancs d'Amerique* by Pierre Vallieres（Montreal: Parti Pris，1968）。它指出英国人通过像杜普莱西斯（Duplessis）那样的“rois negres”统治魁北克。

② 证明这一点的言辞很多。或许最可理解的关于西山区和说英语的蒙特利尔其他部分的方方面面通常可以在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无礼且严厉的作品中找到。*The Apprenticeship of Duddy Kravitz*（London: Deutsch，1959，but first published in Maclean's magazine some years earlier）与 *St. Urbain's Horseman*（Toronto: McCleland & Stewart，1971）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1963年的选举中，在总理迪芬贝克乘坐的参选列车的必经之路上发现一枚哑弹。春天时，西山区的邮箱连续发生了几起爆炸，使一位拆弹专家身受重伤。省内外的观点变得令人焦虑。为了弄清从何处入手，如果莱斯特·皮尔逊被选为总理，他承诺了成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而且他信守了诺言并于1963年拙劣地将其命名为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不可避免地被叫做双双委员会，两届主席后被称为洛朗多－邓顿委员会）。

勒萨热总理发现内阁的成员随时间变动，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赶上他们就像“挣扎着控制一只熊”。[①] 新任教育部长保罗·热兰－拉茹瓦想要合法地拓展省内的司法权——他相信合情合理——进入至今被联邦政府占据的领域。他们的自然资源部长勒内·勒韦克，想要将魁北克的私有公司国有化且将他们与政府现存的魁北克水力发电（Hydro－Québec）系统（可追溯到1944年）合并。大多数省份都有政府拥有的水电设施，所以加蒂诺和沙威尼根的电力供应在省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价。然而，在内部转变被认为是对英语排外性的冲击。440 这种排外性被魁北克的经济支持了很长时间。勒萨热将它作为“经济解放”解释给他的内阁听。[②]

1962年秋，勒萨热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投票。勒萨热毫无悬念地赢了。私营公司国有化了，而且组合成为新的且大型的魁省水电局。魁省水电局成了收尾的手段，仅仅是改革魁北克经济和社会更大计划的一部分。魁北克不再是“像其他省份那样的省”已经非常明了了，而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必定是扩张主义者、活动家的省份——对于全国来说，只有魁北克体制毫无悬念地处于法裔加拿大人的控制之下，

① 引自 Tom Kent，*The Globe and Mail*，11 October，2005。

② Robert Bothwell，Ian Drummond，and John English，*Canada Since 1945*，2nd e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9）296.

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经营。[1] 而且它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政策，1965 年后开始借助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进行融资。

马克·拉隆德（Marc Lalonde）当时是蒙特利尔一名年轻的律师。他记得，“勒内·勒韦克在魁北克钢铁工业的支持下开始演讲，而且促进了钢铁工业（Sidbec）的产生［“sid”代表 sidérurgie，意味着钢铁工业］，最终在无论如何都要拥有它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如他所说，‘你们将此归功于自己拥有钢铁工业’”[2] 勒韦克的意思是魁北克的“民族”应该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工业设备。在心里，部长已经将他的省份的命运与加拿大的其他部分分开了。

魁北克有了钢铁工业，就像安大略那样，而且像安大略那样，有了一个汽车工厂。它们是政府重商主义的纪念碑，而且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经济中，魁北克自治可见的标志。（然而，随着加拿大联邦工业局在同时期的产生，人们应该观察到对重工业的重视并不是仅发生在魁北克。）事实上，历史并没有像勒韦克和他的理论家们期待的那样，最终魁北克钢铁工厂被出售了——没有卖给英国人，而是卖给了中国人——而且位于圣泰雷茨的通用工厂被它的拥有者在 2001 年关闭了。[3] 这不是将资金投入重工业的最佳时机，而且国家的立场毕竟不仅仅依赖于一两个钢铁厂。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皮尔逊利用自己的天赋完成了平息魁北克的任务，将国际事务留给了来自安大略的、经验丰富的自由党政客保罗·马丁。在魁北克，自由党的势力很强大。在那里，它是有所建树的党，而且皮尔逊能够拉拢一些有才华的人进入他的核心会议和内阁。然而，皮尔逊逐渐发现，不能指望正式与联邦党派分离的省内自由党的支持。

441

---

① 一位经济学家艾伯特·布雷顿（Albert Breton）认为，在那时对于各省内关于讲法语的中产阶级来说，魁北克的活动应该被看作利己的行为。Breton，“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LXXII（August 1964）。

② 语出马克·拉隆德（Marc Lalonde），引自 Robert Bothwell，*Canada and Québec：One Country，Two Histories*（Vancouver：UBC Press，1995），105－106 页。

③ 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定位和传输的用时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圣泰雷茨（Ste. Therese）位置封闭，距离安大略的汽车工厂和美国中西部遥远，因而对此毫无裨益。

某些省内的自由党人支持联邦党派，而另一些则从表面上与其保持距离。如果他们与渥太华走得太近，如何保护魁北克的利益？

事实上，渥太华，一个说英语的政府，如何恰当地代表魁北克的利益？对于保罗·热兰-拉茹瓦和魁北克的高级文官来说，这是不可能的。1965年4月，作为部长兼宪法专家（是他的身份），热兰-拉茹瓦发表讲话，他告诉蒙特利尔的外交使团，魁北克应该在省司法领域代表自己。[①]

热兰-拉茹瓦的主张迅速被联邦政府否决。作为外交部长的保罗·马丁发表陈述认为，加拿大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加拿大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声音是渥太华的声音。渥太华必须要与各省协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论在或不在其外交政策的权力中。结果很糟糕，而且有时是内在的，但整体来说，还是起到了作用，允许加拿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设有代表或就人权问题作出承诺。[②]

皮尔逊政府限制了魁北克政府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阻止魁北克与外国政府签署合约或条约这样的先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承认热兰-拉茹瓦将外交政策司法权一分为二的信条。唯一可能这样做的政府是法国政府，而且该政府就此事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得出结论，魁北克的独立是不可避免且是必要的。他的外交官中除少数人外，都表达了异议。很明显，他的外交部长也是这样的意见。于是，加拿大政府与法国政府于1965年达成一揽子协议，允许加拿大

442

① 此后，渥太华外交部法律司的高级成员艾伦·戈特利布（Allan Gotlieb）指出，热兰-拉茹瓦正在复兴首次被安大略提出的主张，该主张是1937年帝国枢密会议之前在劳工大会的案例中提出的。枢密院忽略了该主张，虽然它同意联邦政府不能利用作为一些地区立法手段的国际协议，这些权力已在不列颠北美法案中被授予各省。*The Globe and Mail*, 5 October, 2005.

② 戈特利布和汤姆·肯特在2005年10月5日和11日的《环球邮报》中已经明确了皮尔逊和勒萨热的立场。会议在伊丽莎白女王酒店举行。对于勒萨热的主张，皮尔逊没有做丝毫的退让，而且勒萨热也不希望他这样做。这个理由与 J. L. 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一书第115页给出的不同。

各省与法国就文化事宜达成共识，同时，在外交事务上承认加拿大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将魁北克与其他省一视同仁的确不是魁北克政府想要的，而且魁北克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阶层也越来越同意这点。魁北克不能屈从加拿大国内的少数派，但是就在1800万的人口中（1961年的人口普查）仅有510万人说法语这一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对19世纪50年代的代表由人口决定这一争辩的重复。19世纪60年代的政客设计了一个摇摆不定（且短期）的解决方法，即“两个多数”。在魁北克，20世纪60年代的政客又面对着它的孪生兄弟——“两个民族”（*deux nations*）。两个民族说了等于没说。它可以意味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它是那时一个语意不清的词。它也可能意味着联合阶层，另一个当时没有实际意义的流行语。[①] 它更可能意味着两个民族的同意是必要的——例如，修改宪法，可能是重要的问题，也可能是任何事。说英语的加拿大部分和魁北克的关系将不再依靠代表由人口决定，而是依赖于双方达成共识。

进步保守党在1967年夏魁北克城外的蒙特默伦西举行的会议上并没有认真考虑两个民族的观点。会上决定了“加拿大是由两个建国民族（deux nations）组成，他们有历史权力，且由来自很多地方的民族加入；宪法应该能够在全加拿大的范围内，平等完成诸如允许和鼓励他们全面和谐地增长和发展”原则。对于魁北克民族联盟主席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在1966年的大选中战胜了让·勒萨热，令人们非常惊讶。约翰逊写了一本叫做*Egalité ou Indepéndance*的书，提议魁北克获得和国家的其他部分一样的公平权力，国家允许它留在加拿大中或被保留下来的部分中。正如约翰逊定义的失败的平等，魁北克应该选择独立。

---

① 博特条款被勒内·勒韦克（Rene Levesque）用于描述在加拿大广播公司节目中1964年12月6日的《本小时有七天》（*This Hour Has Seven Days*）里对拉里·佐尔夫（Larry Zolf）和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采访时产生的灵感。http：//archives. cbc. ca/IDC－1－73－870－5014/politics_ economy/rene_ levesque.

443 或许因为英裔加拿大人拒绝相信他可能意味着约500万说法语的魁北克人能够平衡加拿大1300万或1400万不说法语的人。约翰逊或多或少地履行着魁北克省总理通常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天生的也确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面对英国人四处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手段，而且在巴黎他找到了一个。

作为“二战”时法国抵抗力量的象征，夏尔·戴高乐于1958年重返政治生活并于1959年成为法国总统。戴高乐执掌着他所见的，随着法国殖民地帝国不可避免的瓦解，结束了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创伤。他与难以驾驭的部长周旋，触怒对手，直到1963年取得了胜利。最终，通过聪明的外交，他重建了法国在欧洲此前的显赫。终究，与大英帝国留下的数以亿计说英语的人相比，全世界说法语的人只有6 000万。法国的经济实力并非一流，军力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决定向美国的法国人求援，召唤他们担负自己的使命，无论那是什么。

戴高乐的目标像约翰逊的目标一样不明朗，但在1966—1967年，他们承认，现状并非令人满意，接受了约翰逊将平等和独立分开的观念，绝对地支持独立。而另一方面，约翰逊很可能更偏爱平等。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的1967年夏，在去往蒙特利尔的路上，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

1967年世博会及其后

1967年加拿大庆祝建国100周年，而且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在那个夏天举办世界博览会。计划开始于迪芬贝克政府，皮尔逊就职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皮尔逊和他的伙伴组织了加拿大范围内的庆祝，但444 是中心会在蒙特利尔，在那里圣劳伦斯中部的若干岛屿为了1967年以“人类与世界”为主题的世博会连接在一起。加拿大最好的设计得到展示。全世界的政府都愿意利用世博会作为展示自己的窗口。加拿大紧张地等待着开幕，但是当世博会拉开帷幕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君主、总统和总理们期待能够进行礼节性访问，甚至是不想参加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都出席了。约翰逊有自己的问题，即越南战争和即将来临的中东战争，而且他不喜欢莱斯特·皮尔逊，但是他愿意在最小程度上做一些必要的事情。英王伊利莎白二世作为加拿大和大不列颠女王也出席了。当然戴高乐会出席，代表加拿大的另一个祖国。

当天晚些时候，访问的日程被反复确认，以免出现问题，戴高乐同意进行访问。1967 年 7 月，他乘坐法国船只到达魁北克，直接与热情的丹尼尔·约翰逊握手。在此后的几天中，与想要的相比，约翰逊意识到他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希望能够给英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戴高乐想要激怒他们。"我将给予重击，"他对他的女婿阿兰·布瓦西厄将军说，"事情将发展得受人关注，但这是很必要的。"[1] 戴高乐一行的高潮是 7 月 24 日穿越魁北克乡村，通向蒙特利尔市政厅之行。戴高乐的言行无法令魁北克主人安心。直到戴高乐的车队到达蒙特利尔的时候，有人听到约翰逊的低语，"我们将分道扬镳"。[2]

那天晚上，从阳台俯瞰广场，广场上矗立着英国海军英雄尼尔森勋爵的雕像，戴高乐通过电台和电视对全加拿大狂喜的人们发表讲话。讲话令人非常兴奋。他告诉他的听众们，那天他在魁北克的车队盛况正如 1944 年法国获得解放一样。人群欢呼雀跃，他们也要获得自由。戴高乐因此而受到鼓舞，以一系列的欢呼结束了演讲："蒙特利尔万岁！魁北克万岁！"而且很自然地高呼："魁北克的自由万岁！"人群突然开始齐唱法国国歌《马赛曲》。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戴高乐用过晚餐后就睡下了。 445

"魁北克万岁"是分离主义者的主要标语之一。分离主义者当然理解其中的含义，戴高乐的外交部长也一样，他将他的主子定义为

---

① 译文见 Dale Thomson, *Vive le Québec Libre* (Toronto: Deneau, 1988)；另见 Alain Peyrefitte, *C'etait de Gaulle III* (Paris: Fayard, 1997)，307 页。

② Thomson, *Vive le Québec Libre*, 203.

"垃圾"。[①] 有感知力的英裔加拿大也得到了信息，而且正如预料的那样，被激怒了。在渥太华，内阁于次日紧急磋商，商讨对策。电报和电话充斥着渥太华，表达着加拿大人对戴高乐的愤怒。示威者在法国领事馆外游行，后者当然明智地紧闭大门。[②] 皮尔逊最终读到了一份把戴高乐的言论称为"不可接受的"声明，并且表示了戴将军仍想访问渥太华的孤注一掷。自然，戴高乐并没有访问渥太华。在召来了一架快帆喷气式飞机后，他动身返回巴黎。在那里，他紧张的部长们在机场的跑道上迎候多时，争相一睹其元首的痴呆症征兆。

戴高乐留下了不调和的遗产。勒内·勒韦克离开了省内的自由党并建立了他自己的分离主义运动，最终转变成了魁北克人党（Parti Quebécois，简称 PQ）。皮尔逊的经验令渥太华平稳地做出了反应。加拿大并没有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约翰逊也放弃了。他还没做好宣布独立的准备，而且皮尔逊并没有激怒他。魁北克的商界领袖警告了约翰逊如果过早宣布独立的后果。而在 11 月举办的与加拿大其他省总理的会议上，约翰逊使原本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魁北克和加拿大将继续这样度过百年庆典。皮尔逊通过就加拿大宪法召开会议迫使其就范，以便试探省内的怨言，并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会议在 1968 年 2 月召开。但愿是因为他们在联邦的舞台上展示了新的特点，会议全程用电视直播且大受欢迎。皮尔逊的司法部长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对联邦政府负起责任。特鲁多费力地说明约翰逊并没有仅为魁北克发言，而且他的表现太有效以至于最终约翰逊几乎插不上话。由于受伤、蒙羞且健康状态不佳，约翰逊隐退。9 月，他早亡于心脏病。

446

同月，皮尔逊卸任。他发现工作越来越恼人，70 岁高龄时，他断

---

① 引自 Eric Roussel, *Charles de Gaulle*（Paris：Gallimard，2002），841 页。对 *connerie* 最有礼貌的翻译是"垃圾"。

②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采访了很多示威者，这些人按照加拿大的习惯几乎制止他们对自由和礼貌的渴望，同时还愤愤不平。结果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网络档案中被公开："勇敢地面对德高尔（Gaulle）。" http：//archives. cbc. ca/IDC－1－74－7658/people/lester_ b_ pearson/clip7.

定是离开的时候了。他主要的政治对手约翰·迪芬贝克已于1967年9月从进步保守党退休，而且皮尔逊不太可能同样也与迪芬贝克的后继者——正直、沉默的新斯科舍省总理罗伯特·斯坦菲尔德（Robert Stanfield）作对。

在1968年4月的自由党大会上，富有魅力的特鲁多完全击败了对手。4月6日，在特鲁多胜利的当晚，加拿大广播公司从会议厅的树脂玻璃穹顶上进行报道，用渥太华的编辑诺曼·笛福（Norman Depoe）和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克劳德·瑞安（Claude Ryan）作为评论员。当特鲁多的票数被公布后，他的胜利已毫无悬念，瑞安作出了一个愤怒的姿态。他确信，特鲁多绝对不是接替皮尔逊的不二人选。不像皮尔逊那样言谈和蔼，特鲁多是一个粗线条的人。

当时很少有人留意瑞安的疑虑。特鲁多是那时的英雄，就像在接下来的很多小时内那样，并且一直持续很长时间。

十月危机和此后的日子

可以看得出来，社会的节奏像以前一样继续。特鲁多可能会谈论“公正社会”，但是加拿大看上去具有非常地方性、有时很个人的关于公正的定义。那是一个国内外罢工频发且动荡不安的时期。一个组织接着另一个组织，想要得到更大份额的利益，乱作一团。分离主义拒绝让步，虽然对分离主义的恐惧促使省内的自由党任由一个新上任且没有经验的领导人罗伯特·布拉萨（Robert Bourassa）于1970年4月接管魁北克城的权力。[①] 勒内·勒韦克和他的魁北克人党得到了23%的选票，但是在立法机关（在想要确认魁北克民族地位的姿态下，被更名为国民大会）中只得到7个席位。魁北克的民族联盟比魁北克人党得到了更多的席位，但却较少的选票。它开启了成为政治垃圾桶的过程，而且魁北克人党事实上成了自由党人的选择。 447

① 在选举中最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被广泛报道的布林克公司的安全卡车车队载着贵重物品出省，平安抵达安大略。时间上的有效鼓舞了支持联邦主义者的投票，这将被分离主义者铭记和利用，成为仅仅被联邦主义者期待的不合理的政治战略类型。

魁北克在加拿大的地位看似牢固，但事情并非表面所示。分离主义者极端边缘化的行动并没有放弃利用炸弹和其他暴力行为。1970 年 10 月，他们成功地绑架了两名受害者：蒙特利尔的英国外交官詹姆斯·克罗斯（James Cross）和布拉萨的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1] 因为克罗斯有外交地位，他的命运成了在外交事务上享有司法权的联邦政府关注的焦点。

恐慌随之而来。布拉萨政府不知道自己正面对着什么，警察不知道逮捕谁，而且媒体报道了多方面的阴谋，未知的或不可知的，但当然是非常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组成了名为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on du Québec，简称解阵）的组织。它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类比，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与殖民地当局的对抗。事实上，魁北克解放阵线是一些分散的激进分子的集合（他们称自己为“细胞”），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沟通，在当时尚未有电脑的年代，存在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

解阵正式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在电视上播放他们写得很糟糕的布告，但是不要忘记流向国外的黄金和运输，还有各行各业的分离主义者中的罪大恶极之人，这些人已经在 1963 年至 1970 年间被全部关起来，沦为罪犯，总数约 250 人。

魁北克的政治集团很不稳定。一个公众会议——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学生——于蒙特利尔在“魁北克解放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的颂歌声中达到顶点。官方与解阵支持者的对峙是激进的理论家为暴乱和改革描述的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在北美校园中有相似的情形。一些重要的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要求布拉萨政府与恐怖主义者谈判。有议论说，政府不再有能力和理由进行统治了。（6 个月之前才刚刚进行大选。）但最终布拉萨表现得非常果断，请求联邦政府行使广泛的紧急权力，使联邦内阁的《战时措施条例》生效，或多或少地进

448

① 克罗斯的头衔是商务专员，但是他的职能实际上是领事。拉波特已是杰出的记者，而且成功地成为省自由党领袖，因此他年资较深且受到欢迎。

行适度利用。

另外，布拉萨要求并且得到了被派出维护魁北克秩序的联邦军队，他们保护高官免遭绑架，而且在危机方面起到帮助作用。士兵来来回回地巡逻，全副武装且看上去很凶悍。唯一有记录的军事行动的伤亡是自己造成的误伤。利用《战时措施条例》赋予的权力，警察围捕了约 500 个人，他们可能（或可能没有）与分离主义者的煽动有什么关系。在官员眼中，煽动可能比分离主义意义更为重大。

虽然这些行为加强了国家的权力，但对于拯救不幸的被绑架者拉波特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尸体被塞进停在一处机场的汽车的后备箱中。谋杀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效果并非恐怖主义者能想象得到的。对解阵的支持枯竭了——但对分离主义的支持却没有枯竭，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既没有不合法，又没有被镇压。

最终，警察发现了藏匿克罗斯的地方，并通过谈判解救了他。他的绑架者飞至古巴流亡。剩余的恐怖分子——那些绑架并杀害了拉波特的人在一处乡村地窖被发现后遭到逮捕，接受审讯。他们被判不同程度的重刑，但是最终所有人都获释了，受到分离主义好战者偶尔的赞扬。

十月危机（October Crisis）结束了，它大概持续了 3 个月。它是 7 年零星暴力事件的顶点，这些暴力事件的目的是使魁北克进入摆脱镇压和殖民主义的革命状态。恐怖分子从未想越雷池半步；虽然魁北克是个小地方而且社会名流联系紧密，很多演员都相互熟识。一位革命理论家皮埃尔·瓦利埃甚至在早期的示威活动中与特鲁多共事。在一段牢狱生涯后，瓦利埃得到一份联邦提供的工作，也可能是特鲁多借以表现甚至革命主义者也有代价的方式。 449

特鲁多对危机的管理体现了总理性格中强烈的夸张倾向。新闻界也推波助澜。在一次重大的活动中，魁北克的一名记者要求从总理处得知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有分辨能力的话，它暗示着特鲁多迄今为止隐藏着的军国主义和可能的独裁趋势，旨在造就极权国家。）30 年后，特鲁多的回应仍被重复着："你看，我认为摆

脱那些使用暴力反对全社会和那些想通过绑架和勒索建立相似权力而对政府进行控制的人更为重要”。此后，总理继续道：“有很多人不想看到戴钢盔、拿着枪的人，这些人的心在流血。我所能说的是，继续这样流血吧，但是维持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比担心那些不喜欢看到……表情脆弱的人更重要。”

记者：不惜任何代价？你这样能走多远？你会将此事发展到什么程度？

特鲁多：那就拭目以待吧。

加拿大人在关注，而且赞同，根据民意测验，支持特鲁多及其行为的人接近90%，而且魁北克的支持率比加拿大其他地方都高。

十月危机的所有结果并非都是正面的。危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并非所有都是没有理由的——特鲁多和他的部长的处理不尽如人意，而且必须被思路清晰且有决心的特鲁多拯救。警力的使用变成了迟钝的工具，而且那些被预防性拘留下的人珍视特鲁多那能被理解的愤怒。因为一些人是记者或其他可以接触媒体的次要公众人物，他们帮助完成了一种“黑色十月”的传奇。[①] 相信他们是有理由的——终究，加拿大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且在不提及恐怖分子的前提下，特鲁多的行为绝对是偏执的。因此，尽管特鲁多成了英裔加拿大知识分子所爱戴的人物，但1970年后他们对他的赞美支离破碎。

450

十月危机提醒了加拿大人民，魁北克是未竟的事业。特鲁多政府正拟定一个宪法改革方案，希望它能够允许所有省份和联邦政府处理司法权上的细枝末节，为修宪制定流程，使其基本适应20世纪后期对它的需要。联邦政府认识到下列真相，即这些省份在养老金和社会政策方面有优势。这些省份可以参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他们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加拿大人的、受限制的权利宪章。修宪原则赋予两个最大

---

① 参见电影《紧急法令》(1974)，由米歇尔·布洛尔特（Michel Brault）执导，该片在1975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甚至上映了20年。十月危机时拉波特的被绑架成为皮埃尔·法兰德福（Pierre Falardeau）的改编剧《十月》的主题。还有1994年由加拿大电影局发行的让－丹尼尔·拉丰（Jean－Daniel Lafond）制作的记录片。

的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对修正案的否决权。在法院和省立法机关中，对法语的使用将会被拓展。布拉萨同意了所有提案，可能在1971年6月于维多利亚举行的联邦－省级会议上有一个新加拿大宪章的仪式性协定。

在最后时刻，受到魁北克人民抗议的威慑，布拉萨犹豫了。他需要更多时间。越多的时间过去，他的犹豫就与日俱增，最后他拒绝签字。但这还不够，怎样才足够呢？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没有协议就是最好的协议。对于在特鲁多内阁和省行政事务中充当重要角色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来说，让加拿大成为真正的“两个民族”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意味着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区可以公平地进行协商。他们也希望获得更多、更大的联邦权力。一个倾向于分离主义的文官对让·克雷蒂安——日后的特鲁多内阁的下级部长说：“我们要像加拿大从英国分离那样从加拿大分离出来。我们要一次性切断联系，如果处处让步，最后就会一无所有。”① 《维多利亚宪章》并没有这么做，这与他们对自主、强大的魁北克的看法不一致。考虑到说英语的加拿大，只靠条款而不是民主的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一来，《维多利亚宪章》没有通过。它被拒绝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宪法上的问题，而是恐惧导致的，担心英语会把魁北克的法语特性淹没。

451

对英语的恐惧为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魁北克政治提供了相似的议程。魁北克政府传统上对语言采取的是放任主义，让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各自为政。省内大约20%的人口说英语，合888 000人。诚然，如果说英语的魁北克人留在省内，则还会有700 000人说英语，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说英语的人口比例是靠国外移民保持的。更有趣的是，在加拿大，说法语人口的比例在减少；在加拿大人口中，魁北克人的比例也随之减少。比起内部平衡，魁北克在加拿大占的份量逐渐下降是更恐怖的事情——而且国外移民确实反映

---

① 语出克劳德·莫林（Claude Morin），引自 Ron Graham，*The One Eyed Kings：Promise and Illusion in Canadian Politics*（Toronto：Collins，1986），66页。

了经济机会及其他机会。

这个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表现得很好，以至于带来了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令很多政客和其他社会名流感到惊讶。1969年后期，以让·雅克·贝特朗（Jean - Jacques Bertrand）为首的全国联盟政府回应了蒙特利尔郊区的语言忧虑问题。他通过了法律来重申父母在语言教育中的自由选择权。自由党领袖贝特朗的继承人布拉萨刚开始提出不会改变已习惯的秩序，但是在语言恐惧的压力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决定采取行动。

自由党对语言很不满意。剥夺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自由是不开明的行为，这引起一些内阁成员之间的摩擦。这也有可能激怒到目前为止政党对英语语言团体坚定的政治支持。一些自由党人会认为，如果魁北克的语言民族主义激起的恐惧不是空想，则是失去理性的表现。但如果政府采取合法、公开的行动，就会出现违法、暴力且不公正的活动。布拉萨提出了《22号法案》。这一法案规定了英语语言学校只接受有足够英语知识的孩子。[①] 它也规定了指示牌的用语，且鼓励在工作场所的“法语化”，使法语成为魁北克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最重要的成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它在心理上把英语社区从伙伴转化为少数派。100多年来魁北克是一个双语省份，语言的选择取决于个人而不是集体。[②] 但情况不再是如此了，说英语的市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③]

452

《22号法案》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表示反对，但对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来说是不够的。分离主义者在报纸上表示，他们相信说法语的人们是因大批说英语的移民而失去了所有集体权利。

---

① 英语必须作为孩子的母语，或者孩子必须能通过测试证明其英语知识。第二个规定令移民父母震惊且愤怒。测试局成了指代笨手笨脚的国家干涉的流行词汇。

② 关于在语言上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对抗，见 Paul - Andre Linteau, Rene Durocher, Jean - Claude Robert, et Francois Ricard, *Histoire du Québec Contemporain*, vol. 2, *Le Québec Depuis 1930*, 2nd ed, (Montreal: Boreal, 1989), 603 - 604 页。

③ Garth Stevenson, *Community Besieged: The Anglophone Mino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Québec*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4.

特鲁多很尴尬，但是对于保护少数说英语的人却无能为力。

语言不满不仅仅局限在省内。特鲁多和他的一些来自魁北克的说法语的同僚们打算证明联邦政府及其机构也属于说法语的人。作为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的国家政府（在省内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为魁北克人），魁北克很有吸引力，为了抵制这一吸引力，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因此，1969 年国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案》（*Official Languages Act*），大大加强了法语在政府中的地位。[①] 很多说英语的公务员发现现在自己必须学法语，既为了在部门内部交流，也为了和公众广泛地交流，因为现在公众有权力接受用两种官方语言提供的服务。该法案也鼓励了少数语言团体，为他们提供资金。[②]

制定《官方语言法案》的特鲁多与一些有影响力的魁北克部长改变了很多渥太华官方文化，这不仅鼓励了说法语的公务员，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对魁北克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表明，语言政策对魁北克省内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强大影响，联邦制的拥护者努力把这个省份和加拿大联合起来。但事实表明，他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

453

布拉萨和魁北克人党

在政治上，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坐失良机的年代。自 1970 年到 1976 年，自由党同时在魁北克和渥太华执掌权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有联邦制拥护者们联合起来了，渥太华和魁北克，即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和罗伯特·布拉萨政府应该很容易达成一些协议，至少一个战略来加强加拿大，使分离主义者处于困境。然而，自由党失去了权力——更确切地说，权力从他们手中滑落。特鲁多把权力让给乔·克拉克和渥太华的进步保守党，这是自 1867 年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都

---

① Graham Fraser, *Sorry, I Don't Speak French: Confronting the Canadian Crisis That Won't Go Awa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6), 105 – 110; Keith Spicer, *Life Sentences: Memoirs of an Incorrigible Canadia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4), Chapter 9.

② 正如加思·史蒂文森（Garth Stevenson）指出的那样，由于多种原因，魁北克的英国人发现联邦援助短缺。*Community Besieged*, 258 – 259.

经历的主要政党间的正常更替。1967 年布拉萨输给勒内·勒韦克和魁北克人党，因此让加拿大陷入长期的政治危机，一直到 30 年之后也没有停止。

执政的所有政府都不容易。石油危机产生，石油价格上涨。还会有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滞胀困扰着西方国家。在魁北克，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由于古老的天主教会放松控制，产生了宗教仪式的新形式。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边缘学说，其权力和影响力被学术界夸大。这不是魁北克唯一的特点，更独特的是他们同时热衷于联盟、激进主义和工人。过去的实践一去不复返了，即令最大的工会“中央”——魁北克劳工联盟（Québec Federation of Labour）从属于其母体加拿大工人大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过去的形式也一去不复返了，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盟（Canadian and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首次被全国工会联盟（Confederation of National Trade Unions，简称 CNTU，其法语缩写为 CSN）取代。

454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魁北克的工人运动由于公共部门工人的加入而日益壮大。这些工人在参加工人运动之前都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与此同时，公共部门无论如何在不断壮大。考虑到政府行为和国家机构被取代的平静革命，让魁北克的各劳工组织纷纷热衷于支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才是最根本和最理想的政府形式是很自然的。在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下，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魁北克的社会主义者也会成为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工会的领导人力劝工会成员投票给分离主义政党，即魁北克人党。

然而，投票并不是魁北克工人们最关注的事。正如 1919 年的激进分子，他们极力宣传与其直接敌人魁北克省政府对抗所能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和魁北克政府当时的目的，魁北克政府是诸多工会成员的第一根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72 年，3 个主要的工会，魁北克劳工联盟、加拿大工会联盟以及魁北克教师协会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同步的罢工，公开反抗政府的执政不力。50 年来第一次，“总罢工”一词在国内广为流传。

面对这样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抗力量，布拉萨政府做出了任何政府面临这种情况时都会做出的回应：希望通过向大众表明，法律的权威仍然在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公民手中并能为其所用而解决问题。国民大会通过立法让那些罢工者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当各工会公然反抗新的立法而继续罢工时，工会主要的3个领导人被抓进了监狱。有威胁说，会有糟糕的后果和后续的社会混乱。当然有混乱。1976年、1979年以及1982年均再次出现“统一战线”。政府每次都以相同的方式给予回应，不同点只在于1979年和1982年政府并不是由阶级敌人——自由党人掌权，而恰恰是由各工会在选举中无论好坏都支持的魁北克人党掌权。

其实，魁北克人党利用了布拉萨麾下的自由党人减退的运气。最初，看上去即使他们并非运气全无，也没减退太多。政府并不差，时代也很好，因为要举办1976年奥运会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而从中受益。这自然而然让人想到1967年的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无论是从本身看还是与对手多伦多相比，蒙特利尔的经济都很萧条，所以蒙特利尔人希望奥运会如他们所希望和需要的那样，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学家告诉联邦政府，蒙特利尔的腹地不够大。同时症结在于，虽然像蒙特利尔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这样的大公司的总部仍在蒙特利尔，但是他们的很多职能机构都已经转移到了多伦多。 455

奥运会即使不能扭转，原本也是用以掩盖这一趋势的，然而事实却未能如愿。相反，众多大型的奥运场馆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包括奥运匹克体育馆在内）都有一个严格的完工时间限制，这无疑成为了蒙特利尔和雄心勃勃的市长让·德拉帕（Jean Drapeau）的一个恶梦。德拉帕曾经向媒体坦言，奥运会不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可能性不大于一个成年男性怀孕的可能性。到了1976年，到处流传着德拉帕市长挺着大肚子走向奥运会的漫画。[①] 其实问题的很大部分在于建设施工的工会。

---

① 体育场最初的预算为3.15亿，但最终耗资13亿。它从未像广告上那样被使用过，而且当城市的主要垒球队、2004年世博会最终离开时，它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运动场。

他们觉得，只要做出一点点罢工的迹象，然后让政府知道，便可以要求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①] 为奥运制作纪念币的铸币厂也曾一度罢工。1976 年的加拿大，随处可见罢工的迹象。无需过多的想象，[②]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魁北克工人的状况只不过是全国工人的一个极端化表现。"和公众一起见鬼去吧。"一位邮政工会的领导人曾告诉记者。[③] 大众注意到了他所说的。[④]

发生在奥运会施工期间的邮政部门罢工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候，魁北克的航空管制员也参与到其中。他们的问题是语言。直到 1976 年，和国际惯例一致，加拿大领空的航空用语是英语。对于航线较多的领空，国际的一般惯例为使用通用语，而所有语言中英语的使用是最广泛的。但是在加拿大，语言却是一个政治性和实际性问题。魁北克的一组飞行员和航空管制员要求至少在某些时候在魁北克省的上空可以有使用法语的权力。联邦运输部长让·马尔尚（Jean Marchand）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是说英语的飞行员却不同意。虽然这次的罢工导致加拿大空中交通的短暂混乱，但是它却成功地打破了加拿大语言上的和谐。

456

布拉萨选择在此时举行一次省内选举。当时，他还没有完成 5 年任期的第 3 年，但表面看来他好像已经认为如果等待，他只会做得更糟。当时的省政府被问题困扰，包括对丑闻的控诉、学校和航空业关

---

① 体育场的工程师罗杰·塔伊贝尔（Roger Taillibert）很多年以后宣称布拉萨收买了建筑工会。在 2000 年 9 月 14 日《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的一篇由休伯·鲍赫（Hubert Bauch）所写的文章上，"塔伊贝尔责怪渥太华、魁北克"。塔伊贝尔被报道成抱怨关于"…小气的政治家、没有能力的地方工程师、不正当的承包人、建筑工会和对待他像对待被诅咒的法国人那样仇视外人且狭隘的魁北克人"。

② 在整个加拿大，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频频发生罢工的时代，或者看上去是这样的。超过 300 万个工作日在 1976 年第 3 季度中损失了，虽然只有 175 000 名工人涉足其中。与同年第 4 季度相比，后者又多出 100 万工人的罢工或停工。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停工的时间顺序角度，" www110. hrdcdrhc. gc. ca/millieudetravail _ workplace/chrono//index. cfm/doc/English.

③ 饱受质疑的领导人是加拿大邮政工会中的苏格兰人乔·戴维森（Joe Davidson）。

④ Linteau et al. , *Québec Contemporain*, vol. 2, 573. 公众意见通过重复公共部门的罢工给出了相反的评价。

于语言使用的问题、劳工骚乱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在这次选举中，布拉萨的竞选活动并不是很有效。多年以后，一个官员回忆道："讽刺和半真半假的言论被巧妙地运用。他们利用媒体对此事大肆渲染，因此产生了形象问题。"[①] 在这次选举中，自由党人以历史上的最少票数遭遇了一场彻底的失败，而且布拉萨失去了省总理之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 1939 年以来第一次说英语的团体从自由党中脱离，这是作为对布拉萨政府关于语言问题立法做出的回应。并非最后一次，布拉萨又一次严重地低估了自己冒犯英裔加拿大人的能力。由勒内·勒韦克领导的分离主义政党魁北克人党得到了执政的机会。

首脑之争：特鲁多和勒韦克

虽然在选举前的几周所有合理的迹象都表明魁北克人党将会赢得这次的选举，但是英裔加拿大人一直都没有期望过一个分离主义者的政府。特鲁多总理向加拿大人民保证，就政治上而言，分离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其直接影响是给了特鲁多政府一次重生。支持者要求总理尽快举行一次选举，但是特鲁多却畏首畏尾。相反，他用特遣部队回应，用以调查宪法的选择和各省的民声，从整体和一己的角度观察他们是否会在宪法改革中合作。改革在魁北克进展顺利，正如特鲁多看到的那样，没有放弃任何必要的联邦权力。这些措施都未奏效，而且在特鲁多有所作为之前，他的任期已结束。在 1979 年的联邦大选中，特鲁多输给了对手，也因此决定退出政坛。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由于对手乔·克拉克在 1979 年 12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意外落败，特鲁多于 1980 年 2 月赢得了选举。特鲁多的自由党在众议院中赢得多数，包括 75 个席位中的 74 个，他也依赖于此——这一事实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

457

在此期间，分离主义者也没闲着。省长勒内·勒韦克任命了一个

① 语出克劳德·福尔热，转引自 Bothwell，*Canada and Québec*，152 页。

很有才能的内阁，而且他们本身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反应出魁北克省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与知识分子相差无几的人已经加入了分离主义者的阵营。1977 年，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法语宪章》，新立法会会期的第一个法案。（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由于程序上的原因，它被命名为《101 号法案》［（*Bill 101*），并以这个名字被载入史册］[①] 该法案的主要作者以及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卡米耶·劳林（Camille Laurin）。法案无疑反应了他的情感。就语言而言，职业精神病医生劳林是一个强硬派，认为除非取消对于英语的不正常关注，否则魁北克不会恢复正常。[②]

宪章最前面是一份白皮书。在魁北克，公共场合出现英语被称为是令人“不舒服和尴尬的”，而《101 号法案》也就自然而然地尽量排除这种尴尬。除了极少数例外（如教堂上），英语标记都被禁止；在布拉萨言辞近乎无情的法律的强制执行下，双语标记也被禁止了，但给了它们消失的时间。在这个省中进入英语学校学习也被有效率地执行，只有父母就读过这些学校的子女才能进入——而且仅面向他们。来自国外的英语移民或者来自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只能就读法语学校。同时，如果想要获得专业资格，如护理，都要参加并通过确定的专业考试。强制“法国化”的过程在一种语言许可下被确立，这种语言许可被彻底给予了强制性。

在魁北克人党语言政策的改革过程中，对于魁北克省内外英国人的感受，魁北克人党政府几乎没有给予任何的关注。[③] 省外，说法语的少数人在教育方面所获得的机会比省内仍说英语的人获得的机会要少，即使在《101 号法案》颁布以后亦然。在省内，说英语的人成为

① Pierre Godin, *Rene Levesque*, vol. 3, *L'espoir et le chagrin* (Montreal: Boreal, 2001), 157 – 158.

② Jean – Claude Picard, *Camille Laurin*: *L'homme debout* (Montreal: Boreal, 2003), 247，关于《101 号法案》（*Bill 101*）的“治疗”效果，抚平由法裔加拿大人所造成的 1760 年征服引起的“创伤”。

③ Stevenson, *Community Besieged*, 144 – 151.

魁北克人党群众基础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①]（事实上，《法语宪章》的第1份草案被定义为说法语的“魁北克人民”。）在魁北克人党的好战分子的意识中，该党代表了说法语市民中的大部分，能够使其满足，而且也是勒韦克政府代表的大部分人。劳林甚至推翻了对其省总理勒韦克的温和反对，后者偏爱一种并非过于严厉的语言规范；但是劳林了解自己的总理，而且明白他不会坚持。[②]

在这样的环境下，《101号法案》实施得很顺利，就如当初预计的一样，但蒙特利尔的商业团体并没有重视它。作为蒙特利尔最著名的公司之一，巨大的总部占据着市中心的太阳人寿保险公司宣布要迁往多伦多。[③] 最突出的成效是对学校体制的明显影响。魁北克英语教学的学校数量急剧减少。1975至1983年间，英语学校的入学人数下降了53%。[④]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魁北克说英语的人群遭受了1971到1976年为数50 000人的人口损失，1976到1981年为106 300人，1981到1986年为41 600人。[⑤]

正如我们看到的，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减缓了——如整个西方世界那样。《101号法案》解决了一个问题——阻止了英语在省内的蔓延，同时也解决了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担忧。此时，英语要么适应，要么离开。许多人选择适应——到21世纪，约30%说英语者与说法语者结婚。在说英语的人中间，说双语的人数急速攀升。但是，还有一件事忘记提及：移民的稳定使得在说法语的魁北克，说法语的人数不断增加。

---

① Picard, *Laurin*, 250页注意到，部长非常确信，在他和母语为英语者间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妥协，因此还是像少数派那样行事比较好。

② 见作家兼评论家罗恩·格雷厄姆（Ron Graham）的评论，引自 Bothwell, *Canada and Québec*, 153页。魁北克人党看到《101号法案》的通过喜出望外，而且将其视为法语在一个说法语人口超过40：1的大洲的重要自我保护。Godin, *Levesque*, vol. 3, 221－222.

③ 事实上，劳林和太阳人寿保险公司总裁托马斯·高尔特（Thomas Galt）间存在着对抗性的会面。Picard, *Laurin*, 251.

④ Stevenson, *Community Besieged*, 185.

⑤ “由于省际移民，即来自魁北克以英语为主的人造成了净损失，”见 www. pco－bcp. gc. ca/olo/docs/reference/demodata_ e. pdf。1986年后，损失明显减少。

现在，人口统计学家担心的是别的事情。1970 年后，魁北克的人
459 口增长速度要落后于加拿大其他地区。这并没有让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们感到很不安，因为他们仅关注适用于魁北克一个省的数据。根据省内统计，1971 至 2005 年间，魁北克的人口从 614 万增长到了 760 万。无论与自身相比还是从比例上，比过去有更多的人讲法语。这是好消息。但是，1977 年，北美 1/40 的居民用法语，那么《101 号法案》实施后，到 2001 年，将变成 1/50。实际上，《101 号法案》确保了在一块减少的馅饼上，说法语的魁北克人能得到较大的部分。

1976 年，魁北克人党通过改变存在的理由，即争取主权而在选举中获胜。实际上，由于省总理勒韦克坚持“主权 - 结合”方案，即与加拿大的其他地区结成经济联盟，且保持政治独立，使得该党在党纲上被较多地限制。对于 1976 年的选举来说，主权独立又受到了更多的限制。选举魁北克人党来执政并不意味着会立即取得独立，相反，他们就魁北克是否应该和加拿大政府就独立主权问题谈判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只有在与加拿大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或者根本没有发生的情况下，魁北克人党政府才会提出魁北克省是否应该独立这一终极问题。与此同时，新政府也传达出这样一种观点：魁北人党并不是由一批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组成，它是头脑清醒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值得以授予独立的方式加以信任。

当然，到最后，魁北克人党不得不信守承诺，举行就魁北克独立问题的全民公投。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该党的竞选基础就将遭到破坏。日期定于 1980 年 5 月 20 日。

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政府又换上了新一届的领导人。保守党的乔·克拉克已经下台，而特鲁多却再次在大选中获胜，同时也带来了一大批说法语的部长，特别是能源部长马克·拉隆德和司法部长让·克雷蒂安。后者因为是非联邦主义者和其朴实而有力的演讲才能赢得盛名，成为特鲁多处理全民公投事务的主力。渥太华的政客们参与到这次的公投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当联邦政府的合法性被
460 质疑时，身为总理的特鲁多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

联邦政府也承认魁北克省全民公投的合法性。一旦勒韦克的独立议题得到大多数人的投票拥护，那么这就表明渥太华不再能控制大多数魁北克人对于联邦的拥护了。

联邦主义者或者说投“否”的阵营名义上的领导者是省自由党领导人克劳德·瑞安。他是一个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加拿大人。他自认为自己可能同时，也应该同时有两种身份。不是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特鲁多在这点上和瑞安几乎从未达成过一致。特鲁多坚信，一个强大且指挥国家事务的联邦中央政府正不断被离心的力量困扰。他认为，加拿大不应该仅仅只是各个省的联合，加拿大总理也不应该仅仅是侍者的领班，为每一个省服务。瑞安早已规划好一个缜密的，关于分裂加拿大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魁北克将起很大作用。特鲁多则认为，此前的力量平衡实际上只会削弱联邦政府的力量，从而使加拿大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存在。即便如此，乖戾和烦恼的瑞安最终还是意识到，如果没有特鲁多的号召和反对，那么他可能也就没有机会能够和勒韦克抗衡了。然而，虽然特鲁多一直主导着选举，但是他的干预却很少。

全民公投辩论的双方是对分离主义的反对者和对魁北克主权的拥护者。而分离主义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一样，拨动着人们预测未来的心弦。分离主义者对独立的魁北克承诺了很多事情，比如彻底摆脱来自英国的监护、恩惠以及同化。[①] 而联邦主义者把加拿大描绘成一个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国家，保护法语的使用，同时也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安全的经济避难所。一旦加拿大分裂，魁北克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将会受到威胁。那时候，英裔加拿大人往往相信经济争论将会获得成功，其他9省的省长肯定，讨论仿佛只有经济——而且它的特点，像联邦给予贫穷的魁北克补贴那样——能成为获胜的论据。他们并不理解分离主义的支持者相信如果魁北克独立，会发生经济状况的好转。 461

① 对这一时期气氛的较好描述见 Ron Graham，*The French Quarter*：*The Epic Struggle of a Family – and a Nation Divided*（Toronto：Macfarlane，Walter and Ross，1992），224 –229 页。

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于加拿大的分离主义者，魁北克就是产金蛋的鹅。[①]

然而，特鲁多呼吁共同的目标感，对加拿大的自豪感和加拿大的宪法能够被修改或将被修改的信心。（而且他还强调，在魁北克他的威望比勒韦克高的事实。根据当时的一句名言，特鲁多是魁北克人希望成为的人，而勒布克是他们所是的人。）[②] 之后，在蒙特利尔的演讲中，特鲁多做出了郑重的承诺。对于分离主义者和多数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宪法的改革仅仅意味着权力下放，虽然不是所有的权力，但也是更多的权力。这根本不是特鲁多的本意，但是他没有澄清自己的意思[③]。结果，当反对票的支持者以六四开的投票获胜后（大部分是说法语的人），特鲁多有望完成对宪法的修改——这是他并没有许下的承诺。特鲁多并没有实行修宪，这个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者便认为特鲁多是一个大骗子，欺骗了魁北克人民。当勒韦克发表退位演说时，他毫不留情地宣称投反对票的一方并未公平行事，同时也支撑了民族主义者的传奇，即分离主义的失败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

但当时投票的结果有约束力是无可置疑的。精疲力竭的魁北克人指望渥太华在宪法传奇中的下一轮表现。“勒韦克是一个政治庸才，”一位西部的省总理评论道，“与特鲁多进行较量取决于我们中剩下的人。”[④] 后来的事情取决于胜利者特鲁多。

特鲁多宪法

如果特鲁多在 1979 年最后一次卸任总理，他将会被作为风趣但政

---

① 民意调查显示，57% 的魁北克选民相信经济情况会改善或在魁北克的主权下保持原状。

② 53% 的魁北克人喜欢特鲁多，不喜欢勒韦克（22%）。如果只考虑说法语的人，这一数字是 46% 和 27%。Bothwell，Drummond，and English，*Canada Since 1945*，386.

③ Kenneth McRoberts，*Misconceiving Canada*：*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Unity*（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58，174.

④ 在 Robert Sheppard and Michael Valpy，*The National Deal*：*The Fight for a Canadian Constitution*（Toronto：Fleet，1982），42 页中有引用。

绩平平的总理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其执政期只会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和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间的桥梁。他将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像约翰·迪芬贝克那样没能抓住时机令国家变得更好。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乔·克拉克在1979年的大选中没能得到议会的多数选票和他此后的政治厄运——特鲁多得到了这一群体中最鲜有的 462 机会，正如1878年的麦克唐纳爵士和1935年的金。他们位居加拿大最著名的总理之列。特鲁多也能吗？

这样一来，特鲁多决定不再受制于程序。他不会为了地方或省份的利益做出让步——20世纪70年代他曾尝试过，但只激起了更大的胃口。[①] 他将通过再次修宪为这个国家留下印迹，一劳永逸地解决魁北克问题。附带地，他将通过巩固联邦政府的权力来维系加拿大。

特鲁多修宪的想法广为流传。他想从英国那里得到修宪权，自从1931年起那里便没有此项权力。（这一过程被称为调回本国，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如此，因为修宪权从不属于加拿大。）[②] 他想得到授权，但并非《美国权利法案》那样通过定义和捍卫自由授权给个人。他想在全国范围内——包括魁北克，通过巩固两种语言实现布拉萨建立一个全新且更美好的加拿大的构想。

加拿大的修宪涉及多个省份，需要从传统上认同任何使省级权力发生的改变。方案一旦获得认同，如同1941年的失业保险一样，联邦政府就将协议转交给英国的同级部门，然后呈递给英国议会关于《英属北美法案》的修正案。

1980年夏，特鲁多根据以往的惯例，派司法部长克雷蒂安到各个省会寻求各省总理对于宪法返还之权力授予的意义达成一致。但是，正如特鲁多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克雷蒂安发现除非给予各省让

---

① 在一些见多识广的萨斯喀彻温观察家眼中，20世纪70年代宪法协商的最终产物，即与各省的协议草案将产生“加拿大联邦主义的主要方向的改变……证明了以联邦权力为代价的省级权力。”见 Roy Romanow, John Whyte, and Howard Leeson, *Canada... Notwithstanding* (Toronto: Carswell - Methuen, 1984), 53页。

② 这一用法的的例子见 Bob Bennett: *A Mandarin's View*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2006), 140ff。

步，否则一致是不可能达成的。各省总理于 1980 年 9 月在渥太华时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电视摄像机前清楚地表明，特鲁多想要得到，那么公平合理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463 夏季时，联邦战略报告上的另一种方法被泄露给了媒体。如果各省能就修宪达到一致，建议特鲁多将省总理们引入巨大的失败，随即说明他们都不适合管理国家事务。特鲁多就应该简单地忽视省总理进行修宪，经过议会同意，在没有各省同意的情况下，呈递给英国政府。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它承认了大多数加拿大人对加拿大的忠诚是个人的，而且他们的身份并未被分割或能通过各省进行斡旋。[1] 因此特鲁多直接挑战魁北克“民族”，主要通过位于魁北克城的省政府表达观念、观点，但也会挑战所有其他宣布自己占首位的地区和省份。

特鲁多完全依计行事。他提出修正草案，令国会加以考虑，而且在委员会听证时，法律实质上得以修正，体现了对妇女团体、公民自由的支持者以及少数民族的考虑。[2] 他拉拢了 10 位省总理中的两位，一位是政治上机敏过人的安大略总理比尔·戴维斯（Bill Davis），另一位是无比聪慧的新不伦瑞克总理理查德·哈特菲尔德（Richard Hatfield）。两人都是激进的保守党人，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各省都不存在自由党政府。最顽固的反对来自纽芬兰、魁北克、马尼托巴以及阿尔伯达，它们与其他 4 省形成了“八省帮（Gang of Eight）”。它们立即向 3 个省的上诉法院起诉宪法修正案。最终，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受理了这起诉讼并于 1981 年 9 月做出判决。

判决令人困惑。法官判定的惯例支持各省的争论，即未经各省一致同意，不能修宪；但在法律上，特鲁多的做法在权力范围内。他可以将修正案带到伦敦，进行最终的裁决——如果他敢的话。直到戴维斯令特鲁多知道某种妥协是必要的，他才看到无风险的赌注；如果特

---

① 宪法专家皮特·罗素（Peter Russell）在他的 *Constitutional Odyssey: Can Canadians Be a Sovereign Peopl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111 页中指出了这一点。

② Lawrence Martin，*Chretien*，vol. 1，*The Will to Win*（Toronto：Lester，1995），299. 在 124 条修正案中，马丁观察得出，超过一半被采用。

鲁多不能做出那样的妥协，那么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将会撤销对于联邦制的支持，将对修正案在英国议会的最终通过产生致命影响。联邦－省级会议于1981年的11月在渥太华召开。看看联邦－省级间的外交能做些什么。 464

“八省帮”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稳固。几个政府动摇了，尤其是萨斯喀彻温，而且勒内·勒韦克与其他省总理之间也出现了分歧。勒韦克对谈判的失败饶有兴趣，但归根到底，其他省总理并不想这样。总有特鲁多是正确的可能性，而且各省的人民会优先考虑渥太华的目的，也总存在这种可能。最后，会有一场激烈的对抗。

特鲁多主持正式会议，顺利地通过公开让魁北克省总理与其伙伴发生争执智胜勒内·勒韦克。克雷蒂安在幕后操纵谈判，[①] 与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的律师罗伊·麦克默特里（Roy McMurtry）和罗伊·罗曼诺（Roy Romanow）共事，他秘密地设计了一个交易，能够满足“八省帮”中的7省。唯独只有一个省长对此事一无所知，那就是勒韦克。次日，勒韦克是普遍称颂新宪法声中显而易见的例外。在魁北克，至今仍有很多人将此视为另一次背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1981年11月，宪法的妥协给了个人一点儿他们想要的。特鲁多得到的最多——《权利和自由宪章》，这部宪章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源于他的草案，同时宪法的修订权被转给加拿大。宪章允许举国上下的公民可以用英语或法语接受教育——虽然相同的条约对移民并不适用。《101号法案》因此被修正了。

一方面，宪法修正案由几个持反对意见的省份制定，它是复杂且分层的认同，将使未来对法案的修改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任何省份，无论多大（如安大略）或者多么特别（如魁北克），对于以后的修正案都不具备一票否决权。当勒韦克在签署省级法律修正案时， 465

---

① 将勒韦克和其他人分开的问题是由特鲁多的公投提出的。前者忠诚于他的民主原则和他可能取胜的想法，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其他省总理则害怕他们会失败，认为这是政治毒药。

实际上承认了这点。最终设置了一则特殊的条款平息那些从传统意义上相信旧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人，他们迄今在加拿大仍存在。[议会至高无上的主要倡导者是马尼托巴的保守党省总理斯特林·莱昂(Sterling Lyon)]。国会和立法机构通常随意就他们的所选进行立法。如果未来国会或省级立法机关希望通过一部与《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相冲突的法律，只要引用“虽然”条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他们仍然能这么做。该条款的使用必须具体，并且每5年就要更新一次。但有些人认为，政府不会想要遭受因承认它正在侵害加拿大公民一般享有的权利或自由而带来的尴尬。

由各省——或者说是10个中的9个——同意并通过的协定并不是故事的结束。特鲁多必须使宪法通过英国议会，而且最终议会完成了特鲁多所期待的事，新宪法通过了。1982年4月17日是个阴雨天，这天伊莉莎白二世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正式签署宪法。心情大好的特鲁多在此旁观。

特鲁多的政绩

作为加拿大的总理，加拿大宪法及《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和修改方案是特鲁多最主要的成就。从特鲁多的角度看，可能正是该宪章使此前所做的事有价值。修改法案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意味着加拿大主权的完整，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回顾20世纪60年代，特鲁多主张，宪法对渥太华和各省间的分权是令人满意的。尤是魁北克，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权利。

特鲁多对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魁北克政府发展的妙招和传统要求失去了耐心。加拿大并非“两个民族”，魁北克和其他地区具有同等的地位。他对“特殊地位”的说法同样厌恶：这种说法在评论员间引起了一些混淆。的确，魁北克拥有与其他省份不同的合法特性，如它的民法或在立法机构和法庭上对法语和英语的同时使用。但如20世纪60年代或自此以后被认为的，“特殊地位”意味着魁北克应该享有比其他省份更多的权利，是在通向“两个民族”和资深的丹尼

466

尔·约翰逊对“平等和独立”观念的道路上的驿站。特鲁多深谙这个游戏规则，即伴随着与加拿大历史的特殊解释共存的“特殊地位”。这是一场他并没有做好准备的游戏。

加拿大也不是10个省份的叠加。联邦政府必须拥有成为国家政府所需的权利和能力，既要借助加拿大民族，同时也是为了加拿大民族。为了这个目的，特鲁多一直下放各省的权力。显然，如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他已准备考虑对各省的要求做出让步。

这并不表示特鲁多对于宪法的想法是矛盾的或他的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或无原则的。如果是，那么也是对其协商和妥协过程进行奉献的衡量。那次过程随着1980年选举的结束而结束。特鲁多认识到，将重大的权力转交给各省，只能刺激他们要求更多的权力和资金，每一次相继的决定都是下一次更高要求的平台。坚信对各省的让步是蠢事后，特鲁多在1980—1982年间对宪法最终协商的权力进行分配，维持了现状。

1982年修宪获得成功后，特鲁多和自由党人并没有壮大。1984年，特鲁多卸任，他的党派在接下来1984年9月的大选中惨败。74个自由党席位只剩下了17个。这是一种对特鲁多在任时表现的评价方式，但在大选中，通常没有单一的问题是支配性的。自由党在加拿大的其他地方比在魁北克表现更糟——特别是在安大略。在那里，他们的得票率更低。出现通货膨胀、极高的利率和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除此之外，政府还激怒了阿尔伯达、经济团体和传统的右翼分子。 467

特鲁多会因为很多事情被铭记。“他仍然缠着我们。”1990年，他的两位传记作者写道。[①] 如他的虚构英雄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特鲁多的潇洒、冷酷的魅力定格了他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成为了加拿大自我定义的一部分。2003年，在他死后第3

① Stephen Clarkson and Christina McCall, *Trudeau and Our Times*, vol. 1, *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0), 9.

年的民意测量中，他被称为“转型人物”。在社会科学意义含糊的用语中，这是对特鲁多很高的赞扬。[①] 他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他去世的消息和葬礼令人动情，大都是正面的。[②]

但是，正如詹姆斯·马什提及的那样，当特鲁多去世的消息出现在魁北克的最大报纸《责任报》的头版时，这样写道：“说英语的加拿大人的英雄”。[③] 在他的故乡，特鲁多的声望备受争议。任职多年的法裔加拿大总理1980年在省内选举中一举获胜，在全民公投中打败了受欢迎的总理，却在最开始的时候被人们断定为在任何法语选区都不可能当选，被流放到了魁北克最安全的说英语的选区——皇家山，从1965年到1984年。

特鲁多有意识地——有些人会说不自觉地——逆势而为，不会更甚于在魁北克的情形。特鲁多是一个知识分子，且总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在法国和说英语的加拿大地区。20世纪60年代，随着说法语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他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事实可能解释了他功绩中的力量和脆弱。它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最终运气不好的勒内·勒韦克仍在魁北克非常受欢迎并具有号召力。

---

① Daniel Schwanen, “Ranking Prime Ministers of the last 50 Years: The Numbers Speak”, *Policy Options/Options Politiques*, June – July 2003, 18 – 20.

② Michael Valpy, “Trudeau: The Response” *The Globe and Mail*, 4 October 2000.

③ James Marsh, “Pierre Elliott Trudeau,”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第十六章　80年代的繁荣与萧条



歌咏大会：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米拉·马尔罗尼（Mila Mulroney）、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夹在两名歌手中间，唱着《爱尔兰的微笑》（*When Irish Eyes Are Smiling*）。1985年3月17日，魁北克城。

471 20世纪80年代在1980年2月特鲁多再次当选总理的巨响中开始。随着"二战"后经济陷入最严重的萧条时期，这个时代在人们的抽泣声中延续。虽然特鲁多对魁北克的处理和对加拿大宪法的改革或许使他名留青史，但当时失业率的增长和利率的飙升同样令人愁眉苦脸。

特鲁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并不是导致萧条的原因。加拿大经济步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后尘，而且加拿大的经济政策与那些大国的经济政策类似，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由于深陷同样的问题，加拿大试图采取同样的解决办法。1981至1982年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人均收入随之减少，直到1984年才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实际上，西方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经济的衰退。在法国、德国等国，失业率从此居高不下。政府也助长了这样的发展。他们一再提高利率，以至于通货膨胀被从经济体制中去除。因此，虽然关闭工厂带来很高的代价，但政府最终还是打垮了零售业，降低了失业率[①]。

货币政策很少会成为选举中的热点，特鲁多及其部长们的注意力自然就会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由于伊朗革命，石油价格上涨，据称已达60美元一桶。这给加拿大"双轨制"的石油政策带来了问题，其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价格还不到国际价格的一半，而其石油是以国际472 价格销往美国的[②]。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联邦政府已经出现财政赤字，部分原因是因为要为双轨制补缺。那为什么联邦政府不可以从石油中获利，帮助偿还石油项目赤字，同时借机使加拿大在石油产业中享有更多主权呢？

特鲁多政府正打算要这么做，由于没能与阿尔伯达就油价达成一致（克拉克领导下的进步保守党政府的努力也失败了），政府在公布1980年10月的联邦预算时同时宣布了国家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

① Jeffrey A.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2006), 372-374.

② Brian L. Scarfe, "The Federal Budget and Energy Program, October 28th, 1980: A Review," *Canadian Public Policy*, VII: 1, Winter 1981, 1-14. 对加拿大能源危机的最佳研究是Bruce Doern and Glen Toner, *The Politics of Energy: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Toronto: Methuen, 1985)。

Program，简称 NEP)。渥太华自行设定了国内价格，并估计油价将从 1980 年的 16.75 美元一桶上涨到 1990 年的 66.75 美元一桶。这个计算预测到了国际油价的上涨，而且欧佩克将继续主导世界石油市场。补贴、特别定价以及税收激励三位一体使加拿大更愿意投入石油生产。渥太华自己有权在“加拿大土地”上对现有石油占地租金收取 25% 的利息（即“倒车对井口中心”），“加拿大土地”指的是沿海岸及联邦政府管理下的领地。渥太华改变了游戏规则，这让投资者很吃惊，也很失望，因为他们带着不同的期待把钱投入到了石油生产当中。换言之，外资石油公司常对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 – Canada）（即枫叶石油，成立于 1975 年）等加拿大公司有偏见，并因此被鼓励把石油卖给加拿大公司。联邦政府有权强加自己的意志，因为它控制着省际及国际贸易，并且声称有能力为“加拿大的和平、秩序及良好政府”立法。

其目标是让加拿大在能源供应方面有更大的控制权，让联邦政府享有油价利润份额，以及保持国有控股带来的利润。加拿大自由—民族主义领头机构“多伦多之星”称 NEP 是“一个综合的能源计划，以后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分红。它值得所有加拿大人支持。”①

阿尔伯达政府、石油产业及省政府都非常不看好 NEP。依照宪法，各省拥有自然资源的主权，因此有权便宜行事。阿尔伯达人认为，NEP 为了更富有、发展更好的中部地区的利益，对许多省区进行资源征用，那个地方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贫穷省区。西部对于人口较多的中部省区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安排国家经济事务的趋势一直抱有不满情绪。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施行 100 多年，使西部加拿大人相信，东部加拿大人更愿意靠着关税保护，高价卖出自己的产品，低价（国际价格）买进西方资源，而现在国际价格首次给西部产品高价，

473

① Editorial，“But a superb energy plan，” *Toronto Star*，October，29，1980，A4，引自 Doug Owram，“The Perfect Storm：The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and the Failure of Federal – Provincial Relations，” Richard Connors and John M. Law，eds.，*Forgiving Alberta's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2005）.

而东部一般是出于自己狭隘的最大经济利益考虑而作出反应。

阿尔伯达政府的政策也倾向于反映石油产业的态度，其总部大多位于卡尔加里（Calgary），而石油产业视 NEP 的利息支持为财产的充公。《埃德蒙顿报》称，“真正的冒险在于，既然渥太华倾向于充公和国有化，石油业和投资集团仍将觉得发展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是值得的。”① 来自阿尔伯达的彼得·拉菲德（Peter Lougheed）总理肯定得到了其省区内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削减了阿尔伯达的石油产量，而不是付钱给渥太华。“让东部那些坏蛋冻死在黑夜里吧”这样的保险杠贴纸就曾出现在阿尔伯达。

尽管众说纷纭，并且其中大部分争议是他自己引发的，但拉菲德并非极力反对向渥太华方面做出让步。毕竟，产量减少就意味着阿尔伯达收入的减少，而如果联邦政府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国际油价还会上涨，那么每个人都会有丰厚的收入。一系列复杂的计划正在酝酿中，使“新油”可以接近国际价格，而且会为省提供其他财政让步。于是，渥太华和埃德蒙顿签署了一项协议（萨斯喀彻温与不列颠哥伦比亚也签署了同样的协议。）②

1981 年的谅解未能维持太久，国际油价在 1980 年达到顶峰，之后持续走跌，到 1985 年，每桶价格低于 20 美元，而到 1987 年已降至 11 美元。收入也随之下降，这让联邦和各省政府都心灰意冷。投资商们已经响应了渥太华极具诱惑力的 NEP 刺激，并筹资投入能源领域，现在却发现自己的收入在下降，利息在上涨。破产成为阿尔伯达石油业的共同主题，而 1981 - 1982 年的经济困难及其后果，即使在 NEP 从法令全书中完全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实际上，即使从来没有 NEP，许多不幸依然会发生。1981 年以后，阿尔伯达的繁荣随着国际油价一路走低，同时石油钻井和探险团队也随之减少，而他们的离开是 NEP 瓦解的直接后果。NEP 导致的直

① Editorial, *Edmonton Journal*, 3 November 1980, A4, 引自 Owram, “The Perfect Storm”。

② Bothwell, English, and Drummond, *Canada Since 1945*, 451 - 454.

接后果也与其他事情的影响交织在一起，而对这些，渥太华束手无策。尽管如此，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还是 NEP，而不是市场的变化无常。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演练，NEP 几乎无可比拟，但它究竟是一出悲剧还是闹剧还待定。

到 1984 年，NEP 及其背后的猜测都是一片残局，特鲁多下赌注了，可是他输了，不仅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输得很惨，而其后果也是长远的。首先，这是自由党在 1984 年联邦竞选中失利的原因之一。西安大略只有两名自由党人当选，其中一位是新党魁约翰·特纳（John Turner）。当然还有其他后果。在西部，尤其是在阿尔伯达，NEP 成为 1917 年后的 30 年中与魁北克征兵问题一样饱受非议的问题。特纳死后，2000 年阿尔伯达的报纸完全忽略了特鲁多的大部分成就，只记得联邦干涉在石油问题上的原罪。

这种干涉，像反对党进步保守党鼓吹的那样，会与自由党一同销声匿迹。得胜的保守党领袖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宣称，“加拿大向商业敞开大门”。他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瓦解联邦政府对石油干涉和控制的残余。这让阿尔伯达欢喜至极——当然，1984 年马尔罗尼已经赢得了省内所有的席位，1988 年也将同样如此。这并没有让安大略不悦，即使当时双重价格的石油体制已经终结。油价较以前低，而且持续下降，而调整的难处因此不是那么尖锐。但是，马尔罗尼针对石油业采取的措施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却行不通。

475

马尔罗尼、政治与贸易（1984—1993）

马尔罗尼是第 5 位来自魁北克的总理。1891 年至 1892 年曾有另外一位讲英语的魁北克人出任此职，他是约翰．阿博特爵士（Sir John Abbott），但除了有个大专院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外，他已被遗忘了。马尔罗尼来自魁北克偏远的内陆地区，魁北克城最东部的圣劳伦斯河东段的北岸的贝科莫镇（Baie Comeau）。马尔罗尼是爱尔兰人与加拿大人的混血儿，在当地接受教育，大学就读于新斯科舍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他在那里把保守主义融入

到了他与生俱来的天主教信仰当中。据马尔罗尼以前的一个律师合伙人观察，马尔罗尼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那种永远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然而，马尔罗尼确实小有成就。[1] 他的法语已经很流利了，所以他最后选择就读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的法学院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在法裔加拿大人居多的拉瓦尔过得很惬意。马尔罗尼一毕业就搬去了蒙特利尔，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劳动法律师，但同时他还继续活跃在保守党圈内。

马尔罗尼很快掌握了劳动法，他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调解劳工的要求和管理层的顾虑。他很有魅力，有点冷酷无情，而且明显怀有远大抱负。他也熟悉公关技巧，因而知名度高，在 1976 年顺利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候选人。在败给乔·克拉克（Joe Clark）之后，他告别了当时的环境，开始出任加拿大铁矿公司的总裁，其名誉和财富都得到了提升。加拿大铁矿石公司是一家美资公司，主要业务是提取昂加瓦（Ungava）的原油，然后运往美国中西部的钢铁厂。他在蒙特利尔的业界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并在各地精心培养了一批保守党亲信。1983 年，他利用这些人把克拉克从保守党领导人的位置上拉下了台。马尔罗尼自然取而代之。

476

在加拿大的政党政治中，保守党是自由党的必然接班人。新的自由党领袖特纳并未赢得选民的好感，或者说他做得还不够好。选民还不能忘记对特纳及其政党 20 年来的失望。马尔罗尼在电视竞选中沉重打击了倒霉的特纳——这些事件在当时已成为联邦竞选活动的内容。马尔罗尼还带领其政党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选票，并在下议院的 282 个席位中赢得 211 席。特纳设法保住了自己的席位，但是作为这个被废弃的政党的领袖，他遭到了群众的谴责。这个党的席位几乎全部被第三党新民党（New Democratic Party，简称 NDP）占据。

如前所述，马尔罗尼出台的第一项商业法规就是要废除人所共愤

---

① 语出其律师合伙人 Arthur Campeau，引自 Peter C. Newman, *The Secret Mulroney Tapes: Ungrarded Confessions of a Prime Minister*（Toronto: Random House Canada, 2005），53 页。

的 NEP。但接下来怎么办呢？后来证明，政府的政策几乎是一纸空文，收效甚微。像大多数反对党一样，保守党的竞选口号是反对铺张浪费。为了查明真相，马尔罗尼也确实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由副总理艾瑞克·尼尔森（Erik Nielsen）领导。但铺张浪费的作用常常成为政界的化妆品，给权力的腐败抹上了一层胭脂。与社会公共项目支出等政府大宗款项相比，铺张浪费则不那么重要了，因此，马尔罗尼政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马尔罗尼试图安慰加拿大人民，他不会触动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项目，他确实没有这样做。因此，保守党不会改革公共财政。虽然保守党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内获得了利润，但他们发现自己困在巨大的赤字和通胀的政府负债中动弹不得。

马尔罗尼和他的部长们平静了下来，而丑闻的风声已经开始在其政府内传播。他们的政绩很少。加拿大武装部队有了新制服——在20世纪60年代被废除的老式的三军制服样式的基础上设计，同时，马尔罗尼的国防部长因为把可能含有国家机密文件的公文包落在了一间德资夜总会而被迫辞职。总理开始寻求一种新政策，这带有某种惊人的主动性。他希望这种政策能给他的政府带来目标和高尚的品格。

477

其中有一个与这个国家一样古老的政策：加美自由贸易。加拿大建国的部分原因就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拒绝与其自由贸易，在后来的50年里，这一直是加拿大政策中的热门话题，而在美国则并非如此。渐渐地，加美贸易关系不断改善。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出口美国的80%的产品都是零关税通过两国南部边境的。

加拿大贸易方面的联邦政府官员非常担忧。美国经济变得愈加脆弱，而且已不如以前那般辉煌。美国贸易常年出现赤字，而随着工作机会流向阳光更充足且没有工会的美国南部及西南部，甚至流向境外的墨西哥时，这个国家的工业中心地带，即五大湖南部地区，开始走向萧条。马尔罗尼不用人告诉也知道：从贝科莫港到克里夫兰铁矿石运输的下降说明，因为从国外进口，美国钢铁及其替代品产量已经开始下降。美国立法官员开始寻求新办法，以便在面临国外竞争时，保护本国制造商，而其中一些办法妨碍了加拿大的出口。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美国人限制其贸易，加拿大出口美国的 80% 以上的产品将味同鸡肋。

加拿大在美国并非没有朋友，其主要朋友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1 - 1989）。里根对加拿大知之甚少，但他喜欢自己所了解的加拿大。他之前在好莱坞当演员时的一些朋友就是加拿大人，如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和格伦·福特（Glenn Ford）。里根知道加拿大人一般都跟美国人很像，美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和平友好，而且与加拿大的贸易也很重要。作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里根也关注其另一个邻国墨西哥，他把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都纳入到一个被他称之为"北美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Accord）的项目当中。没有人，当然，他的下属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478

里根的主要兴趣在于战略，即在与苏联冷战带来的共产主义 - 反共产主义战线中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在这场分歧中，加拿大站在美国这边。虽然在特鲁多担任加拿大总理时，里根的顾问有时候会怀疑这一立场。特鲁多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才使加拿大站在了美国那边。

毫无疑问，马尔罗尼会站在哪一边。马尔罗尼出生在一个因美国人投资而富裕起来的小镇，他后来在铁矿石行业工作（虽然他在总部工作，和矿厂相距甚远），因此他对加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与美国交往的好处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在 1984 年的选举中告诉民众说，他想与美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他需要一些东西——一个想法、一个政策、一个动机——来支撑摇摇欲坠的政府。突然在 1985 年，他的公务员们提出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政策。确实，他在竞选过程中曾明确否定了类似的想法，但是他说服自己，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①]

与里根总统的高层峰会即将于 1985 年 3 月在魁北克城召开。后

① Newman, *Mulroney Tapes*, 189 - 190.

来，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加拿大总理与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的四重唱《爱尔兰的微笑》。这是一首感伤的歌曲，多年后它仍被视为加拿大知识分子低级品味的象征（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合唱并未给马尔罗尼带来坏处，实际上也没有在后来的选举中被反对党利用，这说明这种姿态在加拿大并非不受欢迎。马尔罗尼向里根提到，自由贸易是值得探讨的事，里根也表示同意。经过一个夏天的研究与准备工作，马尔罗尼与其内阁最终开始尝试谈判。1985 年 9 月，两国正式同意协商自由贸易，议会勉强同意了谈判程序的进行。美国法律规定，将来要达成协议必须做到两点：谈判必须在两年内完成，而且协议内容一旦确定，将会在议会进行投票表决，国会不能在最后关头做出任何修订。

479

马尔罗尼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自由贸易，即对这两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取消边境税。同样重要的或更加重要的是，马尔罗尼想用这个协定来处理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边境自由贸易的危险障碍。随着关税的减少，对国内相关利益者的保护越来越微乎其微，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生产商开始依赖“反倾销”立法，或用美国的说法叫“反补贴”。这个其实是加拿大人的主意，即很早以前的劳里埃的财政部长威廉·菲尔丁（William Fielding）的想法。为了防止倾销或受补贴的产品进口，加拿大国会制定了特殊的反倾销关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很敬佩菲尔丁的真诚，分别制定了各自国家的反倾销税，使之应用于所有非公平定价（倾销）或受到原产地国家不公平补贴的进口产品。

没有两个国家能在什么是倾销或什么是真正的补贴上达成一致。这个问题都留给了国家法律解决，而国家法律会因为国内压力而不时作出修改。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不仅有自由贸易，也是公平贸易。因此，美国能够带头促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扩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如果贸易体系或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偏激，那么还要保留这些贸易壁垒。

在理想情况下，美国和加拿大会废除各自的反倾销措施，但如果

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那么就要通过对那些极其专业和复杂的法规做出标准的解释来规范这些政策，于是马尔罗尼投票赞成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后来这一机制把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了一起。

480 马尔罗尼与加拿大没能如愿以偿。马尔罗尼把他大部分的政治命运赌在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实现上面。他任命加拿大经验最丰富、资格最老的谈判专家西蒙·莱斯曼（Simon Reisman）带领加拿大代表团。莱斯曼想达成一个综合协定，而且非常坚决。美国方面看起来却并非如此。他们可能在等加拿大让步，但没有等到。谈判一再拖延，以至于在 1987 年 9 月加拿大的谈判专家撤离，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这样一来，问题重新回到了双方的政治家手中。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有挽回的余地。很少有人会怀疑里根及其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想要看到一些好事发生，他们最终确实看到了。

1987 年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 FTA）促进了加美两国产品之间的所有余留关税的废除，也提供了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决定两个国家规范贸易的法律是否合理，但其法律效力有限。美国可以任意修改法规，而且所有迹象显示议会不可能会不同意。马尔罗尼及其顾问认为这个协定是一个胜利，政府也希望能在国会马上通过。

对于政府来说，是机遇甚至是救赎办法的，也是反对党自由党的机会，当时自由党由前总理特纳领导。特纳不喜欢这个协议，而且知道它不能保护加拿大或加拿大人的利益不受美国法律将来做出修改带来的影响。他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其党派对立，其自身地位不稳固。但他确实还有一个优势，自由党在任命产生的参议院中占多数，遂利用这一点来阻止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马尔罗尼被迫参加了投票，其中自由贸易是主要议题。

投票于 1988 年 11 月 21 日开始。刚开始时自由党似乎是在尽力断送自己的选举，一些杰出的自由党人士甚至为了增进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在选举还在进行时建议特纳辞职——这肯定是加拿大政治史上这些严肃的政客们所提出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魁北克的自由党政

481

府同意自由贸易，分裂派也持肯定态度，因为协定减少了渥太华对贸易的控制，为魁北克出口提供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市场。联邦政府对魁北克的支持相应就减少了。[①] 新民党主席声称，自由党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党派会接任反对党，接管加拿大的轮换政治体制并最终接管政府。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特纳在竞选活动中的表现，特别是他在领导人电视辩论赛中的表现。

世事难料，命运无常，特纳在辩论赛中打败了马尔罗尼。他认为，加拿大代表了政治打败地理的胜利，有意识地建立横跨北美大陆的东西轴心抵消了南北贸易的自然吸引力。马尔罗尼建议，结束并替换这种依赖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总理这种激动的抗议淹没于特纳充满说服力的说理当中。

自由党通过聪明的电视宣传进一步扩大了辩论赛带来的胜利。最有效的一段广告是，通过两位谈判专家之间的一段谈话描绘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据“美国的”谈判专家称，只有一句需要修改。惊讶的“加拿大人”回答说，是哪个。是这个——画面显示美国人指向边境。民意测试显示，群众情绪马上发生逆转。自由党支持率激增，而马尔罗尼的保守党则支持率狂跌。“针对自由贸易的指控及其带来的恐惧变得越来越无法容忍，”马尔罗尼的一位支持者后来说道。[②] 加拿大的恐慌被大大激发。自由贸易现在已明显失败。

保守党的还击说明了什么是有效的政治手段。钱不断地从惊慌失措的商人团体手中涌入这个党派的金库，他们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决拥护者。新的保守党广告上描绘了“据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人”（实际上是保守党工作人员）如何贬低特纳，说他是个骗子。通过上百种巧妙（和笨拙）的方法，加拿大人被告知他们的富裕甚至工作都岌岌可危——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工作，因为 X 生意或 Y 工厂无法再在加拿大待下去。即使有些产业和领域因为自由贸易处于不利地位，保守党 482

---

① 特纳的自由党确实得到安大略自由党政府的支持，后者强烈反对自由贸易。

② Derek Burney, *Getting It Done: A Memoir*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8.

许诺，他们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当然是在选举过后了。现在轮到保守党领先了，并且一路领先到选举当天。

11月21日，保守党在下院中赢得多数席位（169席，自由党占83席，新民党为43席），而且国会一旦召开就能顺利通过自由贸易协定。① 国会适时地通过了必要的立法。1989年1月1日，马尔罗尼和里根签署了文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马尔罗尼设法使立法得以通过，而且成为第二大党，虽然他只赢得43%的民众选票。他将在接下来的4年当中继续担任总理。特纳竞选失败，这是他作为自由党领袖的第2次失败。个人习惯和好恶决定了他的离开。他适时地辞去了职位，1990年被政党代表大会取代。尽管如此，自由党总席位已经翻番，在全国选票中赢得了可观的份额，并保留了轮换政府制度。新民党才是选举中的真正失败者。尽管他们在议会中的总席位数为历史最高，他们还是错过了取代自由党的机会。如果保守党之星陨灭，那自由党就会在下次竞选中占据优势。

1987－1989年的FTA并非马尔罗尼在贸易政策上的最后成就。美国也想与其另一个邻国墨西哥签订贸易协定，在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总统（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的带领下，谈判已经开始。加拿大政府最初不愿加入，但后来改变初衷，参与到后来被称为三方谈判的商讨当中。② 加拿大这个决策背后的理由很直接——相比以美国为轮轴、其贸易伙伴为辐条的辐射状关系，加拿大更喜欢三边贸易关系。然而，正如有位观察家说的那样，加拿大在贸易对话中是个“不太积极的参与者”。③ 然而，为了能参与对话，加拿大要依赖马尔罗尼总理与布什总统亲密的私人关系。布什后来写道，马尔罗尼“善于交际而

483

① 保守党在魁北克大获全胜，得到63个席位，而自由党是12个席位，前者甚至在安大略以46个席位险胜自由党的43个席位，尽管在安大略省，自由党赢得更多的普选选票。

② Maryse Robert, *Negotiating NAFTA: Explaining the Outcome in Culture, Textiles, Autos and Pharmaceutica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29－31, 33－35.

③ Donald Barry, "The Road to NAFTA," in Donald Barry, Mark Dickerson, and James Glaisford, eds., *Toward a North American Community?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0.

且很有幽默感。”在布什看来，马尔罗尼是“加拿大强有力的领导和美国真正的朋友”。[①] 承认加拿大或纳入加拿大的决定是布什做出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加拿大，也是为了他的朋友马尔罗尼。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直到 1992 年底才结束，协定得到正式批准耗时甚至更长。NAFTA 是 1992 及 1993 年美国和加拿大大选的一个热点。它可能还帮助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 1992 年打败老布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而且促成了 1993 年加拿大进步保守党的失利。考虑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墨西哥比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都要低很多。结果，就像美国一位政治家说的那样，如果工作机会从高工资且高管制的北部经济中消失，流入南部低工资的文化环境中时，会出现“很大的吸气声”。确实，墨西哥的政治和体制文化与加拿大和美国有云泥之别。民主制的墨西哥方式是一种新现象，因此也很脆弱，人们对于法律在墨西哥的实施力度也持怀疑态度。

在最初的加美条约或后来的 NAFTA 中，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除了降低关税，建立贸易法实施的评估和申诉机制，协议还要处理能源及投资问题。在加美协议中可称之为反国家能源计划的条款中，双方都承诺不会缩减对另一方的能源供应。另外，如果不得不减少供应，将会依据现有贸易模式按比例分配。[②] 同样，一旦联系建立，两国对另一方的投资者承诺“国民待遇”。这就意味着国家能源计划“倒车对井口中心”条款将来都会被废除。另一方面，按比例来说，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要大于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基于这个事实，加拿大南部边界的投资者就享有一些额外的保护。 484

NAFTA 协议中第 11 章有 1 条备受关注。这个条款允许非本国投

---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62 –63. 然而有趣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墨西哥都没有在布什的回忆录中被谈到。

② Bruce Doern and Brian Tomlin, *Faith and Fear: The Free Trade Story* (Toronto: Stoddart, 1991), 121 –125, and Michael Hart with Bill Dymond and Colin Robertson, *Decision at Midnight: Inside the Canada – US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Vancouver: UBC Press, 1994), 377 –378.

资者（在加拿大，它指的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政府法规干涉其可能获得的利益时，可以提请损失诉讼。三国的投资者都用这个条款在环保法规方面压榨政府赔款，或者迫使政府废除这样的法规。矛盾的是，国内的公司得不到这种赔款——只有 NAFTA 规定的另外两个国家的投资商才可以。至少对于最初参与 NAFTA 的谈判专家来说，这样的别有用心让人惊讶。正如美国谈判副主席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我能想象你们是怎样把那些字眼单拿出来，然后说，嗯，看，生意上说的是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如果你采取管制，使我利润减少，那么你就要赔偿我的损失。我不觉得这是我们的初衷。”①

起初的自由贸易协定和 NAFTA 给加拿大经济带来的灾难比反对者预计的要小，也很可能比热心的自由贸易商所期待的好处要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酒商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的葡萄酒生意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日渐兴隆。事实证明，竞争也可以是有利的。“1989 年，我曾公开说过，自由贸易真的会损害我们的企业，”安大略一位家具制造商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本该私底下说让我们的产业独立站起来是有必要的——也确实是有必要的。现在（1999 年）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没有自由贸易，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每个公司都这么幸运。安大略 1/3 的家具制造商都破产了。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公司会关闭他们在加拿大的仓库，或在加拿大的分厂。加拿大市场现在是为边境以南服务的。但总体看来，贸易和出口都有所增长，因此到 1998 年，“（安大略）国内生产总值中有 40% 的惊人比例”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在 1989 年还只有 20%。魁北克亦然，其向美国的出口经历了“巨幅增长”。但制造业的就业率下降

485

① 查尔斯·罗（Charles Roh）在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美）公共广播系列节目 *NOW* 中接受采访时所言，2002 年 2 月 1 日。www. pbs. org/now/ transcript / transcript_tdfull. html. 另见 Stephen Clarkson, *Uncle Sam and Us: Globalization,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Canadian Stat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227 - 228，348 - 351 页。

了 10%。[1]

FTA 及 NAFTA 确实给加美贸易带来了秩序和可预测性，这部分要归功于纠纷调解机制。而且由于 NAFTA 的第 11 章，它们也有不明确的地方，三国的政府和各政治阶层就要讨论如何或者是否可以施加必要的权力来施行污染标准等法规，或管理邮局等政府企业——这是第 11 章给加拿大带来的主要挑战。

纠纷调解委员会能做的不多。他们可以解释现有法规，但肯定不能限制国家立法机构或国会通过的法律。最臭名昭著的是加美的软木之争，但是类似案例并非仅此一件。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建筑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拿大的软木出口，在加拿大各省的土地上采伐后，送往南部，迎合美国郊区的需要。（软木一般是松木和云杉。）加拿大各省采用各种体制，使得木材公司可以采伐木头。其中一些措施，比如在滨海诸省，与美国常用的一些措施类似。其他省区，尤其是魁北克、安大略、不列颠哥伦比亚都征收一种叫做“立木”的费用，即木材公司为了获得在公共土地上砍伐树木的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

问题在于，加拿大的软木与美国相比极具竞争力。加拿大的出口也引起了美国木材公司的愤怒。1982 年，在 FTA 出台之前，美国企业联合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含补贴”的加拿大木材。他们的请求以失败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相反，愤怒的美国人成立了一个更有效的特殊利益游说团体，重新提出 1986 年的要求——当时给 FTA 谈判带来了极大不便。这次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反补贴，即向加拿大出口木材征收的关税（但不是针对滨海诸省），而且事实上，假如他们没那样做的话，对议会将来通过 FTA 造成的麻烦也许会更多。这给马尔罗尼制造了麻烦，因为软木案表明和突显了自由贸易协定解决不了的问题。迫于压力，加拿大在 1986 年同意征收出口税，1991 年到期，

486

[1] Steven Pearlstein, “10 years later, Canada Sharply Split on Free Trade,” *Washington Post*, 29 June 1999, E01; John McCallum，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师（后来成为自由党内阁大臣），“Two Cheers for the FTA,” Royal Bank of Canada Economics Department, June 1989。

然后在1996年商讨另一个出口税。当它在2001年失效时，论战再次继续，除非有一方投降，否则没有解决的可能。即使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他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都能与大多数加拿大人取得一致，但他同时也是一座软木种植园的老板——他认为，加拿大的立木行为是一种变相的补贴，用来保持加拿大木材业实现充分就业。①

美国木材商人游说团的势力和政治影响说明，它能支配美国在软木方面的贸易政策。加拿大可以通过最初的FTA、后来的NAFTA，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来向贸易法庭提出诉讼，但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加拿大必须要么接受美国的关税，要么就要实施本国的出口关税或严格限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大概是1/3）。如同在贸易和关税纠纷中普遍出现的情况一样，消费者的利益大多被遗忘，因为他们太过分散且没有影响力，因为美国关税是一种间接的、隐藏的税收，也因为美国木材联盟可以把他们的游说工作和影响力集中在从大西洋（佐治亚）到太平洋（华盛顿）的各州。结果，加拿大人的反应可能是气喘吁吁（他们确实是这样），并祈求自由贸易神明的愤怒能降临到美国人身上。加拿大人没有在美国竞选中参与投票。自由贸易大部分还是自由的，美国政府对FTA纠纷调解机制的许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例外——软木。②

联邦政治的毒害

马尔罗尼第2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是改革加拿大的联邦主义。如果他有什么显著的能力，那么就是能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或者说诱骗他们达成原来被其忽视或拒绝的妥协，并且使之自行解决。这样联邦和各省的关系似乎得到了改善。

487

① Jimmy Carter, "A Flawed Timber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rch 2001.

② 2006年，新上任的哈珀政府与布什政府在软木出口上达成一项协定。它征收出口税，力图放弃加拿大的法律诉讼，归还美国对加拿大软木进口已经征收的——可能是非法的——50亿美元中的40亿美元。加拿大的木材生产商总的来说不太高兴。

如果政府各级部门不能达成大量的妥协，加拿大的联邦政治就不能发挥作用。不经省级部门的同意和合作，有些联邦权力就不能实行；而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有些省区的责任也得不到发挥。与此同时，所有省区或一些省区与联邦政府之间总是存在竞争。19世纪，联邦与省间的纠纷集中在安大略省。安大略是最大、最富有的省，其自由党政府与麦克唐纳爵士领导的保守党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从水力发电到与马尼托巴的省际边界之争，都要一争高下。在20世纪，渥太华与草原各省争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与安大略争夺水力（这是第2次，而且以后长期争战）；20世纪30年代就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与魁北克发生分歧；对渥太华是否有能力对各省司法部门做出支出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1960年以后，魁北克成为联邦－省区问题的核心。我们已经看过特鲁多在魁北克的政绩，但他确实成功修改了宪法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此举团结了各省，也加强了联邦政府。实际上，特鲁多对总理勒内·勒韦克的挫败如此沉重，以至于他麾下的政府官员针对目前要采取的对策争论不休，政府也分立瓦解，独立不再是一个备选答案。勒韦克于1985年10月辞职，由其部长之一皮埃尔·马克·约翰逊（Pierre－Marc Johnson）继任。约翰逊的任期很短，他是20世纪60年代的全国同盟主席的儿子。1985年12月，约翰逊被罗伯特·布拉萨（Robert Bourassa）领导下的复兴起来的省内自由党赶下台。布拉萨结束了其在野生涯和在欧洲的流亡生涯，回到加拿大，领导自由党。布拉萨在欧洲研究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下属机构。他总结道，与加拿大其他地区合作的机构和合作的政策能使魁北克获利，而分裂则不然。另一方面，布拉萨从未认同过特鲁多的联邦制方式，而且他下定决心，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扭转特鲁多的遗产。这种遗风被很多魁北克人看作是一种中央集权。 488

马尔罗尼被布拉萨的看法所吸引。与其他大多数母语为英语的魁北克人一样，他也曾鼓励各省的自由党人士支持联邦主义，反对分离主义，但到1984－1985年，他不再喜欢特鲁多及其魁北克政策。他认

为，驱赶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联邦政治，只要妥协条件合理，民族主义分子就会满意。要是有好的搭档，他的表现会更好，而布拉萨就是那个搭档。

布拉萨称，特鲁多1982年的修宪手段合法但不合理，因为它并没有被当时的魁北克政府承认或经魁北克立法部门批准。他和他的司法部长吉尔·勒米拉得（Gil Remillard）提议，这个缺口可以通过把包含5个条件的宪法在魁北克的获批换取对宪法的修订来补全。这5个条件是，承认魁北克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恢复魁北克对宪法修订的否决权，1981年作为勒韦克宪法谈判失败的一部分，被其出卖；魁北克在移民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名义上讲，要有更多的魁北克移民以平衡英语区）；减少联邦采购支出（不再出现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医疗）；省参与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马尔罗尼和他的部长们细心地游说各省。西部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阿尔伯达，那里的参议院改革已经成为平衡人口众多的东部和资源丰富的西部的万能药。这里的弦外之音是说，“不要再有NEP了”。这本可以由一个“三E的参议院”来阻止，即平等的（Equal，各省参议员数目相等）、选举的（Elected，不受现任总理的控制，可以更加反应需要）、有效的（Effective，更像美国的参议院）。这后来形成了一个叫“三个E”的口号。有位热心的农民在他的农田里精心耕出了这一口号，即使天上的飞机也能看到。马尔罗尼劝说阿尔伯达的进步保守党领袖丹·盖提（Don Getty）先解决魁北克的事情，然后再处理阿尔伯达的议程。

489

首脑会议于1987年的4月在政府位于渥太华北部的加蒂诺山（Gatineau Hills）脚下、魁北克的米奇湖（Meech Lake）乡村退休胜地召开。马尔罗尼想获得对魁北克5个条件的支持，而他也确实如愿了。这毫不奇怪，因为马尔罗尼向各省区做出了重大让步。联邦政府把最高法院与参议院提名人选的权力移交给了各省区。因此，总理只能在各省总理提交的名单中任命法官和参议员。如果有需要，魁北克可以否决宪法修订案，但是其他各省也都可以如法炮制。而且为了确保此

次宪法不是最终修订，省总理与联邦总理——“第一部长们”将会每年集会，讨论宪法。所有这些都说明加拿大的宪法更像是一个万花筒。魁北克被特别认定为“独特的社会”，这种措辞出现在宪法修订案的前言部分。针对这一定位是否会在后来的条款解释中给与魁北克特权地位，专家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但肯定是有可能发生的。

虽然修订案直到后来在 6 月份于渥太华召开的另一次大会上才被最终通过，但修订案是以米奇湖命名的。马尔罗尼凭借着他强有力的谈判技巧，使一个又一个的省总理站到了他那边。最后被攻破的是安大略的自由党省总理大卫·彼得森（David Peterson），但最终彼得森也被说服了。他说为了国家统一，他应该同意。（彼得森对魁北克要怎样维护“独特的社会”有些疑虑。）1987 年 6 月 3 日黎明时分，马尔罗尼通过一个使人眩晕的媒体宣布，针对宪法制定召开的“魁北克回合”谈判已经圆满结束。省总理们这时则踉跄着回到旅馆，准备上床睡觉。

米奇湖是一次信心与信任的举动：对魁北克的信任、对各省的信任、对善意的信任——在反对者眼中却是盲目的信任。他们马上就站出来说话了。特鲁多是《米奇湖协议》最尖刻的批评者。他在法国和英国均谴责这个协议，说联邦政府在代表加拿大利益方面的软弱无能让人忍无可忍。“除了把司法权的很多重要部分拱手让给各省外（购买力、移民等），”特鲁多在《新闻报》（*La Presse*）和《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上写道，“除了削弱‘加拿大权利宪章’，加拿大政府还将立法权（参议会）与司法权（最高法院）让给了各省，并且这些权力将不会有希望被再次拿回来（即宪法规定，各省有否决权）。而且，它许诺召开宪法的“第 2 轮”会议，到时候各省的要求将主宰会议的日程。”①

490

在一次国会联合委员会讲话中，前总理严厉抨击米奇湖会议，说

① Trudeau, “Say Good - bye to the Dream of One Canada,” *La Presse*, *Toronto Star*, 27 May 1987.

那次会议是没有逻辑的，其支持者都是无能之辈。令委员会成员愤慨的是，特鲁多对米奇湖的政治出身是这样描写的，但用另一个报刊评论员彼得·杜鲁门（Peter Trueman）的话说，当今这一代加拿大政治领导人最多可以说是“非常平庸……他们当中有些人我们都不会让他们进客厅。”①

起初这些批评几乎无关紧要。联邦总理和省总理们同意，协议必须被全盘接受，不能进行修改，除非是针对事实部分，即如果草案有错误的话。联邦三大党，进步保守党、自由党和新民党认可《米奇湖协议》是好事，其内容对于国家统一来说至关重要。在各省的三党成员——至少是管理各省的党派——看法也相同。在渥太华和各省也有这样的听证会，但委员会成员被告知只能知道一下内容，不能到现场听证。

《米奇湖协议》必须按宪法规定的原则得到批准。这种修订必须取得全体一致同意，因此必须由联邦议会和各省立法机关通过。而且修订协议必须在获得一个省批准后的 3 年内通过——这次是在 1987 年 6 月 23 日在魁北克省获得批准的。

距离期限还有 3 年的时间，刚开始甚至能听见宪法的时钟在滴答作响，但只有 1987 年 6 月当政的政府同意了《米奇湖协议》。这批省政府中的第 1 个在 1987 年 10 月消失了，当时新不伦瑞克的进步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被抹掉（名义上确实如此——省总理和其党内成员被反对党自由党打败）。新总理弗兰克·麦克肯纳（Frank McKenna）并不支持《米奇湖协议》，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表明他也不是真地反对。马尼托巴政府也参加了选举，但被一个三党联合的少数党取代，而自由党从特鲁多那里得到信号，开始对其表示蔑视。像新不伦瑞克一样，马尼托巴政府也推迟了问题的讨论。

其他省一个接一个地陆续批准了《米奇湖协议》。看来，马尼托巴和新不伦瑞克最终也必须如法炮制，但在 1989 年 4 月出现了一件怪

491

① Bothwell, Drummond, and English, *Canada Since 1945*, 397.

事。纽芬兰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在民意测验中被克莱德·韦尔斯（Clyde Wells）领导的自由党打败。后者是宪法律师，也是联邦权力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米奇湖协议》不仅会削弱联邦政府处理省内重要问题的能力，而且会削弱纽芬兰在全国舞台上的影响力。他承诺，会撤销纽芬兰对《米奇湖协议》的批准。事实证明，他言出必行。纽芬兰的立法机构在1990年4月5日撤销了之前对《米奇湖协议》的批准。①

现在还有3个省区没有批准《米奇湖协议》。压力达到顶峰，但马尔罗尼似乎漫不经心。他在压力面前表现得更加强大，尤其是他会把压力转嫁给他人。有人听到风声，拒绝通过《米奇湖协议》会冒犯魁北克，使其放弃联邦主义，使这个国家面临危险。只有《米奇湖协议》能使魁北克的宪法走向合法。魁北克省内的马尔罗尼、布拉萨及其支持者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米奇湖协议》通过的期限，即1990年6月23日渐渐逼近，公众情绪因为媒体的推波助澜，变得更加惊慌失措。②

在新不伦瑞克，麦克肯纳害怕了，于是批准了《米奇湖协议》。现在还剩下两个顽固分子——马尼托巴的少数派政府和纽芬兰。省总理们被请到渥太华，成群的记者聚集在那里，紧闭的大门背后危机四伏，电视上充斥着特为专栏预留的富有危险信号的无数报道。 492

最后，韦尔斯和马尼托巴代表团（马尼托巴的3个党派都出席了）表示让步。他们会把《米奇湖协议》递交给其立法机关，在当时过分热烈的形势下，人们估计投票结果应该会通过议案。

马尔罗尼欣喜若狂。《米奇湖协议》顺利通过势在必得后，他在

---

① 在纽芬兰批准《米奇湖协议》“撤销”之前，马尔罗尼与纽芬兰省总理韦尔斯的谈判几乎没有浪费时间。Andrew Cohen, *A Deal Undone: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Meech Lake Accord*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1990), 224.

② James Winter, “The Media, the Meech Accord, and the Attempted Manufacture of Consent,”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Revue electronique de communication*, vol. 1, no. 2, Winter 1991. 毋需一定认同温特明显的左倾立场，即有证据表明其报道政府时的偏见及对米奇湖的偏爱，特别是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频道中，这些体现得尤为强烈。

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时说，“一个月前我就告诉了［我的顾问们］［下次见面的］时间。这就像竞选一样，你是倒计时的。［我说］，‘那就是我们掷骰子的那天’”。[①] 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公开的沾沾自喜从来都不是谨慎的行为；而过早的沾沾自喜肯定是下策。“为国家的前途掷骰子”提醒了很多加拿大人，他们的总理经常不必要地自吹自擂，而且他对如何统治这个国家也只有肤浅的理解。

马尔罗尼试图挽回损失。他访问了圣约翰斯，再次鼓励纽芬兰人和他一起掷骰子。但为时已晚，在马尼托巴亦然，一位克里族新民党立法机构成员拒绝全体一致通过，但这是《米奇湖协议》获得讨论和通过的必要条件。于是，协议被废弃。

马尔罗尼和布拉萨种下了祸根，招来了满天乌云。暴风雨来临时，没有人感到惊讶。魁北克的政客——除了特鲁多和他的一些支持者以外——实际上是一致同意的，《米奇湖协议》的失败被认为是英国人及其长期忍受魁北克人的盟友所端上桌的最新的，也是最严重的耻辱大餐。[②] 于是发生了群众的游行示威，现在由分离主义分子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领导的分裂派反对党控制了议程安排，布拉萨对《米奇湖协议》也无计可施。在渥太华，马尔罗尼的党派分裂了，他最能干的一位部长卢西恩·布沙尔（Lucien Bouchard）拍屁股走人了，还表达了其对分裂派的同情。

493 自由党碰巧在卡尔加里召开了领导层会议。其中一位候选人小保罗·马丁（Paul Martin Jr.）是支持《米奇湖协议》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支持者指控他的对手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是英国人的“vendu”，即销售品，而当克雷蒂安胜出后，一些马丁的魁北克支持者离开了他，加入了布沙尔的阵营。结果，一个分裂派政党魁人政团党（Bloc Québecois，简称 BQ）首次坐在了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上。

---

① Susan Delacourt and Graham Fraser, “Marathon Talks Were All Part of Plan,” PM says, *The Globe and Mail*, 12 June 1990.

② 一个普通、冷静的魁北克学者对作者这样说：“我们说‘我们爱你们’，而你们（英国人）却说‘走开’。”

马尔罗尼时代的结束

马尔罗尼政府还苟延残喘了3年，但那是痛苦的3年。总理在米奇湖事件后一直试图喘口气，却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因为蒙特利尔北部及南部的战略储备，莫霍克人掀起了骚乱。骚乱是因一次土地财产纠纷引起的，莫霍克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隔离，而且被不当地利用。开发商建议在原住民公墓上建一个高尔夫球场。事件的发展接下来是对质、警察干涉以及暴力冲突。在冲突中，魁北克的省警，即魁北克省警局被击溃。一名省警在枪战中丧生。莫霍克人封锁了通往他们后备区域的省区道路，其中包括一条从蒙特利尔南郊到蒙特利尔岛的主干道。省总理布拉萨在他的任期内第2次呼吁加拿大联邦军队的干涉，后者及时地派来了军队。莫霍克人与士兵怒目而视，冲突升级，于是发生了扔石头事件。幸运的是，理智和时间的流逝最终占了上风：封锁被清除，高尔夫球场没有建起来，生活或多或少恢复了正常。

这是一种变态的正常状态。《米奇湖协议》和以马尔罗尼为首的领导层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了与其初衷完全相悖的效果。魁北克动荡不安，这是谨慎小心的布拉萨不愿看到的。布拉萨与时间赛跑，任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发布时间期限的最后通牒，并威胁说要针对分裂派展开公民投票，以此给激动而失望的群众一个发泄的渠道。马尔罗尼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基思·斯派赛（Keith Spicer）担任主席，在全国巡回，让加拿大人“发泄”愤怒。 494

针对布拉萨的期限之一，马尔罗尼和省总理们试图采取新一轮谈判。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叫做《夏洛特敦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的文件，是以其诞生地命名的。《夏洛特敦协议》佶屈聱牙，而且很可能无法施行，但这毕竟是一个协议，而且魁北克也在其中，加拿大政府领袖也大力举荐。在1992年10月的公民投票中，协议被否决，在魁北克遭到否决，在整个加拿大亦然。宪法不会被修改，马尔罗尼和布拉萨也不会被视为加拿大或魁北克的再生父母而名垂青史。

马尔罗尼也是另外一项重大改革的倡导者。几十年来，加拿大政府对生产商征收联邦营业税。人们普遍认为，这项税收没有效力且对加拿大制造业有害，造成其发展不良。它也没有带来足够多的收入，但即便如此，政府也需要它——马尔罗尼政府每年都出现赤字，他效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语国家中成为财政和经济改革明灯的新西兰，建议采取更加综合、全面的联邦营业税，即"商品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简称 GST）。从政治角度讲，新的税收一般都是不稳定的，因此无需辩解，GST 比它取代的那个税要好。国会中出现了激烈而混乱的争吵，马尔罗尼利用宪法中一条模棱两可的条款（以前从未用过的）任命了一批新的参议员，从而使这项税目得以通过。

毋庸置疑，GST 是马尔罗尼走向下坡路的一部分。这项税收在加拿大西部尤其不受欢迎，包括保守党的中心地带阿尔伯达，那里没有省级营业税，是故任何营业税的想法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是独一无二的。虽然马尔罗尼内阁里有一些来自西部的位高权重的部长，西部人也不信任总理偏向魁北克的习惯，并在政策中给予魁北克优惠的做法。这在签订空军新购置的 F-18 战斗机利润丰厚的维修合同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战斗机是特鲁多政府购买的）。基于经济和效率的考虑，空军倾向于购买一家温尼伯公司的战斗机。1987年，政府把合同奖给了一家蒙特利尔的公司，以加强蒙特利尔的航天工业。批评家有理由怀疑，这是在回报魁北克。布拉萨曾用过"有利可图的联邦政治"的口号，这确实是有利可图的联邦政治——对于魁北克来说确实如此。（考虑到魁北克人认为魁北克在保持加拿大的联邦政治中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马尔罗尼针对这种想法采取了处理措施。）政治以一种及其愚笨的方式抛弃了经济。

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马尔罗尼的预期。不满的西部人在温哥华集会，要求政府做出解释，最终导致了一场主要由前保守党人参加的政治运动，包括保守党众议员的前任政治助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然而，不满人群当中的领袖和焦点人物是普雷斯

495

顿·曼宁（Preston Manning）。他是阿尔伯达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前主席欧内斯特·曼宁（Ernest Manning）之子。在1988年的联邦选举中，曼宁打着“改革”的旗号，打败了70位候选人，这些人没有赢得任何席位——他们名不见经传且一盘散沙只会给未来添麻烦。

马尔罗尼审时度势，做出了合理的算计。当其党派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低迷不振且无可挽回后（低到1991年的15%），他宣布会在1993年春退休。在渥太华的一次进步保守党会议上，他们选举金·坎贝尔（Kim Campbell）继任总理。坎贝尔曾任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是马尔罗尼年轻的部长之一让·查尔斯特（Jean Charest）的上司。

坎贝尔当局存在的时间很短。1988年，国会的任期到期后，必须在1993年秋以前进行选举，坎贝尔拖到最后一分钟，于10月宣布竞选开始。她在民意测验中获得些许优势——她很聪明，而且是新人——但事实证明，她太没有经验了。她不理智地告诉媒体，在选举中根本没有时间辩论严肃的话题。她的顾问们起了内讧，争吵不休，496 媒体也闻到了死亡的气息。10月25日的竞选之夜，加拿大人坐了下来，静待没有悬念的结局。

那是一个很精彩的夜晚。进步保守党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从1988年的169席下降到了1993年的两席。（国会解散之前他们还有151席。）随着保守党选民树倒猢狲散，坎贝尔也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但是她以前的对头让·查尔斯特赢得了席位。在魁北克，即“改革的西部”，席位到了布沙尔的新魁人政团党手中，而其他选票则流到了安大略及滨海诸省的自由党手中。新民党垮台了，1988年它赢得了最多的席位，而到1993年只剩下了9席，跌到历史最低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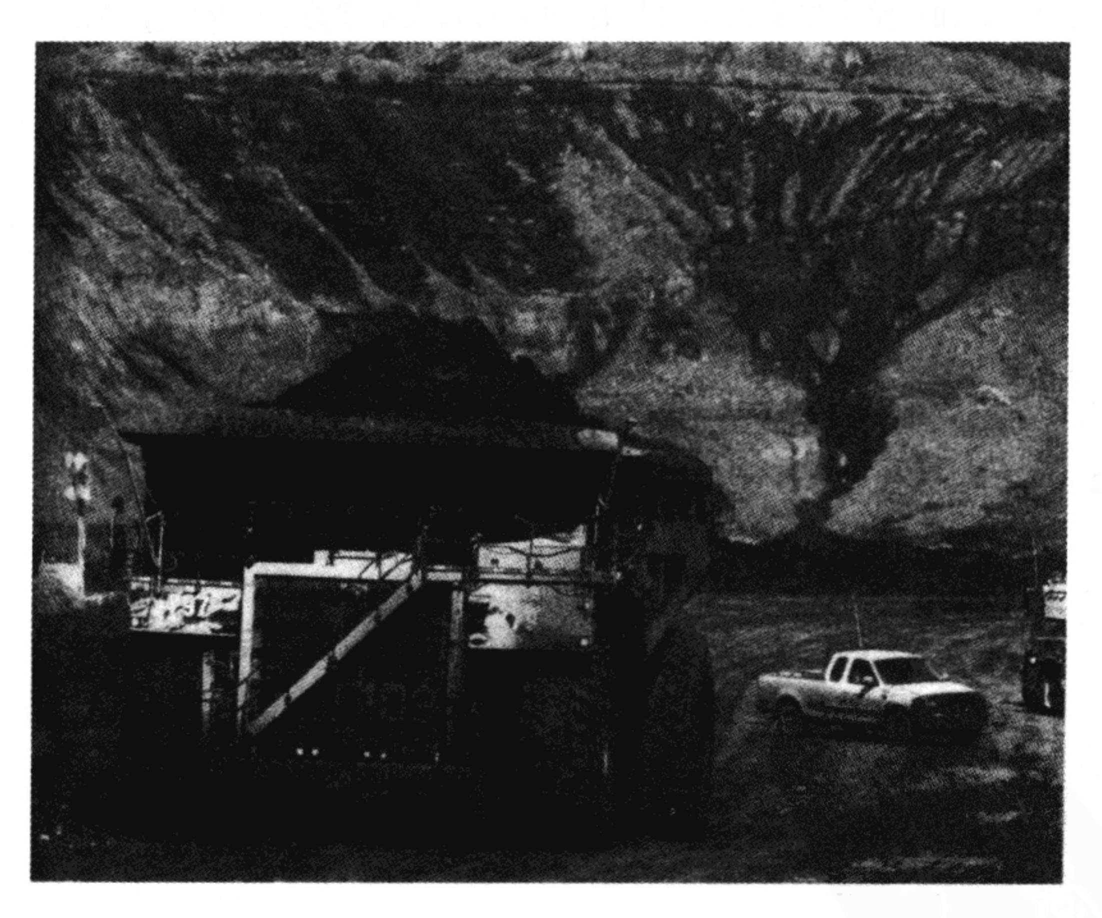
自由党人是靠弃权赢得胜利的。他们获得了41%的选票并赢得了大多数席位——177席。没有别的政党曾赢得过总票数的20%。分裂派魁人政团党位居第二，有54席，在众议院中成为女王的官方反对党。普鲁斯特的曼宁改革派位居第三，有52席，虽然其总票数比魁人政团党多。新民党悲惨的结局与其说应归因于党派在联邦政治中的表现（但是这也不值一提），不如说是因为新民党政府在不列颠哥伦比

亚和安大略的执政记录，其理念和政策都不适合解决那里的经济萧条。这无疑也削弱了保守党。

竞选结果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支离破碎。加拿大传统党派中只有一个，即自由党，得以从这次选举中全身而退，它在每个省份都占有席位，在阿尔伯达奇迹般地多达4席，这是一代人以来在该省的最佳表现。然而，作为20世纪大多数时候自由党堡垒的魁北克，却败给了魁人政团党。魁人政团党纯粹是一个地方性政党，虽然它并不信口开河，他们也欢迎说英语的人，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纯粹讲法语的政党。改革派也自诩是个全国性的政党，而且在安大略成功选出一名众议院议员。即使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党派，从意识形态上讲，它在地区和选民方面都很受限制，因为他们喜欢权力和政治中的传统元素——这就远谈不上是一个多数党。

497 妥协和平衡的传统技巧是否能在经历80年代的混乱、90年代的萧条以及《米奇湖协议》的灾难后复兴加拿大，一切都要取决于克雷蒂安，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政治家。这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第十七章　新千年、新世界



加拿大能源的未来？世界上最大的履带式卡车正在阿尔伯达的麦克莫里堡（Fort McMurray）搬运重达400吨的油砂。

501 1999年12月，《麦克莱恩》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正在消失的边界》的专栏文章。该杂志分别对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了民意调查，询问他们对于自身和对方的看法。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加拿大人普遍有着良好的印象，认为后者很友好，虽然也许有些乏味。此外，加拿大还取代了大不列颠成为了美国的最佳盟国。

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似乎很困惑。他们使用了大量词汇形容美国人，大多是消极的，但是后来又认为自己越来越像美国人了。从整体上说，大约1/4的加拿大人愿意接受美国公民的身份，但在魁北克，这一数字大幅增长，约1/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成为美国公民。魁北克也是最愿意与美国合并的地区，这一比例占到了28%，而在整个加拿大境内只有19%的人表示愿意。[①] 1999年冬天，一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称71%的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有好感。这一数据排在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之后，但高于大多数国家。[②]

就加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来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两国人民对这些看法也觉得很自然。在与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0年（对加拿大人来说，这比北大西洋公约更重要），加拿大人认为边界有点令人讨厌，是阻碍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官方障碍。加拿大海关 502 可不接受这个观点。他们指出，边境虽然阻碍交通，但它至少可以使加拿大远离枪支，使入境处剔除声名狼藉的家伙。当然，边境还为数以千计的移民机构和海关人员提供了工作。

《麦克莱恩》杂志的民意调查数据并没有反映1999年12月14日发生的事情。当时，一艘定时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港起航的渡船停靠在华盛顿的安吉利斯港口（Port Angeles）。船上有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拉森姆（Ahmed Ressam）的青年男子，他携带着名为“本

---

① Chris Wood, “The Vanishing Border,” *Maclean's*, 20 December 1999.

②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3 June 2005, table “Favorable Opinions of the U. S.,” using Environics data repor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 1999 - 2000: 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 Report ID = 247.

尼·诺里斯”（Benni Noris）的加拿大护照旅行，因为这个所谓的诺里斯看起来很紧张，海关人员开始搜查他的车并在他试图逃跑时逮捕了他。其车内有大量的爆炸物，他的目的地是洛杉矶国际机场，拉森姆打算在1999年12月31日午夜12点用这些爆炸物炸毁机场，制造一起新千年恐怖大袭击。

逮捕拉森姆给加美关系带来了全新而又深远的影响。加拿大曾是或可能是美国不安定因素的来源。像美国一样，加拿大每年接收成千上万的移民。1999年，已知有超过18.9万移民来到加拿大，而大多数年份有超过20万的移民进入加拿大。1999年，12.8%的移民属于难民，因为害怕国内种族或对公民权利的迫害，而申请在加拿大居留。[①] 拉森姆原是阿尔及利亚（Algeria）人，自称是难民，而他到加拿大后所从事的活动明显是违法的。[②] 然而，很多时候，由于资金匮乏、能力不足，移民机构无法跟踪记录在国内的那些非法和合法移民。例如，拉森姆就受到通缉。他甚至去了一趟阿富汗（Afghanistan），接受圣战的理论和实战训练，而后回到加拿大履行袭击美国的任务（还携带1.2万美元），但是警察却找不到他。

美国当局全面地审讯了拉森姆，加拿大警方也调查了他在加拿大境内的活动，发现他是一个名为“基地”（Al-Qaeda）的秘密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几年前对美国宣战。在一份2001年8月提交给布什总统的名为“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的简报中就含有拉森姆的一些信息。 503

① 美国国务院2005年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国家报告”指出加拿大的“放宽移民收容政策”是恐怖分子存在的部分原因。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5473.pdf.

② Stewart Bell, *Cold Terror: How Canada Nurtures and Exports Terrorism Around the World* (Toronto: Wiley, 2004), 132-133. 书中描述了拉森姆在蒙特利尔作扒手的生活。尽管拉森姆得到难民身份这一要求被拒绝，然而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加拿大对他回到阿尔及利亚后受到的待遇缺乏信心。

多元文化论

2000年，位于美国以北的加拿大与1960年的加拿大大不相同。当然，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中，加拿大人口已达到3 000万，比50年前的1 400万翻了一番多。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自然增长”的婴儿潮。而且人的寿命延长了，出生在2001年的孩子，其预期寿命要比1951年出生的孩子长11年。[①] 实际上，对于加拿大境内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而言，因为老年人数量的稳步增长，他们的数量实际上并不明确。

然而，出生在南亚、东亚、非洲、加勒比以及拉美地区的加拿大居民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90年代的移民总数为220万，达到20世纪的最高峰，虽然按照比例1901—1910年的移民比例更高。今天的宗教平衡正在发生变化，天主教是最大的宗教团体，占43%并且持续了很多年；第二大团体是无神论者，占16%；第三大团体是由多个基督教新教宗派组织的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占9.6%；然后是英国圣公会，占6.9%；2%的人口属于穆斯林（Muslims）；1.1%的人口是犹太教徒。[②]

虽然所有的加拿大人社区都受到影响，但移民效应在大城市最为明显，如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由于在政治上要适应新形势，加籍印度裔政治家、华裔政治家以及后来的拉丁美洲裔政治家开始变得举足轻重；加籍意大利人在加拿大也享有很强大的势力。在2000－2001年，一名加籍印度人锡克·杜新志（Sikh Ujjal Dosanjh）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一位非白人总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地区的反亚民族主义在法律中都有体现，因为

504

① 出生在1951年的男孩预期寿命为66岁，女孩为71岁；与之相对，2001年出生的男孩、女孩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7岁和82岁。

② 考虑到魁北克宗教人口明显减少，人们或许期待看到“无神论”人口在该省人口普查数据中更加突出，但事实不是这样，“无神论”人口到目前为止在安大略更多，甚至在阿尔伯达，“无神论”人口数量也绝对多于魁北克，且多出很多。

法律拒绝承认东方人在省选举中的投票权。

并非所有的迁移人口都是外来的。20 世纪晚期，土著加拿大人口也在大幅增长。这一现象首先反映了 50 年代婴儿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其次反映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出生率，这一数据在 1967 年达到顶峰，出现在全国其他地区婴儿潮的 10 年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土著人出生率是全国整体水平的 1.5 倍，虽然比 60 年代下降了许多但仍然很高。）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土著人问题和身份的更强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人因土著祖先而产生的自豪感。在 2001 年的人口普查中这一趋势产生了 3.3% 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土著人口。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49%）居住在城市，特别是温尼伯、埃德蒙顿、萨斯卡通（Saskatoon）和渥太华。其中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萨斯卡通，达 9%，温尼伯以 8% 紧随其后（但其绝对人口数更多）。

20 世纪 70 年代，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制定多元文化的计划来应对移民的蜂拥而至。人们怀疑多元文化论只不过是政客（主要是自由党）迎合制度化的种族社区的另一种方式。[①] 更有人严厉地指责，多元文化论是加拿大人培养真正的国家和地区意识的障碍。尼尔·布松达（Neil Bissoondath）就是著名的批评者之一。他在其 1994 年的论著《出卖幻象：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狂潮》中谴责到，多元文化论被用来将移民群体强暴地集中到种族贫民窟，这只能分裂加拿大人而不是把他们团结到一起。而多元文化论的捍卫者则称，多元文化是众种族走向平等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对新移民和欧洲裔的“老加拿大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此看来，多元文化即使没有增进团结，至少也增进了满足感。[②]

---

① 当他们来到加拿大时，移民社区总是倾向于支持执政党，1896 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党执政，1945 年之后又是自由党执政，其间都是移民数量最多之时。在 2000 年的选举中，有对此现象的有力证据。那一年，72% 的非欧洲移民投票给自由党。Andre Blais, Eliabeth Gidengil, Richard Nadeau, and Neil Nevitte, *Anatomy of a Liberal Victory: Making Sense of the Vote in the 2000 Canadian Election*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2), 92, table 6.1.

② 例证见 Pico Iyer, *The Global Soul: Jet Lag, Shopping Malls, and the Search for Home* (New York: Knopf, 2000), 117－171 页。

魁北克的动荡不安

505 20世纪90年代，魁北克是加拿大不满情绪的焦点。这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在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中间，对分裂主义的支持已成为主流思想。魁人政团党这一分裂主义的代表通过选举进入1993年10月联邦众议院的选举就证实了这一情况，并且人们认为分裂主义者会横扫下一次将于1994年举行的魁北克地区的选举。

1990年以后，自由党省总理罗伯特·布拉萨（Robert Bourrassa）巧妙地策划，使他的省躲过了许多政治陷阱。虽然布拉萨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惑众能力而闻名，但到了1994年，很明显，他希望魁北克一直归属加拿大。1994年初，主要因为健康问题，布拉萨被迫辞职，由小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 Jr.）继任省总理，他是布拉萨手下的一位部长，也是一位前省总理的儿子，他与其父同名。

在1994年魁北克的地区选举中，本该由约翰逊带领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虽然也许是微弱胜利。[①] 而分裂主义政党魁北克人党却在席位上取得77：47的压倒性胜利。（这次选举中的搅局者是民主行动党（Action Democratique du Québec，ADQ。）该党的领导人是马里奥·杜蒙（Mario Dumont)，他曾是自由党青年派的主席。魁北克人党可能赢得了大部分讲法语的魁北克人的选票，该党的领袖与新省总理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非常了解这一点。

帕里佐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致力于魁北克的独立。作为卓越的经济学家和政治老手（他曾于1976年以后担任勒韦克的财政部长)，他从来没有钟情于“主权——联系”的政策，即20世纪70年代勒韦克曾试图引诱特定的人群拥护分裂主义的政策。作为省长，帕里佐决定要取得独立，并计划只要魁北克人党一执政，就开始谋划进行全民公投。

---

① 魁北克讲英语的人口在1994年以压倒多数投票给自由党，并且反对独立，然而因为讲英语的人口在地理上只集中在几个选区，所以他们的投票仅仅在席位总数上起到微弱的影响。

魁北克人党运用政府的丰富资源来促进分裂分子的团结意识，至少在法语区人群中是这样做的。作为反对党领袖以及魁北克联邦主义的主要官方代表，约翰逊令人敬仰却沉闷无趣。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在他的家乡并不受欢迎，曾反对过《米奇湖协议》，也曾做过特鲁多的助手（皮埃尔·特鲁多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中间被成功地妖魔化了），而且知识分子也轻视地认为他很粗俗、没文化，这一点不像特鲁多。 506

帕里佐却存在相反的问题：许多魁北克人认为他太自命不凡。同特鲁多一样，他来自于富裕家庭，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魁北克以外的地区获得的，很显然帕里佐不是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人。与特鲁多不同的是，他看起来相当像英国银行家——这可不是能增加选民感情的形象。

帕里佐也不容易做出妥协，更愿意用简单、明确的方式为主权、独立而战。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米奇湖协议》之后；即使在渥太华有克雷蒂安；在魁北克地区有软弱无力的反对党，魁北克人也不希望与加拿大其他地区明显划清界限。因此，帕里佐不情愿地被迫与民主行动党及其领导人杜蒙一起在政治上共谱加伏特舞曲，因为1994年的全民公决中ADQ 6.5%的选票将决定他的成败。他又出于无奈，邀请关系欠佳的卢西恩·布沙尔（Lucien Bouchard）。虽然充满犹豫和竞争，也许更多是根本的差异问题，三方还是在1995年6月同意，他们“Yes”一派要在日渐临近的全民公决中，承诺尝试着协商一种与加拿大的新型“经济政治联盟关系”，然后再宣布魁北克的独立主权。

随着在全民公决中的目标顺利地取得一致，达成目标的方法也就可以协商了。协商的结果很复杂，就是要使选民通过6月的协议，为主权独立投票。帕里佐感到胜利在望，开始了认真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知道商业和国际金融更喜欢稳定，但是分裂主义者的胜利绝不可能带来稳定。如果因为独立投票而立刻面临经济动乱，这可不能为魁北克的独立做好广告。因此，“Yes”派取得胜利后，帕 507

里佐将开始用储备基金来稳定加元。

然后，9 月在魁北克城的一个剧场，他通过聆听魁北克独立宣言发起了“Yes”运动。投票定于 10 月 30 日举行，然后，辩论开始。起初，看起来帕里佐似乎判断失误。民意调查不是特别令人鼓舞，并且联邦主义者“No”派却充满信心。一位联邦主义者发言人谈到要一次性彻底“粉碎”分裂主义，情况看起来只要把竞选运动留给乏味的约翰逊和联邦保守党领导人让·查尔斯特（Jean Charest）就够了，虽然后者不是一位政治上的重量级人物，至少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

选民犹豫着开始靠近“Yes”派，但在此之前已认识到他的个性带给“Yes”阵营的不利条件，因此他调转竞选方向，把任务交给更有魅力的布沙尔。布沙尔以其独特的热忱进入领导者名单，并使犹豫者确信——独立自主会像一只魔棒，驱散联邦主义的阴霾，会带着魁北克进入充满机会、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福地。于是，选民开始追随布沙尔及其令人向往的魔棒。

身在渥太华的克雷蒂安极其震惊，他一向以务实的政治判断为傲，然而他的判断失误了。当说到自由党在渥太华的政治会议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最多能做的就是保证在魁北克一些紧要关头的妥协，而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最后时刻的悔改。更实际的是，美国大使詹姆斯·布兰查德（James Blanchard）引用并发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发言，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的偏爱。克雷蒂安的一位部长布莱恩·托宾（Brian Tobin）在全民公决前一周，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场巨大的支持加拿大的游行，鼓动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公民来表达他们对加拿大的一部分——魁北克的爱国热忱和深厚感情。这是一个卓越的姿态，大大提高了联邦主义者的士气。这是否实现了目标抑或是另一个外部的操纵打击了许多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仍是有争议的。美国的声明比较接近事情的原貌，那就是“Yes”派没有积

508

极敏捷的应对，只有气急败坏的回答。[①]

10 月 30 日的选举结果是令人恐怖的势均力敌。一开始帕里佐认为自己赢了，但选票逐渐向不利于他事业的方向扭转。狂怒的省总理冲进“Yes”派的聚会，宣称主权分子仅仅因为金钱和民族而骗走了他们的胜利。他没有错，魁北克以前的省总理们就这么说过。其中，最著名的是 1944 年民族独立主义者、省总理杜普莱西斯（Duplessis），当他解释这一事实时说自由党获得更多的选票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人的选票。确实如此，如果仅由说法语的选民决定，独立毫无疑问会胜利。

帕里佐计划采取断然行动，即使他在普选中只获得了 51% 的选票，他本来也能够宣布魁北克的独立。他预言并断言，法国会承认一个主权的魁北克。[②] 当时在一些说法语的拉美和非洲国家中，已经有关于承认主权独立的谣言。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将可能不是唯一承认其独立的国家。

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毫无意义的了，帕里佐也不例外。在全民公投那天晚上，他情绪激动的讲话彻底断送了他的事业，即使对大多数分裂主义者来说，帕里佐也让他们很难堪，他们认为他大大倒退，回到了一个遥远且更加黑暗的年代。帕里佐宣读了自己的辞呈，并在 1996 年 1 月不可避免地由卢西恩·布沙尔接任。

就说英语的加拿大人而言，布沙尔并没使情况好转。他解释说，魁北克的部分地区与该省分离而仍旧属于加拿大是荒谬的。照他自己的解释，“加拿大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魁北克则是。但是，如果魁北克是个所谓真正的国家，为什么它是真正的？假设他所指的不只

---

① 这里引用的民意调查表明，在魁北克，支持美国的情绪强烈，但不一定是因对美国本身的爱慕和钦佩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更确切地说，表达对美国的爱慕对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和独立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有用的选择。他们不必依赖讲英语的加拿大，而可以依赖更强大、更富有的美国。

② 实际上，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公投期间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倘若是“赞成”票多，法国会承认一个享有主权的魁北克。Lawrence Martin, *Iron Man: The Defiant Reign of Jean Chretien*（Toronto: Viking Canada, 2003）, 128.

是地理上的表述，但是如果有任何不当的理由说魁北克是个真正的国家，那么作为魁北克人或说法语的魁北克人的家乡而言，魁北克只是另一个像加拿大本身一样的多民族国家，只不过公民中占大多数的人群不一样罢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509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如此。魁北克终将是加拿大的一部分，魁北克仍将使用加拿大的法律，魁北克人仍将照常纳税，继续参加加拿大的选举。一位魁北克人曾是加拿大的总理，在他的内阁中魁北克人地位显著。在全民公投中，克雷蒂安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加拿大人都指望他构思一种策略，防止如此令人震惊的事情再次发生。

通常对分裂主义的回应可分为“A 计划”和“B 计划”。A 计划是妥协、让步，试图改变宪法和联邦机构来接纳更多温和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这个选择的缺点是，实际上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宪法是不能修改的。[①] 米奇湖事件和夏洛特敦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克雷蒂安在 1996 年使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承认魁北克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但在魁北克省内无明显影响。1996 年 9 月，各省总理竭尽全力颁布了一项宣言，称魁北克有权利“在属于加拿大的前提下，发展它的个性……”。另一方面，魁北克省以外的加拿大人已经对无尽的全民公投感到厌烦，因为除非或直至分裂分子在全民公投中获胜，他们会一直安排全民公投。

B 计划被定义为“严厉的爱”。B 计划的前提是其余的加拿大人对魁北克分裂主义者太宽容了，他们按照分裂主义者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全民公投，包括计划好的使独立问题模糊不清的全民公投。[②] 世界上还有哪个主权国家能够容忍针对分裂主义是否还能在现有的领

---

① 这一点在以下事实中得到证实，克雷蒂安在 1995 年秋未能得到省对在宪法问题上浪费时间的必要支持。Lawrence Martin, *Iron Man*, 141.

② William Johnson 在《史蒂芬·哈珀与加拿大的未来》(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5), 170 页中指出一次投票，这次投票表明只有 1/3 的加拿大人认为承认魁北克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会使分裂主义者沮丧。在魁北克，49% 的人认为这种认可实际上会鼓励分裂主义。

土上继续存在下去而展开的周期性投票呢?

对“严厉的爱”有多种不同形式，它通常的主题是依据《米奇湖协议》及在夏洛特敦和卡尔加里的宣言中所做的让步无效。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争论说，如果加拿大是分裂的，那么魁北克也是。无论如何，加拿大人形成了对一种议题的兴趣，而这种议题会彻底并消极地影响加元的稳定性，更不用提贸易、交通和通信，以及现存政治机制的可行性及持续合法性了。例如，如果1995年分裂主义者获胜了，可以授权什么人或什么机构与他们协商?

51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克雷蒂安政府将分裂主义的问题提交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一个省份可以脱离加拿大吗?如果可以，如何脱离?另外，正如1995年[1]帕里佐所设想的，一个省份单方面宣布独立，这合法吗?普遍的看法认为，魁北克省外的加拿大人也许会有兴趣，也有权利参与魁北克独立，这种说法得罪了魁北克各派民族独立主义者，包括省内的自由党人。该党在省立法机构谴责这种看法时，加入了魁北克人党多数派。魁北克民族自治的权利是不受约束的，只是看起来，魁北克人现在要选择去实施这种权利。[2] 在1997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克雷蒂安和他新提名的政府间事务部长史蒂芬·狄翁（Stephane Dion）为最高法院的引证及其观点作辩护，即加拿大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魁北克的分裂议题中。正如进步保守党在新领导人查尔斯特的带领下所做的一样，克雷蒂安和自由党提高了他们在魁北克的信誉。显而易见，最高法院的引证并没使自由党在魁北克的情况变得更糟。

最终，当最高法院宣布对于1998年8月的问题的观点时，也认为加拿大人普遍对发生在魁北克省的事情很感兴趣。无论是依据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魁北克省都无权决定脱离加拿大。另一方面，魁北克虽然为分裂公投了，加拿大其他地区却必须为其独立后的前景做出商讨。

---

① 帕里佐在1997年春适时出版了一本书，名曰 *Pour un Québec souverain*。该书详细叙述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以及如果在全民公投中获胜将会做的事。

② *Canadia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1997（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125.

克雷蒂安把这当做一场胜利，主张在魁北克人将来的全民公投中必须直截了当地问他们问题。但是，魁北克省总理布沙尔却认为这一结果显示，加拿大其余地区最终会尊重魁北克大多数人所作的分裂决定。

布沙尔不会在短时间内问其他地区这个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想要“有利的条件”，而这些条件还不存在。然而，分裂主义的狂 511 热支持者们却认为他太软弱，太容易妥协了，并且毫不同情魁北克民族主义的极端排外组织。1998 年，布沙尔领导魁北克人党打败自由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组织另一场全民公投的信号。省总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被动状态在魁北克人党的激进分子当中引起不满，毫无疑问，这加快了布沙尔从省总理位子上的辞职及 2001 年最终退出政坛的结局。他的继任者伯纳德·兰德里（Bernard Landry）是一位分裂主义的老手，一位高举独立的、无可指摘的正统主义者，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疑虑。因此，在兰德里担任省总理期间，很明显，第 3 次公投也不会迅速来临。

魁北克选民显而易见的厌倦深深地影响了布沙尔和兰德里。因此，当克雷蒂安和狄翁按照最高法院的观点，于 2000 年 6 月经过议会通过了《权限界定法案》（即清晰法案，Clarity Act），提出了关于在何种情况下加拿大可以接受分裂投票的纲要时，省总理兰德里试图动员魁北克舆论来反对这一法案。恰恰相反，民意调查显示，魁北克人并不认为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立场必须清楚，而且多于 50% 的人的同意是必要的）。接下来，在 2000 年 11 月的普选中，克雷蒂安再一次提高了自由党在魁北克的地位，以 44.2% 比 39.9% 的得票超过分裂主义的魁北克人党。①

极端政治

在 1993 年以后的 10 年里，加拿大的政治史上即使不是独一无二，

① 选举还表明，联邦主义者需要比分裂主义者在魁北克多出 5 个百分点来赢得更多席位，分裂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得到 38 个席位，自由党得到 36 席。

也是非比寻常的。在1993、1997和2000年的3次大选当中，自由党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席位，反对党要打败他们的愿望已经不切实际。魁北克人党不再把获得国家级的权力作为目标，宣称他们的职责就是代表魁北克在即将来临的省级全民公投中获得必要的胜利。然而，2000年的选举表明，全民公投和魁北克人党的理论都已渐行渐远。

20世纪90年代，自由党的主要反对党是改革党，该党由阿尔伯达省的普雷斯顿·曼宁创立和领导。改革党的主要吸引力仅限于西部省份，然而即使在那里，像温哥华和温尼伯这样的一些大城市，该党也得为立足之地而奋斗。为了试图超越其地方性身份，改革党在2000年更名为加拿大联盟党（Canadian Alliance），曼宁希望能获得进步保守党的选票并在大西洋诸省和魁北克取得一定地位。[①] 但是，在进步保守党领导人查尔斯特投身于魁北克省的政治活动后，1998年继任的乔·克拉克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曼宁牺牲了自己的领导人地位，并交给来自阿尔伯达省的进步保守党部长戴卫国（Stockwell Day）。然而，事实证明，戴是一位不称职的联盟党领导人，第一次就在2000年的大选中输给克雷蒂安，随后他在联盟党的领导地位也遭到了来自党内的质疑。 512

整个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新民党仍然处于被忽视的角落，在2000年大选中只获得13个议会席位（这一结果是受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不得人心的新民党政府的影响）。坦率地说，对许多新民党的选民来说，尤其是在面对公然的右翼势力加拿大联盟党时，自由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由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并将他们的选举活动集中在丑化对手上。通过极右的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政府领导人麦克·夏里斯（Mike Harris，1995—2002）的记录，可以看出自

① 关于什么名字恰好最能抓住其本质有些争议。很受欢迎的一个想法是加拿大改革联盟党，其首字母缩写为CRAP。当意识到重名时，便改称加拿大改革保守联盟或简称联盟党。

由党因这一策略大大获益。[①]

自由党人不但相对于对手而言是幸运的，而且幸运地拥有操控政治事件使之为己之便的能力。除了魁北克分裂主义，主导20世纪90年代政治生活的还有“赤字之战”。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加拿大的财政赤字持续增加，而这又使国债不断攀升，联邦政府除了偿还利息再也无钱可用。因此，在1995年的全民公投准备阶段，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者又抛出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说法——加拿大的债务是魁北克地区繁荣昌盛的累赘。《华尔街日报》因加拿大的债务规模直言不讳地称其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加拿大国内，公众普遍认为削减债务是当务之急。

513

自由党人自从1993年执政以来，就有改革的意愿。他们想花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直到他们震惊地预料到一旦加拿大触到“债务墙”，将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筹集到任何资金。随后，克雷蒂安和他的财政部长保罗·马丁（与皮尔逊政府时期外交部长老保罗·马丁同名的儿子）勉强地转变了他们的财政走向。政府除了几种特定的情况外，都要少花钱。政府大大削减了拨给各省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这就意味着省府将在健康、福利、教育上减少支出。长期以来，联邦政府的政客们抱怨各省政府抢走了功劳又获得了联邦政府津贴的政治利益。现在各省政府承担了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的责任。然而，开支的削减受到像安大略省的夏里斯内阁一样的右翼政府惺惺相惜的欢迎。联邦政府慷慨程度的降低无疑夸大了其政策的影响，从长远看来，很可能导致了他们政治上的失势［相同的现象也没有帮助左翼政府，如格伦·克拉克（Glen Clark）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新民主党政府等］。

联邦政府的节约政策尤其对军队开支影响巨大。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武装力量规模不断缩小。在自由党的领导下，这一进程加快了。不仅军队数量在减少，军事装备也在减少。军备购买被取消或推迟，

① 夏里斯有自己的恶梦：一般来说是工会、老师、土著人、享受福利者和公共部门。他与这些群体的对抗造成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被偶尔发生的暴乱打断。所有这些都提醒潜在的新民党支持者，自由党至少优于夏里斯及其加拿大联盟中的政治同僚。

老掉牙的坦克、战斗机、直升机象征着20世纪90年代末武装部队的困境。虽然在克雷蒂安的领导下，加拿大仍采取活跃的外交政策，但已逐渐不是靠军事实力来支撑的了。美国观察家黯然地把加拿大的军事贡献与冰岛相提并论。

克雷蒂安和马丁在国内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联邦政府的赤字大幅降低，并在1997年完全消失。随后，马丁开始支付头期国债，逐渐使加拿大从全球8个最发达工业国家八国集团（G8）中政府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大的国家降到最低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在1995—1996年间，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4%，而在2004—2005年间仅占38.7%）。[①] 加拿大的赤字之战也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扭转赤字情况的真实写照。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沿着平行线向前发展。 514

如果仅仅是听说过一系列的议案、政策以及3次选举胜利后的连任（1993、1997、2000），就来评价克雷蒂安在担任总理10年间（1993—2003）的高度党派性的政治生涯是不公平的。他的大权在握得益于90年代后期不断好转的经济形势以及坚定不移的政治天性。克雷蒂安不是制度的创新者，他只是尽自己所能，为政府工作做了大量的精打细算。事实上，在他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资金实行革新政策的。

克雷蒂安和自由党领导国家就意味着从政治中心进行统治，而右翼势力则被流放到省级政府，尤其是安大略省和阿尔伯达省。[②] 甚至连萨斯喀彻温省也倒向右翼，因为省级的部长们发现了平衡预算和量入为出的政治活动的价值所在。

加拿大也受到了美国政治问题甚至政治气候的影响。20世纪90

---

① Canada, Department of Finance, Canada's Fiscal Update, chapter 3 "Canada's Fiscal Progress," www. fin. gc. ca/ec2005/ec/ecc3e. html.

② 在安大略，大卫·彼得森（David Peterson）（1985－1990）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被鲍勃·雷（Bob Rae）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1990－1995）接替，之后又被麦克·夏里斯（1995－2002）和厄尼·伊夫斯（2002－2004）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接替。雷政府在经济衰退和收入减少时期执政，其灾难性经历不仅对安大略产生影响，还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

年代，美国的政治具有邪恶的党派性和高度的个人性。然而，在这些特性之下隐藏着真正的转变，因为共和党和美国社会都在向右转。问题主要是美国福利社会（或任何一个福利国家）反对保守派的运动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是问题的所在，而不是国家困难的解决方案。[①] 优惠福利政治将被机会政治取代，福利国家将被“市场国家”取代。同时，美国也有“宗教权利”的兴起，这是一群通常将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强烈反对公众对堕胎、同性恋的自由化态度结合起来的保守清教徒。[②] 他们在政治和立法上的失败是深深挫折感的来源之一，正如他们在加拿大的同侪一样垂头丧气。

美国的民主党及其总统克林顿（1993—2001）三心二意地维护了福利国家这一制度。虽然在1992年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无法击败克林顿，共和党却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席位，并利用它对克林顿进行无休止的财务诚信和性道德方面的调查，也曾试图在1999年对他进行弹劾。

515 在美国和英国，福利国家比加拿大退化得更严重。加拿大已成为英语国家中的怪人，因为加拿大仍建有社保网，右翼势力认为加拿大既供不起，也不应该提供这种社会保障。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社会保障通过高税收和国家干预阻碍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根据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国家邮报》等右翼势力的看法，衡量一个国家失败的标准就是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挫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拿大人才向美国的流失。“人才流失（Brain Drain）”常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专栏作家的文章里。加拿大人似乎一无是处，而他们的邻居美国人在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掌白宫期间却似乎从不犯错，这种情况即使在克林顿和民主党下台以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

① David Runciman, *The Politics of Good Intentions: History, Fear and Hypocris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6 - 137.

② Kevin Phil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06). 该书的题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美国有利的对加拿大亦然。像克林顿一样，克雷蒂安也被右翼的喉舌（又是《国家邮报》）污蔑为腐败，但该报选择的丑闻集中在魁北克省克雷蒂安家乡新建的高尔夫球场，这太复杂，也太琐碎了，不足以说服选民把自由党赶下台。

很可能加拿大的保守人士只把克雷蒂安当做自由党政治上大规模腐败的象征，而不是真正个人意义上的腐败。个人化很少成为诋毁对手并改革政治最有效的方式。右翼势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只让他们更愤怒，但并未削弱他们的信念，即不仅要把自由党赶下台，而且要摧毁它，就像摧毁一切使加拿大有问题的障碍一样。 516

而经常发生的却是，重大问题通常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推动的。从表面上看，众多的指控和个人攻击占了上风；从深层次看，加拿大国内的右翼势力追求的是更低的税收、更少的国家管制和干预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回归等，这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右派别无二致。这说明政治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因此，20 世纪末的加拿大政坛的特点是极端的怨恨和党派分歧。

自由党的外交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写到，加拿大以前“拥有与其军事贡献不相称的影响力”，因为该国“有些偏远的地理位置及高效的领导力……加拿大实行全球外交政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也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做出建设性的贡献。”①

基辛格对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令人钦佩的描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了质疑。原因相当系统、合理，加拿大已不再像 70 年代（基辛格写作的时间）那样举足轻重了。那时，加拿大是七大（Group of Seven）工业国之一，因为它是世界上第六或第七大经济体。到 90 年代中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

①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383.

加拿大以前曾是，现在仍是联合国和维和行动的有力支持者。[①]曾几何时，加拿大缺席的大型维和演习是无法想象的，但到了90年代，加拿大只能努力跟上步伐了。军备的削减、节俭开支的政策影响了所有政府机构，其中也包括外交部，这就意味着外事工作质量的下降。[②]

517 克雷蒂安不再或不是对外交事务特别感兴趣了。一方面，他有政治家通常所具有的对国外备受瞩目的事件的洞察力，但他通常不愿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另一方面，他深信，贸易是恢复和推动加拿大繁荣的关键。他也把贸易当做维护国家统一的手段，因为有谁会站出来反对贸易呢？又有谁会对选民的经济利益视而不见呢？因此，作为总理，克雷蒂安多次组织和带领加拿大贸易代表团出访。这些都是大规模的代表团。几乎所有的各省总理、高官、杰出的商人都登上飞机，飞向首选国家，例如中国。克雷蒂安不仅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且还想把加拿大研制的重水铀反应堆卖给中国。

克雷蒂安对贸易和经济利益的专注与重视导致了加拿大在外交策略上采取折衷方法。在马尔罗尼执政时期，人权是加拿大政策的焦点。马尔罗尼及其外务部长乔·克拉克冒着得罪加拿大盟友的风险仍坚持这一政策。如在南非这一事件上，可能会得罪英国；而在中美洲这一事件上，则可能得罪美国。

克雷蒂安可没有这么始终如一。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使其人权纪录显得微不足道了。公平地说，马尔罗尼政府已经对中国政府在国内的举措视而不见，加拿大的大多数盟友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尤其是美国。加拿大代表团在北京受到欢迎。经济利益，虽然与他们所设想的前景不同，却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

① Jocelyn Coulon, *Soldiers of Diplomacy: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X.

② 2002年的一项调查将加拿大的薪酬和福利置于许多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之后，更不必说国际组织和私人企业了，见 Andrew Cohen, *While Canada Slept: How We Lost Our Place in the World* (Toronto: McClelland& Stewart, 2003), 138页。

即使是设想的前景也并非全然安全。1997 年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主办亚太国家峰会时，就发现自己在公众事件上站错了队伍。当时民众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对印尼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的出席表示愤怒。而加拿大政府则选择了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公众的示威游行。克雷蒂安政府承担了这一过错，他的总理形象因此也受到了相应的损害。

518

维和也没有产生可靠的结果。1967 年，西奈（Sinai）半岛战争爆发，维和部队却无能为力。通常，他们会象征性地出现，但由于数量或装备不足，他们并不能给战乱的地方带去和平。20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参加了联合国领导的多次维和行动，如在波斯尼亚（Bosnia）、克罗地亚（Croatia）、索马里（Somalia）、卢旺达（Rwanda）、海地（Haiti）以及其他地区。其中，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索马里的维和在克雷蒂安执政前就已开始。

在波斯尼亚，由于联合国限制性的授权，加拿大主要盟国的不一致并相互推诿的政策，使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内战相应地延长。加拿大和联合国军进退维谷，没有能力和权威在当地武装分子当中实现和平。联合国军所能做的最多只是阻止塞族人的胜利，却无法阻止塞族人对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轰炸，无法阻止 1995 年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对波黑穆斯林的大屠杀。尽管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了大量军队并作出很大的贡献，加拿大仍然被排除在负责 1991 年后西方对前南斯拉夫政策的“联系小组”之外。[①] 最终，在 1995 年，波斯尼亚战争通过武力解决，以克罗地亚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和塞族人的失败告终，而并非使用和平或维和的高尚方法。他们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加拿大式的维和在没有和平可以维护的地方是不起作用的。

索马里和卢旺达的情况可能更糟。1993 年 1 月，马尔罗尼政府派遣加拿大空降团（Canadian Airborne Regiment）进驻索马里。这里的政府和有序的社会组织业已瘫痪。也许索马里维和从一开始就毫无希

---

① 似乎是英国人操纵、说服马尔罗尼领导的加拿大人不要坚持成为联系小组的成员。

望，但随着空降兵折磨并杀死了一个用胶卷记录他们行径的索马里少年，人们对索马里的维和绝望了。最终，真相浮出水面，并相继在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得到调查。

索马里事件是一个实际教训，告诉加拿大人什么是不该做的。自519由党还没有启动索马里维和行动，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损失，但人们却认为其国防部推卸责任、混乱不堪。同时，很多部长被牵扯进来，索马里事件成了律师们的狂欢节，也深深地吸引着媒体，因为就连暴徒也可以披着耀眼的彩色光环。最终，这次事件对政治家和军方都产生了损害。作为预防措施，克雷蒂安在1997年大选的准备阶段结束了调查。调查委员们为敢于妨碍他们彻查此事的政府预测了可怕的结果。然而，这些可怕的后果从未变成现实。索马里如今已成为历史，但却是加拿大军方和维和行动声誉上的污点。

自由党的外交政策与他们的前任相差无几，正如保守党与特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大致相同。正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加拿大以支持联合国发起的维和行动而著称，这也是加拿大的一大标志。因为不了解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许多加拿大人还以此为豪。但随着90年代的不断演进，维和行动失败的接连发生，加拿大人已丧失把维和行动作为实际可行的政策的信心。

维和行动在非洲国家卢旺达也备遭冷眼。这次由加拿大领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由罗密欧·达莱尔（Romeo Dallaire）上将指挥，他们在面对1994年春图西族（Tutsi）遭遇的种族屠杀时无能为力。达莱尔竭尽全力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作为回应，联合国不仅拒绝采取行动，而且还削减了原来部署在那里的军力。将近100万的生命在卢旺达消逝了，这是一块联合国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加拿大自身能做的不多，但即使是这仅有的一点也随着冷战后的裁军而逐渐丧失。

加拿大政府依然如故，好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维和都会是其可行的政策。由于媒体和特殊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的行话中520被称为非政府组织）的鼓动，在危机接二连三地被记者以各种目的观察和发表出来时，加拿大公众更倾向于要求政府采取行动。1996年下

半年，一个类似事件就发生在刚果（Congo）东部。当时，一场重演的卢旺达灾难正在逼近。受到侄子——职业外交官以及当时的加拿大驻美大使雷蒙德鼓励的让·克雷蒂安提出了由加拿大带领联合国蓝盔部队前往该地区，并美其名曰"保障行动"。整个维和行动大约持续了6周，以完败告终，丝毫都没有完成为刚果难民提供保障的任务。因此，当情况已经很明朗，维和部队不能提供多少帮助时，他们便匆匆撤离了。那时，一位叫莫里斯·巴里尔（Maurice Baril）的加拿大上将指出加拿大正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中，"我们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和大玩家在做交易，"他写到，"既没有必要的工具，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去控制具体的事件或整个局面。"[①] 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保障行动"变成了"丛林里的一团糟"（The Bungle in the Jungle）并广为流传。[②]

在索马里、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的维和方式，即尊重被维护国家的主权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正确模式了。在这3个国家，危机都是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威胁和平的不是有组织的正规军队，而是非正规军和游击队，甚至匪徒。因此，恰当的国际回应必须是不能过分地尊重或保护国家主权，而要尊重和保护人们的人权。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加拿大自由党，人权却是一个古老的关于自由的主题。然而，人权却成了克雷蒂安政府的鲜明特征。因为加拿大积极寻求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地雷并积极推动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地雷和国际法院这两个议题使加拿大的政策甚至区别于克林顿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克林顿在将军们的建议下，抵制对使用地雷的管制，并且在2001年的最后一刻才签署了国际法院协议，那是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里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才签署的。然而，取消地雷的使用在许多美国人当中却很受欢迎，1998年，在时任克雷蒂安外交部长的劳埃德·阿克斯沃斯（Lloyd Axworthy）的注视下在渥太华签订这样的协 521

---

① Peter Kasurak, "Accountability for Intelligence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anada's Operation Assurance as a Case Study," www. carleton. ca/csds/pki/doc/Kasurak. doc.

② 这首歌由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乐队所作。

议时，他们欢呼雀跃。

然而，有一个领域，加美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积压在前南斯拉夫众多未竟的事业中，对塞尔维亚政府试图“解决”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Kosovo）省占大多数的问题，他们目标一致。塞尔维亚人的残忍众所周知，使人回想起在波斯尼亚和其他地方骇人听闻的“种族大清洗”。由于俄罗斯的否决票，联合国安理会无法同意采取救援行动。因此，西方国家打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旗号，决定单独行动。在遭受美国带领的空袭和来自后方地面入侵的威胁后，塞尔维亚政府投降并撤出科索沃。

在少数拥有空袭所必需的飞机和装备的盟国中，加拿大是北约空袭的战斗力强的较早参与者。科索沃事件阐述了“人权”甚至高于国家主权的原则。支持者认为，这显示了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实用性；批评者却认为，北约的行动绕开了联合国。如果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国际军事行动需要联合国授权，那么科索沃行动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了。

相同的领导、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世纪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接近尾声，世界各地充斥着疯狂的谣言（当时的行话叫做“都市传奇”）来纪念这个日子。这个谣言就是电脑系统会因为两个新的数字 20 代替 19 而瘫痪。这也显示了电脑的广泛使用以及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个人和机构对机器的依赖。截至 1997 年，已有 36% 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而且电脑也成为各行各业、各种规模企业的标准设备。电脑与互联网的结合如此巨大地改革了交流与信息流动的方式，以至于当电脑无法工作、因特网停用时，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混乱。政府立即组建工作队，由其出资，新的电脑进入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于是 1999 年 12 月 31 日得以顺利过渡到 2000 年 1 月 1 日。事实上，这并不是新的纪元，而是在一年之后。

522

加拿大以古老的自由王国的形式庆祝这个新千年，接着进入了它

的第 8 个年头。克雷蒂安暂时结束他在佛罗里达的假期赶回渥太华，发现一切都还不错后，又离开了这个有雪、有松树的地方，来到那个有沙滩、有棕榈树的地方。尽管是缓慢地，政府正摇摆不定，几乎没有政治问题，选举也已经结束，而且经济也发展良好。克雷蒂安可以放松下来，并把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头上。

加拿大人看到了新年的庆祝，他们正在通过彩色电视机观看。在 1970 年，有 99% 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65% 的加拿大人通过网络观看电视，网络是另一种相关的革新）是相当罕见的现象。电话已经存在 120 年之久了，现在已经达到 100% 的覆盖率，而手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传播开来的（2004 年，已有 59% 的家庭使用手机了）。电冰箱也几乎是全球性的。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著人保留地是个例外，但是到了 90 年代，超过 90% 的家庭有污水处理系统和自来水连接系统。录像机、CD 机和微波炉在 80 年代到 2000 年期间，已经从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也更低廉）。

居民住房也变了——变得更大了。加拿大的住房面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萎缩，但这一趋势早已逆转。[1] 更大的房子有更多的房间（在 1961 年后的 40 年里，达到每座房子比原来多了一个房间），但住的人却少了，从 1961 年的平均每户 3. 9 个人，下降到 2001 年的 2. 6 个人。

在 20 世纪中叶，加拿大人渴望“终身就业”，实际上如果在大萧条的危害和战争的影响后还有可能的话，很多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到 90 年代，事情已不再是这个样子。根据一项政府研究显示，“今天的劳动者一生平均将从事 3 项职业和 8 份工作。”[2] 简单的全职工作也愈发稀缺，从 1989 年雇佣 67% 的工人到 21 世纪初期的 63% 。兼职工作人员或是临时工作者的利益也减少了，因此成本也随之降低，而且工

523

①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Energy Use Data Handbook*, *1990 and 1995 - 2001* (Ottawa: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2002), 26 - 27.

② Federal Labour Standards Review, Backgrounder, www. fls - ntf. gc. ca/en/bg_ 01. asp.

人更容易被解雇，从而使被雇佣者能够更快地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由工业方面的衰退以及服务业地位的提升导致的。（这个下降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当受雇于制造业领域的加拿大人数量减少时，金融业、旅游业及其他“轻”工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却在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随着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这种变化愈发加快，并不仅仅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管理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国际原则和实践走向自由化的结果。这种趋势被称为“全球化”，这个名词自从20世纪60年代已经逐渐变得很流行了。

全球化背后的理论是很清楚的。“水涨船高”是对它的很好总结。更确切地说，它认为，真正的繁荣不是政府调控带来的，而是通过市场不受约束的增长、取消国际经济的壁垒以及解散特殊利益集团带来的。

这种学说很好地切合了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自由主义泛滥的回应。从更大程度上讲，它重演了19世纪初重商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与自由贸易者之间的争辩，这场斗争导致了《谷物法》的废除和加拿大从英国的经济保障和指导中不情愿地退出。[①] 在1999年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ITO，前身是关贸总协定）的一次会议在“西雅图之战（Battle of Seattle）”中被打断，成千上万反全球化的活跃分子集会，联合抵制互联网。加拿大贸易部长皮埃尔·佩蒂格鲁（Pierre Pettigrew）是那些成百上千翻越墙壁和路障逃跑的代表之一。（这场战斗于2001年在魁北克城重演，在许多国际会议，特别是在峰会上，示威者试图表明国家领

524

① 这场辩论过去很激烈，现在仍很激烈。例证见 Jeff Faux, *The Global Class War: How America's Bipartisan Elite Lost Our Future—And What It Will Take to Win It Back* (New York: Wiley, 2006)。

导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原封不动地处理事务。)[1] 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带着他的著作《颠覆品牌全球统治》(*No Logo*),在2000年的国际讨论会上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参与者之一。在书中,他谴责了一些国际大公司,它们忽视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们的利益,这些人经常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报酬却极低。[2]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和东南亚,走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先是让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泰国从贫困走向繁荣,这都是全球化恰当的表现。[3](在西方人眼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的程度有时候被扩大化了。毫无疑问,那些西方人都是资本家。)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历时近30年的毛泽东统治后,改革了经济体制。甚至在印度,多年来被认为采用的是没有希望的保护体制的篮子计划,也开始挖掘一批又一批的大规模的、高素质的、说英语的精英团队。(加拿大已经通过移民开始从次大陆挖掘这样的团队。)最后的结果在20年或是更久的时间内都无法预见,但却显示了部分结果是惊人的。对于加拿大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其他国家亦然。

如上所述,在加拿大的经济中制造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加拿大或是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中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都足够稳定(面对国家干预,有足够"自由")的国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正在学术上讨论是否稳定要优先于民主,或者说对于民主俱乐部的会员来说繁荣是不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银行家和国际信

---

① 政府通过给警察配发防暴装备予以回应。这些装备是自16世纪装甲盛行以来从未见过的。这反映了一种明显存在于各个方面的不安全感,以致于给停车计时器的执行人员配备防弹背心,另外导致理智的城市居民购买像悍马这样适合各种地形的军用车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驾驶这样的车到购物中心。

② 尽管《颠覆品牌全球统治》是印刷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产生了一个热心的因特网世界,包括一个具有相同名字的网站。

③ 见Jeffry A.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2006),第18章。

贷机构试图把一些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东西强加于人。“华盛顿共识”是坐落在华府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525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炮制的学说，因此优先于其他所有条件的因素就是自由经济。[①] 据信，没有繁荣就没有民主，也没有经济自由、投资自由以及政治自由。

在加拿大，全球化没有遭到什么有力的反对，尽管贸易还是属于政治日程的范畴，特别是现在，很明显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绝对了。软木，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浮出水面。加拿大不断地确保软木能够出口到美国，却不断地被强大的由美国国会和拜占庭式的美国法制操纵的美国木料联盟所阻挠。（所有的法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拜占庭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会比其他的更糟糕。）最近的软木出口问题表明，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就最近的软木争端达成协议得以于2006年上台执政。

外部边境

2001年9月11日早上，北美东部天气极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大约在9点钟，晚起的人们在收听收音机的广播，观看各种电视报道，这时各新闻频道都传来了消息：一架飞机冲向了纽约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一幢大楼。惊魂未定的人们又看到了另一架飞机撞向了另一幢大楼。不久，又一架飞机撞向了五角大楼（Pentagon）。很明显，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袭击，不久就找出了这帮匪徒，他们都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这就是艾哈迈德所属的基地组织。

美国政府立即关闭了领空以防再次遇袭。加拿大也被要求接收所有不允许返回欧洲或是亚洲的越洋飞行。在此次事件中，有3.3万多526 名乘飞机旅行者在加拿大着陆，在他们可以回家之前，受到了加拿大的热情招待。加拿大，就像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对这次袭击事件的反应是表示相当的同情，但是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加拿大事

① Faux, *Global Class War*, 98－99. 书中提及这一要点。

实上能够提供一些及时的、实质性的帮助。一个值得纪念的公共服务活动于9月14号在国会山举行，有10万人参加。

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于9月12号打电话给克雷蒂安，对他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在不久后召开的议会上，布什对一系列国家表达了感激，可是加拿大并没有被公开提及。加拿大对此颇感意外，有些人甚至感到愤怒。①

对于危机时期的加美关系来说，这不是一个光明的前兆。顿时，关于布什并不尊重克雷蒂安或克雷蒂安不尊重布什的谣言四起。城市传奇在加拿大生根发芽了。克雷蒂安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布什，都已经变得不温不火或是不支持了。布什清楚地知道并对此表示愤慨。②事实上，两人在思想上没有多少共同点：布什的右翼哲学并不讨克雷蒂安总理的喜欢，而对于布什那边的右翼分子来说，加拿大温和的福利制度完全是一场逝去的梦，是20世纪70年代噩梦的遗存。克雷蒂安在国内的政治对手不停地赞扬目前美国右翼的社会模式。此举只会使事情雪上加霜。他们认为，美国模式是医治传染加拿大的自由主义顽疾的良药。

布什决定必须做出及时、有力的反应，以反击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因此在加拿大，想要帮助美国的愿望没有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之间产生冲突，就如在科索沃的情况一样。加拿大出兵阿富汗，并一直在波斯湾一带参与监视和封锁沿海的巡逻活动。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出乎意料地快，亲美政府入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胜利是不彻底的，美国人控制的政府并不稳定。

阿富汗很快就回到了火坑。布什及其代理人坚信，美国武力的介入对于永久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他们 527

① 对这一遗漏有两种模糊的解释：一种来自布什的演讲稿撰写人，即右翼权威人士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该解释似乎认为这一遗漏是蓄意的。第二种解释来自美国大使保罗·切卢西（Paul Celucci）。他指出“加拿大本来应该被提到，”而“不应被蓄意冷落。”见“Canada was purposely cut from speech, Frum says,” *The Globe and Mail*, 8 January 2003, A4 & Paul Celucci, *Unquiet Diplomacy*（Toronto: Key Porter, 2005），85页。

② Paul Celucci, *Unquiet Diplomacy*, 87－88页试图反驳这种谣言。

进攻的目标是伊拉克。这个国家穷凶极恶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早已想要摆脱10年来1991年海湾战争（Gulf War）压在他身上的层层制裁和限制。萨达姆的策略是离间1991年的盟军，逃避制裁，通过细菌甚至是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重建他的力量。通过运气和联合国武器核查的联合作用，萨达姆，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能被阻止的，但合理的解释是：在2001或2002年这并不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有所怀疑，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共谋。

然而，到2002年中期，很明显布什打算发动伊拉克战争。那时，克雷蒂安在底特律会见了布什。关于会议的报道足够细致——布什怂恿他反对伊拉克，而克雷蒂安也已经改变了原先的立场。他之前认为，只有在伊拉克给全世界带来了明显的、迫近的危险时，才有必要动武。[①] 克雷蒂安私下告诉布什，如果美国保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加拿大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将会大大提高。

联合国的授权不会立即到来，克雷蒂安的支持也不会。美国官方发动战争的理由——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准备投入使用——很单薄，在西方世界的有智之士中受到广泛怀疑。联合国外交也帮不了美国。美国决定不去等待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最后结果的行为，导致了更多的强烈反对。法国在联合国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正如一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家后来说的那样，“墨西哥人、加拿大人、智利人——我们在这个半球上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站在我们这边。”[②]

才能和外交破坏了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加拿大，总的来讲或特别是在魁北克，最终的想法似乎就是群众的意见。在加拿大，没有一个

---

① 会议只进行了半个小时，随后是一场新闻发布会。http://archives.cnn.com/2002/ALLPOLITICS/09/09/bush.iraq/index.html.

② 语出 Martin Indyk，引自 Philip H. Gordon and Jeremy Shapiro，*Allies at War: America, Europe and the Crisis Over Iraq*（New York: McGraw-Hill, 2004），145.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当时的回应是设法使加拿大、智利和墨西哥的大使被解职。

地方，其公众的意见是作为美国建立的“自愿联盟”的一部分而支持战争的，在魁北克尤其如此。

528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魁北克的地位非常重要。在4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曾3次卷入战争，对此魁北克要么从一开始就并不热心支持，要么半途而废。在1917和1942年，政府曾在魁北克为海军进行强制的征兵和征税，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历史都生动地记载和描写了这些事实。在韩战中，没有产生同样的冲突，当然这是由于联合国维和机制在20世纪末没有唤醒古老的英法恶魔。

但伊拉克战争却把他们唤醒了。从有些方面来说，这是让人十分震惊的。为了抵消英国与加拿大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为了他们的亲昵关系为美国做了很多。他们称美国才是真正的强国，而英国与加拿大仅仅是效仿者。这种对美国的看法似乎在2001到2003年被有力地颠覆过来，而这种颠覆显得很突然。分析人士反对的理由各异，但是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因为魁北克反对军国主义的传统冲击了美国最近的好战形象，而且它不喜欢这种形象。① 2004年11月公布的一项投票将美国在多数国家与城市（包括加拿大与魁北克）持有的观点进行对比，发现79%的英籍加拿大人喜欢美国人，但是只有52%的魁北克人与他们看法相同——这跟西班牙人的认同程度相似。

2003年3月，在蒙特利尔发生的反战游行大大表明了魁北克人意见的波动，15万到25万人上街进行反战游行。在多伦多，类似的游行只有1万到3万人参加，但这并不表示英籍加拿大人支持伊拉克战争。所有的民意测验结果都表明他们并不支持，即使在人们认为是全国最亲美和最右翼的阿尔伯达省亦然。2003年3月的一项投票结果表明，与21.1%的支持美国的加拿大人相比，有50%以上的魁北克人反对美国政府的观点。关于“美国人”的说法，24.3%的魁北克人“完

① David Haglund, “Does Québec Have an ‘Obsession Anti – Americaine’?” Seagram Lecture, McGill University, 11 April 2005, www. misciecm. mcgil. ca/enpages/pdf/haglundseagramtext. pdf.

529 全否定”，而在全国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只有8.9%（大草原地区是5.9%）。①

在战争这一问题上，只有7.6%的魁北克人愿意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追随美国进攻伊拉克（后来确实如此），而在其他地区，这个数字是20%。这个数字在大草原地区达22.7%，不列颠哥伦比亚为16.5%，大西洋省份为17.8%，安大略省为20.4%。如果伊拉克战争得到联合国授权，加拿大其他地区将有59.6%的人同意加拿大参战，但在魁北克这个数字变成了42.4%，仍有50%的魁北克人持反对意见。这一政策被克雷蒂安政府所接受。因此，布什决定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攻打伊拉克的举措大大解除了加拿大政府内部可能因为魁北克的反对而带来的政治动乱。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观念的政治家来说，更有趣且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历史是两大势力的汇聚——两种语言将加拿大分为英国派与法国派，而在政治上则分为亲美派和反美派。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结合，克雷蒂安对此深表敬意。

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在观念上可能有着相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在加拿大并非独一无二。就像2005年初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说的那样，“简单说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激增的无可匹敌的势力感到既害怕又愤恨。”② 对超级大国美国的看法就变成了针对美国人的看法。再次引用皮尤另一份不同的调查，“大多数的西方国家认为美国人有着‘诚实’、‘创新’、‘勤奋’等美好品格。与此同时，不少国家认为美国人具备‘贪婪’、‘暴力’等负面特点。加拿大人与美国人的交往最多，也同样认为美国人‘贪婪’、‘暴力’，但是很少认为美国人诚实。而加拿大也是唯一一个有超过半数的人

① 最有用的意见分歧来自于卡尔加里投票公司，即JMCK Polling，见其“Global Sunday: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 and War with Iraq（March 2003），”www.queensu.ca/cora/polls/2003/March-Support_for_USA_Iraq_Plan.pdf，感谢卡丽·斯皮尔（Carrie Spear）提供的这一参考。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Trends 2005，106：http：//pewresearch.org/reports/？ReportId=6.

（53%）认为美国人粗鲁的西方国家。”①

一些评论员的见解更加深刻。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意测验者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曾说，加拿大人，包括英裔加拿大人在价值观上与美国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欧洲人却越走越近。在宗教等话题上，亚当斯有民意测验的数据支持其观点。② 史学家格拉纳茨坦（J. L. Granatstein）曾反复提到，确实，加拿大人已经并且经常表现出他们在个性上的反美倾向。③ 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似乎认为，与美国人的这种差异完全是加拿大人造成的，并且认为如果加拿大人对美国有负面情绪，那么他们应该默默忍受。

530

这样的感觉似乎此消彼长。如果反美主义在加拿大人的生活中从未间断，那么对美国的好感也同样如此，而且这种好感有时会产生反作用。在文化上，比起本国其他辽阔且极其多样的土地上的人们，有些美国人更接近加拿大人。当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2004年非常具有分裂性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时，一张卡通漫画很快在美国盛行，上面描写的是“加拿大合众国”（从东北到华盛顿，加上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州）与“耶稣之地”——一个分离出来的国家，即南部、平原地区及西南地区。④ 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及两国文化的观点，不仅带有地方性，而且带有时代特征，那些记得“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老一代人很可能感觉自己与美国人很相像。2003年布什发动战争时，克雷蒂安没有参战，而反对派和3位省总理——安

---

① Pew Global Research Project, “U. S. Image Up Slightly, but Still Negative,” 23 June 2005, 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 ReportID = 247.

② Michael Adams, *Fire and Ic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Myth of Converging Values* (Toronto: Penguin, 2003), 50.

③ J. L. Granatstein, *Yankee Go Home? Canadians and Anti-Americanism* (Toronto: HarperCollins, 1996).

④ 在其广播节目 *A Prairie Home Companion* 中，幽默作家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在2004年大选后告诉他的听众，加拿大人本来也应该被允许投票的，因为为布什投票的人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了，意思是一个痴迷宗教的国家。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播放的一个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检验了美国人对加拿大的情感，并发现大多数人对加拿大没有参与战争并不是特别恼怒。Paul Rutherford, *Weapons of Mass Persuasion: Marketing the War Against Iraq*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150-151.

大略的厄尼·伊夫斯（Ernie Eves）、阿尔伯达的拉尔夫·克莱因（Ralph Klein）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都高喊支持布什。

有趣的是，2004 年 12 月，布什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讲话时，呼吁的对象是传统的加拿大人（大概也是以这 3 位省总理为代表）。他回忆起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并认同她所做的一切，认为现在是为了相同的理由而再次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接待他的自由党总理保罗·马丁鼓掌表示赞同。他的政府将不会向伊拉克派兵，因为人民反对，但是他们会（再次）向阿富汗派兵。

531

政治分歧

阿富汗问题在 2003 年至 2005 年并未进入加拿大政界的视野。自由党执政是主要事件，之后两年紧接着又出现了丑闻。

克雷蒂安高估了他在自由党内的受欢迎程度，他领导自由党的时间过长。作为自由党领袖，虽然克雷蒂安曾成功地以令人羡慕的三连冠纪录连任，但他自己并没有赢得党内及议会的爱戴。由于暴躁、专横而且与众议员关系生疏，他造成了忠诚的真空，野心勃勃的人可能就会钻空子。果不其然，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财政部长小保罗·马丁。克雷蒂安在 1990 年的激烈大选中击败马丁从而成为自由党领导人，随后两人的关系变得僵化。马丁准备等待克雷蒂安离开，但是随着选举一次次过去，时间一年年流逝，他也日益衰老。在一些能干的政客的支持下，马丁开始着手获取全国各地选民的支持。克雷蒂安本来也可以赢的，但是自由党被说服了，觉得马丁的胜算更大。党内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已准备让新的领导人马丁替换旧的领导人。

作为回击，克雷蒂安解除了马丁财政部长的职务，这让马丁更有空闲去实现其领导人的目标。（马丁因此不用参加 2003 年 3 月围绕伊拉克战争召开的内阁讨论，而且也不用表明立场。）最后，迫于压力，克雷蒂安同意让贤。在 2003 年 11 月多伦多召开的大会上，马丁成为毫无疑问的获胜者，而克雷蒂安的告别演说却成为当晚最精彩的部分。

他滔滔不绝——自由党的传统福利政策、“赤字之战”、“清晰法案”等等。他补充说，“是因为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价值观的深深信念，我们才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与会人员不断起立鼓掌，为老总理的演讲欢呼，掌声响彻大厅。许多人相信，马丁本来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包括在对伊拉克问题的处理上。克雷蒂安的演讲警告他不要这样做。 532

马丁站在国家舞台中心的时间很短暂，只从2003年12月持续到2006年2月。起初，他看起来更加地关注于清除自由党中的反对因素，而不是攻击反对党。显然，他认为击败倒霉的保守党是势在必得的事情。由于面临一个著名的丑闻，在魁北克，自由党和政府方面的财政混乱，很明显，他们已经以吹嘘联邦主义和加拿大作为回报了。马丁很愤怒，重复着克雷蒂安在索马里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委任一个调查委员会要对这个“阿迪斯科目”（Adscam）的费用进行调查。同时，出于希望平息选民的愤怒，马丁在2004年6月参加竞选，就当前的议会来说才仅仅3年左右的时间。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形成自己的多数党，而不是克雷蒂安的多数党，并且能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势力。

这场赌博输得很惨。马丁低估了他的敌人。自从马尔罗尼开始，在一个后起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卡尔加里人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领导下，保守党第一次团结在一起。哈珀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进步保守党成员，后来在厌恶的情绪中离开了渥太华，并成为第一批号召一个新兴的右翼党来代替装模作样、易于妥协的进步保守党的人。他在回到右翼利益集团组织的私人领域——国家民众联盟（National Citizens' Coalition）之前是一直效命于改革派议会的。接替斯托克维尔沃作为联盟党的党魁后，哈珀开始清除那些守旧的保守党的糟粕，而这些东西在先前的乔·克拉克的领导下已经划归一个小的党派旗下。他反对任何类似的提议，但是在他作为领导人请辞之后，却试图去保护这些东西。兼并在2003年10月已经正式完成。合并之后的党派被叫做“保守党”，上次使用这一称呼的时间是1942年。

哈珀的合并之举使得保守党在地域方面延伸到大西洋诸省与安大

533 略省。哈珀比起以往的领导人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他身兼重任，这其中包括签署一份2000年宣言，号召政府在城市周围“打造一个防火墙”，从而去防止自由党的不利影响。他曾支持布什总统2003年3月在伊拉克的战争，并且指责政府不跟从其天然盟国的引导。[①] 根据加拿大的政治学家所说，应该把哈珀定义为一个乡巴佬，或者说是一个严格的建筑商，这是不公平的，理由是联邦政府应该停留在1867年的结构上。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防等其他方面。

在2004年的竞选中，哈珀在宣传他自己的想法方面失败了。加拿大人对马丁和自由党人已经失望了，但是并没有失望到说想要给哈珀和他的保守党一个机会。[②] 马丁的竞选完全是基于他之前所受到的支持（竞选宣传板上的口号写着“保罗·马丁的自由党”,[③] 很明显是要把它同先前糟糕的克雷蒂安的自由党区别开来），一开始效果很不好。他的操纵者们很快从积极的方面调整到消极的方面，强调哈珀的极端和严苛——一些保守党领袖的缺点，并且提出了确凿的证据。在传统的消极竞选中，自由党推翻了少数人的政府，给马丁第二次机会去实现他的承诺。他曾承诺，要给加拿大的政治带来崭新的清新的风貌。在一次竞选中，自由党在魁北克败得很惨，这也预示着魁北克对于“阿迪斯科目”丑闻的愤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马丁本希望能在魁北克用一种更加柔和、更加适宜的办法比克雷蒂安做的更好，这种办法就是用“非对称的联邦”这个互不连贯的信条来对付魁北克的民族

---

① William Johnson, *Stephen Harper and the Future of Canada*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5), 319 - 322.

② 关于保守党决心将自由党的污点从加拿大清除的最好例证是2006年大选后《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文章（Les Whittington, “Emerson Frustrated with Conservatives,” 21 April 2006），出自他的一位部长，名为戴维·爱默森（David Emerson）的前自由党人与他的自由党前任助手戴维·埃普沃斯（David Epworth）。据埃普沃斯与这位部长交谈之后作的笔录，爱默森说“私底下，保守党人是比自由党人更坏的党徒，”他引用爱默森说的话，“他们憎恨该死的自由党人，并尽全力损毁他们。”

③ 甚至有人讨论为自由党“重新命名”，另取一个名字，以摆脱其刚过去这段时期被认定的负面印象。新名字可能是什么很难想象——或许是保罗主义者，抑或是马丁主义者。

主义分子。相反，他做得更糟。

马丁的第二次机会持续了 18 个月。马丁政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中包括在 2005 年 11 月签署加拿大民众的财政协议，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与财政方面相适宜的建议达成一致。这次运动为加拿大的鹰派提供了新的武器。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促进了与布什政府之间的关系，派兵前往阿富汗。（美国人在伊拉克面临无止尽的叛乱，因此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以减缓他们军队的自身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通过缩减美国驻扎在阿富汗的军队的数量来缓解他们自身的困境。）534 另一方面，这与布什的一个优先政策不符，即在导弹防御体系内展开合作的政策。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但越来越来的人意识到总理在重大问题上无法做决定。同时，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自由党的令人惊心不已的机会主义，这着实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有个报纸专栏作家戏称马丁为“犹豫先生”，对这一绰号马丁先生已经忍无可忍。）[①] 一位著名的保守党人投向了自由党的怀抱，就立即被提名为内阁成员。不久，自由党由于在选票上获得平局而勉强突围，随后根据议会传统，由于获得主席的决定票而成功渡过难关。

2005 年 11 月，马丁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在众议院中的失利使得他又参加了 2006 年 1 月的选举。在 2004 年选举的时候，他故技重演，但这次却没有成功，收效甚微。他在选举中败北，民众直接投票的情况比议院实际投票的情况还惨。随后，马丁辞去了自由党领袖和总理的职务。2006 年 2 月，史蒂芬·哈珀作为保守党的少数党政府领袖当选为联邦总理。

结论

现在推测哈珀政府能够执政多久还为时过早。可能这也标志着漫长岁月中自由党及其当政的时代要在加拿大的历史中落幕了。从 1935

① 参见连环漫画《金发女郎》中性情暴躁的老板。

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有70年了，也可能是从劳里埃爵士开始的接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那段加拿大历史总是和跨越加拿大边界的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总是伴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起起伏伏，无一例外。

伴随着哈珀在2006年的选举成功，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从某种535 方面讲，是20世纪30年代的回归。事实上，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外交政策上，都是一种回归，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即在自由主义所坚持的集体主义的福利社会制度扎根之前。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政府所实行的低税、低风险政策就避免了与省级优先权间的混乱——这与哈珀所期待的景象相差无几。1939年，当加拿大的外国友邦宣称在海外冲突中采取积极参与政策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加拿大政府的扩张以及为了支持国家战争消耗的省级政权的萎缩。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来铭记20世纪30年代。那时，加拿大与其主要的盟国——英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立场都出现了矛盾。确实有理由对英国政策的趋向失去信心，也应该担忧加拿大说英语与说法语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趋向。1911年之后，当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的保守党政府在魁北克和说英语的地区以不同的宣讲形式赢得选举的同时，也给保守党带来了持久的、毁灭性的后果。2001年之后，在对外政策上又出现了不同，而且还伴随着语言的不同。

与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的时候就对其失去了兴趣不同。很少人会料到美国在加拿大海岸望而却步，是地理、经济和文化使然。美国——另一个富饶的以英语为母语且临近加拿大的大国，在历史上长期维系着英法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本国的关系。两个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克雷蒂安和马丁在历史上都曾为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冲突——本国英语区和法语区的关系及与老大哥之间的关系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是只有善意的忽略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更多强制性的尽快的行动呢？只有静观其变才能见分晓了。

形势要求必须对加拿大的现状做出调整。在自由党统治加拿大的

一个世纪里，尤其是1945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加拿大的人口统计 536 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米提人在内的原住居民的变化最显著，他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增多。这使得原住居民、土著问题和土著意见在当地的现实生活中扮演了比1815年以来更重要的角色。从某些方面来讲，加拿大回到了她的起点。

21世纪初也凸显了这种回到起点的迹象。15、16世纪的气候及其变化塑造了加拿大。2006年，全球变暖似乎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冰川融化到飓风频仍，它们在加拿大和北美的影响都在提醒着加拿大人，“国界”并不能使他们远离世界发展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是洲际的发展。远远不止气候变化，疾病也没有边界概念。加拿大的历史和原住居民都已证明了不明或失控的瘟疫会给全体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在21世纪，曾让“加拿大原住居民”大批死亡的疫情会重现吗？许多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也相信如果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加拿大和其他所有国家坚定、统一的承诺。

同时，大规模的移民也在改变加拿大，正如它也在改变美国。政治体系见证了这种变化。就代表席位来说，一个接一个的少数民族都设法在政府中被选举或任命。而这是否会给加拿大政府的政策或者是加拿大整个社会的态度带来影响还不得而知。加拿大的组织形式、议会、民主文化、君主制都出人意料地持续了很久。但是象征着加拿大政治体制延续性和适应性的国王代表却历史上第一次是出生在香港的女性——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Adrienne Clarkson），在她之后是海地裔黑人总督米夏埃尔·让（Michaelle Jean）。这是旧瓶装新酒的一个例子——守旧却又象征着新事物。

用多元文化这个最标准的时髦语来描述（也是掩盖）一个多移民 537 国家的性质可能还远远不够。多元文化或许仅仅是移民向一个更庞大且差异更大的民族融合中的一个暂时现象。尽管如此，20世纪末的人口统计即使不是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性质的彻底修正，也暗含了对这个国家本质的再度审视。

致　谢

撰写本书是一项复杂而艰辛的任务，虽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见证该过程的人而言。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盖尔所给予的恩惠。她的宽容和支持令我能够平稳地进行此项目。

但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老朋友，当时作为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专员的罗伊·麦克拉伦。听说企鹅出版社正在寻找一位作者，罗伊设法令出版商和我得以实现合作。

协助我完成此书完全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直以来，我最为感激我的研究助理们，特别是鲁特哈、玛丽亚·班达、亚塞明和珍·哈苏姆；我的学生，他们耐着性子从看似无尽无休的有关 18、19 世纪的聒噪中挺过来；还有我的助手玛丽莲·拉维尔，在缓慢完成的过程中，她是忠言和鼓舞不竭的源泉。承蒙我的朋友道格和约翰·英格利希给予的极大恩惠，我在自觉江郎才尽之时，得到了适时的建议和现成的史实。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历史专业的格卢斯金教职。格卢斯金教职是由格卢斯金家族慷慨资助，鼓励进行研究的职位。此外，它使申请国家拨款且幸运拥有之的人，其压力得以缓解；使他们有效地避开了对少量奖金无休止申请的痛苦和乏味

的经历，而这些少量的资金是 21 世纪学术活动中最恼人的部分之一。本人谨对格卢斯金家族切合实际且精心筹划的帮助表示无上感激。

罗伯特·博斯韦尔

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bott, Sir John 约翰·阿博特爵士 243, 475

Abenaki people 阿布纳基人 77

Aberdeen, Ishbel, Lady 伊莎贝尔·阿伯丁夫人 264

Aberdeen, John Hamilton – Gordon, Lord 约翰·汉密尔顿–戈登·阿伯丁勋爵 264

aboriginal peoples 原住民 see Native peoples 见土著人

Acadia: British 英属阿卡迪亚 38, 67, 68, 74, 75, 76, 77 – 79, 81 – 82, 95; French 法国的 28, 53 – 54; named 命名 14

achat chez nous 抵制外货 337

Action democratique du Québec (ADQ) 民主行动党（简称 ADQ） 505, 506

Act of Union of 1840 《1840 年联合法案》 186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100

Adams, 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 146, 371

Adams, Michael 迈克尔·亚当斯 530

Adscam 阿迪斯科目 532, 533

Afghanistan 阿富汗 502, 526, 531, 533 – 534

African Canadians 非洲裔加拿大人 110, 206, 251, 423

see also slaves and slavery 另见奴隶和奴隶制

agriculture 农业 231 – 232, 233 – 234, 250, 251, 253, 312, 316, 329 – 330; Europe 欧洲 413; Native 本土· 5, 6, 9 – 10; pre –

Confederation 前联邦 50, 51 – 52, 53, 82, 132, 167 – 168, 192; trade 贸易 278, 413 – 414; wartime 战时 294, 349 – 350
aircraft 飞机 286, 391, 494 – 495
air force, Canadian 加拿大空军 353, 357, 494 – 495, 518
air raid alerts 空袭警报 397
air traffic control strike 航空管制员罢工 455 – 456
Alaska 阿拉斯加 4, 116, 271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421
Albany, NY 纽约州奥尔巴尼市 32, 49
Alberta 阿尔伯达 232, 250, 385, 405, 406, 411; oil, 石油 386, 391, 428 – 429, 472 – 473, 474; politics 政治 312, 334, 463, 469, 494, 514
Alcan 阿尔肯铝业公司 258
alcohol 酒 38, 96, 125, 262, 287, 288, 317, 325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417, 438, 447
Algonquins 阿尔冈昆人 9 – 10, 20, 28, 31, 35
Allan, Sir Hugh 休·艾伦爵士 224 – 225
al – Qaeda 基地组织 502 – 503, 525, 526, 527
Alverstone, Richard Webster, Lord 理查德·韦伯斯特·阿尔弗斯通勋爵 272
"America," "美洲," 14
American Canadians 美国裔加拿大人 132, 133, 134 – 135, 159 – 160, 176 – 177. See also Loyalists 另见效忠派
American colonies: relations with Native peoples 美洲殖民地：与土著人的关系 66 – 67; Revolution 革命 100 – 110, 115, 130; settlement 定居 38, 46, 79 – 80
American question 美国问题 176 – 177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独立战争 100 – 110, 115, 139
Amherst, Jeffrey, Lord 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 85, 87, 97
Amiens 亚眠 308
Amin, Idi 伊迪·阿敏 423
Amish 门诺派教徒 110
Anglicanism 英国国教 128 – 129, 164 – 165, 177 – 181, 198, 199, 503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英美关系 111 – 112, 157, 196 – 197, 223, 271, 272 – 273, 319
Annapolis Royal 安纳波利斯罗亚尔 78
Anne, Queen 安妮女王 65
annexation 合并 159, 202 – 203, 204, 223, 240, 501
anti – Americanism 反美主义 279, 389, 407 – 408, 530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337，339，340，561（注释15）
Arab－Israeli war 阿以战争 427
architecture 建筑 69－70，168－169，260，285，394，404，406，439
Arctic Archipelago 北极群岛 217
armed forces：British forces，in Canada 武装力量：驻加拿大英军 220，222；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在英属北美 145，153，158，180，203，208，209；Canadian 加拿大的 264－266，276，277，280，289－291，305，357，378－379，448，476，513；in New France 在新法兰西 48，50，53，75，80；uniforms 制服 476；women in 入伍女性 357. See also defence policy and spending；militia 另见国防政策与开支；民兵
army，Canadian 加拿大军队 357，448，493
Arnold，Benedict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104
Asquith，H. H. H. H. 阿斯奎思 303
Asselin，Olivar， 奥利瓦尔·阿塞林， 294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议会 424－425
assimilation 同化 424
Athapascan language group 阿萨巴斯卡语族 7
Athenia 雅典尼亚号 344
Attlee，Clement 克莱门特·艾德礼 372
Auden，W. H. W. H. 奥登 326
Australia 澳大利亚 153，232，318，319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车工业 258，332，365，406，414－415，440
Autopact 汽车协定 414－415，416
Avro Arrow 阿夫罗箭式战斗机 391，392
Axworthy，Lloyd 劳埃德·阿克斯沃斯 522
Aylmer，Matthew，Lord， 马修·阿尔默勋爵 173

baby bonus 婴儿津贴 350，367
baby boom 婴儿潮 367，393，404－405，408，426，438
Baker，James 詹姆斯·贝克 480
Baldwin，Robert 罗伯特·鲍德温 179，181，196
Baldwin，Stanley 斯坦利·鲍德温 314，320
Baldwin，William Warren 威廉·沃仑·鲍德温 179
Balfour，Arthur，Lord 阿瑟·鲍尔弗勋爵 320
Balfour Report 鲍尔弗报告 320－321

Bank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银行 258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银行 345
Bank of Montreal 蒙特利尔银行 168, 207, 219, 222, 257, 455
Bank of Nova Scotia 丰业银行 257
Bank of Upper Canada 上加拿大银行 207
bankruptcy 破产 330 – 331, 474
banks and banking 银行和银行业 219, 222, 256 – 257, 258, 285 – 286, 330, 345, 455
Baptists 浸信会 177
Barclay's Bank 巴克莱银行 258
Baril, Maurice 莫里斯·巴里尔 520
Barrette, Antonio 安东尼奥·巴雷特 395
barter 物物交易 330
Basques 巴斯克地区 12 – 13, 14
Battle of Seattle 西雅图之战 523 – 524
Bay of Fundy 芬迪湾 27 – 28
beaver 海狸 26, 55, 115, 117; giant 巨大的 5
Bell, Alexander Graham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234, 260
Bennett, Richard Bedford (R. B.) 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简称 R. B.） 327 – 328, 329, 330, 331, 333, 345
Beothuks 贝奥图克人 96
Beringia 白令陆桥 4, 6
Bering Strait 白令海峡 3 – 4
Bermuda 百慕大群岛 108, 183
Bertrand, Jean – Jacques 让 – 雅克·贝特朗 451
Bidwell, Marshall Spring 马歇尔·斯普林·比德韦尔 177, 179
Bigot, Francois 弗朗索瓦·比戈 80, 85
bilingualism 双语制 135, 396, 439, 452, 457, 458, 462
Bill 22 《22 号法案》 452
Bill 101 《101 号法案》 457 – 458, 464
birth rates 出生率 52, 366, 367, 404 – 405, 406, 435 – 436, 504
bison 野牛 115
Bissoondath, Neil 尼尔·布松达 504
Black, Conrad 康拉德·布莱克 515
Black Rock, NY 纽约州布莱克罗克市 144
blacks 黑人 110, 206, 251, 423. see also slaves and slavery 另见奴隶和奴隶制
Blair, Andrew 安德鲁·布莱尔 249, 254
Blair, Fred 弗雷德·布莱尔 340
Blake, Edward 爱德华·布莱克 230
Blanchard, James 詹姆斯·布兰查德 507
Bloc Québecois 魁人政团党 493,

496, 505
Board of Grain Supervisors 谷物监察委员会 329
Board of Railway Commissioners 铁路委员会 254
Boer War 布尔战争 267 – 270
BOMARC 波马克远程地空导弹系统 398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 131, 137, 140, 141, 145
Booth, William 威廉·布思 261
bootlegging 非法制造（或运输、贩卖）酒等 325
Borden, Henry 亨利·博登 346
Borden, Sir Robert: First World War 罗伯特·博登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 302 – 307, 308 – 310;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外交与国防政策 274, 277, 280 – 281, 295 – 296, 318; leadership and personality 领导能力与品格 287 – 288, 294 – 296, 347, 535; ralilways 铁路 286; trade policy 贸易政策 279
Bosnia 波斯尼亚 518, 520
Boston 波士顿 100, 101, 160
Bouchard, Lucien 卢西恩·布沙尔 492, 493, 496, 506, 507, 508, 510 – 511
boundaries 边界 76, 100, 115, 158 – 159, 196 – 197, 203, 273 – 274. See also Canada – U. S. border, 另见加美边界
boundary disputes 边界争端 129, 151, 158, 253, 271 – 272
Boundary Waters Treaty《边界水务条约》274
Bourassa, Henri 亨利·布拉萨 269, 289, 293, 294, 305, 306, 462
Bourassa, Robert 罗伯特·布拉萨 446, 447 –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6, 487 – 489, 491, 493, 494, 495, 505
Bowell, Sir Mackenzie 麦肯齐·鲍威尔爵士 243
Bracken, John 约翰·布拉肯 363
Braddock, Edward 爱德华·布雷多克 81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 515
branch plants 分厂 258, 332, 406, 484
Brant, Joseph 约瑟夫·布兰特 122
Britain: allies 英国：协约国 275; immigration from 移民来源 152, 167, 180, 290, 366, 404; trade 贸易 192, 193 – 194, 195, 258 – 259, 331 – 332, 413, 422. See also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British Empire, 另见英美关系；大英帝国
British – American relations 英 – 美关系 See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见英美关系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73 – 74,

151, 308; attitudes toward 对…的态度 147, 219–220, 248, 249, 264, 279–280, 292, 320, 339, 374; end of 最终 373, 379–381, 394, 438; imperial relations 帝国关系 153–154, 189–190, 193–195, 263–272, 275–276, 280–281, 289, 302–304, 309, 318–321; trade 贸易 118, 131, 154, 196. See also Britain; Commonwealth, 另见英国；英联邦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94–95; economy 经济 160; the French in 在……的法国人 93–94; governance 统治 120, 126–129, 160, 183, 184–186, 189, 195–196, 200; population 人口 116, 132–133, 134, 167, 180, 190, 191; 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116–117, 120–121, 132–133, 133–134, 190. See also American colonies, 另见美洲殖民地

British North America (BNA) Act 《英属北美法案》 213, 243, 257, 318, 321, 462

Brock, Sir Isaac 艾萨克·布罗克爵士 140, 141, 142, 143

Brown, George 乔治·布朗 189, 201, 211, 236

Bryce, James, Lord 詹姆斯·布赖斯勋爵 272–273

buffalo 水牛 231

Buffalo, NY 纽约州布法罗市 144

Burgoyne, John 约翰·伯戈因 106–107

Bush, George H. W. 老布什 482, 483

Bush, George W. 小布什 418, 503, 526–527, 529, 530

By, John 约翰·拜 154

Byng, Julian, Lord 朱丽安·宾奇勋爵 314

Bytown 拜城 154–155

John Cabot 约翰·卡博特 13

Cahokia 卡霍基亚 10

caisses populaires 大众银行 286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116, 129, 159

Campbell, Kim 金·坎贝尔 495–496, 530

Canada: anniversary 加拿大：建国100周年纪念 314–315, 443; expansion 扩张 217, 220; governance 统治 219, 222–223, 223–224, 263–264, 309, 321, 325; population 人口 217; size 尺寸 217

Canada, Province of 加拿大省；governance 统治 186, 195, 207–208; party system 政党制度 196; reformists 改革者 195

Canada Act 《加拿大法案》 127 - 129, 130, 177
Canada Pension Plan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410 - 411
Canada, union of 加拿大联盟 184 - 186
Canada - U. S. border 加美边界 111, 154, 157, 209 - 210, 273 - 274, 501 - 502
Canada - U. S. relations 加美关系 160 - 161, 206, 218, 279, 373 - 374, 389, 407, 478, 483, 501 - 502; Cold War 冷战 397, 398 - 399; 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 389; defence 国防 420 - 421, 513, 533; 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 国际联合委员会 272 - 274; Iraq War 伊拉克战争 527 - 532; 9/11 9·11恐怖袭击 525 - 526; Québec 魁北克 507, 528 - 529;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416 - 418, 427
Canada - U. S. trade 加美贸易 207, 332 - 333, 375, 477; auto sector 汽车部门 414 - 415; energy 能量 386, 388, 428;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203 - 205, 210, 278, 334, 478 - 480, 481 - 486, 501; softwood lumber 软木木材 485 - 486, 525; tariffs 关税 238, 239; wartime 战时 357 - 358
Canada West: education 加西：教育 199; immigration to 移民目的地 198; reformists 改革主义者 211. See also Upper Canada, 另见上加拿大
Canadian Airborne regiment 加拿大空降团 518
Canadian Alliance 加拿大联盟党 512, 532
Canadian and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合会 453 - 454
Canadian Expeditionary Force 加拿大远征军 290, 296, 298, 346
Canadian Labour Congress 加拿大工人大会 453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加拿大医学协会 330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加拿大国家铁路 256, 286
Canadian Northern Railway 加拿大北方铁路 256, 258, 286, 316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224 - 227, 229, 232, 233, 254, 286
Canadian Wheat Board 加拿大小麦局 329
Canadiens 法裔加拿大人 71 - 72, 104, 124
canals 运河 152, 153, 154 - 155, 168, 192, 200, 234
CANDU 加拿大加压重水反应堆

387, 388, 427
cannibalism 食人族 67
canoes 独木舟 6, 54, 125
Cape Breton Island 布雷顿角岛 68, 74, 126, 163, 164, 253, 420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406
captivity 被俘 66 – 67, 84
Carleton, Sir Guy, Baron Dorchester 盖伊·卡尔顿爵士，多切斯特男爵 97, 99, 101, 102, 104, 105, 110, 120, 127, 136
Carleton, Thomas 托马斯·卡尔顿 120
Carlos I 卡洛斯一世 25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486
Cartier, Sir George – Etienne 乔治 – 艾蒂安·卡蒂埃爵士 201, 211, 219, 225
Cartier, Jacques 雅克·卡蒂埃 14 – 15, 17, 18, 19, 25, 26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398
Catholic Church and Catholicism 天主教会与天主教徒 241 – 244; in Acadia 在阿卡迪亚 68; bishops 主教 47, 70, 98, 136, 137, 143; in Britain 在英国 44, 157;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在英属北美 128, 198; in Canada 在加拿大 503; education 教育 243, 261; English 英国人的 124; Irish 爱尔兰人的 198, 242, 293; in Lower Canada 在下加拿大 172; in New France 在新法兰西 30, 31, 32 – 34, 36 – 37, 70, 93; political involvement 政治介入 136, 143, 247, 260 – 261, 339, 378, 436; in Province of Canada 在加拿大省 198; in Province of Québec 在魁北克省 88, 94, 97 – 99, 100; in Québec 在魁北克 260, 262, 292, 364, 394, 436 – 437, 453; in Upper Canada 在上加拿大 181
Canadian Broadcast Corporation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简称 CBC） 393
Centennial 百年庆典 443
CF – 18 contract CF – 18 战斗机合同 494 – 495
Chamberlain, Joseph 约瑟夫·张伯伦 266, 267 – 268, 269, 270, 271, 342
Chamberlain, 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342, 347
Champlain, Samuel de 塞缪尔·德·尚普兰 27 – 30, 31, 32, 39
Chanak incident 查纳克事件 320
Charbonneau, Joseph 约瑟夫·沙博诺 437
Charest, Jean 让·查尔斯特 495, 496, 507, 510
Charles I 查理一世 43. see also Carlos I 另见卡洛斯一世
Charles II 查理二世 44 – 45, 46,

54, 55, 57
Charles V 查理五世 17 – 18
Charles X 查理十世 175
Charlottetown Accord 《夏洛特敦协议》 494
Charlottetown conference 夏洛特敦会议 211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权利与自由宪章》 450, 462, 464, 465, 467, 487
charters 特许状 27, 54
Chateau Clique 城堡派 171, 172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144
Chicago 芝加哥 273
child care 儿童保健 533
child labour 童工 236
China 中国 5, 153, 377, 421, 427, 517, 524; immigration from 移民自 227, 251, 422
Chippewa, Battle of 齐佩瓦战役 146
cholera 霍乱 173, 190 – 191
Chretien, J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让·克雷蒂安：财政管理 513;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对外政策与贸易政策 517, 519, 520, 526, 527, 529; Indian Affairs 印第安事务 424; Justice 司法 459; 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 品格与领导能力 493, 497, 514, 522, 531 – 532; Québec 魁北克 450, 462, 464, 505 – 506, 507, 509, 511
Chretien, Raymond 雷蒙德·克雷蒂安 520
Chretien, Wellington 威灵顿·克雷蒂安 353
Christianity, and non – Christian peoples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15 – 17, 27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80, 281, 347, 380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 See Anglicanism, 见安立甘教
Church of Ireland 爱尔兰教会 198, 199
Citadel 星堡 157
civil service 国内服务 391
Civil War 内战 See U. S. Civil War, 见南北战争
Clarity Act 《清晰法案》 511
Clark, Glen 格伦·克拉克 513
Clark, Joe 乔·克拉克 430 – 431, 457, 459, 461, 475, 476, 512, 517, 532
Clarkson, Adrienne 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 536
clergy reserves 教会保留地 133, 177
climate 气候 7, 9, 29, 49 – 50, 329, 330, 536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483, 514, 515, 520
Clinton, DeWitt 德威特·克林顿 155

Clinton, Sir Henry 亨利·克林顿爵士 107 – 108
Clovis culture 克罗维斯文化 7
coal 煤炭 233, 357, 385, 427
cod 鳕鱼 12 – 13, 14, 18
Colbert, Jean – Baptiste 让 – 巴蒂斯特·科尔贝 45, 47, 48, 49, 51
Colborne, Sir John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 157, 174, 175, 178 – 179, 181
Cold War 冷战 372 – 374, 376 – 377, 378 – 379, 380, 381, 394, 397 – 399, 407, 421 – 422, 427, 478, 513
Colombo Plan 利伦坡计划 380
colonial conference 殖民地会议 266 – 267, 270 – 271, 276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2
commerce and merchandising 商业和营销 234 – 235, 286, 337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帝国防务委员会 280
Common Market 共同市场 413, 422
Commonwealth 英联邦 321, 325, 331 – 332, 374, 379 – 380, 413.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另见大英帝国
Communaute des habitants 共同体成员 31
communications 通迅 152, 189, 190, 219, 286, 521 – 522
communism 共产主义 310, 325 – 326, 377, 378, 379, 380, 381, 398, 416 – 417, 421 – 422, 453, 478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358 – 359, 372, 373, 375, 379, 384
Company of a Hundred Associates 百人公司 29, 31, 35 – 36, 37, 39
computers 电脑 521 – 522
Confederation 联合 210 – 213
Confederation of National Trade Unions/Confédération des Syndicats Nationaux 全国工会联盟 454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 CSCE） 421
Congo 刚果 520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会 177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有良心的反对者 305
conscription 征兵 232, 335, 418, 528;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296, 304 – 306, 307, 312, 316;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345, 346, 348, 351 – 353, 356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224, 230 – 231, 240, 250, 292, 295, 296, 306, 476, 532, 535;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200; Lower Canada 下加拿大 211,

212－213; Ontario 安大略，317; Québec 魁北克，230，244，315－316，337. see also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另见进步保守党
Constitutional Act of 1791 《1791年宪法法案》 127－129，130，177
constitutional reform 宪法改革 318，321，445，450－451，456－457，461，462－466，487，488－492，494，509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 101，102
contraception 避孕 436
Cook，James 詹姆斯·库克 116
Cooper，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84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CCF) 平民合作联盟（简称CCF） 334，352，363，373，390，396，407，410
co－operative 合作 286，329
crop 玉米 9
Corn Laws 《谷物法》 194，196，523
Corte Real，Gaspar 加斯珀·科尔特·雷亚尔 13
Council of Twelve 12使徒大会 164－165
counterculture 反主流文化 408，438
countervail 对抗 259，479
coureurs de bous 树林里的奔跑者 35，54
Craig，Sir James 詹姆斯·克雷格爵士 138
Cree 克里人 57
Crerar，T. A. T. A. 克里勒 311
crime 犯罪 325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208，259
Cross，James 詹姆斯·克罗斯 447
crown lands 王室土地 163，166，317
Crow's Nest Pass Agreement 《鸦窝关协定》 254
Cuba 古巴 88，257，398－399，448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导弹危机 398－399
currency 货币 257，344－345，375
Currie，Sir Arthur 阿瑟·柯里爵士 304
Curzon，George Nathaniel，Lord 乔治·纳撒尼尔·柯曾勋爵 320
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 389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342，421，423

Dalhousie，George Ramsay，Earl of 乔治·拉姆齐·达尔豪西伯爵 157，161，169，170，171，173
Dalhousie University 达尔豪西大学 146，170

Dallaire, Romeo 罗密欧·达莱尔 519
Davis, Bill 比尔·戴维斯 463
Davis Strait 戴维斯海峡 20
Dawson City 道森城 252-253
Day, Stockwell 戴卫国 512, 532
daycare 日托 533
D-Day D日 354
death rates 死亡率 52, 290, 367, 504
debt: British North America 债务：英属北美 153, 186; federal 联邦 313, 317, 476, 512-514; municipal 市级 330-331; provincial 省级 317, 329, 330
Declaratory Act (1778) 1778年《声明法案》 107, 118
defence policy and spending 国防政策与开支 264-266, 269, 279-281, 412, 420-421, 422, 494-495, 513, 516, 519, 533
deficit, federal 联邦赤字 313, 512-514
deforestation 森林砍伐 192-193
demographics 人口统计 See population 见人口
Dene 提纳人 7
department stores 百货商店 234-235, 286
DePoe, Norman 诺曼·笛福 446
Depression (1930s) 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 326-327, 328-331, 332, 333, 334, 335, 340, 363-364. See also economic depressions 另见经济衰退
detente 缓和 421, 427
Detroit 底特律 59, 63, 65, 71, 73, 97, 142
development aid 发展援助 380, 381
DEW line 远程预警线 378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191
Diefenbaker, John 约翰·迪芬贝克 390-392, 393, 396-397, 398-399, 430, 439, 446, 461
Diefenbunker 迪芬贝克地堡 397
Dieppe 迪耶普 353
Dieskau, Jean Erdman, Baron 让·埃德曼·迪斯考男爵 81
Dion, Stephane 史蒂芬·狄翁 510, 511
diplomacy 外交 223, 357-360, 381-385, 441
discrimination 歧视 403, 423
disease: early settlement 疾病：早期定居点 18, 27, 28, 29, 80; and immigration 和移民 73, 190-191, 197; in Native peoples 在土著人中 10, 33, 96, 139, 191, 536
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政教分离 164-165
Disraeli, Benjamin 本杰明·迪斯累里 209

distinct society 独特的社会 488, 489, 509
Dorchester, Baron 多切斯特男爵 See Carleton, Guy 见盖伊·卡尔顿
Dorset people 多塞特人 8, 9
Dosanjh, Ujjal 锡克· 杜新志 503
Douglas, Tommy 汤米·道格拉斯 410
Doukhobor 科波尔派 305
draft dodgers 逃避兵役者 418
Drake, Sir Francis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20
Drapeau, Jean 让·德拉帕 455
dreadnoughts 无畏舰 277, 279, 280 – 281
Drew, George 乔治·德鲁 370
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 – Temple – Blakwood, Lord 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汗密尔顿 – 坦普尔 – 布莱特伍德·达弗林勋爵 264
Dummont, Mario 马里奥·杜蒙 505, 506
dumping 倾销 259, 479
Dundas Street 登打士街 133
Duplessis, Maurice 莫里斯·杜普莱西斯 337, 338, 345, 370, 378, 391, 394, 395, 437, 508
Dupuis Frères 银壳开面怀表公司 235
Durham, John Lambton, Lord 约翰·兰布顿·德拉姆勋爵 169, 184 – 186, 195, 196

Eastern Europe, immigration from 来自东欧的移民 250
Eastern Townships 东部城镇 133, 167, 192
East Germany 东德 421
Eaton's 伊顿有限公司 235, 286
Economic Community 经济共同体 413, 422, 487
economic depressions 经济萧条 205, 206, 207, 259, 281, 289. See also Depression (1930s) 另见萧条(20世纪30年代)
economic planning 经济计划 368 – 369
Eden, Sir Anthony 安东尼·艾登爵士 382 – 383
education: agricultural 教育：农业的 234;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199 – 200; Catholic 天主教的 242 – 244, 261, 437; compulsory 义务 367; English – language 英语语言 451, 452, 457, 464; French – language 法语语言 242 – 244, 291, 464;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37; post – secondary 中学后 337, 366; universal 普通 394; women's 女性的 367
Edward VII 爱德华七世 270, 314
Edward VIII 爱德华八世 343

Egypt 埃及 382 – 384

1837 Rebellion (Upper Canada) 1837 年起义（上加拿大） 121, 181 – 182

1837 – 1838 rebellion (Lower Canada) 1837 – 1838 年起义（下加拿大） 174 – 176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382, 393, 398, 416

elderly 老年人 405

election, federal: to 1900 联邦选举：至 1900 年 224, 225, 230, 237, 244, 249, 250, 269 – 270; 1900 – 1945 period 1900 – 1945 年时期 279 – 280, 295, 305 – 306, 312 – 313, 314, 327 – 328, 334, 338, 346, 363; 1946 – 1980 period 1946 – 1980 年时期 390 – 391, 396, 409, 411, 418, 420, 426, 429, 430, 431, 457; debates 辩论 476, 481; post – 1980 1980 年后 466, 471, 474, 476, 478, 480 – 482, 483, 495 – 496, 505, 510, 511, 532 – 533, 534

elections, pre – Confederation: Lower Canada 前联邦时期选举：下加拿大 173; Province of Canada 加拿大省 195; Upper Canada 上加拿大 181

elections, provincial 省级选举 See individual provinces 见独立省份

electricity 电力 219, 233, 234, 235, 252, 260, 316 – 317, 385 – 386

Elgin, James Bruce, Lord 詹姆斯·布鲁斯·埃尔金勋爵 178, 195, 203, 204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20, 21

Elizabeth II 伊丽莎白二世 343, 374, 380, 393, 444, 465

emigration 迁出 250, 251, 262; to United States 到美国 197, 218, 262, 423, 515

employment 雇佣 See labour 见劳工

energy crisis 能源危机 427 – 429

energy policy 能源政策 391, 427 – 429, 430, 471 – 475

England 英格兰 See Britain 见英国

English languages: in Lower Canada 英语：在下加拿大 129, 167, 172; in Québec 在魁北克 251, 292, 336, 435, 439, 451 – 452, 455 – 456, 457 – 458, 464

English party 英国党 171, 172

entertainments 娱乐 286, 325, 393

Ericsson, Leif 雷夫·埃里克森 8 – 9

Erie Canal 伊利运河 155

“Eskimo” “爱斯基摩” 8

espionage 间谍 359, 372

Esquimalt 埃斯奎莫尔特 208,

222, 277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341
ethnic groups 民族团体 292 - 293, 403, 423, 503 - 504
Eves, Ernie 厄尼·伊夫斯 530
experimental farms 实验田 232, 234
exploration 开发 12, 13, 14 - 15, 17 - 18, 19 - 20, 25, 27, 55, 116, 125, 126; map of ……的地图 56
Expo 世博会 67, 444
F - 18 contract F - 18 战斗机合同 494 - 495
Family Compact 家庭契约 180
farmers 农民: conscription 征兵 307; Depression 大萧条 329
farmers' movement 农民运动 311 - 312
farms, experimental 实验田 232, 234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39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487, 488; asymmetric 不对称 533
federal - provincial conferences 联邦 - 省会议 425
federal - provincial relations 联邦 - 省关系 218, 249, 317 - 318, 328 - 329, 331, 345, 363 - 364, 368 - 370, 425 - 426, 462 - 463, 464 - 465, 487
Fenian Brotherhood 芬尼兄弟会 210, 213, 223
Fielding, W. S. W. S. 菲尔丁 249, 258, 259, 275, 479
firearms 火器 28, 32, 35, 117, 295
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 See Indians; Native peoples 见印第安人；土著人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281 - 282, 288 - 291, 293 - 294, 295 - 301, 302, 303 - 310, 311, 335, 340 - 341, 342
fisheries and fishing 渔场和渔业 12 - 14; American 美国人 76, 109, 156, 203, 205, 223, 239 - 240; Basque 巴斯克 12 - 13, 14; British 英国人 12 - 13, 18 - 19; French 法国人 14, 18, 53, 88; Native 本土 7; Newfoundland 纽芬兰 13 - 14, 18, 25 - 26, 53, 88, 94, 95, 109, 118;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 76, 109, 118, 203;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14
flags 旗帜 219, 282, 325, 360, 394 - 395, 408
Flavelle, Sir Joseph 约瑟夫·弗拉维尔爵士 307
Fleming, Sir Sandford 桑福德·弗莱明爵士 224, 225
Foch, Ferdinand 费迪南·弗洛克 308
Ford, Glenn 格兰·福特 477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投资 256,

257 –258, 316, 387, 408, 484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273, 302, 318, 320, 340 – 342, 381, 385 – 388, 513, 516 – 521, 530 – 531, 533 – 534; Québec 魁北克 441. See also Canada – U. S. relations 另见加美关系
forestry 林业 See timber industry 见木材业
Fort Beausejour 波塞诸尔堡 79, 81
Fort Chipewyan 奇普怀恩堡 125
Fort Detroit 底特律堡 See Detroit 见底特律
Fort Duquesne 迪凯纳堡 81, 85
Fort Frontenac 弗龙特纳克堡 59, 85
Fort Lawrence 劳伦斯堡 79
Fort Niagara 尼亚加拉堡 107
Fort Orange 奥兰治堡 32
Fort Oswego 奥斯威戈堡 82
Fort William 威廉堡 156
Fort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堡 82 –84
49° parallel 北纬 49° 158, 159, 196 –197
Foxe's book of Martyres 福克斯殉道者名录 241 –242
France 法国 275; attitudes toward 对…的态度 124; immigration from 移民来自…… 137 – 138, 250; imperial 帝国的 46, 74, 193, 438; relations with Canada 与加拿大的关系 359 –360, 365; relations with Québec 与魁北克的关系 441 –442, 443, 444 –445, 508; religion 宗教 261; wartime 战时 341, 344, 347, 359 –360
Francois I 弗朗索瓦一世 14, 15, 17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281
Freemasons 共济会 198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194, 195, 201 – 202, 240 – 241, 267, 278, 331, 477, 478 – 480, 481 – 486, 501, 525; sectoral 部门的 205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自由贸易协定（简称 FTA） 480, 482, 483, 485 –486, 501
French, Sir John 约翰·弗伦奇爵士 300
French Canadia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法裔加拿大人：在英属北美 159, 185; in New Brunswick 在新不伦瑞克 435; in Ontario 在安大略 293; population 人口 315, 442; in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289, 335; wartime 战时 293 – 294, 304, 344, 352
French Language: in the air 法语：在传播中 455 –456;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在英属北美 185, 196; education 教育 242 – 244, 291,

458; in government 在政府中 396, 452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23 - 124, 130 - 131, 135 - 138
French Shore 法兰西海岸 88
Frobisher brothers 弗罗比舍兄弟 125, 126
Front de libératon du Québec (FLQ) 魁北克解放阵线（简称 FLQ） 447, 448
Frontenac, Louis de Buade, Comte de 路易·德·弗龙特纳克伯爵 48, 55 - 57
fur trade 毛皮贸易 17, 26, 326; British 英国的 30, 54 - 57;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117, 125 - 126, 132, 155 - 156; French 法国 31, 35, 45, 51, 52, 54, 59, 64, 71 - 72; in the war of 1812 在1812年战争中 141 - 142
Gaelic 盖尔语 164
Gage, Thomas 托马斯·盖奇 101
Galbraith,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 392, 410
Galt, John 约翰·高尔特 166
Gang of Eight 八省帮 463 - 464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347, 359 - 360, 360, 441, 443, 444 - 445
gasoline tax 汽油税 317, 430
GDP 国内生产总值 364, 404, 471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rifs and Trade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 GATT） 413, 415, 523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 258
geography 地理环境 3 - 4, 6, 50, 69, 80, 115, 192, 386
geological survey 勘探队 234, 253
geology 地质环境 3 - 4, 386
George II 乔治二世 124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88, 94, 100, 124, 130
George V 乔治五世 276
George VI 乔治六世 343, 344, 393
Gérin - Lajoie, Paul 保罗·热兰 - 拉茹瓦 395, 439, 441
Germany 德国 275 - 276, 277, 375, 379
Getty, Don 丹·盖提 489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威廉·尤尔特·格拉斯通 222, 265 - 266, 267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523 - 525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536
GNP 国民生产总值 316, 350
gold 黄金 17, 25, 252 - 253, 272, 326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商品与服务税（简称 GST） 494
Gorden, Charles 查尔斯·戈登 265 - 266
Gorden, Walter 沃尔特·戈登 408,

410, 413, 414, 415
Gosford, Archibald Acheson, 2nd Earl of 阿奇博尔博·艾奇逊·戈斯福德二世伯爵 173, 174, 183
Gouin, Lomer 洛梅·古安 276
Gourlay, Robert 罗伯特·古尔利 179
Gouzenko, Igor 伊戈尔·古曾柯 372
government, size of 政府的规模 219
government debt 政府债务 See debt 见债务
governo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总督 126-127; of New France 新法兰西的 47, 48, 52, 70
governors general 大总督 264, 536
Granatstein, J. L. J. L. 格拉纳茨坦 530
Grand Banks 大浅滩 14, 18
Grand Trunk 大干线 206-207, 233, 254-256, 258, 286, 316
Grant, George 乔治·格兰特 407-408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See Britain 见英国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See Depression (1930s) 见萧条（20世纪30年代）
Great Western 大西部 207
Green, Howard 霍华德·格林 398
Greenway, Thomas 托马斯·格林韦 243
Grenville, William 威廉·格伦维尔 127, 128, 177
Grey, Albert, 4th Earl 艾伯特·格雷四世伯爵 264, 276
Grey, Charles, 2nd Earl 查尔斯·格雷二世伯爵 195
Groseilliers, Medard Chouart de 梅达尔·舒达尔·德·梅罗塞耶斯 54, 55
Grosse Isle 格罗斯岛 191
Group of Seven (G7) 七国集团（简称G7） 516
guerrilla activity 游击活动 107, 144-145, 182, 210, 223
Gulf of St. Lawrence 圣劳伦斯湾 6, 19, 68
Gulf War 海湾战争 527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权 136, 176
habitants 定居者 136
Haig, Sir Douglas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300, 304, 307-308
Haldimand,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 120
Haliburton, Thomas Chandler 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 160-161, 164
Halifax, NS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 78, 105, 163, 191, 208, 222, 277

Halifax Award 哈利法克斯裁决 239
Handsome Lake 汉森·莱克 139
Harkness, Douglas 道格拉斯·哈克尼斯 398
Harper, Elijah 伊莱贾·哈珀 492
Harper, Stephen 史蒂芬·哈珀 495, 532-533, 534-535
Harris, Mike 麦克·夏里斯 512, 513
Hatfield, Richard 理查德·哈特菲尔德 463
Hawke, Edward 爱德华·霍克 87
Head, Sir Francis Bond 弗朗西斯·邦德·黑德爵士 178-179, 181, 182
head tax 人头税 197, 251
health care 医疗保健 330, 367, 405, 409-410, 411-412, 476
health insurance 健康保险 405
Henri IV 亨利四世 26-27, 29, 43
Henry VII 亨利七世 13
Hepburn, Mitchell 米切尔·赫伯恩 346
Hertel, Francois 弗朗索瓦·埃泰尔 336
highways 高速公路 404
Hincks, Francis 弗朗西斯·欣克斯 196, 222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327, 340, 341, 342-343, 348, 351, 358
Hochelaga 霍什拉加 18
Hong Kong 香港 348, 353
horses 马 5, 6, 96, 117
hospital insurance 医院保险 409-410
housing 房屋 69, 366, 367-368, 394, 522
Howe, C. D. C. D. 豪 347, 348, 357, 368, 386-387, 391
Howe, Joseph 约瑟夫·豪 164-165, 193
Howe, Sir William 威廉·豪爵士 105, 106, 107
Hoxha, Enver 恩维尔·霍查 421
Hudson, Henry 亨利·哈得逊 55
Hudson Bay 哈得逊湾 55, 59, 68
Hudson River 哈得逊河 46
Hudson's Bay Company 哈得逊湾公司 54-56, 71, 125, 155-156, 158, 229; stores 商店 235, 286; territories 地区 94, 96, 217, 220
Hughes, Sam 萨姆·休斯 282, 289, 290, 294, 295-296, 307
Huguenots 胡格诺派教徒 45
Hull, William 威廉·赫尔 142-143
Hungary 匈牙利 383, 384, 421, 423
Huronia 休伦 33-34
Hurons 休伦人 18, 28, 31-32, 33-34, 70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527
Hyde Park Agreement 《海德公园协

定》 358
hydroelectricity 水力发电 233，252，260，385，388，427
Hydro – Québec 魁北克水力发电 439 – 440

ice age 冰川期 3 – 4，4 – 5，6
Iceland 冰岛 14
Ilsley，J. L. J. L. 伊尔斯利 347，348，357，369
immigration 移民 218，258，290，502，536；African 非洲的 423；to Alberta 至阿尔伯达 406；American 美国的 116；Asian 亚洲的 227，251，422 – 423，524；to British North America 至英属北美 152 – 153，198；and disease 和疾病 190 – 191，197；European 欧洲的 250，404；and Liberal party 和自由党 337；to Lower Canada 至下加拿大 132，133，167，173；Loyalist 效忠派 111；to Manitoba 至马尼拉巴 232；to Newfoundland 至纽芬兰 189；to New France 至新法兰西 49；to Nova Scotia 至新斯科舍 78，95，102，163 – 164；to prairies 至大草原 250；to Province of Canada 至加拿大省 189，197 – 198；to Province of Québec 至魁北克省 99，104；to Québec 至魁北克 337，435 – 436，458，488；refugees 难民 137 – 138，281，338，340，423，502；Scottish 苏格兰人 124；to United States 至美国 111 – 112，159，197；to Upper Canada 至上加拿大 134 – 135，167，176 – 177，180；of visible minorities 有色少数民族的 206，227，251，281，422 – 423，503，524；and voting rights 和投票权 305；war brides 战争新娘 366. See also emigration 另见移民
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 340
imperial conferences 帝国会议 276，309，318 – 319，320 – 321，331 – 332. See also colonial conferences 另见殖民地会议
Imperial War Cabinet 帝国战时内阁 304，307，318
income tax 个人所得税 307，317，345，351
India 印度 76，153，208，318，373，380，381，383 – 384，524；immigration from 移民来自 251，422，524
India affairs，department of 印第安事务部 424，425
Indian Department 印第安部 120
Indian Mutiny 印第安叛乱 208
“Indians” 印第安人 12. See also Native peoples 另见原住民
Indochina 印度支那 438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工业发展 51, 52, 154, 234, 235, 252, 262, 385, 406, 440, 524; wartime 战时 365. see also war production 另见战时生产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54, 193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 290, 367, 504
inflation 通货膨胀 429 – 430
intendants 地方行政长官 47
Intercolonial Railway 殖民地间铁路 224, 233, 254
interest rates 利率 471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刑事法院 520
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 国际联合委员会 27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24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国际贸易组织 523
internet 互联网 521
Interprovincial Railway 省际铁路 318
Inuit 因纽特 8, 9, 96, 423. see also Native peoples 另见土著人
Iraq War 伊拉克战争 527 – 529, 530 – 532, 533
Ireland 爱尔兰 21, 44, 157, 199, 266, 374; immigration from 移民自 152, 189, 198 – 199, 293
iron 铁矿石 253
Iron Ore Company of Canada 加拿大铁矿公司 475
Iroquois: Grand River 易洛魁人：格兰德河 122; in New France 在新法兰西 70; pre – Contact 接触之前 9, 10 – 12; relations with Americans 与美洲人的关系 46, 66, 107, 109 – 110; relations with British 与英国人的关系 97, 122; relations with Dutch 与荷兰人的关系 32; relations with Europeans generally 与欧洲人的普遍关系 76, 79 – 80; relations with French 与法国人的关系 18, 35, 38, 48 – 49, 80;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ve peoples 与其他土著人的关系 28, 33 – 34, 48, 139
Iroquuis Wars 易洛魁战争 31, 33 – 35, 38, 63
Islam 伊斯兰教 503
Isle St. Jean 圣让岛 68
Israel 以色列 383, 427
Italy 意大利 341

Jackson, 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146, 170
James II 詹姆斯二世 65
James III, "the Old Pretender" "老僭主"詹姆斯三世 65
Japan 日本 251, 275, 319, 348

Jay's Treaty 《杰伊条约》 139
Jean, Michaelle 米夏埃尔·让 536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140
Jesuits 耶稣会会士 32–34, 36
Jews 犹太人 251, 336–337, 338, 503
Johnson, Daniel, Jr. 小丹尼尔·约翰逊 505, 507
Johnson, Daniel, Sr. 丹尼尔·约翰逊爵士 442–443, 444, 445–446, 466
Johnson, Lyndon 林登·约翰逊 416, 417–418, 444
Johnson, Pierre–Marc 皮埃尔·马克·约翰逊 487
Just Society 公正社会 419–420
Kennedy, John F. 约翰·F. 肯尼迪 392, 395, 397, 398, 399, 416
Kent, Tom 汤姆·肯特 410, 411, 412
King, William Lyon Mackenzie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constitutional matters 宪法事务, 318, 319–320, 321, 369, 370;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rade policy 财政管理和贸易政策 330, 333–335, 357–358, 389;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340–342, 374–375, 375–376;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278, 288, 306, 311, 312–315, 317, 326, 328, 337, 338–339, 347, 351–352, 363, 390;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343–344, 345, 346, 354–356
King George's War 乔治王之战 75–76, 77–78
Kingston, ON 安大略省金斯敦市 59, 124, 191
Kipling, Rudyard 拉迪亚德·吉卜林 275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421, 516
Klein, Naomi 娜奥米·克莱因 524
Klein, Ralph 拉尔夫·克莱因 530
Klondike 克朗代克 252–253, 272
Knights of Labor 劳工骑士团 236, 237
Komagata Maru 驹形丸 281
Korea 韩国 422–423
Korean War 韩战 377–378, 381, 417, 528
Kosovo 科索沃 522
Kruger, Paul 保罗·克留格尔 268
labour 工人 235–237, 252, 310–311, 406, 430, 446, 522–523; child labour 童工 236; Québec 魁北克 453–454, 455–456; standards 标准 333; wartime 战时 311, 346, 350, 366; women 妇女 311, 366, 367
LaFontaine, Louis–Hippolyte 路易

斯-伊波利特·拉方丹 196, 201
Lake Champlain 尚普兰湖 81, 85, 101-102, 104, 157
Lalonde, Marc 马克·拉隆德 440, 459
land grants 土地补助 119, 120, 133, 134, 167
land lease 土地出租 232
land mines 地雷 520-521
Landry, Bernard 伯纳德·兰德里 511
language: Native 语言：土著的 11. See also English language; French language 另见英语；法语
Lansdowne, Henry, Lord 亨利·兰斯当勋爵 264
L'Anse-aux-Meadows, 梅多斯湾国家历史公园 9
Lapointe, Ernest 欧内斯特·拉普安特 315, 335-336, 337, 338, 344, 345, 347, 352
Laporte, Pierre 皮埃尔·拉波特 447, 448
de la Salle, Robert Cavelier 罗伯特·卡弗利耶·拉德萨莱 59
Laurendeau, Andre 安德烈·洛朗多 336
Laurier, Sir Wilfrid: defence 威尔弗雷德·劳里埃爵士：防御 265, 277-278, 280, 289;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rade policy 财政管理与贸易政策 240, 257, 258, 275; imperial affairs 帝国事务 267, 268, 270, 271, 276; and Mackenzie King 与麦肯齐·金 315;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230, 241, 243, 247-250, 256, 259, 292, 293, 304-305, 305-306, 311; prohibition 禁令 262; railways 铁路 253-254; and U. S. 与美国 272, 273, 274; women's suffrage 妇女选举权 263
Laurin, Camille 卡米耶·劳林 457, 458
Laval, Francois de 弗朗索瓦·德拉瓦尔 36-37
lead 铅 253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309-310, 318, 340, 341, 374
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 国联社团 340
Leduc, AB 阿尔伯达省勒杜克市 386
Lenin, V. I. V. I. 列宁 301, 310
Lesage, Jean 让·勒萨热 395, 437, 439-440, 440, 442
Lévesque, René 勒内·勒韦克：Bill 101 《101 号法案》 457, 458; constitutional reform 宪法改革 464, 465;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工业和经济发展 439, 440;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

涯 395, 445, 446 – 447, 453, 456, 467, 487
Levis, Francois, Chevalier de 弗朗西斯·希瓦利埃·德莱维 87
Liberal – Conservative party 自由–保守党 200, 201
Liberal party: Adscam 自由党：阿迪斯科目 532, 533;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200; Canada West 加西 200 – 201; elections 选举 429, 466 – 467, 496, 511, 512, 515 – 516, 533; leadership 领导权 311, 492 – 493, 531 – 532; Lower Canada 下加拿大 212 – 213; Manitoba 马尼托巴 491; in party system 在政党制度中 292, 313, 390, 419, 476, 482, 534; policy 政策 240, 241, 247 – 248, 304 – 305, 392, 396, 410, 490, 513, 520; Québec 魁北克 315 – 316, 337, 395, 441, 446, 451 – 452, 453, 481, 505; scandal 丑闻 277 – 278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 10, 218, 503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208
liquor 酒 See alcohol 见酒精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合·乔治 303 – 304, 307, 309, 318 – 320
log cabins 原木屋 69
London, ON 安大略省伦敦市 133
Lougheed, Peter 彼得·洛希德 473
Louisbourg 路易斯堡 74 – 75, 76, 85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59, 63, 65, 68, 88, 115
Louisiana Purchase 购买路易斯安那 116
Louis XIII 路易十三 29, 30
Louis XIV 路易十四 30, 36, 45, 57, 67, 68; and New France 与新法兰西 38 – 39, 47, 49, 55, 65
Louis XV 路易十五 69, 93
Louis XVI 路易十六 123
Lower Canada 下加拿大 124, 129, 168; Confederation 联邦 211, 212 – 213; governance 统治 135, 170 – 171, 185, 186; politics 政治 170 – 176, 211; population 人口 132 – 133, 133, 167; social division 社会划分 169 – 170; timber trade 木材贸易 132, 192
Lower Canada Rebellion 下加拿大叛乱 174 – 176
Loyalists 效忠派 105, 107 – 110, 111, 118 – 119, 124 – 125, 133 – 134, 135, 159 – 160, 167
lumber 木材 see timber industry 见木材工业
Lundy's Lane, Battle of 伦迪小路之战 146
Lyon, Sterling 斯特林·莱昂 465

Macdonald, Sir John A. 约翰·A. 麦克唐纳爵士 189, 393; Confederation 联盟 211;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对外政策与外交 223, 265 – 266; labour 劳动力 236; legal practice 法律实践 182;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219, 224 – 225, 227, 240 – 241; and Riel 与里尔 221, 229, 230; trade and finance 贸易与金融 222, 238, 279

MacEachen, Allan 艾伦·麦凯琴 426

Mackenzie, Sir Alexander (explorer) 亚历山大·麦肯齐爵士（探险家） 125, 126

Mackenzie, Alexander (PM) 亚历山大·麦肯齐（总理） 225, 247

Mackenzie, Sir William 威廉·麦肯齐爵士 256

Mackenzie, William Lyon 威廉·莱昂·麦肯齐 175, 179 – 180, 181 – 182, 193, 321, 338

Mackenzie King, William Lyon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See King, William Lyon Mackenzie 见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Mackenzie – Papineau battalion 麦肯齐 – 帕皮诺纵队 341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140, 146

Maine 缅因 143, 146, 158, 159

Maisonneuve, Sieur de 西厄尔·德·迈松纳夫 31

Maitland, Sir Peregrine 佩里格林·梅特兰爵士 157, 178 – 179

Malecite people 麦勒席人 77, 95

Manifest Destiny 天定命运 159

Manitoba 马尼托巴 221, 233; education 教育 242 – 244; politics 政治 243, 311, 312, 463, 491, 492; population 人口 232, 243, 250, 406

Manitoba Schools Question 马尼托巴学校问题 242 – 244, 269, 291

Mann, Sir Donald 唐纳德·曼爵士 256

Manning, Ernest 欧内斯特·曼宁 495

Manning, Preston 普林斯顿·曼宁 495, 496, 512

Mao Zedong 毛泽东 377, 421

maps 地图 25, 63 – 64, 115

Marchand Jean 让·马尔尚 456

Maria Theresa 玛丽亚·特蕾西亚 75

Marquis wheat 马奎斯小麦 232, 250, 260

Marriage 婚姻 52, 365, 366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375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375

Martin, Paul, Jr. 小保罗·马丁 493, 513, 530 – 531, 531 – 532, 533 – 534, 535

Martin, Paul, Sr. 老保罗·马丁 416, 441
Maryland 马里兰 98
Masons 共济会 198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66, 75–76
McGill University 麦吉尔大学 168, 337
McKenna, Frank 弗兰克·麦克肯纳 491
McLane, David 戴维·麦克莱恩 137
McMurtry Roy 罗伊·麦克默特里 464
McNaughton, A. G. L. A. G. L. 麦克诺顿 354
McTavish, Simon 西蒙·麦克塔维什 125
medicare 医疗保险 330, 409–410, 411–412, 476
Meech Lake Accord 《米奇湖协议》 489–492, 493
Meighen, Arthur 阿瑟·米恩 312–313, 314, 318, 319, 339, 352
Mennonites 门诺派教徒 232, 305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51, 99, 126, 131, 151, 154, 158, 193, 440, 523
merchandising and commerce 营销和商业 234–235, 286, 337
Mercier Honoré 奥诺雷·默西埃 230
metal, Native use of 土著人对金属的使用 5, 26
Methodists 卫理公会 177–178, 179–180, 261
Metis 梅蒂人 72, 217, 218, 221, 228, 229. See also Native peoples 另见土著人
Mexico 墨西哥 9, 17, 159, 197, 257, 477, 482, 483
Michilimackinac 米奇里马基纳克 71, 72, 97, 142
Mies van der Rohe, Ludwig 密斯·范·德·罗厄 406
Mi'kmaq people 米克马克人 75, 77, 95, 121
militia: British North America 民兵：英属北美 120, 136; Canada 加拿大 223, 237, 264–265;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51, 79, 84, 86. See also armed forces 另见武装部队
mining 采矿 233, 252–53, 316, 326, 349, 371, 388
Minto, Gilbert, Lord 吉尔伯特·明托勋爵 264, 269
Miquelon 密克隆 88, 360
missile defence 导弹防御 398, 534
missionaries 传教士 30, 32–34, 36, 77–78
Mississippi Valley 密西西比河谷 59, 159
Mohawks 莫霍克人 49, 70, 107, 493

Moliere 莫里哀 37
monarchism 君主政体 130, 396
monopolies 垄断 227, 233, 260
Monroe, James 詹姆斯·门罗 146
Montcalm, Louis - Joseph, Marquis de 路易斯 - 约瑟夫·蒙特卡姆侯爵 82, 84, 85, 86
Montgomery, Richard 理查德·蒙哥马利 104
Montmagny, Charles Huault de 查尔斯·于奥·德·蒙马尼 31
Montreal 蒙特利尔 38, 48, 51, 53, 86 - 87, 102, 104, 155; business and economy 商业与经济 125 - 126, 129, 194, 285, 455, 458; cholera 霍乱 190; English, 英语 167, 169, 292, 336, 435;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建立与发展 15, 31, 168 - 169, 191, 251; Hochelaga 霍什拉加 18; immigration 移民 337; Olympics 奥运会 455; party system 政党制度 292; riots 暴动 173 - 174, 270, 420; in War of 1812 在1812年战争中 143
de Monts, Pierre du Gua, Sieur 皮埃尔·杜瓜·西厄尔·德·蒙 27, 29
Morgan's 摩根大通 235
Mound Builders 美国原始印第安人 10
Mount Royal 皇家山 15
movies 电影 286, 325, 327
Mowat, Oliver 奥利弗·莫厄特 249
Mulroney, Br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布莱恩·马尔罗尼: 宪法改革 486 - 487, 488 - 489, 491, 492, 494, 495; foreign relations 外交关系 483, 517;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478, 479, 480, 482, 486; oil 石油 474 - 475;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475 - 477, 481, 495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504, 536 - 537
municipalities 市政府 329, 330 - 331
Murray, James 詹姆斯·默里 87, 97, 99
music 音乐 393, 408
Muslims 穆斯林 503
Mutual Aid 互助 359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482 - 485, 486, 501, 523
Nasser, Gamal Abdel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382, 385
Natchez Rebellion 纳切兹反抗 73
National Citizens' Coalition 国家民众联盟 532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全国妇女联合会 264
national debt 国债 See debt, federal 见联邦债务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国家能源计划 472 - 475, 476, 483, 488

National Indian Brotherhood 全国印第安兄弟会 424
nationalism：Canadian 加拿大的民族主义 292，338，345，389，407，413，419，435；Québec 魁北克 292－293，336－339，370，394－395，435，438－443，450，452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286，439－440
National Policy 国家政策 238－239，240－241
national treatment 国民待遇 483
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 全国印刷工会 236
National Languages 本土语言 11
Native peoples：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的土著人 121－122；and Canada－U. S. border 加美边界 111；disease 疾病 10，33，96，139，191，536；European contact 与欧洲人的接触 12，15，16－18，20－21，115－116；governance 统治 423－425；hunting 打猎 231；language groups 语族 11；in New France 在新法兰西 70－71；population 人口 10－12，64，94，115，190，423，504；poverty 贫困 330，405，522；pre－Contact 接触前 5－6，6－12，16；relations with British 与英国人的关系 75，96－97，141－142，151，158；relations with Canada 与加拿大的关系 218，228，533，536；relations with French 与法国人的关系 63，65，70，72－73，76，77，84；relations with Québec 与魁北克的关系 493；relations with United States 与美国的关系 139－140，151，158；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4－5；trade 贸易 26，35，38，48，55，57，77，96，117，122，125；treaties 条约 121－122，139，228；war practices 战争实践 66－67，84. See also specific peoples 另见特殊人群
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375－376，378－379，381，383，421，422，522
natural gas 天然气 386，427
Naval Service Act 《海军服役法案》 277，280
Navigation Laws 《航海法》 196
navy，Canadian 加拿大海军 277，280，281，357，378－379
Nehru 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383
Nelson，Horatio 霍雷肖·纳尔逊 137
Netherlands 荷兰 32，46，438
neutral rights 中立权 140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

32, 46
New Brunswick 新不伦瑞克：boundaries 边界 158, 159; colonial 殖民地的 119; Condeferation 联盟 211, 212, 213; economy 经济 160; governance 统治 126; politics 政治 143, 195, 463 – 464, 491; population 人口 132 – 133, 198; timber 木材 132, 152, 163, 192
Newcastle, Thomas Pelham – Holles, Duke of 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公爵 77
New Deal 新政 327, 333
New Democratic Party（NDP） 新民主党（简称 NDP） 396, 407, 410, 419, 426, 427, 476, 482, 490, 496, 512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38, 66 – 67, 101, 102, 143, 232
Newfoundland: birth rate 纽芬兰：出生率 406; Confederation 联盟 212; economy 经济 160, 405; fisheries 渔业 13 – 14, 18, 25 – 26, 53, 88, 94, 95, 109, 118; geography 地理 6; governance 统治 95, 162, 208; Irish in ……的爱尔兰人 189; Norse settlement 挪威人定居点 8 – 9, 12; politics 政治 195, 463, 491, 492; population 人口 95 – 96; railways 铁路 404; settlement 定居点 20; sovereignty 主权 68, 74, 88
New France: ceding of 割让新法兰西 87 – 88, 93; economy 经济 51 – 52, 64; expansion 扩张 59 – 60, 63 – 64, 73; governance 统治 29, 30 – 31, 35 – 36, 38 – 39, 47 – 48, 50, 52, 93; named 命名 17, 29; population 人口 31, 37 – 38, 52, 53, 69, 70; 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50, 69
New Netherlands 新尼德兰 38
newspapers 报纸 286
New York City 纽约城 32, 46, 66, 110, 155, 194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 101
New Zealand 新西兰 153, 318, 319, 494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大瀑布 233, 260
Niagara – on – the – lake, ON 安大略省滨湖尼亚加拉市 133
Niagara River 尼亚加拉河 143, 144
nickel 镍 233, 253
Nielsen, Erik 艾瑞克·尼尔森 476
Nightingale, Florence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259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长刀之夜 464
9/11 9·11 事件 525 – 526
Ninety – two Resolutions 《92 号决议》

174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418, 427
Nobel Peace Prize 诺贝尔和平奖 384
nobility 贵族 51, 52, 53
Norfolk, Henry Fitzalan – Howard, Duke of 亨利·菲查伦–霍华德·诺福克公爵 276–277
Normandy invasion 诺曼底人入侵 354
Norse 挪威人 8–9, 12
North Frederick Lord 弗雷德雷克·诺斯勋爵 100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莱纳 46
North Korea 北韩 377
northwest coast culture 西北海岸文化 7–8
North West Company 西北公司 125–126, 155–156
North – West Mounted Police 西北骑警 228, 310
Northwest Passage 西北通道 19, 20, 25, 55
Northwest Territories 西北地区 227
Notre Dame church (Montreal) 圣母大教堂（蒙特利尔） 169
"notwithstanding" clause "虽然"条款 465
Nova Scotia: blacks in 在新斯科舍的黑奴 110; boundaries 边界 76, 94–95; colonial 殖民地的 77, 81; Confederation 联盟 211, 212; economy 经济 160; fisheries 渔业 76, 109, 118, 203; immigration 移民 78, 95, 102; mining 采矿 385; named 名为 68; politices 政治, 101, 102, 143, 160–161, 164–165, 195; Scots in 在……的苏格兰人 163–164; sovereignty 主权 72
nuclear power 核能 387–388, 391, 427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371–372, 376–377, 397–399, 407, 527

October Crisis 十月危机 447–450
Official Languages Act 《官方语言条例》 452–453
Ohio Valley 俄亥俄河谷 77, 79–80, 81, 97
Ohio Valley peoples 俄亥俄河谷居民 76, 110, 139
oil 石油 357, 386–387, 388, 391, 427, 428–429, 471–475
oil crisis 石油危机 427–429
Ojibwa people 奥吉布瓦人 122
Oka 奥卡 493
Olympics 奥运会 455
O'Neill, Tip 蒂普·奥尼尔 326
Ontario 安大略: economy 经济 317, 334, 405; education 教育 242, 291, 303; electricity 电力

252, 385－386; French Canaians in 在……的法裔加拿大人 293; labour 工人 236; medicare 医药 411; politics 政治 312, 317, 463－464, 489, 512, 514
Ontario Hydro 安大略水电公司 260, 386
Opportunities for Youth 青年人的机会 420
Orange Order 橙带党 181, 198, 242
Oregon Territory 俄勒冈地区 158, 159, 196－197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 388, 428, 472
Orleans, Island of 奥尔良岛 38
Ostpolitik 东方政策 421－422
O'Sullivan, John J 约翰·J. 奥沙利文 159
Ottawa 渥太华 154－155, 212
Ottawa Agreements 《渥太华协定》 331－332
Ottawa people 渥太华人 35, 70
Ottawa Valley 渥太华河谷 198
"Our Lady of the Snows" "白雪佳人" 275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15
Pakistan 巴基斯坦 381
Paleo－Eskimos 古爱斯基摩人 8
Paleo－Indians 古印第安人 6－8
Palliser's Triangle 帕利泽三角洲 231, 316, 329
Papineau, Louis－Joseph 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 171, 172, 173, 174, 175－176, 186, 193, 201
Papineau, Talbot 塔尔博特·帕皮诺 294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巴黎和会 308－310
Parizeau, Jacques 雅克·帕里佐 492, 505, 506－507, 508
Parti canadien 加拿大人党 138
Parti Québécois (PQ) 魁北克人党（简称 PQ） 445, 446－447, 453, 454, 456, 459, 505, 511
party system and party politics 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 119, 195－196, 200－201, 218－219, 233, 292, 441, 476
Pasteur, Louis 路易·巴斯德 259－260
pasteurization 巴氏杀菌法 312
Patriote Party 爱国党 170－171
patronage 公职人员的任免 162, 225, 265, 296, 312
peacekeeping 维和 384, 427, 516, 518－520, 528
Pearson, Lester B.: Centennial 莱斯特·B. 皮尔逊百年纪念 443; flags 旗帜 408; French Canada 法属加拿大 439, 440－441, 445;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381, 383 - 384, 409, 416, 417, 418, 444;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 384;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343, 376, 391, 392, 395, 396, 399, 411, 446; trade 贸易, 413
Peel, Sir Robert 罗伯特·皮尔爵士 194, 195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46, 79
pensions 养老金 409, 410 - 411, 476
Pentagon 五角大楼 525
Peru 秘鲁 17
Petain, Henri - Philippe 亨利 - 菲利普·贝当 359, 360
Peterson, David 大卫·彼得森 489
Petro - Canada 加拿大石油公司 472
Pettigrew, Pierre 皮埃尔·佩蒂格鲁 523
Philip V 菲利普五世 65
Pickford, Mary 玛丽·匹克福特 477
pioneers 先驱者 116 - 117
Pipeline Debate 反对党的异议 387
Pitt, William, the elder 老威廉·皮特 84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小威廉·皮特 127, 128, 130, 177
Pius IX 庇护九世 247
Plains Indians 草原印第安人 71, 96, 117, 228
Plains of Abraham 亚伯拉罕平原 86
plebiscites 公投 262, 352 - 353. See also referendums 另见全民公投
Poland 波兰 343, 344
poliomyelitis 脊髓灰质炎 367
pollution 污染 273 - 274, 385
Pontiac 庞蒂亚克 97
Pontifical Zouaves 轻步兵 242
Pope, Sir Joseph 约瑟夫·波普爵士 273
Population: Acadia 人口: 阿卡迪亚 75;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116, 132 - 133, 134, 167, 180, 190, 191; Canada 加拿大 217, 250 - 251, 290, 405 - 406, 503; French Canada 法语加拿大 315, 442; Manitoba 马尼托巴 232, 242; Native 土著 10 - 12, 64, 70, 94, 115, 190, 423, 504; Newfoundland 纽芬兰 95 - 96;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31, 37 - 38, 52, 53, 69; Northwest Territories 西北地区 227; Prairies 大草原 231 - 232; Province of Québec 魁北克省 129; Québec 魁北克 451, 458, 459; United States 美国 116; urban 城市的 404; visible minorities 有色少数民族 503
Port Royal 罗亚尔港 27, 28, 53, 67, 78
Portugal 葡萄牙 13, 14, 438
post office 邮局 120, 200, 286, 455

poverty 贫困 290，330，405
power 能量 See electricity；oil 见电力；石油
Prairies：agriculture 大草原：农业 250；economy 经济 405；population 人口 250；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316
Presbyterianism 基督教长老会 261
Prevost，Sir George 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 138，141，145
Price，William 威廉·普赖斯 132
Price Brothers 普赖斯兄弟 132
Prince Edward Island 爱德华太子岛 68，160，162 – 163，211，212，217，222
privateers 私掠船 102，143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321
Proclamation of 1763 《1763 年宣言》 97，121
productivity 生产力 364
professionalism 职业素养 287
profiteering 牟取暴利 351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进步保守党 363，384 – 385，390，392，419，442，490，496，512；provincial 省级的 463，512
Progressive Party 进步党 313
prohibition 禁令 262，287，288，317
Protestantism 新教 241 – 244，261，364，503；American 美国人 514；British 英国人 73 – 74；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128 – 129，152，198 – 199；and Catholicism 天主教 260 – 261；French 法国人 45；Province of Canada 加拿大省 198；Province of Québec 魁北克省 98，99；Upper Canada 上加拿大 177 – 179，179 – 181. see also Anglicanism 另见安立甘教
Protestant Reformation 新教改革 16，20，26
public enterprise 公共部门 260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409
pulp and paper 制浆和造纸 233，235，316，330
Quakers 教友派 110
Québec：civil law 魁北克：民法 466；constitional reform 宪法改革 463，488，489，490；culture 文化 394，436；economy 经济 334，335，405；education 教育 242，367，394，437，451，452，457，458，464；elections 选举 230，277，345 – 346，352，395，440，442，446 – 447，453，456，459，505，511；English language 英语 251，292，336，435，439，451 – 452，455 – 456，457 – 458，464；flags 旗帜 394 – 395；immigration 移民 250 – 251，435 – 436，488；industry 工业 440；labour 工人 453 – 454，455 – 456；popu-

lation 人口 250 - 251, 406, 435 - 436, 451, 458 - 459; prohibition 禁止 287, 288; referendums 公民投票权 459 - 461, 493, 494, 506 - 508, 509; and Riel 和里埃尔 229 - 230; sign law 标志法 457 - 458;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 336 - 337; 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 410 - 411; trade 贸易 485; U. S. relations 对美关系 528 - 529; voting rights 投票权 305, 311; wartime 战时 291, 293 - 294, 304, 335, 352. see also nationalism; separatism 另见民族主义；分离主义

Québec, Province of (colony) 魁北克省（殖民地） 94; and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101, 102 - 105; boundaries 边界 100; economy 经济 99; governance 统治 98 - 100, 100, 118; population 人口 99, 104, 129; 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124

Québec Act 《魁北克法案》 100, 101, 126, 127

Québec City: cholera 魁北克城：霍乱 190; English 讲英语的 167;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建立与发展 28, 38, 39, 53, 157, 168, 276 - 277; party system 政党制度 292; riots 暴动 306, 524; Stadacona 斯塔达科纳 18; wartime 战时 85 - 87, 102, 104

Québec conference 魁北克会议 211, 213

Québec Federation of Labour 魁北克劳工联盟 453

Québec Pension Plan 魁北克养老金计划 410 - 411

Queen Anne's War 安妮女王之战 64 - 68

Queenston Heights 昆斯顿高地 143, 144

Quiet Revolution 平静革命 437 - 440, 454

quotas 配额 251, 337

racism 种族主义 206, 251, 271, 281, 403, 423, 503 - 504

radio 无线广播 286, 327, 333

Radisson, Pierre 皮埃尔·拉迪松 54, 55

railways 铁路 152, 153, 189, 200, 206 - 207, 219, 233 - 234, 253, 286, 316, 329; transcontinental 横跨大洲 218, 222, 224 - 227, 233, 253 - 256, 255, 404

Ralston, J. L. J. L. 罗尔斯顿 354

ranching 经营大牧场 232

rationing 配给 365, 385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477 - 478, 480, 482

recession 经济萧条 467, 471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互惠贸易协定》 334
Reciprocity Treaty of 1854 《1854年互惠条约》 205，210，223，332
Recollets 黑克雷修道会 32，36
reconstruction 重建 368，375
Red River Rebellion 红河叛乱 220－221
Red River Settlement 红河定居点 55
Red River Valley 红河谷 232
referendums 全民公投 459－461，493，494，506－508，509. see also plebiscites 另见公民投票
Reform party（Canada） 改革党（加拿大） 495，496－497，512
Reform party（Province of Canada） 改革党（加拿大省） 196，200
refugees 难民 137－138，281，338，340，423，502. See also Loyalists 另见效忠派
Reid，Escott 埃斯科特·里德 383
Reisman，Simon 西蒙·莱斯曼 480
religion 宗教 241，286，503；in public life 在公众生活中 260－262；in school systems 在学校系统中 199. see also specific religions 另见特殊宗教
Remillard，Gil 吉尔·勒米拉得 488
repatriation 调回本国 462，464
representation by population 按人口确定席位 21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 420
reserve system 保留地体系 70
responsible government 责任政府 170，173，184，195，196，200，208
Ressam，Ahmed 艾哈迈德·拉森姆 502－503，525
revenge of the cradle 发源地的报复 435－436
Revolutionary War 美国独立战争 See American Revolution 见美国革命
Richelieu，Cardinal de 枢机主教黎塞留 29，30
Richmond，Charles Gordon－Lennox，Duke of 查尔斯·戈登—伦诺克斯·里士满公爵 157
Rideau Canal 里多运河 154，157
Riel，Louis 路易·里埃尔 220－221，228－231
riots 暴乱 173－174，237，251，270，306，420，523－524
Ritchie，Charles 查尔斯·里奇 374
roads 道路 133，192，286，404
Robichaud，Louis 路易·罗比肖 435
Rock ‘n’ roll 摇滚 393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会 See Catholic Church and Catholicism 见天主教会与天主教
Romanow，Roy 罗伊·罗曼诺 464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327，333，

334, 335, 341, 358, 375, 389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272, 274
Root, Elihu　伊莱休·鲁特　272
Ross rifle　罗斯步枪　295
Royal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皇家银行　257, 455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325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　439
Royal Military College　皇家军事学院　266
royal visits　王室访问　343, 393–394, 444, 465
Rupert' Land　鲁珀特地区　220, 222
Rush–Bagot Agreement　《拉什–贝哥特协定》　158
Russia　俄国　116, 271–272, 275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301, 304, 310
Rwanda　卢旺达　518, 519, 520
Ryan, Claude　克劳德·瑞安　446, 460
Ryerson, Egerton　埃杰顿·赖尔森　178, 180–181
Ryerson, Joseph　约瑟夫·赖尔森　178
Saint John, NB　新不伦瑞克省圣约翰市　119
Salmon　鲑鱼　7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261
Saratoga, NY　纽约州萨拉托加市　107
Saskatchewan　萨斯喀彻温　250, 311, 316, 405, 406, 464, 473, 514; medicare　医疗保险　410, 411
Saskatoon　萨斯卡通　331, 504
Saunders, Charles　查尔斯·桑德斯　260
Sauvé, Paul　保罗·索韦　395
Schoultz, Nils von　尼尔斯·冯·舒尔茨　182
Scotland　苏格兰　44, 73, 124, 163–164, 189
Scott, Thomas　托马斯·斯科特　221
scurvy　坏血病　18, 27, 28
Seagram Building　西格莱姆大厦　406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285, 338, 341–357, 371, 375
secularism　世俗主义　403, 404, 437, 503
segneurial system　庄园主体制　50, 51, 52, 185
self–government, Native　土著自治政府　424–425
Selkirk, Thomas Douglas, Earl of　托马斯·道格拉斯·塞尔扣克伯爵　155–156
seminaire de Québec　魁北克神学院　37

Senate 参议院 281, 488, 489
separate schools 独立学校 199, 242 - 244
separatism 分离主义 293, 306, 419, 444 - 445, 446, 450 - 451, 454, 456, 481, 492, 504 - 511, 512; October Crisis 十月危机 447 - 450; Quiet Revolution 平静革命 438 - 439; referendums 全民公投 459 - 461, 493, 494, 506 - 508, 509
Serbia 塞尔维亚 522
service sector 服务业 523
settlement patterns: British North America 定居模式：英属北美 116 - 117, 120 - 121, 132 - 133, 133 - 134, 190; New France 新法兰西 50, 69; prairies 大草原 316; Province of Québec 魁北克省 124; Upper Canada 上加拿大 166 - 167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81 - 88
Sharp, Mitchell 米歇尔·夏普 412
Shawnee people 肖尼人部落 139
Shelburne, NS 新斯科舍省谢尔本市 119
Sherbrooke, Sir John 约翰·舍布鲁克爵士 143, 146, 157
Shirley, Sir William 威廉·雪利爵士 76
Sicily 西西里岛 353
Sidbec 钢铁工业 440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110
Sifton, Sir Clifford 克利福德·西夫顿爵士 249, 250, 254, 279
Sikhs 锡克教徒 281
Silliman, Edward 爱德华·西利曼 168 - 169
silver 银 253
Simcoe, John Graves 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 133 - 134
Simpson, Sir George 辛普森，乔治爵士 156
Simpsons 辛普森一家 235, 286
Sinai Desert 西奈沙漠 518
Skelton, O. D. O. D. 斯凯尔顿 320, 339 - 340
Skraelings 丑人 9
slaves and slavery 奴隶和奴隶制 110, 118, 157 - 158, 159, 204, 206, 208
Smith, Donald 唐纳德·史密斯 227
Smith, Goldwin 戈尔德温·史密斯 240
Smoot - Hawley bill 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 332
Smuts, Jan 杰·史黑兹 309
Social Credit 社会信用党 334, 390, 396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10, 368, 406 - 407, 454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 369
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 262, 369 - 370, 407, 409 - 412, 476, 514 - 515

softwood lumber 软木木材 485 - 486, 525
Somalia 索马里 518 - 519, 520
South Africa 南非 153, 267 - 270, 318, 517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 46, 203 - 204
sovereignty, coastal 沿海主权 203
sovereignty - association 主权 - 结合 459, 505. see also separatism 另见分离主义
Soviet Union: Cold War 苏联：冷战 372 - 373, 376, 378, 379, 381, 427; and communism 共产主义 358 - 359, 373, 421; espionage 间谍活动 372; in Europe 在欧洲 383, 384, 421; imperial 帝国的 438;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344, 348
Spain 西班牙 129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341
Spicer, Keith 基思·斯本瑟 494
St. John's Island 圣约翰岛 126
St. Laurent, Louis 路易斯·圣劳伦特 352, 353, 356, 374, 376, 378, 381, 390, 391, 409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 30, 143 - 144
St. Lawrence Seaway 圣劳伦斯海道 391
St. Louis, MI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73
St. Pierre 圣皮埃尔 88, 360
Stadacona 斯塔达科纳 18
stagflation 滞胀 429 - 430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344, 348, 358, 372, 377, 378, 381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平 218, 252, 350, 364, 403, 423, 471
Stanfield, Robert 罗伯特·斯坦菲尔德 446
staples theory 大宗出口理论 327 - 328
Statute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法》 321, 325
Ste. Croix 圣克罗伊 27, 28
Ste. Marie Among the Hurons 休伦区的圣玛丽 33
steam power 蒸汽动力 152
steamships 蒸汽船 152, 168, 189
steel 钢 253, 440
Stephen, George 乔治·斯蒂芬 227
Strachan, John 约翰·斯特罗恩 178, 179
strikes 罢工 310, 411, 430, 446, 454, 455 - 456
subsidies 资助 234, 318, 479, 485; colonical 殖民地的 51, 93, 99, 131, 153, 158; federal 联邦的 331, 460, 513
Sudbury, ON 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市 233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382 – 384
sugar 糖 45, 64, 257
Suharto 苏哈托 517
Sulpicians 稣尔比斯会 36
Sumner, 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 223, 224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463, 488, 489, 510, 511
Sydenham, Charles, Lord 查尔斯·西德纳姆勋爵 195
Taft, 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274, 278
Talbot, Thomas 托马斯·塔尔博特 120 – 121, 181
Talon, Jean 让·塔隆 51, 52
tariffs 关税 237 – 239, 258 – 259, 278, 328, 331, 332, 415, 523; pre – Confederation 前联邦 131, 146, 166, 201 – 202, 207; preferential 特惠的 275
Tarte, Israel 伊斯雷尔·塔特 244, 269
Taschereau, Louis – Alexandre 路易 – 亚历山大·塔什罗 315, 316, 337
taxation 税收 258, 364, 369, 430, 494;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120, 138, 153, 166, 200, 207; colonial 殖民地的 94, 107, 118, 123; income tax 所得税 307, 317, 345, 351; Ontario 安大略 317; War of 1812 1812 年战争 146
Team Canada 加拿大代表团 517
Tecumseh 特库姆塞 139 – 140, 142, 144
teenagers 青少年 393
telegraph 电报 152, 189, 219, 286
telephone 电话 219, 234, 286, 522
television 电视 393, 416, 522
Tenskwatawa 坦斯克瓦特瓦 130 – 140
terrorism 恐怖主义 439, 447, 448, 449, 502 – 503, 525
Test Ban Treaty 《禁止核试验条约》 407
Texas 德克萨斯 159, 197
Thames, Battle of the 泰晤士战役 144
theatre 剧院 37
Thompson, Sir John 约翰·汤普森爵士 243
Thomson, Charles Poulet 查尔斯·普莱·汤姆森 186. see also Lord Sydenham 另见西德纳姆勋爵
Thoreau, Henry 亨利·索罗 159
Thule people 图勒人 9
Ticonderoga, NY 纽约州提康德罗加市 85
Tilley, Sir (Samuel) Leonard （塞缪尔）伦纳德·蒂利爵士 212, 213, 219

timber industry 木材业 132, 152, 153, 163, 192 - 193, 198, 233, 253, 326, 349; trade 贸易 118, 131, 154, 485 - 486, 525
tithes 什一税 128
tobacco 烟草 125
Tobin, Brian 布莱恩·托宾 507
Tocqueville, Alexis de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161, 186
Toronto 多伦多 133, 144, 191, 285
torture 酷刑 67
Toryism 保守主义 161 - 162, 165
Tory party 托利党 200, 202 - 203
trade 贸易 See under British Empire; Canada - U. S. trade; Native peoples 见大英帝国; 加美贸易; 土著人条目
Trade Agreements Act (U. S.) 《贸易协定法案》(美国) 333
trade policy 贸易政策 201 - 202, 223, 237 - 239, 240 - 241, 312, 327 - 328, 340, 413, 517; U. S. 美国 203 - 204. See also Britain; British Empire; Canada - U. S. trade; mercantilism 另见英国; 大英帝国; 加美贸易; 重商主义
trade unions 工会 350, 406, 453 - 454. See trade unions; unions 见工会; 工会
Trans - Canada Highway 横贯加拿大公路 404
Trans - Canada Pipelines 横贯加拿大管线 387
transfer payments 转移支付 513
transport 运输 116, 117, 152 - 153, 154 - 155, 189, 190, 191 - 192, 219, 250, 286; urban 城市的 235, 252, 385
Treaty of Aix - la - Chapelle 《艾克斯 - 拉 - 沙佩勒条约》 76
Treaty of Ghent 《根特条约》 146, 151
Treaty of Halifax 《哈利法克斯条约》 121
Treaty of Utrecht 《乌得勒支条约》 68, 74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塞条约》 310
Trea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条约》 239, 271
Trent 特伦特 209
Trois - Rivieres 三河城 31, 38, 53
Trudeau, Pierre Elliott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Québec 宪法改革和魁北克 445 - 446, 452, 453, 456 - 457, 459 - 460, 461 - 467, 489 - 490; energy policy 能源政策 474; foreign relations 外交关系 422, 478; nationlism and the Just Society 民族主义和公正社会 419 - 420; October Crisis 十月危机 448 - 450; politi-

cal career 政治生涯 418－419，426－427，429，430，431，436，471
Trueman，Peter 彼得·杜鲁门 490
Truman，Harry 哈利·杜鲁门 372，373，374，377，416
Tupper，Sir Charles 查尔斯·塔珀爵士 212，219，243，264
Turkey 土耳其 320
Turner，John 约翰·特纳 474，476，480，481，482
typhus 斑疹伤寒 191
Uganda 乌干达 423
Underground Railroad 地下铁路 206
unemployment 失业 290，340，365，404，426，471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失业保险 426，462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441
Union Nationale 民族联盟 337－338，395，447，451
United Church 联合教会 503
United Farmers 联合农民 312，317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 See Britain 见英国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374－375，377，383－384，516，518，519，522，526，527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 联合国紧急部队 384. see also peacekeeping 另见维和
United States：annexation 美国：兼并 159，202－203，204，223，240，501；Civil War 内战 205，208－210，223；culture exports 文化输出 393，416；expansion 扩张 116，138－139，152，159，197，205；governance 统治 128；immigration from 移民来自 132，133，134－135，176－177，206，218，232，251，258；Native peoples 土著人 139－140，151，158；politics 政治 514－515；population 人口 116. See also Canada－U. S. relations；Canada－U. S. trade 又见加美关系；加美贸易
universities 大学 337
Upper Canada：creation of 上加拿大的创建 119，129；governance 管理 133，179，181；population 人口 133，134，167，180；settlement patterns 定居模式 133－134，166－167；timber trade 木材贸易 192. See also Canada West 又见加西
uranium 铀 371，387，388
urban development 城市发展 191，218，251，260，285，287，329，385，404
U. S. Civil War 美国内战 205，208－210，223
Vallieres，Pierre 皮埃尔·瓦利埃 448－449
Vancouver 温哥华 251

Vancouver Island 温哥华岛 116, 129, 159, 197
Van Horne, Sir William 威廉·范霍思爵士 227
Vauban, Sebastien Le Prestre, Marquis de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沃邦侯爵 75, 76
Vaudreuil – Cavagnal, Pierre Francois de Rigaud, Marquis de 皮埃尔·弗朗索瓦·德里戈·沃德勒伊 – 卡瓦尼诺侯爵 82, 85
Venezuela 委内瑞拉 388
Vermont 佛蒙特 133, 136 – 137, 143
Verrazzano, Giovanni da 乔万尼·德韦拉扎诺 14, 19
Vespucci, Amerigo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 14
veterans' benefits 老兵的利益 366, 370 – 371, 394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174, 219, 263, 270
Victoria Bridge 维多利亚大桥 206
Victoria Charter 维多利亚宪章 450 – 451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416 – 418, 420, 427
Viger, Denis – Benjamin 丹尼斯 – 本杰明·瓦伊格 176
Vikings 维京人 8 – 9, 12
Vimy Ridge 维米岭 304
Vinland 温兰德 8 – 9
Virginia 弗吉尼亚 20, 29, 38, 79, 81
visible minorities 有色少数民族 503 – 504, 536
voting rights 投票权 135, 165, 172, 262 – 263, 305, 311, 504
voyageurs 旅行家 28
wages and price controls 工资与价格控制 347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512 – 513
walrus 海象 19
war brides 战争新娘 366
War Measures Act 《战时措施条例》 289, 344, 350, 448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 121, 124, 138 – 147, 151, 156, 159 – 160, 285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75 – 76, 77 – 78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64 – 68
war production 军工生产 307, 311, 346, 347, 348, 349, 357 – 58, 365
Wartime Elections Act 《战时选举条例》 305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81, 102, 105, 110, 119, 128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524
Webster – Ashburton treaty 《韦伯斯

特－阿什伯顿条约》 159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see social welfare 见社会福利
Welland Canal 韦兰运河 154，200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亚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 141，145，146，157
Wells，Clyde 克莱德·韦尔斯 491，492
Western alienation 西部的疏远 420，473，494－495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108，131
Westmount 威斯特蒙特 336，439
wheat 小麦 167－168，231，251，254，316，326，329－330；Marquis 马奎斯小麦 232，250，260；trade 贸易 51－52，118，131，193，194，289，349－350，374
wheat pools 小麦联营 329
wheel 车轮 5，6
When Irish Eyes Are Smiling 《爱尔兰的微笑》 478
Wilde，Oscar 奥斯卡·王尔德 271，389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275，308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198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304，309
Windsor，ON 安大略省温莎市 330－331
Winnipeg 温尼伯 225，251，504
Winnipeg General Strike 温尼伯大罢工 310
Wolfe，James 詹姆斯·沃尔夫 85－86
Wolseley，Garnet 加尼特·沃尔斯利 221
women：in armed forces 在部队服役的妇女 357；education 教育 367；labour 劳动力 311，366，367；suffrage 选举权 135，262－263，305，311
Woodward's 伍德沃德的 235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524－525
World Trade Center 世贸中心 52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486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See First World War 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e Second World War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
Wright，Philemon 菲利蒙·赖特 132
Wrong，Hume 休姆·朗 377
year 2000 2000年 521－522
yellow fever 黄热病 29
Yonge Street 永日大街 133
York 约克 144
Youth culture 青春文化 393，405，408，420，438
Ypres 伊普尔 297
Yukon Territory 育空地区 252－253
zinc 锌 253

书名=加拿大史=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作者=（加）罗伯特·博斯韦尔著；裴乃循，符延军，邢彦娜，耿小岩译
页码=518
ISBN=
SS号=13106152
dxNumber=000008268295
出版时间=2012.03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68295&d=2C403E7F4945DD56BEB904FF2D5A71CE&fenlei=1108070101#ctop
全文地址=084e29b4d2bd1db88af0a06c82b326c6/img19/F1596FAFBE3025E4FA6476BE675AFDA17D1CC8824EE2E284ABEDC891BE791179F8AE9C363F1641FC5FB5A9AC7AD38586BE7307472EED7DD2E9DE1C518D50B14AE49D7399BBE0CC6D4184409867B63A67AF40669648FFD33F86CF706A99B5F6563FA0E71BB39767FD6A93FDC6AB9D92DD5FFF/n35/qw/